

第二卷

# 廣東文史資料存稿選編

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广东人民出版社



# 目 录

## ·护法运动和孙中山 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

海南讨袁斗争的回忆 .....	梁秉枢 (3)
讨龙入狱的回忆 .....	何侠 (11)
香山讨袁一役 .....	萧宝耀 (12)
宝璧舰反袁讨龙起义经过 .....	卜汉池 (13)
对《旧海军南下护法及北归纪略》一文的几点补正 .....	胡应球 (17)
狄河护法运动的回忆 .....	马培清 (23)
护法之战的回忆 .....	程潜 (26)
护法之役北洋军第一路在湘作战经过 .....	王之佑 (114)
1917年临洮护法运动记略 .....	郑瑞青 (134)
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 .....	熊克武 (138)
护法之役中的四川靖国军 .....	吴克雄 (145)
护法运动时期冯玉祥武穴通电主和前后 .....	张之江 鹿钟麟 吴景南 (150)
湖北靖国军民众武装纪略 .....	曾榆村 (161)
靖国军在鄂西的活动与鄂西神兵 .....	胡复 (178)
非常国会在昆明 .....	高子厚 (188)
参加护法援闽战役的一点回忆 .....	甘融 (195)
大元帅府见闻 .....	黄梦熊 (201)

护法政府之变迁	高承元	(209)
参加护法战争后的回忆	方鼎英	(213)
我在护法战争后的活动	仇鳌	(249)
桂系军阀之盘踞广东	李朗如	陆满 (254)
驻粤滇军内部分化的见闻	徐祚新	(264)
方声涛护国护法及援闽经过	邹孔昭	(271)
程璧光被杀内幕	许让玄	(279)
关于援闽粤军的回忆	李朝彦	(280)
粤军回粤策反活动的片断回忆	范准	(289)
对粤军回粤虎门各路联军活动的一些回忆	叶少华	(295)
朱执信先生虎门殉难记	何博	(297)
朱执信先生之死	徐直公	(301)
第一次北伐时一次军械运输	张带山	(304)
1922年参加飞机队北伐亲历记	胡汉贤	(306)
桂林韶州随军回忆录	陈海瀛	(324)
孙中山北伐时的赣军先遣支队	胡运鸿	(326)
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时的警备军	张可廷	(328)
大本营警卫团成立经过	李洁之	(332)
北伐军大本营将校团始末	曾其清	(339)
陈炯明部将在背叛前后的言行	李朝彦	(344)
关于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的一点补充资料	区摹常	(353)
陈炯明军炮击永丰舰目睹记	苏济川	(355)
第一次北伐回师靖难失败的回忆	梁国武 梁秉枢	(358)
陈炯明叛变时护法议员的遭遇	高子厚	(367)
陈炯明统治广东时期的若干措施	王鸿鉴 黄绍声	(369)
我被陈炯明叛军拘禁的一段经历	杭毅	(378)
关于叶剑英曾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辨正	胡应球	(383)
关于卢焘率滇军入桂的回忆	黄梦年	(385)

---

滇军经桂东下讨陈的经过	杨右丞	(389)
滇军朱培德部入粤片断	卓仁机	(394)
杨希闵部滇军入粤及被消灭的经过	张适南	(398)
1923年北军入粤记	任启圣	(405)
参加驱逐陈炯明战事的片断	罗良斌	(409)
建国攻鄂军始末	唐菊庵	(412)
刘震寰入粤前后	朱绍武	(424)
江防会议事变后的陈德春	王鸿鉴	(434)
入粤滇军范石生部最后消灭记	陈杰夫	(437)
建国粤军第三师概况	曾其清	(445)
刘玉山东下讨伐陈炯明的经过	陈剑崖	(451)
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	廖行超	(455)
1921—1922年的滇黔赣联军	龚师曾	(488)
邓本殷统治时期灵山钦县地区的贩毒略况	廖燎	(496)
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回忆	冯璜	(507)
林俊廷在廉州的失败	李家述	(514)

## • “五卅”运动与沙基惨案•

“五卅”惨案第一枪	周尚	(523)
“五卅”惨案亲历记	何志明	(530)
我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一些活动	江森裕	(534)
回忆“五卅”运动片断	王光钊	(536)
国民革命在同济	何志明	(542)
关于沙基惨案的见闻	张适南	(553)
沙基惨案的一鳞半爪	宋瑞珂	(557)
忆“六二三”沙基惨案	杨维泉	(561)

“沙基惨案”亲历见闻.....	张采庵 (565)
“沙基惨案”目击记.....	李纪麟 (569)

## ·北伐战争·

梁鸿楷等大塘会议倾覆政府事泄被扣案 .....	林祥 (573)
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 .....	叶少华 (582)
我所知道的张国桢和张被蒋介石杀害的经过 .....	李朝彦 (593)
蒋介石迫逐许崇智下野前夕见闻 .....	林祥 (604)
北伐前后我参加大革命的经历 .....	沈沛霖 (608)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	唐生智 (630)
北伐前北洋军阀动态片断 .....	刘毓源 (639)
北洋军阀在两湖战场失败实录 .....	刘少泉 (643)
武昌守城战役纪实 .....	朱明轩 (649)
武昌围城见闻 .....	高启东 (654)
对邓演达兼任围攻武昌城司令的回忆 .....	文强 (661)
邓演达、恽代英派耿丹到汉口运动刘佐龙起义 .....	李泽民 (668)
北伐会师武汉的回忆 .....	晏勋甫 (670)
1927年的晋奉之战 .....	鲁穆庭 王理寰 谢珂 (676)
阎锡山在“二次北伐”中取得京津地盘的原因 .....	李泰棻 (680)
吴佩孚军队在两湖被歼的经过 .....	刘维黄 冯巍 (688)
关于东征军、西征军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	
回忆 .....	谢慕韩 (704)
1927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 .....	唐菊庵 (720)
王天培的《宁归歌》 .....	龙和甫 (723)
王天培之死 .....	孟绍廉 (725)
我代表冯玉祥联络刘镇华、靳云鹗等的经过 .....	席液池 (730)

奉军败走河南之役	刘翼飞	(736)
直鲁联军三将领天津反正片断	赵激生	(743)
第八军政治工作片断	苟怀谦	(746)
北伐中的松口之战见闻	丘一中	(748)
扫帚战略和口袋战术	李培基	(756)
对大革命时期中央独立师的回忆	蓝香山	(759)
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	蓝文蔚	(767)
二次北伐中三十七军的政治工作	向 之	(770)
龙潭战役片断回忆	张文鸿	(775)
蒋介石对谭延闿系的利用和排斥	李家白	(783)
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时的航空部队	曹宝清	(788)
李汉魂枪杀胡谦始末	陈孝伟	(798)

# 护法运动和孙中山 在广东三次建立革命政权



## 海南讨袁斗争的回忆

梁秉枢\*

袁世凯充当了总统后，想做皇帝，便秘密勾结日、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于1913年宣布向六国（日、英、美、法、德、俄）银行大借款，阴谋取消共和，恢复帝制。于是引起国民党革命人士纷纷反对，当时孙中山先生正从日本返回上海，既反对袁世凯大借款，又痛恨袁主谋暗杀宋教仁，就毅然主张立即讨袁。陈侠农是国民党籍的国会候补议员、反对大借款的激烈派，于1913年潜来上海会见孙中山先生，坚决响应孙先生立即讨袁的号召，并马上返粤与广东都督共谋独立讨袁大计。二次革命失败后，陈侠农以琼崖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在香港与琼崖的国民党军人如陈得平、吴公侠等密商组织琼崖讨袁军驻香港联络机关，并定陈得平、吴公侠为在港的负责人。同时又派人往暹罗、新加坡、马六甲等地组织讨袁军的海外联络站，以支援琼崖讨袁工作。暹罗联络站设在琼岛会所，由王开刚、陈星五、詹访先等负责；新加坡联络站设在同文书报社，由吴澄洲、王公傅负责；马六甲联络站设在琼州会馆，由郭巨川、郭镜澄负责。之后，陈侠农就返回琼崖在海口泰昌隆旅店，秘密设计讨袁军总司令临时办事处。同时他又与国民党籍的国会议员梁典章密谋，进行讨袁活动。

当时陈侠农又带吴公侠的介绍信密到琼山演丰市找吴的胞弟吴佩三，取出吴公侠密藏在家中的四支驳壳手枪，并交出吴所介绍当地革命青年的名单，如徐成章、梁秉枢、熊受天和张梦麟

\* 作者当时系琼崖讨袁军领导人。

等，由吴佩三通知他们来会面，共商琼崖讨袁计划。大家研究后，决定在琼山县演丰市附近的白石溪，密设琼崖讨袁军总司令部，作为指挥讨袁斗争总机关，以种植、畜牧的公开招牌作掩护，暗中进行讨袁活动。惟因那时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部下黄志桓为琼崖镇守使，约拥有一团兵力，分驻在海口府城、文昌、加积、定安、万宁和澄迈等地，以及各县市还设有警察机构，这些反动势力虽然力量不大，但是那时当地的封建势力还很浓厚，群众觉悟不高，因而仍阻碍讨袁工作进行。所以讨袁人员白天不得不化装为农民、小商贩、算命和堪舆等模样，到各地宣传组织讨袁工作，晚上才返回白石溪休息和汇报工作情况。同时在文昌潭牛市附近的陈宗舜家，白延市附近的梁英家，抱罗市附近的林家（忘记其名），以及树得头、南阳附近的乡村分设计讨袁工作联络站，以白石溪为联络中心，经常指挥各地进行讨袁活动。各地讨袁人员均经常到白石溪来联系，陈侠农总司令除在白石溪指示和布置工作之外，有时还往文昌白延与梁典章、梁英商量并指导工作。

当时讨袁经费的来源：一方面是依靠当地殷商富户及热心讨袁人士的捐助；另一方面是由南洋各埠的爱国侨胞的捐募支援，于是我们设在香港的联络机关，收到南洋联络站所汇回的钱，就由香港购买驳壳枪 24 支，每支配购子弹 100 颗，暗藏在两张沙发里，偷运回海口机关，再从海口分批多次转运到白石溪总机关，才初步组织起讨袁武装力量。

不久以后，讨袁的武装力量的组织有一定发展，我们便开始军事行动，打算夺取万宁、陵水、崖县等县城为根据地，再向府城海口推进。于是讨袁军总司令陈侠农即决定抽调琼山、文昌两地的枪支在 2 月中集中于白延市附近候命。而琼山县的枪支即先集中在白石溪，并派梁秉枢、徐成章率领限于 2 月中到白延附近的目的地；文昌的枪支集齐后，由梁国一和洪太初率领限于 2 月中抵达白延附近的目的地。然后由陈司令率队日伏夜行，潜入

保亭县兴隆市驻扎于黎境。即策动黎首钟奇曾、钟孟君兄弟两人，站在我们这一边讨袁，策动钟奇曾兄弟与我们共同行动的是黄胜朱、陈翼甫。而黎首钟奇曾兄弟所领导的黎民有三四千人，他们多装备土制药枪，也有少数好枪，其力量是不小的。当时钟奇曾答应决心率所属黎民与我们进攻万宁县城，于是我们讨袁军的声势壮大了。那时敌人防守万宁县城的部队是杨锦隆一连兵，力量很单薄，所以闻风破胆。我讨袁军四面包围万宁县城，就从东西二门进攻，敌人死伤惨重，结果敌不支，急向北门败退。而我军东路指挥也在这役阵亡，且受伤数人。至我军进城时，敌人已逃走一空，我军缴获甚多，敌万宁县知事已逃跑无踪。陈侠农即委派钟奇曾为万宁县知事，维持治安，博得黎民拥护。万宁战事结束后，我们又乘胜转攻陵水县城，该城敌人早闻风逃跑，而该城内只有20余名警察，均向我们投诚。因为该县城无人负责维持，陈侠农司令即委派另一黎首刘某为陵水县知事，暂维持治安。接着我们又夺取了新村港，连战皆捷，就再乘胜直向崖县、三亚进发。该地敌人的防守部队也是杨锦隆部另一个连及警队30人。而该连长张圣之为陈侠农的同乡，他早同情革命，于是陈即先亲往榆林，派代表到三亚策动张率部起义，同时又派梁秉枢、徐成章和梁国一等三人率队由陵水到榆林帮助策反工作。但适值张圣之因事请假返里，其职务由营附代理，以致派往的代表，竟被该营附扣留。策反工作遭到挫折，陈侠农就不得不马上离开榆林，等到梁秉枢等赶到榆林时已不相遇。

但是我们在归途中，却碰着该连前排长姜飞（他以嫌疑而遭撤职），他知道我们去榆林的意图，便主动找我们商谈，表示他愿意参加讨袁工作，并说驻在崖县的敌人、三亚的敌人中，有他前部下两个班长岑峰与梁某（忘记其名），都有革命倾向，他能策动他们起义，只要我们跟他重返榆林，由他写信介绍我们代表带往三亚交与岑、梁两班长，在暗面时相机与他们密商进行策反工作，这样就能加强他们的决心。我们觉得这次机会不能放过，

乃决定派代表冒险到三亚将姜飞的介绍信交给岑、梁两班长洽商，结果他们果然同意起义。三亚敌驻军原分为三处防守，一个排驻在河边炮楼上，还有两个排是和连部驻在另一块地方，盐警队就驻在盐知事衙门，在三亚对面的一个小岛上。敌人力量分散，利于我们进攻，所以我们就与岑、梁两班长约定在某天早晨4时开始行动。我们集中在榆林的部队，均化装乘渔船偷渡三亚，摸黑登岸时敌人毫不知觉，我们便迅速用炸炮攻破敌炮楼，围攻敌人两个排及连部，岑峰等班长闻枪声立即内应率部起义，并马上将敌营附和排长通通枪毙。我们占领敌人炮楼的同时，也接受敌连部与那两个排的投诚。至于盐警队已逃之夭夭，所以三亚战事便迅速解决。陈司令未久也来了。我军便将起义军改编为琼崖讨袁军第一支队，下辖三个小队，以姜飞为第一支队长，岑峰副之，并兼第一小队长。那时据民众报告说，在盐知事衙门有子弹数箱埋在地下，我们便如数挖出，并由民众为向导，把躲藏在盐知事同乡（非本地人）家中的盐知事衙门的秘书科长及科员等三人逮捕，而盐知事往海口尚未归，故免。至于星散的盐警队，也由民众为向导分头招回，均编入第一支队归姜飞指挥。由于该盐知事自到任以来，便对民众横征暴敛，增加盐税十余倍，人民恨之入骨。讨袁军攻克三亚之后，即出布告安民，取消一切苛捐杂税，民众欢欣鼓舞。而曾受过其剥削的民众，那时情不自禁，便纵火焚烧了盐知事衙门。并一致要求讨袁军将该秘书科长枪毙，以平民愤。

三亚战事胜利后，讨袁军的力量更加强大了，各地敌人无不动摇，尤其崖县知事知道三亚被讨袁军攻克的消息，更为震惊，就弃职潜逃，其县政府由20余名警兵看守，均反正，崖县顺利收复。该县知事平日无恶不作，民愤甚大，群众受了三亚战事胜利的鼓舞，一闻该县知事弃职潜逃，即群起从四面八方截路搜捕，终于被黎民兄弟拿获，就用水将他活活淹死。当时崖县县政无人主持，就由商会临事维持地方秩序，群众便派代表来三亚请

求讨袁军派人去维持治安。讨袁军顺从民意，开入崖县城，群众夹道欢迎，情绪热烈。

当时讨袁军因一部分调往陵水，致使万宁县城力量单薄，敌人就集中力量反扑，钟奇曾县知事那时的紧急报告说：“万宁县城被敌集中力量反攻，我军不支，迫得退回兴隆市候命。”因此，我军始决定回兴隆计议收复万宁县城，进攻加积市，向府海推进。当时即指派钟奇曾率队收复万宁县城，我们率队进攻加积市。正当我军开到距加积市约十余华里的椰子寨时，适值端午节，便在那里劳军休息。忽闻万宁县城已为钟奇曾率队收复，所有败退的敌人均向加积撤退。而敌人撤退到椰子寨时适与我军发生遭遇，约激战六小时，敌我伤亡均重，我方一秘书（姓名忘记）就在此役阵亡。结果敌军不支，退回加积，这样，敌人在加积的防御力量比前加强了。但那时琼东的敌人只有一排防线，因怕我军把他吃掉，也急忙退入加积市。于是我军便改变进攻加积市的计划，而绕道攻克了琼东县城。未久，敌人从文昌、定安和加积增兵反攻琼东县城，而我军为了保持实力计，只好自动撤退回定安翰林市一带驻扎休整，准备新的行动。那时候计划调万宁钟奇曾部增援，准备夹攻加积市，歼灭敌人的力量。

1915年，袁世凯称帝后，全国人民群起反对。惟琼崖文昌白延迈仍村的保皇派林肇洲为首的封建势力，恃其族大人多，有的在南洋发财，有的在北京做大小京官，有钱有势，大量购置枪械，以其贵德祠为拥护帝制的总机关，以其武装与反帝制的讨袁军对抗，任意压迫和屠杀白延附近的非林氏的十多姓乡民，迫得白延附近的各姓青年更多地参加了陈侠农所领导的讨袁军。后来这些青年都归洪太初率领，不在话下。迨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不久病死，由黎元洪任总统，广东仍为袁氏余孽龙济光所盘踞。至桂军陆荣廷率师入粤，广东形势又形紧张，而龙济光自知大势已去，便派代表与陆荣廷和谈，提出条件要求陆给予新职，调他往琼崖安置新部，则让位给予陆。陆答应龙的要求，将龙所部尽

调往琼崖。

1915年6月，龙济光率部到琼崖做琼崖矿务督办后，就与当地封建势力互相勾结，尤其一向拥护帝制的林少洲，对琼崖民众的摧残加深。当时龙济光是假督办矿务，真拥兵自雄，对琼崖讨袁军更加疯狂地拿捕屠杀，而讨袁军因鉴于袁世凯既死，而讨袁军经费的来源也极端困难，于是讨袁军通过驻港联络机关，奉得上级指示，陈侠农司令便将在琼崖讨袁斗争了三年余的讨袁军解散。他以后便只身赴港转至广州。讨袁军在解散以后，黎族民兵，各归原籍。其余一部分部队由姜飞率领调回万宁兴隆一带听候改编；一部分由陈继虞率领组成琼崖讨龙（济光）护国军。陈继虞自任该军总司令。一部分琼文籍革命青年由洪太初、梁国一等率领回文昌反对白延林少洲为首的封建势力。其中也有不少革命知识青年逃往广州，或是南洋，如梁秉枢、徐成章、洪世扬、文鸿恩、罗连峰、文朝籍等许多人。后来这些革命青年都从广州或南洋转入云南讲武学校，他们毕业后，大多数都投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部队，从事反军阀的革命斗争。

袁世凯死后，国会又在北京重开，陈侠农以国会议员身份就赴北京对革命有所活动，不料被白延林姓住京的劣绅向段祺瑞政府诬告，陈侠农就被段祺瑞政府逮捕而杀害。但其在琼崖的部属由陈继虞所率领的那部分，最后仍会同广东讨龙护国军将袁世凯的爪牙龙济光打倒了。

以上所述的史料，一部分来自我亲身的经历，一部分出自陈侠农司令的口述。但因年代久远和我年老记忆力衰弱，难免没有遗漏，或是时间、地点、人名都莫无出入的地方。不过仍可供参考。

（1966年）

## 补充：

对梁秉枢同志所写的《海南讨袁斗争的回忆》一文，现就我所知道的一些事实，作些补充。

1. 海南岛地区，当时所选出的国会议员，只有三名是正式议员，两名是候补议员，正式议员是林格兰、陈治安、陈法檀等三人，候补议员是陈业农（陈侠农）、王钦宇等两人，其中林格兰是暹罗华侨，留学日本法科，是海南岛人最早在日本参加同盟会者，后因林在海南岛充琼崖日报社社长，在报章上发表反对袁世凯向六国银行借款，同时揭露袁氏主谋暗杀宋教仁，和想取消共和、恢复帝制阴谋的言论，于1913年春，被袁党琼崖镇守使陈世华在琼山府城逮捕枪毙。袁氏死后，国会在北京重新召开，陈业农才得顶补林格兰的国会议员名额，梁文所指出，陈业农在爱国会议员中，是反对大借款的激烈派，因而遭到袁世凯的大力排挤，免去国会议员职务。其实陈当时是属候补议员，尚没有资格参加国会议席，怎么能够说陈在国会中，是反对大借款的激烈派呢？时间与事实，是有出入。陈业农在广州进行活动，由胡汉民派他为琼崖讨袁军总司令，叫他返琼崖策动讨袁的工作。

2. 琼崖讨袁军失败主要原因是：

(1) 由于文昌县白延市附近迈仍村大恶霸林肇洲等，恃其族大人多，有钱有势，平时横行乡里，压榨邻近乡村各小姓族乡民。当时各乡村小姓的青年，因不愿受林肇洲的压迫和侮辱，一致奋起参加讨袁军。他怕这些青年乘机报复，就勾结袁氏余孽文昌县知事胡熹（安徽人）、琼崖镇守使黄志桓（广东钦县人），购置大量枪械，组织林姓子弟兵一二百人，专与讨袁军对抗，大肆屠杀焚烧白延市附近二三十个各小姓的乡民和屋宇，从中阻挠讨袁军的发展。

(2) 运动雷州半岛著匪李福隆，率领他的匪众约一千人，过来海南岛协助讨伐胡熹等余孽，但因李匪贼性难改，一到达文昌

县的铺前港，就停止不前，不听调遣，大肆洗劫铺前锦山波罗等20多个市镇和乡村，即由原船溜回雷州半岛。

(3) 因龙济光由广州来海南岛，以大兵压境，讨袁军仅有百余（因钟奇曾、钟孟君的黎兵，不愿远离黎境），更觉众寡悬殊，难于支持，陈业农就将讨袁军结束。

(梁国武补充)

(1966年)

## 讨龙入狱的回忆

何 侠 \*

我自沪与蔡和坡同乘招商局之广生轮船到香港，与蔡分手后自己与同志入粤，寓广州东堤花捐局和惠总公司。我与何造时为同乡又属同志，商议设机关密谋讨龙。其时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统率龙观光、段尔源、马存发三军人马驻粤，驻扎观音山，架天桥至旧省署，军警护卫，严密非常。其时肇庆都司令岑春煊委魏邦平为广东南路攻城司令，余任广东东路攻城司令。余在新塘、南海招兵买马，并运动观音山宪兵营邝元武为内应，同时设讨龙机关于和惠公司，公推何造时为广东都督、何揖仙为参谋长，定期相约起事。因一时不慎，事机不密，为马存发部下侦缉人员识破。次日约期发难，是夜三更被马部重重包围，遂被执。押余在昔日之台山会馆，即今华侨中学。经过数次刑讯，不肯招认，但求速死。押约有三四十天左右，最后一次提审迫供，余曰：“我为革命而牺牲，但求速死，何须多问，但余死后，生而无愧，死亦有荣，要杀就杀，不必多问。你这样摧残革命党人，将来难逃世人之唾骂耳。余言尽矣，请快执行。”军法官马品三阅后命余画押，余写一十字。当日天阴地暗，余签字时日由天窗照到余画之十字上。余想，尚有见天日之日乎？迨李烈钧兵到石围塘，朱庆澜来粤做省长，请龙济光到琼崖，即刻出城，乘舰往海南岛。马品三接龙电，手忙脚乱，即解余缚释余出，并以好言慰我而去。此我得重生还一段事实也。

(1965年)

\* 作者当时为广东东路攻城司令。

## 香山讨袁一役

萧宝耀

袁世凯帝制自为，改民国5年为洪宪元年。

孙中山先生从日本回上海，召集党员，发表宣言，号召国人讨袁；自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乃即遣派党员入粤，以“驱龙”号召，在广东分途起事，以响应蔡、唐在云南的讨袁义师。又派遣朱执信、胡毅生、何振、薛岳、林树巍等五人来香山策动，借住石岐正黄街——即现民生北路萧家大屋为机关，布置了任鹤年、林警魂两人为护国第五军正副司令。

当龙济光据粤之际，香山劣绅郑雨初、何鼎元两人为虎作伥，陷害革命党人。如毛其颖的被捕枪毙，李耀裳、黄冷观、刘涌芬等报界编辑或教师，也被捕监禁。其他党员家属，被郑雨初等密报拘捕者尚多。故任、林等率县人起义，就将郑雨初在达德街（即现县人委会）的大屋查封，改为司令部。当时原同盟会的各省中坚人物多聚香山，如湖南的周大刚、河南的冷遹等均在县内赞襄军事。迨陆荣廷率桂军入粤驱走龙济光，同盟会人所率领的军队，也被迫解散了。

在讨龙发难时，死难者十余人，后来国民党人在西山（现中山图书馆）后的高台勒石纪事，以为纪念。

（1965年）

## 宝璧舰反袁讨龙起义经过

卜汉池\*

民国 5 年袁世凯改制称帝，反袁空气笼罩着全国，广东方面亦有不少人起而反袁讨龙，如李耀汉在西江、陆兰清在三水、李福林在广州河南、魏邦平在四邑、任鹤年在香山、陈炯明在海陆丰，还有海防宝璧兵舰和江防所辖的江大兵舰等等。在这里我不能全面来写，只就我所知道的丁守臣在宝璧兵舰起义讨龙一举，叙述于后。

丁守臣是广东合浦县（今属广西）人，曾在广州中学堂读书，辛亥年间在合浦参加革命，帮助苏慎初的胞兄苏乾初推翻合浦清政权而建立了新的军政府。之后率领部队直上高州跟随着苏慎初光复高州各属，地方秩序安定后，随苏慎初到达广州充当连长。

龙济光入据广东之后，丁守臣于民国 2 年底由广东陆军第二师（代理师长吴飞）第六团（团长苏汝森）充连长时送入广东陆军军官讲习所学习，民国 4 年 5 月毕业，闲居广州。民国 5 年讨龙前数月，广东反袁空气逐渐紧张，宝璧舰舰长木全忠鉴于宝璧兵舰上的官兵都是广东籍多，深恐有变，乃建议龙济光增添一排武装士兵保护该舰，并荐委丁守臣（因其妻丁四姑是丁守臣族人）为宝璧兵舰二副兼负该舰士兵指挥。这批士兵是由丁守臣一手招来的，丁守臣就在宝璧舰决心起义讨龙。

丁守臣走魏邦平的路线，领导一班刚毕业而失业的陆军学生如黄质文、苏逢玉、夏蓬山、苏陈亮、陈济棠和阮子明等在陆上

\* 作者时任讨龙军的江防陆战队上尉队长。

策动龙的部队起义。原本约定日期陆上策动部队与宝璧兵舰同时起义，然后由舰炮击观音山龙济光老巢，协助起义部队行动。谁知策反事泄，丁守臣得知黄质文和阮子明被龙济光逮捕，深恐刑逼供出自己，因此便与周天禄紧急会商决定行动。乃于是夜八九点钟时候，把木全忠杀死。该舰驶出虎门时，始将木的尸体绑紧一段铁链沉入海底。

在当晚杀死木全忠后，江防司令部的江大兵舰泊在大沙头附近。舰长陈庆云，云南人，龙济光的爪牙。该舰船头装有一门大炮，桅杆上安有一门马克沁机关枪，火力比宝璧舰强，而且又有一排济军护卫。江大副舰长冯廷灿（广东人）早与宝璧副舰长周天禄（增城人）和丁守臣密谋起义，商决先把江大舰长和卫兵骗过宝璧兵舰，然后冯逼陈配合宝璧兵舰动作。

当丁守臣除掉木全忠之后，周、丁即将宝璧舰驶往大沙头附近向江大喊话，说是龙太太（龙济光之妻）在宝璧舰上，请江大舰长陈庆云过来有事吩咐（因为龙太太指定宝璧为座驾舰，时常乘坐出游）。陈庆云不敢怠慢，当即只身过来宝璧舰上，就被扣留。随即胁逼陈庆云用传声筒命令江大济军一排全数过来保护龙太太，又被全数缴械扣留在大仓库里。这时冯廷灿便跟随宝璧起义，共同行动。

斯时周、丁、冯以事机紧迫，恐怕天明被龙济光觉察，乃于是夜两点钟由天字码头附近起锚开航，鼓足马力要在天明以前通过虎门向香港驶去。到达香港后，周、丁、冯得到魏邦平指示，即刻驶往澳门等候，再行决定行动。

木全忠做宝璧兵舰舰长后，专做鸦片烟土生意，捞钱不少。此时舰上存有烟土约数万两，木全忠以财产都在舰上，认为宝璧卫兵由丁守臣招来，十分可靠，因此把妻妾儿女搬上舰住，以为万一广州失守，亦可把宝璧舰驶往别处，保存一家生命财产。当木全忠被杀之后，丁守臣派卫兵严守舵楼，不准其眷属下楼。宝

璧驶到澳门时，丁守臣才把木全忠的妻妾子女以及陈庆云与济军徒手兵一并送上岸去。存下的烟土，据说一部分分给了丁四姑，一部分犒赏舰上官兵，但大部分由丁守臣所占，周天禄只得少数而已。

魏邦平由港到澳亲自指挥江大、宝璧两舰一度进入省河胁逼龙济光下野，声称如不下野即炮击观音山。广州绅商各界恐怕战事爆发，糜烂地方，乃奔走呼吁相劝。龙济光见大势已去，答应下野让位与陆荣廷。魏邦平即率舰到梧州开去迎接陆。在向西江开往途中，俘获较小出勤段舰十五六艘，声势壮大不少。到梧州后发现江固兵舰被桂军俘虏停泊梧州，因此请莫荣新转请陆荣廷把江固舰归魏邦平使用。魏邦平因丁守臣起义有功，特委他为江固兵舰舰长。但该舰船头的大炮（是克虏伯厂造七生的五炮，与江大的大炮同样）早被龙济光移上观音山去了，只剩下桅杆上一门机关枪和一些水兵用的步枪而已。魏邦平再请求桂军准将缴获济军之山炮（口径七生的五）拨给一门安在江固船头，这是丁守臣在梧州接充江固兵舰舰长的过程。

魏邦平率舰到达梧州之后，龙济光强硬起来，不肯下野让位了。讨龙部署，不得不有所筹备。因而江防舰只在梧州停泊约两个月后，改称为两广都司令直辖江防司令部。江防司令初由魏邦平兼，到肇庆后改为莫荣新兼。副司令周天禄代理司令职权指挥舰队。两广都司令部将要在肇庆设立时，江防舰队开往三水河口布防警戒，准备配合桂军陆荣廷、滇军李烈钧的部队进攻广州。

在进攻广州准备期间，江防司令部各舰抽出步枪 100 支，招募新兵约百名（不是由各舰调用），成立一个江防陆战队，委我为陆战队上尉队长。当舰队进攻将至容奇时，发觉容奇附近济军布有水雷，即调我陆战队掩护一门山炮登上桂洲山上，炮击对岸小村村头之敌，即控制水雷之发电机构。炮击多发，敌人顽抗不退。因此，夜间即撤回舰上，于翌晨派我陆战队用船运至对岸距

敌发电机构约五六公里处登陆。我率陆战队登陆后，以一部沿岸边攻击前进，主力包围攻击敌之侧背，敌人稍为抵抗，即向后撤走。我陆战队即时切断水雷的电线，并以旗号报告。司令部据报立即派舰扫清水雷。是日下午 1 时舰队通过容奇向广州攻击前进。

我舰队进至三山、石壁附近，发觉车歪炮台为敌军占据，即开炮轰击。敌人亦开炮抵抗。双方炮击，相持多日。此时陆上方面莫荣新桂军已攻至佛山、石围塘一带。李烈钧滇军已进至清远、花县一带，威胁到石井兵工厂、白云山方面。李福林在河南方面亦有活动。龙济光孤军据守广州城（当时还有城墙），已成瓮中之鳖。适逢朱庆澜奉北京政府命令来充任广东省长，乃负调和之责，奔走两方呼吁先行停火（在停火期间舰队撤回容奇戒备）。结果最后协定，龙济光愿意下野交出广州，准其率领济军开赴海南岛了事。我们大军便开入广州，陆荣廷接任广东督军，莫荣新充广惠镇守使兼海防司令，周天禄充海防副司令，魏邦平充广东全省警务处处长兼广东省会警察所所长，桂军司令马济兼江防司令，冯廷灿仍充江大兵舰舰长，丁守臣初仍充江固兵舰舰长后调升广玉兵舰（原海防）舰长。

民国 9 年陈炯明于福建率领粤军回粤时，丁守臣追随黄明堂在钦廉地方起义，响应粤军回粤，已在黄明堂部充任统领。越年援桂之役，丁守臣部随黄明堂进攻广西，进驻龙州。民国 11 年孙大总统由桂林回广东改道江西北伐时，粤军奉命回粤，丁守臣亦随黄明堂撤回钦廉驻防。此后南路（高雷钦廉）军队复杂，军阀互相混战，丁守臣所统的部队被消灭了。民国 17 年丁守臣生活困难，得到陈济棠介绍在容奇充任护沙大队长，不久病故。

（1966 年）

# 对《旧海军南下护法及北归纪略》一文的几点补正

胡应球 \*

阅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 48 辑胡文溶、袁才乔撰写《旧海军南下护法及北归纪略》一文，据我回忆，其中有些地方，有所出入。当时，我是永丰舰二副，特提出以下几点以供研究。

## 一、孙中山先生究竟有无到海珠 和是否上了楚豫舰？

作者原文 162 页小标题“陈炯明叛变”内说：胡文溶在海珠司令部接到总统府秘书长谢持的电话，说速派队伍在海珠对岸至永汉路一带警戒，迎接二人去海珠保护……（未说出谁）……当即报告温树德，派陆战队 80 人分在海珠附近及永汉路一带布防。约一时半，即将孙中山和随从一人接到海珠，孙先生当时光头未戴帽，身着夏布长衫，满头大汗，见温树德即说：“陈炯明反了”……温树德认为海珠接近长堤，不大安全，商得孙先生同意改乘小轮送去楚豫舰保护，当夜孙先生宿于该舰。蒋介石写的《孙大总统蒙难记》一书，也是叙述中山先生行经永汉路到了海珠，然后落了楚豫舰。上述作者原文与此是同出一辙的。

据我所知，孙中山先生没有到海珠，也没有上楚豫舰，而是到永汉路天字码头，下宝璧舰，转永翔舰，再到永丰舰。事变那天，林直勉随中山先生离开总统府，来到永丰舰后，讲述脱险经

---

\* 作者时任永丰舰二副。

过时说：“中山先生身穿长衫，他和林树巍手提一小皮包，随后，行出总统府至大马站被叛军所拦截，林直勉便借口父亲有病，请医生急救，并指中山先生是医生，皮包是药箱，匆匆而过，得以转入大马路，穿出永汉路，至天字码头，见有宝璧舰锚泊附近，他便与中山先生雇小艇登上宝璧舰，而林树巍则转到长堤，去海珠海军司令部找司令温树德告以情况。”

当时的宝璧舰长是卢善矩，电务员是吴鑾昌，时至今天，犹常谈及：中山先生确先到宝璧舰，并说当日中山先生到舰后亲笔拟一电稿通告声讨陈炯明，电报由吴鑾昌拍发，原稿中山先生没有收回，现在两人很抱憾未能保存当日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的这份最有价值的历史文件。

卢、吴两人又说：“孙中山登宝璧舰后，不久，林树巍与温树德也随之乘小轮来宝璧舰告谒中山先生，指出宝璧舰实力不够雄厚，乃接中山先生去永翔舰住。”

根据我的回忆：中山先生到永翔舰后，永丰舰长冯肇宪、楚豫舰长招桂章、江防司令陈策（均是广东人）等均认为永翔舰内人员混杂，保护恐不安全。就是永翔舰长丁培龙也认为永翔对保护中山先生的安全没有十分把握，于是由永丰舰长冯肇宪以请孙中山先生到永丰舰训话为词，偕同士兵代表乘小火轮去永翔舰接中山先生到永丰舰，在此以后，中山先生就一直住在永丰舰。

就当时情况分析，中山先生经永汉路到海珠必须经过天字码头才能到达。当他行抵天字码头的时候，眼见宝璧舰近在咫尺。绝无阻碍，而中山先生等三人目的是为了找安全地方来避难，这很容易理解，他们不再犹豫，立即登上宝璧舰了。就算原来想去海珠，此时亦会变更计划，不再前行长堤一段路了。何况据说长堤一带已派有部队，到底这些部队是保护他的，还是危害他的，一时不易辨别。为了安全，可止则止，可避则避，因此他们先登上宝璧舰是很自然的事。

根据我的回忆，永丰舰官兵代表去迎接中山先生来永丰舰时，分明是向着永翔舰驶去，而不是向别的舰驶去，中山先生乘小火轮来时，亦分明是从永翔舰来的。永翔舰武力充实，吃水较浅，可以进出省河。温树德把它作为自己的座驾舰，间或住宿舰内，因此温请中山先生先到永翔也在情理之中。

最后，历史已证明，如果中山先生一直住在永翔舰，的确是不安全的，温树德接受了陈逆 26 万元贿款而背叛，永翔舰也随着背叛，使永翔舰长丁培龙不能回舰行驶职权。但是楚豫舰就一直同永丰舰保护中山先生到底。如果中山先生先上楚豫舰住，大家会认为是安全的，不会再去接他到永丰舰来。事实中山先生没有到过楚豫舰。

## 二、温树德是否不甘与陈炯明妥协

作者原文 165 页第 1 至第 4 行：“以田士捷为首的浙江人多倾向陈炯明。但当时身为司令的温树德反没有鲜明的表示，一味因循应付。其原因，是眼见中山先生已失败，军饷即成问题。但他又不甘与陈炯明公开妥协。”

我所知的事实：温树德受陈炯明贿买后，立即叛变：

1. 1922 年 7 月 8 日指使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从黄埔驶出淡水河（当时三大舰锚泊鱼珠炮台前面，鱼珠炮台由陈军占据，因有三大舰屏蔽，不能炮击平岗附近的永丰舰和对岸的长洲炮台），使鱼珠炮台陈军得以方便炮击永丰舰，幸方向偏差些误中平岗鱼雷局。
2. 7 月 9 日温命驻在长洲海旁的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迎接鱼珠炮台陈军登岸合攻，致使长洲失守，更使永丰舰无安全地可驻泊，如果说“温树德不甘与陈炯明公开妥协”，上述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如果说“以田士捷为首的江浙人多倾向于陈炯明”，那么，海圻舰长、海琛舰长的行动和陆战队的投降，难道都可以归肇和舰长田士捷指挥而倾向于陈炯明么？如果田士捷可

以左右各舰和陆战队，试问温树德的司令宝座还能坐得这般稳否？历史是最好的见证人。1923年5月，原文所说“不甘与陈炯明妥协”的温树德公开背叛孙中山，投降与陈炯明相勾结的吴佩孚了，他秘密命令各舰逃出省河，驶往汕头。因此，孙中山先生忍无可忍，立即撤掉温树德海军总司令职务，饬各炮台戒严；改委各舰长，归大本营直辖。这一事实证明：1922年巡洋舰三艘的叛离，是温树德的秘密叛变，而此时则是温树德明目张胆公开叛变。对温树德的秘密叛变加以掩饰，说成是“不甘与陈炯明妥协”，是不符事实的。

### 三、林葆怿的叛逆下场和孙中山先生 1922年改革舰队

作者（159页第5至7行）说：海军司令林葆怿见海军形势不稳，又迫于群情责难，愤将余存税款扫数发给官兵后，于1919年离职，肇和舰长林永谟接任舰队司令。又159页小标题“护法舰队的改革”文内有1920年孙中山先生决心改革海军，密令温树德为改革舰队临时总指挥，陈策为副指挥。根据我所知道的事实，前者是另有内幕的，后者时间颠倒了。海军部长程璧光于1918年2月被刺死后，林葆怿暂署部长，5月20日非常国会开会通过，改组军政府，迫中山先生离粤，选出政务总裁七人，林葆怿被推为总裁之一。按海军资历来调动的话，则林升任为总裁，可兼部长，而司令一缺应以汤廷光升之。且汤是广东人，林为把持海军实力起见，升汤为部长，以总裁兼任司令安排福建人，海圻舰长给林永谟升充，海琛舰长给魏子浩升充，肇和舰长给郑祖怡升充。三人都是福建系，从此闽系势力巩固。1920年8月，粤军陈炯明由闽回师讨伐桂系，林葆怿派遣军舰在粤闽边界海面协助桂系拒陈。11月桂系败走，中山先生回广州复任大元

帅，林葆怿以失势乃与北京商谈所谓北返条件，北京先给福建作地盘，着将海军舰队全部调集厦门，宣布海军统一，并先汇给部分修舰费和官兵开拔费。因大元帅的阻止，林内部亦有矛盾纠纷，舰长多起而反对，向林算账，林亲自应付，便提出一些余存税款以脱身，随即悄然离开。

另外改革舰队的问题，福建系林葆怿、林永漠在海军舰队把持了四年之久，做了很多反对中山先生革命的坏事。中山先生决心改革海军是在 1922 年 4 月下旬，绝不是如原文所说：在 1920 年春。1920 年 11 月前，粤军尚未回粤，桂系仍踞广东。那时中山先生怎么能于 1920 年春决心改革海军呢？江防司令是桂系人物申保藩，是年陈策执行中山先生驻港办事处的计划，夺取申部的江大舰起义，驶到唐家湾时，被澳门葡炮舰截击，解回澳门，将陈扣押在狱中。陈策负责办理海军舰队一事，则是至 1922 年。

#### 四、欧阳格、欧阳琳、潘文治 是否温树德的心腹人物？

作者原文 165 页第 12 行至第 17 行：“海军舰队内原属于广东海军的各舰长均于中山先生走后而离职，温树德乃另行调整，计……飞鹰舰长欧阳格，永丰舰长欧阳琳，楚豫舰长潘文治。”

我所知的事实：欧阳格在护法舰队福建人当权的时候任三副，在舰队改革进行的时候，他是江西人亦在舰内响应，及改革后，温树德任司令时，他是通过李烈钧的提拔从三副而跃升为豫章舰舰长的。在中山先生蒙难驻舰的时候，他是自始至终拥护中山先生的，及中山先生将要离开舰队，乃委任他为四舰（永丰、楚豫、同安、豫章）指挥；中山先生离舰后，再过几天，他也离职他去，以后再没有在舰队任职。欧阳琳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回国后，初时没有干海军工作，至 1922 年 7 月 10 日中山先生率永

丰舰攻入白鹅潭时，原在白鹅潭的同安舰长离职，8月9日中山先生委任他为同安舰舰长。8月9日中山先生离开舰队时，他亦随之离去。至1923年夏历十二月初四晚上，欧阳琳乘小电船来黄埔登上永丰舰，同舰上官兵（船长常光球除外）起义，一直任永丰舰长好几年。潘文治（广东人）在护法舰队南下后，他任永翔舰长是程璧光提拔的。程死后，福建势力排挤外省人，潘为保存自己地位，对福建人卑躬屈膝，日常满口福建话，认自己先祖是在福建行商的。因此温树德在计划改革舰队布置人员时，没有潘参加，恐怕潘向福建人告密。及事后，潘亦同福建系一样解除舰长职位。中山先生逝世后，他才出任广东海军职务。

（1965年）

## 狄河护法运动的回忆

马培清\*

1917年当甘肃狄道、河州的护法运动发动时，我正在“西军精锐军”中服务，当时也参加了一些活动，兹将马安良父子响应这一活动的经过，据我所见所闻，回忆记述如下。

马廷勦，河州（现在临夏）人，是甘肃提督马安良的第三子。1917年正在北京总统府担任侍从武官。平常与蓝天蔚等来往甚密。蓝每次谈到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的革命意义时，马廷勦表示拥护，并愿在甘肃发动响应，同时与在京的部分甘肃同乡也有联系，他们共同商定，马廷勦即请假回甘，到兰州后，首先与在甘肃策划发动护法运动的蔡大禹（甘肃法政专门学校校长）及同乡周志高、秦钟岳、赵学普等取得联系，计划先从狄道、河州方面发动事变。马即返回河州，首先说服了他的父亲马安良赞成响应，并派马廷勦参加活动。马安良这次赞成革命的主要原因，是感到他在辛亥后（1912年）同意了马麒的计划，刺杀了前临时省议会议长李镜清，在甘肃回汉人民的关系上，造成了很大的隔阂。今年老多病，回忆往事，深感后悔，因而对这次革命计划不但同意，并表示积极帮助，想借以融洽回汉人民的感情，为其子孙的前途扫清障碍。

马安良同意革命后，即约请蔡大禹等去河州商议。即应约与赵学普（法政学校教务主任）、秦钟岳、周志高等十余人赴河州与马安良会谈。参加会谈的西军方面除马氏父子外，还有帮统马国良、分统马占奎，连续开会三次，决定河州方面由西军先出兵

\* 作者时在“西军精锐军”中服务。

3000。狄道方面的新建右军派赵学普先去负责联络，关于谁先发难的问题，当时马安良的意见是：“应由汉人来领导，因为甘肃的回汉人民在历史上是隔阂的，如果先由我们出头，恐引起汉人的误会，说回人又造反了。”因而决定西军先开到洮河边作声援，等候狄道方面发难起事后，再作进一步的行动。

狄道当时驻的新建右军统领吴桐仁，分统刘忠荩（字笏臣），虽系张的嫡系，但士兵多是甘肃人，容易串连。经过赵学普的深入联络，已经有了头绪。适于这时不知什么地方走漏消息，引起对方的怀疑，将各营士兵带的子弹，全部收去。赵学普即返回河州，设法由马部接济子弹，以便起事。马部当时决定先送500粒交赵带去。我随蔡大愚跟赵一同去狄道，策划起事。走到狄道西二十里铺打尖时，赵提出意见，让蔡和我住在此地，他先设法送弹进城，待第二天再迎蔡进城。蔡亦表示同意。到第二天赵来说：“粮弹已送进去，定于明天（农历十一月十一日）拂晓起事，一定能够成功。”蔡听了很高兴，准备一同进城。赵又主张等大功告成，城内悬灯结彩，再迎蔡进城。蔡也同意。蔡于天黑时仍回城去。行至大浮桥时，不料事已暴露，双方军队已在大桥一带埋伏警戒，向赵几次问口令，赵答不上，即开枪将赵与随从人员击毙。赵的舅父边永福，在赵被击毙后，也被搜捕枪杀。当夜12时左右，我们的便衣来报告了事败经过情况后，我随蔡大愚连夜回到河州。

在狄道兴事失败后，甘肃督军张广建在兰州成立了督捕局，大肆搜捕有关人员，甘肃省议会共有议员30人，共和、国民两党各占其半，狄道河州护法运动失败后，国民党议员除议长杨思由于吴桐仁向张广建说项免于危险外，余均逃跑。在河州，绅士张绍先、喇世俊、蒋钦等出面组织了保安稽查局，表面上是稽查与此案有嫌疑人员，但骨子里主要是为马安良父子洗刷嫌疑。蔡大愚回到河州后，因张广建追查甚严，不好藏身，由马安良派营

长马有禄护送出境，回四川原籍，他的眷属一直在河州留住几年始回四川。

(1962年)

## 护法之战的回忆

程 潜 \*

护国战争结束之后，湖南成了广大民众反对北洋军阀滥施武力、鱼肉人民的一个重要省份，同时又是北洋军阀和南方军阀角逐争夺的焦点。在这里，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互相交织，终于在1917年9月爆发了护法战争。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从它们的基本意义来看，大体上是相同的。即：要打倒的对象，都是封建帝制余孽以及由此脱胎的封建军阀；要争取实现的目标，都是一个雾里观花、若隐若现、但是谁也说不出所以然的“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在袁世凯称帝遭受可耻失败以后爆发的护法战争，则进一步反映了广大人民要求民主权利、维护旧约法、反对南北军阀的意志和愿望。当然，从军阀这一方面来分析，护法战争又反映了北洋军阀的武力统一与南方军阀的地方割据之间的矛盾。在护法战争期间，我担任了湘、粤、桂联军的湘军总司令兼前方总指挥。作为这次战争的参加者和组织者之一员，本文拟就这次战争前后亲身经历的事实，进行记录和整理。由于战争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战争的出现，也不可能完全是突发性的。为了说明与这次战争紧相联系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它的酝酿形成过程，在撰写本文时，不得不叙述一些有关全局的史实。

### 一、护国战争之后的国内形势

护国倒袁之后，有些天真善良的人认为：窃国大盗袁世凯既

\* 作者时任护法湘军总司令兼前方总指挥、湖南省省长。

死，不属于北洋军阀系统的南方军人黎元洪继任总统，法治恢复，中国的民主政治制度可以逐步纳入正轨；北洋派首领段祺瑞，既不赞助洪宪帝制，担任内阁，必能翻然改图，一反袁氏残暴行为，抑制军阀势力，使人民得以喘息；西南起义各省，应该以战胜余威，团结一致，因利乘便，对实际上为北洋派所掌握的中央政府，进行有力的监督和制约；1912年3月11日公布的临时约法，1914年1月10日被袁世凯狂暴践踏，以非法手段将国会解散，几经波折，国会才于1916年8月1日恢复，为了巩固国家根本，国会必将制定出一部民主宪法来。但是，天真善良人们的愿望，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所粉碎了。人们发现，那位号称“老实人”的黎大总统，一方面堕入了北洋派军阀的牢笼之中，做了北洋派军阀的高级政治俘虏；另一方面却又在挣扎暗斗，以求遂其强烈的政治权欲。这位黎大总统，远非为民创业、与民更始、以国事为重的人物。人们发现，段祺瑞实际上是袁世凯的化身，是继承袁世凯衣钵的政治野心家，他之所以拥戴黎元洪当总统，同意临时约法，赞成恢复国会，只不过是一种手腕，其目的则在争取时间，团结内部，组织力量，以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狼子野心。人们发现，原来以护国义旗团结起来的西南各省，在护国战争结束之后，其领导集团发生了极严重的分化；在西南各省掌握实力的人物，实际上就是一伙企图窃占一方、保全实力、以便向北洋中央抗衡、讨价还价的、毫无原则的地方军阀。当然，他们也利用人民追求民主权利、主张恢复旧约法的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反抗北洋派军阀，甚至不惜刀兵相见。滇桂力量受到北洋军阀的排斥和挑拨离间，成为地方军阀，也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恶。人们还发现，辛亥革命没有消灭产生军阀的社会根基，这股恶劣势力，并不是临时约法可以控制和驾驭得了的。因此，对于临时约法，袁世凯于民二毁之，这回南北议和复之（编者注：原文如此）；而北洋军阀则视之如死敌，必欲又毁之灭之，

以遂其私。军阀们把一切法纪之类的东西看作装饰品，合意时就用，不合意时就扔。寄望于北洋军阀所掌握操纵的国会，来制定国家的根本大法，简直是缘木求鱼、与虎谋皮。在这样的背景下，护法战争揭举维护临时约法的大旗，正是给北洋军阀的当头棒喝。

在南北和议的过程中，南方代表坚持“恢复民元约法”，“恢复民二被非法解散的国会”，段祺瑞一开始就坚持袁世凯的新约法，坚决反对旧约法。段祺瑞声称新约法适合国情，国会久已解散，不能代表现实民意，不应恢复。双方辩论，相持不下。6月25日，驻沪海军首领李鼎新、林葆怿、曾兆麟等受到孙中山的感召，联合宣布拥护旧约法，向北京政府宣告独立，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给段祺瑞以严重打击。段祺瑞的策士提醒他：袁世凯的新约法是实行总统制的工具，如果要实行责任内阁制，有力控制政权，只有恢复旧约法，才有法律根据。段祺瑞在各方的压力和策士们的献计下，佯装赞成恢复旧约法，于8月1日召集国会，南北两方实现了表面上的虚伪的统一。从此，以维护新旧约法之争为表、以各派军阀权利之争为里的府院之争，就一步一步地展开了。

## 二、湖南的形势

当时湖南形势是这样的：5月29日汤芗铭宣布独立，6月底我毅然决然率领所部军队，结合民众力量，于宁乡道林一战，取得全胜，逐走了汤芗铭。但是汤芗铭走后，湖南形势还是有如一盘散沙。先是，谭延闿和汤芗铭合作，推荐曾继梧、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刘建藩等人投入汤的部下收编和训练军队，并分别委为军长、梯团长等职。曾继梧甚至乘汤逃后，自称代理湖南都督。另一方面，中华革命党邹永成、易象、王道、李国柱等，拥戴龙璋为民政长，掌握行政权力。这两派势力，积不相能。我

于7月5日到达长沙，对曾继梧予以斥责，劝他自动取消代理湖南都督之职，曾继梧表示遵办。当时我部下有些同志建议，要我担任湖南督军。他们的意思是：残忍暴戾、反复无常的小人汤芗铭，主要是被我所组织的力量所逐走的，湖南督军一职，应该由我担任。如果自甘退让，当断不断，结果就会中道而废，反受其殃。我说：“你们的意思，是说革命应该夺取政权，但是现在南北和议将成，政令自会统一，已经不是争夺地方政权的时候了。历史上不是权奸争夺政位，就是藩镇拥兵称雄。辛亥之后，到处是都督，却没有一个都督为人民做过一点好事。现在袁世凯虽死，但祸根埋得很深，前途尚多艰险。我们断不可见利忘义，自取灭亡，对于这一点，我是日日夜夜深自警惕的。”参谋长林修梅赞成我的意见。翌日，桂军司令马济来会，称得确讯，北京已决定任陈宦为湖南督军，准带北军入湘，在陈宦未到任以前，着陆荣廷代理。马济说：“干老（陆荣廷，字干卿）决不受其圈套，但关心湘事，希望早日得到安定，不为北洋派所乘。”我说：“干老以大局为重，不愿就湖南职务，我当团结湘人，推一人暂担此职，以为缓冲。”马济表示赞成。马济走后，我们得知：段祺瑞为了笼络地方军阀，结其欢心，已将各省武职改名为督军，文职改名为省长。段内阁并已任命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未到任前由龙济光代理；任陈宦为湖南督军，未到任前由陆荣廷代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使西南各省互相猜忌攻击，妄想坐收渔人之利的手法。我于是晚召集赵恒惕、陈复初、陈嘉祐、刘建藩商议，欲拒陈宦入湘，必先自己团结坚固，推一年高德劭之人以为缓冲。大家认为：刘人熙齿德俱尊，不为北洋军阀所忌，且在前清游宦广西多年，和桂军声气应求，并可借资联系，是一个比较适当的人选。当晚决定分头联络农工商学兵各界，开会公推刘人熙为湖南都督，并请北京政府和军务院明令发表。刘人熙以古稀高龄，在乱离之中，不避艰险，挺身出而保卫乡邦，也是难能可贵的。在

发出请任刘人熙为湖南都督的电报后，我即计划派遣得力部队，分驻湘阴、汨罗、新市，表示坚决抵抗乱命。段政府看见挑拨湘桂关系的计划未能得逞，始于7月16日任命刘人熙暂代湖南督军。如前所述，当时的民政长一职，中华革命党同志拥戴龙璋。但刘人熙、龙璋之间迭生纠纷，相持不下，我再三向龙璋进行劝解，说明大敌当前，团结一致，免为北洋派所乘的必要，龙璋始自动取消民政长职务。7月25日，北京又任命刘人熙兼代湖南省长。

北洋派军阀要实现统一全国的计划，它的最大对手是西南各省有实力的地方军阀，这就决定了湖南在当时政治形势下的重要位置。一方面，北洋派要把湖南夺到自己手中，作为威慑西南各省的前哨；另一方面，西南各省实力派要湖南站在自己的旗帜下面，作为自己的屏障和缓冲地带。民二讨袁失败之后，孙中山曾在日本向我详细论述过建立革命根据地、高举革命旗帜为天下倡的重要战略意义，我把孙中山这个思想运用到当前的湖南形势来，得出了一个必须利用矛盾、开展湖南自主保障运动的结论。但是要开展这个运动，必须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作为后盾和凭借，否则还是空话，时时有为投机政客所乘的危险。我于上月曾打电报给蔡锷，请他回湘主持军政事宜，他复电称“川事复杂，不宜摆脱”（见“松坡遗墨”），但已打动其注意乡邦的怀念。黄兴刚刚从北美归国，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在政治上不便擅出主意，但是只要他仗义执言，于段政府还是一种政治上的巨大压力，对湘局也有裨益。这时，谭延闿逍遥上海，依靠黄兴，得其支持，加上进步党熊希龄、范源濂亦作相应的援助。段政府认为谭延闿是一个文人，无足轻重，采取待机策略，于8月3日任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湖南督军。一个多月来，经过陈宦督湘、陆荣廷代理的乱命，和吴光新屯兵岳州、准备率师督湘的谣传，现在又换了一个八面玲珑、摇摆不定的谭延闿来做湖南的省长兼署督

军，这时于湖南人民的情绪，不能不是一个打击。对于一般中间阶层来说，他们认为，谭延闿阴柔多伎，视湖南为私产，与北洋军阀视湖南为采地相距不远，但“宽暴不同，宾主有别”，只好得过且过。对于一部分封建余孽来说，谭延闿督湘则是天大的喜事，因之攘往熙来，弹冠相庆。但谭延闿也是一个热衷于抓枪杆子的人物，他心目中追求的是督军兼省长。迷信枪杆子万能的段政府任命他做省长兼署督军，实际上就是说，湖南地盘是属于北洋军阀范围、不容轻易改变的。这样看来，南北战争的隐祸，已然深深藏于“兼署”二字之中了。

汤芗铭被逐之后，我考虑到：革命前途荆棘丛生，湖南形势十分险恶，自己的力量不但难于一时打开局面，且有被卷入争权夺位的浑浊漩涡中去的危险。因此，我即将所部军队改编为湖南陆军第四师，选择得力军官，订立训练计划，交由林修梅接管。同时结束护国经手事务，偿还黔省借债，宣布解甲下野。及至谭延闿于8月20日回湘就职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毫无阻碍、自由自在的老百姓了。

### 三、段祺瑞展布毒谋离间西南各省

段祺瑞对西南各省使用的毒谋主要是挑拨离间，既挑拨滇黔军与四川军队的冲突，又挑拨滇桂军与龙济光军队的矛盾，使四川、广东两省兵连祸结，人民惨罹灾难。

有人问：西南起义护国，不乏高瞻远瞩之人，对段祺瑞这种显著阴谋，何以不能洞悉其奸，反而听其摆布、落入圈套呢？殊不知，护国军领导方面一开始就在政治上有着不同的倾向，时移势异，分化益显；同时，护国军仓促起义，骤然停火，留下许多问题未曾解决，即如军饷军械二项，北洋军阀就不闻不问，听其自生自灭，因此西南当局就感到支绌万分。忠诚如蔡锷，尚感穷于应付，必须四处张罗，以图补救（见“松坡遗墨”）。这就使得

段祺瑞以西南地区为饵，引起西南各省互相猜忌、互相兼并、互相削弱以便乘间宰制的毒谋，得以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效果。

先说四川。袁世凯称帝，陈宦宣布四川独立，这个行动，给了袁世凯相当大的打击。但陈宦是看到大势对袁世凯不利，犯不着为袁殉葬而独立的。他在宣布独立的通电中，就说成是只“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并不是与北洋军阀断绝关系，所以陈宦此举，只能算是一种专为个人打算的、不折不扣的投机取巧行动。袁世凯临死前，预布了一支毒箭——任命川军第一师长、重庆镇守使周骏为重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嗾其反噬。袁世凯是1916年6月6日死的，6月8日，陈宦就受黎元洪的策士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的密电怂恿，宣布取消独立。段祺瑞一方面看不起陈宦为人反复无常，另一方面认为陈宦搭的是总统策士的线，并不是响应内阁总理的号召而取消独立，所以不但不给陈宦官职，并且借刀杀人，利用袁世凯预布的毒箭，利用周骏想扩大权欲的野心，利用周骏的地方排外性的口号来挑拨川滇军的感情。结果是，周骏得到曹锟的暗助，令旅长王陵基由川东进逼成都，陈宦令新编旅长杨志澄在简阳外围迎击，甫经接触，即行溃散。其他北军伍祯祥、冯玉祥、李炳之三个旅不肯应战，荷枪曳兵，向大川北路如鸟兽窜。周骏不费吹灰之力，旬日之间，唱了一出“取成都”，吓走了“满腹甲兵”的陈宦。周骏嚣张跋扈之时，川军将领如熊克武、刘存厚，乃至所部团长刘湘，均未受其诱惑，并一致拥戴蔡松坡，听其节制。那时蔡锷尚在川南，为了维持四川秩序，督率川滇黔各军申罪讨伐周骏。6月24日，段祺瑞慑于大义，任命蔡锷为益武将军，督理四川军务。30日，刘存厚率师进入成都，赶走了周骏。段祺瑞当时尚图用曹锟渗入川事，命为会办四川军务，用以控制西南。嗣见曹锟兵力单薄，若不及早撤退，必招覆灭，乃令曹锟所部退驻岳州。7月6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署四川省长。蔡锷于7月

底到成都，不肯就职，因患严重喉结核病，请假休养。8月初，北京批准给假一月，蔡锷乃于8月底离川抵沪，又复坚请辞职，北京批准续假三月，蔡锷随赴日本九州福冈医院治病。随后，北京派罗佩金署理四川督军，戴戡署理四川省长，机陧纷乱的川局，到此暂时告一段落。

再说广东。广东的龙济光，和湖南的汤芗铭，是一模一样的人物。对于这条在护国战争过程中表现极端恶劣的袁氏鹰犬，段祺瑞是早就心中有数，亟欲利用的。先是，3月间军务院在肇庆成立的时候，护国军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率领滇军，越广西而抵广东边境，龙济光坚决拒绝滇军过粤，经军务院多方调解，始允由北江过韶关出赣。龙济光一面令所部驻韶济军，拦路截击滇军，一面竟密电段祺瑞迅派北军援粤，妄图扑灭滇军。这个密电被我们截获，转报军务院揭发其奸。驻防韶关的脆弱的济军，和滇军交手，一战而溃，6月7日向滇军投降。龙济光心有未甘，加派军队援救韶关，与滇军在源潭遭遇，结果败退广州。后来，据熟悉内情的广东人说，龙济光得到这个消息，在观音山粤秀楼号啕大哭。我想：龙济光此时此际，上失主子，下失部曲，止不住失声痛哭，恐怕也是实情。正当此时，桂军莫荣新见有机可乘，由肇庆攻占三水，龙济光陷于四面包围之中，向段祺瑞求救。段祺瑞电令江西李纯、福建李厚基就近派兵应援，无如各省兵力单薄，只能固圉自守，派不出兵来。段祺瑞又派汤芗铭为广东查办使，这个声名狼藉、信用扫地的人当然遭到广东人民的反对，汤芗铭也不敢就职。段祺瑞支援龙济光的计划处处落空，又要出两套花样：一是运用张勋纠集北洋军阀各派代表在徐州开会，叫嚣讨伐李烈钧，极污蔑毒恶之能事。一是于8月11日发布处理广东问题的申令，说龙济光于未卸任前，守土有责，自应保卫治安；李烈钧统率军队，管束有责；着各勒束所部，即日停火，以后如有抗令寻衅事情，当“严行声讨，以肃国纪”。显然，

这道命令是偏袒龙济光、压制李烈钧的。此时肇庆军政府已经取消，李烈钧考虑，广东督军久已任命陆荣廷担任，龙济光军队已败如丧家之犬，长期对抗，不独开罪于北洋派，而且对桂军又不讨好，因此，李烈钧于8月17日通电辞职，所部滇军，交由张开儒、方声涛两师长直接统辖，自己则离粤赴沪。8月底，萨镇冰以闽粤巡阅使名义，率领一部军舰到达广州，会同广东省长朱庆澜，极力劝解和疏通陆荣廷和龙济光之间的矛盾，龙济光狠狠勒索了一笔巨额饷项，以矿务督办名义移驻琼州，陆荣廷至10月间，在肇庆就广东督军职务。杂乱纷扰的粤局，到此也暂告一段落。

四川、广东两省局面的暂时平稳，说明段祺瑞挑拨离间毒谋取得一些成效。但是这种平稳是虚假的，是暂时的，各派政治势力正在重新分化和组合，政治风暴正在潜滋暗长。

#### 四、闲话谭延闿

谭延闿就职之前，我曾秘密组织过一个团体，这个团体的骨干分子有林修梅、林祖涵、易象、张振武、杨源濬、李仲麟、李隆建、张定、胡兆鹏、叶隆柯、张自雄、宁坤、廖家栋、瞿惟臧、丁斌杨、马骥、李国柱、邹永成等人。这些人大多数是比较纯洁的中华革命党党员。我们每星期开座谈会两次，座谈的内容，多是当时的革命形势和任务。从我们湖南来讲，自曾左功利学说倡导以来，封建势力十分浓厚，传曾左衣钵的，大有人在。这种封建毒恶，流播太广，植根很深，要正本清源，一举廓清，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家认为，谭延闿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人物。有一回，林修梅诙谐地发问说：“谭延闿精通庄老，综名核实，手法圆到老辣，作伪矫柔，蒙蔽社会。湖南谭派中人规矩矩步，实繁有徒，而比较到家，可称外貌形似，内尚神虚的人，我认为有三个半，请你们猜一猜，是谁当之无愧呢？”大家指出：

仇鳌、林支宇、鲁涤平三个，颇合乎谭派格调，但是那半个人欲猜不出是谁。林修梅说：“这半个谭延闿就是姜济寰。”惹得哄堂大笑。

写到这里，我又想起了一件事。1916年11月初间的一个晚上，谭延闿约我过署，说是有要事相商。我到公署，看见谭延闿面色阴沉黑暗，神情沮丧，赵恒惕和陈惟诚也在座。谭说：“我接到上海来电，称家母患重病，促我速回上海。炎午他们认为湘局甫定，不宜离湘，劝我缓行。你的意思如何？”我问：“病情怎样？”谭说：“恐怕是严重，不然不会来急电。”我问：“你的主见怎样？”谭表示想急速赴沪。我说：“父母鞠育之恩，罔极难报，阻你行者，实为害你。我是不劝人行不孝的，你还是迅速返沪为是。至于湘局，我可保证，断无事变发生。”我这番话隐含讥讽，谭延闿表示敬受教而别。后来才晓得，谭延闿接电报已经数日，只是因为放心不下刚刚到手的湖南地盘这块“肥肉”，所以犹疑不决，迟迟未行，及至舟抵湘阴，谭母已经长逝了。可见，政客官僚们念兹在兹的，只是权位利欲，口里夸夸其谈讲的孝悌之道，都是装点门面用以骗人的十足鬼话。

## 五、黄兴、蔡锷相继去世

1916年10月31日上海来电，称黄克强在上海福开森路339号以肝病身故。克强先生天不假年（死时年仅44岁），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刚毅忠贞的战友，更重要的是，使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损失了一个有能力的战士。这是一个很大的损失。我在悲痛之中，用谢灵运体作“黄克强先生挽诗”：

天地久横溃，明哲回此屯；  
所志惟胞兴，于心绝垢尘。  
萍浏始发皇，钦廉历苦辛；  
广州奋威武，阳夏会风云。

江表新建国，胡运自兹泯；  
 功成谢轩冕，长揖居海滨。  
 雄奸图篡窃，快意肆凶残；  
 南风偶不竞，百谤一身攢。  
 幽燕集氛慝，劝进饰妖言；  
 义旗扬六诏，景泰终复申。  
 首恶虽自毙，余孽尚逞顽；  
 公从海外归，元元有欢颜。  
 忽然梁木坏，宇内共悲欢；  
 嗟予随燕行，雅范夙相亲。  
 驱虏参谋议，讨逆预阳艰；  
 眷怀失楷模，沉痛摧肺肝。  
 道行殆由命，形灭付之棺；  
 存歿数所系，夭寿人无权。  
 德音犹在耳，神理初未捐；  
 作卿诔纪哀，投笔泪潺湲。

1916年11月8日，蔡锷之丧耗又自日本传来（蔡锷死于日本福冈医科大学病院，死时年仅35岁），我以无限伤怀，作“松坡挽诗”以志哀忱：

□疾不可医，荣华遂长已；  
 我凭故人棺，泪落何能止？  
 念昔革命时，公适在南纪；  
 登坛群彦集，拔帜异军起。  
 滇黔数百城，反正未移晷；  
 俄移腥膻主，间闻解其玺。  
 功成恶施伐，端已绝尘滓；  
 党论徒嚣嚣，片言肯汚耳。  
 彼哉篡窃徒，勋叶自摧毁；

舜禹事如戏，韩彭谬相拟。  
 吾钦智勇人，微行聊用诡；  
 江海万里路，一夕入军垒。  
 走也同心期，东归先举趾；  
 讨逆独夫惊，首义四方喜。  
 一呼山可撼，三战魄终褫；  
 移浊悉荡除，重见天日美。  
 高名满人口，大事载国史；  
 长歌侑清酒，魂兮倘来只。

黄兴、蔡锷的死，意味着失去了两个有号召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人物，这对湖南革命斗争局面的继续开展，显然带来了不利的影响。我于是整装离湘，于11月24日抵沪，即往福开森路黄宅吊唁。克强之丧由孙中山为首主持之，松坡之丧由进步党主持之。两人灵柩，均于是冬运回湖南，葬于长沙湘江西岸岳麓山。

## 六、中山先生一席谈和民党中央坚分子的议论

在上海期间，孙中山约我在环龙路作过一次长谈。孙中山询问湖南情况，我告诉他：“逐走汤芗铭之后，我就将军队改编为湖南陆军第四师。谭延闿接任督军，又将其缩编为一旅，任林修梅为旅长。所有团营长，都是中华革命党员。一部分士兵，也将参加中华革命党的组织。这支部队现在正加紧训练，很有希望成为一支革命劲旅。”孙中山听了很高兴，嘱我转告湖南同志：“一定要迅速训练，努力训练，兵贵精而不贵多。要练成以一当十，以百当千的钢铁军队，于进攻退守，无往不利。要戒骄矜，戒疲惰。不可暴露目标，惹起意外摧残。”我向孙中山提出：北洋派嚣张狂妄，段祺瑞妄想以武力统一全国，一意孤行，多行不义，最终是站不住脚、不难打倒的；但是帝国主义实力较强，蓄意侵

略中国，要打倒它就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作了很精辟的分析。他说：帝国主义侵略他国，必乘他国经济文化落后之弱点，必利用他国的反动势力作为工具。从当前情势看，帝国主义的庞大武力，主要是在争夺弱小国家的斗争中，用来对付别的帝国主义国家，其次则为对付弱小国家本身，起着一种威吓和震慑作用。现在的欧洲大战，就是两个帝国主义国家集团互相火拼。将来国际风云多变，但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扩充军备，则会是长期的事情。基于此，我们革命党的目的仍然在于取得政权，建设富强国家。只要自己的国家一无给帝国主义可乘的弱点，二无供帝国主义可资利用的工具，那么，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就不可怕了。因此，首要的问题，还是我们革命党要有革命锐气，能够认清革命对象，不和国内外敌人谋妥协，不脱离背叛民众，我们就能获得胜利。接着谈了一些西南各省的情况，孙中山问我行止，我说：“想到北京走走，考察一下北洋军队的真实情况。”孙中山表示同意。我随行后即派人回湘，把孙中山谈话的意旨精神向湖南同志传达。

在同一期间，我和胡汉民、廖仲恺、居正、李烈钧、柏文蔚、张继等往来甚密，常有聚会。聚会时一般都是剖析形势，探讨革命任务。大家一致主张团结本党，扩大群众运动，增加力量，与北洋军阀作殊死斗争，取得胜利，然后实行三民主义，建设国家。有一天，我和胡汉民、廖仲恺、居正四人聚谈，我们首先分析了段祺瑞连续三次向民党进攻的事件。7月间第一次向民党进攻，段祺瑞为了要掠夺广东，作为北洋军阀的地盘，因此袒护支持龙济光，阻止李烈钧率领滇军北进，甚至指使北洋走狗张勋、倪嗣冲等主张派兵援龙，讨伐李烈钧。这种视民党如眼中钉、肉中刺的举措，如见其肝肺然。8月间第二次向民党进攻，捏造司法总长张耀曾（张是属于国民党右翼的段内阁阁员之一）由滇至沪携带烟土，唆使张勋等含血狂吠，企图嫁祸张耀曾，并

通电免其职务。幸亏张耀曾站得脚稳，任何捏造诽谤，检不出他的真实凭据，案情得以大白。段祺瑞怙恶不悛，于8月13日发表重申禁烟命令，妄图掩盖其陷害善良和打击民党的阴谋。9月间第三次向民党进攻，当时黎元洪提出任唐绍仪（唐是国民党系的人物）为段内阁的外交总长，唐本来不愿赴任，但因黎元洪再三电促，始于9月间赴京，行至中途，段祺瑞竟派国务院秘书曾毓隽携带反唐通电到徐州，唆使正在徐州召开所谓“十三省区联合会”会议的成员张勋等34人，按照原电稿发出通电，诬说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素行不检，秽德彰闻”，诬说唐绍仪在前任内阁时曾借公款600万，“与少数伟人朋比分肥”；诬说“唐之此来，实将要结外援，阴图不轨……务请大总统勿令就职”，以免“金壬误国，华夏蒙羞”等语，结果唐绍仪愤慨辞职。到了9、10月间，段祺瑞甚至派徐树铮参加了张勋所召开的徐州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将原来的七省攻守同盟扩大为十三省区联合会，并制定了省区联合会章程12条，气势汹汹地干犯国政，凌轹国会。根据上面这些情况，我说：“三次进攻民党和徐州会议的召开，说明段祺瑞铲除民党、仇视国会、与西南各省为敌的狼子野心，也说明他纵容张勋之辈进行颠覆国会的阴谋诡计。气焰如此猖狂，但是他越猖狂，也就越临近末日。有人说，北洋势力雄厚，军队遍布于南北各省，非孱弱的革命力量所能摧毁。殊不知北洋腐朽力量，现今已登峰造极，而后就要走下坡路，日见分裂和溃乱。革命方面只要掌握了一部分有战斗力有觉悟的军队，结合民众力量，是不难击退这股逆流的。”胡汉民说：“辛亥首义以来，民党根基未稳，经过癸丑倒袁和护国战争，民党既有失败，也多少有些成功。所谓成功，实际上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民党站在真理正义一边，代表了民众的利益而已。现在北洋势力凶顽狂暴，要剪平涤荡这股势力，当务之急，则是转变民党意志涣散的局面，把民党力量重新团结起来。”我说：“要民党团

结，先须坚决摒除争权夺利、挑拨离间之辈。现在人亡政息（这是指那位善于翻云覆雨播弄是非的陈英士），大体可无顾虑了。”居正问：“像张勋这样的辫子军，估计需要多少兵力才能消灭？”我说：“这种既无纪律、又缺训练的乌合之众，有正式军队一旅就可以击溃。如要全部消灭，不过一师已足。据我看，不但张勋的辫子军，就是正规的北洋陆军，也不难击破。我这次预备到北京去实际考察一下北洋军队的内情，也许对我们今后组织训练军队会有裨益。”廖仲恺谈到段政府的财政情况，说：“段内阁军费开支过大，东挪西凑，不可终日。它的法门就是大量举借外债，以资维持。这种加重人民负担的倒行逆施，我们应当予以揭发，这就在政治上制他于死命了。”这次聚谈涉及的题目颇为广泛，并且是就各人的角度抒发己见，因此，这些谈话都比较有代表性，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国民党中坚分子的政治见解。

## 七、北京之行

在上海滞留一个多月，恭送黄、蔡二公灵柩上船之后，我即整装北发。12月31日车到南京，在车上不期而遇张继，一路倾谈，颇为欢畅。冯国璋的副官长陈调元极力张罗，都被我们婉言辞谢了。1917年1月3日晨车抵北京，下榻西城。在京老同志如章士钊、居正、田桐、覃振、周震鳞、张恒九、沈衡山、张溥泉、彭允彝、王立斋、褚辅成、李执中、吴景鸿、杨时杰等都是民党中央分子，相见益欢。大家说，打倒洪宪，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春梦，现在革命处于低潮，前路正多荆棘，还不知要经历几许艰险。就中章士钊、居正、田桐往来较密，尤其是田桐议论风生，豪情云举，对革命大事鼓励之余，颇怀忧心忡忡之感。我说：“不必悲观，袁世凯猖狂一时，也在全国人民奋起反对之下崩溃了。那时他年近六十，我辈正在壮年，和他作斗争，当然胜券在握。现在北洋派多行不义，我们以主观论年龄高下，是彼老

我壮，我们必胜；以客观论民意从违，是彼逆我顺，也是我们必胜。困难自然会有，但是只要我们革命意志坚定，取得胜利也不会是遥遥无期的事情。”田桐和居正都表示同意。

这时，国民党人中有张耀曾、谷钟秀、李肇甫、杨永泰、殷汝骊、欧阳振声、钟才宏、汤漪、刘彦等，拥李根源为首，自称稳健派，组织政学会，在议会中显露声色。他们主张迁就现势，迎合军阀，与梁启超的研究系声气应求，几乎毫无差异。这些人除了李肇甫和我不相识以外，其余都和我有私交，我秉着一种朴素的革命良知，深感难得和他们合作。我来京后，他们曾表示要开会欢迎，都被我正言谢绝了。其中李根源和我的私交极深，终因政治见解不同，也不能不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到北京后，我曾按例拜见过段祺瑞。段向我问及西南各省情形，我据实告诉了他，并且建议他开放舆论，段佯装采纳。我进一步谈到国际情况，表示要及早加入协约国，同时防备日本乘欧洲混战，进一步对中国进行侵略。段祺瑞说：“你是日本留学生，为什么反对日本最力呢？”我说：“留学是一回事，做一个中国人又是一回事。”我说的这番话，实际上触及了段祺瑞的疮疤之痛，所以他默然不语，起身送客。随后，我又和章士钊在勤政殿右厅拜谒过黎元洪，谈话内容多是西南军事，不过30来分钟就告辞出来了。4月间陆荣廷来京。我还参加过黎元洪欢迎陆荣廷的盛大宴会，满堂在座的人物，多是当时北京政坛上的各方人士。

## 八、府院交恶的政治丑剧

这时候的段祺瑞内阁，已任职将近八个月，他的主要“政绩”就是贯彻执行他的挟持武力统一全国的梦想，在全国范围内散布下一个军事网。在长江流域，以冯国璋为首，坐镇南京，王占元、李纯、倪嗣冲、杨善德、李厚基等扼据湖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分肥而治。在黄河流域，山东有张怀芝，山西

有阎锡山，河南有赵倜，陕西有陈树藩，分区镇压。在东北地区，利用张作霖、孟恩远、毕桂芳等割据称雄。同时，调曹锟率第三师为河北督军，拱卫段政府的中央。用卢永祥率第十师驻扎淞沪，策应长江下游。用吴光新率第十一师、第十八师、第二师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以俯视川湘。用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以控制陕甘。段祺瑞这种严密的军事部署，自以为手臂心腹，动用自如，金瓯无阙，十分得计。并且以此作为资本，向国会和黎元洪展开进攻，妄图把一切权利集中于一己之手。段祺瑞没有料到，惹火烧身，“多行不义必自毙”，爆炸性的政治局势——府院交恶一幕剧烈的政治丑剧，随着就炽热地展开了。

这一段府院交恶的政治丑剧，刚巧我“恭逢其盛”，所以下面想占用一点篇幅，把这几场人间丑戏，作一些简要的描述和回顾。

头一场，段祺瑞内阁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勾结。欧洲大战正在打得难分难解，欧洲各帝国主义一时无暇顾及东方的理乱，只有日美两国，一个打着继承德国在华权益的旗子，一个打着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旗子，在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土地上互相角逐。此时的日本内阁为寺内正毅，他高唱“日支亲善”口号，用以掩蔽其侵略实质，同时通过章宗祥和曹汝霖，用经济借款和军事援助的花言巧语来勾引段祺瑞。此时的段祺瑞，政权不稳，财政枯竭，对外借款波折重重，军事控制破绽百出，总统和国会处处和他为难，而自己又正沉浸在武力统一全中国的昏昏迷梦之中，丧心病狂，难于自拔，所以章、曹辈汉奸的花言巧语，对于他是一拍即合，容易接受的。段祺瑞听信了章、曹这一派卖国论调，打算派曹汝霖到日本去充当解决中日悬案、互相亲善和赠勋的特使，由于曹汝霖的名声实在太臭，得不到各方的同意，段祺瑞考虑派熊希龄去，日本方面对熊希龄始迎终拒，结果段祺瑞改派绰号汪大变的汪大燮做了赴日的赠勋特使，草草结束了这

一场丑戏。

第二场，围绕对德绝交案的争论，加剧了府院之争。美国经过长期的军队训练和战争准备，决定投入世界大战的漩涡。1917年2月3日，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并且照会世界尚未参加欧战的国家，欢迎和美国采取同样的行动。中国外长伍廷芳主张在外交上取得有利条件，接受美国劝告。黎元洪企图借助美国的力量，以钳制段祺瑞，表示同意伍廷芳的主张。段祺瑞和日本秘密结合，此时已如胶似漆，固不可解。日本的意图是：利用中国对德绝交进而宣战，乘便将中国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统操己手。因此，黎、段在对德绝交的问题上最初原来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投靠的外国老板不同，走的外国路线不同，所以来才发生了矛盾。此时，所谓在野名流和北洋派的各个小军阀，都表示反对和德国绝交。伍廷芳向所谓在野名流派尽量解释，段祺瑞向北洋派各小军阀尽力疏通。2月9日，段内阁决定向德国提出潜水艇骚扰公海事件的抗议，与此同时，伍廷芳以外交部名义答复美国公使的照会，声明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并拟作进一步的必要准备。日本政府认为段祺瑞内阁对德潜水艇扰乱所提出的抗议，系美国所主使，因而向段内阁提出警告，今后对德国的行动，要按照日本政府的意旨行事。其实，日本和美国对中国的外交行动是各有打算的。美国为了早日结束欧洲战争，希望中国直接派军队参战，所有装备粮饷，悉由美国协商承担。日本想利用中国对德绝交和宣战，增加日本的声威，不一定要中国派军队到欧洲战场，只要继续输送为欧洲战争服务的华工，同时派遣日本教官和供应装备，由日本训练一批中国军队，力助北洋军阀以武力统一中国。可以说美国之行谲而巧，日本之行诡而诈。由于段祺瑞内阁坚决跟日本走，而日本政府又运用秘密外交，与英、法、俄、意协商，取得了日本承继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和中国参战应归日本指导的偷偷摸摸的承诺。美国一看风头不对，直接

参战不合中国政府的胃口，坚持原来的政策又很难避免和日本发生正面冲突，所以虎头蛇尾地表示，中国政府所提参战后中国的权利与义务问题，应当“多与协约国磋商”。段祺瑞在其卖国外交显得顺手的情况下，于3月1日在公府特别会议上提出了对德绝交案。黎元洪表示，这等重大问题，应该先征求国会两院的同意。段祺瑞旋即邀请两院议长和国会党派首领开座谈会，说明对德绝交的理由，列席者都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3月3日，段内阁的国务会议通过了对德绝交案。3月4日，段内阁率全体阁员到公府，请黎元洪在向国会提出的对德绝交案的咨文上盖印，黎元洪不同意盖印，并且以大总统有宣战媾和的特权这个约法上的根据，和段内阁阁员许世英、范源濂展开辩论，段祺瑞因而采取要挟办法，愤而出走天津，并声言要发表辞职出京的通电，请各省军民长官一评是非曲直。经过当时正在北京的副总统冯国璋与徐世昌、王士珍等从中疏通调解，结果由冯国璋赴天津劝段祺瑞于3月6日回京视事。3月9日，段祺瑞招待两院议员，对外交政策作了说明。3月10日和11日，众议院和参议院相继以多数票通过了段祺瑞内阁提出的对政府外交政策的信任案。府院交恶的第二场政治丑剧，以院方的胜利告终。

第三场，围绕对德参战案的争论，导致了府院交恶的更高波涛。府院两方的军师策士们，府方的蒋作宾、金永炎、哈汉章、黎澍，院方的徐树铮、靳云鹏、傅良佐、王赓，都为了各自主子关于对德宣战案的意旨和政治目的而积极策划，多方奔走，组织力量。黎元洪颟顸自信，认为居高临下，胜算在握，如果段祺瑞内阁倒台，只要物色一个在北洋派中和段祺瑞具有相等威望的元老接替，就不致发生变乱。黎元洪经过考虑，认为北洋派老一辈资望较高的徐世昌，可以出来组阁。但是，这个阅历甚深、老子世情的官僚，洞悉北洋派内情复杂，难于统御，又不愿在黎元洪旗下充当冯妇，表示坚决推辞。黎元洪又经过考虑，认为所谓北

洋“三杰”之一的王士珍，可以出来组阁。但是，这位善于趋避的人物，不愿“卖友求荣”，抑且自知魄力不足，无法任重，所以托词谦谢。这是黎元洪首先碰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其次，国会参众两院的政治倾向并不一致。国民党的韬园派和丙辰俱乐部，虽然和段祺瑞极不相容，反段祺瑞情绪较为浓厚，但是国民党的政学会参加了段内阁充任阁员，和段内阁幕后军师梁启超所领导的研究系，都是面向段而背向黎的。再次，西南各省虽然对黎有一定好感，但也远水难救近火，只能摇旗呐喊，遥为声援。黎元洪处此势单力薄的情况下，虽然通过策士们上自冯国璋、下至臭名昭著的张作霖，到处进行拉拢，但还是没有得到可靠的保证。段祺瑞内阁又是一个什么情况呢？首先，他有北洋实力派的拥护。其次，他获得国会议员大多数的支持。再次，他外假虚衷之名，内行谲谋之实，网罗一批官僚精、卖国贼以及所谓外交家和言论家，例如陆征祥、熊希龄、汪大燮、梁启超、曹汝霖、夏诒霆、孙宝琦、汪兆铭、魏宸组等人，在国务院组织一个“国际政务评议会”，制造舆论，为自己壮大声势。其实，段祺瑞冥顽执拗的头脑，只是深信北洋的枪杆子实力，什么党派实力和名流言论，在他看来都是无足轻重的。此时的段祺瑞，虽然在军事和政治力量方面占了优势，但外惧日人的交涉棘手，内惕举国的机陧不安，因而惴惴以宣战通过为忧。为了威胁和钳制议会，段祺瑞又组织了两支力量：一曰督军团，一曰“公兵团”。

所谓督军团，原本就有一个略具雏形的结合，袁世凯就常利用这个力量，作为对付革命党的有力工具。袁世凯只要遇到什么困难和敌对政治力量的阻隔，就祭起这个法宝，暗示督军们以攻击的目标，于是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使被攻击者受到极大损失。段祺瑞跟袁世凯学，以召集军事会议为名，把各省督军们叫来北京，一以齐一各地区对德宣战的意志，一以威慑解决府院的纠纷。所谓“公兵团”，也是袁世凯攫取总统宝座时采用过的一

种组织“社会舆论”的卑劣手法。段祺瑞跟袁世凯学，陆军部平时豢养着各省被裁军官，这是一批帮会骨干，匪帮流氓，需要的时候，他们又用金钱去临时雇佣和组织一批竹头木屑、游手好闲之辈，采取恐怖行动来包围要挟议会，迫其就范。段祺瑞为了通过对德宣战案，组织这两支力量来对付总统和国会，概括言之是八个字：武力威胁，伪造民意。

4月中旬，段祺瑞急电各省督军进京讨论外交问题。冯国璋深知这次会议院方命意所在，他怕陷入是非漩涡中，托病告假，张勋、张作霖也借故只派代表出席。如期应招到会的，有直、鲁、豫、晋、鄂、赣、闽、吉八省督军，皖一省长，绥、察两都统，和海军总长、训练总监及各省代表共计20余人。4月25日正式开会，段祺瑞亲自主席，说明中国外交政策后，全体一致签名“赞成总理外交政策”。督军们随后又拜会了协约国各公使，表示对德宣战的意志，各公使也郑重其事，交道接礼，献酬有加。5月1日，国务院举行会议，这时的阁员，有的已辞职，有的因事因病告假，有的尚未就职，有的未补人，有的因贿案被免职逮捕，不足法定人数。督军团20余人突然闯入国务院，要求参加会议，倪嗣冲放肆无忌，在会上带头发言，词语十分猖獗，说得乌烟瘴气。所谓对德宣战案，就如此这般地在国务院会议上通过了。5月4日，督军团及各省代表联名邀请两院议员400余人在迎宾馆举行招待会。李厚基代表督军团讲话，意思是说要议会通过政府提出的对德宣战案。汤化龙代表两院议员致答词，说了一套不着边际的圆通辞令而散。同日，督军团谒见黎元洪，企图以绝对威势要挟和遏制总统。不料这回黎元洪动了肝火，用军人擅离职守、干预国政、目无法纪、侵犯总统特权等理由向督军团痛斥一番。倪嗣冲素以莽撞著名，这回也碰得头破血流，不欢而散。在这种情况下，国会议员也认识到督军团违法乱纪、凶横无忌、干预议会职权，大都按捺不住心头的无名火。议会各党

派对于对德宣战案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政学会的议员，由多数赞成宣战变而成为少数；益友社由不一致变为一致，立于反对地位；韬园与丙辰俱乐部，与段素不相容，根本反对对德宣战；只有研究系表示倾向于参战，尚无变动。5月7日，政府对德宣战案，提交到了国会。8日段祺瑞邀请两院各党派首领举行谈话会，对政府的提案作了四点解释：第一，俄德单独媾和，全属子虚，现时俄国克伦斯基政府仍然继续对德作战；第二，中国政府外交政策，对协约国方面任何一国，并不有所偏重，保证参战后和日本没有秘密外交；第三，对德宣战只是一种形式，实际上没有战争，在国内也不实行紧急军法；第四，德国战力已弱，由攻势变为守势，无疑定失败。这种解释是没有说服力的，尤其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第二条，成了问题的焦点，段祺瑞就是千张巧嘴，万条利舌，无论如何巧辩，总不能遮掩其派遣特使赴日本赠勋一事，就是段日秘密外交的人所共知的铁证。同日晚各党派开会，除研究系的主张，由于有梁启超的指导而无变动外，其余国民党等所有各派，由于政治上的刺激和震荡，见解异常混乱分歧，甚至没有一派能够作出坚决一致的主张。

我来京数月，值府院交恶，见闻多感，作杂诗四首。

### 其一讽黎元洪：

高台何崔嵬，彷彿生丹霞；  
楼前接瀛海，墙外长蓬麻。  
平旦多悲风，薄暮栖游鴟；  
本期芟秽杂，其如无斧柯。  
张目快积愤，即耳来哀笳；  
皎皎春夜月，粲粲春日花。  
今日乐俄顷，明日徒咨嗟。

### 其二讽段祺瑞：

晨登西山颠，举首观域中；

春风吹广野，一望眇无穷。  
信美此河山，物饶土亦丰；  
奈何凭权者，日夕事内讧。  
昏迷不知止，虎狼瞰西东；  
粉饰自谓美，回谲以为工。  
岂有朝颜花，亭午尚再红。

其三讽督军团：

九衢鸣长轂，尘埃起高车；  
行道共侧目，乘者自豪华。  
相彼车中人，服饰一何奢；  
谁知飞盖下，蠢蠢如橐驼。  
东园粲桃李，日暮多落花；  
西园畜狐兔，夜半起清歌。  
耳目岂不快，失势将如何。

其四讽议会：

蜉蝣乐无涯，楚楚振其衣；  
荣耀须及时，朝露殆将晞。  
夏虫亦啾啾，朱明尚未移；  
蟋蟀最得意，午夜声相催。  
云何当涂士，与物竞光辉；  
旦炫九衢道，暮饰三形围。  
努力事争夺，谁能计安危。

5月9日，北京西城突然有一批手持白布小旗，自称“五族公民团”的奇奇怪怪的人们，有如沟中之蛆在象坊桥一带大小胡同活跃蠕动。10日下午，众议院举行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象坊桥各胡同蜂拥出来两千余人，见议员走进议场，就投掷请愿书和威胁传单，如果议员拒而不受，就被“公民”拖下车来，施以殴打，斥为“不能代表民意”。当天受到殴打的，有吕

复、田桐、邹鲁、陈策等十余人。“公民团”的头子究竟是些何等样人呢？这里有：著名湖南红帮头子张尧卿，江西民二投降师长刘世均，湖南民二退伍师长赵春霆，同盟会变节分子刘文锦，还有湖南人向瑞琮、莫南凤，安徽人吴光宪。有人看见，段芝贵、靳云鹏、陈绍棠也亲自出马，指挥群小。那一大群摇旗呐喊的群众，则是陆军部的差遣，花钱雇来的城内的军人、巡警和无业游民。自称“公民团”代表的张尧卿竟敢闯入议长室，向议长汤化龙提出，在讨论对德宣战案时，“公民团”得到席旁听。汤化龙以议会无此规则，严词拒绝。张尧卿要求议会即日通过对德宣战案，否则就采取严厉手段对付议员。此时，平日负责保卫国会的警察、宪兵，竟然置身事外，与“公民团”和平共处。午后国会开会，各党派议员咬牙切齿，满怀愤怒情绪，主张如果不解决游民蹂躏议会的问题，就不讨论对德宣战案。全院委员会也因而改为大会。大会开始后，议员张伯烈提议，请段祺瑞总理和他的阁员内务总长、司法总长到国会来听取质询，看看段内阁能否维持北京秩序，能否尊重和保护议会。张伯烈的提议，获得全场的一致通过。议长打电话要求段祺瑞出席议会，等到黄昏时刻，内务总长范源濂、警察总监吴炳湘先后到会，对议员温词敷衍，但是不制止“公民团”的恶行。其实，“公民团”是他们的上级指示组织的，内阁总长和警察总监是没有这种胆量来干预的，而“公民团”的歹徒们也是不会对这种干预买账的。8时许，传说段祺瑞将到议会，“公民”们肃立无哗，段到时，“公民”们掌声如雷，声震遐迩。段祺瑞欣然从人丛中通过，径入议场，国会继续开会，段祺瑞出席说：“公民”代表民意，和和平平地向国会请愿，政府不使用武力对付，如果用武力对付，就会发生流血惨案，现在只好采取和平办法婉为解决。段祺瑞并掩耳盗铃声称，“公民”集结，纯系民意的表现，与政府无关。汤化龙深恐议员纷纷质询，惹出一场难于下台的争论，只得请段祺瑞于一小时内

解散“公民团”，并宣布暂时休会，引段祺瑞、范源濂到休息室座谈。议员们在室外纷纷担忧，议论庞杂；“公民”们在场外吵吵闹闹，意兴高涨，并向议场内抛掷瓦石，以示恫吓。谁知石块偶然地扔到了外国记者的脑袋上，段祺瑞看到如果发展下去，可能演成巨变，始调兵将“公民团”驱散。下午9时，议会继续开会，内务总长范源濂向议员们做出虚假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请求议员安心讨论对德宣战案。范源濂讲话之后，随即随段祺瑞退席。这时，议员们已经熬过十小时的骚乱，饥渴疲殆，谁也没有兴致来讨论对德宣战案，因而匆匆散会。“公民团”蹂躏国会的消息转瞬传遍全国，舆论为之大哗，不但国内名流如孙中山、唐绍仪、岑春煊纷纷致电北京政府，严加责难；就是冯国璋也迫于大势，电斥“公民团”的非法行为。国民党议员由不一致转而变为一致，主张先行倒阁。段祺瑞内阁的国民党阁员伍廷芳、程璧光、张耀曾、谷钟秀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建议内阁总辞职，没有得到段祺瑞的许可，只得各自提出辞呈，挂冠而去。到此，段祺瑞内阁事实上已经垮台，无法维持。内阁急需改组，黎元洪斟酌继任人选，认为只有老一辈的北洋派出来，才能统御各个大小军阀。黎元洪词义诚恳地请求王士珍出来组阁，王坚辞不就，因而北京的政治时钟暂时停摆。

5月18日，北京《英文京报》揭露了中日军械秘密条约：日本政府以一万多日元贷与中国政府，条件是，聘用日本技师和管理人员，主持中国军火工业生产。这个秘密条约一经披布，顿使全国人心震动。由于亮出了段祺瑞卖国外交的底细，北京《英文京报》主笔陈友仁也于同日被捕。5月8日，段祺瑞在国会两院各党派首领举行的座谈会上，还拍胸脯说不会和日本有秘密外交。不出一句，北京《英文京报》就透露了这项卖国条款，因而各方面的反段情绪继长增高。众议院19日开会时，议员褚辅成提出动议说，关于对德宣战一案，原来是以总统的名义咨交国会

的，何以三次催请表决的咨文，都是由国务院出名？况且现在的国务院只有总理一人，并未举行正式的国务会议通过这项议案，因此这项公文不合手续，在内阁未经改组之前，应该不予讨论。褚辅成的动议，得到议会议员多数同意通过。到此，第三场政治丑剧给府院之争在形式上造成了僵滞局面，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实际上，总统、国会与内阁的斗争，已经进入了短兵相接的阶段。

我和湖南督军代表张翼鹏、奉天督军代表杨宇霆、云南督军代表叶荃，都是旧日同学。有一天晚上，张、杨、叶一齐来我处聚餐。张翼鹏说：“我现在才弄清楚，原来研究系就是段内阁的后台军师，它和督军团暗中结合，看到‘公民团’在国会捣乱后，对德宣战案已经没有通过的希望，所以他拼命为督军团策划，攻击国会二读宪法，并且指摘宪法草案强调议会权力的条文，认为是‘暴民专政’，要求国会立即修改，否则就要呈请总统解散国会。”我问：“研究系依附段祺瑞内阁，这是由来已久的。可是他们也是国会议员，为什么要策划解散国会，与国民党同归于尽？这岂不是自掘坟墓吗？”杨宇霆说：“研究系是不怕解散国会的，如果闹到国会解散，研究系的人可以和各省督军结合，在下届选举中捞到更多的议员席位。拿我们奉天和吉、黑来说，只要段老总说一句话，就会帮助他们的。”我说：“研究系有如毒蛇身上的蚊子，毒上加毒，被它咬上一口，就有立即丧命之虞，确实要多加警惕。”张翼鹏说：“督军们对宪法内容一窍不通，研究系的后台军师既替他们尽心策划方案，又为他们尽力代为起草，明天就要逼着我们签名了。”我问：“督军们逼着你们签名，你们打算怎么办？”张翼鹏说：“没有得到谭延闿都督的许可，我是不能代表签名的。万一他们加意逼迫，我就只好用个人名义签名。”叶荃说：“我不准备出席。”杨宇霆说：“我们奉天是和督军团一致的，我只能代为签名。”我说：“你们各人所处境遇

不同，当然可以各行其是，不必强同。”大家都认为，府院国会都已成为僵尸，中国的议会民主政治，已经堕落到可鄙可耻可怜的地步，禁不住嗟叹而散。

### 九、张勋复辟前见闻

督军团以孟恩远领衔，纠合在京督军、都统及各省代表 22 人，向黎元洪提出呈文，要黎咨交国会，改正所谓宪法草案中某些“议会专政”的条文，否则就请即日解散国会。黎元洪虽然认为武人联名干涉国会制宪，不足为训，但是又无力遏制督军团的越轨要挟，不得不迁就大势，将督军团要挟的要点转达于国会。1917 年 5 月 20 日，黎元洪邀请国会各政团领袖王正廷、汤化龙、谷钟秀、吴景濂等举行谈话会，提出各督军对宪法草案指出的“缺点”，表示希望国会自动改正。各领袖答称，当传达此意于两院议员，重加考虑。同一天，黎元洪召督军团领导人孟恩远谈话，黎元洪说：解散国会，在约法上毫无根据，今日的问题，不在国会，而在段内阁本身已经解体，应该将内阁改组；现在拟由徐世昌、王士珍、李经羲、赵尔巽四人中择一人继任国务总理，请即转达督军团。孟恩远与各督军举行会议，传达了黎元洪的意思，但是大家仍然主张维持段内阁，以示抵抗。当晚，各省督军和代表纷纷离京。

自 5 月 19 日以后，府院双方剑拔弩张的情势，一天加紧一天。黎元洪决意免段的职，而继任无人，再三敦请徐世昌、王士珍上台，均表示高蹈，不肯应此艰巨。段祺瑞虽然壮心未已，藐视府方手无寸铁，无所作为，但因开罪国会，无法疏解，陷入进退维谷之境，也想徐世昌、王士珍出山暂承担责任，可是也同样被拒绝。人们多不了解徐世昌、王士珍的心理，当此大难临头，何以不肯出来排难解纷，唯以“清高纯洁”自矢？其实，把话说穿了，此二公断非“清高纯洁”、不作左右袒之辈，他们对于府院

之争，是明明白白地站在段祺瑞一边的。他们一肚子的官僚心理，认为黎元洪“不好共事”，认为黎元洪对段祺瑞闹别扭，根本上就是和北洋派闹别扭。徐世昌、王士珍两人，在清朝就取得了老牌官僚的资格，黎元洪于武昌起义，因缘时会，以一协统之职而爬上总统宝座，在徐、王两人看来，屈居你黎元洪之下，为你遮风挡雨是不屑为之的。因此，他们反过来伙同段祺瑞，惩创黎元洪。

5月21日，同学孔庚来谈（孔庚当时任山西大同镇守使，参加了公府的策士团），我问孔庚：“公府对段祺瑞和督军团，究竟作何打算？”孔庚说：“段祺瑞组织督军团要挟议会，又组织流氓团捣毁议会，内阁之职，势在必免，公府已派江西议员郭同赴徐州拉拢张勋，请他来京调解时局纠纷。”我一听此言，十分惊骇，大声说：“张勋是一条粗狂凶横的匹夫，谁都知道他是清朝复辟党，黎总统为什么要请鬼进门，斩断国本？并且张勋又不是北洋派的正统，他又凭什么资格来调解督军团和公府的纠纷？黎元洪甘心把先烈热血创造的民国，拱手奉献于奸人之手，将来又有什么面目再见国人？本来，辛亥革命就没有根本铲除专制余孽，遇有机会，这股余孽就蠢蠢欲动。这股腐朽余毒，顺而抑之，可以转危为安；逆而相之，立见烈火燎原。请你转告黎总统，断不可饮鸩止渴，自招罪戾，自取灭亡！”我这一番话，说得孔庚抢头点首而去。5月23日，黎元洪在毫无安排布置之下，决然下令免除了段祺瑞的国务总理职，特派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为副司令。段祺瑞即日避往天津，并以“国务总理段祺瑞”名义发出漾电，指控黎元洪的免职令为不合法，“不能发生命令效力”，用以挑唆各省北洋军阀起兵抗黎元洪。

其实黎元洪并不是想要和北洋派为敌，他的目的，只是要去

掉那个目无总统的内阁总理段祺瑞。可是，段祺瑞一下台，黎又无力统御北洋派军阀，因此只得下气柔声，再度请求徐世昌或王士珍出山，均遭到拒绝。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通过冯国璋和王士珍里外疏通，得到国会两院通过，于5月28日正式任命那个做过前清督抚和洪宪旧臣的老官僚李经羲为国务总理。第二天，安徽省长倪嗣冲受到段祺瑞的唆使，突然发难宣布独立。接着，浙江、河南、山东、山西、福建、陕西、奉天各省相继独立，声称分路向北京进军，共清“君侧之恶”。黎元洪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李经羲躲在天津不敢露面，北京人心动摇，人们纷纷迁往天津，顿时变为一座死城。

对于当时情状，我曾有“丁巳五月纪事”诗一首加以描述：

公府持名号，岳牧攘威权；  
谬矣诸藩镇，信使集幽燕。  
问彼意何为？国计渺无关；  
势利结一时，营营互攀援。  
庸愚务专用，倏忽兴波澜；  
岂知燕雀争，徒尔长凶残。  
一朝虎狼来，势将斩本根；  
吾怀覆巢恐，命驾速南辕。

5月底，我移住天津，就在天津安顿了家眷，稍作勾留。在天津接触到的，大多是军政界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听来不少奇闻。最奇怪的是，段祺瑞移住天津后，居然门庭若市，研究系的著名魁首，洪宪帝制的余孽，段氏平日豢养的策士，都替段氏策划奔走，并派出徐树铮到徐州参加第四次督军团会议，怂恿张勋积极进行复辟准备。有人说：这是研究系策划的一个大政治阴谋，其步骤是，先利用张勋的势力，威逼黎元洪解散国会，实行复辟，埋葬黎元洪，然后起来打倒张勋，恢复段祺瑞的卖国独裁。

的责任内阁。后来事态的发展，证明这种说法是有根据的。

6月初，天津忽然成立了一个独立各省的“总参谋处”，由洪宪帝制余孽雷震春为首，通电主张“巩固共和政体，另订根本办法，设立临时政府、临时议会”。参加这个组织的有段祺瑞派，有研究系，有洪宪帝制派，有复辟派以及各色各样的投机政客。这个“总参谋处”的组织，实际上就是督军团临时政府的雏形，并且宣称，独立各省“此次用兵，专为黎氏一人”。至此，局势进入万分险恶的阶段。6月2日，驻天津各国领事团警告所谓“总参谋处”，要它注意辛丑条约，不能在天津作军事行动。张勋也认为，“总参谋处”和他的复辟主张有妨碍，由徐州来电表示宜加慎重。这样，“总参谋处”就无形地垮台了。

张勋一方面通过郭同和黎元洪搭上了线，一方面通过徐树铮和段祺瑞挂上了钩。6月7日，张勋率领马、步、炮兵约5000人的定武军，由徐州出发，经天津而入北京，分驻天坛、社稷坛一带，使北京大为震动。张勋自驻天津，一面电告独立各省，暂将军队屯驻原地，静候他人都筹谋解决；一面向黎元洪提出，请总统于三日之内解散国会，以平独立各省之愤，否则就不负调停责任。黎元洪接到这位武装“调人”提出来的哀的美敦书，吓得魂飞天外，即刻电求徐世昌和李经羲劝阻张勋，徐、李均不作理会。此时的国会，一因研究系的拆台，一因国民党活动分子的避地，实际上早已动摇。外国法律顾问向黎元洪解释：按照约法，总统无可以解散国会的规定，也无不可解散国会的规定。因此，迫于事势，应张勋之请，黎元洪决心将国会解散。但是，总统下的命令，没有内阁总理的副署不能生效，黎元洪哀求伍廷芳副署，伍廷芳誓死不从，最后由江朝宗负责担任临时代理内阁总理，于7月12日副署了解散国会的命令。时距张勋所提期限，迟了两天。

## 十、南回上海

1917年6月13日，我得知黎元洪下令解散国会的消息，知道复辟大变已在眼前，急忙乘津浦车回到上海。湖南督军署参谋长陈惟诚刚好因事到沪，和我晤面，陈惟诚向我询问北京情况，我将府院交恶的过程，从对德绝交争论起，到段祺瑞组织督军团和公民团干扰捣毁议会而免职，到黎元洪引用张勋做调人，张勋乘隙调兵入京准备复辟为止，等等情节，作了详细说明。陈惟诚问：“你看张勋复辟，北洋派将会采取什么行动？”我说：“在第四次徐州会议上，张勋在形式上已经取得了督军团的信誓，可是只有倪嗣冲一省长及次要督军李厚基、赵倜参与其事，主要督军并没有参加，而主要督军都是听冯国璋和段祺瑞号令行事的。因此，和谭组安的心理一样，他们都会采取观望态度的。”

陈惟诚说：“组安深以张勋冒昧为虑，所以派我赴粤联络陆、陈，万一张勋复辟，我们好一致声罪讨伐。”

我向陈惟诚详细剖析了一下形势，我讲话的大意是：

北洋派原出于袁世凯一个系统，后来因为攘权夺利，形成为段、冯两派。属于段祺瑞一派的，有杨善德、张怀芝、卢永祥、张作霖（准北洋派）、张敬尧。属于冯国璋一派的，有李纯、王占元、曹锟、陈光远、李长泰、冯玉祥。这是一个大致的分野，当然也有人因为错综复杂的利害关系，两面交叉讨好。此外如陈树藩、阎锡山、赵倜等，都不是小站嫡系，或者由于实力微薄，只能作为附庸。以上这些大大小小的北洋军人，如果在冯、段不表示态度以前，他们是不会受张勋摆布的。但因府院交恶，给张勋以可乘之机，故复辟有昙花一现的可能。在这昙花一现的瞬间，冯、段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呢？以常理度之，他们还是不会和张勋一同下水的。如果赞成帝制复辟，那么，在袁世凯建立洪宪帝制的时期，他们本来可以拥护洪宪，做一个“开国元勋”的。

可是，冯、段在当时由于种种原因，毕竟没有投入袁氏彀中。张勋何人？威望才具不仅远逊袁氏，抑且不逮冯、段，他们之间既无声应合作的条件，又有冰炭水火的矛盾，冯、段不能俯首贴耳，听任张勋摆布，自可断言。况且，冯国璋身居副总统，黎元洪如果被张勋打倒，他就是中华民国的大总统。借张勋之力来做大总统，回过头来又得听张勋的命令，辞荣求辱，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至于段祺瑞，一向自诩为北洋派才望出众的领袖，他在内阁总理任内，对北洋派各大小军阀颐指气使，“指挥若定”，要他在张勋靴下作附属品，这也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此，事情的发展只有一个可能：黎元洪下台，张勋复辟，段祺瑞东山再起。

陈惟诚又问我西南各省的反应将会如何，我说：“西南六省，川、滇、黔本可因护国讨袁连成一气，但是川军刘存厚受了段祺瑞的挑拨离间，使三省军队互相残杀，造成难分难解的局面。他们对北方政局，恐怕一时不会表示明朗态度。广西陆荣廷的力量并不深厚，军队落后腐朽，对于张勋复辟，远水难救近火，顶多是摇旗呐喊而已。”陈惟诚认为确是如此。

第二天，我和居正到环龙路谒见孙中山，孙中山对我表示欢迎，十分关切询问北京政局，我把近半年来北京政局的详细情况向孙中山作了报告，孙中山在我报告时插了一句话，说：“我反对对德宣战，主要就是维护国家主权。”在我报告结束后，孙中山对当时的政治形势作了一段很长的精辟分析，大意如下：

“要建设一个国家，就要遵奉一种主义，就要讲求法治。在宪法尚未制成的时期，约法就是国家的根本法。全国人民应当共同遵守，违背约法，人人得而诛之。复辟就是违反约法，就该遭受人人诛之必不可免的覆灭命运。军队和武力，是国家政权的支柱，只能作为抵御外国侵略的干城，不可作为对内压迫人民的工具。违反了这一条，也可以人人得而诛之。袁世凯利用北洋军队图谋帝位而遭惨败，继起者没有惩毖于此，昏迷自恣，咆哮一

时，其结果只能是比袁世凯更加悲惨的覆灭。黎元洪和段祺瑞交哄，所谓府院交恶，根本谈不到是非得失；但奸人乘隙以摧国本，值得注意。历史是演变的，死灰不能复燃。清皇朝和洪宪帝制都是死灰，纵有张勋的凶恶，康有为的奸佞，黎、段辈迷于权欲的盲然煽动，这一堆死灰是不可能复燃的，燃起了一点星火，民众就会要将它破灭。张勋复辟，冯、段等北洋军阀鉴于自身的利害，自会将其扑灭，但北洋派今后一定会更加嚣张残暴。可是北洋派脱离民众，没有主义，不可能长久存在，将来四分五裂，更没有一个人可能出而统一指挥。南方现在也是一片混乱，四川受段祺瑞的挑拨离间，川军与滇黔军打得难分难解，四川人民受了极大损失。陆荣廷取得广东统治地位，但是他所率领的部队，和倪嗣冲的安武军、张勋的定武军也相差无几。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把护法的旗帜揭举起来，宣传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共同拥护约法，同时取得根据地，组织陆海军声罪致讨。”

孙中山要我先回广东联系，并问我湖南军队的情况。我说：“陈惟诚刚从湖南来，据他报告，军队训练大有进步。可虑的是，湖南军官由几个军事学校出身，派系复杂，多数人为曾、左功利学说所迷，须得注意改造。”

孙中山说：“广东的军官学生，又何尝不为康、梁保皇改良学说所误呢？这也是各省都有的普遍情形，不足为怪。”

我说：“北洋派的军事力量貌似强大，但军队意识卑劣，训练腐朽，要将其消灭和翦除，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至于广东的陆荣廷，如果论军事实力，我看还够不上称为军阀。先生说陆荣廷和张勋、倪嗣冲相若，真是至理名言。去年陆荣廷到湖南，我和他见过面，这个人沉默寡言，城府很深，从表面上看，讨袁护国，倒是真的发自义愤。因为陆荣廷早就和冯国璋有联系，他自己力量薄弱，不能不走冯国璋这条路线。冯国璋和段祺瑞是有矛盾的，冯主张用北洋力量，“和平混一”南北，段主张用北洋武

力，军事统一全国。陆荣廷利用这个矛盾，以求自全，我们开展护法斗争，提出打倒北洋军阀的口号，在根据地没有确实取得之前，也可以从策略上利用这个矛盾，由他们联络一方、反击一方。主动拉拢陆荣廷一把，在我看来是有必要的。”

孙中山表示同意，问我何日启程，我告以日内即有邮船南航，想早点动身，到广东把张勋复辟的恶行广为播扬，对联络策应工作有好处。孙中山又把他和程璧光策动海军的计划告诉了我们，我即与居正辞出。

## 十一、在广东的活动

1917年6月25日，我乘皇后号邮船南行，27日到香港，是晚转赴广州。翌晨，广东省长朱庆澜派员来码头迎接，我指定住大新旅社，即往公署拜访朱庆澜。

我和朱庆澜分手六年，重逢后彼此都极高兴，我把北京政府府院交恶到张勋准备复辟的始末，详细告诉朱庆澜，朱对黎元洪的安全很是关切，问：“黎总统不会有性命危险吗？”我说：“张勋对革命党人是不会轻易放手的，可是黎元洪并非革命党，张勋不独不会加害，反而要拉拢合伙。问题是，黎元洪在袁氏洪宪时，尚且未受王封，这回在张勋复辟下的满清爵位，他是不会承受的。”

朱庆澜问：“北洋派这么多军队在北京，难道都和张勋一鼻孔出气吗？”我说：“问题不是如此简单，讨贼自然有人。”我于是把段派策划惩张倒黎、企图东山再起的阴谋通通告诉了朱庆澜，朱说：“为图自身的利益，竟敢在政治上要这样险恶的阴谋，不惜把国家命脉断送于大奸人之手，这也未免过于胆大妄为，肆无忌惮了。”我说：“你是阅历很深的人，难道不明白政治上的争夺，总要拼个你死我活始有底止这个极其简单的道理吗？就是现在广东的情况，也是阴霾密布，总得筹谋划策，讨伐叛乱才好。”

朱庆澜说：“我这次到广东来，是黎总统极力主张的。当时龙济光在观音山负隅顽抗，我和萨镇冰多方诱劝，才把这条毒龙送到海南岛。那时在广东的护国军有 100 多营，经过我陆陆续续改编，还剩下 40 营。现在两广已经宣布自主，陈炳焜高唱军权统一，逼我把这部军队交出，由他派员接收。其实，我做民政长官，难道要依靠军队来做发号施令的工具吗？只是因为，去年我在上海拜访中山先生的时候，他再三嘱托我要好好将军队掩护。到广东之后，胡汉民和陈炯明又再三请托。加以这一部分军队的军官深惧桂军吞并，反对桂军接收。现在我正处于两难之中，不知如何处理为好。”

我说：“现在一定要多方忍耐，绝对不能轻举妄动。即令桂军对你多方压迫，你也不要随意把这部分军队交出去。将这部分军队作为基本力量，加以切实训练，再和滇军紧密结合，桂军断不敢随便作激烈行动。”

朱庆澜表示同意，我即于下午往访陈炳焜。陈炳焜见面就说：“谭祖安来电，他知道我们早有交谊，希望我们共同协商，应付这不安定的局面。”

我说：“这回来广东，我是代表湖南来向陆干老致敬的，我感谢他去年助我逐汤，解除了湖南人民的痛苦。同时，我也想听取你们对于大局的意见。”接着，我将北京政治舞台上演出的丑剧说了一遍，我进一步说：“今日全国人民深恶痛绝的大祸，集矢于张勋的复辟。而张勋的复辟，又肇根于北洋军阀的横暴。北洋军阀抓有实力的首脑现在是段祺瑞，但是在如何统一全国的问题上，他和北洋军阀另一首脑冯国璋是有矛盾的。段祺瑞掌握中央政权，排除异己，西南各省，早就列入了他的歼灭计划之中。在这个紧急时刻，我认为，联系温和的冯国璋派以牵制暴烈的段祺瑞派，固然不失为一种策略，但专恃这个策略，自己没有实力，无所准备，还不足于对付不时的事变。这是因为，北洋派军

阀只认得枪杆子，他们可以自恃兵力充足，不择手段，行其所欲行。对于湖南和广东两省来说，段祺瑞在四川挑拨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应该看作是很大的教训。龙济光和汤芗铭在粤湘两省残暴屠杀，革命元气已经大受伤害，广西虽然好一点，但是受地理自然条件和其他客观情况所限，革命风气并不见高涨。为了保护约法，以巩固国根，粤、桂、湘三省应该进一步加强团结。湖南在地理形势和当前军事部署上，实际上处于第一线，如果不能得到两广的有力支援，是不能一朝存的。我来广东，用意尽在于此，请你斟酌，并请陆干老酌裁。”

我这一番话又软又硬，既晓以是非，又动以利害。陈炳焜接着说：“你所谈的都是实情，如果我们三省不能精诚团结，唇亡齿寒，前途就会不堪设想。广西军队之所以不能改编为陆军，确实是由于财政、装备、器械等等原因。湖南的军队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呢？”

陈炳焜长于辞令，他分明是在这里说鬼话。其实，广西军队何尝是为了财政和器械装备原因而不能改编呢，说穿了，是因为人事更动大，难于处理。因此，我就把湖南军队的实际情况告诉了陈炳焜：“湖南本来有四个师，去年9月改编为一、二两师，按照中央营制，步兵人员完全满额，每师有山炮一营，工辎具备，只是欠缺马队。各兵科的训练较为切实，进步颇速。此外还有守备队30余营，编制比陆军小得多，每营300余人，多由陆军改编，分布在湘南、湘西地区镇守。当然，到了紧急需要时这部分也可以投入作战。”

陈炳焜说：“你调查过张勋的兵力没有？”

我说：“张勋的军队，是在袁、段秉政之下陆续乘势扩充的。他号称60营，每营定额500人，总计为3万余人。实际上，他们沿袭老湘淮军习气，各级长官按例吞吃缺额，所以总数不过两万余人。张勋平时任情放纵，军纪废弛，更谈不上什么军事技

术。这回张勋受了段祺瑞的怂恿，率领步炮兵 5000 余人入京，准备实行复辟。据说这回进京的部队还是经过挑选的辫子军的精锐，长官都是一些青红帮头子和粗暴冥顽的游民，既无纪律，又无训练，当然也就无实力可言。”

陈炳焜说：“北方祸乱如此其深，西南川滇的混战难分难解，我们两广的事权又未统一，这又如何来应付当前的困难局面？”

我说：“广东得革命风气之先，民智早开，民众革命热情很高，如果能因势利导，纳入正轨，自当产生巨大力量。否则，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革命力量变为反革命力量，也是有可能的。所以不能不权衡得失，判明利害，作深远慎重的考虑。”

陈炳焜说：“我们今天谈话最重要之点，就是要三省精诚团结，应付危局。我要把这层意思转报于老，得到于老的复示，再来和你商量。”我说我也将电告谭延闿，使他放心。

晚间，方声涛来寓访我，他劈头一句话就说：“搞得好！革命事业弄得乌烟瘴气，到处碰壁，而且是千重万叠的壁！异常坚固的壁！这个局面如何了结！”

我看见方声涛表现激动愤懑，因而耐心地劝导说：“专制统治遗留下来的余障，既非一朝一夕所能演成，也非一朝一夕所能铲除。要革命，就要有一股蛮劲韧劲，必须千回百折，斗志不移。光是激动，或者光是泄气，都于事无补。我这回到广东来，很想看看你们的军队训练情况，在严重的时局下，想向大家请教和商量继续革命斗争的方针方法。”

方声涛说：“军队训练工作，我们是一刻也没有放松的。可是，我们从昆明出发，沿途受了千辛万苦，却总是为人作嫁衣裳，怎么能不令人气愤呢？”

我说：“在反对洪宪帝制时期，我们手无寸铁，不能不运用各方面的力量。袁世凯垮台，北洋军人当权，他们的目的在于以武力排除异己，统一全国，实行卖国的军事独裁统治。因此，不

但新生的革命力量是他们阴谋歼灭的对象，就是一切非北洋派的地方势力，也同样列入他们的歼灭计划之中。有鉴于此，我们就要千忍万耐，千方百计地保存这点单薄的实力，无论如何不能为北洋派所乘，重蹈川滇的覆辙。”

方声涛说：“朝大局着想，你的这番话是正确的。但是从我们这个局部地区来看，赶走了一个龙济光，又回来另一个龙济光，这个局面何时得了呢？”

我说：“今年4月间陆干卿晋京，段祺瑞大耍手段，把两广的军政大权交给桂军，实际上是不怀好意的。段祺瑞正是希望两广和川滇一样，走上同室操戈、自相残杀的道路，然后他们可以从中取利。陆干卿的桂军是十分腐朽的，实力有限，但是他老于世故，不致妄起衅端，自贻伊戚。所以只要我们既忍耐，又警惕，求得暂时相安，等待时局演变，保全革命力量，就有发展希望。张勋复辟的大祸已迫眉睫，中山先生已决定联系海军，率舰南来，誓师讨叛，形势将对我们更加有利。”

方声涛说：“中山先生率舰南来，誓师讨叛，时局将有转变，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但是现在广东的警卫军受到桂军的严重压迫，要保存这个革命的根子，总得想个办法才好。”

我说：“我自然竭力做点工作，你们也应该和警卫军精诚无间，紧密结合，才能做到有恃无恐。听说桂军派林虎来接收部队，我们也要在林虎身上做点工夫，当然能够收到一定效果。”

我和方声涛的谈话到此为止。因为本段所记和朱庆澜、陈炳焜、方声涛三人的谈话，都牵涉到当时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的情况，所以这里有必要与以补叙。当时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如下：（一）桂军60营，装备编制均极简陋，训练无方，在山地打打“麻雀阵”，还可以纠缠和牵制一下敌军，正规作战力量异常薄弱；（二）广东的护国军和龙济光的警备军，由朱庆澜收编为40营，营的编制与陆军同，训练比桂军稍优；（三）护国滇军第

二军号称两个师，实际上兵械不足，但训练较好，有相当的战斗力。以上朱庆澜所收编的 40 营，在桂军压迫下已交出 20 营，其余 20 营任陈炯明为司令，和滇军相依相助，使桂军也莫可奈何。朱庆澜之所以能和陈炳焜对抗，部分原因在于此。

## 十二、十三天的张勋复辟叛乱

1917 年 7 月 1 日上午，羊城各报都发了号外，揭露张勋复辟的罪状，并转载了由张勋副署的宣告复辟的伪谕。

这次复辟是张勋唱的独角戏，复辟的第一道伪谕，则是康有为唱的独角戏。伪谕里面说冯、陆：“合词奏请复辟”，事实是冯、陆均不与闻，并有电报严斥其诬；伪谕里面说黎元洪“奉还大政”，事实是黎随身受威迫，对于所谓“奉还大政”的奏折并未签字；伪谕里面说瞿鸿机等“奏请御极听政”，事实是瞿等本人并不在京，是由张勋和康有为一手包办的。

张勋复辟的第三道伪谕是组织伪内阁。第五道伪谕是派万绳栻、胡嗣瑗为“内阁阁臣”。万是张勋的参谋长，是复辟的主谋人之一。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张勋正至是万绳栻等所利用的傀儡。胡是冯国璋的秘书长，是宗社党摆在冯国璋身边的一个奸细，是万绳栻的助手。张勋复辟先后还下了许多道伪谕，这些伪谕的内容，基本上就是权利地位的分配。

7 月 3 日，陈炳焜为我设午宴，参加午宴的有桂军将领莫荣新、韦荣昌、林俊廷、林虎、沈鸿英、马济及议员郭椿森、曾彦等。席间，陈炳焜说：“张勋复辟，发出许多伪谕，其中诬蔑干老，真是含血喷人。”我说：“奸人做作，无法无天，事实胜于雄辩，谣言是不攻自破的。”陈炳焜问及张勋复辟的可能演变，我说：“段芝泉即日登坛讨逆，复辟问题容易了结。但是，像段这种刚愎自用、囂张跋扈的人东山再起，国家的前途，实在不堪设想。我们如果不剑及履及，发奋图强，前途也是不堪设想的。”

陈炳焜说：“广东也和其他省一样，民穷财尽，其何以行？”我说：“广东是北洋军阀的第一战略目标，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全国的计划，自然囊括广东在内。广东物资丰富，民智日开，家家户户都晓得要反对北洋派，正宜运用这种民力物力，联合各派力量，壮大声威，千万不能蹈四川的覆辙。”陈炳焜说：“干老有电报，极端赞成湘粤桂三省联合共同对敌。”席间谈了许多有关张勋的笑话，尽欢而散。

7月3日，冯国璋在南京召集军事会议，通电反对复辟，声罪致讨。同日，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淞沪护军使卢永祥联名通电讨伐复辟。

### 十三、孙中山南下护法

1917年7月7日，孙中山率领应瑞、海琛两舰到汕头的消息传来，广东各界欢欣鼓舞。我怀着满腔热情和朱庆澜商量准备欢迎。我说：“中山先生南来，固是可喜。但重重叠叠的障碍，将会陆续发生。”朱问：“你看陆荣廷和陈炳焜的态度如何？”我说：“如果陆、陈了解国家大势潮流，中山先生南下，对他们是有利的，应当竭诚欢迎，尽力支持。但他们不会跟中山先生一起革命，他们的内心是反对中山先生的。可是他们既然宣告了自主，外表又不便反对中山先生。看情况，只好对中山先生采取不即不离的态度。现在只要你的警卫军和滇军紧紧靠拢，就能保持相安无事。”朱庆澜问我的看法有何根据，我说：“我是根据陆、陈的力量来作判断的。陆、陈的军事力量虽然是破铜烂铁，但段祺瑞的所谓讨逆军事已近尾声，南北对峙的局面必将接踵而至。桂军的这股破铜烂铁力量，从辛亥以至护国未受损伤，一般来说，又没有做过大不义之事，因此从政治上讲，这支军事力量在西南还是可以有些影响的。此时此际，陆、陈据此力量，既不能投靠北洋派，当然只能和中山先生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这就是我们应

该抓紧和桂军进行联系的道理。”朱庆澜表示，他所编的 20 营军队，决不移交给桂军，将留下来作为广东部队。我说：“广东的潜力是很大的，如果能和桂军好好周旋，又能和滇军紧密联系，20 营军队的力量不但可以保持，还能徐图发展。”我和朱庆澜谈毕回寓，张开儒和方声涛同来，商谈开会欢迎孙中山来粤事宜。张、方都明白桂军底细，但是在旅馆不敢放言高论，我说：“来日方长，谋事尽在我辈努力，一切心照。”

孙中山抵粤树起护法旗帜后，广东内部矛盾逐渐暴露。张勋叛乱结束之日，即孙中山率舰南下仗义护法之时。从此，一场真共和和假共和之间的斗争，就激烈地展开了。

就护法方面来说，孙中山是从三民主义的立场出发，以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巩固国本为职志。7月17日孙中山到达广州，在广州黄埔公园的欢迎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张勋率兵入京、威胁总统、解散国会、复辟叛国，统统是北洋派布置的政治圈套，是有意制造出来的祸乱。孙中山又指出：“洪宪王朝的佐命者，和宣统伪帝的辅佐者，同样是不可赦的帝制犯。”孙中山说：“段祺瑞引用段芝贵、倪嗣冲这些复辟派做讨逆军统帅，以逆讨逆，忠奸不分。今天的中国，不是复辟与共和之争，而是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今天真复辟者少，假共和者多。”7月22日，前海军总长程璧光和海军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宣布自主，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并且率领海军第一舰队由吴淞口开赴广州。这个响应孙中山护法主张的行动，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使一切假共和的军阀闻之心惊胆破。

就毁法方面来说，段祺瑞得到研究系的策谋擘划，如虎生翼，研究系依靠段祺瑞的实力，如狼负狼。在段祺瑞重组的内阁中，研究系取得五名阁员，梁启超并取得日夜梦想的财政总长职位。梁启超仇视国会，深恐国民党人占多数议席的国会于他不利，因而主张在旧国会已被解散、新国会尚未成立的时期，先行

召集临时参议院会议，代行国会的立法权，通过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以便选出新的国会。7月20日，段祺瑞的国务院会议通过了梁启超的建议，并推举梁启超起草向各省当局征求意见的通电。对于梁启超的通电，除西南六省外，其余各省的北洋军阀都随声附和，一致赞成。孙中山持反对态度，认为军阀和政客勾结，贻患无穷，坚决主张恢复旧国会。其实，段祺瑞对于所谓民意机关、国会立法这一套把戏，本来是不感兴趣的，但他自己既然号称是责任内阁，就不能没有这些装饰品以资点缀。段祺瑞真正感兴趣的是，向日本卖身投靠，借款补充军费，以武力统一全国。西南各省在军事上和他抗衡，在政治上又和他唱反调，加上孙中山在广东有号召力，所有这些，都是段祺瑞实现其统一全国计划中的大障碍。因此他坚持梁启超的建议，一定要召集临时参议院，并说，这样做才是“遵守约法，决不许捣乱分子再来把持立法机关”。

护法和毁法的意见为此针锋相对，这就导致了南北两军在湖南地区演出的一场战争。

护法战争是民国成立以来的一场大战争，其规模超过了辛亥倒满汉阳之战、癸丑反袁湖口之战和护国反帝纳溪之战，它打破了北洋军事无敌的观念，确立了国民革命肃清军阀、打倒列强的先声。

就政治主张来说，冯、段对召集临时参议院会议，对以北洋派为主体统治全国，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如前所述，冯国璋主张和平混一，段祺瑞主张武力统一。对于西南各省，冯国璋倾向于迁就事实，态度比较稳健温和，并且暗结西南地区的实力派，允其沉迷现状、据有实力、坐地分赃，条件是服从北洋政府的统一领导。段祺瑞使用的是两手策略，一面挑拨离间，使西南各省内部自相残杀，彼此削弱；一面企图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全部予以消灭。由于冯、段在统一全国的方法问题上意见相左，加

之权力的冲突和地盘的争夺，所以，北洋派冯、段两大系的矛盾日益深刻和尖锐。就军事力量来说，北洋派军队的装备比较优良，从表面上看，编制也比较完整，其一部分占据于长江、黄河流域各省，尚有一部分作为机动部队，分扼于长江上游和北京近郊。但是这支庞大的北洋军队，没有政治信仰，训练陈腐，各级军官的指挥能力薄弱，因而战斗力不强。就经济状况来说，北洋派武力席卷各省，横征暴敛，尽力搜刮，弄得民生凋敝，民穷财尽，生产萎缩，民众苦不堪言，用了最贪婪刻毒的压榨办法，北洋派的财政力量，还是不足以豢养这样一支专吃人肉专喝人血的庞大军队。段祺瑞于是饮鸩止渴，出卖国家主权，大借外款。先是，各帝国主义为了利益均沾，垄断中国向外借款，于1913年，由英、德、法、日、俄五国银行团与中国政府成立了协定，规定中国不得向五国银行以外任何一国进行借款，也不得单独向五国中之一国进行政治借款。现时欧战急剧，列强无力东顾，日本政府乃想谋联合垄断中之独家垄断，设计先行分期垫付借款给段祺瑞政府，待将来欧战结束，再由五国银行团如数拨还日本政府。这样，所谓善后借款、交通借款、军械借款、矿山借款等名目繁多的段祺瑞政府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借款条约，就先后签订了。段祺瑞得到日本的巨额贷款，挪充军费，以肆行北洋武力征服西南各省的阴谋。

从以上的大致分析可以看出，北洋派在政治上是反人民的，在军事上是外强中干的，在经济上是财力枯竭的，在内部关系上是矛盾重重的。那么，西南各省的情况又如何呢？西南各省，要将孙中山的坚决护法革命派和西南地方军阀投机取巧的实力派分别开来。孙中山既反对袁世凯，又反对假共和；既反对段祺瑞制造复辟，又反对段祺瑞包办“讨逆”；既坚持约法，又支持已被解散了的国会；既反对卖国通敌，又反对军事独裁。孙中山、程璧光先后率领海军南下，国会议员又纷纷来粤，堂堂之鼓，正正

之旗，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就是广东省长朱庆澜也表示欢迎。陆荣廷在此局面下，一方面，慑于段祺瑞武力政策的威胁，因而对孙中山的护法义举不能倾心的赞助。另一方面，他又看到孙中山的护法旗帜大得人心，声威雄伟，因而也不敢公言反对。当时雄踞两广的陆荣廷，看到桂军实力单薄，在琼州尚有龙济光的残部未曾肃清，东江尚有莫擎宇、张天骥为段祺瑞所收买，都对桂军有重大的威胁。如果北军长驱直入，湖南为北洋派所踞，唇亡齿寒，两广面临着的军事威胁，真是不堪设想。所有这些，使得陆荣廷对孙中山只好采取不即不离、十分模糊的政治态度。桂军是按旧式营制组织的，因为饷粮的关系，有大营、小营之分，装备简单，总数为 60 营；粤军则为大营编制，总数为 40 营；护国滇军尚有两师驻粤，但不足额；湘军有正式陆军两师，巡防营小营编制 40 营。就经济方面来说，广东一省就有主军客军之划分，客车的粮饷接应差，加以海军议员臻集，在在需钱，这些困难，都需要孙中山独力支撑，一手张罗。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西南各省，孙中山在政治上首倡护法，旗帜鲜明，但各省实力派和孙中山貌合神离，意存观望；在军事上，实力不见雄厚；在经济上，开源节流均有困难。

#### 十四、广东内部的斗争

这时，广东内部的斗争形势转趋紧张。孙中山主张建立护法军政府，和北洋派政府抗衡。陆荣廷主张地方自主，联冯倒段，自处于半独立的地位，与孙中山的主张根本不能相容。本来，陈炳焜之为广东督军，就和段祺瑞企图分化两粤、引起两粤发生内讧的政策有关。当龙济光盘踞广州时，桂军自度力量薄弱，借口不愿“糜烂地方”，不竭全力围攻，而由滇军与之苦战，加上萨镇冰、朱庆澜的调解，始将龙济光逼赴海南。这之后，朱庆澜所收编的 40 营军队，除已交出 20 营之外，仍留 20 营作为“省长

亲军”。这支以陈炯明为司令的 20 营“省长亲军”，有广东武备将弁备学生参加，虽未完全接受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洗礼，而在军事训练和指挥能力上，却远远超过桂军。对于这 20 营“省长亲军”，陈炳焜虽然强令接收，但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程璧光、胡汉民、廖仲恺等，一致嘱咐和支持朱庆澜拒绝交出。表面上看起来，这是广东省督军和省长之争。实际上，这既反映了粤、桂的矛盾，而因为朱庆澜靠拢孙中山，为段所忌，所以，它又反映西南实力派和孙中山革命派的矛盾，以及北洋政府和护法势力之间的矛盾。

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于 7 月 26 日下令将“自主”的广东、广西两省省长互换——朱庆澜和刘承恩对调。本来，朱庆澜在广东颇得人心，同时，两广如果真正是名实相符地实行“自主”的话，对于北京政府的所谓调令，是可以置之不理的。朱庆澜感于桂军的倾轧有增无已，所谓“自主”也只是一个幌子，进退维谷，因而和海军协商，愿将“省长亲军”改为海军陆战队，以求保存这支武力，使其不落入桂军之手。但是这一着缓冲的棋也没有办得到，朱庆澜迫不得已，于 8 月 26 日将广东省长印信交与广东省参议会，黯然离去。桂军随派广东人李福林接管了“省长亲军”，广东省参议会也随即选举了胡汉民为省长。胡汉民当然不合桂军的意图，孙中山不愿意因省长的问题和桂军决裂，他希望以胡汉民不当广东省长作为条件，换取桂军对组织护法军政府不加干涉。胡汉民向省议会辞谢省长之职，并且推举那位由陈炳焜早已向北京政府保举过的肇阳罗镇守使李耀汉来做广东省长，广东省参议会也就如此这般地将李耀汉选为省长，北洋政府也就随即加以任命。

## 十五、我到上海的活动

那时在北方，冯国璋代理了总统，段祺瑞组织了责任内阁，

冯、段在地盘和权力的分配上达成了临时协议，段祺瑞取到了日本的借款，在四川滇军、黔军与川军经过长期混战弄得彼此精力疲惫之后，段祺瑞派了吴光新率领北军两师，任为四川督办使，稳定川局。这样，段祺瑞就把他的注意力，转移到湖南方面来。段祺瑞设想：谭延闿以一介文人，应该专任省长，另外任命一个得力大员来做湖南督军，把湖南省纳入北洋派的军事势力范围之内，用以窥伺和威胁两广，那么两广的问题也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但是，从上年驱逐汤芗铭之后，在湖南社会各界，“湘人治湘”的口号越来越响亮，一有风吹草动，湘省各界团体莫不大声疾呼，同声反对。在京的湘籍“名流”如熊希龄、范源濂辈，都主张维持现状。唐继尧和陆荣廷从他们的切身利害出发，也反对湖南省军政首脑换人。面对上述情况，段祺瑞不能不仔细考虑。他从“湘人治湘”这句口号得到“启示”，采取以“湘人之言塞尔湘人之口”的办法，派他的亲信傅良佐担任湖南督军。傅良佐是湖南乾城人，生长在北方，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中国学生三期生。当时留日的中国学生革命热情很高，但是傅良佐生怕惹祸上身，不爱和这些学生来往，因此很多人都把他当作汉奸看待。傅良佐回国后在陆军部服务，谨小慎微，长于事务，博取了段祺瑞的信任，做了陆军部次长。傅良佐知道湖南人深恶北军，在接到任命之后，他就发表三项声明：(1)“湘人治湘”；(2)军民分治；(3)不带北军入湘。这个声明是笼络人心的官样文章，事实上是办不到、也无法办到的。

这回湘军易督，引起了湖南地方上的反对。谭延闿虽是文人，但是他的经验教会他要抓军队；现在北军就要进入长沙，要他交出帅印，这是他极不愿意的。可是，如果让护法义军崛起，演出举真枪、响实弹的战争，这位患得患失的“太平都督”谭延闿也是不愿意的。因为这样一来，很有可能从根本上摇撼了他的政治统治。

一年多来，湖南军队的训练多有进步。湖南共有陆军两师（炮兵炮位有缺）及巡防营 40 营。第一师，师长赵恒惕，是日本士官学生；旅长李佑文，广西干部学校学生；旅长林修梅，湖南武备学堂学生。这个师是由原来的护国湘军第二、第四师合而缩编的，原称第二师，后改为第一师。第二师，师长陈复初，也是日本士官学生；旅长陈嘉祐，日本士官学生；旅长朱泽黄，湖南武备学堂学生。这个师是由原来的护国湘军第一、第三师合而缩编的，原称第一师，后改为第二师。上述主要军事干部，赵恒惕和陈复初在癸丑讨袁失败之后，曾被汤芗铭押送北京，经陆军军法审讯，判处了徒刑，后由在京的同乡保释出狱，算得是“共过患难”的。可是，由于第一、第二两师更换番号，赵恒惕、陈复初两人竟至发生龃龉。旅长林修梅在讨袁失败之后，曾和其堂弟林祖涵亡命东京，在东京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孙中山引为得力干部。陈嘉祐是老同盟会会员。只有李佑文和朱泽黄刁顽异常，反对革命甚坚。巡防营多半也是由护国湘军改编的，因经费关系，缩减了名额，但是也能编入战斗序列。

8月6日，北洋政府发表了傅良佐督湘的命令。我考虑到时机急迫，必须迅速赴沪一行，组织干部队伍，回湘部署军事任务。我把这个意图报告孙中山，得其允许，于8月20日经香港乘坐邮船，越两日到达上海。

此时，傅良佐正准备入湘。长沙方面，谭延闿胆怯力弱，进退无方。一些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纷纷离开了湖南。和我关系较深的同志，如程子楷、陈惟诚、林祖涵、易象、李隆建、林支宇、胡兆鹏、宁坤、张定、文鹿鸣、钟宪民等 20 余人，陆续来到上海。他们告诉我：陈复初已被北洋政府收买；朱泽黄、李佑文态度模糊；赵恒惕父死丁艰；陈嘉祐有心向善，无力回天；高级将领中，只有旅长林修梅和营产处长刘建藩，正在待机而动，颇有孤掌难鸣之势。他们还告诉我：谭延闿认为大势已去，无法

挽回，已将得力的林修梅旅调驻衡阳，将可靠的陈嘉祐旅移驻常德。

我认为谭延闿这一措施很不对，因为从军事紧急的情况来看，应该将陈旅移驻宝庆，才能收到互相策应之效。林支宇还告诉我：陈复初已受北洋派收买，把部队往湘西拉，还想在湘西生根；谭延闿已派零陵镇守使望云亭做代表，赴京欢迎新督军，而以刘建藩接任。望云亭是北洋派留在湖南的一根内线。谭延闿派他赴京，名义上说是欢迎新督，实际上是调虎离山。林支宇最后并说：“现在大家都希望你回湘部署军事行动。”我说：“反对北洋派，全仗大家出力，我个人岂能担负这样重大的任务。”我当即决定约一些同志到法国花园进行协商，以决行动。

8月26日午前10时，我和程子楷、陈惟诚、易象、林支宇等共12人在法国花园草地密会。我介绍了当时的局势后，并提出了四项要求：（1）坚决拥护约法，同北洋军决战到底；（2）联合西南各省友军，集合各界团体的力量，以壮大护法的声势；（3）统一军队指挥，反对分裂行动；（4）广事延揽革命人才，严禁帮会扰乱后方秩序。通过讨论，大家都确认这四项要求应当共同遵守。当时我已从商家贷得万元，作为活动经费，请林祖涵、易象两位先行赴粤，报告孙中山。其余人员，分两三批出发，统于9月15日到达广州。

## 十六、再回广东活动

傅良佐在南京和李纯、在武汉和王占元等北洋直系将领进行拉拢疏通之后抵达岳州，北京政府加派驻马厂的第八师王汝贤部进驻岳州，和第二十师范国璋部会合，成为一个战斗序列。傅良佐随即部署这两师军队，进入湘阴地境。与此同时，傅良佐又对湖南第一师第一旅李佑文、第二师第四旅朱泽黄许以名利，将其纳入怀中，对湖南军队进行了极其阴险恶毒的分化。1917年9

月9日，傅良佐率领步兵一营来到长沙，接任湖南督军，并发表两道“下马威”命令：“湘军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林修梅撤职，派邹序斌接充；零陵镇守使刘建藩调省，派陈遽章接充。”至此，湖南形势已经到了短兵相接的程度。

在广东，8月30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9月1日，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9月2日，又选举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唐继尧狃于讨袁首义，以为运用区区兵力，就可以独霸西南。陆荣廷自谓稳健持重，联冯倒段，独具只眼，得以横行两粤。他们两个人都夜郎自大，表示不愿和孙中山通力合作。但是，孙中山提挈海军入粤护法，大义所在，如日中天，论理滇桂不敢反对，论力滇桂也无能反对，所以他们只是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孙中山早已看破，滇桂地方军阀和北洋军阀是一丘之貉，不过一下子无力扫除扑灭这些苍蝇臭虫，为了组织护法政府，减少阻力，不能不和他们虚与委蛇，有所联系。

9月10日，在西南对于护法运动抱持冷淡态度的形势下，军政府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国会就大元帅职。同日，非常国会选出唐绍仪任财政部长、张开儒任陆军部长、程璧光任海军部长、胡汉民任交通部长；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李烈钧为参谋总长、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方声涛为卫戍总司令、李福林为亲军总司令、章太炎为秘书长、许崇智为参军长、李耀汉为筹饷总办。

9月16日，我到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谒见孙中山，孙中山热情地接待我，说：“我排除万难，总算把护法政府树立起来了。得不到那些号称强有力者的同情，今后只有靠你们的全力支持了。”我说：“先生的革命主张，当然和他们的旨趣不合，要博得他们的同情，是难于办到的。只要他们不公开反对，倒是可以相安一段时候。时局正在激烈演变，反潮流的东西，是不能长久存在的。”孙中山说：“你们的计划，林祖涵已经向我作了详细报

告，我都同意。我要问，你们究竟有什么把握发动湖南军队和北军对抗？”我说：“傅良佐已经带北兵入湘，到长沙接任督军，谭延闿已离职守，湖南内部对于我们的行动计划，不致有什么障碍和牵制。湖南方面，真实可靠的军队只有一旅和十几个巡防营，力量虽小，但是其他三旅在北军压迫下，将有可能和我们合流。现在最需要的一着是联络桂军，我明天还想和陈炳焜商量一下，得到他的切实的支援保证，即可启程返湘。”

孙中山说：“你看桂军是否能够参加？”我说：“只要湖南军队在前方站住了脚跟，桂军是会参加的。唇亡齿寒，陆干卿深明此理。桂军战斗力虽不强，但如得其支援，用以壮大声威，也能发生极大作用。”孙中山说：“只要能够和我们合作，干革命，我们是不咎既往的。”孙中山还详细地询问了我的干部班底和旅费来源等问题，我一一作答之后辞出。

9月17日上午我往访陈炳焜，陈面带愁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湖南前方形势万分紧急，你什么时候启程回湘？”我说：“我准于19日启程回湘，特来听取你们作何打算，并希望你们鼎力支持。至于前方，我们当竭力支撑。”陈炳焜说：“湖南有失，两粤岌岌可危，陆干老就有过唇亡齿寒一语之喻。两粤若是坐视，无异自杀。请你们放心大胆去做，我们当竭力支援，君子一言九鼎，绝不空口骗人。”陈炳焜随后又问：“如果前线开火，湘军能够支持多久？”我说：“前线都是精锐部队，结合民众力量，更能牵制敌人，撑持到底，断无问题。但如有迅速强大支援，克敌致果，把握更大。我这里有一电报致陆干老，请你代发，今后如果有紧要事件，都可以托林虎转达。”

辞别陈炳焜，我即赶赴广州长堤林虎的司令部，向他说明了我和陈炳焜会谈的情况，并交给林虎一份密电本，嘱他有重要事情的时候，按密码电本联系。

9月17日夜，我往长堤践方声涛之约。方久罹肺病，并染

烟癖，我们在烟灯之下畅谈。方声涛说：“滇军入粤，和龙济光军队作过苦战，对桂军则遇事迁就，采取慎重态度，但滇军、桂军隔阂太深，矛盾终归难于解决。”我说：“为了照顾大局，需要时时克己自省，刻刻警惕为怀。不但是海军与你义切同声，应当格外加强联系，就是参加了桂系的林虎，也要破除隔阂，握手言欢。”方声涛点头称是。

9月18日，林修梅来电，称局势急转直下，已提前发动，和刘建藩一道，宣告湘南自主。19日下午，我乘火车到达粤北韶关。一行十余人转沿旧驿道旱行，急忙赶路，700多华里的路程，只费五天时间，就于25日到达衡阳，和林修梅会合。26日，刘建藩由零陵赶来衡阳。当晚，我即与刘建藩、林修梅、陈惟诚三人集会。林修梅说：“北洋政府下达易督命令之后，谭延闿曾经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只是因为高级将领意见不一，难于协调，致使人心涣散，陷于被动。赵恒惕师长丁艰回籍葬亲，陈复初师长暧昧骑墙，意存观望，把话说穿，就是上了傅良佐的钓饵。我和陈嘉祐坚决反对北军入湘，因此，谭延闿将我旅调驻衡阳，陈旅调驻常德。现在傅良佐已进驻长沙接任督军，谭延闿远走高飞，北军步步南逼，我军现正在衡山和湘潭之间布防，战机一触即发。眼下军事形势紧迫，必须组织军事机关统一指挥，我们欢迎程颂公出来领导。”刘建藩也表示同样态度。陈惟诚说：“军事、政治、地理形势，都决定了湖南在护法斗争中首当其冲的重要地位，因此我们的责任是义不容辞的。陈嘉祐旅调驻常德，军事呼应不灵，举措乖戾。在上海时，程颂公对此已有批评。当时我为参谋长，循陈复初的请求，未加思索，遽尔行事，应引咎自责。现在刘、林二公既已宣布湘南自主，战争迫在眉睫，组织统一的军事指挥机构，实为当务之急。刘、林两公都表示推戴程颂公总持其事，我完全赞成。我们应该同心一德，排除万难，打开护法的局面。”

我说：“听到三位的讲话，使我既高兴，又惶悚。现时的大问题在护法，以打败北洋军为作战第一个目标，因此要号召全国人民，共同声讨。我们不存畛域之见，南方人也好，北方人也好，只要站到护法爱国旗帜之下的人们，我们都与之团结，通力合作。我们护法，决不是敌视北方人民，因为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正是北洋派统治下的受难者。我们护法，对北洋军队的下级军官应当区别对待，他们不自觉地沦为北洋派的工具，我们要号召他们回头。”我还建议今后不再采用“湘人治湘”这句口号。这句口号以往作为抵制北洋军阀，有它一定的作用。而现在这句口号已为北洋军阀所利用，所以今后我们不宜再用这句口号了。接着我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军政府，我们应该忠诚拥护。我们现在站在护法战争的第一线，应该鼓舞士气，拼命抗击。”于是大家商妥三项决定：（1）团结全国民众，联合邻省友军，共同讨伐毁法自便的北洋派；（2）定名为护法湘军，推举总司令，统辖湖南军民两政，并负责用兵作战，总司令部设民政长，管理民、财两政；（3）推举前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程潜为护法湘军总司令。上述三项决定，由刘建藩、林修梅具名电告西南各省，并呈报广东军政府备案。我提出请陈惟诚任参谋长，请林支宇任民政长，大家一致赞成。林修梅提议请赵恒惕参加护法，我表示同意。赵恒惕和我会面时，颇显忸怩之色，说：“我引用李佑文为旅长，真不争气，实在惭愧！”我说：“李佑文和我们的志向不同，他专在利禄上计较，不辨是非善恶，自然走入迷途，只好让他去吧！”我把我们的三项决定详细告诉了赵恒惕，希望他能一致行动，赵表示诚心赞成。

9月27日，在原衡阳道公署成立护法湘军总司令部，设参谋、秘书、副官三处，由陈惟诚任参谋长，易象任秘书长，张辉瓒任副官长。我于9月29日，宣布就护法湘军总司令职。

此时前方军情紧迫，战端已开。我们面对着的北军，计有陆

军第八师、第二十师和安武军 20 营。我们自己直接掌握的只有湖南陆军第二旅和零陵守备队 12 个营。从数量上讲，大体上是 5:1。因此，在军事上必须强调两点：（1）集中使用兵力，尽力扼制敌人，以待桂、粤军的增援；（2）利用地形，构筑临时工事，坚守阵地，预备作持久战。

28 日下午，廖家栋团长自衡山前线来电报称：傅良佐派旅长李佑文率领步兵一、二两团，炮兵一营，工兵一营，在湘潭、衡山交界处与我第四团接触。我方官兵大喊：“湖南人不打湖南人”、“湖南军队团结起来”，就把李佑文吓跑了。李部官兵全数归来，现在我们的第一师建制完整无缺了。

傅良佐利用湖南陆军第一旅打第二旅、使其自相残杀的意图落空了。这是护法战争揭开序幕的一个大胜利。我即电告第一旅全体官兵，对他们深明大义、分清敌我、排除万难、参加护法的果敢行动，表示热烈赞扬，并勉励他们奋发团结，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中立功。

由于第一旅参加到护法湘军的战斗行列中来，我们得以决定作战计划大纲如下。

（一）护法军以确保护法根据地，打倒北洋派罪恶统治，击退北洋军队对湖南之进犯为作战目标。将湖南陆军主力集结于衡山附近，迎击来犯的敌人，左凭南岳，右临湘江，择险构筑临时工事，以困扼来犯之敌，俟桂粤援军集中，即展开猛烈反攻。另将陆军一部分，防守自衡阳下游东岸（约 50 里）至攸县南部之线，扼要构筑防御工事，遏制敌人，以确保本军正面右侧之安全。左侧翼邵阳方面，采取游击战术，干扰敌军，一俟桂军集中，相机派遣得力部队与之联合，转为攻势，猛击敌人，以威慑敌军之后路，聚而歼之。

## （二）具体部署

（1）以湖南陆军第一师（欠第四团）和零陵守备队三营合编

为第一纵队，赵恒惕师长为纵队长，担任衡山正面、左凭南岳右临湘江之线。

(2) 零陵守备队 12 营（欠 5 营）编为第二纵队，零陵镇守使刘建藩为纵队长，担任湘江东岸自衡阳下游江岸、右至攸县菜田之线，建筑工事。邵阳守备司令周伟所部四营，担任南岳山地警戒，并出没于永丰、湘乡之间，游击敌人。

(3)、以湖南陆军步兵第四团和零陵守备队二营合编为第三纵队，旅长林修梅为纵队长，集结于衡阳、衡山间为总预备队，策应各方。

(三) 交通用军用电讯、电话、书面。

(四) 给养由临时输送队运送前方。

(五) 各纵队限于 10 月 2 日，邵阳守备队限于 10 月 4 日，将部署情况报告护法湘军总司令部。

这个作战计划大纲，由陈惟诚参谋长召集各纵队作了详细说明，征求意见，得到一致赞成，然后用训令发布施行。

这时敌军斥候，已跟踪第一旅进至湘衡大道。据报，北洋军阀已派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总司令，王汝勤率第八师、范国璋率第二十师兼程前进，前方情势日趋紧张，但衡阳市民一如往昔，镇定自若。

10 月 11 日早晨，参谋长陈惟诚忽然要求请长假回粤。陈是我多年好友，我问他何故临阵求去。陈惟诚结结巴巴地说：“听得战事发生，心神恍惚，坐卧不宁，参谋长一职，实在不能胜此重任。”

我说：“战争已临到头顶上来了。两军开火，必有死伤，这是无法避免的。谁不爱惜身家性命，蝼蚁尚有此要求，何况于人？战争压到头上，求之于钢甲钢盾以护身，求之与地形地物以掩体，顶多只能减少伤亡，并不能杜绝伤亡。据我看，人类生命的主宰只能是正义。正义充沛于身，纵枪弹如雨，炮声如雷，也

就能镇定不移，如山岳然。胆量固然由天性所生，亦可由人为而铩，我奉劝你共图护法革命事业，安定为上。”

陈惟诚说：“你讲的都是至当之理，无奈我心已动，深恐在此对你拖累过重，于作战指挥有碍，不如放我去为好。”

我看强留无益，只好准其所请。我平生见过不少学军事的“大人物”，纸上谈兵的时候，的确是豪言壮语气吞河岳，凛然可佩，但一临到真枪实弹之际，就变成了一个瑟瑟发抖、胆小如鼠的可怜虫了。揆诸原因，盖是没有一定的政治信仰，所以贪生怕命，把自己等同如蝼蚁了。陈惟诚只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其实，这样的人是并不鲜见的。

这时北洋军队两师，已在湘潭集中完毕，前卫以优势兵力向我节节逼近，我军第四团在前线与之周旋。

我们考虑：新收的第一旅两团及炮兵工兵，经过一番混乱，需要进行安抚整顿，始能投入战斗；另一方面，从地理形势来看，衡山并不是与敌决战的地点，湘潭至衡山、衡山至衡阳，距离大体相同，都是 100 华里左右，如果在湘潭和衡山之间作持久战，与敌一决雌雄，不但我军没有可资凭借的良好阵地，而且使敌人的军事补给得到许多便利，若在衡山和衡阳之间作战，则使敌人补给发生困难，而我军又可以扼据优越地形。权衡厉害，当即决定：我军除在前线阻滞敌人的部队之外，其余正面主力由衡山后撤 40 华里，左凭南岳，右临湘江，集中力量，整训军队，严阵以待。这个决定，当即由赵恒惕、林修梅两纵队长，电告前线各级指挥官。

10月1日午后忽接电报，称衡山前线敌人，向我军发起猛烈进攻，军心惶惑，有一部分军队溃退。我深恐牵动全局，即刻启程，驰赴前方，于下午 5 时达到萱洲河，正好遇上第一师第一团代理团长贺耀祖率领全团向南撤退，我当即令该团在现地停止行动，听候指示。5时 20 分，召集全团官兵训话，我说：“我们

为什么要拥护约法？因为约法是共和国的根本法。我们湖南这次起义，不畏强暴，和强大敌人真刀真枪打仗，既不是有什么南方北方的地域观念的成见，也不是为了要争着做湖南的都督，而是要保卫国本，保护约法。有人说，北军强，我军弱，敌人众，我们寡。弱不胜强，寡不敌众，我们打不赢。这是胡说！北军没有正义，军队腐朽，他们的训练保守成规，动作迟缓，纪律败坏，丧失民心，他们一点也不强。他们日间打仗并不勇敢，一到晚上就打响步枪机关枪来壮胆，这是他们的老习惯，你们马上就会领教的。北洋军队的总数当然比我们多，但要分兵霸占各省，这些军队就像钉子钉在柱子上一样，钉下去就移不动了。这回到湖南来的北军只有两个师，和他们比起来，我们既得了地利，又得了人和，只要我们鼓足勇气，胜利就会是我们这一边的。”

第一团的官兵，因为团长梅焯敏畏缩潜逃，弄得军心散漫，这会听了我的讲话，皆大欢喜，稳定如常。我于 10 月 2 日回到衡阳，即促赵恒惕偕同一师参谋长叶隆柯赴萱洲河，将衡山撤回的各团官兵迅速集结，按作战方针布置阵地，分配任务。

10 月 3 日傍晚，据赵恒惕报称，我军在萱洲河部署甫定，敌军前卫部队约一团兵力向我进攻，阻于地势，两军激战五个小时，我以优势兵力由左前方猛勇出击，肉搏相接，敌军本队扼于地形，无法前进，被击毙 400 余人，击伤 500 余人，我军获得全胜，死伤仅 182 员。接到这个捷报，为了发扬我军士气，压倒敌人威风，护法湘军总司令部即刻发出嘉奖令，表扬官兵“建立殊勋，大慰民望，允为护法干城”；同时将捷音报告军政府，转报两广。

## 十七、湘粤桂三省护法联军组成

1917 年 10 月 4 日，接到陆荣廷来电称：“捷音敬悉。两粤与

湘唇齿相依，休戚与共。冬日与两粤军政首长、海总程老在南宁会商，决定两粤共组大军出湘，尽力支援。详情由陈督军奉闻，特先驰告。”同日，又接陈炳焜自南宁来支电称：“冬日于老召集两广军政首长与海总在南宁会议，决定事项：一、两广与海军联名通电申讨段祺瑞主使督军团、‘公民团’毁法叛国、发动内战罪行；二、由陈炳焜与谭浩明、程璧光、李耀汉向冯提出四项主张：迎黎复职，恢复国会，罢免段祺瑞，撤回傅良佐；三、推谭浩明为两广护法军总司令，统辖5个军，广东出兵30营，广西出兵45营，每军分辖15营，以韦荣昌、林俊廷、陆裕光、马济、林虎分别为第一至第五军司令。湘省前方战况，请随时通报。”

我接到这两个电报，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湘粤桂三省的大联合，终于形成。惧的是，桂军老气横秋，没有半点生气，而且军纪败坏，骚扰群众。桂军资格极老的将领如韦荣昌、莫荣新、林俊廷，都是冥顽不灵、醉生梦死之徒，对于新的军事战斗技术，可说一无所知。新起年少的马济，好胜恃才，夸张为幻，对于军事，可说根本未曾入门。林虎小心持重，新近加入桂系，未敢昌言改造。因此，我对于这个湘粤桂结合的前途，实在怀着无穷的忧虑。但是，大敌当前，桂军入湘，虽然在军事上不可能大有作为，却壮大了护法义举的声势，于护法斗争有直接间接的推动作用。

两广联军既和湘军站在同一战线上，为了统一指挥，加强团结，必须成立湘粤桂三省联军。10月7日，我对谭浩明发出推举电，同时通报两广。陈炳焜迅速复电，称“联合破敌，统一指挥实为先决条件”，表示赞成我的虞电。谭浩明复电谦恭自牧，虚衷推诿，但后来还是接受了护法湘粤桂联军总司令之职。

我军在萱洲河阵地，按地形筑有临时工事。王汝勤、范国璋鉴于前两日不明我军情况，冒昧猛攻，招致失败的教训，从10

月6日开始，稳步向我阵地推进。敌军希望用优势火力将我军压倒，取得主动。但我军依据壕堑向敌瞰射，使敌军数次冲锋皆未得逞。敌军见正面攻击不能奏效，徒遭损伤，乃变计向我左翼延伸，企图围困我军基本阵地。由于我军左翼凭险构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屡次予敌痛创，加以林深径窄，行动困难，敌人的军事延伸越五日之久，始前进30余里，使双方战斗呈现胶着状态。10月11日，敌军正面阵线上的火力转趋沉寂，我军看到有机可乘，遂于12日以优势兵力组织反攻，向其薄弱部突破，集中猛攻敌之正面。13日激战整天，将敌正面阵地摧毁，毙伤敌军逾千，正面战线上的敌人尽皆向后溃退，我军伤亡仅394名。这是护法战争揭幕之后的第一次重大胜利。至此，敌军只得构筑阵地防守，战争形成了对峙局面。我军为了引起敌军浪费子弹，购买了大批浏阳爆竹，于夜间鸣放起来，敌军闻之，全线机枪立时隆隆而起。

10月中旬，连绵五六天大雨。有一天，江道区司令黄岱来见，请求组织游击，扰袭敌人后方。我知道黄岱随黄忠浩在旧军队中服务多年，为人深沉勇敢，缺点是不能熟悉新的军事技术，对他的这个请求，未便轻易允许，只好对他说明，作战的首要之道在于保持有生力量，不要鲁莽行事，徒供无谓牺牲。黄岱说：“我军扼敌旷日持久，胜负未决，采取我这个扰袭敌后的方法，大可摇动敌人军心士气。”我说：“正面之敌已为我军困厄。你的办法，如果在敌人正面的广阔后方采用，有了回旋余地，当然可以发生一些作用。但是在衡山以南的仄狭正面，敌军纵深配备严密，区区百数十人的游击行动，不独难于发生效力，还有被敌人包围消灭的可能。”黄岱又说：“开战以来，我们防守右侧，未曾见过敌面，真是心有未甘。”我说：“来日方长，还有重要任务在后头呢！”他又再三请行，我始允许。结果黄岱在秋雨秋风中率游击队数十人，由湘江东岸于暗夜渡河，全部为敌军所害。其殉

难之烈，实可表彰。

在对峙期，我军子弹补给发生了问题。原来我军每枪仅有子弹 220 发，经过历次战斗，消耗甚大，多者逾半，少者也达三分之一。请求补给子弹的报告，有如雪片飞来。我这个空空如也的总司令，又有什么办法来应付这个难题呢？我只好向两广请求接济，广东答应支援 20 万发，广西答应支援 10 万发，但都因运输困难，不是一时即可到手，只好急电催运来湘备用。

10月20日，谭浩明通电就护法湘粤桂联军总司令职。贺克昭率领的先头部队两个营，广东邱渭南率领的先头部队一个营，随即到达衡阳。我商得贺、邱两人的同意，将部队即日开往前线，以壮声势。

此时，我衡量全局，看到萱州河阵地得到粤桂军的增援，坚如磐石，右翼阵地防守严密，能够确保侧翼安全，惟左翼邵阳方面，力量单薄，是一个大漏洞。如果按照原定作战计划，欲决两军胜负，必须从左翼发动攻势。据谍报称，段祺瑞已调晋军一混成旅和安武军一部在湘乡地带集结，有向邵阳进攻之势。我想：晋军入湘，人地生疏，并且是未经过实战的部队，战斗力当然大成问题；安武军是一群乌合之众，不难一击即溃；且桂军韦荣昌部，业已先期到达祁阳，如果以得力部队协同桂军迅速将晋军击破，进出湘乡，则我军以拊衡山之背，不难将正面之敌一举击溃，取得全局的胜利。基于这个考虑，我决心交由第三纵队担负这个任务。当我们正在和第三纵队纵队长林修梅商议的时候，又接到谍报称，晋军旅长商震率部于 10 月 26 日向邵阳前进，我军周伟部不能拒止，已向武冈转移，晋军已于 28 日占领邵阳。我对林修梅说：“敌人送上一份礼物，摆在邵阳，请你迅速去取，不要失掉时机。”

10月29日，林修梅率兵四营由衡阳出发，11月1日与桂军韦荣昌部会合，商量联合作战，部署进军计划：桂军从邵阳南面

进逼，湘军从邵阳东面进逼，围攻敌人，均于4日开始行动。同时，桂军并贷与我军子弹十万发。

这时商震察觉到自己孤军深入，陷入重围，便迅速将主力转移于永丰（现改称双峰），以一部分军队扼守邵阳东南面，掩护主力退却。我联军于11月4日同时以迅速行动和优势兵力从邵阳东南面猛进，压迫晋军阵地。晋军在邵阳东南面的掩护部队虽然只有两个营，但战斗力颇强，经过一日激战，多方包围，始将其全部解除武装。邵阳恢复后，我们才知道敌军主力早已转移到永丰去了。11月5日清晨，林修梅约会桂军，向永丰方面跟踪追击。这时晋军在永丰选择阵地，图与我军作战。但是晋军官兵屡进屡退，斗志低沉，加以人地生疏，交通情报处处受到限制，而永丰地势低于邵阳，处于受制地位，因此，这支号称训练多年的晋军，竟然无法展其所长。我联军分路进击，激战两日，在永丰、湘乡之间，将晋军混成旅全部和安武军一部解除武装，旅长以下一体成为俘虏。林修梅旋派先头部队进入湘乡，解决了晋军的后方残部。安武军望风披靡，向湘潭方向溃退。这是联军组成之后的一次重大胜利。

这时，有随军的采访员报称：邵阳、永丰、湘乡虽幸克复，但民众却遭受到重大损害。我说：“军事战斗，民众受些损害是难于避免的。”采访员问：“军纪松弛，抢得十室九空，这也是难于避免的么？”我说：“湘军纪律败坏，危害人民，我当负责严厉惩办。”

正在这时，据报告，我军虽获胜利，而老百姓却遭了殃，被抢得十室九空，行劫者全是桂军。我认为桂军是友军，我只能向他们建议请予纠正，于是密电谭浩明请予取缔。不料这道密电大触桂军之忌，加以谭延闿派在谭浩明行营的人，从中离间拨弄，因此桂系开始和我结怨。这也证明，湘粤桂联军正式形成时，我那种“一则以惧”的心情，不是没有根据的。

## 十八、收复长沙的前后

邵阳、永丰、湘乡一战，对北军来讲，是一个相当沉重的打击。王汝勤、范国璋听到晋军全旅覆灭的败讯，看到安武军仓惶逃溃的实情，在颠危慌乱之中，急速转移阵地，将主力撤至株洲一线，凭河依险，企图扼制我军追击。赵恒惕发现敌军阵线有动摇征兆，于1917年11月11日向敌军全线发动进攻，将敌军掩护主力退却的不到千人部队全部解除武装。

敌军主力撤走之时，我们对情况作了如下判断：敌军庞大部队的行军速度，每天不可能超过50华里，因此湘衡大道上，必有大股敌军迟滞其间，于是决定派部队追击疲敌。赵恒惕派第二团由衡山附近渡过湘江，经朱亭向渌口前进；其余二团（缺一营）配合桂军黄克昭、粤军邱渭南两部，由湘衡大道向下摄司跟踪追击。与此同时林修梅纵队进军湘潭，刘建藩纵队进军醴陵，回师攻逐逃窜之敌。

敌军行动果然迟缓，湘衡大道上北军蜂拥，途为之塞，官兵疲劳万状，叫苦连天，忽见我军飞奔淹至，无法设阵抵抗，惟有缴械投降。我军把湘衡大道上（北距下摄司30华里）不作抵抗的敌军解除了武装，总计缴获步枪7000余，机关枪36挺，俘虏敌军官兵8000有余。

败退的北军第八师及第二十师各一部急忙于株洲布防。株洲是湘江右岸突出的一块三角地带，水陆交通四达。按照北军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以株洲一线为凭借，要想抵御由南而北的进攻，首要条件是以两师的兵力控制醴陵、渌口，配以较坚实的防御工事，才能防守得住。但是，第八师已经在萱州河鏖战40天，损伤甚大，士气低落，而防御工事的构筑，又非仓促间所能完成。因此，北军的这区区八九千人，成了瓮中之鳖，无处窜逃。11月13日，我军击破敌军前哨，安全渡过湘江，第二团也由渌

口逼近株洲，由两方面猛烈夹攻，结果将北军大部解除武装，计缴获步枪 5000 余枝、机关枪数 10 挺、山炮 36 门、炮弹 4000 发，俘虏北军官兵 6000 有余。从株洲突围的北军 2000 余众，分为数股向浏醴大道溃逃，均因饥饿疲困，被当地民众包围解除武装，悉数送交长沙作为俘虏。北军两个师的后勤部队约 4000 余人，争先恐后由水路逃奔岳州去了。

段祺瑞据以讨平张勋的北洋陆军第八师，以及张绍曾于辛亥年在滦州据以起义的北洋陆军第二十师，这次在湖南和湘粤桂联军鏖战一月有半，完全溃败被俘（除后方勤务部队 4000 余人），从此注销了建制番号。段祺瑞利用督湘的傅良佐，自 9 月 9 日起，至 11 月 14 日止，做了两个月又六天的湖南督军，于 14 日晚偕同省长周肇祥登上小军舰向岳州逃走。总司令王汝贤，于 11 月 15 日在长沙各界人士组织了“湖南暂时维持军民两政办公处”之后，亦于 17 日退出长沙。有人说，王汝贤和范国璋于 11 月 14 日通电主张停战撤兵，尚想做湖南省的督军和省长。这完全是虚构之辞。两师军队，全部缴械，人虽至愚，断不出此！他们这种主和主张，说是出于被迫，说是受直系军阀的暗示，倒是更近情理的。

我于 13 日由衡阳启行，过萱洲河，凭吊战场，浏览营垒，惟见南北两方，工事犬牙交错，地色苍茫，天光黯淡，作诗纪之：

### 纪湘南护法之役

大盗何时止，生灵困涂炭。  
罪死促罪凶，卓亡催乱。  
联军起南纪，相与申国宪。  
视听秉民意，忠贞摧虐慢。  
尸横祝融麓，血染萱洲涧。

前军告矢绝，秋霖获天顺。  
惨淡偏师捷，虎狼中夜遁。  
飞师逐窜逃，气类由兹奋。

### 过萱洲河

握奇不在众，妙用存一心。  
哀胜征自古，骄败盛于今。  
伊予莅衡阳，发愤惩暴淫。  
敌军三面来，其众浩如林。  
右戒攸醴虚，左防湘邵侵。  
于中扼萱洲，险隘凭崎嵚。  
鏖战经两月，坑壕涨秋霖。  
幸藉奇兵力，捷音播山阴。  
士卒勇益厉，诸将智愈深。  
卒焉克凶残，顽敌悉成擒。  
今当过战墟，堑垒可指寻。  
悲风振林木，悽然为楚吟。

我于 11 月 19 日进抵长沙，当晚即召集刘建藩、林修梅、赵恒惕开会，商定事项如下：(1) 督军名义不恢复，俟谭浩明到时再议；(2) 省长由省议会议决，先派民、财两厅厅长负责；(3) 各团和守备营补充缺额，但不扩充军队；(4) 接受仓库，检查子弹粮食；(5) 俘虏二万余人，设管理处，优予赡养；(6) 稽劳友军及本军官兵。

11 月 21 日，湖南省议会选举我为省长。11 月 24 日，我接任湖南省长。12 月 7 日，冯国璋再行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我乃于 12 月 8 日解除省长兼职。其实，我当时负责指挥军事，对于省政自难兼顾，而且大敌当前，似不应执迷于权位之争。但是，谭延闿和桂系暗事勾结，从中破坏，致使湖南省长

问题成为湘桂继续合作的阻碍。平心论事，我想桂系对我不满，不外下列三条原因：（1）桂系反对省长民选，因为影响及于广东、广西；（2）桂系对孙中山革命势力的发展，颇怀戒心；（3）我曾揭发桂军军纪不严，桂军最高统帅对我有刺骨之恨。但是，湖南省议会要选举我当湖南省长，谭浩明又不便明目张胆反对，所以只好复电声明，“督军省长，须得中央任命，不能由各省自由选举”。护法战争反对的是北洋军阀掌握的北京政权，取得护法战争胜利的省区，其行政和军事首脑反而要“中央任命”，谭浩明等这种荒唐主张，乍看起来很难索解，觉得矛盾百出，或者认为是桂系单纯地因为上述三条原因而与我个人为难，其实，这正是桂系联冯倒段策略的一种具体表现。在桂系的心目中，还是在崇拜着冯国璋大总统，还是在贯彻执行以湖南作为南北缓冲地带的一贯方针，还是在实践其“北不犯南、南不犯北”的指导思想，还是在企图保持其地方割据势力。桂系誓师援湘的原因在此，桂系对于湖南省长问题的态度，其原因也在此。

### 十九、南北双方内部斗争激化

在南北急剧斗争中，桂系陆荣廷和直系冯国璋的勾结日益暴露，北洋派直系和皖系之间的明争暗斗也日益加剧。

1917年10月1日，陆荣廷召集了南宁会议。随后，两广的军事首脑发出了斥段的通电。10月20日，两广护法联军又入湘支援。所有这些，使段祺瑞大为恼火，乃于10月29日下令罢免广东督军陈炳焜，派李耀汉兼署广东督军。这表明直系冯国璋的力量此时尚斗不过皖系段祺瑞的力量。11月8日，段祺瑞又迫使冯国璋下令：（1）调陆荣廷为宁威上将军，着即迅速来京；（2）特派龙济光接任两广巡阅使；（3）责成新任广东督军李耀汉严饬桂军开回广西。这三道命令，更加证明桂系联冯策略的挫折。

11月10日陆荣廷在梧州召集两广军政首长，并邀请大元帅代表胡汉民、军政府代表外交次长王正廷、海军总长程璧光等开联席会议。会议议决的重要事项有：（1）消除两广内部意见的隔阂，团结一致，对付北洋派的武力统一；（2）开辟第二战场，发回亲军20营交陈炯明指挥，推程璧光兼任讨闽军陆海联军总司令，讨闽军以林葆怿为海军总司令，陈炯明为粤军总司令，方声涛为滇军总司令；（3）推陆荣廷为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在陆荣廷养病时期，以广惠镇守使莫荣新代理；广东督军陈炳焜，调任讨龙军总司令。通过这次会议，两广内部的纠纷得到了暂时的解决。

这时，北军在湖南战场上连连失利，王汝贤、范国璋于11月14日通电主张停战，长江三督公开主张停止川湘战争，江西督军陈光远拒绝“客军假道”（指的是通过江西开往湖南战场的北军）。这一切，给主战派的皖系以沉重打击，段祺瑞被迫辞职，发出了剖明心迹的铣电。这份铣电，可以看作是段祺瑞祸国卖国的亲供。铣电首先供认了用兵西南的野心，是想“发挥我北洋同袍之实力，统一国家，奠宁宇内”，谎称“迭经阁议，询谋无间”，以表示自己不是独断独行。接着，铣电指责湖南前线王汝贤、范国璋在军事失利下通电主和的行动，说成是“奸人煽惑”，以致“军无斗志”。段祺瑞在电报中感慨地说“删日王、范通电传来，阅之痛惜，不意我同袍中竟有不顾大局之人，干纪祸国，至于此极”。再接着，铣电又为他自己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进行辩护，认为“今日中国，盗贼盈途，环顾国内，惟我北方军人实力，可以护法护国”。最后，铣电又号召北洋派加强团结，说什么“辛亥癸丑之间，我北方军人人数不及今日三之一，地利不及三之一，所以能统一国家者，心志一而是非明也”，“近日南方党徒别出阴谋，始以北方攻北方，继以南方攻北方，终至亡国灭种而后快”。怎么办呢？段祺瑞认为，“我北方军人分裂，即中国

分裂之先声，我北方实力消亡，即中国消亡之朕兆”，因此，“为国家计，当先为北方实力计”，应该“时时以北方实力即国家实力为念，团结坚固”起来。

段祺瑞的这份铣电，字里行间，实际上隐含着杀机，等于放起一把野火，煽惑主战派的皖系各督军，举起反对主和派的直系冯国璋。

冯国璋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唆使李纯拉拢曹锟，得到曹锟的初步同意，由曹锟领衔，发出四省联名的巧电，主张停止内战，曹锟愿任调人。这是打击段祺瑞的一个当头棒，使段手足无措。但曹锟虽隶直系，对冯、段之争一向采取两面光的手法，他深恐巧电开罪于段祺瑞，急忙向段祺瑞解释，说巧电并非本意，说事先并未得到他的同意。段祺瑞发现了这个漏洞。立刻派徐树铮赴津，大力吹捧曹锟，并以副总统为饵，使曹锟顿时变为主战派。曹锟乃于11月21日单独发出马电，主张以南军退出长沙为南北议和的条件。这样一来，李纯等弄巧反拙，曹锟实质上附和了主战派，使皖系气焰更加高涨，压倒了主和派，集矢攻击李纯。冯国璋外受桂系速下停战令（11月26日陆荣廷首先下了停战令，28日谭浩明据以发表，不许湘军继续前进）的要求，内迫皖系督军团速下讨伐令的催促，陷于羝羊触藩的困境。终于在12月16日，令派曹锟为第一路总司令，张怀芝为第二路总司令，由湖北、江西两路大举进攻湖南。

12月7日，冯国璋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冯国璋的这道命令，不仅由于湖南当时是自主时期，湖南人民不欢迎谭延闿，且与北方主战派的意志大相违背，因而两面不讨好。我于11月24日接任，12月8日离职，做了14天的“短命省长”。但是谭延闿无法就职，也不敢大胆就职。

我在《护国之役前后回忆》一文（刊《文史资料选辑》）中，曾将谭延闿对待反袁的态度作过说明。汤芗铭被逐，谭延闿掌握

了湖南军民两政。这次北军压境，谭延闿一看风势不对，立刻远走高飞。这时谭延闿被任命为省长兼督军，不是没有来由的。谭延闿本来依附桂系，桂系又和直系有勾搭，所以冯国璋於南军克服长沙之后，任命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桂系的想法是：北方主战派一定要进攻湖南，与其在湖南冒更大的战争风险，不如让谭延闿回来，仍将湖南划为南北的军事缓冲地带。直系的想法是：把谭延闿回湘作挽救和平的一线希望，认为如果谭延闿能够说服桂军先行退出湖南，主战派就没有理由坚持军事进攻。谭延闿此时则跟在岑春煊的后面以“调人”姿态出现，与岑联名电请北军不要进攻岳州，他表示愿意回湘“调解”，并要求北京政府再下一道停战令，以便作为他进行“调解”的政治资本。结果是，北京政府的停战令没有下，南军却坚决攻下了岳州。我和湖南人民坚决拒绝谭延闿回湘，谭延闿和我结怨，从此开始。（谭延闿后来在7月间还是重任了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以后我们虽几度共事，但总是貌合神离，相互戒备。

12月12日谭浩明到长沙，我们欢言相见，我说：“直桂合谋倒段，虽然在策略上收到一定效果，但是没有解决根本问题。目下冯国璋处境困难，和当日黎元洪的处境无异，我们尚须加倍警惕，整理军务，以应艰巨。”谭浩明说：“湖南省议会选举省长，陆干老认为不合法，不便赞成。”我说：“癸丑倒袁之役，江西起义即已实行，有例可援，并非湖南创举。现在湖南并不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联军总司令有合情合理的权宜办法，我们当然竭诚赞成。”谭浩明说：“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长计议，不会发生纠纷的。”旋由联军参谋长钮永建从中斡旋。我坚决表示，只要民财两政不为更动，同意由联军总司令兼管军民两政。旋得谭浩明诺言，所有人员一律仍旧，谭浩明宣布，暂以湘粤桂联军司令名义，兼领湖南军民两政事宜。

此时，浙江、湖北等省都有军队宣布自主反对北洋政府。石

星川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军长。1918年1月4日，河南民军司令王天纵在汝州宣布自主。这些纷纷宣布自主的军队，不论其所抱宗旨如何，但他们都直接或间接以北洋政府为其反对目标。宁波自主，遭受了浙江第一师师长童葆暄的镇压而失败。荆襄自主，虽然黎、石本身并不健全，但是对湖南军事的呼应起了极大的作用。当时，北京皖系主战派的气焰高涨，要挟冯国璋下命令对西南方面进行“全面讨伐”，冯国璋耍了一个滑头，他想“大事化小”，把荆襄自主看成是湖北的内部问题，与南北和战形势以及西南当局无关，所以通过参战陆军办公处以“奉大总统谕”的方式向前方军队发出电令，进剿荆襄自主军。冯国璋满以为这样做法，既敷衍了主战派，又不得罪主和派。谁知，主战派对此并不满足，而西南各省首领，除陆荣廷之外，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等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两路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两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行为，提出严厉质问，使冯国璋没有躲闪回旋的余地。

在南北斗争这个带关键性的时刻，段祺瑞主战派咄咄逼人，步步进攻；冯国璋“主和派”事事迁就，节节败退；内阁总理王士珍倜傥惶惶，苦苦求去：这就是当时北洋派的一幅写照。

## 二十、西南内部斗争激化

以陆荣廷为代表的桂系采取“拥冯拒段”的政策，他们对于湖南战场的军事行动，严加控制，他们的最高目的只是换取北京政府的一个正式“停战令”，使湖南成为缓冲地带，以便保持他们原来的实力。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人和西南护法军政府，与北洋政府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桂系看到孙中山有一定的实力，而冯、段斗争的结局尚是“未定之天”，并且两广又是“自主”

时期，所以他们对孙中山和军政府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对付，明的说是要加强团结，暗的却在勾结西南各省的实力派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桂系大将莫荣新，甚至残杀孙中山派往广东各县招收民军的干部，大拆孙中山和军政府的台。

孙中山处此情况下，实在忍无可忍。1918年1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密令海军、滇军和地方派军人举行一次军事突击，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海军豫章、同安两舰接到命令之后，按照指定时间驶出广州，向观音山开炮，作为起事信号，结果陆军没有及时响应。第二天，对于这个突发事件，国民党的重要分子和桂系都一致主张和平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了五个条件：(1) 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2) 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3) 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4) 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5) 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回答说，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荣廷请示，第四至第五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这就是说，孙中山所提出的五个条件，没有一条是被接受了的。孙中山考虑到自己掌握的武力尚不足以变更现状，迫于情势，只好在1月9日在大元帅府招待各界人士，把这次事变的经过真相宣布，西南的一场轩然大波，暂时平息下去了。

## 二十一、南军攻克岳州

桂军出兵援湘，是为了使冯国璋得以向段祺瑞施加压力，打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全国”的政策，从而保全桂系的势力范围。可是，军队入湘以后，问题越闹越大，他所暗中勾结的直系，在北京又斗不过皖系。陆荣廷自度本钱无多，实在不足以与北军一决雌雄，倒不如让湘军独立决战，自己可以火中取栗。这就是桂系对待护法战争的基本态度。因此在收复长沙之后，桂系就按兵不动，观察风向。他们面对着驻防岳州的北军直系第二师

师长王金镜的部队，彼此心照不宣，保持默契。而对湘军进攻岳州的要求，谭浩明则力加劝阻。至于荆襄自主军遭受北军进攻，谭浩明不但坐视不管，并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

从湖南湘军的利害关系方面来看，湖北荆襄自主，不论它的动机为何，是靖国也好，护国也好，护法也好，他们的成败都和湖南息息相关。因此湘军进攻岳州，牵制北军，于湘于鄂都有好处。再则，如果岳州不收复，长沙也就很难守住了。这就是我们当时对军事形势的基本认识和行动准则。

曹锟的部队开到湖北广水，准备进攻湖南。这时，北方的主战主和两派在对南问题上正展开激烈斗争。曹锟想在湖北停留一下，观望风色，再决行动；加之，荆襄已经发生了变动，如果置荆襄变动不理，率部南进，将有可能“腹背受敌”。因此，曹锟和赵倜、吴光新会商决定，在进攻湖南以前，先行消灭荆襄自主军。同时，他们还请王占元派兵协助，以便摆下一个四面围攻的阵势。王占元对于这个计划，也无法加以拒绝。

1918年1月14日，襄樊方面，吴佩孚率领第三师从东面进攻，南阳镇守使吴庆桐率部从北面进攻，黎天才所部旅长张联升反对自主，率部开往南阳，因而势孤力单，无法抵抗。荆州方面，吴光新部从当阳西下，王占元所属的王懋赏部和卢金山部从潜江、沔阳进逼，经过接触，黎、石两部毕竟因装备饷械不足、军事训练较差，更兼缺乏坚强的革命精神，敌不过北洋军队。1月20日，吴光新部进占荆州。

正当北军进攻荆襄的时候，黎、石都有急电来求援。我当时考虑，进军岳州是最好的支援办法。因而回省和谭浩明商量。我同时拨出1000余人，300多枝枪，由老同盟会会员陈楷良率领，交由李书城组织援鄂第一军，由李书城任援鄂第一军总司令。同时委周则范为援鄂第二军总司令。李书城率部出湘西澧县，进入荆沙，正值黎天才、石星川自主军失败溃散。李书城即将溃散之

鄂军夏斗寅、张笃伦部收容折回湖南，与我在岳州会师。这时李书城所率领的援鄂第一军编为两个团，一个游击队；一团团长张笃伦，二团团长夏斗寅，游击队长陈楷良。这支军队以后在湘东、湘南和北军作战时，都有一定的建树。

我们的援鄂行动，谭浩明深表不满，他一见我就说：“北方冯、段的斗争日益激烈，我们的军事行动应当格外慎重。如果为事势所逼，不能不进军岳州，也只能在岳州范围以内考虑军事规划，断不可扩大范围，牵涉到政治问题，以致无法收拾。”我说：“从军事上决策，当然首重利害，同时也要计算力量，否则都是空言。现在我们的力量足以攻取岳州，而事势利害，又如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总司令既然赞成进军岳州，我想提出两个进军方案，以供采择。”

我提出的两个方案是：第一个方案，用一支得力军队出桃林，占领羊楼司，截取敌军在陆地上的归路，另以主力从东南面进攻白湖荡、新墙，夺取岳州；第二个方案，用一支军队由黄沙河佯攻新墙，另以主力由长寿进攻白湖荡，夺取岳州。我见谭浩明对这两个方案都犹豫不决，便说：“第一个方案等于瓮中捉鳖，可收伟大战果。但是直捣羊楼司，必须选择能员率领劲军担任。”谭浩明问：“谁能担得起这个重任呢？”我说：“桂军陆裕光和粤军马济，都能担负这个任务。”谭浩明说：“他们年青，恐难胜此重任。第二个方案如何分担任务呢？”我说：“拟以湘军为主力，负责进攻白湖荡，桂军韦老将军（荣昌）负责由黄沙河进攻新墙。”谭浩明决定采用第二个方案，我便要他下命令。这时，参谋长钮永建插嘴说：“驾轻就熟，前方指挥由你一人承担，毫无牵制。”我说：“攻岳计划已作决定，但是侦察敌情和部署攻击，还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完成。”谭浩明说：“计划既经决定，进行日期由你斟酌好了。”

我由长沙回到新市，召集刘建藩、林修梅、赵恒惕三人开军

事会议，作了必要的部署。为了呼应荆襄友军，为了扫除战场障碍，我军势不能不进攻岳州。林修梅说：“攻取岳州，必须速战速决，不可拖延时日，坐待形势发展，于我不利。我建议每团派一个督战员，全军鼓起战必胜、攻必克的气概，火速行动。”刘建藩说：“我赞成林纵队长的建议，我军应该抓紧时机，将岳州两师北军击破，对于我将来作战更为有利。”赵恒惕说：“第一个作战方案，可以减少牺牲而收得最大战果，但是因为没有得力军队进占羊楼司，所以弃而不用，实在可惜。如果采用第二个方案，则敌人早以重兵扼守白湖荡，这样坚固的阵地，非拼大力不易奏效。假如我军被阻滞在白湖荡阵地，如同敌军上个月停滞在萱洲河一样，那么，前途之险，就会不堪设想了。”我分析说：“我早就注意到了可能产生这样的危机。但是，我料想王金镜不会死守岳州。因为岳州西面洞庭、北临长江，如果没有三湘九澧作为屏障，可以说是最不容易防守的地区。假使王金镜硬要死守岳州，阻止我军在白湖荡鏖兵，则我可调一支军队截断他的归路，敌军就必须迅速由水路退却。现在我们采取正面进攻的办法，给敌军以全师而退的机会。这正是采取第二个作战方案的精意。总之，敌人与我军激战也好，敌人全师后撤也好，敌人与我军鏖兵相持也好，我们处境艰危，只有作战之一法。战则可以收复岳州，按兵不动，不但岳州无收复的希望，就是长沙也岌岌可危。”

我接着又提出了敌我军事力量情况和战斗的有利时机，我说：“进攻岳州，关于敌我双方的军事力量，我也经过再三考虑。王金镜现在指挥两个师，这两个师的装备和训练都比较好，有一定的战斗力，不能够小视它。我估计他的作战部署，必然会在新墙配备一个旅，以一个师配备于白湖荡之线，另以一旅作为总预备队。我军作战部署，拟用三个旅主攻白湖荡，比敌军占优势；韦荣昌担任率部由黄沙河佯攻新墙，也要比敌军占优势。现在是

严寒冬令，岳州地带港汊湖沼悉变旱地，对我作战极为有利。我军斗志昂扬，奋勇前进，一周之内，定然可以把岳州拿下。”全体官兵，一律配发白布缠臂的口号，上写：“夺得岳阳，湖南必生，不夺岳阳，湖南必死”，“敌人胜我，则中国亡，我胜敌人，则中国存”。这些口号，对鼓舞全军士气、发挥斗志，起了很大的作用。

此时，湖北方面吴光新部正攻下荆州，襄樊正处于被吴佩孚围攻的紧急关头，于是我命令集中于湘阴北部的湘军，于1月20日拂晓，向白湖荡主攻，桂军韦荣昌部同时由黄沙河向新墙佯攻。白湖荡战线方面，敌军在前哨阵地构筑了许多临时工事，凭借这些据点，敌军以猛烈火力阻遏我军进攻。我军每拿下一个据点，都要付出相当的代价。双方激战近两日，到23日黄昏时候，我们才将敌人的前哨据点悉数击破，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阻碍，逐渐接近白湖荡敌军的基本阵地。敌军的基本阵地，虽然构筑了临时工事，但是极其粗糙，反而不若前哨阵地据点那么细致结实，并且配置布局，极不合理，有些地形不可为据点的而作了据点，则予我军以容易接近的机会；有些地形应为据点的而不作据点，则予我军以暇隙可乘的缺口。1月24日拂晓，我军展开了攻击白湖荡敌军基本阵地的正规战斗。由于敌军工事构筑混乱无章、极不合理，使得我军比进攻前哨阵地更加容易，付出的代价更小。1月25日，敌军阵线上火力渐次低沉，似有退却模样。没有料到，此时大部分敌军已经脱离本阵地。1月26日，敌军白湖荡阵地被我军全线突破，在阵地上俘虏敌军160人。经过激战，我军于1月27日进入岳州。敌人撤退前纵火焚烧，蔓延达一昼夜，全城被毁殆尽。

自1913年讨袁失败以后，岳州就沦于北军之手。这回岳州收复，湖南人民莫不欢天喜地，共相庆祝。

北军王金镜、李奎元虽然不是主战派，但他们以两师兵力驻

防岳州，对湖南来说，的确是一个赘疣隐患。如果不将它割除，则曹锟、张敬尧等北军进攻湖南时，即可凭借岳州之险，将第一线摆到湘阴、长沙一带。因此，从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看，付出一定代价（包括军队伤亡和岳州被焚）收复岳州是完全必要的。

我于 1 月 29 日进驻岳州，即得到谭浩明的电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鄂境一步。此时，桂系和直系仍然勾结主和，长江三督仍然是主和首脑，所以谭浩明于 1 月 30 日打电报给李纯，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并请李纯正“毅力斡旋，促成和局”。谭浩明并电劝我们赞成此旨，我乃对王占元作出不入鄂境的声明。1 月 30 日，我又向李纯声明：“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1 月 31 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大意说，湘军以和平为目的，不得已采取武力手段进攻岳州，今后仍本和平主旨，希望能够早日实现。1 月 31 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作为南北停战的前提条件，李纯即据以发出世电。李纯的世电，为南方桂系所欢迎，但为北方主战派所痛恨。当时，一般的舆论认为，直系的“和平混一”虽然不是根本办法，但比皖系较为温和，能够维持现状，能和即和，得过且过，也是好的。但也有些激进派，主张趁湖北空虚之际，直窥武汉，使局势立刻改观。其实，这种激进派的主张只能是一种主观愿望。须知当时粤桂军队腐朽无力，不能正式作战；湖南的军队，素质较好的也只有林修梅一旅，但是经过两次血战，伤亡几近一半。以这样单薄的军事力量，侈言直捣武汉，这不是梦呓吗？

## 二十二、攻克岳州后的困难局面

南军攻克岳州，引起了皖系一阵狂吠。冯国璋在此情势下难于抗拒，于 1 月 30 日以总统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

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并说“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他命令曹锟、张怀芝进兵，以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这就是冯国璋顺应主战派的要求所下的讨伐令。

冯国璋虽然迁就皖系下了这道讨伐令，可是张敬尧、曹锟、倪嗣冲、张怀芝、张作霖等对李纯的攻击，并没平息下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阻挠对南作战。他说南军攻克岳州之后，李纯还打电报给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并请北方各省协助。张敬尧还造谣说谭浩明有电报给李纯，称南军进攻岳州，是因为得知李纯因主和受到了攻击而辞职，不胜气愤，所以采取报复行动。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严厉质问李纯，要李纯将谭浩明的密电原文公布，切勿吞吐其词。张作霖也通电斥责李纯，说什么“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李纯也不示弱，他发表通电否认接到过“主和密令”，说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指讨伐令）尤属极端服从。李纯并且反唇相讥，说张作霖“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他们彼此交电交讧，各执其词，极为激烈，实际上只是对骂，互相揭底，张敬尧等这样做，意在进一步激起主战派对冯国璋的公愤，使冯国璋站不住脚。

此时，陆建章通过谭延闿介绍，同我有过一度书札的往来。陆建章确实站在直系冯国璋一边。他在主使冯玉祥于2月14日在武穴发出主和通电痛斥南北战争之前，曾派人持信来和我联系，请求我在冯玉祥因主和行动而受主战派围攻时，能够以实力呼应，牵制主战派的行动。我复函答应他决以实力相助。嗣后陆建章策动安徽民军企图驱逐倪嗣冲一举未获成功，冯玉祥亦因此受到处分，这个往来也就断绝了。

湖北荆襄自主军被击溃之后，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各混成旅，张敬尧率领第七师，陆续开到鄂南崇阳、通山一带，高叫以

武力征服西南。张怀芝的第二路“讨伐军”，包括施从滨的山东第一师、张宗昌的混成旅以及李传业的安武军，也陆续向赣西集中。风声所播，遐迩共惊。冯国璋“出巡”未遂，成了主战派的俘虏，一反其平日主和的态度，变为主战派首领之一。但段祺瑞还是不放松，派徐树铮到奉天，以运到秦皇岛的日本军械换取奉军入关，用来威胁冯国璋。

此时坐镇南宁的陆荣廷，看到桂系、直系合谋主和的策略已经破产，南北大战一触即发，又见广东内部发生内讧，程璧光于2月26日被刺身死，因而感到身处棘地荆天之中，只好实行其“伸头缩脚”的办法。何谓“伸头”？他命令谭浩明出师湖南，取得舆论的赞许，这就是“伸头”。何谓“缩脚”？他乘隙退兵，保存实力，以待时机，这就是“缩脚”。陆荣廷一伸头一缩脚，由湘军承担全局安危的重责，使湖南面临着战争的威胁。

兹将敌我两方兵力列举于下，便知我湘军当时所处的困境。

北军第一路总司令曹锟	直军总指挥吴佩孚	第三师师长吴佩孚
		第一混成旅王承斌
		第二混成旅閻相文
		第三混成旅萧耀南
		第四混成旅陈德邻
		陆军第七师
北军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	山东陆军第一师施从滨	
	江苏混成旅杨春普	
	江苏混成旅张宗昌	
	安武军 20 营	
北军第三路吴光新	陆军第十八师卢金山部	
	混成旅冯玉祥部、李炳之部	

以上是北军的基本队伍，以下则是湘粤桂护法联军的基本队伍：

湘粤桂护法联军总司令谭浩明	湘军总司令兼前方总指挥程潜	桂军	第一总司令韦荣昌 警卫 10 营
			第二总司令陆裕光 警卫 10 营
		湘军	湖南陆军第一师
			湖南陆军第二师
			零陵警卫队 12 营
		粤军	粤军总司令马济 警卫 10 营

按照敌军战斗序列计算，曹锟所率领的第一路军，主力是北洋陆军第三师和四个混成旅，共有 75000 人，张敬尧的陆军第七师，有 20000 人，两部合计为 10 万左右。张怀芝所率领的第二路军，主力为山东陆军第一师和杨春普、张宗昌两个混成旅以及安武军 20 营，共有 55000 人。吴光新所率领的第三路军，主力为卢金山的陆军第十八师和李炳之、冯玉祥的两个混成旅，共有 40000 人。以上三路军总计 20 万人。

这三路北军的作战目标大体上是：第一路由鄂南进攻湘北，第二路由赣西进攻湘东，第三路由荆沙进攻湘西北。

北洋军阀如此兴师动众，用兵西南，原因有四条：（1）段祺瑞主战派梦想以武力统一全国，以遂其军事独裁之私；（2）督军团意气用事，认为湖南军队在“太岁头上动土”，灭了北洋军队的威风，因而力图出一口恶气，想要“报仇雪耻”；（3）曹锟想在猎取副总统的权位，所以异常卖力；（4）直系（冯国璋）在和皖系（段祺瑞）的较量中，证明自己力量不足，不能不屈服于一时，因而同意出兵以取得弥缝。上述四原因中，最主要的还是第一条。

当时湘军的处境，的确有种种困难：（1）湘军陆军共 21000

人，巡防营 3000 人，新收鄂军 1600 人；桂粤军韦荣昌、陆裕光、马济所部合计 14000 人。总计湘粤桂联军战斗列兵不及 40000 人，较之北军兵力，相差甚远。（2）桂粤两军，包括一部分湘军，都是巡防营队的组织，这种军队实际上是地方武装警察，其组织编制和装备训练，大都不适宜于正式作战，何况桂系的上层领导人物已经动摇，斗志更加松懈。（3）由临湘起，经过巴陵、平江、浏阳、醴陵边界，长达一千数百里，北军由湘北和湘东分路进犯，南军防线处处空虚，没有得力军队足以遏止敌军的进攻。（4）攻克岳州之后，桂系不但不敢开罪北洋直系，反而和北洋直系同气相求，严禁湘军越出湖南一步，使湘军在军事行动上受到百般限制，致作战立于被动地位。由于上述原因，使我湘军只能暂取守势。

### 二十三、战争最后的结局

鉴于北方南方政治形势和敌军的优势，我军决定部署如下：在湘北、湘东，左自长江右岸经羊楼司和巴陵、平江边境延伸到浏阳、醴陵边境，绵亘一千数百里的地带，以湘军主力担任羊楼司正面布置防御阵地，桂军韦荣昌部担任桃林方面防御，粤军马济一部会合湘军刘建藩一部担任平江方面防御，桂军另一部担任浏阳、醴陵方面的防御。

部署初定，正当敌军压境、激战即启的前夕，前线指挥官赵恒惕突患重病，我乃由岳阳赶到中路铺，亲临前线指挥。

1918 年 3 月 1 日，在羊楼司和羊楼峒一带（羊楼司属湖南，羊楼峒属湖北，相距三四十里），两军开始接触。羊楼司左右都是崇山峻岭，我军择险构筑工事以待来敌。吴佩孚率队向我军进攻，双方互相冲杀，战况十分激烈。我到羊楼司左侧方第四团第一营阵地观察和指挥作战。该营依据斜坡防守，面对前方空旷平地，可以组织火力瞰射。这时，大约有一营左右敌军，向我军阵

地进行威力侦察。敌军渐次接近，我军阵地上用机枪组织了猛烈的火力网，伤敌甚众，其余则狼奔豕突，逃到附近村落中去了。这场战斗，是我方第一营第四连连长张鹏翼指挥的。我当即对全体官兵的沉着勇敢，予以赞扬鼓励。战斗结束之后，我召集第一营全体官兵，询问战斗经验。我问第一营的官兵们：“北军第三师的作战能力如何？”士兵们回答说：“北军第三师能够刻苦耐战，爬山越岭，不畏险阻，这是他们的长处。”有些官兵们说：“我们和北军第八师、第二十师、第二师、第十一师、山西混成旅打过多少仗，比较起来，北军第三师算得上是能够打仗的。”我向一营官兵们说：“我们的军队要以革命精神战胜敌人，要以动作灵敏战胜敌人，要以技术高强战胜敌人。有了这三条，我们对任何敌人就无足畏惧了。”不久，赵恒惕病愈归队，我将前线军事指挥任务仍交赵恒惕执行，并吩咐他：“赣西敌军日渐接近湘东，桂军萎靡，无法抵挡，羊楼司战线方面，由于敌众我寡，不能轻易决战，必须看准时机，转移阵地。”

我回到岳州，汇集各方面情报详加考虑，认为湘东方面尚不十分吃紧，最危急的是平江方面，其次是桃林方面，而羊楼司正面鏖战日久，兵力已疲，于是我决心命令正面主力转移阵地。韦荣昌摇摆不定，如果风声紧急，他很有可能不战全师。在羊楼司正面，3月5日以后战况日趋紧张，每一山头据点或者阵地钥匙据点，敌我双方莫不经过三番五次的争夺，时攻时守，激战已历五昼夜，敌我两军伤亡惨重（敌军伤亡3000以上，我军伤亡亦近2000），尸横山麓，血染层林，天昏地惨，鬼哭狼号，附近居民，逃避一空。鉴于友军的怠战，敌军在平江和湘东方面的威胁，羊楼司正面已达成消耗敌军的任务，不宜长久恋战，我乃下定决心：令正面主力转移阵地。

3月10日，我羊楼司前哨阵地一度失利，旋即夺回，并于10日晚全军脱离阵地，安全撤至云溪。大家知道，在敌军占优

势的情况下，转移阵地，确是十分困难的军事行动。为慎重计，我又于 12 日亲至云溪布置。我抵云溪时，我军绝大部分已安全转移，忽遇第一旅代理旅长宋鹤庚率后卫甫到。宋鹤庚报称：“后卫组成为第二团加一营又炮兵一连，敌人跟踪的追击部队，与我后卫部队的兵力大体相等。”我说：“在此紧要时刻，如果不把敌人的追击部队击破，我军就会在云溪站不住脚，就会造成混乱局面，前途不堪设想。”宋鹤庚说：“我率领的这支后卫部队，可以担负击破敌人跟踪部队的任务。”宋鹤庚按照我的指示，于云溪以北十里许选定阵地，布置妥当。敌军追击部队逐渐接近我军阵地，莽撞来攻，渐来渐众。我在炮兵阵地看到宋鹤庚从容不迫地指挥第二团的主力，正以如熊如罴的精神，和如虎如豹的猛勇，一往直前，争先恐后，痛击敌人。经两小时战斗，我军所向披靡，往复冲杀，敌军势渐不支，向后溃走，我军寻势追奔逐北，将敌驱逐 30 余里，获得大胜。宋鹤庚指挥战斗，智勇过人，这次狙击敌军跟踪部队，关系全局，至为重大，其精诚奋发，令我终生不忘。

## 二十四、南撤时侧击痛创第二路北军

不久桃林失守，平江前线战事亦变不利，岳州吃紧，我将战况电告联总，谭浩明坐望和平，一筹莫展。1918 年 3 月 12 日傍晚，我与赵恒惕、林修梅商量，想将全军撤至衡山一线，相机打击敌人。经过详细研讨，赵、林都赞成这个办法。我乃决心下令全军于 12 日夜间开始行动，终于 13 日全部脱离岳州，我随部队行动。

3 月 20 日，闻谭浩明准备退出长沙，城内居民惶惶不安，商肆关门闭户。25 日，我到长沙，市肆已遭桂军洗劫，景象凋零，不堪言状。而湘军于撤退之中，亦有肆行抢劫者（吴剑学部）。我告诉赵恒惕，部队从前线撤至湘阴地界时，秩序井然，

但也发现吴剑学所部在途中发放冷枪，惊扰人民，均已随时制止。我和赵恒惕在湘潭启轮溯江而上之时，适有一散兵开枪向我坐船连射数弹，停轮容彼上船，讯知又是吴剑学的马弁，当即就地正法。沿途上驶，行至昭陵，我上陆巡视，发现有输送兵抢劫民物，证明赃证俱全，也交法办。桂军腐朽，纪律松怠，扰民祸民，自不待言；湘军素称军纪森严，但在颠危之中，亦多越轨行动。

我于3月26日到达衡山。此时，湘军全部都已集结在潭衡道上。27日，我集合刘建藩、林修梅、赵恒惕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事项如下：（1）从敌情分析，今后应该确保湘南，以湘南作为军事根据地。（2）为了巩固军事根据地，取得立足点，挽回湘军威望，依目下情况，应该选择北军薄弱一环，予以重大惩创。正面吴、张两部北军兵力雄厚，势成犄角，难与争锋，只有张怀芝所部第二路军，如施从滨、张宗昌所部及安武军，内容复杂，战斗力弱，正宜相机予以打击。（3）为了执行上述任务，以湘军第一师和第三旅（欠一团）为骨干担任正式作战，另组织零陵守备先锋队四营、粤军守备先锋五营，担负冲锋陷阵轻骑突袭任务。（4）湘军第三旅第六团、鄂军夏斗寅团、吴剑学部守备营，归林修梅纵队长指挥，担任警戒和防守衡阳任务。（5）通知粤军马济，望其组织守备先锋队，配合作战，期于必胜。

刘建藩对我说：“此次用兵，如果不能取得胜利，无面再见总座。”我闻之凄然，鼓励他说：“事在人为，我们是能够取胜的。”

赵恒惕、刘建藩即日由衡山击楫渡江，并协同马济在株亭附近各自成立守备先锋营，准备对敌进攻，士气非常旺盛。4月1日，进攻准备工作结束。据报：敌军施从滨率山东第一师已由江西进入醴陵地境，抵达渌口；张宗昌的混成旅和李传业的安武军，集结在醴陵泗汾。4月2日，我军由株亭出发，分两路向醴

陵前进：一部奔向醴陵南乡，截击张宗昌、李传业麇聚泗汾之敌；一部奔向醴陵西乡渌口，迎击施从滨的第一师。

泗汾方面，张宗昌的混成旅，全是北方的帮会；李传业的安武军，半是张勋的辫子军。人数组称三万有奇，实际上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群乌合之众一和我军接触，立刻喧哗喧杀，声振云霄，战争开始时尚能恃其人众，横目鸣枪，怒容抗拒，待到我军倾力攻击，马济所率领的守备先锋营加入阵线奋勇冲杀的时候，这班乌合之众就如飞禽走兽，纷纷乱窜。

交战结果，北军第二路大败而逃，一部分奔向长沙，一部分退回萍乡。为了遵守不入江西境界的诺言，我军追至老关而止。我军取得这次胜利，遂在湘南站住了脚跟。

我军打垮张怀芝的主力之后，刘建藩身先士卒，追击敌人，进至株洲，因阻止张、吴两方的援兵，渡过白石港（港水甚深）时不幸落水阵亡。湘军遽失大将，是为一大损失，全军闻之，莫不痛悼。我军赵恒惕部于达成任务后，率师经由攸县、茶陵折回湘南。

经过这次战斗，张怀芝所率领的北军第二路军被我截为两段：一段在渌口，一段在泗汾，首尾不能相应，两段均溃不成军。这一伟大胜利，使我在湘南站住了脚跟。

关于这一段战斗经过，我的诗集里有《纪羊楼峒及攸醴之役（并序）》予以记载，录之如后：

去年冬，予既自衡阳克长沙，段祺瑞因自劾去职。  
所部李奎元、卢金山等犹据岳阳，于是有白湖荡之战，  
克之。不逾月，段复藉参加欧战借日款，重柄政，以曹  
锟、张敬尧、张怀芝、吴光新、张作霖等军分五路来  
寇。予掣桂军御之，左起羊楼峒，右至萍乡，战线亘千  
余里，鏖战月余，覆张怀芝军于攸醴。殆予部刘建藩在

株洲阵殒，前锋不支，因弃衡阳，退保郴永，而长衡诸郡遂同陷，因以纪之。

朔风吹霰雪，烽火连江湘。  
凶残不悔祸，旗鼓忽再张。  
群丑众如林，分路犯我疆。  
众寡虽殊势，理直气自扬。  
麾兵事险隘，摧敌先摧强。  
三旬遏狂寇，死伤略相当。  
选锐扼攸醴，期然来虎狼。  
追奔士无前，惜哉殒俊良！  
前锋遂颠踬，因之弃衡阳。  
全我仁义师，胜负亦何常。

我还有《零陵镇守使刘建藩挽诗（并序）》一首，一并附录。

君字崑涛，予邑人也。性勇毅，富智略。毕业保定速成军校。辛亥广西反正，君致力特多。后充江南第八师骑兵团长。讨袁之役，声望尤著。湘南首义，每战身先士卒，所向克捷，不幸于攸醴击败张怀芝军后，追至株洲死焉。诗以哭之！

求志怀远图，超俗企令誉。  
先轸甘丧元，狼瞫竟忘躯。  
忠为大义尽，事以奇烈殊。  
刘子今健者，心雄无万夫！  
义旗举湘南，挺身当先驱。  
抒谋申纪纲，领军树楷模。  
走也岭峤来，诚信夙同符。  
相兴摧强暴，正气击一隅。  
选锋扼攸醴，始焉报捷书。  
追逐下株洲，穷寇终负隅。

逆众势再振，孤军陷泥涂。  
堂堂官彭才，殒命在须臾。  
临阵得凶闻，抚膺痛何如？  
感同一臂断，哀使双泪枯！  
造化胡不仁？豪杰独先殂。  
疑衡共昏暗，慷慨望前途。

先是在3月28日我到达衡阳时，曾与谭浩明谈话。我把主力军转移湘东击敌的计划告诉了他，他表示疑信参半。我向谭浩明说：“今后时局变化无常，请转报陆干老相机运用，好自为之！”谭浩明点头同意，于3月底悄然回桂，结束了这宗联军公案。

如果一定要保持衡阳，就必须再经一次萱州河血战，湘军将始终独当其冲，所受损伤当会更大，尚且不能保证不败。抛弃衡阳，则粤桂同受其苦，虽欲避战，势不可能。马济同意组织守备先锋营，参加湘东战斗，即是此理。我军如能在湘东击败张怀芝，将声威大震，足以促醒吴佩孚痛感身处艰危，发生“物伤其类”的悲观怯战情绪，使其内部产生巨变。何况曹锟这回倾巢而出，押的是孤注。岳州战线凭借势众，独得胜利，难道张怀芝全军覆灭于前，曹锟还敢再押孤注于后吗？

我在衡阳，得到前方战讯：吴佩孚步步进逼，我军节节失利。我忖度，在此情况下，寡不能敌众，弱不能敌强，现在所需要的是迟滞敌人，争取时日，作好转移准备。4月5日，正是湘东醴陵方面大破张怀芝所部的时候，我仍令衡山正面前线继续迎敌，支撑局面，同时，率总部退驻耒阳。我原来打算在秧田圩附近布置防御阵地，拒止敌人，以迟滞其南进凶锋，不意衡阳于4月6日失守，敌人乘我不备，分东西两路追击，西路向祁阳尾追桂军，东路向耒阳尾随湘军，这就打破了我的阻敌进攻的计划。其实，敌人在东路的追击部队只有一旅，如果我军有相应的兵力

进行阻击，将其击退是没有问题的。4月10日，敌人追兵已达秧田圩，前方吃紧，兵力单薄，无法支持，我遂令总部人员向郴县转移，我自己亲率卫队，前往收容溃兵。行十余里，见溃退湘军纷纷而至，我即令营长袁镇斌将各连展开，并将溃兵组织起来，共同阻击尾追之敌。敌军疑我援军已至，即时停止前进，但仍猛烈向我射击，枪弹如雨，伤及卫士。袁镇斌劝我择地稍作休息，我令溃军协同卫队，阻击敌军，遂向郴衡大道南下，于灶头街停止小息。初不意经过这场战斗，敌我双方停止了军事行动，形成划地而守的局面。

4月12日，我和林支宇经灶头街向郴县转移，抵高亭司，往宿书院，有《耒阳遏寇》诗一首：

融风吹旷野，玄云靄和春。  
总辔出衡城，洒泪渡东津。  
沿途睹播种，劬哉念人民。  
休戚与我共，忧危累汝分。  
本愿希北指，如今愧南辕。  
挥剑收溃卒，振缨励全军。  
固圉新堑垒，依险置兵屯。  
遏寇必茹苦，复仇期卧薪。  
外惟白日鉴，内抚赤心存。  
鞅掌忘寝食，感奋集朝昏。

## 二十五、几句概括的话

北军占领衡阳，吴佩孚不敢轻举前进，我军则因久经战斗，伤亡惨重，亦难反攻。事实上，此时南、北两方在政治上的斗争日趋激烈，而在湖南境内的军事行动却出现了一个相持暂停的局面。下面想写几句概括的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参加此次在湖南境内的南北战争的军队，前后计有北洋陆军

第八师、第二十师、第二师、第十一师、第三师、第七师、山东省施从滨的第一师共七个师，晋军混成旅、直军四混成旅、苏军混成旅、冯玉祥混成旅总共七个混成旅；安武军前倪毓棻后李传业各 20 营。以上合计战斗员 25 万以上，合后勤人员，将达百万之众。南军方面，计有湖南陆军第一师、第二师之第三旅、零陵守备队 12 营、邵阳湘中守备队 8 营、桂军韦荣昌守备队 12 营、桂军陆裕光守备队 12 营、粤军马济守备队 12 营，以上合计战斗员 5 万，合后勤人员，总共 20 万之众。南军和北军在数量上众寡悬殊，成 1 与 5 之比。

这次战斗，从 1917 年 9 月 20 日北军攻占衡山开始，到 1918 年 4 月 11 日南军耒阳遏寇为止，总计 166 天。整个战争过程，以 1917 年 11 月 14 日湘军收复长沙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梗概：傅良佐率北军第八师、第十二师进入湖南；湘军第二旅旅长林修梅和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布湘南自主；傅良佐派湘军第一旅旅长李佑文率该旅讨伐林、刘，第一旅官兵在潭衡道上驱逐了旅长李佑文、团长梅卓敏，与第二旅合，归还湘军第一师建制；刘、林推举程潜为护法军总司令；程潜令湘军集结于萱州河，严阵以待北军，南北两军在萱州河进行了 41 天的阵地壕堑战；谭浩明率粤桂军入湘支援，湘粤桂军联合战线形成；联军收复邵阳，在永丰将山西混成旅全部缴械，进入湘乡，威胁北军后路；王汝勤、范国璋率部转入株洲阵地，湘军跟踪追击，在下摄司、株洲附近将北军第八师、第十二师完全击溃；傅良佐逃跑，湘军恢复长沙；段祺瑞内阁倒台。

后期梗概：段祺瑞倒阁后，指使和操纵曹锟、张怀芝组织两路北军进攻湘北、湘东；湖北荆襄地区石星川、黎天才宣布自主，曹锟派第三师会合吴光新部攻下荆襄；南方联军收复岳州；曹锟所部经由鄂南进攻湘北，张怀芝所部取道赣西进攻湘东，吴光新率卢金山师、冯玉祥旅自荆沙进攻湘西；北军第三师向湘军

羊楼司阵地开始攻击，鏖战 11 夜，湘军后撤至潭衡之线，岳州、长沙相继落入北军之手；湘军奇袭湘东，北军张怀芝部土崩瓦解；北军吴佩孚部在衡阳正面以优势兵力进攻，衡阳、耒阳、祁阳相继失守；程潜率部退入湘南腹地，战争转入相持暂停局面。

北军攻下长沙、平江、衡阳等地之后，闯入民家，抢劫财物，强奸妇女，宰食牲畜，拉走壮丁，湖南人民饱受苦难，对北军痛恨切齿。

直军攻下衡阳不敢穷追猛打，南军也无力反攻，湖南战场从此冷静下来。这时在正面和南军对垒的北军是直军吴佩孚，段祺瑞无意终止其武力统一的政策，所以加意笼络吴佩孚。段吴直接通电以示优异，6月3日，北京政府又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徐树铮还建议加派吴佩孚为第一路副司令。正在此时，直军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等五个旅长联名通电请假，集体“消极怠工”；直军全体将士又发表通电说，“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吴佩孚虽未在这两个电报上列名，但是人们看得清清楚楚，幕后策划指使的人正是吴佩孚。

吴佩孚为什么忽然主和？原因很复杂，大体说来有四：（1）北洋军阀内部矛盾激化；（2）湖南人民痛恨北军，北军在湖南站不住脚；（3）直军如加意南进，威胁及于两粤，可能引起更坚决抵抗；（4）直军军心士气无法维系。吴佩孚素来以关云长自命，我乃利用其和皖系的矛盾，尽力拉他一把，由李书城拟稿，写了一封信给吴佩孚，信的大意说，你是一个识大义的人，现在段祺瑞勾结日本是卖国贼，我们反对段祺瑞，是爱国力量。你要分清界限，不要帮助卖国贼来摧残爱国力量。向这位以“关公”自诩的吴佩孚责以“春秋大义”，居然发生了一定效果，吴佩孚以后和南军竟相安无事。

5月25日，湘军代表和直军代表在耒阳县公平圩王壮武祠举行谈判，6月15日成立了湘南停战协定，从此湘南无战事。尔后，吴佩孚迫于国内情势，出于个人利害考虑，8月7日还发表致李纯的阳电，痛斥北京政府，痛斥武力统一是亡国政策，并请李纯会同湖北、江西两省督军通电主和。我于次年退出湖南，湖南护法战争自兹告终。

(1964年)

## 护法之役北洋军第一路在湘作战经过

王之佑\*

### 一、南北战争的序幕

在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的罪行中，冯国璋是以“盖世武功烧汉口”的暴行，拼命地打击革命，段祺瑞是以停军孝感通电主和，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后来，他俩在袁氏政权中，一个坐镇江南，为袁氏任东南屏障；一个掌握全军，为袁氏运筹帷幄，是为袁氏两员大将。

曹锟的第三镇，在辛亥时，由长春调到北京。1912年元宵节北京兵变的主动者——总统府卫队，即是曹锟部下的第九标（当时的标统是唐天喜）。进攻太原、镇压山西革命的部队，又是曹锟部下的第五协（当时的协统是卢永祥，参谋长是王承斌，吴佩孚是时任十一标第一营管带）。因此，在袁世凯任总统时期，曹锟就出任长江上游总司令；在袁世凯做洪宪皇帝时期，曹锟又率兵入川，抗拒蔡锷军北伐。在这次战争中，曹锟的兵力又扩充了三个旅——第一补充旅旅长王承斌，第二补充旅旅长阎相文，第三补充旅旅长萧耀南。段祺瑞在接替袁氏时的“论功行赏”中，又升任曹锟为直隶督军，使他有了地盘。这一“行赏”，是有着段曹之间私人关系渊源的。

我在保定高等小学读书时，段祺瑞任第三镇统制，驻在保定。我考入陆军小学时，段祺瑞改任各军事学堂督办，第三镇就由后任统制段芝贵率领，开去东北。当第六协协统曹锟进到长

\* 作者时任北洋军第一混成旅上尉作战参谋、团附。

春、第五协协统卢永祥进抵锦州时，适值段芝贵购买杨翠喜赠给振贝子的贿案被揭发，第三镇统制一席，就由慈禧太后给她所称许的“虎将”曹锟继任了。据记，曹锟陛见时，西太后一见甚喜说：“真虎将也！”所以曹锟毕生常写虎字，喜好虎威。第三镇原是段祺瑞的军阀本钱，曹锟正是段祺瑞衣钵相传的得力助手。曹锟在段祺瑞的“府院之争”、“解散国会”、“马厂誓师”各行动中，都是最出力者，对于段氏的“武力统一”政策，更是积极的拥护者。

段祺瑞在北洋军阀中，向以刚愎自用著称。他同黎元洪在“府院之争”中，结果虽然是两败俱伤，给张勋造了复辟机会。但马厂誓师胜利后，黎终于下野，由冯国璋继任，而段则再任总理。段自再任总理后，就以再造共和的首功自居，益发专横跋扈，坚决反对冯国璋的“和平统一”政策，拒绝恢复旧国会，另行成立所谓安福国会。他对于孙中山的护法和西南的独立，采取武力镇压政策，实行所谓讨伐。他派遣其得力爪牙傅良佐督湘，又派其内弟吴光新任长江上游总司令，率领中央部队及各省增援大军，指向川湘，因而引起南方护法政府派兵援湘，于是在湖南的南北战争开始了。

在段祺瑞力主参战，强迫下令解散国会后，议长吴景濂等及两院议员会聚广州，成立非常国会。孙中山率海军去广州，组织军政府，联合唐继尧、陆荣廷等，发动西南四省军队，护法北伐，因称护法战役。

1917年10月间，曹锟在保定召集部下高级军官会议，命令护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第四混成旅旅长曹瑛及天津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商得全等，作出动准备。

王承斌返回防地后，即召集部下团营长开会，传达命令，准备出发。我这时任旅司令部上尉参谋，即在参谋长郜汝濂和少校

参谋韩荫三指挥下，计划部队出动运输诸事项。约于 10 月下旬，全旅自涿州开到河南许昌暂驻。这时，我们根据情况判断，似有由陆路经过桐柏进向襄樊打击黎天才所部的企图，但未接到命令，就乘此间隙完成新兵连的战斗训练。其后不久，吴佩孚率第三师进向襄樊，担负了这一任务。其结果，因为旅长张联升等倒戈，黎天才被迫出走。

1918 年 1 月，湖南战事吃紧，王承斌接到曹锟电令，进驻汉口。我们乃进驻刘家庙，经湖北督军署得到前方情报：商震的山西第一混成旅兵败贺家山；王汝贤的第八师及范国璋的第二十师已退出湖南，傅良佐被逐出长沙；阎相文的直隶第二混成旅失守岳州，被中央褫夺冠勋；第二师师长王金镜所部退出岳州，正在向武汉撤退。种种不利消息不断传来，王占元连连催促我旅过江。王承斌又向曹锟请命，得曹锟批准，旋即渡江，暂受王占元指挥，并相机收容第二混成旅。

王占元给王承斌的命令是：该旅进驻嘉鱼县，掩护王金镜部向金口集结，并相机进攻在赤壁山盘踞的夏斗寅部（夏称湖北暂编第一师师长）。王承斌接到任务后，决定将野炮及军属人员留在武昌，设武昌留守处，由少校韩荫三负责，此后的作战参谋任务就转到我的身上。

我旅于春节进驻嘉鱼。嘉鱼县南的赤壁突入江心，它不仅在三国时代的作战上起着重大作用，就在这时同样重要。夏斗寅部据此，诚是北军交通上的一大障碍。王承斌命令第二团团长阎治堂率部进攻赤壁。经过四日的战斗，阎部占领了赤壁，又经过约十日间，肃清了蒲圻至陆溪口地区，为北军南进打通了要路。这样，既掩护了王金镜第二师在金口集结的安全，又取得同阎相文第二旅的联络。这次任务的完成，颇受王占元的嘉赏。后在曹锟的复电中，得知他已率第三混成旅及第五混成旅的第八团，到达汉口的刘家庙，这是直军出动的全部情况，其后，即开始入湘。

## 二、刘家庙会议后第一路军的南征

1918年2月上旬，曹锟到达汉口刘家庙，中旬召集高级军官开会。王承斌赴刘家庙开会时，我同副官唐寿永随行。到汉口后得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率领该师正向汉口集结，吴佩孚所部第三师正沿襄河向汉口运输中。参加会议的师旅长中，有张敬尧、吴佩孚、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曹瑛等。

曹锟在会上宣布，中央已下讨伐命令，分两路南下，第一路总司令由曹兼任，设临时司令部于汉口刘家庙，指挥直隶各部队及第七师，经湖北向湖南进攻。第二路总司令由山东督军张怀芝兼任，指挥山东军队及由苏皖等省派遣的援军，经江西向湖南进攻。另有长江舰队杜司令（是杜锡钧或杜锡圭，记不清了）的舰队配合协助。

第一路的兵力配属和任务如下：

右翼总指挥王承斌，指挥直隶第一混成旅，及直隶第四混成旅的第八团（团长穆长喜）自嘉鱼县沿长江向岳州进攻，会师长沙。

中路总指挥吴佩孚，指挥第三师及直隶第二、第三两混成旅，经粤汉铁路沿线向岳州进攻，会师长沙。

左翼总指挥张敬尧，指挥第七师，经崇阳、通城之线向平江进攻，会师长沙。

同时，曹锟、王占元、张怀芝等，协商了彼此之间的联系事项，由湖北督军署提供了一些情报及湖北省地图，并介绍两湖轮船公司租用轮船。

这时，武汉三镇大军云集，有的是由北向南，水陆并进，也有由南向北，正在结集收容。在长江水面上，排列着大小不同的民船和舰艇，两湖运输公司的轮船，则拖着各种运兵船往来不停。真有杀气腾腾，大战将临、大祸将到的紧急形势，人心惶恐

不安。然而第一路所属部队这时已开到长江南岸的，则只有第一和第二两个混成旅，其他部队尚未过江。

右翼总指挥王承斌在会议结束后，即令我们雇用轮船和民船拖驳，编成兵船和医院等船舶队，将野炮连的野炮和兵员载在拖船上同行，并令第八团用船舶输送，随后跟进。留守处任务，仍由韩荫三负责。

王承斌回到嘉鱼县，召集部下会议，传达作战任务后，下达作战命令：右翼部队以进占临湘为目标，沿江岸向临湘县城前进。第一团长龚汉治率该团任前卫，经赤壁、陆溪口、新洲脑之线，向临湘县搜索前进。第二团及骑营、炮营为本队，随总指挥续行。第八团在追及总指挥部后，登陆归入本队。船舶队从江道在本队后方跟进。

约在3月上旬，右翼部队开始战备后，是一路无阻地通过了陆溪口。次日中午，在新洲脑和鱼矶间，同湘军周某所率部队（这个部队原驻地是武冈县）展开攻防战。同时又探知，在黄盖湖南岸有湖南第一师第一团团长贺耀祖全团布置了防守阵地。王承斌命令第二团派兵一营进攻，于是在临湘县北展开了全线的攻防战。

这次战斗中，是在右临长江左靠黄盖湖的狭隘地形中进行，行动殊感不利，尤其是只有湖北省地图，对于湖南省地形不明了，更感困难。当我去新堤联络湖北第三旅长卢金山及到楚观舰联络海军后，才取得一份湘北地图，明确了两军阵地内外形势，终于占领临湘。

右翼部队占领临湘后，当天并未追击。次晨，我军向岳州急进，下午3时到城陵矶，得知岳州城内已无南兵。南军开始撤退，到夜8点后战斗结束，岳州城完全归北军占领。

据被俘人员声称，他们是马济所部，经羊楼司撤退到此，因为不知北军已到，遂致引起这次巷战。双方伤亡不大，各约二三

十人。

当夜依总司令命令，第二团警戒岳州城外东南方面，第一团及炮骑各部队在城内休整，第八团第三营驻牛皮厂担任北面警戒。长江舰队入夜又驶入长江水面。岳州战斗，于是告终。

次日晨，吴佩孚偕阎相文乘车抵岳州，同王承斌密议。吴要求将克复岳州首功让予第二混成旅，以便恢复阎相文官勋，王承斌答应了。就在这天，由吴佩孚、王承斌、阎相文三人，共同接受了岳州市民的欢迎。第一团也将所得战利品（内有阎旅失岳州时的野炮），交付第二旅人员接收。当时即由吴、王联名向曹锟报捷，算作阎相文旅克复岳州。

但是当天龚汉治提出免营长职和自请处分的消极抗议。吴佩孚、王承斌只好反复安慰，并面许今后本年有旅长缺出，即由龚升任，才算了事。吴佩孚的这一招，不仅使阎相文很难堪，并且把阎相文紧紧地握在自己掌中，至死方休。

第一路的右、中两路回师岳州，给段祺瑞制造了复职增权的好条件。因此在他上台后，就首先发犒军费 20 万元，分给陆海两军。但在曹锟的分配下，右翼部队所得最多。这时约在 3 月下旬，我又回到总指挥部去了。

### 三、长沙回师及吴佩孚、张敬尧之争

第一路的右、中两路岳州回师后，稍事休整，又按既定路线，分途南进。吴佩孚所部，沿粤汉铁路两侧，向长沙推进，曾在新墙河到黄沙街之间，同湖南第一师有小接触，而南军则是且战且退。王承斌所部，沿洞庭湖东岸前进，头一天就进抵孙埠，除在搜索山林中，收容湘军迷途兵一名外，毫无敌情。次日在渡过南渡河时，曾因中途被阻，派遣小部队向左支援，其后是两路无阻，直向长沙。但是一路上大小乡村，破坏零乱，十室九空。据留守老人云，这都是桂军溃兵所为，言语间深表痛恨。因此我

们又增加了教训，所驻之地，除公平交易不入民宅外，又以老人作向导，将山林中妇孺找回家来，更为他们安排食宿，因而颇得民助。

右翼部队进入长沙的早晨，是从灵均寺出发的。王承斌曾面谕阎治堂：“长沙已无南军，部队首要安民抚众。关于官衙学校，要严格保存，笔墨不动，以备移交与张勋臣（即张敬尧）。”从这些话里可见湖南督军一席，中央已内定是张敬尧了。

当右翼部队进抵捞刀河时，岸上就有欢迎“国军”的群众；自北门入城时又受到燃烧鞭炮的欢迎。商店即日开市，市内自由通行。长沙城东部及小吴门外车站由第二团警备，西部及江边由第一团警备，第八团第三营驻北门外开府寺，担任船舶队的保护。右翼总司令部驻在荷花池的军械局，该局库存一无所动，由原局长方本任负责保管。据该局职员声称，桂军在长沙，是以搜刮为目的，毫无斗志，闻风先退了。湘军通过长沙，分两路南去，长沙城内是一兵皆无。但是，当我们在市内行走中，却遇到一些曾任南军军官的旧同学，有的是因伤留下医治，有的是因家在长沙潜伏了。这是我们右翼部队占领第三个名城长沙的情况。

次日午后，吴佩孚到长沙。至此，是第一路的右、中两路会师长沙，完成了第一段作战任务。随后大军云集长沙，市内顿形活跃。然而吴佩孚却坐在督军署，俨然以湖南督军自居，因而给长沙市民，又造成一次惶恐不安。

在我们进入长沙的第四天（约在在3月末），王承斌又召集团营长会议。他先向大家慰劳后就说到：“我们这次作战，是受中央命令来驱逐侵入湖南的桂军，并不是争夺什么地盘的。况且湖南督军，中央已内定张勋臣，又不是论功行赏或因功强抢的。我劝吴二爷（指吴佩孚），他不听，看来不久要起纷争。我们的处境，情理两难，只好躲开。因而在明天，全部撤到湘江西岸岳麓山方面暂驻，不参与这次纷争。”从王承斌这些话里可见吴佩

孚是起了争夺地盘的野心，也可看出，段祺瑞早有了直皖分系的偏见。王承斌当即决定，右翼总指挥部移驻岳麓书院，各部队移过湘江西岸，船舶也靠西岸停泊。会议结束后，立即准备实行。关于资遣被俘人员就在这时实施的。

当夜传达命令，第二团进驻兴隆寺，一、八团依次移驻兴隆寺岳麓山之间，次早即开始移动，成为第二步前进态势。

张敬尧的左翼部队，自从由汉口出发，就形成跟随中路续进的态势，离开铁道线后更是行动迟缓，进到平江就被刘建藩部阻住了。因而当王、吴已会师长沙，他还在平江停滞。后吴佩孚令萧耀南旅经新市来援，刘部左侧被威胁，始自动撤退，张敬尧乃得进入长沙。因而吴佩孚常说，张敬尧是他派萧耀南接进长沙的。

张敬尧头天到了长沙，段祺瑞第二天就发表以张督湘的命令。这一措施，是使吴佩孚不服气的。张敬尧来到长沙，神气十足，更被吴所鄙视。于是在督军署的居住问题上，张、吴两人起了争执。张敬尧小题大作，向中央电告。段祺瑞就电令吴佩孚腾出督军署，这更引起吴佩孚的不满，抗不遵从，更使段吴之间发生龃龉。这就演成由于吴张的摩擦，挑起吴段的不和，进而又吴段的矛盾，演成直皖的分裂，乃至直皖内战的发生。

张、吴的争执，最后还是曹锟授意于王承斌，给他们和解了。张敬尧就任湘督后，为着他的地盘，不得不宴请直军将领，犒赏直军官兵，给吴佩孚一些面子。同时也为防守地盘，将他自己的第七师集结长沙，与第三师形成对抗阵势，使长沙人民担惊不小。第一路的第二步作战任务不得不放弃，这就使南军得以纵容集结布防，留在长沙的护法人员也乘机脱出，再整旗鼓。

这时，我们得知桂军已通过衡阳向祁阳方向撤走，湘军沿湘江两岸正向衡山、攸县集结中，只有湘东的刘建藩部情况不明。实际上，刘建藩正在利用张、吴内讧，准备着反攻长沙，给张敬

尧一大打击，因而又几乎使张敬尧的督军席位坐不稳。

#### 四、吴佩孚的两次被围

在长沙会师后，曹锟的第二步作战计划是：令吴佩孚所部沿湘江西岸追击南军，进窥衡阳；令王承斌所部经湘潭、衡山追击南军，直取宝庆（即邵阳县）；张敬尧所部则保守长沙，分向湘东接应第二路的进攻。

王承斌在接到新任务后，因为即将离开江道，就将船舶队上的野炮搬上陆地，用全部输运民夫担任运输武器弹药任务，另行组织采购队调办给养和柴草。船舶大部返回，所留一部移泊静港，因此出动稍迟。

吴佩孚在争地盘失败后，心怀不满，接到新作战任务时，就气愤地说：“我们再自己打个地盘。”这就说明，他的地盘热还正在炽烈。于是吴佩孚立即挥军急进，令五、二、三旅沿湘江右岸南下。他自己则率第六旅（他原任第六旅旅长）攻占湘潭，进军衡山，将船舶队留在湘潭，交参谋长李济臣率领。

当王承斌留在岳麓山的某日早晨，突然接到由第二团电话转报，据李济臣声称：吴师长同第六旅在花石被围，战况吃紧，请将第二团开赴湘潭，并要求王总指挥快到湘潭，面商援救，云云。王承斌立即令阎治堂所部，务必在当天进驻湘潭，同时令我骑马先去湘潭了解情况。当我见到阎治堂时，他已令驻兴隆寺的两营进驻湘潭，并准备率其余部队随后续进。但是因前方情况不明，阎嘱我转告第一营王营长，千万慎重，不可冒进。我见到王营长后，就先率第一营出发，第三营续进，于当日下午4时开进湘潭，同李济臣相见。李济臣说：“湘潭在水面和城内守兵，总共只有骑兵和辎重兵不到200人。吴佩孚率第六旅及骑兵辎重营一部，于前天进到花石，昨天一出花石不远，就同湘军遭遇，陷入被围。今天除收容许多伤员外，前方情况尚不明了。”他又说，

向右翼部队求援，是他个人主张，因而很盼望王承斌的到来。听了李济臣介绍情况后，我们一方面向后方报告，一方面由王营长率该营在城南布防。我曾到医院探视受伤官兵，见到连长级负伤 5 人，伤员共百余人。他们说，双方兵力相差甚多，南军逐步包围，北军陷入苦战。夜 7 时许，王承斌和阎治堂冒雨赶到湘潭。同李济臣面谈后，王承斌即决定先率阎治堂所部，连夜向花石增援。

次日拂晓，我们抵花石北端时，前方战斗已不炽烈，花石市内异常沉静，除收容死伤者的医务人员外，几乎再没有人。王承斌即令部队休息吃饭，他率我们到花石南端察看情况。花石市位于涓水右岸的长达 5 里的长街，南端不及半里，即由涓水和一条衡山支麓夹成一个狭隘门户。山上竹木丛生，已被南军占领，时有断续枪声。北军通过隘路口，即受到步枪射击。两军的阵地情况，还是不明。

王承斌乃令阎治堂留一个营，在自己指挥下，阻止敌军进逼和保护交通路口外，其余部队由阎治堂率领，经花石北端向东南迂回，抢上衡山支麓，打开左翼的敌军包围。

阎治堂率部迂回 20 余里，无阻地登上衡山支麓，即以一个营下山，其余经山麓上由东南向西北联络进逼，首先就占领了林支宇旅部所在的山村。战斗开始后，步炮联合，步步向上向下进逼，到下午 3 时，迫使南军解围而去。这次战斗于是结束。

当旅长张福来、团长董政国等同王承斌相见，向老长官致谢时（王承斌任十一团团长时，张福来接任吴佩孚的营长遗缺），他们反先问：“看见我们师长没有。”这才知道吴佩孚的下落不明。经派小部队四出搜寻后，才从一条小溪中找到吴等数人，满身泥水，面目甚显焦瘦。但吴佩孚还是怒气冲冲地问：“敌人退了没有？敌人退却为什么不追？”终于在这天夜间，他又率领第六旅向南追下去了。

右翼部队即为第六旅救护死伤，约有300余名。吴佩孚的乘马也被打死了，这是他盛怒冒进的结果。假如没有王承斌右翼部队的解围，失守湘潭，丢了弹药，这场战局就不堪设想了。右翼部队去花石集结，先头部队第三团于次日下午进驻衡山县的白果市。

白果市是赵恒惕的故乡。当我们部队到达时，见到在市西北隅有一座有鱼塘花园的深宅大院，双门紧闭，询问是赵师长家，曾派人慰问，并布告保护。据管事人云，主人均已远避，待得机再答盛情。

王承斌在白果市，命令右翼部队经此转道向红螺庙、宝庆方向前进。行军次日，忽有骑兵第三团第一营营长申明道驰马追来，向王承斌报告说，吴师长又在衡阳被围，派他来请回军援助。王承斌又下令按一、八、二团序列转向衡阳前进。他将部队交由郜汝濂率领后，即率我同副官等数人随申明道乘马先行，次日去衡阳北门外同吴佩孚相会。

至此始知，当吴佩孚追到衡阳时，湘军尚有一旅之众未过江东，这样就将演成衡阳巷战。吴佩孚向湘军将领宣布，愿降者缴械投降，不愿降者，给以从容渡江时间，约在耒阳再会。因而湘军全部渡江，衡阳得免再战。吴佩孚随即令张福来率一团跟向耒阳，又陷入众寡悬殊的苦战之中。在这同时吴得知桂军正在熊罴岭下集结，准备经祁阳退往黄沙河，乃命令第十一团团长陈星海率该团追击，不料行至洪桥也被围困了。至此，在吴掌握中，只有不完全的辎重兵一营及少数骑兵，连衡阳内外城防也不敷分配。而在湘江以东的三个旅，不仅远水不解近渴，且因湘东失败，株洲失守，大有后顾之忧。所以吴佩孚又得王承斌的来援，有如大旱之见云霓。

吴佩孚这次的遭困，固然有他贪功冒进的缺点，实际上是同第二路及张敬尧部对南军作战不利有重大关系。当第一路第二步

作战开始时，正是第二路在赣西、湘东作战失败的时期，因而在江东的三旅就要注意湘东，不能齐头并进。而张敬尧因保护长沙，在株洲仅驻一小部队，刘建藩侦知情况，全力猛扑株洲，一举而得，随即进窥长沙。当时不仅张敬尧慌了手脚，就是李济臣也放弃湘潭退往静港。这就使吴佩孚兵弹两缺，不仅要求援军，更希望补充弹药。吴佩孚向王承斌说他自襄樊转战至此，竟因张敬尧的无能，使他束手无策的时候，不仅怒气填胸，而且泪随声下。

在我们共进早餐中，王承斌对吴佩孚善为安慰，并承担了共同防守的责任，即令龚汉治率第一团肃清衡阳南境，相机进到常宁，令阎治堂率第二团（欠一营）增援陈星海，将第三团第三营配以山炮和重机枪交与吴佩孚向耒阳增援。同时由右翼总指挥拨给步枪弹 20 万发，机枪弹 4 万发，山炮弹 200 发，由吴支配。其运输民夫，由右翼运输队担任。衡阳由王指挥第八团和辎重营共同镇守，静待吴的捷音。吴佩孚始转悲为喜，大口喝起烧酒来。

关于株洲的失守，据其后得知，刘建藩在平江战斗中并未失利，只因萧耀南旅从左后方威胁，始整军撤退。他们对长沙的情报，颇为准确，张吴内讧及株洲空虚的情况早已详悉，因而乘第二路失败时，全部急扑株洲，进窥长沙，以图给张敬尧一大打击。而张敬尧的部队，军纪废弛，人民怀恨，嗜吸毒品，战斗力薄弱，所以一触即溃，株洲遂告失守。不惟长沙危急，更也截断北军后方联络线，使吴佩孚感到“有家难归”。

张敬尧这次株洲失而复得和长沙转危为安，却得益于第二路溃败。原来张宗昌的江苏暂编第一旅在湘东激战后退到长沙，他想主动赎罪，就自告奋勇，率其收容的各部溃兵反攻株洲。当部队由小吴门车站登车时，张宗昌向官兵们磕了一顿头，恳求大家弟兄帮他“张长腿”一场。到达株洲后，就用他们有团没有线的

队形，忽东忽西的战术，把刘建藩的阵容搅乱了。不幸刘建藩堕入浏阳河而死，算是结束了这次战局。然而因为这次湘东告急，又引出奉军的三旅援湘，曹锟和张怀芝撤销第一、第二路司令部，使这次战争内容复杂化了。

## 五、衡阳、祁阳之战与衡阳协议

在王承斌留镇衡阳一周间，首先是恢复地方秩序。在军事方面，除已巩固城防外，龚汉治团已肃清衡阳、常宁间骚乱，保住治安，畅通水陆。这时第三师的张学颜旅进向安仁，阎相文旅趋向茶陵，萧耀南旅仍在攸县，更以一部驻守衡山，巩固了直军后方。只有耒阳、洪桥两地尚有战斗，而陈星海则不断地向老团长求救。

约一星期后，吴佩孚自耒阳凯旋。据二团三营彭营长报称，耒阳战事吃紧，只是因为众寡悬殊，并非战斗激烈。张福来得到援军和援械后曾发动一次反攻，南军就向后撤退了。吴佩孚也改变战略，不再穷追，因而双方形成远距离的对峙，战局和缓下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湘军没有战斗力。就该营说来，到耒阳后，受到命令，在耒水以西地区作战，任务是由水口山进向白沙。而在作战中，因耒水上的浮桥被敌击断，一时陷入孤军苦战，以致一部分炮位和人员被俘，但一经得知这是直军右翼所属部队，湘军就自动地交还枪炮放回人员，更帮助架桥渡过耒水，因而双方有了友谊，自动形成停战。湘军全线后撤，我军也没有追击，就这样又随吴总指挥回衡阳了。这些实情就给湘南停战奠下基础。

吴佩孚回到衡阳后，准备再去洪桥，经王承斌劝阻，留第八团交给他共守衡阳。次日（约5月初），右翼总指挥部又同彭营及第一团封连星夜往援洪桥。

洪桥镇（今祁东县）位于衡阳、祁阳之间，南越熊罴岭即是

祁阳，称为湘桂交通要路。桂军后撤到此，已集结了 35 个营，因熊黑岭上下 40 里，只一线可通，行军难免受阻。这时陈星海团紧紧追来，桂军侦知他们是孤军深入、后方无援，就打算包围歼灭，双方展开了激烈战斗。阎团增援上来，也逐次陷入包围中。这时陈团被围约半月，阎团被围也约一周。在桂军迭次突击下，陈团连长战死三人，阎团两位营长一死一伤，战斗激烈，可以想见。

王承斌师晚到七塘，即令部队休息吃饭。他率参谋长以下幕僚数人及封连驰赴洪桥，约陈、阎两团长会见。在听取他们报告后，即决定令我接任二团团附（因魏团附接任营长后又阵亡了），指挥二、三两营及封连，担任反包围任务，限于即日夺下益成峰（这是后方最高山顶，其下即仅有的一线交通路）。

我接受命令后，即为同来的野炮、山炮连选定阵地，指定封连和彭营的攻击点，约定开始进攻信号，就随阎团长进入包围圈，勉强他由一二两营抽调出约两连兵力，随我由南向北反攻。正午开始反攻后，在炮火协助下，封连从北面首先登上了益成峰。他们居高临下，配合我同彭营连下五个山头，打开了北面的包围，使阵地形成南北两条平行线，战况有了好转。次日又激战一天，至晚遥见南面灯光混乱，桂军开始撤退了。

洪桥战役，是直桂两军的关键战役，也是湘南战斗中最后的一次激烈斗争。双方伤亡将近千人，仅陈星海团就死伤官兵约 300 人，阎治堂团也死伤约 160 多人，桂军将有过之。

吴佩孚经花石、衡阳、耒阳的受挫后，又经王承斌的劝说，对于再打一个地盘的欲望是放弃了。他也感到愈战愈远，后继为难，好战雄心也冷却下来。当王承斌离衡之时，他们不仅约定吴坐镇衡阳勿动，王击退桂军即回，并且将远征的害处和未来危险向曹锟申述。他们的主张，当然得到曹锟的首肯。王承斌在桂军撤退时并未追击，到熊黑岭下，就停止四日。当左侧部队也登上

岭上，犹见桂军尚在退却时，又停止一夜不下山，就可见他的意图了。到桂军全部渡过湘江，祁阳居民来迎，他始令下岭入城。

祁阳正当湘桂水陆交通要冲，这次战祸人民受灾却较小，他们不仅未受到湘北那样洗劫，还拾得若干衣物。据商民云，桂军抢着渡江，遗弃所负包裹，只图速渡，无暇抢劫。又称陆裕光一人，就由湖南抢走姨太太七人，长官如此，部下可知。当时湖南人民最恨桂军，这是有原因的。

北军入城后，总指挥驻在濂溪祠，城防警戒由阎团担任，陈团体整，即日恢复地方秩序，并向城乡张贴布告，宣布北军入湘，是为民除害，只要桂军退回，战事即告终止。在人心混乱的情况下，益发促使桂军早日出湘。

又据前往永州（即零陵）的情报人员回称，永州秩序大乱，人民切盼“国军”的到来。旋有零陵商会人员，请求进军拯救。正拟乘舟向永州进攻间，传来张其煌（字子午）到零陵负责维持秩序的消息，王承斌乃写信交前永州警卫队队长（姓名忘了）面见张其煌，请他促使桂军从速撤出湘境，妥善维持地方，战事可告停止。不久得张回书，大意为“其煌不才，愿从尊嘱，一息尚存，愿尽全力”等语。至此，直、桂两军也自动停战了。

其后，经双方信使往来，商定了两军驻防区域。北军只在祁阳境内沿江驻防（阎团二、三营驻浯溪到白水），祁南各县均由张军（闻有四营）负责，清除中间地区匪患。北军不再前进，南军出剿要向北军通知。恢复交通，陆路互相保护行旅邮电，水陆双方保护船只通行。

不久，萧耀南的步六团自宝庆来会，即令陈星海团归还建制。王承斌率总指挥部人员回驻衡阳。随后，我又被调回总指挥部服参谋任务。这时是1918年5月下旬。

直军前线虽已形成停战，但并无正式和议，更谈不到有什么政治上的结合。当我们回驻衡阳的时候，曾有赵恒惕的六叔来向

吴佩孚致谢。接谈之后，始知阎治堂团曾给他的老家加以保护。在吴等招待这位老人时，说到直军入湘专为驱逐桂军拯救湘民这些话。这位老人就反问：“直、湘两军可以和议停战吗？”吴回答说：“苦无信使。”这位热诚老人，就自告奋勇愿往见赵恒惕，这就促成吴赵互派代表，商定了耒阳的湘直两军停战协定。这个协定规定了双方驻军地域。直军驻常宁、耒阳、安仁各县，湘军驻新田、永兴、桂东各县。双方前线位置，限制在驻地 20 里以内。对中间地域的剿匪任务及联络，以距离驻在地最近为标准，但一方派队进剿，应立即向对方部队通报。此外，还订有相互保护交通和物资交流等办法。

自此以来，双方信使往来，尤其是湘军军官北归省亲者，越来越多，我们就常常招待这些过客。我本人曾在马济等代表来衡时，收到过谭延闿写的对联，又同赵恒惕的兄弟赵恒莹等 6 人有了师生关系（赵派他们入学兵连学习），成为敌我一家了。同年 7 月，我们又参加衡阳的“罢兵息争大会”。这年秋季，张其煌自永州来衡，加强了直桂双方的罢战息兵，缔结了张、吴、王等的文字交。从此，第一路的直军就信守协定，由进攻而停战。直湘两军由交战而转交好，不仅军官成了朋友，就是士兵在剿匪行动中，彼此到了防所，有如兄弟一般，问寒问暖，让居留饭，依依惜别。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再以兵戎相见了。

这次停战，在直军本身，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战斗力已感不足。总计历次战斗，死伤共有一千七八百人，扩军时又调走干部两千人，这就减少总兵力约五分之一。武器方面，只有消耗，并无缴获。而参战借款的大宗武器，又在徐树铮的把持下，全未得着。

而援湘各军谁也不开赴前线，仅在后方摇旗呐喊，且有威胁形势。这些内容，都说明这次停战，并不是偶然的。直军到这个时期，也有一次大升赏。从中央方面，是普遍叙勋任官。从曹锟

方面，是又扩充了五个补充旅。如团长龚汉治等升任了旅长，营长孙清山等升任了团长。我们升官的，总计就有 500 多员。这时每月还照发薪饷数十万元。

## 六、奉军援湘及北军撤出湖南

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原是同北洋军阀没有渊源的。1916 及 1917 年间，在段、黎的府院之争中，黎元洪主使冯麟阁勾结汤玉麟反对张作霖，张作霖因此怨黎亲段。段再任总理后，宠用徐树铮，以杨宇霆为引线，插手到奉军内部，戴上奉军副司令头衔，就拉拢奉军帮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实际上，这正是徐树铮等的大阴谋。他们想利用南北战争机会，调动奉、直、鲁、晋各省军队，使他们两败俱伤，借以铲除异己。张作霖既然亲段，就在湘东吃紧株洲失守的时期，派遣代理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任援湘东司令，率邹芬、阚朝玺、梁朝栋三旅入湘，设湘东司令部于长沙荷花池。但是，张作霖又为防止徐、杨、孙等叛己，另任张景惠为援湘军支队长，设支队司令部于长沙又一村，直接指挥三旅的军事行动。东北三旅开抵湖南后，将邹芬的第一旅驻在醴陵，看守株萍铁路，阚朝玺的第二旅驻在株洲，看守水陆交通，梁朝栋的第三旅驻在长沙，保护奉军后方。他们也是看风使舵，停军观望。

奉军到湘东伊始，曾以观察团名义，由阚朝玺为首，前往衡阳，同吴佩孚相见，这是奉直两军军官的初次联欢。王承斌回驻衡阳后，吴王和议，调我作他们的代表（因为在私人关系上，我同阚是盟兄弟）去长沙回礼，同孙烈臣、张景惠及旅团长们作了数日间的酬应，这是直奉两军军官的再次联欢。

我在长沙期间，适值杨宇霆陪同徐树铮到长沙，催促奉军南进，由孙烈臣的介绍，在荷花池同他们相见。大家对于湘桂军的作战实力，南北两军战斗力的比较，作过不同见解的辩论。其结

果，直奉两军的趋向同徐、杨的意图相反，不仅直军是停战不变，就是奉军也按兵不动。

据闻，杨、徐等曾以督军席位饵孙，促他挥军南进。经阚朝玺、张景惠先后回沈告密，被张作霖电阻了。其后，孙烈臣被调回，留张景惠驻长沙，他同曹锟一贯执行直奉联合策略，直奉两军始终联合一致行动，直到1920年湖南撤兵、直皖战争还不解。

段祺瑞、徐树铮对此大大不满。不久，段祺瑞亲赴武汉督师，也是无济于事，反而造成“楚材”舰撞沉“江宽”轮的惨案，全国舆论一时沸腾。张作霖又查出徐树铮盗用军饷数百万，因而免去他的副司令，使皖奉两派也起了裂痕。

曹锟在这次内战中，担任了主要任务，是为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效劳，但段对曹却大大不满，因为并未消灭护法势力。张怀芝在出动时，原是兴致勃勃，一遭失败，却又灰心丧气，也想找阶下台，于是他们在1918年5月末次第回省，并将司令部人员全部带回，第一、二路总司令部就自动撤退了。

这次全军班师，采用水陆并进。右翼部队任前卫，全部用船泊运输到汉口刘家庙登陆。先由祁阳部队撤退，到栗江同第一团回合，到衡阳后，按第一团、总指挥部、八团、二团顺序，向长沙、岳州前进。

中路部队是本队，水陆两路并进。铁路上是三、二两旅的主力，由第五旅任后卫。水路上是中路总指挥部率第六旅及三、二两旅的一部，由骑兵第三团任后卫。全军通过长沙、岳州之前，是用战备行军态势。

这次直军班师，是同奉军及十六混成旅采取互相掩护态势下实行的。奉军的第二旅，已先期以调赴吉林剿匪为名撤回了，到这时，张景惠也率第三旅移驻北京。邹芬的第一旅则驻在湘阴，掩护直军撤退。待直军过了长沙，他们就马上开车，先抵汉口，再驻郑州，最后向北京集结（这两旅就是张景惠的暂编第一师）。

第十六混成旅，同时从常德经水路，撤到汉口，又进驻许昌。

直军撤防后的接防问题，表面上是请张敬尧派队接防，而实际上是由南军接收了。就衡阳说，据骑三团长云，该团等到南军到了衡阳东车站，才登船开始撤退。这就说明撤防接防的内幕了。

班师的过程，就我们水路行军来说，依旧战备行军的部署，均有识别旗和联络旗，用旗语互相通讯。各部队依照建制、兵种，均有队号旗，颜色更是鲜明，一望可知。各轮船所拖民船驳船均不太多，以便行动灵活。而重火器和甲板上都设有沙囊掩体，犹如把陆军改成水军。当船队通过长沙时，先后距离各依规定标准以同等速度前进，联系更为紧密。即令是张敬尧的犒军船，也须由预先派往长沙的人员引航方许靠拢。我们的船队这样通过了第一关。行至湘阴，适洞庭湖有大风浪，乃在芦林潭上下停泊一夜。次日下午，驶抵岳州，即在南津港到城陵矶之线，成半包围形势停泊。又次日驶入长江，过了第二关，顺利到达武汉。经过武汉三镇时，两岸观众和江上停船，看到这一字长蛇式的旌旗招展的兵船，欢呼和掌声雷动。他们以罢兵息战心情，欢迎直军“凯旋”。其实这正是酝酿着一次军阀大内战——直皖战争。

汉口登陆时，王占元大事犒军，王承斌等也先后去督军署致谢，这情况较之过长沙时，迥然不同。

王承斌所部在郑州下车，即将第一团进驻河北新乡，第二团及其他部队驻在郑州，扼住了黄河铁桥南北要冲。第八团继续北上归还原建制。待第五旅到达后，西向汜水，成为面对洛阳西北军进攻的态势。

吴佩孚率三、六两旅继向保定北进，准备进攻边防军。

阎相文率第二旅留驻信阳，作为殿后部队，其目标是面向十一师。

冯玉祥最后进驻许昌。以上就是直军班师后初步分驻的情况，也就是直皖战前的准备态势。

在这里要补充一件事，就是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正在直军衡阳班师的期间里，曾被曹锟留在保定光园，“厚情招待”了数日。这无疑为的是直军通过岳州时，范国璋的部队不敢阻截。而吴光新在回到武汉后，又曾一度被王占元如法“招待”了一次。这就说明王占元在直皖战争中所持的态度了。

(1963年)

## 1917年临洮护法运动记略

郑瑞青 \*

1917年在临洮发动的护法革命运动，事虽未成功，但在甘肃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次事变，最初是由师仲吾联络发动。师为甘肃临洮人，辛亥以后，受革命熏陶，思想进步。1916年冬从北京法政学校毕业后，次年前往广州，晋谒孙中山先生，表示仰慕之忱，要求参加革命。当时正值广州护法政府成立，中山先生就任大元帅，准备北伐，各省都派有工作人员，惟独甘肃没有。师仲吾适于此时到达广州，表示了参加革命的愿望。中山先生大为嘉许。在问到“如何在甘肃进行革命活动”时，师即提出了“应先从下层入手，联络士兵，组织可靠的武装，发动事变，革命始能成功”的意见，中山先生甚表同意。除勉励外，并发给密电本、路费，还允许在必要时，帮助款械。

师仲吾于1917年5月回到兰州，即积极筹划进行活动，苦无门径。这时我正在临洮队伍中工作，因事到兰，与师相见，互相谈心多日，师始露使命。我当时提出建议：临洮驻有新建右军七八营，各营都是保定军官学生当教练，我们都是临洮人，联络比较容易，可以秘密进行，作为在甘肃进行护法运动的基本队伍。同时，我又向师介绍了新建右军营中的焦桐琴（号友邕）。焦为碾伯县（今青海乐都）人，湖北陆军中学毕业。1913年与胡登云、樊政、郭戒堉、王法等被派遣来甘，策动二次革命，事未成功，被逮捕，监禁一年多才释放。后保定军校开学，他们考

\* 作者当时正在临洮队伍工作。

入军校学习，毕业后，焦被分发在驻临洮新建右军（分统刘笃臣）步五营作见习官。焦为人寡言好学，富于革命思想，常对我说：社会如此黑暗，想在临洮另立一支革命势力，苦于孤掌难鸣，无人支持，如能联络同志，定有可为。师当时采纳了我的建议，并与我相约同车回临洮，介绍与焦见面。交谈以后志同道合，极为融洽。焦又给师介绍了他的同学胡登云（陇西人），我又介绍了进步人士、临洮劝学所长秦钟岳。

我们这几个人，经过详细计划研究，认为在临洮保定军官学生多，甘籍士兵多，大有可为。即决定以临洮为根据地，筹划建立“甘肃护法军”。大家即捐出数百元，在城内台子寺开设了一个酒馆，作为秘密联络据点，经常在此商讨进行革命的方法和步骤。当时我们的分工是：焦桐琴负责联络策动步兵第五营，胡登云负责第四营，我负责第六营。另外，焦又联系了他的同学张铭（永登人）负责联络骑兵第一营。我们每日分头联络对革命表示同情的在营甘肃籍士兵，约到酒馆吃饭谈心。经过一个时期，在各营内部，一切布置妥当后，师于当年7月间到兰州，又秘密联络了兰州的一些同志，在官升巷设立“二阳公寓”，作为联络活动的地点。师在一切筹划就绪后，即赴广州向孙中山先生报告策划起义详情，并请示机宜，要求发给款械委任状，以便进一步进行活动。

是年8月间，皋兰阿干镇及武都县，先后发生军事变乱。胡登云被调驻阿干镇，我被调赴武都。所有在临洮的一切，完全由焦桐琴负责。这时兰州法政专门学校校长蔡大愚、教员赵学普和他的舅父边永福及河州（临夏）回族军人马廷勤，都与我们取得了联系，先后参加革命活动。按当时确定的计划，是在11月17日（即冬至日）晚在临洮起义。举事时，以步五营的“马首是瞻”，鸣枪为号。起义后，除杀安福系分子外，其余不伤一人，待得手后，即带队进省，联络在省的同志，驱逐甘肃督军兼省长

张广建，并电报广州，通电全国，响应北伐。关于起事后的地方秩序问题，当时决定临洮城内由边永福、秦钟岳、杨景如、边杰臣等负责，洮河以西由赵学普负责；马廷勦部开到洮河边，以作声援；教场军队方面的发动指挥，由焦完全负责。不料在过冬时，有尹、洪两个班长，因酒醉泄漏消息，被人向统领吴桐仁告密，吴当即下紧急命令，收去各营粮弹，四路派亲信防守，洮河浮桥也派重兵把守，邮电交通完全断绝。在此情况下，焦桐琴见事已泄漏，首先进入营部枪杀了分统刘笃臣。连长张承识闻声持枪抵抗，也被焦当场击毙。接着焦即跑到各连大声疾呼：“兄弟们！赶快跟我来到军装库去取枪。”无奈甘肃士兵，素被压迫，临事畏惧。焦连喊数次，仍是集合不起。在万分紧急之中，乃只身逃走。先逃到东山，将军服脱下，挂在中道亭上，再跑到洮河沿去，脱下两只鞋子，放在水边，表示已经跳河。然后潜赴城内藏匿郭子璋家中。三日后的省城下令通缉，又乘夜由南城坠下，向官堡逃跑。

11 日夜间，赵学普、边永福因未得到城内消息，不敢贸然进城，在洮河边探讯时，被守桥士兵击毙。胡登云原和焦桐琴约定月日起事，胡由阿干镇带兵乘夜赶到中铺，攻击营部，伤亡数十人，未得成功，遂逃临夏。秦钟岳、杨景如、边杰臣三人，在城内见到事已失败，逃到马家集、高家窝窝等处，不敢逗留，又逃至临夏。这时马军态度业已转变，秦等在临夏不能久留，乃与胡登云相约赴陕投效郭坚，徐图再举，不料行抵两当盘龙铺被当地驻军捕获，解送天水后，胡被枪毙。秦、杨、边三人均被解省。我在武都因响应临洮起义失败，也被解到兰州，和秦、杨、边等人，同系狱中 6 年，直到 1922 年才被释放。

师仲吾二次到广州晋谒孙中山先生后，领到了委任状。他因事在粤延搁，先派王德一将委任状送来，后闻临洮事败，即留南方一个时期，后又转赴新疆任金树仁幕友。在盛世才统治时期，

曾担任新疆建设厅长。1937年，以所谓“叛国案”被盛世才捕押，死于狱中。

(1962年)

## 四川护法之役的回忆

熊克武 \*

### 一、护法前四川的局势

1916年，讨伐洪宪帝制的护国战争胜利结束后，蔡锷任四川督军兼省长。不久，蔡锷因病去世，由随蔡入川的护国军左翼总司令罗佩金（滇军）、右翼总司令戴戡（黔军）分别继任督军和省长。川军整编为五个师：属于北京政府系统的有第一、二、三、四师（师长周道刚、刘存厚、钟体道、刘禹九）；属于同盟会系统的为第五师（师长熊克武）。蔡锷先保荐我为重庆镇守使，因我辛亥革命后曾任川军第五师师长，癸丑（1913年）讨袁失败，第五师官兵多散留川东一带，所以蔡仍任我为第五师师长，收集旧部，较为人地相宜。

当年四川的局势是很混乱的。川滇黔之间，主客军之间，川军之间，以及各自内部之间，由于争权夺利和公私利害的冲突，形成了纵横联合错综复杂的关系与斗争，加之北京政府内阁总理段祺瑞（皖系军阀首领），阴谋吞并四川，进而囊括西南，实现其武力统一中国的迷梦，使四川局势更为严重恶化，战争迭起，岁无宁日，而川民苦矣！

第五师是处于这样的环境中：政治上没有取得重要的地位；军事力量并不强大；而孙中山先生远居海外，消息难通，同志们无所秉承，意见常生分歧。因此，第五师有随时被北洋军阀与四川军阀消灭的危险。

\* 作者时任川军第五师师长、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四川督军。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同志们几经商量，决定了四个方针：1. 第五师原由蜀军改编（详见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的《蜀军始末纪实》一文），而蜀军是辛亥年奉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中山先生之命组织的一支革命队伍，我们必须设法保全这支力量，为他日继续革命之用；2. 反对北洋军阀恢复对四川的统治；3. 不参加任何为个人争权争霸的内战；4. 维护与原护国军滇、黔军的友谊关系，互相支援。一直到护法之役，我们是本着这些方针周旋于各个方面，算是大体上做到了。

首先爆发了刘（存厚）、罗（佩金）之战。因为刘存厚原想活动重庆镇守使，蔡锷不同意，派他为川边镇守使，他已心怀不满；罗接任督军后，另委殷承志为川边镇守使，刘更为气愤，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刘就用武力逼走了罗佩金。北京政府任命戴戡为督军，张澜为省长，刘存厚仍无所得，又用武力驱逐了戴戡，占据省会成都。这就是所谓刘、戴之战。北京政府于是改派周道刚暂代川督。

周道刚感到，刘、罗、戴的纷争不能解决，他的暂代督军的地位是不牢靠的，为讨好北京政府，特电请派大员来川彻查究办，段祺瑞乘机委任他的亲信吴光新（长江上游总司令）为查办使。起初，周极表欢迎，后得知吴带来大批随员和军队干部，看出吴有取而代之之意，转而计划拒吴。但是周不敢公开挡驾，乃采取两项办法：第一，在吴未到之前，联络川军，把刘、罗、戴之战扩大为川、滇、黔战争，使吴无法查办，知难而退；第二，制造谣言威胁吴说，入川必须经过第五师的防地，熊克武态度不明，恐有危险。

周又密令我调兵五营参加作战，我老实告诉他，第五师还戴着红边帽（护国军军帽），要第五师打讨袁军，是办不到的。不料周正在积极布置的时候，吴光新却到达重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怎么办？同志们再三斟酌的结果，决

定我们决不卷入战争的漩涡；同时，我们知道吴、周各怀鬼胎，同床异梦，是难于协调合作的。因此将第五师在南岸集中，交但懋辛全权指挥，既可免受周、吴的挟制，又可于必要时自由行动。而我则带少数卫队暂留重庆，随机应变，看形势如何变化，再筹对策。我曾把我们的应变计划密告滇军长顾品珍，他也托人带来口信，要我无论如何坐镇重庆，万一有事，他会带兵来援助。

拒吴入川的计划失败，川军又打不过滇、黔军，前方吃紧，周就请吴出兵相助，代他火中取栗。吴乃有所为而来的，不肯上当，两人争吵多日，各不让步。很显然，周是想拖吴下水，挽救他眼前的危急；而在吴看来，川、滇、黔军互相火并，他乐得袖手旁观，待他们两败俱伤之时，夺取川督。

周既恨我不帮他打滇、黔军，驻重庆的吴光新军队又成为他眼中钉，为个人利害，就向吴献策说：熊某一贯反对“中央”，此人不除，终为后患，建议他们合力解决第五师，实即想挑起我和吴的冲突，坐收渔人之利。可是吴却有他的想法，我和周究竟是四川人，最怕我和周联合对他，于今我和周已有嫌隙，他正好利用，从中摆布。尤其当前吴的对手是周，而不是我，吴也没有力量同时对付我和周两个人。所以吴不愿采纳周的献计。周的阴谋不成，便对我施用毒辣手段。一方面扬言，待打败滇、黔军后，再收拾第五师；另一方面，他电请北京政府调我为川边镇守使，派钟体道为重庆镇守使。周这一着棋有两个作用：第一，调钟来重庆，增强他的实力，可以压制吴光新，迫使其就范；第二，命令陈经（钟的参谋长）要我即交出重庆镇守使关防，又密电川边镇陈遐龄拒不交代，使我两边落空。偏偏吴光新又不赞同，反质问周：在这样紧张困难的时候，撵走熊克武是不行的，会出乱子的。吴还马上电请段祺瑞收回成命。这样，我得仍留任重庆了。

## 二、川省护法之战

我在重庆的环境是恶劣的，也晓得周已在暗中监视我，我和五师与滇、黔友军的联系都很困难，彼此情况多不了解，只有本着既定的方针，各干各的。滇、黔军一面与川军对峙，一面由顾品珍亲率精锐经水道东下，在重庆的背面登陆，同时黔军、义军和第五师也攻到重庆对岸，已形成包围之势，周、吴只得逃跑了。吴光新的北军全部退出川境，北京政府任命的川省政府也随之垮台，这就为以后护法之役，得以建立一个根据地。

1917年9月，国会非常会议开会于广州，成立军政府，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海陆军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孙大元帅号召各省同志反对北京政府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并通电声讨北洋军阀，一般称为护法之役。

当滇、黔军和五师驱走周、吴后，北京政府任命被查办的刘存厚为川督，张澜为省长。川、滇、黔将领为响应护法政府的号召，组织靖国联军，于1918年1月在重庆举行会议，推唐继尧为靖国联军总司令，兼滇军总司令，刘显世为黔军总司令，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并商定了讨伐刘存厚的军事计划。孙大元帅致章太炎（军政府秘书长时在重庆）电中有云：“克武兄兵力既厚，又得人心，洵吾党难得之士，望执事励其破除顾虑，提兵进取，安国乃所以保川也。”这使我振奋有加，五师将士亦乐于效命。

靖国联军于1月底开始分路进兵成都。我军担任北路，因但懋辛病重休假，乃委五师团长吕超为北路第一纵队司令，攻打蓬莱镇失利，败退遂宁。吕急电我请但懋辛赴前线指挥，以免影响整个战局。我任但为北路军司令，他即带病督师。此后讨刘各路军连获大捷，刘残部败逃陕南。我军于2月21日进占成都，结束了川省护法之战。4月，孙大元帅任命熊克武为四川督军，杨

庶堪为省长。这是辛亥革命以来，四川国民党第一次取得了全省政权，也是护法之役的一个胜利。

### 三、护法战争胜利以后

先烈们用鲜血创造的四川新局面，我们为国家为地方，都应同心协力，建设家乡，造福人民。但是要建设四川，必先解决存在多年的“四多问题”：军队多、盗匪多、捐税多、纸票多，然后才能进行建设。于是我就职后，着手召开各军将领会议，提出整编军队、肃清盗匪、整顿税收、改革纸币四个方案，交付讨论，虽经一致通过，终以变故多端，困难重重，仅改革币制、肃清盗匪稍见成效而已。最重要的原因是：护法政府内部的桂系军阀勾结政学系政客，阴谋与北方妥协调和，运用非常国会决议改大元帅制为政务总裁制，选举孙中山先生及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陆荣廷、林葆怿、岑春煊等七人为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护法政府已蜕变为军阀官僚政客的集团。孙中山先生当然不肯放弃维护约法、打倒军阀的主张，毅然离开广州，四川党人顿失领导的中心，从此多事矣。其次，唐继尧乘机积极活动，为实现其兼并四川的野心，联合旧四川军和不满于我的一部分同志，发动反熊战争，四川又重陷于烽火混乱之中。

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后，曾托王子骞（号希闵）带给我一信（此信已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现照抄如下：

锦帆仁兄惠鉴：顷闻川战已告结束，治平之机庶几已启，为国计为川计，皆不能无此期望。川乱亟矣，不但民生憔悴，即将士亦疲殆不堪。今日所急，在诸袍泽各牺牲其意气，以同趋于一鹄，庶兄弟之争可以终泯，而得以措手于民治也。战后所重无过于民生之培养，川省地大物博，人口众多，若能善用之，以开发实业，使

生计优裕，则经济日以发展，政治现象随以安定，不惟为川省善后计当如是，即为民国建设计，亦舍此无先务也。兄若有意于此，文当开示实业计划，并绍介专门人才，以助进行。兹因希闵兄回川之便，托带此信，惟裁察之。此候

台绥！

孙文 八月二十八日

孙中山先生对于川省建设，人民生计，同志团结，谆谆教诲，期望殷切，而我无所建树，以报中山先生，以慰家乡父老，感愧无已！

反熊战争爆发时，我曾宣言，战事结束，决即引退，表明非为个人名位而战。因此，1920年10月我军获得胜利，召开善后会议之后，我于12月30日通电辞职。不料，北京政府忽任命我为四川省长，授予勋位。我曾发出元电，拒绝伪命，严词斥责。元电有云：“……此次力辞全省人民之挽留，径自解除四川督军职务，本以护法中摧，分当负责下野。对于护法正旨，自谓始终不渝。……而北庭以个人权位为言，迭经拒绝，犹不觉悟。此固由武德未修，信义未立，然即谓武易与，亦当知二十年于役革命，粉身碎骨在所不辞，更何肯蝇营权位以自污其清白，又何至以全省军民一再挽留为未足，而必以非政府之任命为宠荣。是不独识武为何如人，抑且辱及个人之人格，应即严加驳正者一也……”

1922年，孙中山先生先后交宋绍曾、戴季陶带来两信（均送中国革命博物馆保存），并附录于后：

锦帆兄鉴：曩奉手书，旋即裁答。青阳函亟称执事仍笃故谊，为之慰喜。国内近情略具致怒、蕴（即但懋

辛、余际唐) 两兄笺，不更赘述。

执事以在野之身，斡旋蜀局，卒能有成，幸进而为建设之谋，以复西南往时之盛，何庆如之！绍曾还川，特嘱存问，唯进教不宣。即颂

侍第

孙文 八月二十九日

锦帆兄大鉴：(向) 育仁兄来，备述蜀中近况与兄为国为省之努力，欣慰无已。十年来，国事不宁，蜀中尤备受痛苦，果能由此次战争之终结，得长治久安，则匪特蜀中之幸，民国前途亦获助不浅。关于蜀中发展整理，曾有所见，已言之在沪蜀中同人，并托育仁兄详细电致蜀中当局。兹更派戴季陶兄入川，与诸兄面究，惟近教之。尊伤痊否？尤念，希善护养。即询  
痊安！

孙文 十月二十三日

我捧读再三，深感中山先生时以川局治乱、人民疾苦为念，而我党人则自相残杀，为害地方，这不仅完全违反中山先生的旨意，问良心岂能安乎？所幸双方同志终为中山先生的伟大人格所感化，痛觉前非，翻然悔悟，重新团结，为讨伐贿选总统曹锟而共同奋斗。但在我内疚于心，耿耿于怀者，即由护法之战而取得的川省政权，又落入直系军阀之手，四川护法运动还是失败了。

(1965年)

## 护法之役中的四川靖国军

吴克雄 \*

1917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大总统职后，号召讨伐北洋军阀段祺瑞毁法专政。四川石青阳首先组织义军，响应声讨。

当时段祺瑞任命四川陆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为四川督军，以徐孝刚为第一师师长，驻重庆，统率川军。命吴光新率领北洋军入川，会同周道刚企图消灭西南方面反对北方的武装力量，颠覆广州政府；又命嘉陵道尹张澜为四川省长，刘存厚为川军军长兼第二师师长驻成都，钟体道为第三师长，驻川北等处。

滇黔军方面的情况是：云南督军唐继尧拥护广州政府，定号为靖国军，兼任滇川黔靖国联军总司令，并以顾品珍为靖国滇军第一军军长、赵又新为靖国滇军第二军军长，驻扎川南叙泸等处。贵州督军刘显世以王文华为靖国黔军总司令，统率第一纵队司令袁祖铭、第二纵队司令李雁宾，由黔向川省綦江县境推进。

四川国民党的情况是：熊克武为川军第五师师长兼重庆镇守使，但懋辛为第九旅旅长，向育仁为十七团团长，吕超为十八团团长，喻培棣为十九团团长，王伯常为二十团团长。但熊部被周道刚、吴光新两军所挟制，不敢出动，只得把所有步兵四团，分驻南川下东县境。熊克武则在重庆与周、吴虚与周旋。其他国民党人石青阳、颜德基、萧德明、黄复生、卢师谛、夏之时等奉孙中山的号召，各自组织义军，对在四川的段系军队展开作战。以下专述石青阳徒手起义的经过。

石青阳是最服从孙中山的。他依靠熊克武的第五师为基本，

\* 作者时任靖国黔军游击总指挥部参谋、预备队指挥官。

积极联络滇黔两军，秘密组织义军。我为组织义军，被第一师二旅旅长王佑瑜察觉逮捕，禁闭在其司令部。经我的旧同学周荔（王佑瑜最亲信的连长）保释出来。我以重庆不能立足，乃潜赴璧山、铜梁、合川等山区去说服绿林头子熊联生、张云程、颜桂祥等来归石青阳。石青阳暗中活动，许多军政人员和工商业者，以及绿林头子、江湖弟兄，皆愿出钱出力来帮助起义。起义的时机成熟，由袁祖铭电请贵州督军刘显世委任石青阳为靖国黔军游击总指挥，并拨黔军营长刘济川带全营军士来协助石青阳，听候指挥作为基本队伍。1917年8月，石青阳到綦江县蕉坪，宣布就靖国黔军游击总指挥职，通电起义，拥护孙中山，讨伐段祺瑞。石青阳的总指挥部设六处，以宋绍贞为参谋长，吴克雄等为参谋，阎崇阶为副官长，朱品珊等为副官。石青阳先后委任十六路指挥官，我现在能记忆的是：第一路指挥官汤子模、第二路周渊如、三路萧玉书、四路陈鸿图、五路孔阵云、六路熊联升、七路张伯超、十六路杨璧戎。另委吴克雄为预备队指挥官，招募补充队伍，因我随军服务，实际由参谋张民安代行职务。各个指挥员统率一营、二营、三营不等。石青阳以展开战斗为中心任务，必须有一个统一的前敌指挥，乃选拔汤子模为前敌指挥官，各路指挥部都要听命调遣。汤子模是湖南大庸县人，前五师熊克武的军士，讨袁失败后，他不投降，拖一部分军队在川东落草。周骏多次派兵去剿办，始终没有把他消灭。熊克武于护国军胜利后，重当第五师师长，才把汤子模招回，委在司令部服务。汤子模勇敢善战，忠于国民党，就是爱乱杀人。石青阳拔他为前敌指挥官，在当时也算得人。

1917年9月，滇黔两军与段祺瑞军展开战斗。

当时滇黔两军的布置是：滇军一、二两军由泸县东下，一由长江南北两岸顺流而下，攻取沿岸的城镇；一由泸县、永川东下，皆以重庆为攻取的目的地。黔军由綦江进攻重庆，黔军主力

用于綦渝大道。黔游击军以汤子模率领大部，用于黔军右翼，或游击队之左右翼，或在敌军的后方活动，例如周渊如，已活动到了璧山境。

段系军队的抵抗情况是：周道刚命令徐孝刚第一师去永川、江津抵抗滇军，节节败退至江巴县境的福子场地方，营长邱卫华被击毙，所部溃回重庆。吴光新率北洋军去南岸，向綦江抵抗黔军。北洋军毫无战斗力，一击即溃，也退回重庆。吴光新率其残部，迅速离开重庆，乘轮逃往湖北宜昌。周道刚率其第二旅残部，退至合川，复转至东道荣昌、隆昌暂驻。刘湘率其第一旅残部退至璧山，亦至荣昌、隆昌与周道刚会合。周道刚的督军从此垮台。徐孝刚以荣昌、隆昌亦难以立足，率领残部到荣县、威远避战，徐孝刚也就从此下台。

滇黔两军会占重庆后，通电报捷。孙中山任命石青阳为四川川北招讨使兼川北靖国招讨军总司令，顾品珍、赵又新、王文华、石青阳联电唐继尧请任命熊克武为四川靖国各军总司令，统一军事指挥，重新布置攻取事宜。滇军由东大道西上兼略取下川南地方、黔军由袁祖铭、李雁宾两纵队司令率领，由璧山、铜梁、安岳，东至西上，黔军总司令王文华留镇重庆。川军由熊克武率领，分两路进向西北，熊克武率本部由合川、遂宁间道直趋成都；石青阳率所部经合川、遂宁向南充、三台等处进攻。

石青阳遵照上述既定进攻方略，立即派遣汤子模指挥前敌各部队出合川。又派吴克雄迅速赴蔡家场，会同周渊如部到璧山，追击刘湘。我们兵不血刃占领璧山县，刘湘窜永川。汤子模追击周道刚于合川，周道刚逃窜铜梁。石青阳命令攻取铜梁后，各部队一律转向川北进取武胜、潼南、遂宁等处，集中兵力攻取南充，太和镇、三台等处敌人的根据地。

敌人方面：刘存厚以江防司令张邦本余部和钟体道第三师的营长何畴带兵一营，扼守南充，防御靖国军进攻。石青阳集中兵

力进攻南充，在青竹街击溃张邦本，占领南充县，复在南充桂花场击溃何畴全营，缴其武器。张邦本退守蓬溪县，石青阳率部进攻，用佯败诱敌计，撤兵后退。张邦本以为真退，撤收警戒，石青阳乘机挥兵突然袭击，张邦本跣足逃亡，几为靖国军活捉。张邦本收集残部，退太和镇隔江扼守。石青阳命令各部队于1918年元旦攻进太和镇，庆贺新年。石青阳亲自督师，士兵喊叫子弹缺乏，要求补充，石青阳声言，大批子弹到了，到前方去补充，实际是叫在敌人手中夺取。从此士气振奋，硬是元旦拂晓攻进太和镇，夺获张邦本械弹粮秣很多，乘胜进取，旬日之间，把潼川府所有州县完全占领。张邦本残部逃窜绵阳，川北县境完全为靖国军所攻占了。石青阳以一部分兵力，防范绵阳，预备截断刘存厚、张澜退陕西之路；又以汤子模出中江，趋金堂协助联军攻成都北面。川北战事，至此结束。

1918年唐继尧任命石青阳为滇黔川靖国联军援陕第一路总司令。石青阳受命后，把所有部队编为两个纵队，以参谋长易复为第一纵队司令，统两个支队去南充县境，驻扎贵民关等地，向陕西进发；以汤子模为第二纵队司令，统两个支队驻后方，作为继进部队。

石青阳略取川北后，保荐宋绍曾为嘉陵道尹兼川北清乡司令，办理地方善后事宜。

另有郑英由靖国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委为梯团司令，起源于荣昌、隆昌、内江等地，有部队两千余人，经顾品珍允许，合并于石青阳部，石青阳委任郑英为靖国招讨军第一旅旅长。

1919年夏，熊克武命令石青阳把所部切实缩编为一个师，成为建制陆军第六师。石青阳为师长，辖十一旅旅长郑英，十二旅旅长汤子模，二十一团团长王权之，二十二团团长张超伯，二十三团团长陈鸿图，二十四团团长刘是安，护卫营营长吴克雄，稽查所所长王子文，稽查兵一连，执行宪兵职务。我现能记忆的

营长有：张仲铭、罗观光、张云程、李浩然、颜桂祥、陈徒南、康聚五、曾德成、周渊如、最后成立一个教导营，以刘锐为营长。又成立陆军随营学校，以白瑾怀为校长。

石青阳自綦南起义，逐渐扩张军队至十几团，分次缩编，到成立第六师止，实在只有 12 个步兵营。由石青阳部队所攻占县城有三十几座，到成都分驻各县驻扎训练，仅驻南充、西充、盐亭、南部、蓬安五县，其余县分，皆陆续退出。

县知事一律由省长委任。财政方面，三十几县的粮税，射蓬盐场、南阆盐场的盐税，皆在石青阳的掌握中，可以任意提取。但石青阳以能供军费开支为满足。多余的完全陆续交省长支配。成立建制第六师起，每月造具预算书请督署核发，由省署财厅拨领款凭票，按所指定处所去提取，转发全师官兵。战争时期的军费，石青阳事后皆据实报督署请予核销。1917 年至 1918 年间，石青阳曾兑 30 万元去广州，接济孙中山使用。

(1960 年)

## 护法运动时期冯玉祥武穴通电主和前后

张之江 鹿钟麟 吴景南 \*

1917年，段祺瑞在讨伐张勋复辟之后，重任内阁总理，对孙中山恢复国会的要求悍然不顾，以致引起护法战争。段内阁先是令冯玉祥率部援闽，继又令其援湘。冯始而托辞延宕，继而附和以冯国璋为首的主和派，以等待新的时机，终而在武穴通电主和。其间又穿插着陆建章的活动，情节颇为曲折。时张之江任十六混成旅骑兵营营长（后升步二团团长），鹿钟麟任步二团二营营长（后升炮兵团团长），吴景南任步一团团附（调在旅部参谋部服务），均曾参与当时的活动。兹就亲身所历，叙述于下，以供参考。

1917年秋，冯玉祥率其部十六混成旅驻防廊坊。一天，有不速之客来访，其人正是对冯成见最深的段系人物傅良佐。冯实鄙其为人，第以其为陆军次长，亦系上级，故以军礼迎送如仪。傅临行复邀请冯到专车上密谈良久始去。傅此来，所为何事，局外人一时难以揣测。不数日，北京政府明令发表以傅督湘。至是始悟傅之访冯，盖谋多方结合武力为己后盾，冯实其结合对象之一。

其时，段对南方坚持武力统一政策，已经导致护法战争，而遣傅督湘，更不啻火上加油，以致战争蔓延。粤军攻闽甚急。闽督李厚基电北京政府告急，陆军部令冯玉祥率部驰援。次长徐树铮召冯到部面商，以津浦路天津至唐官屯一段被水冲坏，一时不能修复，指定取道京汉路经郑州转陇海路到浦口，再乘海轮赴

\* 张之江、鹿钟麟时在冯玉祥旅任营长、团长，吴景南任团附、参谋。

闽，并令尽速筹备开拔。冯既不愿卷入内战，又怕损失实力，心虽踌躇，无法推托，只有表示奉命，徐图应付之策。以接受过去在四川军运困难的教训，请招募运输队3000人，以利行军。段系当时正在要用他，勉强同意。经陆军部批准后，即派李鸣钟到河南归德一带招募。当时陇海路操诸外人之手，军运亦需付半价。陆军部咨财政部与该路洽办手续，往返颇需时日，因此很久未能出发。段祺瑞曾召冯到部面促开拔，后又迭次电催，本难再缓；恰巧京汉路新乐、冯村两处铁桥又被冲毁，因得再延。冯表面复作出积极准备出发的姿态，向路局要了列车，停于车站道岔，又命部队练习上下车，以示整装待发。

先是失意已久的陆建章久蛰思起，他看到冯国璋出任总统后，对南方主张和平解决，与段系政见相反，认为有机可乘，乃商之于冯玉祥，拟附和和平，以博个人在政治上的声誉；同时，想因利乘便，夺取段系皖督倪嗣冲的安徽地盘。就前者来说，和平主张若能实现，则内战可以避免；即使成相持之局，则援闽亦有观望余地，这当然适合冯玉祥的愿望。就后者来说，果使政局转变，他这个老长官陆建章能以皖人督皖，对自己也是有利的，因此对陆的主张表示赞同。陆以自己的主张得到冯的赞同，乃潜赴南京，在苏督李纯处进行活动，他企图首先造成长江三督一致维护和平主张的声势，与主张武力统一的段系相对抗。从形势来看，确实是可以有为的。

不久，京汉路已经通行，冯玉祥以无可再延，遂派员赴宁与苏督李纯联系，并商定队伍到浦口的驻处。正拟开拔间，适傅良佐已被湘军驱逐，急谋恢复，陆军部突然改令冯玉祥率部援湘。冯接到命令，颇为着慌。因为援湘，势必直驱武汉转赴前方，有立即投入战斗的危险，而且替傅良佐打地盘，更非所愿；另一方面，亦必放弃到南京后的所有策划。他顿时计上心头，决定立命部队向南京开动。当向路局要车三列，限当晚6时齐备。命团长

邹心镜率步兵一营，机炮各一连，乘停留岔道的列车，先行开出，并密嘱其注意两事：1. 列车到达徐州后，须俟第二列车到后，集结行进；2. 过蚌埠时，应特别戒备，以防意外。盖以陆建章的政治活动，倪嗣冲已有所闻，恐其中途截击。冯于第一列车开出后，才电复陆军部，谓部队已遵前令，出发在途，遽难调转。当晚第二、第三列车亦陆续开出。次日，冯自率模范连、手枪队及旅部官佐随第四列车行进。不到四天，全旅开拔完毕。每次列车行抵归德时，将李鸣钟所招之运输队分批带往浦口。部队到达浦口后，由浦口至浦镇列幕而居，没有住商店民居者。将所招募之运输队新兵编为第三团，以李鸣钟为团长。严戒全旅官兵，无事不准随便过江。

冯见苏督李纯，李极表欢迎，亲切招待，对于给养及其他物品，均愿尽力相助。一日李邀冯密谈，提出当前内战的问题，冯说出自己倾向和平的本意。李很高兴地说：“冯代总统极不以对南方用兵为然，既然我们所见相同，你可在这里住着，不必到福建去了。军队给养，苏省尚可供给。”当又问冯有什么需要。冯以新兵第三团缺乏武器对。李遂拨给金陵制造局库存的林明敦步枪 1000 枝，复在督署设宴，邀请冯部营长以上的官长和他的第六师官长在一起联欢。彼等相处，均极为融洽。李之所以对冯部如此亲切者，正恐一旦与段系决裂，首先受到皖督倪嗣冲的军事威胁。因为蚌埠至南京三四小时可达，而安庆又在上游，可以顺流而下南京。留冯部驻浦口，平时可以为苏省守着大门，一旦大局有变，可以助陆建章向安徽进展，以牵制倪嗣冲。冯玉祥主要希望和平，避免参加内战；于是，躲一时是一时。其实，他对陆建章的政治活动，在作法上，也并不完全一致。

冯在浦口停兵不进的种种情况，陆军部早有所闻，曾不断来电催促，冯均以已派员到沪向招商局交涉船只为辞，向陆军部敷衍。冯明知招商局南洋航线只有海轮两只，不敷应用，还须海军

护航，皆一时不能解决的问题，都正可借此拖延时日。闽督李厚基派代表关吉胜来宁坐催开拔，亦以船只困难为辞答之。未几，湘局更趋紧张，南军节节进逼，而以冯国璋为首的主和派又屈服于段祺瑞，放弃了和平主张，一致对南方大举用兵。命曹锟为援湘军第一路司令，率吴佩孚的第三师、张敬尧的第七师沿粤汉路向长沙前进；又命张怀芝为援湘军第二路司令，率施从滨的山东暂编第一师、安武军李传业一路，经江西向株洲前进。南北双方布防，大战迫在眉睫。陆军部仍命冯玉祥率十六混成旅援湘，归第一路司令指挥，开赴武汉待命。由于冯旅久已停兵不进，其实四周都布满了北洋军队，而紧蹑其后者，为施从滨师，已到滁县。皖督倪嗣冲及驻徐州的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等复纷电李纯诘责其留冯旅驻浦口的用意何在，这就给了冯很大的压力。这时，大局既已变化，李的态度向以冯国璋为转移，自然随之转变，而且形势压迫，对冯亦爱莫能助，姑也劝冯开拔。冯受到四周的压力，无可奈何，只好离开浦口，向西移动。

1918年1月3日，冯率部乘招商局江轮4艘，由浦口向武汉前进。但他并不想立即开到武汉参加援湘的军事行动。他在由浦口溯江而上的时候，途经安庆，还曾逗留了几个小时，考虑在安庆登岸，又恐引起冲突，才又继续西开。中途也考虑过停留在九江，最后才决定在武穴登岸。冯的主和通电发出以后，陆建章也赶到武穴，要求冯助他攻取安徽。冯知不可为，但又不便直接拒之，为了应付一时，乃派鹿钟麟去安庆侦察情况。鹿到了安庆住在一个小客栈里，外出窥查，看到到处军警密布。不料走在街上碰见他先派去的一个侦探员，口称营长，立正向他行礼，鹿见势不妙，立即向他大声呵斥说：“你这小子乱跑，家里到处找不到你，逗得你妈着急，赶快跟我回家吧。”装作爸爸找儿子，拉着他的手就向客栈里走。哪知到了客栈仍被后面的人盯梢不放。鹿向那兵示个眼色说：“我买点东西就来。”脱身逃走，后来那个

青年兵也逸去，衣物行李完全抛弃。鹿回报，知倪嗣冲已有戒备，冯劝陆慎重从事，陆大为不满。冯率部驻扎武穴，一面派少校参谋刘骥到湖北督军王占元处，派团附吴景南到江西督军陈光远及九江镇守使吴金彪处分别联系，窥察动静，结果，未见有若何迹象。惟已开至武汉之第七师师长张敬尧抵冯不遵中央命令，中途逗留，指为叛逆。陆军部亦来电诘责，斥其违抗，令速向武汉行进。其时吴佩孚之第三师屯驻孝感、广水等站，皖督倪嗣冲派倪煦芬集结重兵于皖鄂边境，接踵而来到九江者，厥为山东暂编第一师潘鸿均旅，对武穴已成大包围的形势。1月14日，冯乃发出通电，痛陈内战之非。有元首下讨伐令系处于迫胁、不敢冒昧服从之语。18日又发出第二个通电强调护法之名正言顺，不宜意气主战，希望早开国会，罢兵修好。这时潘鸿均已进驻九江龙开河附近，节节进逼，冯为先发制人，派团长董世禄、手枪队长韩占元等率步兵一营、手枪队及机枪等，分乘小轮5只，前往夜袭。驶至距九江尚有10余里一个小河的地方，即令登岸。讵水浅，船不能登岸，朦胧中误认为是龙开河，当令官兵徒步，泥淤下陷，又不能托足。辗转之间，东方已白，度不能达到目的，遂登轮颓然而返。九江镇守使吴金彪与冯同系基督教友，交甚密，闻报急找冯派往南昌的代表吴景南到镇署谈话。一见面情形似很紧张，他问吴景南：“你昨晚来带了多少人，有何任务？”吴景南说：“昨晚到此，就来见帮办（时吴金彪兼江西军务帮办），已经说明由此赴南昌见陈督军，别无任务。只带了一个随从。”吴金彪说：“你要说实话，我与你们旅长是好朋友，同是教友，休戚相关，有何情形，不妨对我明说。”吴景南答：“我说的是实情，不知其他。”吴金彪说：“你不要去南昌了，恐有不便。”吴景南叩询究竟。吴金彪说：“你们那里昨夜开小轮船数只，满载军队，到距此不远的一个小地方想登岸，不久又走了。南昌已得情报，认为你们旅长有异图。所以叫你不要去。你可先回去，

问明你们旅长是否知道。”吴景南归报冯，冯以夜间演习为辞告知吴金彪，得以掩饰过去。

冯在武穴停留期间，除了加强戒备外，并在前后方作了一些活动。为谋补充第三团的武器，他选部队中狡者数十人，令扮作农民，各授以短刀及短枪，由排长薛星广掌握，在皖鄂边境冒充游勇散匪，专搜民团及警察的枪械，不准劫夺商民财物。这批人去到那里，夜聚明散，飘忽无定。驻黄冈湖北一旅二团谢超部曾派出两连清剿，亦被击溃，获得不少枪械。风声越来越大，鄂北各县为之震动。冯虑暴露真相，派鹿钟麟率一部分队伍开抵湖北广济县姚伯岭地方伪作协剿，暗中将其招回，地方遂臻宁谧。湖北督军王占元闻报，以十六混成旅清剿有功，赏了铜元 3000 枚，后来传为笑谈。此外，冯还物色部下鲁籍目兵与山东第一师官兵有亲故关系者，得 10 余人。令其到九江装作谋事者，各找自己的人事关系，到山东第一师报效。如遇与本军冲突时，在内部相机扰乱，并暗中联系，招致缴械来投者。这一部分人去后，皆得打进了第一师。

冯两次通电，颇触怒段祺瑞，段乃下令免其旅长职务，以团长董世禄继任，并令曹锟查办。旅中官兵表示拒董挽冯，电请政府收回成命，并说旅长主和，是全旅官兵公意，愿与之同生死，不能任其独去，否则，请将全旅官兵 9995 人一律科罪。因此，免职问题，又闹成僵局。这时，各方面对冯很注目，找上门来的政客日渐其多，冯皆拒而不纳，尚不至授人以柄。惟对陆建章的问题，感到很难应付。原来陆要冯旅占领安庆，事不果行，又屡次促冯攻皖，亦皆借辞未动。至是陆不能耐，向冯要挟，意极坚决。冯的拖延之术已穷，被逼不过，提议以出兵必须先向官兵说明道理，使大家知道目的何在，然后才能用之。陆以为然，当即决定次日下午集合官兵讲话。时春雨连绵多日，届时仍未放晴，官兵遵令集合，陆亦莅止。正期盼冯来，忽一骑士驰至，向值日

团长传达说：“旅长来时，桥面石滑，马失前蹄，堕地被摔伤左腿，已抬回医治，传令暂时解散。”陆闻之，颜色顿变。各部队正要调走，陆急止之，并高呼：“我有话说，你们旅长摔伤是假的。十六混成旅是我一手培植起来的，你们才有今日，你们应该听我的话。”正待往下说时，各部队官长纷纷下令将队伍带走。陆愤极，顿时倒卧地上，大骂冯玉祥忘恩负义不止。经团长董世禄扶起，送回寓所。陆知无望，悻悻而回。陆建章梦想当安徽督军的一幕插曲，至此告一段落。

是时曹锟已进驻武汉，张怀芝进驻南昌，冯派骑兵营营长张之江、团附吴景南分别前往联系，并有所陈述。张之江见到十六混成旅所处环境极为险恶，颇为忧虑，想到既有明令归第一路司令指挥节制的隶属关系，比较容易措辞。这时曹锟的汉口行营设在一个旅馆里，张往晋谒，曹知为代表冯旅长者，立即接见。一见面，他就先开口说：“你们那里怎样啦？我很关心，赶快向我说说吧！”张首先代冯向曹致候，接着说：“此次冯旅长主张和平，不愿意扩大内战，完全为爱护国家人民起见，与冯代总统意见相同，并无他意。最近冯旅长及全旅官兵听说本旅划归总座（指曹）直接指挥，莫不欣幸异常，大家极为兴奋，凡有所命，无不绝对服从。”曹闻之，哈哈大笑地说：“你们只要听我招呼，你们前途就有无限光明。望转告焕章，必须将军队开往湖南。将部队中陆建章的亲信，酌量换掉，把内部整刷一新就好了。你们有什么难处，尽管找我（他手拍着胸膛），我一定负责照顾你们。至于目前的谣言以及恶劣的环境，亦必随之风平浪静，不必多所顾虑。”吴景南至南昌见到张怀芝，张首先问：“冯玉祥叫你来是什么意思？”吴说：“冯旅长叫我来问候总司令（指张），附带说明一下他停留武穴、主张和平，原系本诸大总统的主和意旨。另一方面，也是顺从人心，皆由于爱国哀民一念所发。可是段总理竟轻听左右之谋，非用武力统一不可，实失人心。所以冯旅长虽

蹈违令之愆，不敢相从，亦出于爱护段总理之意。至于陆将军虽有所图谋，冯旅长始终不肯为所利用。”张忽然说：“算了吧！你会打麻将吗？”吴说不会。张说：“我谅你也不会，你们旅长是禁止吃喝嫖赌的。我教给你，打麻将时无奇不有的。冯玉祥就是这个无奇不有，太好出风头、捣乱。他不想自己只有一旅人，就是生龙活虎，能抵抗四面八方包围的大军吗？要赶快遵从命令，听曹锟总司令指挥，悔过立功，以赎前愆。能这样做，我也可向曹总司令代为解释。你回去，叫他赶快开拔好了。”吴即归报。冯综合张之江、吴景南与各方接洽的情形，反复考虑，依然徘徊不定。适曹锟派孙岳来武穴促冯开拔。孙见冯说：“我看你住在这里太危险了，还是遵从命令挪挪地方好。”冯说：“朋友多年不见，你来我很高兴。想你有多少好话教导我。咱们都是努力革命的，哪知你竟说出这些话来，叫我很失望。我挪到哪个地方呢？”孙说：“我来并不是为曹作说客，还是给你这个老朋友处境作打算。现在前后左右都是对付你的，一旦有事，南军能援助你吗？你的和平主张已昭示于国人，你的力量也算尽了。照着命令开拔，不就完了吗？”冯考虑再三，终于接受。并派张之江随同孙岳回报曹锟，定期开拔。一面调整内部人马，将第一团团长邹心镜（陆建章的外甥）、第二团团长董世禄（陆的盟弟）更换，以李鸣钟为第一团团长、张之江为第二团团长。适段祺瑞南巡到武汉，冯先往见段，段问冯腿的伤势如何，冯挺立以示无恙，并说明佯装堕马的经过。段为之一笑说：“我知你的处境，不宜再与陆朗斋（陆建章的别号）来往，以后应切记。对于其他政客尤不可接近，免为其利用。”曹锟复乘势向段代冯缓颊，请从宽以撤职留任，以观后效的处分，段许可。曹以冯为援湘右翼司令，并派参谋门致中、副官严念慈两人为监军。冯见湖北督军王占元，请代征雇轮船以便运输。王即派员征到大小火轮 32 艘，遂开赴武穴，接运军队。

军队齐到武汉后，冯遵令向湘西前进，本令乘船到太平口（沙市对岸）登陆，往公安入湘。乃派团附吴景南、参谋刘骥，先到沙市、监利等处与当地屯驻长江上游司令吴光新所部联系。嗣因石首尚有南军一部占据，遂改在石首登陆，先占领石首，再向公安前进。在此期间，有前派往九江到山东第一师投效的鲁籍士兵一人赶来归队，并悉他们自投亲友，在第一师里补名入伍后，不久该师即开拔经江西萍乡，进入湘境，攻下醴陵后，又开往株洲。他们觉得越走离队越远，当一个夜晚进攻株洲，战事正激烈时，天又下雨，他们即在后面放火扰乱，又乱放枪，大喊敌人已由后面包抄过来了，一时秩序大乱，竟把第一师搞得溃败，不堪收拾。师长施从滨坐轿逃去，几为乱枪所击伤，军慌马乱，谁也找不到谁。他随带二三十人各携枪支要回武穴，经过赣境陈光远的哨卡，均为所截留，后得乘间归来。按当时情况，南方守株洲的湘军本已不支，迭向桂军告急，桂军派马济部驰援。马至北军已溃退，日夜追赶，竟望尘莫及，曾说北军溃败之惨，逃跑之速是罕见的。殊不知这是受冯玉祥派去的人从中扰乱的影响，至今外人知之者甚少。山东第一师的溃乱，同时牵动了安武军，亦随之溃退。第二路司令张怀芝又因援湘失利，恐怕其山东督军职位为张树元取而代之，亦急回山东。一时风流云散，援湘第二路竟以取消。湘东方面军事，由奉军副司令徐树铮命驻武汉奉军邹芬部前往接防。

冯旅因用小火轮来往运输，进军甚缓。段、曹迭电催促，至5月中旬始全部到达湖南津市，分驻津市，新洲等地。冯过石首时，曾将附近曾尚武部数百人收编为一个营（是鄂西护法军石星川所部，石失败后，饷源断绝，无所归属。在武穴时，曾派人接洽请求收编）。曹锟闻之，甚为不怿，勒令遣散。冯多次与曹商谈，始行作罢。在津市休息约两周，至6月4日，分两路向常德前进。第一路张之江的第二团在鳌山与胡瑛部稍有接触，胡部即

退，跟踪挺进。6日晨进入常德，胡部退往辰州。胡之母亲出走未及，改变姓氏，匿迹城中。冯入城后闻知，派副官长宋良仲前往慰问，并馈赠生活费400元。这时北京政府明令开复冯的十六混成旅旅长原职，并令兼署常德镇守使。所辖为常德、桃源、临澧三县。胡瑛由辰州致函冯，感谢关照其母，此后遂与胡函电往来。胡一度亲到常德与冯交谈多时而去，并介绍南方革命党人蔡济民等与冯纳交。冯与南军各将领互通声气，实自此始。

冯在常德两年，这是他治军以来头一次在一个地方驻这么长的时间。他惟恐军队习与苟安，训练要求更加严格，订出种种教练方法，使官兵学术素质能逐步提高。对于所属地方公益设施，无不尽其力之所及，次第兴办。关于工程艰巨者，如开辟公路，修建石桥、沿江码头、堤防等等，均以兵代工。创立实习工厂、平民习艺所，皆自筹经费，不使地方担负，人民觉得很稀奇，莫不感戴。其他事迹尚多，因与本题无关，不作详述。

这时南北战局，忽紧忽弛，冯虽偏处湘西，但是他主张和平的意见仍旧坚持，曾同吴佩孚联合驻湘北方将领，联名通电向北京政府及曹锟力陈不可再战的理由，主张双方进行和平磋商，不可存地域观念。及安福系实行新选举法，成立新国会，又联合南北将领通电斥为非真正民意选举，实不合法。迨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时，冯联合北方将领联名电徐，劝勿就职，免作主战的傀儡；并请其出作调人，促成南北的和谈。1919年3月，因南北和议停顿，各代表辞职，又联名电唐绍仪劝其为国家计，勉为其难。

1920年，吴佩孚率第三师由衡阳撤防北旋，湘军谭延闿、赵恒惕即攻下长沙，驱走张敬尧，对湘西动态如何，未敢断定。冯为防万一计，乃将部队集结常德外围，亦有适当的布置，由长沙通常德的要路汉寿县竺山地方，派连长冯治安率兵一连驻守，作为前哨线，与湘军防地相距约百余里，互不相犯。一日前哨线

连长冯治安报告说南军进逼，距防地只有45里，仍向前进，恐有决裂之虞。冯玉祥决心不下，令团长鹿钟麟带手枪队百余名夜间增防，日间撤回，日日如此，以防疏虞。后又接冯连长复报告，谓南军来电要他让开防地，他复函谓我奉命驻此，无长官命令，不能擅离，南军亦未进逼。冯觉南北大局日有进展，遂决计退往津市，并向各方表明态度，为和平而入湘，非为战争而入湘。谭延闿、赵恒惕闻之，派代表携带湘绣及运输小火轮5艘相赠，又令常德商会拨款10万元作为开拔费。冯将湘绣小火轮收留，款则璧还。7月6日晚6时，适值大雨，冯率队悄然退出常德，两日安抵津市。时湖北督军王占元，因张敬尧残部退到武汉，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率部亦抵武汉，王恐其有他图，遂邀冯部速开武汉震慑。以后与南军人士函电往来频繁。是年9月，冯驻军谌家矶时，孙中山曾派徐谦、钮永建来访问，冯亦派秘书任右民前往答拜，冯与孙中山取得联络发生关系自此始。

(1963年)

## 湖北靖国联军民众武装纪略

曾榆村\*

### 一、湖北靖国军第一二两军的建立和西退

北洋军阀在袁世凯称帝失败以后又违反约法，解散了国会，孙中山在广东组织护法政府，并创建护法军。其时属于唐继尧统率的护法军，为滇、川、鄂、豫、陕等省军队，都称为靖国军。湖北于民国六年（1917年）初冬，在荆州、襄阳成立湖北靖国军第一、第二两军——即原荆州镇守使石星川、襄阳镇守使黎天才两师部队，由国民党人宣传运动，起而响应护法政府的号召，宣布起义的军队。此外，另有国民党人组织的民众武装七个部分，领导人为王安澜、梁钟汉、刘英、张国权、刘公、蔡济民、吴醒汉，并有客军豫西王天纵部。

岁云暮矣，军阀大军攻占了荆襄，于是荆襄两处的义军，都退往鄂西。荆州部队改由唐克明率领，驻守恩施，襄阳部队退守宜昌自南沱溪以上大江南岸，黎天才本人驻归州指挥。民众武装王、梁、刘、张四部，退守南沱溪一带北岸。在退守以前，四部组成为湖北靖国联军，王、梁、刘、张四人分任四军司令，都以游击战的方式退到鄂西。年节期间，梁军退往远安县的洋坪，我在正月初参加梁部，后又到刘公部队约一星期，最后参加蔡济民军部工作，直到蔡军失败为止。关于梁、刘（公）、蔡三部的军事行动，是亲身的经历，其他各部是耳闻之事。兹将各军尤其是民众武装部队的实际情况，概略述之。

\* 作者曾在梁钟汉、刘公、蔡济民部工作。

## 二、四个民众武装的成立经过

王安澜是襄阳人，据他的参谋长蔡仁斋（我的儿女亲家）说，他拥有步枪 1200 余支、机关枪两挺、山炮三尊、手枪 13 支，是收集地方团队的枪支，并联合团总如李让卿等组织而成的。又据梁钟汉说，刘英是京山永隆河人，早年参加革命，地方民众对他很有好感，在广东护法政府成立之初，他就宣传护法的重要性，待到时机成熟，即联合同志收集散在民间的枪支组织成军，计有人枪 300 余。张国权不是当地人，他一向与季雨霖（荆门人）为革命密友，季在沙洋一带联络有志革命的人很多，季的有力助手阙龙先被军阀派人暗杀，黎天才的部将犹由龙又计杀季雨霖本人，在群龙无首时，武装民众乃共推张为领导人，张遂组织群众为季之继承者，计共有人枪约 200 余。梁钟汉是汉川人，他的成军情形是这样的：10 月中旬的某日，他回到县城，对县长王绳高讲说革命意义，表明要他在县城起义响应荆襄的独立，王欣然应允，约于明晨举旗宣布起义，梁信以为真，也就安心等待。谁料王是阴诈万分之人，他调查清楚了梁身上只有手枪一支，也没有另外的后援，乃暗中部署，拟活捉梁及跟从人员送省献功。梁探到消息，遂乘王未动手前，急越仙女山边的城墙而逃。越城之后，迅跑至分水嘴地方，侦知集市上有保卫团，枪支不少，由于城内的失败经验，乃异想天开，购办洋油箱数个，大型鞭炮数挂，并分途在街市里和河道下收集枪械。在集市里，选拔壮汉约十人，各执大刀，掩至保卫团大门，猛击门卫守兵，夺枪去即时大叫缴枪者免死，随后之人，急在洋油箱中燃放鞭炮，高喊大军到了，于是 21 条步枪皆于团丁睡梦时缴获无遗。河边泊有炮船一只，装备步枪 12 支、大炮一门，用与集市同样的方法夺取，因为大炮太笨重，不便行军，就未搬走。在船长身上又搜获了德制手枪一支，为这支手枪曾发生过小小争执。梁钟汉以

一支手枪起家，两小时前，处在危险之中，两小时以后，则有步枪 33 支、手枪 2 支，可说是旗开得胜了。

大家忙了近半夜，乃趁天还未亮，急走至天门境内乾镇驿，到后，急找商会说明不作军事行动，只请筹借军费 1 万元，须在下午 5 时以前交齐。成员们分三班轮值警卫，其余皆睡觉休息。5 时以前，军饷齐了，乃连夜建军，翌日天刚拂晓，即入天门县城，缴获了近百支步枪，弹药一批，同日午后又筹到了一部分军饷。县城人说，境内皂市驻有督促修路的正式军队一排，枪支弹药齐全，于是会议夺取之法和负责夺取之人，并宣布谁能夺取其全部枪弹，即另拨步枪 100 支，成立第一支队，负责夺取之人，即为第一支队长。陈蔚如当场自告奋勇，随挑选精壮 30 人，晚餐后出发，到达目的地，正值东方发白，仍然是壮汉潜至门卫身旁，以大刀威逼，夺取其枪支，随即全队拥入士兵卧室大喊缴枪免杀，乃于士兵梦中惊醒之际，缴获其全部枪、弹。在迫缴枪、弹时，排长乘机逃跑。收枪以后，发现有保险铁柜，士兵说内储有新发下来的饷银。砸毁铁柜，获得了 200 余元现洋，还有不少的纸币，除当时发给少数不愿加入革命阵营的士兵路费而外，均连枪、弹携回天门县城。回县城后，即印委陈蔚如为第一支队队长，就此就成立为有组织的武装部队。

在天门驻扎四天，一方面拟订成军后整个的编制和作战步骤，一方面在附近地区收集枪械。在收集枪械的工作中，值得记叙的是仙桃镇之役。军阀在仙桃镇驻有步兵一营，营部驻江西会馆，另分 5 个小据点。驻天门的第三日下午 4 时左右，分五批三路共计 70 人，向北路出发。战斗开始是在下半夜，按其驻地分为 6 个小组，以包围形式，先掩杀其步哨兵，继捣毁其营部。包围战的各点中，有缴获全部枪械的，也有未尽缴获的，不到 3 小时，即已结束。检查战利品，计有步枪 255 支、马枪 6 支、手提机关枪 9 支、手枪 5 支。其时河下泊有炮船两只，本拟在结束陆

战后迫其交出全船装备，谁料他们乘梁军不备时，已起碇逃跑远去了，乃收容倾向革命的民众 200 余人。

### 三、湖北靖国军联军的组成

梁军返回天门县城住了四天之后，在第五日移驻沙洋刘（英）、张两军已先在此，王军亦派有代表，乃举行会议，商量四军如何联系，如何分路阻击，如何保持和扩大武装力量等问题。经决定组织湖北靖国联军，按照当时的人枪，推王任第一军司令，梁、刘、张分任第二、三、四各军司令，王军由北而南，再转向西，其余三军，分途西去。关于作战方案，计分五点：1. 占领未驻北军之地，或夺占驻少数北军的地点和器械；2. 收集各地团队人枪；3. 联合夺占重要城镇；4. 抵守军事要地。5. 与荆襄两军取得适当联系，以期前后夹攻，粉碎敌军。靖国联军组成后，梁军遂西向到远安洋坪镇。在第二年元宵节后，捷报称五军李让卿部夺占了荆门县城，乃计划前后协守，刚至石马槽（当阳），据报李已撤出，遂转清溪河观察变化情况。驻清溪河时，探知王军参谋长蔡仁斋领队去东巩（南漳）搜索武器，梁乃坚请我也回去组织实力，我即带同南漳籍副官王永康回乡进行工作。

回乡后，一面查询附近乡村私人枪支，一面与峡口百福头巡检司（均属南漳）一带会党头人简必正密商。其时洋坪驻有北军，以上各地及我的住家处所，都逼近洋坪，行动决不能张扬。与简密商事件是如何收集枪械，如何集中人枪及何时何地集中人枪，何时由何路行军，以及沿途食宿等等，均由简负责策划，我完全信托于他，他也慷慨承担了。至于我的本乡，因为蔡仁斋早已将人枪搜收无遗，经乡人建议，收黄莺枪制为罐子炮，建立炮队，其效力并不减于步枪。于是急招能制罐子炮的铁匠数名，就山沟深处日夜锤炼，制建了罐子炮四五十门，选其精巧的长筒炮

30尊。这种炮制法简单，将黄莺枪后膛锯去半边，成一个半缺口，另制长短粗细合式的罐子，每炮至少5个，装满弹药，安置缺口内，点火即爆发，炮身越长，射程越远，火力也越大，连装连发，最少可发5炮。此时简已搜收了步枪29支、盒子炮1支、六轮手枪2支，连同罐子炮，共计有武器62件，皆编为炮队大队，以王永康代大队长，下分三个小队，每小队有炮10门、枪9支，官兵一共120人。因为不能在当地筹饷，沿途给养问题，早经打算由各处会党头人妥为安置，并先行知照去了。大队出发时，简派其得力弟兄冯子衡作前导，冯持着小铜牌，循大山的小径，按预定的时刻、地点前进，大队亦皆尾随而行，饮食供应极为周到。路程约二百一二十里，急行军一天又半就到达目的地了。

#### 四、进攻宜昌的战役

各军在荷花店（远安）、分厢（宜昌）会合时，估计北军追踪我方荆襄两大部队，重军配备在宜昌以上的大江南北两岸，城内防务必然单薄，计划分两路攻夺宜昌城寨。王、梁实力较厚，担任猛攻北门，刘、张实力较弱，担任扰乱东门，兼及南门，并先期半日作时援时急的行动，以减少敌人在北门的防御力量。子夜开始，热烈战斗未到两小时，眼看将要攻破北门，得急报刘、张已溃不成军，敌人又在北门猛加火力，出城反攻，不得已，被逼退走小溪塔，而王军未知何时退出战场。敌人迫近梁部，喊问答称王军，细看始知并非友军，遂急向西方退避。由于不明地势，误入西河沿岸的狭道，乃决定步兵先行，炮兵殿后，俟敌逼近，即发排炮抵御，连发三排炮，敌军稍稍后撤，步兵完全渡过狭河后，又占据高山，以步枪掩护炮兵安全退到对岸。炮队两人共抬一炮，动作比较迟缓，西退时，分作三队，除以枪掩护外，中间一队急行，左右两队缓行，随退随发炮防御，第一队到了对

岸半山，又以炮火猛轰敌阵，因而炮队全部人枪安全通过，未有损失。

### 五、湖北靖国联军的破裂

宜昌战役失败后，突然发生不幸事件，即王军预谋吞噬友军，在西河支流乌沱河狭路地方唆使第一支队长陈蔚如、参谋钱东藩率队背叛，并鸣枪威胁其他支队及警卫营全部归附王军，在最紧急时，由警卫营长程庆之统率迎战，炮队也选好阵地，准备向王军炮轰，因为梁的制止，遂未开炮。旋梁高声责备王的不义行动，并向自己部队官兵声明说：革命是大家的事，也是各个人的志愿，凡不愿意跟梁某者均听其自便，程营长也不要对战了。经过这一次演变，第一支队全部，其他各队小部均投入王军，检点全军损失人枪已过半数。事后探悉，第三、四两军残部，早经王军鲸吞，已分编到王的各支队之内，从此，湖北靖国联军已名存实亡。此后王军退过乌沱河中小集市，梁军退守大江北岸的罗田溪，中间缺少联系，在策略方面，殊为不利。罗田溪下游即是南沱溪，敌军驻南沱溪，相隔只是一条横山。先是我占横山高处，每日作间断的枪战，彼此都无进展。第三日清晨，敌忽开机枪，我也还以罐子炮，卒因实力不敌，我遂放弃了高处阵地；敌军居高临下，其炮火已能迫近我方司令部，幸而有罐子炮作防御，得以保持山脚阵线。原来南沱溪的侧面是一座高山，名天柱山，敌在高山上装有大炮，又设有瞭望台，不仅可以瞭望江北的罗田溪，还可以瞭望江南岸。南岸的革命队伍是黎天才部颜得胜团，装备胜过北岸梁部十倍。敌计划先在南岸得手，然后才在北岸动作，所以梁军能暂时稳住罗田溪阵线。今敌忽急行进攻，料是南岸已经失败，情势危险，不得不作后撤的准备，业经部署就绪，只是未发行军命令。

## 六、进攻南沱溪小胜

三月十四日（阴历）敌军炮队占领了山顶，梁军准备于下午5时后撤，忽接滇军靖国军第八军军长叶荃自黄陵矶（三斗坪附近）来电话，嘱暂坚守原阵地，他明晨率全军进攻南沱溪，于是又满怀胜利信心地改变后退计划。翌晨6时以前，叶的前敌指挥官向岩领前锋部队先到，叶本人率全军陆续到达，认为梁的实力单薄，拨给大炮两门、水机关枪两挺、洋抬枪20支，在一小时内，即颁发战斗序列。叶自任右翼，梁任中路，王位左翼，猛烈进攻，夺取了罗田、南沱两溪中的高山阵地，敌全部退出南沱溪集市，退到天柱山周围去了。叶乃马上变更阵形，11时以后，叶主持中路，梁担任右路，王仍然左路。梁以高山上晒席坪为司令台，暂停开火以伺敌军动作。敌军见梁军的军旗以为有懈可击，遂大胆下山，大约是两团的兵力。梁静守不动，敌乃乘小船四只（每船约一班人）强渡溪口作尖兵，梁仍不动，任其已渡溪口的尖兵深入，敌意梁军怯战，又号大船十数只，拟于强渡溪口后，大举猛扑。梁俟大船行至半渡，即吹起冲锋号，一面以步枪配合罐子炮冲下山，消灭其尖兵，一面以大炮、机关枪、洋抬枪照准大船开火。敌见我炮火炽烈，急将船头下放，不意大雨后，溪水冲力过激，洄流又将大船漩回，结果，多数大船都被击沉至江底去了。是役计在山边活捉敌人32名，获长短枪30支，子弹齐全，打毁打沉大船14只。叶军长即计划夺取天柱山：（1）八军的第一师附炮兵一营，协助梁军进驻南沱溪集市，炮兵阵地即驻晒席坪背后山上，防敌反攻；（2）八军的第二师全部及第三师的一部分，附炮兵两营、机关枪一营，随同叶本人进攻天柱山西坡一带小山头，务必夺取小山头的炮兵阵地；（3）王军全部坚守天柱山北边的陡坡地带，防敌偷下山地扰乱我军的后方；（4）八军第三师的另一部分附手提机关枪一连，作为机动部队往来三

处；（5）开放天柱山的东面，一则使敌有路可逃，一则避免我军激战的伤亡。预计此布置，天柱山的攻夺战，已是胜利在握，取宜昌城乃是指间事耳。谁料不久，忽又接到总部电称归州危急，总部即迁入四川，至此，就不得不急行撤退了。

## 七、向四川撤退的情况

南沱溪战役小胜的第二天，上午4时，叶军分作先头部队和殿后部队两股，并分沿江岸与穿山道两路西行，梁军亦随先头部队循山径西撤。在香溪（兴山）的对面，是个悬崖陡壁的深沟，因为连日大雨，沟道水深丈余，人马都只能在险路上行进，叶军运饷械的骡马，坠入崖下深沟者不少。士兵经此，苦则苦矣，但勇气并未因是而少衰，不过偶然听到“大将无才，小兵遭殃”之息声耳。事后在四川奉节见到黎天才的秘书长赵雄群（钟祥人，国民党的老党员），听他说，大荒口是过归州的要隘，他曾建议以重兵驻防，却不为参谋长等所重视；敌之逼攻归州城，就是先占据这个要隘，乘虚而入。行军中有人称述叶军人马虽分，但纪律很严，每逢宿营，除遇有庙宇以宿少数人员而外，余均选择大树下作营地，狂风暴雨，不稍顾及。如梁部等随行部队，也就自然地仿效其作风，非奉主官命令必须与当地居民接洽，不能进入民家也。

在香溪沿兴山县河而上至归坪，欢迎我军的人，咸道南军辛苦了，并争送茶水；一种箪食壶浆的热忱，令人振奋不已。过了归坪，再到龚家桥（归州），其情形则大大不同。该地本属干沟旱地，但散居的人户，只次于归坪，却一个人影也不见。私心以为奇怪，自说乡人太胆小了。再往前走，仍不见人，偶尔发现山林中露出一两个人影。及至与四川巫山交界地方，突见一人家门口，横陈刑具死尸，这才省悟到不是乡人胆小，更不是乡人不喜欢南军，必是有坏人故意扰害地方，所以人都避而远之。到巫山

后，听说西撤时，某某客军在叶军之前先行，军纪不好，叫人不能安其居，居民也就不得不作逃避之计了。如此军队，还称革命军，究竟革什么呢？梁军于西撤时，曾在巴东巫山交界的火峰，有过一次激烈的战斗。梁亲身作战，敌人居高临下，炮火猛烈，罐子炮不能发生作用，步枪更无能为力，节节退却，节节失败，几乎全军覆没。叶军决定由巫溪进入陕西，拟与于右任（驻三原县）率领的陕西靖国军联合，梁未随往，只是王安澜的全部随去了。在巫山时，传闻入陕军先顺利占领了兴安，占领不久，敌军大部队赶来围攻，又遭受很大的损失，王安澜军几至于全部消灭。

## 八、建始的失陷和收复

梁到巫山后，人员不足一百，枪械更少不堪言，都次第编入黎天才的军政各机构中，不愿受编者，则发给少数旅费，听其自便。我曾充任刘公北伐左军（武昌首义后刘驻军襄阳的番号）的部员，时值刘在建始设军事司令部，乃径赴建始县城。刘接见众人的第一次，就说：“现在驻鄂西的靖国军各部，武力都很有限，计划也欠周详，我的旧部将林鹏飞带领枪兵三千，附有过山炮机关枪等，驻防高店子一带最前线，他的勇猛，是人所共知的，尤其是你们所熟知的；建始与川边接壤，是施南全府的门户，没有建始，施南各县是不巩固的，我坐镇此城，用意所在，就是要保卫各军，我的军事番号定为鄂西靖国各军总司令，就是这个道理。”又说：“现在参谋长人才最缺乏，我自愿任参谋总长职，以马木良为参谋主任，以资助理。”我在建始住了三天，已知林鹏飞只有人枪三百，饷粮极困难。又查知北门外有百步梯险道，沿百步梯而东西，皆是高地，南门又有极狭的甬道。百步梯附近全无守兵，司令部深居洼地，等于坐在锅底，形势最为不利，但是不好向他进言，因为他是只许人家说好话的人，我也就隐忍不发

了。

第三日下午 1 时许，谍报传来林鹏飞叛变的消息，刘不信，反大骂谍报员。时马木良在座，即抽身出来与大家商议，乃密派参谋副官数人再去侦察实在情形。回报说，已到百步梯，林在前队，北军继后，声势浩大，似在布置直掩县城之阵；于是急报刘，请示如何抵御。刘身边仅有卫队 30 人，枪身与枪弹也都不太适合，当然无法抵御，只好一声口令走吧（民国 7 年端午节后），急出南门向柏杨坝（恩施）大道而行。柏杨坝是去恩施的大道，已到柏杨坝了，没有看见恩施来人欢迎，刘私计到恩施不妙，乃折而西向，径由杉木坝、尹家坝直到四川界上的太阳河，以为熊克武是辛亥革命的老友，去依他，或可能取得一些帮助（曾向部众这样说）。但是随行闲员太多，给养成大问题，遂又迟迟不急行。由于刘一向大言不惭，驻在恩施的唐克明，正幸其蒙受灾难，毫不作丝毫的照顾。时章太炎在恩施，知道个中情形后，就公开大骂唐克明是破坏革命的怪种；唐在被骂不堪的情势下，才派人去太阳河迎接刘回驻恩施。建始是施南全府的大门，是恩施县的后路，又是崔坝防御线的左翼要冲，负崔坝防御线总指挥重任的人，当然不可能忽视这个骤变。总指挥柏文蔚一得到噩耗，即派遣大队，浩浩荡荡地由正面进军，扬言即日收复建始县城，又另选精干少数人枪由小路急行，抄袭敌后，乘其不备，未满三日，就将建始收复，并夺获了无数的战利品。暂时失去的县城，迅又回到革命军手中，成为鄂西靖国军的坚固堡垒了。

## 九、蔡济民军的成立与失败

蔡济民军番号是鄂西靖国军，蔡任总司令，牟鸿勋任副司令，根据地是利川县。先是牟在川边联络有伍锡爵、孙锡光两个实力派（都是袍哥头脑），响应护法军事，在利川成立了军事机构；但未正式建立起编制，也没有严格的上下之间的纪律。第一

年的冬天，要在武穴、广济约同驻军冯玉祥举义失败，乃西奔至利川。蔡是武昌首义的老友，于是欣然合作，自民国七年（1918年）初，即正式建立起鄂西靖国军。正式建军后，关于军旅的制度纪律等等，也都逐步地规定并见诸实施。伍、孙等不习惯正式的军规，又因饷源不够充足，不能满足其欲望，遂相继脱离关系而去。受编制为正式部队的，有左路司令胡金桥部，他有汉阳造步枪近1000支，另有杂牌枪约300支，手提机关枪十数支，机炮两门，实力超过其他部队。另有辎重兵一营，马队一营，还有不满两百或一百人枪的营三个单位，到必要时，当然可以组合为团或支队，对敌作战。此外，又有卫队营，分内外两大队，负责守卫司令部的大门二门卫兵持有的枪支多是不能使用的，只是平时还可壮声势。以上是固定的武装实际情况。在时局动荡之际，不免有投机分子，借助少数武器，作为进身之阶的。曾亲眼看到数起自称有相当实力，要求编为一个支队或一个梯团，以便参加革命者，等骗到了名义，领到了军饷以后，就又乘机哗变而逃了。他们是饥依饱扬的骗子手，叫他们同心协力地做革命工作，是样样靠不住的。蔡牟两人都已看清楚了这一点，乃决定自行制械扩军。当时看到川军的武器，多是九子连的独子枪，独子枪易于制造，于是开设兵工厂，自己制造九子连枪和洋抬枪。中秋节前兵工厂建立起来了，分为炼钢、造枪、制弹三个部门。九子连枪号称九子连放，土法制造的枪一般只能发放六颗子弹，多则炸毁枪身。由于钢的不纯，影响到枪的质量，兵工厂负责人，审知其原因，就特别注意炼钢的火功，所造的九子连，就不止放六响，甚至有能放响九颗子弹的，员工们皆信心百倍地精益求精，总副司令也喜出望外。继兵工厂之后，又开设造币厂鼓铸铜元，与军用票币并行于市面，军民咸称便利。仅是本地现金，还不敷运用，又设立土产公司，帮助人民收茶、制茶、运茶、割漆、制漆，也提倡了种烟事业，乃大大地展开了金融活动。利川一向是

穷苦县份，经过此番建设，就变成欣欣向荣的地区了。

俗语说：“一家饱满千家怨”，因此，就惹人垂涎起来，而蔡军的失败，也就因此而种下了祸根。驻恩施的唐克明，原不是真诚的革命者，他的部下，有许多人向慕蔡的声誉，他早知道，已把蔡看作眼中钉；今见利川建设得很好，是一块肥肉，他更想贪图这个地盘，但不敢直接来冒犯蔡。恰好驻利川的川军方化南，因种种事件与蔡不睦：（1）蔡常言方是黄复生的部下，我是黄的老友，也就等于是我的部下，事实上在许多方面，也就把方看作自己的部属了；（2）方部执笔人较少，往往为某些小事，蔡部去信责备他，他总是派人来道歉，此等事情不止一次两次。有一次蔡部秘书长深夜回家，经过方部门口，卫兵喊问口令，不知，从人说：总部秘书长，又问特别口令，仍不能答，卫兵就批评了他。翌晨秘书长到部，叫我写信指责他。我说门卫执行任务，是正当的，我们总是要笔头，设若一旦把他逼急了，还我一个枪头，那就不好办了。当时或者有人还不赞同我的说法，孰知他终于被唐克明利用，破坏革命阵营，并杀害革命党人。方是狡诈之徒，在逼蔡总部战役中，他避不出面，事先与县外张姓土匪联系，纵令人城直扑蔡部。他的司令部与蔡部只隔一墙，门外则散放步哨，门内则强占墙头，声言作防御，实则是帮助搜查破坏。他的墙头守兵开枪打死、打伤之蔡部人员，就不止三数人。企图逃脱罪名，也是逃脱不了的。

蔡部对变故不是完全不知。在出事的若干日以前，早经截获有唐方二人勾结的密电，崔坝柏文蔚总指挥也有不少揭发唐氏阴谋的专电（密电系我经管），已在计议如何和平结束这项公案，不过尚未到适当的成熟时期。适蔡在重庆参加唐继尧主持的军事会议之后返部，随身带回了川造银洋数万元。方与匪见财眼开，就想乘机动作，惟畏左路司令的实力，未敢轻易动手，毕竟情形是万分危险的。这时黎天才也知道了个中情况，派有代表叶鉴古

等，从事调停，蔡部高级人员也参加会商解决办法。有人主张先行动手扑灭城外的土匪，左路司令部的侯参谋长主张尤力。蔡以为若果先行动手，他们（方与匪）势必合力抵抗，难免波及人民；并认为涉及川军，就是斗争胜利了，开罪于川军，以后就无法相处。最后乃毅然决然地作让出地盘的策略，下令左路司令先退，表示诚意。左路司令出发才半日，方即放匪入城，一匪从西门进城，西门是方部的警卫岗地。匪攻蔡部大门，黎的调停代表们还在部里进早餐，蔡仓促从侧门（新开的洞门）逃出，仍袭武穴失败的故智，藏身于古庙横匾中。方是习闻武穴出险情况的，唆使匪向各古庙横匾搜索，蔡知躲藏不住，又急向方司令部跑，不等进入大门，匪即迅从蔡的后脑发枪，以致武昌首义的革命功臣，突然横尸于方化南的司令部门口了（民国 8 年 2 月初即阴历腊月二十七日）。副司令牟鸿勋则全身投入大粪坑中，幸免于难。事后大家议论，假若不叫左路司令开走，方等必不敢动手，又若蔡不顾革命感情或波及无辜居民，先行动手，只说剿匪，避开涉及方部，以左路司令的优势兵力，乘黎的调停代表在场的大好形势，方也是无法与匪合作的。无奈蔡过于自信仁厚，而其左右，除侯参谋长当场力争，其他人都是一筹莫展，一言不发。蔡军失败以后，其参谋长、秘书长等走见柏文蔚总指挥，柏于悲痛之际，遂大声责骂他们是一群无能之辈。这样的责骂，确实是正当的。

## 十、吴醒汉的民众武装

据过去来凤县人的了解，吴部人枪不满 200，号称 500。枪皆是来凤县原来的团防武器，执枪的人，也是原有的兵丁，只有少数参谋副官教练等人，是随吴自武汉附近各地来的。分为三个大队，大队长由民众推选，司令部加委；大队长以下各职官，由士兵推选，大队长认可，呈报司令部备案。每大队置教练官一至

二人，由司令部选派，一般的职权，与大队长同，但不能下攻战或移动命令。这样组织，这种精神，实权完全掌握在民众手里，乃是真正的民众武装。他虽兵力单薄，又在遥远小县，与湖南龙山友军相处最好，不但互不侵犯，而且得互相守望之效。其内部如此团结，友邻如此融洽，故能以最少的武装，建立为靖国军的一个部分。蔡与吴为武昌首义的老同志，几番派人商请合作冀求壮大革命阵营，却没有结果；由于实际环境不许可，或非吴之本意也。他的部队未曾参加崔坝前线，只是派参谋副官等常到总指挥部联络而已。

## 十一、崔坝前线情况

鄂西诸县，是湖北省未遭受军阀蹂躏的一小块干净土，也是进入四川的前门，无论为人民为军事，均需坚强地保卫它。时云集在鄂西与川边的靖国军很多，除鄂军各部外，还有川军、豫军等等。在大江南北岸，地势最险要，由川军负防御全责。崔坝居恩施县的东偏，左接江岸防线，右邻湘西各县，其对面就是军阀部队的关口高店子等重兵所在地，形势至属扼要。若敌军突破其地，势将长驱直入，不但鄂西诸县有卷入敌手的危险，湘西也不得安宁，四川自奉节以下，皆落入敌包围圈以内了。其时在安徽首先响应武昌首义之柏文蔚将军，也到了川鄂边地，于是公同计议组织鄂川豫联军总指挥部，并公推柏任前敌总指挥，即以崔坝为总指挥部驻在地。在前线的部队，有唐克明、黎天才、王安澜（是在兴安失败以后的残部）、蔡济民、方化南、王天纵等六个部分，共约 12000 人枪。其中唐克明部较多，名义上是两个师，蔡部一营，每月更番轮值，意在实地训练战术。吴醒汉部未有去兵，只派有联络人员。战地的部署是：各部的番号不变，但不能单独守一阵地，甲部中必参错乙部或丙部一部分，由总指挥部派员统一指挥。各阵地指挥员，不断地巡查敌情和官兵勤务，总指

挥和参谋等也每日巡视阵地，了解敌情，序列正为紧严。某日之夕，敌军集结大队，企图强渡横河小桥，柏总指挥正巡视到此，情急无法，乃挺立桥头，高声喊叫：“咱老子是柏文蔚，不怕死的小子们，过来受死吧！”并未发一枪一炮，敌人遂迅速离开桥遁引去了。这样的突变情况，不外两个因素：第一，柏总以奇计迅速收复建始，使敌损失惨重，这种挫折，记忆犹新，意想柏是宿将，单身骂阵，必是另有埋伏，惊弓之鸟，当然不敢再行冒险；第二，敌军是吴光新的部队，吴为安徽人，柏是安徽的前辈，自惴智谋不能与他相比，声誉也远不相及，部队中官兵多安徽人，诚心崇拜柏之为人者不在少数，万一过桥后，发生倒戈现象，反而大大地不利。由于此两个因素，只好以龟缩为上策。其实柏在当时并没有什么预定奇谋，完全是万不得已的一种行险动作。北伐战争时期，他追述这桩公案说：虽然把敌人喝退了，毕竟是不足为训的事情。

## 十二、最后的话

正文写完了，最后需要说几句话：

第一，靖国军是孙中山认可的军事组织，其参谋总长孔庚，就是孙所派任的。在广东，胡汉民等硬加孔以叛逆参谋长的头衔；在国民党统一全国以后，陈立夫等又说靖国军不是革命的；影响所及，湖北就有人说梁钟汉是一个土匪之流。这是很不公正的。试想响应护法政府号召而组织靖国军军事机构，建立靖国军武装部队，它不是为护法，难道是替北洋军阀帮凶吗？时间过久了，实在情况忘记了，以假乱真，是历史的耻辱，不得不澄清之。

第二，湖北靖国军的成分有两种：一是驻荆襄的原有师旅，一是革命党人组织的民众武装。原有师旅的领导人物如黎天才、唐克明等，染受军阀的习气甚深，接受革命的洗礼至微；其通电

独立的目的，是企图借势要挟升官晋爵，对于解除人民痛苦，是做梦也想不到的事。因此，在起义之初，就有暗杀阙龙计杀季雨霖的事实，退到鄂西，又有对刘公失守建始抱幸灾乐祸的态度，对蔡济民整军经武作夺占杀害的行动。

第三，民众武装的个别领导人，也有野心勃勃和不顾人民的表现，即破坏了团结，又违反了革命目的，等于是军阀的伙伴，怎能配称为革命军呢？王安澜是湖北靖国联军（包括四个民众武装）的第一军司令，对于其他三军，应当视为亲弟兄一般，为什么在宜昌战役中，乘刘、张溃不成军之际，将他们的人枪鲸吞了呢？又为什么退小溪塔时，默不作声地暗中先行，有意叫梁军困于敌军包围圈呢？又为什么逼在狭路上，唆使梁军部将鸣枪背叛投入自己部队之中呢？这样的行动，任何人皆知其是破坏革命的行为，退一步说，也是不知革命意义的行为。若客军某某部一贯敌视军阀，不受军阀的利诱，是其所长；但是部众很多，训练缺乏，以为打倒军阀是革命的专业，至于为什么要打倒军阀，军阀与人民的矛盾安在，他们平时都欠研究。他们忽略了这一点，对于革命的意义，可以说还不太理解，虽未存心以人民为革命对象，却不知注意人民的生活，因而在无意的行动中，就间或扰害了人民的生活，成为军阀的帮手。

第四，刘公、蔡济民二人，本是武昌首义的功臣，在做人治事方面，自应时时谨慎，不能以求全之心责人，更不能以自满之心待己，谦冲为怀，力求进步，才是正理。乃皆忽视老子常处人下之训，夸张放言，自取失败，君子责备贤者，不能尽归罪于他人也。

第五，革命事业，当然有一定的目的；欲达此目的，有赖于方法，更有赖于执行方法的人，就是人的思想问题。若是思想不纯正，或欠高尚，必然要演出诸种不同的意外变化。我认为革命的基本工作是教育，只要培植好了革命人才，他自必在组织上力

求团结，在行动上重视人民生活，也自必刻苦钻研，虚怀若谷地集思广益，豁达大度地运用众力，纵不能说具有引力之功，毕竟可以掌握必胜之权也。

第六，这篇纪实文字，着重在写民众武装，对于荆襄原来的师旅有时曾提及到一二事，因为是与民众武装发生了关系，不是以它们为主题的。滇军叶荃，在前线与民众武装共同作战，他帮助梁军，布置阵地，以至击退敌军等等，皆是亲眼所见亲身经历的事实，应在必须提叙之列。民众武装各部的情况，目见者，或负责人告知者，写得较详；耳闻者，写得较略。至于是非，决不敢故存我见；如刘、蔡二公是我一向敬重的人，他们皆由自伐居功而招失败，行文时，并不稍作丝毫护短之曲笔也。

（1964年）

## 靖国军在鄂西的活动与鄂西神兵

胡 复 \*

我自荆州独立、靖国军成立时起，一直到鄂西靖国军完全瓦解之日止，始终参与其事，特就我能记忆的复述于下。

### 一、湖北靖国军的产生

先是张勋复辟，黎元洪退位后，在北京供职的鄂省首义军官们，纷纷南下。在武昌首义之时新编的第六标标统胡建军正在陆军部供职，因黎元洪面囑回鄂发动讨逆，即持黎元洪的信件，返省后，先到荆州与其族侄驻军团长胡廷佐等密商，又转赴襄阳，并将黎元洪写给襄阳镇守使黎天才的信面交，共商响应护法。但因黎天才部原系援鄂的滇军，坚持要参加云南唐继尧的靖国军，当时为着荆襄能够同时独立起见，乃改变计划，决定参加靖国军。即以荆州军为湖北靖国军第一军，由原师长石星川担任总司令；襄阳军为湖北靖国军第二军，由原镇守使黎天才担任总司令，并推黎天才担任湖北靖国军联军总司令。当胡到襄阳活动时，事闻于鄂督王占元，曾电黎天才防范并捕送来省。黎遂一面嘱胡先走，一面电复王占元说经查胡已离襄。

胡返汉口法租界后，即将在襄阳接洽经过，通知荆州驻军，遂于1917年11月1日宣布荆州自主。王占元异常惶恐，移住军舰，曾派督署军法处长程汉卿（鄂城县人，与胡廷佐有亲戚关系）赴荆接洽取消独立，许以恢复鄂军三个师和一个旅，并补足枪械。但辛亥首义将领唐克明、江炳灵和国会议员韩玉辰、省会

\* 作者时任鄂西高等兼地方分庭检察长。

议员胡志民以及杨爱棠等咸集在座，坚决拒绝，因未中计。嗣以襄阳方面迟未同时宣布独立，乃推派唐克明赴襄催促。同月7日，襄阳宣布独立，声势浩大，全国震惊。实则该师刘佐龙一旅驻在黄州地带，事前未能集合，隔绝不通，而荆州只朱兆熊一旅，且多缺额，枪械不全，兵力单薄。适值北军吴光新部一团，由川东撤退，分乘民船经宜过荆，当被靖国军第一军第二梯团参谋长张笃伦率兵截击，全军缴械，增强实力不少。又有豫南镇守使王天纵，因在河南独立失败后，只身来荆，号召残部集合，经由南阳转趋襄樊一带。在荆州由江炳灵计划组成靖国军豫军总司令部，由王天纵任总司令，江炳灵任参谋长，同赴襄阳接收部队，阵容益振。

当靖国军荆州方面决定军事动员之先，曾和襄阳方面商谈一致行动。因接受黎天才的建议，主张先行打通后路，攻占宜昌期与川滇两省联成一气。既未能长驱东下，直捣武汉，同黄州刘佐龙旅夹攻，已经失策；又为着等候襄阳正式宣布自主，迟了7天，才开始行动，耽误时机，便利了北军。吴光新部由川东回军宜昌布防，虽然靖国军的攻势，节节胜利，北军大败，到了夕阳西下，攻到宜昌北门外东山寺的山脚下时，前锋梯团长胡廷佐身穿黄呢红缎里子大衣，从东向西前进，日光反射，暴露明显目标，致被北军留下掩护退却的一挺机关枪扫射中弹倒下，抢救下阵后，旋即身死。所部营长黄继超也中弹阵亡。师长朱兆熊不知虚实，但见自己的团营长伤亡，仓皇失措，不敢乘胜挥军继进，反乘坐掩护进攻的楚材兵舰，顺流逃返荆州，遂致全军尽溃。而北军见攻势凶猛，兵临城下，也全部向远安县溃败，宜昌遂成为一座空城。隔日北军闻悉荆州靖国军并没有进城，始重返宜昌。

当靖国军师长朱兆熊独乘兵舰先逃后，军中无主，随军参赞胡廷翼在前线尽力收容，遂继任梯团长之职。随又重新整编，以刘佐龙为第一师长，但刘和其第一二旅长均未到任，仍以朱兆熊

为第二师长，胡廷翼为第三旅长，傅楚才为第四旅长。

本来荆州独立自主，并非师长石星川、团长傅楚才等的意愿，只因大势所趋，被部下旅长朱兆熊的团长胡廷佐等所逼迫，不得不尔。现见主力军伤亡，更加动摇，想接受王占元提出过的条件取消独立。但被特来沙市谋夺兵权的湘西督办李书城部参谋长何成濬所识破，终日在沙市对朱兆熊说：“你千万不要进江陵县城到总司令部去参加任何会议，恐被石星川将荆州独立责任，推卸在你和胡廷佐两人的头上。现在胡已死了，石可能把你捕杀，宣布取消独立，向王占元献功。为今之计，只有设法统帅所部大军转移湘西，一则可免受宜昌吴光新部和武汉王占元部的夹攻；二则可以脱离石星川暗害的危险，方保万全。”朱因此有半月之久不敢进城，乃与何定计，自告奋勇，诡称二次大举攻宜，实则是动员军队转移湘西，比及向宜昌方面开拔，刚与北军接触，朱即率卫队一连，突然退走，于是冲动了大队，跟踪溃败，遂按照原计划，命令全军退湘，并率先渡江等待。

朱原想何成濬能够继任总司令，可以到湘同何通力合作。何朱等原预计石星川和王占元既有勾结，决不愿意随军流窜，荆州靖国军的将领一定会拥何继任总司令之职。石星川虽确不愿干，而副总司令唐克明由襄阳突回到荆州，愿随军撤退，继任其职。因为荆州军队原属唐克明的旧部，当然拥唐以副升正，并不拥何。朱兆熊只好单独出走，脱离部队。何成濬乃乘兵败混乱之际，拿出钱来，交给靖国军的连长夏斗寅收集败兵和枪械，共得400余支，装运过江，到达公安县境江岸黄金口时，突被援鄂湘军张学济部拦截，只准一兵拿走一枪，其余多的留给他们兵多枪少的部队使用。正在交涉间，靖国军旅长胡廷翼在沙市办理善后完竣率领大队赶到，命令开枪制止，始免劫走，唐克明旋也带同总部人员到达南岸。

何成濬谋夺全军，既未能如愿，乃向胡廷翼建议，将夏斗寅

收运来的枪支全部给夏，并提升夏为团长，后又运动夏团脱离唐部擅自开赴湘西。唐愤何煽动军队，曾在公安设下鸿门宴企图杀何，卒因胡廷翼与何友善，率兵将何从席间护走。唐因此对胡亦大为不满，又因与何决裂，并疑何胡联合，恐遭暗算，不敢开往湘西，遂坚决要求胡部一同转移鄂西，且战且走，终获到达鄂西，乃占领施鹤七属。此即湖北靖国军的产生和到达鄂西经过的大概情形。

## 二、靖国军在鄂西的活动

湖北靖国军第一军在荆州失败后，除夏斗寅一团受何成濬运动开赴湘西，由于在湘的多数鄂人坚持不让改编受湘西督办李书城统辖，主张成立鄂军独立团外，其余全部军官撤退鄂西，驻扎地点是：总司令唐克明的总部驻在旧施南府城内，其第一师长兼前敌指挥胡廷翼驻在恩施县属崔家坝和建始县属红岩寺一带，第二师长李德三驻在恩施县和宣恩县一带，第三师长吴醒汉驻在来凤县、五峰和鹤峰州一带，旅长易继春驻在花果坪一带，总共步枪不过数千支，机关枪 5 挺，土炮十数尊。

此外还有湖北护法军总司令蔡济民一军驻在利川县一带，王安澜一军驻扎建始边区一带，游击司令关克威和杜邦俊部驻在七里坪一带，刘英部驻在巴东县属楠木园一带，并有援鄂川军方化南一军也驻在利川县一带，其参谋长蓝文蔚则率领川军一部分驻在前线三里坝地方。至于湖北靖国军第二军兼靖国联军总司令黎天才和豫军总司令王天纵等部，因为荆州失败，襄阳孤立难支，均经取道秭归地区退到四川夔府、云阳和巫山一带，与鄂西靖国第一军等部互成掎角之势，而豫军总部参谋长江炳灵则改调鄂西靖国第一军总部参谋长，此即靖国军在鄂西和川东活动的情形。

施鹤七属自明清以来绝未见过兵端，虽经乾隆时改土归流，土司残余仍多存在。当地保长、甲长都设置有桌案和签筒笔架，

坐堂审案，拥有生杀予夺大权；自庚子事变、辛亥起义以来，都没有受到波及，因而许多京官遗老、富商大户，莫不视为世外桃源，来此避秦。该地土豪劣绅横行霸道，人民生活则异常困苦，劳动者工资每天不过40文。川东一带的难民多逃荒而来，替地主劳苦一生，不得一饱。靖国军到来对土豪劣绅的权威有所打击，保甲长坐堂审案受到制裁。并由于军队走私，贩运些布匹食盐和百货等进来，促进了与外界交通，贫民生活，也稍改善。

在政治方面，先后有些设施，派有代表杨爱棠、李基鸿在广东设立驻粤办事处，并呈准广州军政府成立鄂西民政处，任命胡志民为处长；成立鄂西财政处，任命李德三为处长；成立鄂西高等审判分庭，任命蒋东佛为审判长；成立鄂西地方审判分所，任命杨茂斋为审判长；成立鄂西高等检察分庭和地方检察分庭，任命胡复为高等兼地方分庭检察长，受理民刑案件。从此粗具军民分治规模，但缺少建设、教育和文化等机构，仍不能不是属于军事的类型。孙大元帅亲函嘉勉自主（函稿见民国十八年的《中央党务月刊》第11期特载栏内史料第6页），此系靖国军在鄂西活动好的方面。

不好的方面是军队庞杂，驻地分散，各自为政，互相排挤；又复骄奢逸乐，自我陶醉，上恬下嬉，夜郎自大，其中不少事例：

当年章太炎抱着很大的希望访问鄂西，因看不惯唐克明等骄傲自满，苦中作乐，曾提出劝告，唐不但不接受，反恼羞成怒，当在宴上拍案叫骂，要将章枪毙。章也厉声反击道：“你敢枪毙章某吗？连窃国大盗的袁世凯尚且不敢，在你们这个小小阴沟里翻得了船吗？”在座的军官们以他是“章疯子”，劝唐不必计较，才得了事。章在鄂西作客月余，经常下乡采访民风，临走时题赠对联一副，文曰：“去秭归不远，正端午来游”，又横匾一幅是“新亭努力”四字。唐不知道章是讽刺，反用楠木雕刻，高悬客

厅，后来经人解释：上联是指责我们和刘先主兵败秭归退到白帝城，终日饮酒作乐，相差不远；下联是说他来时正值五月五日，指斥我们同拒绝屈原忠言的楚怀王一样，只有灭亡一条路；横匾是明说，鄂人不图努力恢复中原，恰如新亭的楚囚对泣。唐乃将匾联立予毁弃，并深悔前时接受劝解没有将章枪毙，具见其腐败和狂妄之一斑。

靖国第一军和第二军虽属互为犄角，唇齿相依，但是意见分歧，各不相下。前者倾向于广东护法军，后者则仍倒向云南靖国军。鄂西巴东县籍高尚志（号固群，曾任辛亥起义时的师长）由粤到川转施，计划把靖国军改换旗号，直属广东领导，在奉节和黎天才商谈，但黎坚持不改。黎又恐高到施南后与第一军共图脱离靖国联军，单独改换护法军旗帜，遂于高氏兄弟由奉节渡江后，即派人于代溪将高氏兄弟杀害，从此一二两军的矛盾更加表面化了。

唐克明原要蔡济民接受他的指挥，蔡不同意，又为收回利川地盘增加税源，就不惜暗地勾结川军方化南谋害蔡济民。事前方托词回万县就医，由代理参谋长吴清熙乘参谋长蓝文蔚在前线三里坝防地未返之际，指使新收编的土匪钱某向利川县城进攻，蔡部猝不及防，致被击溃。蔡因躲避在县文庙的匾后里，卒被搜出，解到方军司令部，蔡刚一进门，即被吴令枪决。事后曾经蔡部苏成章、牟鸿勋、陈希智、姚干青等全体官佐通电声讨唐克明，指出唐方勾结，如果不是预有阴谋，一个客车的参谋长岂敢发动事变，并敢于仓促之间，不先请示擅自杀害当地主帅，不怕靖国军报复。而且川军乃是援军，给养自备，并不就地征税。蔡既被害，唐坐视不理，随即派员接收利川各地税捐机关。苏成章等的通电确有根据，因而得到各方面的支持，而唐部的三个师长和游击司令们，也大大不满唐所为，由是发动政变，驱唐下野，呈准云南唐继尧改派柏文蔚继任总司令之职。

此外鄂西靖国军内部互相残杀和互相排挤的，如杜邦俊袭击了中路前敌指挥部的参谋长夏一鸣，排挤了秘书杨经曲；甚至还隐藏有内奸张石庵，此人原系荆州军胡廷佐旧部营长，自荆州失败后，脱离部队，返回省城，经由石星川投靠王占元，后伪装赴施，受到退施张的旧部官佐欢迎，推任第一师部参谋长，其实张的在省家属，按月在王占元那里领取薪金。张因在前线经常煽惑军心，说是靖国军绝无前途，必须另谋出路。由于靖国军内部既多分裂，外部又来奸细颠覆，结果失败，决非偶然。

柏文蔚接任总司令不久，力图挽回颓势，一面整顿内部，改良政治，派员清理税捐发展经济；一面计划北伐，求得出路，并与北军驻在建始县属高店子前线的刘团长（刘系安徽籍，原属柏在皖时的旧部）接洽，使刘响应柏部。但由于靖国一二两军既已不睦，柏的威望比黎大，黎天才更恐尾大不掉，借口以鄂人领导鄂军，迭电唐继尧将柏撤换，改派川陕慰问使蓝天蔚继任。柏文蔚即在蓝尚未到任以前，取道湘西转粤，临走时对送行的官佐不胜慨叹地说：“我在革命阵营里，好像太平天国时代的石达开一样的命运，未及出师，功败垂成，望诸君努力奋斗，完成大举东下。”

蓝天蔚到任后，仍照柏的计划整军北伐，突然川滇形势恶化，祸起萧墙。川军熊克武、刘湘等部，为了摆脱唐继尧的控制，在纳溪一战，把滇军全部驱逐出境，而和鄂督王占元联合，遂把鄂西和川东等地的靖国军同云南滇军的联系割断，川鄂靖国军乃陷于绝境。首先是驻夔府、巫山和云阳的靖国第二军黎天才部受到川军围攻，不得不突围而走，绕道退回云南，其次是靖国豫军更不能在川境容身，又值该军总司令王天纵突患脑溢血病逝，群龙无首，当经商定归并鄂靖国第一军，随即全部转移到建始和恩施大吉场一带。大军既集，粮饷更难，蓝只得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在1921年元旦出兵，大举东下，孤注一掷，此即靖国

军在鄂西活动的大概情形。

### 三、鄂西“神兵”

#### 1. “神兵”的产生

施鹤七属当时即属土司残余，封建统治，民间迷信，特别严重。加之军队给养就地征集，首先是向官僚地主、富户绅商借垫，苛捐杂税，负担尤重，各地驻军复杂，纪律败坏，又复广种鸦片，粮食减产，同上层阶级恶感更深。而鄂督军署参谋长何佩熔原系建始县的最大的恶霸地主，商承王占元拿出重金，派遣宣恩、来凤和建始三县的省议会议员周之瀚等三人，名为回家探亲，实则各到所属地方，策动县众起来反抗驻军。而靖国军将领因为缺乏警惕性，并不知周等别有用心阴谋活动，反认为周等三人都是民意代表，予以便利，分令该属的县长特别招待，期望鄂人治鄂，团结一致支持北伐。其实周等三人各得重贿（例如周之瀚就得到5万元现金，曾在武昌首义路购置房产，并花费多金纳有一个女学生为妾），各回本县，得到自由行动，组织了“神兵”，起来驱逐靖国各军。

周之瀚系宣恩县人，号鹏程，曾经做过辛亥起义时候的内务部副部长，地方颇有势力。他找到了该县属黑狗洞地区一位神兵首领王锡九宣传。王声称替天行道，口念符咒，枪炮不伤；无知愚民，莫不附和，一时风起云涌，首先在宣恩县属下田坝地方向驻军李德三部的一营猛扑。该营因措手不及，全体溃败。神兵随即乘胜向施南府城的靖国军总司令部前进，大举攻城，相持一夜，卒被守军完全击溃。

再是来凤县方面的神兵声势浩大，竟把靖国第三师各地驻军打垮。师长吴醒汉身被神兵砍伤数刀，误以为死，弃置路旁，得被卫士救送湘西治愈，然手已残废。其秘书长姚干青以下的官佐

多被神兵杀害。

正当中路靖国军第一师长胡廷翼指挥前敌部队向建始县离店子进攻的时候，由于北军刘团长前与柏文蔚原有的联系中断，起而坚决抗拒。并值孙传芳师也由宜昌增援高店子。胡部虽已连战皆捷，攻破北军三道防线，占领了高店子右后方，终因前当强敌之冲，后有神兵之乱，弹尽粮绝，未能进展。正相持间，暗藏的内奸张石庵突然出面，号召部队缴械投降，军心动摇，胡遂兵败被俘，解赴武昌遇害。至于内奸张石庵返省后，则因得到鄂省王占元授任楚材兵舰舰长之职。

靖国军中路第一师既因北伐失败，左翼第三师也已被神兵击溃，右翼第二师长李德三见大势已去，不得不逃跑。王安澜部也因兵败，王本人被执解赴武昌释放。由川东转移来的靖国军豫军全部在大吉场被神兵击溃。关克威、刘英和杜邦俊等游击部队，或者被缴械，或者突围拖走，无一幸存。所以先后参加过靖国军的官佐，除了杨经曲、江炳灵、胡志民、蒋东佛、卢智泉、范鸿勋、杨茂斋、刘锡周、熊贞吉等早经离开了鄂西，我则在失败以后由当地天主教堂神父护走，得免于害外，其余则多被神兵不分皂白，搜杀殆尽。一般说来，现代任何战争失败方面的官兵，除阵亡外，多被资遣，而神兵对待靖国军的官佐士兵，则一概杀害。这不能不说这是靖国鄂军的最大惨剧。

鄂西靖国军全部崩溃后，总司令蓝天蔚认为不久前，曾以川鄂陕慰问使名义，受川省各地当局热烈欢迎，这次兵败，再行返川暂时避难，可无问题。遂即带领卫队十数人退经利川转到万县，不料当时川滇关系已经恶化，鄂西靖国军乃系滇军所属部队，因被熊克武将蓝的卫队缴械，并予以扣留，转解重庆。当蓝天蔚被解路过忠州时，其胞弟蓝文蔚的军队正驻扎在忠州一带，拟即派兵抢救出险，但蓝天蔚仍以解到重庆绝无危险，如果中途拦截，反为不便，不愿接受其弟请求。蓝到重庆不久，王占元派

傅楚才（傅原系荆州自主时候的靖国第一军第四旅长，荆州失败后和石星川一起投靠王占元）运送汉阳兵工厂的大量枪弹，接济熊克武部队，商定以杀害蓝天蔚为交换条件。熊即派人持送手枪一支，放在蓝的住房内的桌上，暗示将以此对待。蓝始知不免，乃引自带手枪自杀。自此，独立的鄂西靖国军为时不过三年五个月，就完全瓦解。后来熊克武以杀害蓝天蔚的罪名被广东政府扣押两年多，而终获释放。

## 2. “神兵”的消灭

靖国军在1921年元旦出兵北伐失败后，施鹤七属几成为“神兵”统治世界，搜杀靖国军残部，抢劫行商财产，为祸颇烈。是年7月恰值发动湘鄂之役，以夏斗寅的鄂军团担任先头部队，通电讨王，由长沙向岳州方面进攻。同时刘湘的顾问潘正道率领川军四个旅，约计一万余人，又成立鄂西总司令部，由潘任总司令，潘康时任参谋长，董用威（即董必武）任秘书长，拟经施南向宜昌方面进攻。鄂督王占元部队自武昌兵变之后，军无斗志，节节败溃。鄂军团和湘军等大部攻达到咸宁汀泗桥畔，其左翼别动队也占领了新堤，但被吴佩孚率部南下，改派萧耀南督鄂，接替王占元之任，增派大量援军开赴前线，激战于汀泗桥之间，以致湘军功败垂成。

鄂西方面潘部蓝文蔚担任先遣大队长，攻占了利川，随即大军占领了施鹤七属，也因鄂军团和湘军在汀泗桥溃退，势孤力弱，未能攻占宜昌。但是，潘总司令和蓝部终将鄂西“神兵”完全平定，予以彻底肃清。

（1963年）

## 非常国会在昆明

高子厚\*

### 一、广州国会迁沪迁滇的争执

自1918年5月广州国会通过军政府改组案，由大元帅的一长制改为七总裁的合议制以来，军政府已变成桂系军阀的政治工具，国民党与桂系的矛盾越来越深。1919年8月，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去军政府总裁一职，广州国会内国民党和政学系两派议员的斗争也更加尖锐。又因岑春煊私派代表到北京与北洋政府秘密接洽和议，国民党方面的议员以岑违反约法精神和军政府的合议制，提出了不信任案，国会并议决要改组军政府。桂系军阀陆荣廷、莫荣新、谭浩明等出来为桂系的代理人——岑春煊说话；他们并将有不利于国民党议员的行动。因此国会内派系斗争激烈，意见分歧，一片混乱，开会时常吵架甚至打架，或者以不出席来消极抵制，以致国会陷于瘫痪状态。

又因1920年初，桂系企图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唐继尧大为不满，他就公开揭露岑春煊与北京接洽和平的内幕，于是西南滇桂两大军阀的关系破裂，滇系同国民党有新的结合。唐并辞去军政府总裁，来拆军政府的台。

国民党鉴于广州形势紧张，决定以云南为新根据地，把广州国会移往昆明。这期间，广州的五十号楼、十行会馆和褚寓，成了议员们活动、斗争的三个据点。后来又在香港集会，国民党议员一致主张国会迁离广州，但对迁沪迁滇仍争论不休。有的主张

\* 作者时为国会议员。

迁昆明，依靠唐继尧的势力，国会到那里去开会。但有的议员则反对迁滇，认为唐继尧同陆荣廷一样也是地方军阀，过去就不同孙中山合作，现在虽同桂系有矛盾，表示合作，这也是暂时的利害关系，太不可靠。且昆明交通不便，国会偏处一隅，也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主张迁往上海。但主张迁滇者又表示反对，认为上海是皖系军阀卢永祥的势力范围，更加不可靠。

## 二、国民党议员由香港经海防前往昆明

1920年4月初，广州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暗地把国会两院卷宗运往香港。褚在临行前召集国民党议员开会，要大家先到香港集中。我是国民党的山东议员，也跟着大伙到了香港，先由关余（关税余款）里给每一议员发了一个月经费400元，过去在广州很少按时发给过。

议员中主张迁沪的居多，已有不少人去上海，众议院议长吴景濂率领部分议员到沪筹备。但后来因伍廷芳（军政府总裁兼外交、财政两总长）被军政府派人到香港告他携带关余公款潜逃，因此100多万公款被香港法院判决扣留，上海召开国会便无经费，迁沪又成问题。先后征集愿去昆明的登记，那时李烈钧也在香港，他也鼓动大家去昆明。6月间，我们约有30多人，由褚辅成率领入滇，先搭轮船到海防，换乘滇越铁路火车去昆明。那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铁路都是窄轨，夜里不开车，足足走了三天半方到达昆明，李烈钧也同行回滇，同唐继尧商量另在云南组军政府的问题。

唐继尧时称滇黔川靖国联军总司令，声势煊赫。我们到达昆明时，唐曾派员前来欢迎，招待议员们住在昆明复兴街。唐并假座云南讲武堂设宴招待来滇的议员，地上还铺有松枝，以示隆重。

### 三、在昆明召开非常国会，罢免 岑春煊、陆荣廷两总裁

国会议员到昆明的很少，留在广州和已去上海的都比去昆明的多得多。但根据向例，只要有 14 个省区以上的议员，就可以召开非常会议。到昆明的议员虽不多，省籍却在 14 个以上，因此多次筹商，决定在昆明召开非常会议，开会地址在云南省议会。7月 7 日正式开会，由褚辅成任主席。出席非常国会的以山东省人数最多，计有丁维汾、亓养斋、于沐尘、阎容德、樊子元、邓献璞和高子厚；察哈尔（特别区）有张厉生、童效贤、与杜济美三人；直隶（即今河北省）有赵升斋、宋赓等三人；浙江省为褚辅成；江苏省有刘云昭等；奉天（即今辽宁）有杨大实；山西省有李素；云南是李××一人，以及河南、四川、贵州、蒙古（地方）、吉林、广东、湖南、湖北等 16 个省区。

最主要的议程就是罢免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和陆荣廷，补选唐继尧、刘显世二人为总裁。这只是利用滇系来打击桂系，借以出国民党对岑春煊的一股怨气而已，并没有起多大作用，各方对昆明的非常国会也不大重视。

### 四、拟在重庆召开国会组织军政府

国民党本来打算在云南召开国会，另组军政府，以拆桂系把持的广州国会与军政府的台。但昆明非常国会经过罢免、补选一幕后，唐继尧也受到桂系等的攻击，同时他也不愿再有军政府这个顶头上司在云南，这会妨碍他的独裁统治。很明显，国会如果选举，孙中山先生当然仍会当选大元帅，他只能是副牌的元帅或总裁。因此他主张改在重庆召开国会和组织军政府。滇川黔的军阀如滇军军长顾品珍、赵又新，黔军前敌总指挥袁祖铭，川军总司令吕超，都发表通电，欢迎国会议员到四川开会。在上海的孙

中山先生和许多国会议员都准备入川，并电派李烈钧先往重庆布置一切。

上海和广州的国会议员，都来信征求我们在昆明的议员对前往重庆开会的意见。在昆议员都同意前往重庆。由昆明往重庆有两条道：一条是经滇越铁路到海防，转香港去上海，再乘轮船去重庆，这条路路程遥远，但比较安全。一条是经霑益、宣威，通过贵州的威宁、毕节进入四川的叙永、泸州，再乘小火轮去重庆，还要经过著名险要的七星关、大渡河等处，这段路短而险。有 10 多个议员走前一条水路，我们约有 20 来人，由于好奇，宁愿冒冒险，取道后一条路，借以饱览一下滇川黔的奇秀景色。

## 五、议员们在滇川道上

走旱路的可能都是北方各省的议员，计有我们山东的 7 人，以及直隶、山西、察哈尔等省区的 10 余人。我们事先在昆明作了些远行的准备工作，带上部分日用品如粮食、油盐、干菜、烟茶之类。这一带土匪颇多，猛兽也不少，唐继尧派了一连军队打前站，来保护议员们的安全。这条路多是大山，那时还没有公路，唯一的交通工具，是用台椅绑在两根竹竿上，类似轿子或“滑竿”的东西，以两个人抬着走，行李则另雇一个挑夫背着。行前每个议员发了 400 元。我们同轿行订合同，每人需三个轿夫，先付一部分钱，言明送到四川的叙永。我们还要带一部分鸦片烟土。云南是以出产大烟著名的，“云土”是上等的鸦片，这是预备给轿夫们抽的，合同里就规定每天须给几颗烟泡，他们差不多都抽。我们 7 个山东籍议员还带了一个厨师和一个勤务。有个山西议员李素和直隶的议员赵升斋还带有家眷。所以这一行将近 100 人（不算开路的一连军队），可说是川滇道上少见的旅客。

沿途哪里宿营，哪里“打尖”，都是按传统的规定，如错过了站口，就没有客店，没有饭铺。一般一天走八九十里，最大的

一站有 110 里，因为那是一座大山，从山下到山上，再由山上去就一站。沿途峰奇路险，风景绝佳，都是长年生活在北方的人没有见过的。到了中午和夜间，就停下做饭（或买饭）；轿夫都带有烟枪，每逢中午或晚间宿营，我们就给每人几颗烟泡，他们吃完白饭就“吸黑饭”（抽鸦片），过完了瘾才起程，据说不这样就没有精神和力气了。由此可见鸦片毒害人民之深——尤其是劳动人民。

到了大站，再补充些粮食蔬菜之类，沿途都可买到鸡蛋和小鸡。宣威是全国有名的火腿产地，那里设有火腿工厂，主要是在民间收购来加工，有的制成罐头，我们当然也买了一些。到了毕节，那是贵州西北部的大镇，在那里休息一天（一般是走五天，歇一天），适逢赶大集，街上多是卖大烟的，各人把烟土放在碗里，手提篮子到处兜售。议员们在出发前早有规定，决不买大烟，故虽价贱，也没人买。

轿夫整天抬是够累的，遇到长站或爬山，许多人都下来走二三十里，让轿夫们喘口气，抬着空轿走。轿顶张有漆布，雨小还可以对付，大了也遮不住。沿途发现有少数挑夫，因为受不了，中途把背的东西扔在路边，悄悄偷跑了，可是他们没有把东西拐走。遇到这种情况，坐轿的人只好下来步行，把行李放在轿上抬着走。到了城镇，再雇人来挑，也有时老乡不愿去，雇不到人，个别议员就用强制力“拉夫”来挑。利用特权势力来欺压老百姓，这是极端恶劣的作风。这样共走 38 天。

好不容易进入四川境的叙永，那里有条永宁河汇入长江，我们就可舍陆登舟了。叙永县衙门还设宴招待，给找房子住。更难得的还有炮台烟招待，使我们大过（纸）烟瘾。因各站都买不到纸烟，昆明带来的不多了，早抽完了。在毕节买到一种发了霉的纸烟，在叙永舍叙永能抽到“炮台”，大家很满意。县衙门还代我们雇好木船，沿永宁河下驶，从叙永经古宋到泸州对岸的纳溪，

这一段水流很急，滩险也多，偶一失慎，就有翻船的危险。船夫把船划到长江与永宁河口上，个个满头大汗，算是松了口气。

纳溪对岸的泸州，是川南的重镇，那里以出产大曲酒著名。长江上游就有小火轮了，大家很高兴。泸州那时是滇军的防地，他们事先已得到唐继尧的电示，准备招待的，可是这时川滇战事已起，泸州虽尚未波及，但军队调动频繁，给我们预备住的地方，也被军队占据了，到处乱哄哄的，都被军队住满了，我们只好在船上住一夜。第二天搭上英国轮船“隆茂”号，开往重庆。

船入江津境内，船上早已预备了棉絮，用水浸湿后，搭在栏杆上，叫乘客下舱去，下不了的就卧倒。因为四川“棒二哥”（土匪）很多，听说隆茂由渝上驶时，棒二哥要船上拿钱，否则就不客气，船上不理，故下水时土匪在岸上向轮船开枪，轮船开足马力，很快就冲出险界了。

## 六、川滇火拼，议员们由渝去沪

重庆是四川最大的商埠，工商业发达，人口众多。也是西南的经济中心。地方当局招待我们住在金家大楼。那时上海来的议员已很多，还在继续前来，到重庆的议员已在200人左右，正在筹备开会。

可是时局一天紧一天，川军发动驱逐客军，在重庆的滇军和黔军，便是攻击的对象。熊克武部川军刘湘的军队，已到浮图关，重庆危在旦夕。据说川军对国会议员是仇视的，因为这批议员同孙中山及唐继尧接近，而川军正是要反对唐继尧统治四川的，所以大家都想赶快离开重庆，便向重庆总商会交涉，借了部分钱，每人发300元作路费，准备到上海。

适有英国轮船将开万县，船停泊在南岸，过午我们出城到望龙门外，想乘木船渡江。可是因军情紧急，木船全被军队封啦，谁也不敢动。我们把行李放在江边，来回转悠，城门已关，回也

回不去，过江又无船，眼看天快黑了，进退不得，非常着急。江边船上有人看到这班人怪可怜的，也是想趁机发点财，船夫上岸对我们说：“先生们想过江，可是我们奉军方命令，都不能随便行动。只可用小舢舨把先生们送过去。”我们听了非常高兴，讲好15块钱，仅仅我们山东省的7名议员，连行李都装不了，又要船夫多添一只小船。箱子、网篮连人分装两船，一个劲地往上游划。划了一个多钟头，天已大黑了，船工就说：“先生们，今天船不能开了，水太急，天黑又看不见，划过去非常危险。”我们很诧异，船已到郊区，上不着村，下不着店，如在此过夜，准被土匪抢劫，而且性命难保。无论如何要过江去。好说歹说，船工才答应冒险过江，因水流急，船一放很快就到了轮船码头。船上灯火辉煌，还有大菜可吃，大家欢庆脱险。

第二天八九点钟才开船，已听到重庆城里的枪炮声，川军已打进城了。我们远远望见逃到南岸来的一位滇军高级将领，坐着大轿，还有好几个护卫。事后才知道他就是代孙中山到重庆筹备召开国会及代表唐继尧主持川东滇军军事的李烈钧，他随滇军前往贵州去了。卢焘也率领黔军逃往綦江（1920年11月，卢焘回师贵阳，赶走刘显世，1921年1月，顾品珍由四川退回云南发动政变，唐继尧也被逼下台）。

我们到了上海，曾往谒孙中山先生，他说：“护法任务还没有完成，我不久就去广东，你们也到广东去吧。”这时粤军陈炯明已把桂军打败，桂系在广东的统治已垮台。孙中山后来被广州非常国会选举为大总统，再次组织军政府，积极筹备北伐，因不属本文之范围，兹不详述。

（1965年）

## 参加护法援闽战役的一点回忆

甘 融\*

1918年7月，我和家兄海涛（后任粤军营长团附）应援闽粤军第十三统领蒋国斌的函召，航海经潮汕入闽，参加护法战役。到达长汀统领部时距长汀克复只有三天。（汀州争夺战共三次，此是最后一次。）从峰市到长汀，铺店多锁门逃徙，行人稀少，呈现战时一片荒凉景象。那时统领部的书记长吴璋，奉派代理长汀县知事，军书旁午，无人负责，蒋统领以我承乏。我军打到距南平40里的洋口，遭李厚基部队顽强阻击，退到顺昌以南蛟溪高滩一带布防，统领部即驻将乐。适逢南北议和，闽粤两军就驻地停战待命。到了1920年1月，我由蒋司令部保荐，奉委署理将乐县知事。是年秋，粤闽双方协议成熟，由李厚基接济粤军械弹，旋师回粤讨桂，我于10月中交防离职，在永安军部办清交代手续后，请假回湘。兹将这次见闻作一些简要的回忆。事隔40余年，错误在所不免，还求阅者指正。

先是1917年7月，孙中山先生以段祺瑞非法解散国会，率一部分海军由沪南下，在广州成立军政府，被推为大元帅，宣言拥护约法，恢复国会，号召西南各省出兵讨段。那时两广为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等盘踞，虽然他们借护法作幌子，不受北京政府统治，但对毫无武力的孙中山，采表面敷衍态度。中山先生亟想建立自己掌握的革命武装，以便出师北伐，用尽种种办法，迫使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和粤督军莫荣新同意拨广东省长亲军20营交陈炯明统率，任陈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向段系占据的福建方面发

\* 作者时任粤军十三统领部书记、署理将乐县知事。

展。1918年春，陈炯明率部队及幕僚到汕头部署。中山先生又替陈炯明争得兼任惠潮梅三属军务督办一职，作为进战退守的后方基地。陈炯明就职后，率部驱逐侵入潮梅的北军臧致平部，收编绿林和地方武力，遂渐扩为30余营。（每营三连，官佐兵夫共300余人，枪支种类极为复杂，并没有修械厂修枪制弹。）那年夏天，整编完毕，由潮汕出发。陈炯明亲率第一、第三、第四支队主力（已扩编20营）由黄冈饶平向福建华安漳浦云霄前进，直趋漳厦，企图由兴化泉州进窥福州。许崇智率第二支队（已扩为10余营）经三河坝、松口向永定上杭长汀前进，企图攻占建瓯南平以拊闽军之背。陈部攻占龙岩、漳州以后，适南北议和，停止前进，总司令部即驻漳州，关于这一路进展情形，我不清楚。

许崇智字汝为，广东南海人，清末闽浙总督许应骙的侄孙。年14岁时，凭借其叔祖的势力，用公费送赴日本留学，毕业于官学校。回国后，充福建新军教练官，逐渐升到标统。福建光复前夕，任陆军第十镇第十九协协统。他在日本留学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剪掉了发辫，人家叫他许和尚，辛亥福建光复有功，升任陆军第一师师长。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响应李烈钧等义举，宣布福建独立，充福建讨袁军总司令。失败后，亡命日本，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山很信任他。护法援闽时，福建的地方守备队伍的中下级军官，多是他的旧部，所以他率粤军到达闽粤边境，即派多人运动其旧部响应，又收编各县警备队，共扩充至10余营。蒋国斌字克诚，湖南长沙人，清末在闽任陆军三十八标标统，也是同盟会会员，辛亥光复后，升任旅长，福建独立失败离职赴沪。他是许的老部属，关系极为密切。在援闽战役中，许崇智这一路又分为左右翼，许率主力由永定攻克漳平、龙岩，向永安、沙县前进。左翼则由吴忠信、蒋国斌等率领部队，由长汀经清流、归化、将乐、顺昌向南平推进，同时

分兵占领武平、宁化、连城等县，以吴忠信为左翼总指挥。在1918年南北议和停战后，左翼扼守高滩、万安至泰宁一线，曾一度占据邵武、光泽，以兵力不够，退回建宁、泰宁。这时粤军第一路已攻克长泰、同安、永春、德化等县，前锋到达厦门对面。第二路则占领闽西南上杭长汀闽西北建宁泰宁等县，前锋到达顺昌。粤军占领区合计20余县，占福建全省面积约2/5。兵力由原来的20营逐渐扩充至40余营，于是分为两个军，以一、二、三、四支队属第一军，由陈炯明自兼军长，五、六、七、八支队属第二军，以许崇智为军长。蒋国斌所部由3营扩为7个营，蒋即由第十三统领升充第八支队司令官。（后来扩至50余营支队统领数目均有扩增，情况不详。）我记得改编以后，第二支队司令是蒋介石（后来离职赴沪），第五支队司令是孙本戎，第七支队司令是吴忠信，统领也增至20多个。蒋国斌升第八支队司令后，辖第十三统领温浩，第二十统领徐岳嵩。温徐均湖南人，温原系汀州守备司令符某部下的营附，徐原系建瓯守备司令徐镜清部下的营长，都是蒋的旧部或学生起义来归的。许的第二军司令部，先驻上杭，后移永安。到1920年8月，粤军回师讨桂系，节节胜利。攻入广州后，中山先生回粤，就非常大总统职，陈炯明就任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粤军共编为十个旅，吴忠信任第七旅旅长，蒋国斌任第九旅旅长。后来蒋因病辞职，赴沪就医，调充第二军司令部总参议，第九旅旅长以其团长刘志达接充。

粤军占据闽南闽西20余县后，孙大元帅曾发表陈炯明为福建省长，但陈并未就职。对于占领区的民政，仍以总司令名义行使职权。他的军饷，原来的20营由广东供给，攻入福建后，广东的供应渐渐停止。军队增加，开支庞大，均须就地筹措，乃于漳州设粤军财政总局，以钟秀南为局长，第二军设有财政分局，以吴楠为局长。占领区内，除下游滨海几县较为富裕外，余皆贫

瘠。占领之初，即委任县知事，派筹饷委员劝募殷富捐，停战后，即开征田赋及各项杂税，查验田房契纸，收验契费，恢复厘金并开征各种土特产捐用以开支军政各费，仍感不敷。于是划分防地，设立绥靖处，派各支队司令兼任绥靖总办，蒋国斌即兼将建泰三属绥靖总办。防地内各县知事，大都事由驻防司令官保荐，经军长、总司令核准加委。各县的田赋、契税、贾铺捐，均由县知事照旧例经征。除开支县行政经费外，余款解交支队司令部，取其印收，上缴财政局抵解。印花则由财政总局印制，分发各县销售，此项收入径汇财政局，不拨作军饷。烟酒牌照税费，仍由烟酒公卖局征收。停战以后，闽粤两军分防而守，物资仍可交流。粤军对于水陆要津，恢复或添设厘金局，如将建泰三县水运输出货物，则于高滩设有厘金局。大宗土特产亦设局榷税，如将乐、建宁产官堆纸，运福州输出，粤军则设有纸捐局；建宁泰宁等县产米，运往下游，粤军于将乐设有米捐局，税收均相当可观。但是货物运经闽军区域，又要查验证税，不仅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还阻滞了货物的流通。真实俗话所说“师公斗法，病人吃亏”，内战给予人民的苦痛，是无法估计的。

粤军因军饷不够，又从鸦片烟中另辟财源。闽南吸烟之风盛行，尤其中年以上的人多染有烟癖。总司令部乃设立禁烟总局，收购民间所种烟土，熬制成膏，装入铜盘，分一两庄、五钱庄、一钱庄不等。各县设禁烟所，以县知事兼监督，禁烟局派坐办一员实际负责。我在将乐时，总局曾派李基鸿押运一批烟膏到将乐。办法是凡吸烟的人均须登记领照，向禁烟所购买烟膏，逐月递减，限期戒绝。但实际仍以增加收入为目的，各级军官和经办人员视为莫大的利薮。此项烟膏专卖办法，后来国民政府曾仿行。闽南接近粤东，城镇间赌风颇盛，花会尤盛行。（花会是一种类似番摊的赌博，由头家指定36个古人名字，印绘图象，先期派人四处兜卖，男女老少趋之若鹜，押注的多至数十元，小至

铜币一枚，均可参加。即在 36 个名字中，任选一个，登记于售票人的簿上，到了开标之期，头家当众于 36 个画像中抽取一个，悬挂赌场高处，作为中标，打中的照原售金额加 30 倍赔偿，即买银币 1 元可得 30 元。男女老少争相猜测，有些迷信的人，往往露宿庙中，求神灵托梦，荒误正业，流毒社会极大。头家坐得六分之一，妇女的私房钱、儿童的糖果费均为所吸吮，从来地方官吏是严行查禁的，可是无法禁绝。）粤军借口征收防务经费，开放赌禁，视当地赌桌多少，规定月捐，包与地方上痞徒经收，解交驻防的营连长，这笔收入是不报销的。由此开花会的，便肆无忌惮的活跃起来。赌徒输光了，就偷扒抢劫无所不为，予社会秩序以莫大的危害。

那时当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潮流正汹涌澎湃。陈炯明为迎合潮流，以建设新闻南相号召，办有《闽星日报》、《闽星周刊》等刊物，一面整训军队，一面致力漳州市政建设，倡修公路。在漳州设公路总局，各县设公路筹办处，以县知事兼总办，遴选地方绅士一人坐办，下设总务、工务、调查三股，由公路局分别县道乡道，规定路面路基宽度，挖平铺砂，两边开沟，劳力则发动当地农民服役，办公费从田赋厘金各附加一成充用。那时公路还是一个新鲜名词，虽然陈老总热心提倡，但各县找测量工程人员非常困难；为了求路线径直，有些地方不免要挖屋毁田，这事在当时民智未开，更不容易做到。而修建桥梁涵洞，人力物力困难重重，所以结果，有的整修了一部分的乡村大路，有的竟未曾动手。

粤军援闽以后，广州军政府改总裁制，岑春煊以旧桂系的拥戴充首席总裁，对中山先生颇嫉妒。先生乃离粤赴沪，将中华革命党改为中国国民党，号召党员重行登记，填具愿书。1919 年，我在第八支队司令部时，上海环龙路国民党总部，曾寄交蒋司令入党愿书多份，请他介绍所部的革命忠实同志入党。那时一班人

对三民主义认识极为模糊，多观望不前，仅有少数旧党员进行登记而已。中山先生抱有满腔爱国爱民的热忱，以为粤军援闽，比北洋军阀部队纪律要好，可得到人民的拥护。那知他们的目的，纯为个人升官发财打算（连我也不例外），全无革命观念，以致包赌贩烟，反给人民带来了灾难。

（1963年）

# 大元帅府见闻

黄梦熊

## 一、海军南下

袁世凯死后，北京政府，在政治上出现了极端混乱的局面，政府首脑，名义上的总统是黎元洪，而政府的权力实际上握在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段祺瑞承继了袁世凯全部反动政策，他一开始就袭用袁世凯所篡改过的“约法”来组织新的独裁政府，后来被迫宣布恢复1912年3月南京政府所公布的“临时约法”和召集国会。但到1917年6月，国会拒绝通过他所提出的对德宣战案并撤免他的国务总理职务后，他又唆使北洋系的各省督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安徽督军张勋乘机驱逐黎元洪，拥废帝溥仪复辟。复辟平定后，段祺瑞乘乱复任国务总理，并由冯国璋代黎元洪为总统，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这些事变，引起了极大的分裂，广东、广西及云南等省先后宣布暂行“自主”，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海军第一舰队通电脱离北京政府，开赴上海，拥护孙中山先生重新举起反抗的旗帜。

孙先生在讨袁战争爆发以后，一直逗留在上海，他是把1912年的“临时约法”和国会当作中华国民共和的象征。在讨袁军事结束后，他发表宣言，主张恢复约法，约法恢复以后，他希望可以用和平手段来解决政治问题，以为“今北京存约法、复国会、共和形式已具。纵非革命党执权，仍不必有所顾虑。要之，即曰共和，则凡赞成共和者皆可执政，吾人只排斥反对共和者。现执政者既为赞成共和之人，纵使非倡发共和制度之主张，或输入共和思想者，仍当望之信任，使展其所能。若有反对共和

之证，乃可起而锄之耳。”在经过解散国会和张勋复辟以后，中山先生对北京政府所期望的失去了。他在给桂系军阀陆荣廷的电报中说：“今张勋虽败，而段祺瑞等以伪共和易真复辟，其名则美，其实尤疵，民国之号虽复，而祸乱之机方始。”他提出了打倒伪共和建设真共和的主张。并于7月17日率领海军第一舰队到广东，联合西南“自主”各省，揭起了护法的旗帜。8月25日南下国会议员举行国会非常会议于广州，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宣布成立护法军政府。

## 二、大元帅府的成立

这是孙先生在1911年以来所发动的第二次保卫民主的斗争，择广州市河南旧土敏土厂为大元帅府，于9月10日就海陆军大元帅职，发布就职答词：“文以不德，忝为共和先导。民国成立，六年于兹，而枭雄衅换，频频不已。文不能救，自问无以对我邦人兄弟。今者，叛督倡乱，权奸窃柄，国会解散，元首迁废，此诚勇夫志士发愤倡义之时也。而迁延数月，大兵未举，政府未立。内无以攘寇乱，外不足示友邦。文以国会诸君不释之故，不得不统摄军政。任职以后，唯当竭股肱之力，攘除奸凶，恢复约法，以竟元年未尽之责，雪数岁无功之耻，责任在躬，不敢有贰，诸所举措，亦唯国会诸君实匡救之。孙文。”

大元帅府内设海军、军政、参谋、财政、外交五部及会计、庶务等科。大元帅及各部印信，亟须刊刻，不能稍缓。刊印处，设在海幢寺内松茂台，初由执信先生监刊，后执信先生以事繁忙，中山先生乃改派黄梦熊监刊。帅府规模，从此粗备。

## 三、胡新谋刺未遂

中山先生南下时只率海军第一舰队，并无陆军，福军司令李福林为拱卫帅府计，乃派福军特务营驻扎帅府，任拱卫责任。营

长胡新，副营长邓彦华。胡新出身绿林，受桂系将领申葆藩运动，行刺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先生办公室、客厅、卧室在后座第二层楼上，此层楼的守卫，由华侨组成的卫士队拱卫。某夕午夜后，胡新暗怀二号左轮手枪两支，便装自冲上楼梯，被马湘阻止盘查，他答查哨。马湘说，此是大元帅卧室所在，有卫士队担任护卫，已深夜，你穿便装、怀左轮手枪两支，不对。胡新被马湘阻挡，只得退去。孙中山先生闻马湘与人争吵，起来问马湘何事。马湘将事由报告。孙中山先生嘱马湘，明早电李福林来帅府。翌晨，李福林接马湘电话后，即来帅府，问马湘，大元帅找我何事。马湘答，你见了大元帅便知道。李福林见大元帅请示，中山先生嘱他问马湘。马湘把昨夜胡新的行动告知，并问李福林，你交给胡新几支短枪。李福林答，只给他一支驳壳枪。马湘说，他身怀二号左轮两支，事有可疑，你回去，不要动声色，搜他家里。李福林照马湘的话在胡新家里搜出二号左轮两支、港纸500元。经审问，胡新承认受申葆藩指使行刺孙中山先生，给他二号左轮两支及港纸500元酬劳。李福林把胡枪毙了；并升邓彦华为营长，请马湘向大元帅报告。

#### 四、粤军援闽

广东省长朱庆澜，是黎元洪任命的，桂系军阀为切实掌握民政实权，对朱时加压力，迫使自动引退。朱氏受桂系军阀压迫，亲近护法政府，对孙中山先生颇多赞助，更触桂系军阀之忌。朱氏为谋充省府实力以资对抗计，拟将省政府卫队扩充为亲军二统，第一统统领拟任陈炯明，第二统统领魏邦平，仍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向孙中山先生征求意见。孙中山先生以朱氏意商之陈炯明，陈炯明以昔曾任广东省都督，意殊不愿，朱执信先生以此次护法南下，受制陆氏，因军队实力操在桂系手中，倘革命党人亦握有实力，桂系军阀必不敢过为已甚，既有机会，应放弃个人面

子，尊重革命事业，方是实在办法，把这个意见向孙中山先生提出。孙中山先生同意，命执信先生向陈炯明提出，陈炯明以大义所在，遂允就省政府亲军第一统领领职。

陈炯明接受省府亲军第一统领职后，即以八旗二马路惠州会馆为统部，一切进行由朱庆澜电请补给。匝月间，省府亲军第一统二十营，人员招募，械弹饷需，均已配备就绪。

朱庆澜的省长，是黎元洪委派的，政府实权，握在段祺瑞掌中。府院权力斗争，本已激烈，会段祺瑞以对德宣战案为国会否决，并撤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张勋乘机拥废帝溥仪复辟，驱逐黎元洪。复辟乱平，段祺瑞乘乱夺取国务总理，以副总统冯国璋代黎元洪。桂系与冯国璋是有联系的。朱庆澜内援已失，不安心于位，已是现实问题，为保全陈炯明实力，必须另寻办法。会段祺瑞免湖南督军谭延闿职，对湖南实行武力统一，陆荣廷乘机扩充地盘，任谭浩明为援湘总司令，出兵湖南。朱执信先生认为保全陈炯明实力是一个好机会，向孙中山先生建议。假援闽名义，令陈炯明率所部出闽南以求自全，先由朱庆澜与闽督李厚基密商，假漳泉二州之地，为粤军驻地。两州民财二政，交粤军接管，以资补给。因朱庆澜与李厚基私交甚深，故终取得李厚基同意。孙中山先生又命胡汉民西上邕宁，以陈炯明率所部援闽，可减轻北军对广东东路的压力，游说陆荣廷，陆荣廷认为可行，并允予接济。孙中山先生又将陈炯明援闽事告知莫荣新，令其接济弹械以壮士气，莫荣新答允。孙中山先生以大元帅名义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路司令，蒋中正为参谋长，粤军进驻漳泉后，整训补充，修养待机。

## 五、炮教莫荣新

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广东时，曾受桂系陆荣廷，滇系唐继

尧等军阀欢迎。但是地方军阀的“自主”和孙中山先生的护法不同，地方军阀对北京政府决无坚持不变的立场，他们在得到某种小惠或转圜的口实以后，随时可以取消“自主”。他们欢迎孙先生，不是为了真诚合作，而是利用他率领海军南下，可以壮声势。及孙中山先生受任大元帅宣言发布后，他们知道不能够利用孙中山先生以遂私图。因是，陆荣廷、唐继尧对军政府元帅职，迄无就职表示，陆荣廷纵容陈炳焜、莫荣新等对军政府命令动辄抵制。军政府为充实护法武力，拟编练基本部队，派遣募兵委员分赴各县募兵，辄为桂系爪牙逮捕，甚至杀害。时莫擎宇受段祺瑞嗾使，据潮梅叛变，进军东江，孙中山先生任邹鲁为潮梅军总司令，讨伐莫擎宇。邹部第一支队长兼前敌司令金国治，败莫擎宇于铁场、五华，桂系沈鸿英忌之，诱杀金国治解散所部。又桂军游击营，枪杀军政府卫队数十人，孙中山先生严责莫荣新，莫荣新不理。孙中山先生为振刷军政府威信，思有以惩戒之。商之海军总司令程璧光，欲以海军讨之，程璧光以危险性太甚，不敢从。孙中山先生召豫章舰舰长温树德、同安舰舰长吴志馨到大元帅府计议。因当时该两舰任拱卫大元帅府之责，停泊帅府前河面。温树德以发炮轰击督军署，须有海军总司令的命令。孙中山先生曰：“我是海陆军大元帅，可下命令否？”温树德答曰：“除非大元帅亲自下舰指挥。”孙中山先生决定亲自下舰指挥，并把决定告朱执信。朱执信以为用两舰发炮，影响不大，须发动陆军以应之。孙中山先生命朱执信联络陆军，朱执信奔走福肇两军间，商谈决定，海军发炮，肇军出动，围督署，捕捉莫荣新，缴桂军械，福军在河南渡过河北，接应肇军，兼阻击桂军增援。事定，大元帅下令免莫荣新督军职，以李耀汉继任，朱执信以与李福林，李耀汉商定的办法报告，孙中山先生同意，示发动日期，令朱执信告知李耀汉，李福林做好准备。时肇军有步兵二连驻守大南门城楼，肇军为集中兵力，将该二连调回省署，请福军派队

接防，以便接应。福军派步兵二连接防后，加派炮兵一排，放列城楼上，准备响应海军轰击督署。孙中山先生登豫章舰，命令同安随行，至中流砥柱炮台附近，下令停航。孙中山先生亲督两舰官兵发炮向督署轰击，朱执信闻炮声，令福军出动，准备渡过河北岸，而驻在大南门城楼之联络员适至，报告闻炮声后，亲至督署附近侦察，没有军队出动，请示驻大南门城楼上的炮兵发炮时机。当是时也，直接派往省督附近侦察的亦回报，与驻大南门的侦察员报告相同，李福林知李耀汉中变，请朱执信中止出动，以待时机。朱执信派专员乘电船到豫章舰，把上项情况向孙中山先生报告。孙中山先生下令二舰停止发炮，回航帅府前停泊，当时程璧光以豫章同安二舰，未拿海军总司令命令，擅自发炮轰督署，在海军总司令部开会，拟将温树德、吴志馨撤职查办。孙中山先生闻报，即渡河至海珠岛之海军总司令部（当时有重要同志请孙中山先生乘电船往，以防危险，孙中山先生不答）。到部，问程璧光开什么会，程璧光报告开会原因，孙中山先生告知豫章、同安二舰发炮，系由他亲自指挥，为的是炮教莫荣新，使他知道尊重法纪，程璧光宣布散会。

事后，莫荣新自知对军府开罪过甚，亲到帅府，向大元帅请罪，孙中山先生赦其既往，勉其未来。李耀汉事前将发炮事暗示莫荣新，莫荣新不信，故李耀汉亦不敢发动。

关于轰击督署事，大多数党员事前都劝阻，孙中山先生不答。后知此事是朱执信参加策划的。胡毅生在事前曾以危言恫吓朱执信。朱执信表示，我是党员，应该服从党的领导，个人生死，非所计也。

关于至海军总司令部一事，笔者事后曾向孙中山先生请示，孙中山先生问：“我比章太炎如何？”我答：“先生推翻中国四千余年专制，创立民主共和国，章太炎不过一开明的学究耳。”孙中山先生又问：“袁世凯比莫荣新如何？”我答：“袁世凯在旧时

代是奸雄，在新时代是乱贼，莫荣新在地方上不过一只小军阀耳。”孙中山先生曰：“袁世凯不敢杀章太炎，莫荣新怎敢杀我？”

## 六、程璧光之死

程璧光率海军南下，是拥护孙中山先生的主张——恢复约法、恢复国会，欢迎元首三事。舰队抵沪，程璧光晋谒孙中山先生，就商大计，派舰赴秦皇岛欢迎黎元洪不得，段祺瑞乘乱复职，卢永祥中变，原定在沪组织军政府不可能。适陆荣廷，唐继尧来电欢迎海军南下，孙中山先生遂决定率舰队南下广州，南下国会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通过组织军政府大纲，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元帅，孙中山先生发布就职宣言后，陆荣廷、唐继尧知孙中山先生不会受利用，于是对非常国会选出他们的元帅，无就职表示，程璧光为西南大局计，拟西上邕宁，敦请陆荣廷东下就元帅职，孙中山先生同意。适为粤军援闽事，孙中山先生派胡汉民上邕宁游说陆荣廷，于是两人联袂西上。其时段祺瑞派往邕宁游说陆荣廷的说客王芝祥在邕宁事毕东下，过广州时晋谒莫荣新，莫荣新问陆荣廷对广州政局有何意见。王答，闻陆荣廷拟任程璧光为粤省督军，冀罗致海军。

自朱庆澜被迫辞省长后，陆荣廷以绿林出身的李耀汉为省长，深招粤人不满。一度以省长职饵胡汉民，胡辞。又以饵程璧光，程亦辞。时龙济光余孽邓本殷由琼崖出寇南路，高雷吃紧。风传陆荣廷拟任莫荣新率师往讨，粤省议会据电陆荣廷催促刻日实行，于是莫荣新对王芝祥之说深信不疑，又以程璧光西上邕宁，蛛丝马迹，更证确实，认为非除去程璧光不可，遂以 500 元港纸买凶刺杀程璧光于海珠堤畔。程璧光被刺死后，有张民达等，亲自出马承认是他们指使黑鬼宋（诨名）亲手执行的，事前，张曾面告孙中山先生，程璧光西上邕宁系游说陆荣廷倒军政府，非杀不可，孙中山先生无言，认为孙中山先生默许，故使黑

鬼宋执行，他虽自吹自擂，当时军政府中人，疑他别有作用。且孙中山先生向来是主张堂堂正正的革命，不采取对个人出恐怖手段，炮教莫荣新，是一个现实的证明。程璧光死后，朱庆澜挽联云：“主名勿复深求，公即成仁方谢贼。徒行乃有此厄，我能无恙亦由天。”

## 七、军政府改组

护法战争开始以后不及三个月，北京政府内部和广州护法军政府内部都发生分裂，控制北京政府的两系军阀，以代总统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和以国务总理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因利害冲突，发生了和战的分歧。1917年11月，北军在湖南境内作战失利，直系军阀冯国璋提出议和的主张，南方的桂系和滇系军阀，本是反段拥冯的，直系主和之议一起，他们便酝酿妥协，孙中山先生主张议和应坚持以恢复约法及国会为条件。桂系军阀即与政学系分子结合，转而酝酿改组护法军政府，排除孙中山先生。广州非常国会的议员们为了讨好桂系，竟在1918年4月底，通过了改组军政府的决议，取消元帅制，改设政务总裁7人。军政府经过这一改组以后，便完全变成了议和组织。孙中山先生虽也名列七总裁之一，但已无法立足，终于在5月4日向国会非常议会提请辞职去大元帅职，并在5月25日离去广州到上海去了。在辞职通电中，孙中山先生表明了他对于地方军阀的认识，“南与北为一丘之貉”。

(1965年)

## 护法政府之变迁

高承元\*

护法初期来粤议员人数甚少（约300人），故决定递补候补议员，补足其缺额，至1919年已递补百余，合之陆续报到议员达500余人（1918年6月13日两院出席人数，均达过半数为400余人开第一次两院联合会）。此500人中，国民党人数比率大大增加（候补议员百余人中，多数属国民党）。

计当时议员约分为五派：（1）照霞楼（在南堤，主要人物为林森、张继、谢持、邹鲁、叶夏声、吴宗慈、汪彭年、刘裁甫等）；（2）褚寓（主要人物为吴景濂、褚辅成等）；（3）新新俱乐部，在太平沙，俱系候补议员，主要人物为孔昭晟、谢英伯、吕桂南等，以上三派大都属中国国民党或附从者，拥护孙中山通过武装斗争争取民主之策略（即北伐政策与三民主义政策）；（4）政学系，主要人物有孙光庭、韩玉辰、杨永泰、沈钧儒、徐傅霖等，主张联省自治，和平统一；（5）石行会馆（在南堤二马路五十号之侧），主要人物有王绍鳌，政见大抵赞同政学系。五派各拥有议员百人左右，独新新俱乐部人数最多，有百余人，计一、二、三派合共约300人，四、五派合共约200余人。故在此时期，国民党在护法国会中占稳定多数。

国民党在国会中既占多数，故积极推动军政府的改组计划。从1919年8月起，国民党即在其机关报《新民国报》陆续发表改组军政府之评论，其最重要一篇标题《建设西南临时政府》，副标题：《由两院联合会议决撤销军政府，施行临时约法，组织

\* 作者当时曾参与非常国会国民党议员与政学系议员的斗争。

西南临时政府，由两院联合会选举临时大总统》。此文系由照霞楼议员《新民国报》总编辑汪彭年授意由我执笔于10月31日在《新国民报》署名甲园发表。文中着重主张由两院联合会即国会非常会议执行改组军政府之事，并援引非常会议组织大纲第一条（文云：国会非常会议以现任国会议员组织之）、第二条（文云：国会非常会议之议可以参众两院会合行之），以证明两院联合会与非常会议之同一性，证明非常会议有权改组军政府。发表后翌日，政学系议员韩玉辰即在《中华新报》（政学系机关报）用某政客名义发表谈话，提出辩驳，谓“非常会议到国会正式开会之日止即行消灭”，不能再行召开，并指非常会议等于天字码头露天演说会，其决定毫无法律效力。我又于11月4日再发表《论两院联合会》一文以驳之，引用国会非常会议组织大纲第三条（文云：国会非常会议至内乱戡定，临时约法之效力完全恢复时为止）以指明其非。尔后，尚有韩继续辩论往返三次之多，《中华新报》已钳口结舌，不能有所报复。当时两方争论之焦点，即在“两院联合会”或“非常会议”。盖正式国会开会有法定人数，而非常会议开会则无法定人数。当时国民党已占议席多数，欲利用非常会议无法定人数，不虞政学系之缺席抵制，故极力主张用非常会议或两院联合会议决改组案。政学系不欲改组，虑不足与国民党争衡，故常缺席以为抵制，所以极力否认两院联合会或非常会议之地位与法定权力，即主张除有法定人数之正式国会外，不能有非常会议之召开。

其时国民党于两院开会之际提出改组军政府之案，均为政学系缺席抵制以致流会。国民党终不敢毅然举行非常会议，改组计划遂致流产。

一次，国民党于开会时突然提出对岑春煊不信任案，亦因政学派退席流会而不能成立。

国民党考虑到不能开非常会议执行改组，实因在广州周围无

立足之兵力以为后盾，遂于其年十一二月间使李烈钧率一部滇军潜走北江企图解决政学系李根源之海疆军（原系滇军张开儒师，为莫荣新所夺拨归李根源带领，李烈钧欲收回之归己率领，以拱卫广州），不料交绥后，反为所败，李即逃走江西，间道入重庆，从此国民党议员大失所望，纷纷离粤，吴景濂（众议院议长）带领一部议员赴重庆（以四川省杨庶堪电邀），欲在重庆开非常会议；旋又以唐继尧电邀，褚辅成（众议院副议长）又带一部议员赴昆明，欲在昆明开非常会议。1920 年在昆明之议员开会决定迁重庆，及到重庆又值熊克武攻陷重庆，议员又逃回昆明，未开会，迁延至 1921 年，再回粤，开非常会议。

在国民党图谋改组失败之后，政学系即来一个反扑，于 1920 年，只有岑春煊、林葆怿两个总裁及莫荣新（代表陆荣廷），竟不顾 7 总裁中实际只有 2 人出席，开会免去总裁伍廷芳外交、财政两部部长职务。另行任命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王伯群（贵州刘显世代表）为交通部长，又增设司法部长，以徐傅霖充任（自护法开府以来，司法行政皆由大理院长兼管，由赵士北充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盖仿英制，至此始分设）。王、徐皆政学系，温、陈则前清官僚也。越数日，政学系孙光庭等又开国会非常会议（其时国民党议员星散，留粤议员仅有政学系及其附从者约 200 人，不足正式国会法定人数），议决免除伍廷芳、唐绍仪总裁之职，另选举熊克武（四川督军）刘显世（贵州督军）为总裁。这算是政学系之反改组，是护法政府之第二次改组。

护法政府之第三次改组，是在 1921 年 5 月。1920 年 10 月，援闽粤军陈炯明回师讨桂系攻入广州，岑、莫等及政学系议员纷纷逃避。总裁政府瓦解，尔后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等及国民党议员先后回粤。1921 年 4 月 6 日再开国会非常会议。开会时，由丁象谦动议，废除总裁政府，选举临时大总统，统率海陆军及

行使行政权（此即 1919 年计划改组之内容），即时投票选举，出席议员 222 人，全场一致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授予北伐全权，于是护法政府组织，又由合议制改为独任制，此为护法政府第三次改组。

陈炯明本属国民党，平桂之后，忽而叛变，主张联省自治，阻挠孙中山北伐。1922 年 6 月，更受直系军阀收买，炮击总统府，驱散非常国会。8 月，孙中山再离粤赴沪，护法政府覆亡。是时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一方欲夺取北京中央政权，他方又欲消灭南方护法旗帜，乃用釜底抽薪之计，驱逐段祺瑞所召开之新国会（依新国会组织法产生者）驱逐总统徐世昌（由新国会所选举者），宣称恢复约法，迎前总统黎元洪复职，召集民二国会议员到北京复会（为贿选曹锟作总统之准备），以为文饰，其实黎元洪大总统任期早于 1918 年 10 月 10 日届满。民二国会议员有大部分（特别是进步党议员）叛国乱法，应新国会之选举，因而丧失了民二国会议员之资格者，民二国会早已依法集会依法补选之民六护法国会所代替，今乃使满期之总统复位，召变质之国会重开，此而冒称护法，其实是玩弄约法而已。于是非常国会议员向北京复会之号召，乃相率创屣就之（后来酿成 590 个议员贿选总统之闹剧），护法国会从此葬送矣。

其后，1923 年 1 月，滇、桂军克复广州。迎孙中山回粤复任大元帅，不再召集非常国会，而仅凭各军之拥戴，至此，孙中山即举起革命之旗帜，不复以护法为标榜矣。

（1963 年）

# 参加护法战争后的回忆

方鼎英\*

## 一、参加护法战争

当湖南辛亥革命焦陈被害、谭延闿继任都督时，我正因湖北汉阳失守回湘。其时以湖南门户岳阳关系重大，众议曾继梧（号凤岗）往镇守，初设镇守府司令部于岳阳城，曾为司令，辖程子楷旅两团，驻城陵矶，袁宗瀚旅两团驻岳阳城。我任参谋处长，领导教练员百余人，皆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生派来实习的。曾虑汉阳既失，北军随时可以南来，岳阳首当其冲，一旦战事发生兵员补充是第一件急需准备的事，因即派员赴新化招募了新兵两团，成立补充团两个，即以这些教练员为干部，负责训练以备作战补充之用，意至善也。不料曾因性格刚强，其在湖南混成协任主任参谋时，有一批陆军速成学生初次毕业，派来协分转各标见习，由协部主任参谋负责领导。在这期间，曾好任性使气，这批见习生一般对他印象不佳。但到这时，袁旅各团的中下级军官多是这些人，加之袁本人性又多疑，因之曾袁间私人关系不无隔阂。新化招来的新兵补充团亦恰恰是两个，袁遂怀疑曾准备训练后将袁旅两团解散。这样挑起该旅两团官兵反感，搞得人人自危。袁遂以兵谏方式突来强迫曾立下手令解散补充团。

本来曾的司令部卫兵皆自袁旅派来担任，致袁之作乱更为顺利。但曾忽受此逼不甘屈服，遂严斥不理，致乱兵将司令部内所有职员的公私物件、马匹装具抢劫一空。我亦被隔断，整天不得

\* 作者时任湖南陆军第一师参谋长，讨贼军第一军代军长。

与曾见面，直至夜间因卫队的连排长皆上过我的课，有些感情，才私许吾与曾碰面。相见之下，曾只啜泣，不发一言。我乃告之即赴省城向都督控诉，主张严办，不伸张正义、整饬纪律绝不罢休。我才通过卫队的连排长护送出城，先赴城陵矶告之程子楷赶赴省城，向都督谭延闿详报。马上由谭召开军事会议，一致主张派兵下去严办；即决定由驻省城部队抽派一旅下去，联合程子楷旅围令解散。于是抽调部队雇用船只，整装待发。我乃坐催其整队出发。不料楼上脚步响，总不见人下楼来。久久杨伯笙（曾的参谋长）告诉我曰：“伯雄（我的别号）呀，他们要把戏给我们看的呵。他们根本没有解散袁旅的意向，你催他们，当然是不好明拒的。但想解决，恐怕还拖呢！”我听到这话，便慷慨地说：“这样下去，湖南的兵还有什么练头呢，算了吧，这种场合告不来的。好吧，我马上离开湖南到北京去当小科员去。”

当时我对北京是存在幻想的，以为首都是人才集中地，总比地方好些，遂到陆军部军学司炮兵科长李实茂处当个一等科员。但混了几年，竟被认为南方来的革命党，是搞乱的。我才知道北洋派是专与革命为敌的，袁世凯虽死而其他北洋军人相继而起，兵连祸结愈无尽期。北京非吾久留之地，乃乘选送学员赴日学习军事专门的机会带薪偕眷，再行东渡留学。临离北京时曾发狠心曰：“我将来如不一拳打碎你，誓不再来进你这腐败透顶的城。”抵东京后我即进陆军炮工学校的普通高等两科及陆军野战炮兵射击诸专门学校，后又转入东京帝大造兵科研究兵器制造理论。因此护法战争初期与中段都未正式参加，然每回忆住北京数年所见北洋军阀之祸国殃民，虽未参加已心向往矣。

直到 1920 年，曾继梧驱走汤芗铭后代理湖南督军时，曾截留了 80 万元光洋，欲为湖南办一件生产事业，并为此得罪了不少欲取用此款的人。但曾终于从美国买了一批母机回来办工厂（即今日的湖南机械厂前身），自任湖南兵工督办，筹设厂址于株

洲，电约我回湘协助。我于是年夏将家眷暂留东京，只身先回，为之检查整理一番，组织机构，创立规模，专负保管之责。适是年冬天，谭延闿被赵恒惕挤走赴沪，我因之同时东渡。次年春初，赵恒惕、宋鹤庚等电约我回湘，专任宋所领陆军第一师参谋长之职。这时已是孙先生护法战争的中段，我才算是开始直接间接的要与护法战争发生一些关系，亦窃喜暗伏多年不满现状的心愿矣。

## 二、策动湖南援鄂之役

### 1. 主张对外发展

我由日回湘所任职务，如上所述。我虽只是湖南陆军第一师的参谋长，可是有关省内外的大计，宋赵诸人皆乐与吾言。我在各方接触为时虽短，但已感到吾湘士兵健壮纯朴最能够吃苦耐劳，将领上下，大都英气勃勃，勇敢善战，视打硬战为家常便饭，艰苦朴素相习成风，是大可为国家作一番事业的基础，因提倡要及时向外发展，否则粥少僧多终非善计。对余此议，莫不同声相应，寄予希望。适邻省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政多年，日益与民离贰。尤其所辖部队，数月之间兵变三次，弄得人心惶惶，物议沸腾。鄂人蒋作宾、孔庚、何成濬、朱兆熊等代表湖北民意，齐集湘垣，要求湖南出兵援助鄂人驱王自治。这时孙先生号召北伐，原欲假道湖南直驱武汉，北定中原。赵以湖南自治为名，坚决拒绝。蒋孔诸人，本来负有号召北伐假道湖南的使命而来的，见赵欲以自治相拒，亦就扩大自治而改变说法，但言出兵援鄂支持鄂人自治，不再提孙先生的北伐假道，以为这样即是变相响应了孙先生为护法进行北伐的号召。这恰与吾建议要及时向外发展的主张暗相吻合，亦即全湘高级将领屡经讨论一致赞同的老问题。吾默察形势，此时为了向外发展而出兵援鄂，亦是名正言

顺，只待时机成熟即可水到渠成。倡导所及，不独官兵全体具有雄心壮志，即地方舆论，亦有正气凌霄、斩将擒王舍我其谁之概。而赵恒惕虽背叛革命，另搞一套假借自治名义来拒孙先生的假道北伐，但他为了自治而联省，已不能拒绝出兵援鄂，而我之主张向外发展也就出师有名了。吾当时主张对外发展而出兵援鄂完全站在赵恒惕的立场，未曾接受孙先生的革命指示，以至绝口不谈护法，实即是违反了护法精神的。既未本护法之命，又未用护法之名，而向外发展的目的何在呢？徒为了联省自治。

## 2. 路孝忱的政治投资

路孝忱号丹甫，陕西人，为吾留日陆军士官第八期同学。1921年陕西督军陈树藩交巨款百万元给他赴汉口做投机买卖以谋利。路亏空了20万元，正苦不好交账。这事为在汉口经营贸易的湘人彭熙铭所悉，彭亦知道湖南援鄂需款正急。因劝路即将这笔经营贸易的有限之资投到军政赌注上，则其利润之大不可估计，并以湖南政情近况相告，谓湖南援鄂军士气方盛，如果发动必将所向无敌，打下武汉，可操左券以待，那时候天下且为震动，陈树藩对你这笔政治投资将称赞之不暇，还怕不能交账吗？路遂欣然从之，于是湖南的援鄂出师军费便有着落了。

## 3. 援鄂之役成了鹬蚌相争，吴佩孚做了得利的渔翁

赵恒惕以王占元属直系，曾派代表赴洛商于吴佩孚，未得要领。但鄂人实似水深火热，群效秦廷之哭。赵曾电劝王自动辞职，以谢鄂人，王置之不理。终于是年夏季得到吴的默许，由其参谋长李济臣代吴示意，谓对湖南援鄂并不反对，湘赵才兴师问罪，通电援鄂，沿粤汉路及左右翼分三路进兵。在赵李桥、羊楼洞之线，即将王占元的主将孙传芳部击溃。计此役援鄂军第二师鲁涤平部叶琪团，于某日拂晓进行攻击时，在赵李桥遭到孙传芳

部防御线内机关枪十字火力的堵击。顷刻之间，猛冲突击，死伤千余未得成功。第二天重新组织迂回队，由我左翼羊楼洞夜渡小港，抄袭其右侧背后，才将孙部打垮。于是援鄂军一直尾随猛追至汀泗桥附近，又遇靳云鹗、张福来、寇英杰等部预先占了一个背水阵地，与我作顽强的抵抗，相持了 11 天。湘军的将领知道孙传芳早已被我击溃退出阵地，而靳云鹗等部乃直军吴佩孚所属，为什么蛮不讲理，这样横插进来抢夺胜利果实，把湖北督军一职给他嫡系师长萧耀南，反把流血苦战的援鄂湘军置之不理呢？这不是鹬蚌相争，吴则做了得利的渔翁了吗？不平之事莫过如此。所以全体将士非常义愤，认为吴佩孚太藐视湖南人，非跟他拼个你死我活不可。但赵恒惕初犹以湘军驱逐张敬尧时吴曾暗助过的关系，乃派萧光礼当代表前往解释，希望和平解决。吴竟不见不理，且把我代表萧光礼都扣押起来，赵才死心不再存希望，而亲身到前方来商讨此事。

我记得赵在蒲圻车站援鄂军总指挥部下车时私问我曰：“伯雄，今天这个会怎样开法？”我说：“我听说湘军将领勇则有之，但只能打胜仗，打不得败仗。如打败仗则一退就是几十里收不住脚，是这样吗？”赵曰：“是的呀，一垮遂不可收拾了。”我说：“那好，今天的会请下决心必打，或犹有万一的希望。因为不打败也垮，打也垮，其垮一也。与其不打而退而垮，不若一打，犹有万一的希望，乌可连这万分之一的希望也丢掉不要呢？今天请莫放弃此万一的希望，但约各将领，要求服从命令，作最后的一拼，如敢阳奉阴违，决以军法从事。”于是赵在前线开会时痛述：“吴佩孚之背信弃义，夜郎自大，太把湖南人不当人了。援鄂之先，得过他的同意，才出师驱王援助鄂人自治的。及援鄂军击溃孙传芳、赶走王占元之后，吴却翻脸不认账，而且派其嫡系师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抢夺了援鄂军的胜利果实，占领了湖北地盘。又派生力军靳、张等部，在援鄂军自动停战派代表奔走湘路

道中，正待彼此协商的 11 天之中，竟向我阵线中央及左右两翼进攻三次，均被我顶住，未加还击。这是我们眷恋前情尊重他的一种礼貌，而竟反遭袭击。现在如再不反攻，是我们自己丧失人格，怎么能对得起湖南的革命先烈呢？出师以来我们打垮了孙传芳，赶走了王占元，大家本来已经是很辛苦的，但今天吴佩孚之拦腰打劫实在是欺人太甚。我们再打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和他一拼，请大家各尽最后的努力，虽打得精光也是光荣的。如有不顾大局、阳奉阴违而不去努力争取此万一之望的，我绝对以军法从事，决不宽待。因为今日之事不是我们好战，而是吴佩孚逼得我们实在无路可走了。请大家想想吧！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们今天是要争这口气的时候来了。这是我十分痛心的话，不能不说的。如有异议者请在这时候提出来供大家讨论，否则就此决议。”如是催问数次无一起来发言的，于是决定次晨拂晓攻击当面之敌，把主攻摆在粤汉铁路线方面，赵并留在前方督战。

这十几天来我方虽停止攻击，可是敌人以子弹充足，每日天黑总是全线射击，声如煮粥，弹飞似雨，连绵数十里，不稍间断，机枪声更形猛烈，子弹悉落我阵前田陇或坡地中，防我夜袭也。我方恰恰相反，没有准确目标或正式攻击前进时，决不乱放一枪。敌我相隔一山谷，可以看得见喊得应，两侧都是丘陵起伏，山林荒地，各有壕沟与坚固工事，当我军拂晓攻击时，我到铁路线左翼地段去视察战况。此地的攻击部队是邹序彬旅，其前线与旅长所在位置相隔太远，只能用步哨传通消息，根本看不到敌人的动静。邹是我留日士官同期同学，故我向他建议旅长至少应到可以用望远镜观察自己部队运动的方向去才好。但邹自辛亥革命，在上海吴淞都督李燮和所率的北伐学生军总司令部任参谋长时，遇一流氓学生的狙击，腰部着了一枪，虽幸而未中要害，但已成了惊弓之鸟，以后便遇事胆怯心惊。如前在曾继梧岳阳镇

守府司令部，被袁宗瀚旅兵团要挟时，邹便逃走，三天失去联系。对我的建议，他提不出不同意的理由，仅唯唯诺诺，不付诸实施而已。

我深感此公之带兵作风已经过时了，而且不独邹表现不佳，即全线将领都是保本思想严重。所以拂晓攻击之令虽已实行，而奏效的没有一处。如是继续三天，毫无进展。在此三日中，我视察邹旅火线时，登其左后方的高地，看到其当面之敌成队后撤，正是我突击绝好之机，而邹竟置之不理。我连续要邹旅出击，亦无反应，真是急煞人也。不久发现其当面之敌又成队换防而来，但邹旅前线部队，仍若不知。这时即令敌的散兵壕内并未撤出，但这样整队的来来去去，总是极好射击的目标，岂可随便放弃呢。上午的攻击，都是依然沉寂，直到下午三时许，忽见敌阵动摇，其散兵如被赶的湖鸭子一样，纷纷后逃，而我方则冲锋号与喊杀声狂风暴雨似的从四面起来，全线蜂拥冲击，急起直追。敌阵全部被冲垮，直到天黑前，我尾随部队紧跟至汀泗桥头，便停止追击，因该桥很长。这个胜仗是无计划打出来的。由于敌我初级军官，都是保定军官学生，彼此对峙，既有 11 天之久，白天甚至可以对话戏呼。北军多子弹，南军恰恰相反，是所谓饷械都缺之兵，北军亦以此自骄，常对南军曰：“嘿！好小子，你瞧咱们这里有的是子弹和吃的东西，你敢来吗？”真令我将士非常气愤。我军将士遂组织了一个突击队，提带轻机关枪，沿敌我阵地中间约一人深的荆棘丛生的水沟，到达敌阵之前，用机关枪手榴弹对敌壕射击与投掷，敌登时混乱，全线动摇。我阵乃乘势猛射，出击尾随。这样，沉寂数目的战场，顿时杀声四起，使敌狼奔豕突争相后逃，越过汀泗桥，直经咸宁向武昌方面溃退。吴佩孚到达汉口时，张绍曾见而问曰前线战况究竟怎样。吴则取下军帽向床上一躺大声叹曰：“咳，完了，完了。”当天吴军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了。

这时有敌炮数门成了我们的战利品。唐生智、邹序彬两旅争执不决，都向总指挥部来电相索。当时我便警告唐曰：“区区敌炮数门已是我们的战利品，将来可由总部来公正处理，这时不必争执。惟敌人退过汀泗桥后，我们并未紧跟尾追，又已天黑，敌人随时可以来袭击我们，现在固守桥头的部队固属责任特大，即其他阵地的部队亦不可麻痹大意，以为敌既败退便万事大吉也。何况我们左翼还有敌兵三个团正被我围着，虽相约明晨拂晓缴械，但也难保敌不派兵过来营救，我们要绝对注意此事呵。”唐生智曰：“我旅所守桥头堡，早以用麻袋沙包做了很好的堡垒。配备一营人架着机关枪严重警戒。如敌敢闯过来，那就等于来送死。请放心吧。”我说：“那固然很好，但千万不要大意呵。”当夜幸而无事，不料第二天拂晓前，我守桥头的部队见桥上有敌部队约一连人过来。其连长为保定军官生，呼我桥头堡的连长曰：“我是保定军官生，因吴佩孚不许退，对我们退下来的官长要杀头，请你这边的军官同学许我们来投降，救救我们吧。”我桥头堡的连长便答曰：“既是真来投降，可把枪口朝下，缴送过来吧。”于是敌便遵令把枪送过来退到后面去了。如是接连又过来了两连，都是如此办法法到了最后一批，枪口虽是朝下，但所提的有手提机关枪，一到桥头堡前面，便将枪口向上一扳连发，将这一守堡的连击溃。于是全线动摇起来。由于其他的连不知敌从哪里来，成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也争先恐后的乱向天空放枪，影响后头垮下去，不可收拾了。而这一抢占桥头的敌人也并不向我们追赶，但守住这桥头堡向我们溃退的部队猛射。其余跟过来的敌部也恰是三个团的兵力，一直向我阵左翼开去解救其昨夜来被我围困的三团。到达该地时，我左翼监视被围敌人的部队一营长曹修佐，犹误认为是自己的友军，但喊问口令。谁知喊声刚落音，即被敌人开枪击中。跟着便向曹营各连一阵猛射，遂致死伤无数。于是我左翼部队亦狂呼奔溃有如着魔。而被我围困只待缴

械的敌兵三团，则转败为胜。

我总指挥部既未受到任何部队官长的报告，即用电话联系亦都断线无人接话。吾与宋鹤庚总指挥也就只好跟着溃退的大流，沿铁路线一步一步跟着后退。彼此埋头暗数铁路枕木，拖着送丧步子，慢慢地跟着向长沙垮去。好在敌人并未追来。已经胜了的仗，竟断送于一个守桥头堡的连长之贪图缴械，至今思之犹有余痛也。吴佩孚真是喜从天上来，便马上传令部队就地整顿以待候命。自己却乘兵舰直向岳阳上驶，找赵恒惕去强迫其投降，作岳阳城下之盟。赵从此只能仰承吴的鼻息，把湖南变成直系变相的征服地。北军只驻岳阳不进长沙。这样吴佩孚就做了得利的渔翁，算是如意算盘打得非常之精，一举而将两湖要地变为直系的地盘。

### 三、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

#### 1. 赵恒惕的首鼠两端

湖南为西南的门户。辛亥反正以来，有革命的历史传统，形势上是北洋军阀与南方革命所必争之地，更是革命党人发展革命巩固革命所不可须臾放弃的根源地之一。吾人而应当忠于革命，划清敌我界限，对抗北洋军阀这个大敌，才对得起湖南的革命先烈，尽到革命党人应尽的天职。而赵恒惕自逼走谭延闿后，怕外省势力侵入湖南，就打出自治招牌，原想做独立王国的梦，不料广东方面有政敌程潜随时有回湘夺取政权可能。谭延闿更是可虑，真所谓内外交困，不敢一刻安闲。于是南勾陈炯明以反对孙中山先生护法战争的北伐假道，但又惹起鄂人蒋作宾等请求援助邻省自治出师援鄂。而内部新兴将领，亦有急谋发展的，都主张接受鄂人请求，遂有兴师援鄂之役。这些情形都是他首鼠两端毫无一定政见的表现。湖南偌大一个可以左右全国政局的重要省

份，首先应该把政治方向决定，即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盲目的政治未有不失败的。而赵恒惕恰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终归迷失方向，走向反革命，投降吴佩孚甘为北洋军阀的走卒去了。虽有人向他建议，谓湖南地势虽属四战之地，但为西南的门户。革命在南方，湖南的革命先烈所流血创造的光荣历史，只能发扬光大，决不可抹杀乃至出卖的。那末只要立场不违反革命，其他任何手段方法尽可临时应付，到了真正革命北伐时，矛头一转，即任前驱，对于革命可谓殊途同归。而一时纵或有干物议，有何不可谅解的呢？而赵竟不出此。如第一次直奉战争时，奉军杨宇霆要赵对吴扯扯后腿，只要有所表示，吴便有所顾忌。赵都不肯为，甘当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死走狗，助纣为虐以终。

## 2. 赵恒惕对程派的大屠杀

1920年夏曾继梧任湖南兵工督办，以驱张时截下来了的80万元光洋从美国购办一批母机回来，想为湖南工业打点基础。曾电余由日回湘为之襄助。我除在株洲为之整理一个时期外，都住赵恒惕的参谋长唐义彬家作客。有一夜余方与唐在客厅聊天，忽有首彬混号首痞子者，是广西干部学堂毕业生，赵在该堂任过教官，故是赵的学生，前来向唐耳语，惟恐余听知似的。唐乃大声介绍曰：“这位是我的同学方某也，什么都可以讲，不必躲避。”首乃说他这次在上海曾向程潜派系的人大骂赵恒惕，故程派认为他是反赵的急进派，便引他参加程派对湖南进行政治活动的集团，知道他们的一些阴谋活动。说程欲利用其在湖南的实力派李仲麟区司令兼混成旅长为基础，搞颠覆组织来夺取赵的政权等语。我以事不关己，且属机密，遂淡然置之，不予注意。不久赵将谭延闿逼走赴沪。我也就再渡日本，次年新正不几天，石陶钧亦在吾家作客。一日早晨读报时忽见报纸用大字登载湖南赵恒惕大屠杀案，有李仲麟、易梅村等20余人被杀。我才非常惊异，

因将在唐义彬家听到首痞子所密报的情况向石转述，知道这一颠覆活动竟被赵恒惕等先发制人镇压下去了。石曰：“他们争夺政权不是争城占地杀人盈野的混战，便是这样你死我活的大屠杀。谁有枪杆子，谁有刀把子，谁就是当权派，谁就是统治者。不直接间接具备这些条件，在军阀混战时代更是什么也谈不上的。”我说：“你的高见我很钦佩。像我们这样在海外高谈阔论，也是空的呵。要想挽狂澜于既倒，还是回去实干吧。”石极赞成吾说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呵。”适湘赵等同学已有电相邀，遂决心回湘从新实干，不再在旁边只着急也。

### 3. 赵恒惕的标榜自治，大搞省宪又自毁省宪公开贿选的丑剧

赵为保境安民，力行自治，倡言民意，创立省宪进行选举。凡省长各司司长都按选举法由选民选出。如能大公无私以身作则，依法选举，则湖南第一任省长，他自己未尝不能当选。而赵则以选举为名，而私以权势与优缺相许来贿选其实。省长如是，其他司长的选举更是如是，以致票价一张值多少钱公开的买卖。弄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不知成了什么世界也。兹举竞选财政司长以及抢夺财政司长的所见所及，以概一般。谁都知道财政司长是各司长中最肥之缺，竞选斯缺者，遂如蚁附蛆，其贿选丑态，百出不穷。有袁华选者，本留日陆军第五期的骑科毕业生，洪宪之后曾亡命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学过一个时期的政治法律，遂成了一个十足的军人政客。他与赵是先后期同学，见赵竞选省长，他便竞选财政司长。但欲进行贿选，钱从何来呢？于是妙想天开的以 200 元嘱唐莽在长沙城最热闹的坡子街租一堂皇的铺面开一新钱铺，披红挂绿排场十足的大开其张，而于几百元一张的贿选支票上，尽写这新开张的热闹钱铺。各议员持其支票（写明财政司长选举出来后凭票到这新开张的钱铺付款）来坡子街这一新开的钱铺一看，莫不皆大欢喜而去，都兴高采烈的把袁

华选选举出来。及持支票到坡子街去取款时，则见此新开的钱铺竟倒闭歇业了。持这新钱铺支票的议员们大吃一惊，都骂袁华选这一贿选骗局太不成话。袁则满面笑容安慰曰：“现在财政司长已承大家帮忙选出来了，难道全省的财政司还不如一个钱铺吗？我并不是过河拆桥的人，请放心吧，财政司有的是厘金局、榷运局，请把支票拿来，看你喜欢那一个局子，我马上为你改写取款条子，持向你所愿意去的局子去如数取款，好吗？”这场滑稽把戏才这样结束。袁虽玩手法轻巧得到财政司长的肥缺，而意欲分肥的人，则以军队实力为背景来横抢强夺。袁无法应付，时时当面挨骂受辱，几下不得台。有一日，赵恒惕召开省府会议，余适在场，此会正演出一幕逼袁自退将这肥缺交给宋鲁两师长的兵目同学杨丙，而由军务司长李佑文出来唱大花脸，向袁指手画脚的大骂曰：“袁士权呀，你人格扫地卑污狗贱呀！”每次由主席座次走过我身旁，向袁座前指到脸上大骂特骂，几乎欲打他耳光，吓得袁不敢作声，只见他的脸时红时青而已。而主席赵恒惕且已走开，各师旅长都暗笑。余觉得太不成话，乃于李第四次走骂时，一到我身旁，便一手抓着其矮而胖的肩膀，向后一拉。他便倒退好几步。我怒目厉声曰：“李佑文你在干什么，你和袁同一司长，如袁有问题尽可质问，而竟这样一再漫骂，你晓得士可杀不可辱吗？我不同意你这种搞法。”李乃转向我曰：“伯雄呀，你关顾同乡呀？”于是宋鲁诸人马上出来劝我曰：“伯雄先生请息怒，李佑文大概是喝醉了吧，千万莫计较。”我说：“今天这会不是省府会吗？醉酒的人根本不应该参加开会。”大家便齐声说不应该不应该，今天就散会吧。这台戏便因我打抱不平而结束。赵也就出来责备李曰：“真是佑文不应该这样的。”袁也就跟着说真不应该岂有此理。我乃责袁曰：“猴子（日本话喊袁为猴子已惯了），你今天太丢脸了，赶快把财政司长辞掉吧。”袁才辞职，由杨丙出来继任。赵恒惕这班人，就是这样把湖南的革命传统摧毁殆尽。

## 四、谭延闿的改头换面

### 1. 谭与我的一番谈话

谭延闿是清朝官僚家庭出身。他自己亦少年得志，以翰林院编修得任湖南谘议局议长。辛亥革命时，湖南的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遇害，谭由湖南新军军官梅馨等拥戴出来，继任湖南都督后，数年间，几次政变，造成他三次督湘的机会，深深领略到割据一省独当一面的滋味。在他一起一伏之间，北洋政府曾发表过任他为内政总长，他都薄而不为，宁居上海作暂时的寓公，以待重新督湘的机会。他的封建迷信亦特别浓厚。我同他的关系是朋友又是部属，故每每见面后除公事外，便无话不谈的。有一次他说辛亥革命以前一两年湖南巡防队统领黄忠浩来京，曾一同到天坛去游览，天坛门口，有许多算命看相的摊子，有一长眉白须道貌岸然的相士，向他们特别招手曰：“请来谈谈吧，我的相法无论过去现在未来都看得很准的，不准不要钱。”他们游览后就请他直谈。相士便先对谭说：“尊相太好啦，你是少年得志功名很高。本是文人，偏有武相。现虽闲散，不久必有大运来，并且是独当一面威震一方。不过你这相应该起码是巡抚、总督、提督，但虽是这一类型的官，而又不是巡抚、总督，且将来发迹更大，一定还会入阁作宰相乃至有帝王之尊的。但又不是今日的宰相帝王，诚然我学识太浅，尚不能透彻的讲得出来。要之你以后会到这等地步就是的。”讲到此，谭乃插嘴曰：“照你这么说，那末我们只有上山做山大王去之一途了。”相士亦笑曰：“那绝对不是，不过这是未来的事，所谓天机不可泄漏，而我只能如是说就是了。”然后对黄忠浩曰：“你的功名虽不如他那末高，但也不低（黄是举人），并且现在你正走红运，手握实权也独当一面，要好过他是吗？”又手指其两眼角曰：“不过这里露出败相，杀气很

重，你是不是很喜欢杀人呀？你要晓得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是指相谈相，讲得直一点请莫见怪，你现在仍有杀人之权在手，望你改变作风总以不嗜杀人为好。至少也要少杀几个，看可挽救你一些已成的凶险否。因你凶杀难逃的相已很明现出来，并且为时已晚，恐怕大祸难逃呵！”黄乃大怒曰：“什么大祸难逃，我又不造反，你胡说。”相士曰：“请莫动怒，我是指相谈相的，再明白的说，你这相是将身首异处的，不是大祸是什么呵！”谭乃将黄扯开，并挟之而归，且走且劝曰：“泽生你真是，与江湖人动气这又何必呢。不嗜杀人确是善事，我们应该反省才是。”黄仍愤愤，不久各自南返。谭对我说：“你看湖南反正时，黄竟被害枭首示众了。我却悉如相士所言作了湖南都督，虽不是山大王，确非巡总提督之名，而有军政大权之实也。怪矣哉！相士之言竟这么灵。”我因谓之曰：“人的喜、怒、哀、乐各有其相，所谓哭有哭相笑有笑相，谁都看得出来。那末一个人的骨骼部位气色各有其祸福凶吉的相，在一个人的过去现在未来何时实现，亦各有其暗呈的相在。俗眼人看不出来，相士专家，能够看出是有道理的，并不奇怪。你的过去现在确是讲得很准，那末你的前程远大，相士之所谓名相帝王之尊云云者，自是国府各院院长与国府主席之尊，必有你的一份，可以断言。公其勉乎哉！”谭乃耸耸肩膀与我相视而笑。这是我在黄埔军校、他尚兼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军部设在广州高第街）时在军部深夜闲扯的一些故事，故不厌其烦的记述于此。

## 2. 谭延闿投向革命

如上所述他感相士之言，黄忠浩已验之于前。他又自民元以来逐步在湖南实现的既非山大王的搞法，又不是旧框框的作风。他领会到这就是革命，觉得他的一生事业，相士之言，已有安排注定，又何必他求呢。既欲革命，自以随孙南下入粤、厉行北伐

打倒北洋军阀为是。这就是他改头换面，转南不附北的根据。故其思想的转变，由向在湖南带头喊孙大炮的态度，做了百八十度的急转弯，变为奉孙为党魁，犹子之视父。其革命劲头，亦常言革命者不怕牺牲，所谓失败乃成功之母，怕失败便不会成功，是皆南下随孙之后，受孙的革命感化所致也。记得 1923 年湘军初入粤，与勾结陈炯明的江西方本仁部，激战于始兴南雄之间。结果方被击溃，并招降其第九混成旅高凤桂编为第一师，归湘军节制指挥，电余带领晋见孙大帅于广州士敏土厂。但孙先生仅以普通的问答口吻，大意是说：“好，你过来参加革命很好，前途是很大的，望好好的干吧。”数语了事。谭亦在座，事后我对谭曰：“先生对初来投诚的将领训话觉太简单，应多加慰勉表示亲切才是。”谭却劲头十足的为之解释曰：“先生对一个新来投降的将领能够当面许其过来参加革命，已是无上的光荣了。当然在高的看法可能是旧的思想居多。我们则应当帮助他，使之明白。”从这些地方看谭，是其思想之进步，自与其在湖南的时候迥若两人矣。他的革命之劲头之能够十足而不倒退者。相士所言恐怕是重要原因。故他深懂得革命惟有转南，才是新生命，附北则是死路一条的。黄之至死不变的下场，乃其前车之鉴。有八面玲珑之称的谭延闿何得再蹈黄的覆辙呢？

### 3. 谭延闿的奉命讨贼

赵恒惕自 1921 年援鄂一役投降吴佩孚后，便倒行逆施，肆无忌惮。谭延闿在沪不断与湘中故旧联系，知赵在湖南所作所为，实为革命北伐的大障碍，欲去此獠，非南去参加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组织是不为功的。遂于 1922 年在上海与孙先生见面，参加革命，不久一同南下入粤，任大元帅府的秘书长，一直由陈嘉祐、刘步青诸人与湖南的师旅长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蔡鉅猷诸人暗通声气。我也与陈嘉祐等联系于内，

酝酿倒赵。至 1923 年，适赵欲用兵湘西解决蔡鉅猷，夺取云贵烟土入湘的唯一孔道，影响所及，宋鲁谢吴，都有关系，倒赵之机于焉成熟。谭延闿遂由粤奉命入湘讨贼，直驻衡阳镇守使署，集谢吴蔡三混成旅的兵力，与赵的死党叶开鑫、蒋锄欧等激战于湘潭、株洲、朱亭、石湾之间达 33 天，赵竟请求吴佩孚派兵来相助。适陈炯明进攻广州城，孙电调湘军南援，谭奉命南撤将讨赵结束；宋鲁谢吴蔡各部被编为湘军第一、二、三、四、五军。我随湘军南下入粤，从此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党员，在孙先生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

#### 4. 宋鹤庚的患得患失

赵部两师四混成旅，仅叶开鑫旅为其死党，谢吴蔡三旅已公开反赵拥谭。宋鲁两师长则形式上不表示态度，骨子里亦同情反赵拥谭。尤其到谭入湘讨贼驻衡阳，发动了谢吴蔡陈与赵死党叶开鑫部作战时，宋犹避居湘乡原籍，置赵谭战事于不理，而谭委讨贼军的军职亦受之不辞。其当时患得患失的内心斗争不决，已达极点。余乃以“拥赵、拥谭、自干、滚蛋”八字派军法官胡耀湘持往，请其任选两字实行，倘再含糊犹豫，则余行矣。宋才决定请余前往面商。及相晤时，他说已决定滚蛋，即将谭委讨贼军第一军军长的委状印信图章交余代行，而离湘赴沪。余亦同时西行赴衡与谭面商，主持战事。

#### 5. 鲁涤平的看风使舵

赵谭战事已久，鲁亦与宋同一心情，初不表示任何态度，且住湘潭纳沙氏为夫人尽情享乐。一直到其妹夫在岳阳县长任内以事被唐生智枪毙，赵恒惕亦无所表示，鲁才愤然反赵。其团长袁植因不接受鲁的意见，便把他枪决，然后率此一团及炮兵团团长戴岳，于湘军将欲南援的时候，正式参加反赵最后一段战斗，跟

随谭延闿统率谢吴宋各部（蔡钜猷部刘旅毛谭两团仍返湘西与赵成割据对立之势，遥受谭延闿的节制）南援入粤。湖南一二两师的各旅及叶开鑫旅由赵改编另成四个师。叶开鑫、贺耀祖、刘型、唐生智皆升师长。鲁之反赵拥谭的态度与宋一同手法，实皆属有尾大不掉难言之隐。

## 6. 长沙的九一政变

谭延闿奉命讨贼抵衡阳后，发动谢吴蔡各混成旅与赵的死党叶开鑫诸部接战，只缘宋鲁两师初不明白表示态度，致当时形势暧昧不明。我如前述逼宋决策离湘赴沪后，我自己亦同时南赴衡阳。与谭延闿晤谈之下，知战事久无进展。我在来衡途中，看到叶开鑫旅的朱耀华团正向前线开拔。叶本有三个团，为什么朱独留在这时才向前线开拔呢？盖朱为张辉瓒的内侄，赵对之定有戒心，以故迟迟开拔。我因问张辉瓒曰：“你对朱有否把握喊他倒戈呢？”张曰：“这伢子对我说的话倒是向来肯听的。不过叶开鑫对他很好，能否跟他讲得通却很难说。”我说：“晓以大义，应该可以争取。因为他对叶开鑫虽好，但赵对他的怀疑已是事实，不然为什么叶在前方作战已个多月，独留他在后方，到现在才调往前方开拔呢。我请你马上派一个他所相信的人前往迎他，嘱其部队今晚即在炭团子附近宿营，要他赶到龟头市。而我和你吃过晚饭赶到龟头市与他见面，劝他明日拂晓入城将赵恒惕逮捕解送衡阳，并不伤害生命。这是他的第一功劳。”谭极赞成，谓这着成功可能性很大，是当前打开僵局的唯一办法，比与张商，派林昌武（亦张的内戚，与朱在保定军官第三期同班毕业）立即持张亲笔书信驰往迎朱，嘱如前计施行。

当晚我乃同张赶赴龟头市，半夜间即与朱晤谈。朱对捕赵解送衡阳一着，坚持不肯，不得已乃请其率部连夜赴省，将赵吓走，朱才允行，遂立即行动，而有9月1日之变。余与张随后进

城，赵果被吓走不知所向。赵的一班重要分子，皆匿藏不见。仍命警察维持秩序，朱军负警戒责任，探索赵的行踪。余感手无寸铁如何行使职权呢，因遣人急招胡海琴部约一营人，编为湘军第一军特务营，作为卫队使用。然已来得太晚，计九一政变，余以讨贼湘军第一军代军长的名义支持了长沙的局面 13 天。第一件应该做而不能做的事就是进城第三天，便已探悉赵恒惕逃到了醴陵车站，曾约张辉瓒、朱耀华商请派轻装便衣部队一连，取捷径将赵捕解衡阳，则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无奈朱坚持不肯，而张亦只重视筹款，成天召集商会开会，而忽视我的建议。余与谭延闿经常在电话中商谈此事，亦无法解决。后探知益阳、常德贺唐两旅的部队，向岳阳开动。贺旅的第七团团长谢军儒，且派人前来交涉投诚，终因我这一僵局难得打开而无成议。最伤脑筋的是刘叙彝旅已到宁乡县城来电话联系。我非常高兴，即请其即速开来以便在长沙作进一步的布置，不料忽然又来电话说唐生智已离开常德东去，他便又要折回去，开往常德抢夺防地。我说大局未定，一时抢占地盘又有何用呢。但刘却对战势大局毫不考虑，只顾自谋，一意孤行。遂使赵在醴陵车站探知长沙的虚实，从容布置，一面向吴佩孚求援，一面调集贺唐各旅，由岳阳配合援兵，向长沙进击。而朱团又不听指挥，真使我在长沙困守 13 日，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矣。至 9 月 13 日贺唐各部已逼近长沙，我犹镇静如常。但临离城过河时，遣人告知家属，到福音堂躲藏几天，再搭外轮赴汉逃难。家中书籍衣物十余大箱，悉被被蒋锄欧抢劫殆尽。于是即以朱团从岳麓地区隔江对峙，且战且往南方沿湘江的上游湘潭、株洲、渌口、昭陵、淦田、朱亭，向衡山、衡阳南撤，自株洲之役后，刘叙彝的毛炳文、毛润生两团，始加入作战。长沙的九一政变，本当时打开僵局的绝好机会，只因张辉瓒之不重视与朱耀华的固执私见，不从大处着眼，遂被坐失。

## 五、谭延闿的奉命南援

### 1. 师抵韶关遇方本仁来袭而有北江之役

当谭延闿奉命讨贼时，赵恒惕即已勾结广东东江的陈炯明、江西的方本仁，通过吴佩孚配合拥赵的部队与谭延闿对抗作战了一个时期，几近半年之久。湘南湘西及湘中的宝庆地区即为谢吴蔡的防地。今谭既奉命南援，谢吴部队随之入粤，其防地即由赵扩编唐生智旅为湖南陆军第四师，即以湘南为其防地。湘中的宝庆地区以刘型为第二师的防地，湘西仍由蔡割据未动。

湘军奉命南援，谭延闿亲率卫队，先驰赴援，即解广州之围。湘军本队仓促南撤，师抵北江韶关，即遇江西方本仁部高凤桂混成旅已将北江驻军杨希闵部赵成樑师由南雄压迫退过始兴城，相持于周田山地，大有抵挡不住致韶关岌岌可危之势。湘军南撤陆续开赴韶关，即马不停蹄的转赴周田山地，顶替滇军与敌军高旅接触，把他迫至始兴河的右岸。高旅占据始兴县城高地与我军接战。余率领湘军第一军朱耀华、李湘泉、黄辉祖、周祖晃、胡海琴各部，翻山越岭至始兴河左岸中游选择阵地与敌对峙。谢吴鲁各部则沿韶关始兴大道前进，占领始兴河左岸下游，在我左翼占领阵地与敌对峙。如此相持 11 天，迄无进展。余成天在离军部近 20 里的前线参加战斗，探知始兴河上游渡口很多，可以绕袭始兴城，因凑编一机枪连、迫击炮连，及有手榴弹的步兵一个营计共 6 个连的特遣部队一个混成营，挑选机智勇敢的邹务营长率领，连夜摸至始兴河上游没有敌人监视的渡口过去，再潜占始兴城外的高地，拂晓前到达目的地，即向城中猛射，同时相约左翼部队，一致及时猛攻。果然敌在我特遣部队威胁下，惟恐其退路为我所断绝，乃放弃始兴城急向南雄撤退。于是我谢吴鲁各部乘势猛攻，而我又给以迎头痛击，致使敌人狼奔豕突。在

始兴城外的大道上，狼狈不堪的争先恐后挤下浈江（曲江通南雄的河）的河沿而走。我部遂尾随追过南雄城未稍停，一直追至大庾岭才停止。我亦率特务营由始兴河左岸向始兴城外之始南大道跟进。忽右侧森林中有吹军号声，比拟我方部队尚有掉在后方，因命我部向森林方向探索前进。不料行至中途梯田间，忽由森林中对我军发射排枪，才知不是友军而是遇到敌伏。但很奇怪，为什么到这时犹有敌伏在后呢。乃命部队伏据梯田埂，占领阵地予以反击。一面抽一部分向后撤退至可以收容前线部队之地，再扼险反击。这样相互收容，且战且退，形势自极紧张。盖彼居高临下，我已走进敌之有效射程，如溃退乱跑，于我极其不利也。这样步步后撤，敌亦不敢来追。迄我以退至拐弯处，才命各选阵地，停止射击以待其来。但听到北方口音骂其士兵曰：“妈的，叫你不要开枪，等他来到跟前捉活的多好呢。他妈的偏要乱开枪，现在把他吓跑了，看着要到口来的肉都吃不着，你们他妈的真可恶。”我才知道敌人真尚有掉在后方的，其原因何在，仍不可解。险矣哉！差一点做了俘虏。我曾写有脱险记刻在一石碑立在该处，如不为地方人毁掉，应还存在。于是我复率部跟追至南雄，南雄通江西信丰之间，都是康庄大道，而我追击部队独无一兵向这些大道警戒。吾深不谓然，遂重新派遣部队向这些大道搜索前进。果于离南雄城不远的南新道即南雄通新城道上的村落中，发现有大股敌人方做晚炊，这股敌人如夜间向我来个突击，则我南雄大庾之间，将首尾不顾，那末我这苦战 11 天的北伐之役，不会功亏一篑吗？幸有我这么一着来补救，使敌感到山穷水尽，不再做挽回颓局之想。这次战役到这里才算真告一小结束。不久高凤桂便派员前来投诚，说他这次战役失利，方本仁不会饶恕他的，且钦佩我方作战真行，使他费尽心力竟无隙可乘。如我派遣特遣队威胁其归路的同时，他也曾派有轻装队，先夜绕过始兴河上游想袭击我后方。不料我方的特遣队能够如期暗渡始兴

河，占领城外高地，使之不能不放弃始兴城而退；而他的特遣队，竟迷失方向，未能如愿以偿，到第二日几与其本队完全失去联系，不能脱险云云。我才知道要将我捉活的危险，就是此公之所赐。彼此战局僵持至 11 天之久，同一迂回袭击以求打开僵局的办法，而竟有成功有失败，亦云幸矣。古言胆欲大而心欲细，我的特遣队假设不探明始兴河的渡口，或亦会迷失方向，则成功失败究将谁属岂可料哉。高凤桂旅在北军中有能战之名，在这次战役中而竟失败，或胆欲大而心欠细微有以致之欤？不然，同一迂回袭击以求打开僵局，何致竟迷失方向而自误戎机呢。每一战役之成功与失败，相差固止一间耳。

## 2. 以湘军为主力军的东征之役

陈炯明曾于 1923 年 11 月一度围困广州城，想摧垮孙中山先生广州的革命政府。但孙自调湘军南援后，赵恒惕的湖南地盘得松一口气。陈炯明又缩回其老巢东江。孙先生见湘军入粤，力量陡增，觉得陈炯明不予肃清，势必再来侵犯，因决定再行东征。湘军虽未得到补充休整，但东征之议既出，主力由湘军负责，自然是义不容辞。1924 春，以湘军为左路东征军，由增城博罗河源向老隆梅县攻击前进。滇粤桂军为右路东征军，由惠州海陆丰向潮州攻击前进。

湘军初来广州，语言不通，习惯不同，水土不服，又无兵站医院等设备，仓促应命进军，又值酷暑远征，一人河源新丰河岸，便与敌人接触。彼此隔新丰河岸对峙，瘟疫流行，土匪猖獗，官兵死亡枕藉。医药既缺，给养官四兵二，即官长四角、兵士二角一天，前进愈远护送愈难。离开广州城便非一营以上就是寸步难行，官兵每有朝同餐食，夕便发高烧而死去，埋葬不但得不到一块板子，甚至连稻草都找不到一卷，只能挖穴掩埋，立木记名而已。因此到河源，与敌人隔河对峙，久无进展。右路东征

军则条件较好，但亦一抵博罗惠州，便停止不进。余因由前方被派回广州，要求东征暂行就地调整，将重病官兵撤回后方休整，并盼有生力友军增援，待秋后再图前进。大本营亦深为忧虑。忽有华侨张民达（粤军第二师师长）自告奋勇，组织一个师，愿赴前方向敌一击。决由河源向老隆攻击前进，要湘军配合进行。这时湘军在前方有战斗能力的者不到半数，士气振作自有问题。故对张师的奋发图强，自不便阻挠，不过也曾建议大本营，对东征的两路军要从新筹划，作统一的安排，有齐一的步骤。若枝枝节节，你动我不动，是无济于事的。但张师仍以大无畏的精神向河源一带前进，不过为时不久也就虎头蛇尾以终。

### 3. 以湘军为主力军的北伐之役

1924年秋，冯玉祥在北京搞首都革命，将贿选总统曹锟赶下台来，联合奉军张作霖入关，和胡景翼、孙岳将吴佩孚击溃，通电欢迎孙先生北上，与段祺瑞张作霖会商国是。孙因任谭延闿代北伐军总司令，以在粤湘军为主力，统率滇粤桂军，由北江向江西出击。任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连日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大本营召集师长以上军官开会，讨论北伐大计。记得当天孙先生致词已久，余到会较迟，一人会场，见会场议席都已坐满，只孙先生主席座旁有一空位，余因往就座。只见会场鸦雀无声。忽闻孙先生喊滇军第三军参谋长李宗黄曰：“李参谋长，你们第三军的军长范石生为什么不来开会。”李马上起立答曰：“范军长因另有要事不能离开，故派我来代表听训。”孙先生不待其答完即继续怒声斥责曰：“你们在广东拿广东人的钱，吃广东人的饭，不给广东人做事。”盖因范石生在广东独揽广州市番摊税捐，骄横跋扈，只图回滇驱唐，置孙先生的北伐大计于不顾，故孙先生而有此言也。

这样孙先生部署妥当后，即离开广州，绕道日本北行，与张

会晤后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病逝于北京。而谭延闿则于奉命之后，即以湘军为北伐军的主力，滇军朱培德所部为北伐军的右路司令，向江西的吉安和樟树镇方面攻击前进。另有先遣军樊钟秀单独行动，由赣鄂边境横行无阻的直入河南。这时宋鹤庚已于东征时来粤任湘军总指挥，北伐时仍任原职。宋鲁（涤平）之间早有分歧，不过彼此蓄而未发，事实上亦不能不顾全大局而已。谭在这时任鲁涤平为北伐军前敌总指挥。这时我因在河源新丰之间受瘴气甚深，成了病人，发高烧大呕吐，入怡养园医治未上前线。但听说宋鲁竟在韶关大吵特闹，使谭无法调停，喟然叹曰：“使伯雄在此绝无此事。”两位主将既有意见，作战部署也非常大意，给方本仁造一绝大机会，把大庾岭防守部队一直撤至吉安附近早已布置妥善的阵地，严阵以待。而湘军以为敌弱可欺，不堪一击，也就毫无准备的跟踪尾追。有些部队甚至任伙食担子走前头。方在吉安附近即给以迎头痛击。湘军至一溃不可收拾，与朱联系完全隔绝，朱得不着消息，到了樟树镇亦蒙受极大损失，遂对湘军非常误会。查宋在谭奉命讨贼入湘时，不肯表示态度，是要在谭赵之间，始终保持可来可往的地步，只因谭赵决裂，自己夹在中间，只好暂自离开。故其离长沙赴上海的心意，以为这样对谭的拥护既不违背，对赵也不直接破脸，而且留有余地。其为个人打算，可谓周到已极。这次亲眼看到北伐失败，以为湘军从此再无希望，遂于退回广东的途中，甘受赵的勾结，单独回湘，做起赵的坐上客来了。

本来湘军入粤，以种种条件不够，致官兵思念家乡心理很浓，宋即是其中之一。赵深悉此情，故于北伐开始，派人在湘粤赣边境多方勾引，使这些动摇分子有一大部分跟着回湘，集中在湘粤边区之汝城县。当时我病初愈，体气尚未复元，在后方听说我方胜利，直趋吉安，既知溃退下来，我乃急赴前方，迎于南康途中，遇谭跟退下来，一见我面，便言怎办，部队如此溃散，不

知尚有几人回到广东，如何是好，有何面目回去见人呢？我说事已至此，只好急谋补救，请派得力人员先回南雄组织收容，严令任何人都要到南雄集中待令，不许任意离开。迄抵庾岭观梅时，又一再商讨今后的具体办法。我说千条万条只有整理一条，不过要打破旧框框请即以湘军总司令部为湘军整理处，请总司令为总监，各军师长为副总监，以团为单位，定期点验，规定一枪一兵，编得几团便算几团，严格挑选成军。编余的官长，送讲武堂读书，按期毕业。今后部队里的带兵官，亦应轮流受训，愿回家者资遣回家，愿干其他工作者极力保送。

到南雄后，由余草拟整理处条例，并附以团为最高单位的军队编制及湘军讲武堂编制，提出会议讨论通过，立即点验改编。仅一星期编成七个团，炮兵一个团，工兵一个营，讲武堂的特务营一个。这些新编成的官兵斗志昂扬，人人自信任何作战任务都可负担起来，绝不亚于以前编制庞大的一、二、三、四、五军。其时北伐军的参谋长方声涛是吾留日士官同学。有一日我在其鸦片灯下看见国民二军岳维峻致北伐军总司令的一个电报，大意是催请广东北伐军再度出师北伐，会师武汉。我问方曰：“此电你怎样复的？”方曰：“你们湘军败得这个样子，还能会师武汉吗？我是无法答复这个电报的。”我说：“慢点答复倒不要紧，不答复是不行吧。”方曰：“慢复当然可以，请问慢点又怎样复呢？”我说：“现在不是有一部分被赵恒惕勾回湖南汝城的部队吗？他们扬言誓死不回广东，可是又盘踞汝城不动，一再派人来催我去领导他们革命。本来我自己也有一部分队伍在那里，公谊私情是不能不去。我想一去，把他们整顿一下，带到湘西去与蔡钜猷、熊克武各部号称五万之众的部队联合起来，整顿一番之后，便可东下，与河南的国民二军会师武汉，我想至多三五个月便可成功。不过这件事和湖南赵恒惕关系很大。蔡在湘西割据几十个县的地盘，赵是没法对付的。如我这一来，可以为赵恢复几十个县的政

权。我想赵是极乐为的。不过从汝城到湘西，要你私函给赵，请他许我假道过去。这个交涉我是没有资格跟他谈判的，你去求他应无问题。届时还要请你由大本营给我一个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的名义才好行动。”方深表同意，一一照办。

我率随身的特务营，向汝城进发。谭极不赞成，谓：“汝城的部队不回广东就算了，你大病初愈，何必自讨苦吃呢？”但我说：“公谊私情不能不去，至汝城部队能否如愿处理暂且不管，但求一尽吾道是应该的。我将来还当回粤追随革命就是。”遂尔抱病驰赴汝城，与此间各部宣布假道赴湘西，再会合熊蔡各部东下，与国民二军会师武汉，大家齐声响应，精神立即奋发起来，即就地筹足给养一个月带走。一面将方声涛致赵恒惕请求准我开赴湘西再会合熊蔡各部东下与国民二军会师武汉的信函和盘托出，并请宋鹤庚从傍赞助，由秘书宋光务专程送去。结果赵宋等人，只迭电欢迎我回长沙面谈而不及其他。我复一再详电请求假道，但回电总是要求去长沙面晤。吾只好绕道粤桂边境以去。不料滇军朱培德部王均竟将北伐失利湘军撤退时，未曾向他通知，致其突进已达到樟树镇的部队受到莫大损失的误会，怪到我头上来，而加以报复，派队阻挠我的行动，待我部行抵九峰时尾随袭击，并勾结唐生智部何键夹击我部于山峡中。我进退两难，只好将部队横向九峰两边的高山，攀越上去集中于岭上，嘱守卡子，待我前去牺牲一切，为大家谋出路。吾乃由口才很好的副官张季生及中校周明（保定军官三期生）打着白旗走下山岭，探向湖南边地与唐生智部交涉，由他派一排兵送我下长沙见赵。途中该排长倒是招待甚殷，凡是饮食张必检验先尝，然后同吃。行坐起居张总是寸步不离，戒备甚严。

这样到衡阳，承唐生智特别优待，设宴为我洗尘，就是我和唐两人吃一桌丰盛的筵席。我坐上面，唐坐主位，晤谈数小时，并承其厚赠光洋两千元，又派专轮送我晋省。由老友曾继梧接我

到油铺街成邵吾家小住，共进晚餐，并相约当晚5时到省府晤赵，7时必回。曾曰：“这个鬼崽子，明白杀你是不敢的，但他派人暗杀你是必须防备的。今天我拼了这条老命来保护你，总要使你能够离开这个鬼窝子。我们对对时间，如你7时不回来，这个鬼崽子，也可能要别的花样来留难你。我便赶来省府接你好。千万要切记莫上他的当。”7年之后，赵、唐的亲信秘书邓寿荃在上海告诉我，说在这时赵曾电唐，要唐把我就地枪决。唐不谓然，以此示邓。邓说这是借刀杀人，你又何必为他做刽子手，杀此谁都知道的人呢。还是优待送走，看他怎样吧。而曾继梧开口闭口骂这鬼崽子不是好东西，足见此老之料赵卑鄙如见其肺肝然也。

我当时即别曾赴省府晤赵。比有唐义彬、邹序彬、宋鹤庚三人在座，彼此见面之后，赵开腔先说：“我们湖南士官同学，人并不多。你第二次在日本读书，我们联名打电欢迎你回来，原想大家同心协力来为梓桑作一番事业。几年以来，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姑且不谈。就拿这回你在汝城这件事来说，我们多人又联名函电给你，欢迎你回长沙面叙，不料你的回电，总是答非所问。最后据唐生智师长密报你部队近有异动，请示如何处理。我想到这时，你犹不开诚相见，而有异动，我才回电要唐痛剿。”其恨我之情，溢于言表。吾乃问曰：“你的话说完了吗？我也想说几句，可以吗？”于是唐邹宋三人齐声曰：“可以讲可以讲。今晚是我们老同学谈心，可以无话不谈。”余乃接腔曰：“这几年来我们同学在湖南所作所为是功是过，我也同意你的说法暂且不谈，留待后人去批评吧。单拿这回我在汝城的行动来说，先有大本营参谋长方声涛的长函介绍，我又专派秘书宋光务兼程晋省送请宋阜南（宋鹤庚别号）代为面陈来就商于你。因大本营为了答复国民二军岳维峻请求再度出师北伐会师武汉，知道湘西蔡鉅猷驻有熊克武部号称5万之众，特任我为北伐军特遣军总指挥，向你

假道，前往发动熊蔡各部合力东下，响应国民二军会师武汉完成北伐，使你收复数十县的湘西防地，这难道也值得你一剿吗？”吾言至此，宋鹤庚才很不自然的双手捧送方函交给赵手曰：“真是这封信我还未转交呵。”我才惊异曰：“怎么，此信你还未转交吗，这就非我所得而知也。请你先看看这封信吧，看我此来到底是有助于湖南还是有害于湖南呢。”于是唐邹等齐声曰：“好呵，我们都为的是国家大计，这样当面说明，一切都解决了。好吧，此话不可再提了。”便指壁上何贞老的字曰：“我们大家来欣赏此老写字的笔力吧。”我看时间已快到7点了，因告辞曰：“我要走了，现尚有病在身，要急于回到汉口家中休养。”他们便齐声挽留不必急去。我又补告曰：“今晚已与凤岗约好，如过7点不归，他便来省府接我的。这又何必呢，此老脾气大家都知道的，还是让我如约归去好些吧。”他们才不强留。

我回晤凤老，恰未逾限。曾乃马上陪我，将包袱用一担箩筐，叫张季生挑着，并说：“今晚有日本轮船开湘潭再驶汉口，我们即搭汽车到湘潭去买票上轮好些。”既抵湘潭，才知日轮因水浅不能来，又赶回长沙赴日轮码头，时已深夜，经过河街叶开鑫住宅，有哨兵喊问口号。曾很不耐烦的应声曰：“我们是老百姓没有口号呵。”哨兵斥曰：“既无口号便不许通行。”曾复应声曰：“不许通行我们走别路就是。”乃领我们绕河边烂泥道走过叶的住宅，才到大西门为我们买大餐间船票两张，送上轮船后，他犹拿着那担箩筐站在码头的趸船上。我和张季生站在船头屡劝其先回。但他坚持等轮船开动才离去。我之此来固置生死于度外，但见此老的侠义心肠，真令我感泣得终身难忘也。

我这样的回到汉口宝庆街家中，能与家人见面，大有虎口余生之感，于是一面报告广州的谭延闿，一面探知所领留驻汝城的部队，自我离九峰不久，便被何键缴械遣散。我虽曾竭尽心力重整旗鼓以谋继续实现北伐会师武汉，而终归失败，但吾人事已

尽，并没有见难而退，可无恨矣。而在粤的湘军，自整理改编后，官兵精神奋发，南路剿匪与解决杨刘，都卓有成绩。孙先生组党建军，设党代表，组政治部，派指导员，湘军莫不领先遵行。1925年孙先生病逝北京后，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一直到蒋介石北伐，谭延闿始终兼领第二军军长职务。

## 六、王得庆轶事

### 1. 王得庆的军阀作风几使顾排长祝同冤枉丧命

王得庆，江苏人，随老桂系陆荣廷部谭浩明与北军转战于湖南长岳时，带了人枪不到一团的架子，称为桂军几路司令来到湖南参战。结束战事之后，即留在长沙作为湖南的客军之一，由赵恒惕编为湖南的宪兵，任王为司令。援鄂军兴，归右路纵队司令叶开鑫指挥，由平州通城向武昌方面攻击。王得庆部在通城附近与敌寇英杰接触后，寇部不支溃退。其时顾祝同在王部任排长，缴获寇部光洋10万元。此时士兵群欲瓜分使用，经顾向士兵说服，凡是战利品应该扫数上缴，只能再请司令发犒赏，听候上面处理，才合纪律。但到事后上面竟渺无消息，士兵便要求顾为一问。顾但向王转陈下情，王竟大怒，谓顾煽动士兵要挟长官，应予枪毙，顾被禁闭，候令处决。

顾在禁闭室里，举目无亲，含冤莫白，彷徨无以为计。忽念在王部仅一荐主赵启霖是他保定军官同学，但亦只是一个参谋职务，人微言轻，难以以为力。转念王以一客籍军队，久驻长沙，知其对各方交际是不能不注意的。顾因记得有一次曾被王派其率士兵一排为省城某国会议员做喜事担任警戒、招呼客人，深得主人嘉许，一再向王称谢。倘得此人为他说项求情，容或有一线生机。因密条转调赵启霖代往求救。果然某国会议员一接此信，立来晤王，直言不讳的批评了王，而为顾力求保释。

其时国会议员的来头很大，稍不如意便遭责难，因此王对国会议员畏之如虎，不敢去得罪。今见其特地前来为顾缓颊，便满口接受，立即开释，并嘱顾前来向某国会议员道谢。顾自然遵命来见，并当面谢罪，急求准其离职他去。王自然一一乐许，认为既给了某国会议员的面子，又借办顾排长压服了全排士兵，不敢再对 10 万元有所要求。顾祝同无端遭此挫折，便南走粤，辗转而入黄埔军校，从此遇事小心翼翼，再不敢随便顶撞上司开罪于人了。王得庆给他的教训是不小的，他在蒋介石、何应钦下面一帆风顺，成了独当一面的大将岂偶然哉！祸之适以福之，王得庆于顾祝同之谓也欤！反动时期，军阀之拿军棍打人是家常便饭，不独责罚人要打军棍，即部属升迁前来谢委或辞别临行时，长官亦常高兴叫一声来人呀，给某官某某高升道喜，送他军棍几十吧。受赠者就得马上打千道谢，高高兴兴的挨打而去。顾祝同之因功受整几乎丧命，在当时军阀的眼里，确是家常便饭，并不稀奇的。

## 2. 王得庆的宠妾王仪贞做了何键正式夫人

护法战争期间谭延闿军命入湘讨逆之役，赵恒惕内部起了很大的分裂，不独宋鲁谢吴陈蔡诸军长、镇守使兼混成旅长脱离了赵恒惕并受谭延闿讨贼之命与赵的死党叶开鑫部混战于湘江流域株洲、淦田、朱亭之间，后且被拖去广东，即谭军王得庆亦率所部随客入粤，参加了东征之役，随湘军越罗浮山，在新丰河右岸与陈炯明军隔河对峙。是年新丰河流域瘟疫流行，加之湘军远道南来，士卒水土不调感染特多，又系仓促应命出发作战，后方兵站医药设备毫无，以致死亡枕藉，惨不可言。而对岸的地势平坦，市镇多些，村庄好些。敌将林虎与王都是老桂系下面的同僚好友，关系就较为密切。湘军初临此间，王即与林暗通消息。后瘟疫流行，由于王在新丰河右岸，山高林密，平地少瘴气重，而

河对岸的情况完全两样，面貌既新，乡村市镇条件亦好，人烟稠密，医药供应一切方便。王的生活向来腐化，加之酷暑长征，自难保持健康，这样两军对峙，而王与林又相隔只有一小河，自易转变念头矣。王遂率领全部偷渡过去。林则早得到陈炯明的同意表示欢迎，并令王率部移到后方暂行休整。不久王染疫竟至病重不起，死时其宠妾王仪贞随在身边，侍候送终，其子前来奔丧，王氏很坦白的将王得庆遗留下来的现款 30 万元全部交出，自己声明年纪尚轻只有 17 岁左右，想重新做人，立志读书。王得庆之子为其感动，即从中分 10 万元给她，成其志自由读书去，并托王的朋友谢文炳照料。此时谢亦在陈炯明部任军长职，王仪贞亦就认谢为义父寄住其家，从师就读。其所有 10 万元的生活费亦交由谢代为经营。这样彼此心安理得，九泉之下王如有所知亦当含笑矣。这就是旧社会里军阀官僚彼此之间尚有义气两字，在各自方寸中起到一定作用的表现。

谢文炳以后解甲归田，王仪贞亦随谢返衡阳，在城内某女子学校肄业，每日走读，早去晚归。谢颇有积蓄可以休闲自得，但欲故意装穷，乃在衡阳城大街上起一极普通的铺面，却在店后盖有洋楼庭院，经常延揽接待显要名人。后来何键当了湖南省主席，经常过衡，住在谢家，一见王仪贞年岁尚轻，人品文化亦属可人，谢又是王的义父，故一经谢的介绍，两下心意，便似水乳交融矣。何遂用飞机来衡迎接，由谢亲送长沙，并为女方主婚，举行隆重的仪式。王仪贞也就正式作了何键家的一位夫人，谢文炳则做了何键的乾岳丈。此事引起何键的家庭大兴问罪之师，醋海兴波，翻天覆地，轰动全城。此诚何键一生最合心意的艳福。王仪贞立志读书，从新做人，由一个小军阀的宠妾变成省主席的夫人，此亦可作为一轶事笔之。

## 七、记吴佩孚与杨宇霆

### 1. 吴佩孚的儒将派头

民初我在北京陆军部军学司炮兵科任一个一等科员。每日中午会餐时，常在办公楼碰见一位面无四两肉、外貌酷肖段祺瑞、板着一副冷面孔，轻易不肯交谈的人。我初疑其与段不是同胞兄弟定是嫡亲至戚。有一次我省留日士官第六期同学王隆中任北京总统府中将顾问应酬宴客，假座前门外陕西巷某西餐馆楼上，到客80余人。主人约定每客要叫八大胡同红牌姑娘的条子至少一两个前来助兴。于是燕语莺歌，管弦丝竹声，与宾主猜拳劝酒声吵成一片。独这位不苟言笑的宾客与军学司司长魏宗翰两人并肩而坐，冷冷淡淡，表现特殊。于是主人要我代他写条子，使场面热闹。我因问魏司长段先生贵相知有谁呢。魏忙摇手连说我没有也不要，又指吴说他不姓段，他是陆军部的咨议，名吴佩孚，字子玉，他更没有也更不要。我才晓得这几年来是猜错人了。后来我被派随陆军检阅使蒋作宾次长到岳阳检阅曹锟的第三师，见吴已当上了曹的旅长。据该师部一个顾问刘濬桥（河北人，是我留日陆军士官第八期同学）说，吴是段祺瑞在保定当北洋陆军军学辖军官（是民元以后陆军大学的前身）、军需、军医、兽医、军法、测绘等校督办时的一个测绘毕业生，对军事学虽非本科出身，但品学兼优，好读春秋，讲气节，喜吟诗，在第三师最有作用，确是一位了不起的儒将云云。我才进一步认识他的作风完全是一种自鸣得意的儒将派头。不嫖不赌不抽大烟，假装正经，其所由来者渐矣，当年北洋军阀中之能如此的确不多见。不过仅凭这点生活小节，便自命不凡，目中无人，未免坐井观天，夜郎自大，而且狂妄自负，始终与革命为敌，反动到底，这种装模作样、假仁假义的儒将派头于国计民生有何益呢？我故曰吴佩孚的

儒将派头即是他在迷信武力统一、祸国殃民的另一种手法。事实胜于雄辩，吾为此言岂苛论哉！

## 2. 杨宇霆的大言不惭

1922年吾由赵恒惕电请北京政府黎元洪大总统派赴日本看秋操，由长沙到北京见黎请示之后，乘京奉车路过奉天时，杨宇霆在张作霖幕府里任总参议，代表张作霖带同张学良接待我们。在筵席上大家闲谈，我见张学良仪表英俊，个子高矮、年龄大小与日本的皇太子仿佛，因戏谓之曰：“汉卿先生你这个样儿真与日本的皇太子一模一样。”我这个话当然还是夸奖的意思。不料我一出口，杨宇霆便接着曰：“嘿，你说这个太子是什么玩意，怎能跟咱们比呢，他是什么，咱们这个又是什么，真是，他那里能够得上来比咱们的呢。”杨在日本陆军士官留学时与我是同班同学，而且同是陆军野战炮兵科，彼此经常说笑话抬杠子搞惯了的。毕业后彼此隔别了十几年，不料一见面还是故态。我因亦讪笑之曰：“杨麟阁，我问你，现在你的处境是前有狼后有虎，你这蹦蹦跳跳的小猴子在这中间能够蹦蹦跳跳行所无事吗？我看你这称心如意的蹦跳不得几天呵。”杨乃傲然笑而答之曰：“嘿，咱们呀牵着大鼻子对付前面的小鬼，拿着小鬼对付后面的大鼻子，哈哈，咱们呀，站在这中间就是没事。”这大概就是他在东三省辅助张作霖对付日俄两国的外交策略。后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吾以搞抗日会而亡命于香港时，有一日曾将此段话与胡汉民谈及之。胡曰：“杨宇霆的话虽是说笑，可是说得很对，这就是对外均势之策，是国际外交上常取之道，与蒋介石今天对日的不抵抗主义比起来，要好过十万八千里。”但我总觉得杨宇霆这段话虽讲得对，不过他这种神气十足的狂妄态度，未免锋芒太露。这实是他骄傲自满、必遭不测于乱世的预兆。古所谓满招损、谦受益的教训，对杨宇霆的为人处世之道来说，是根本谈不上的。当时

的张作霖的幕府里已有新老两个派系。新派杨是首脑人物，老派则是张作相、吴俊升这班人，事事专与杨作对。不过张作霖对杨特别信任，凡对外代表一切，张作霖总是叫张学良跟着杨宇霆学习处理，好像是徒弟跟师傅一样的，于是杨也就老实不客气的对张学良以师傅自居。后来张作霖被炸身死，张学良继承乃父执政，欲给杨以别的职务，杨概不接受，仍以总参议名义参与政事，每每开会协商讨论问题时，杨仍大言不惭的对张学良曰：“汉卿听我的吧。”遂大模大样的发表他的意见说：“这件事应该要如何如何才行。”这样一种教训式的神气，在别人看来确是一种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姿态，而他自己却毫不自觉地成了家常便饭，以致更加引起老派的愤怒与仇恨。于是他们经常以老辈的口吻警告张学良曰：“孩子呀，你这个宝座是你的老子大帅不容易得来的呵，你看杨麟阁这小子对你那种毫无礼貌的样子，毫不客气的神气，还有你这个人吗？这小子迟早是要把你坐的这个宝座篡夺过去的呵！”我又记得 1928 年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到了平津附近时，杨宇霆因张作霖之被炸身死，将奉军全部撤去关外，扼守山海关继续抵抗。当时我所率领的国民革命军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第三军团所属各部队已进抵河北兴济韩村之线。总指挥部进驻沧州时，我曾派总部军需处长漆英密赴天津请张宣（留日陆军士官第七期同学，在奉天负电器通讯器材责任多年，其时已退职家居天津）至山海关策动杨宇霆及时易帜，并告以我们对日问题，将来国家中央会有整个办法提出来共同商讨的。计往返三次，费时一月，杨始欣然答曰：“好吧，只要将来国家中央会有整个的办法来对内对外的话，那末我们为的是什么呢？咱们东三省的事你们中央爱怎么的便怎么的好了。咱们听命就是，何况国民政府还有谭组庵先生们在那里，我们是很钦佩的。”但他绝不提及蒋介石，不久各路总司令总指挥齐集北京。

我曾在西郊的西山碧云寺（孙先生灵柩停在此地）接待处

(蒋便驻此)向蒋建议今后应对外用兵，对内则切忌用兵，换言之即攘外以安内为国策，请他定出十年计划准备军事对外即军事对日。因济南惨案血犹未干，这就是日欲亡我的先声。我们只要有准备，这个仗我敢包打。今后望于党政军三宝中，党政这两套法宝对内，另一则法宝专门对外，绝对不要再以军事来对内。总理遗嘱不是指示得很明白吗。他要我们打倒军阀完成北伐。今天我们的北伐军已达到了北京城，可以告慰总理之灵于九泉之下矣。其次是要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是我们今后应做的事。惟帝国主义者太多，我们采取远交近攻之法，即以日本为假想敌，只要把日本这个帝国主义打倒，其他都好办了。现在国内只有奉军尚悬五色旗于山海关以外，我将如上所述派人到山海关与杨宇霆接头这段经过报告之后，并说奉军也可以不打了，但请你缮一封亲笔信派我正式前去接洽，我保证把杨宇霆请来由你当面交代，那末杨便可以回去向张作霖的继承人张学良建议，马上使东三省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旗，并请他即在东三省把我们的十年计划实施起来。我并且愿意到杨宇霆那里去帮他们去干。这样东三省的事可以办好，其他反侧便谁也不敢来搞乱了，故曰攘外即所以安内也。吾说至此，蒋亦很兴奋的曰：“很好！我们当然要这样做。”

如是我正很高兴的等待着下文，以为可以实现我的建议了。不料不久，蒋忽在西山找我说：“现在白健生前来自告奋勇要去追击奉军。我已命他率其第四集团军沿京奉路向山海关攻击前进。并已令方振武部为左路军向热河方面攻击前进。你则因山东胶济路方面尚有刘黑七一股土匪已在雪竹(何成濬别号)那里接头要求收编，可要雪竹把关系交给你。我现给你一个胶东军总指挥名义(蒋边说边写)，你把第三军团并加派缪培南第四军归你指挥。你去把刘黑七部收编好，就在胶东整训。”并说胶济路一带是山东最好的地方，土地肥沃，人民富庶不亚江南。我听至

此，知他把我有关今后国家大计的建议已抛到九霄云外去了，心里感到非常难过，因即表示我的看法曰：“现在的山东主席是冯焕章先生所属第二集团军的一个总指挥孙良诚，在冯先生的眼里看来，以为山东就是他的防地。今又派我带这么多的部队前去，在孙良诚心里一定会怀疑我去抢夺山东地盘。那末我到了那里之后，与孙良诚一定相处不好。到那时候任我怎样顾全大局还是会跟我过不去的。故你要我到胶东去是可以的，不过我要先向你说明我的顾虑。”蒋一边解释派我前去的任务，一边执笔亲写好了一个手令交给我回去准备开拔军队。我才回到沧州总部，遵令将军队部署向山东胶济路进发。迨部队已南过德州，蒋回南京路过良乡（冯玉祥的总部驻地）便来电要我部队停止开赴山东，着即一直南回原防，要我本人从海道先回南京。这完全不出我所料，因冯不同意所致也。

对我以前的建议，以及已约等他亲笔书信交我特晤杨宇霆的那样一件国家大事，不独毫无回信，反而派白崇禧和方振武分两路去打他。杨将对我作何感想呢？这是我当时片面的感想。实则白和杨心眼的不简单，都是八两半斤。后来白与杨在山海关密晤后又有勾搭，实因当时的桂系自取得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番号并接收其部队后，便对蒋的北伐有两种阴谋：一是蒋的北伐如果胜利则自告奋勇请求继续参加，今见蒋的北伐胜利了，故请求追击奉军；二是如果不利，则准备缴蒋的械以倒蒋的。蒋深知桂系有此企图，故亦将计就计以制之，一面欣然允其所请前往追击，一面又由何成濬暗引唐生智归来，收回第四集团军桂系所接收的部队。盖桂系这次带来追击奉军的部队皆唐旧部，仅一随身护卫的特务团是桂系自己的。其意是胜利则功归诸己，败则牺牲唐部，损失落不到自己头上来。唐亦痛恨桂系的这种阴谋，就欣然归来，潜入掌其部队。待白自山海关回到廊坊，正待停车去部队讲话，叶琪参谋长忽见车站欢迎唐总司令的牌楼尚未撤销，便指谓

白曰：“唉呀唐孟濂回来了，你看这欢迎的牌楼还是新的呀！”白才惊讶，不敢停车亦不敢去北京，而直回武汉。这样的给白以根本的打击。白虽毒辣亦无如之何也。故白是始终反蒋的。而杨与我所派联系人的对话中，亦决不提及蒋介石，而只说谭组庵，则其心目中已无蒋介石可以想见之。故其与白一拍即合。杨终被张学良杀害，传说虽不一样，有说张学良经常受老派危言耸听的激动所致，亦有说蒋介石知杨不易受制，故其对东三省易帜对象，宁愿舍杨宇霆而找张学良，犹恐其从中多事，而唆使张学良把他杀害的。故蒋对我在西山所建议的有关国家大计，也就因此而不提也。

(1965年)

## 我在护法战争后的活动

仇 鳌 \*

1920年底，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赶走了陆荣廷的桂系力量。翌年4月，由参众两院开联席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总统。但是当时的西南军人，各为自己的地盘权利打算，不肯拥护孙中山先生实现民主革命的主张，湖南的赵恒惕就是首先发电反对孙中山先生为总统的人。孙中山先生做了总统以后，筹划北伐，以打倒北洋军阀的统治。不料在这时，发生了陈炯明的叛变，孙中山先生又离开了广州。

这时，北方各省在北洋军阀的直、皖、奉三系的混战之下，今日你赶我走，明日我又赶走你，政治腐败，人民痛苦。西南各省也是军阀割据，以联省自治相号召，与北洋派为一丘之貉。我当时感到民国成立，已经十年，民主政治，一直无法实现。自己参加了辛亥起义及讨袁、护法的斗争，结果一无成就。在对国事感到失望之余，就动念前去欧美各国考察，想要找到欧美民主政治的真谛。

我经由美国转赴欧洲，又游历了英、法、意、德等国，毫无所得。最后又回到伦敦，在牛津大学附近，租屋寓居，延请好几位专家，为我讲课，研究欧美政治问题。

正在我游历欧美的时候，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研究中国革命问题，提出“以俄为师”的主张，并且着手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孙中山先生的主持下召开了。会上发表大会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正式决定改组中国国

\* 作者当时正在欧洲考察各国情况。曾任国民政府铨叙部次长。

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我当时在海外，没有参加国民党的改组活动，但在考察研究之中，孙中山先生这种伟大的见解和措施，对我有很大的指导作用，使我对中国问题有了新的认识。

在 1924 年间，孙中山先生还出版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和《建国方略》等书，这是孙中山先生几大著作的宝稿。同时，还陆续发表了《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女子要明白三民主义》、《中国人民受不平等条约之害》、《反对假革命》，我在海外陆续看到这些文章，也在彷徨、探索中得到了新的认识，认为中国要有办法，实在就照孙中山先生的主张不可。

孙中山先生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孙中山先生的认识是逐渐加深的。我在 1906 年初次会见孙中山先生，当时接触很少，认识不多。1911 年辛亥革命后，我再度会见孙中山先生，还是没有深切的认识。一直到 1914—1916 年在日本和孙中山先生有长期、多次的接触，嗣后又读过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而后真正认识了他的伟大。不过，那时的认识还是有限的，因为没有长期跟着孙中山先生工作和活动，所以认识不能与时俱进。直到这时，孙中山先生提出以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之后，才认识到中国一定要照孙中山先生的办法才有前途。

孙中山先生于 1923 年命令驻在福建及粤、桂、湘边境各军分途进攻广州，赶走陈炯明之后，回到广州，就任大元帅职。一面改组国民党，一面筹办黄埔军校训练革命军事干部，并督师东征陈炯明，计划全力北伐。1924 年秋，孙中山先生督率湘、滇、粤、桂、赣、豫、川、陕各路部队，出师北伐，设大本营于韶关。是年冬，北方政府的段祺瑞、张作霖于推翻直系的政府之后，派代表到韶关大本营，要求合作，并表示可以接受孙中山先生对国事的主张，邀其共商解决办法。孙中山先生 11 月间离粤

北上，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两项，向朝野上下宣传，作为解决国事之根据。

不幸孙中山先生途患重病，力疾到京后，病势更加沉重，医治无效，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临终留下“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及“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的遗嘱，并且留下致苏联遗书，重申“联俄”及“以俄为师”的坚决主张。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未成，忽然逝世，当然是中国的损失。我当时闻讯，异常悲恸，异常惋惜。原来我在接受了孙中山先生以“以俄为师”的主张以后，在伦敦的最后一段时期，集中研究苏联，并决定前往苏联考查，以期找到中国革命问题的解决途径。因为前赴苏联考查是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而去的，所以本文最后，特就此事一谈。

1925年秋季，我去苏联考查游历，同行还有两人，有一人精通俄语。我到莫斯科后，曾去东方部提出20个问题，对于苏联革命及苏维埃政制及其他有关事项，请求分别加以说明。该部负责同志没有当场答复，说要交有关专家作答。过了几天，才给我答复了。可是，他当时反对我提出20个问题，要我说明自己的看法。因为我未去苏联以前，曾对苏联作了一个时期的研究，又因根据孙中山先生的联俄及“以俄为师”的主张，对于中国革命与苏联革命的异同，作过探讨，所以我当场就他提出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当时该部同志听了，不但点头赞许，而且神色为之惊异。在分手时，他对我说，明天有一个集会，希望我们参加，问我们同意否？我说：“我们到此是为了学习，无论什么集会，都愿意去参加的。”第二天，农民国际开会，派汽车把我们接去了。在开会时，主席首先说话，我那个懂俄语的同伴听了，对我说：“这个会原来欢迎我们，你要准备说话。”我当时也觉得意外，但既然如此，不能拒绝。就对那位同伴说：“我可以说话，

但是请你翻译，如果有说话不对头的，你就略去不翻吧。”我原来毫无准备，还是出来说了话，结果倒好，听众一再鼓掌，表示欢迎。次日，报纸登载，说是欢迎中国国民党代表团，说我是团长，余两人是团员，并且把我们是照片都登出来了。

我看了报纸，很不谓然，马上到东方部去声明：“我们不是代表中国国民党来的，乃是以个人资格前来游历的，我们并没有自称代表团，为何报纸上如此登载呢？”当时要求更正，但对方说：“这没有关系，一切由我们负责。”我再度声明：“并不是我不能充代表，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奉代表的使命，报纸如此登载，大大不可，务必要请更正。”但是，结果还是没更正。

我们经由东方部的介绍，到各地工厂学校去参观，因为报纸先是那样登载了，所以所到之处，无不表示欢迎，一切予以便利。只是一层，所到之处，大都开会欢迎，处处都要演说。事已至此，无法拒绝不说，而且为考察而来，也不能因此而不去各处参观。

在苏联各处参观访问，经过了一个多月。我向他们提出，准备趁火车回国，请为代买车票。动身的日期定了。并且报纸上还登载我们动身的日期。但是到期他们并没有为我们准备车票，我向他们催问，他派人来说，为了我们途中安全起见，已把行期推迟三日。因为我们在苏联的行动，已经在报上发表，恐怕发生别的问题，所以临时改期动身，较为妥当。

我们离开莫斯科时，他们组织好成千上万人到车站欢送，并且还有女同志来献花，完全是对一个代表团的欢送礼节。并且我对于他们把我们当作中国国民党代表团一事，深为纳闷，但仔细一想，或者他们有意表示其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是有他们的作用的。

我们在苏联的考察工作，在上述情况之下，顺利很多，所以收获也很不少。我回到国内，曾经到处介绍苏联的情况，列举革

命的成就，深表赞许。这对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号召，是有所贡献的。

还有一段插曲，值得一提。我们经由西伯利亚铁路到达哈尔滨下车时，当地政府已经派军警搜捕我们三天了。原来，他们看了苏联的报纸，说有三个共产党由苏联回来了。不过，阴差阳错，他们把苏联报纸上“仇鳌”两字的拼音，误译为“赵”字，所以他们搜捕的是姓赵的共产党，不想苏联所载却是我。同时，我们坐的是三等车，他们注意到头二等车厢去搜查，我们已在三等车厢下去了。下车以后，听到在当地政府工作的一个朋友说，才知道有上述的情事。我当时托那个朋友去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党员，虽然从苏联考察归来，却不是他们搜捕的对象，并且拿出一张湖南民政司长的旧名片作证，这样才算搞清了。不过，有此一段插曲，正好证明苏联方面为我们改变行期，是有他们的道理的。

(1965年)

## 桂系军阀之盘踞广东

李朗如 陆 满

### 一、援闽粤军的组成

1916年6、7月间，桂系军阀头子陆荣廷率领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等各师（共三个师和其他部队）共数万人，于是年8月占领广州后，则以陆荣廷为广东督军，朱庆澜为省长。1916年冬间陆荣廷调升为两广巡阅使，而由陈炳焜为督军，李耀汉为省长。1917年春陈炳焜调广西督军，以谭浩明接广东督军，1917年夏间谭浩明被调走时，又以广惠镇守使莫荣新升广东督军，以李福林接广惠镇守使兼福军司令，同年七八月间，莫荣新为了消灭李耀汉部的肇军，以便减少反对他的力量，以省长职位来引诱肇阳罗镇守使翟汪向他投降，并以肇阳罗镇守使职位来引诱肇军统领左日光投降，因此李耀汉所部二十余营的肇军整个瓦解，没有抵抗而失败了。不久又以杨永泰接张锦芳的省长职位。

桂系军阀陆荣廷到广东以后，除将龙济光的济军调海南岛外，所有的军队都由桂系收编了，其中有二十余营编为朱庆澜省长的亲军，以陈炯明为亲军司令。还有镇守使兼肇军司令李耀汉部的肇军十余营。海军给收编的舰艇计有江字的大、汉、巩、固，广字的元、亨利、贞以及宝璧等数十艘。

1917年冬间莫荣新为了消灭异己力量，强迫陈炯明所部二十余营军队立即出发入闽，而用间接的手段来消灭广东反桂系的队伍，但桂系军阀莫荣新的阴谋目的不仅没有达到，相反的陈炯明所部援闽粤军进占了漳州一带，从此扩张力量，以加紧训练队伍，待机回粤驱逐桂系。

## 二、孙中山先生南下护法和反桂系军阀的斗争

1917年，北京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及大小军舰约20艘，南下拥护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但北洋舰队到达上海附近的时候，对于舰队的经费和燃料都没有想出解决的办法，以后才得到上海大资产阶级哈同富翁负责筹措而得到巨款（原文如此。——编者）。经费问题解决之后，孙中山先生就请程璧光、林葆怿、汤廷光将第二舰队全部开来广东。孙中山先生到达广东后，立即成立了大元帅府，以河南士敏土厂为大元帅的办公地点。

孙中山先生南下进行护法运动，当时得到广东部队和李烈钧部的滇军（即张开儒、方声涛等部）的拥护，但桂系军阀陆荣廷，陈炳焜、谭浩明、莫荣新等反对孙中山先生，以致护法运动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1917年冬间，孙中山先生为了达到护法目的，决定首先要铲除障碍，才能得到命令的统一。因此下令北洋舰队、江防舰队与李福林的福军、魏邦平的魏军、方声涛部的滇军等部队，用水陆包围的形势向桂系进攻。准备用军舰首先向观音山和督军署炮击，继之以陆军围攻，并准备将桂系督军莫荣新俘虏，将驻在广州市的桂军先行消灭，以后向广州以外的大部分桂军进剿，以达成护法的任务。

于是，在1918年1月的某个晚上，孙中山先生即派朱执信先生进入城内负责指挥李福林的福军、魏邦平的魏军、李耀汉翟汪的肇军、方声涛的滇军，派许崇智到东门外指挥将出发入福建的粤军，并令各军舰准备炮击观音山和督军署等处。这一切布置就绪之后，孙中山登上同安舰并亲自指挥各舰出击。到中流砥柱附近地方，预备向目标进攻。待至凌晨1时开始向观音山炮击，并指定方声涛部驻广州市的一团兵力进攻观音山，以魏邦平部驻广州的四营、李耀汉翟汪部的五营、李福林部的五营（河北一

营，河南四营）合共 15 个营担任进攻督军署、江防司令部、大佛寺等指挥机构，以陈炯明、许崇智部驻东门郊外的粤军约 10 余营的兵力为总预备队，待桂军开火抵抗时，就立即分路进攻。

半夜 1 点钟的时候，军舰开始向观音山炮击，并以小舰进入省河分向桂系驻在长堤一带的江防司令等机关监视，并以重机关枪向其机关门口扫射，使他们惊慌失措，手忙脚乱，而能接受缴械投降的条件。但自 1 点钟起军舰开始向观音山炮击至天亮为止，桂军都没有回击一枪一弹，甚至孙中山先生指挥各军分向桂军机关和驻地进攻的部队都没有动作，以致督军署和其他桂系机关和桂军驻地都安然无事。当时驻在广州桂系兵力不到 3000 人，以我军兵力约有 9000 余人，力量的对比是我众敌寡，如果那时各军能够服从孙中山先生指定分路进攻的计划，则在数小时内就把它消灭了。

当时，桂系为什么不开火抵抗以及各友军为什么不向桂系部队进攻呢？其原因是：各军表面上拥护孙中山先生的护法主张，实际上是想保存实力，拥军自卫，而作两面俱圆手法的小军阀，因此各军队还是暗中反对孙中山先生用武力解决桂系军阀的做法。另一个原因是：李福林知道了孙中山先生决定炮击观音山和督军署的计划之后，则在前一天的晚上走到广东军队组织的军警同袍社并找着广东省长翟汪，叫他即乘轿到督军署，将孙中山先生的计划告诉督军莫荣新知道，并请以消极防御，以免惹起各部队有借口进攻。否则以桂系力量之薄弱，恐难于支持而自取灭亡，请莫督军对孙老头儿的暴怒，必须沉着应付，千万不可妄动或积极抵抗，而后悔莫及等语。（李福林在军警同袍社对翟汪所说的话是由辛亥革命反正起义的民军统领黎义在内休息而听到的，李福林知道要捏造罪名，将黎义暗杀灭口，我了解李福林的阴谋，立即通知黎义逃港。）莫荣新得到消息以后，采用消极的防御，使孙先生以武力消灭盘踞广东的桂系军阀，铲除护法运动

的障碍的计划遭到失败。

当晚我和陆祥（宗祺）、邓彦华、刘节仓，化装成福军士兵作卫士，随朱执信和许崇智进入城内，到广惠镇守使署和福军秦棠连部的双门底城门楼上，待军舰开始炮击观音山时，则指挥各军向桂系机关和驻地进攻。至凌晨1时，军舰依时开始向观音山炮击时，朱执信就指挥驻广惠镇守使署内吴近所部的福军一营和秦棠部的一连向驻在大佛寺叶林勋部的一营桂军进攻。我将命令传到吴近时，他对我说：“已接到李司令（李福林）的电话命令，如果没有得到他的命令时不得出动，否则军法从事。”因而指挥不动，再指挥肇军、魏军、滇军，他们都说桂军未开火，不能出击。直至天亮炮击停止，以后，广州仍然平静如常。面临这样的局势。朱执信立即化装逃出城外而转往大元帅府报告经过情况。当他抵达大元帅府时，并用电话通知我说已安全到达了，请设法将带入城中作护卫的东西（即驳壳左轮等手枪）带回大元帅府，以做护卫应用等语。我就换上了福军的装束，除身怀两支手枪外，将其他手枪放进皮箱，并到广惠镇守使署取到封条一纸，将皮箱封了以后，就接着出城。第一处城门是由桂军守着的，侥幸地桂军没有检查而放我出了城门，于是到长堤乘艇回返大元帅府。

在1917年夏成立大元帅府的时候，关于保卫工作是由李福林派了福军营长胡新部负责，以为这样已经是严密的防范而安全了。但莫荣新把孙中山先生视为眼中钉，因而暗中授意他的宪兵司令谢卓英，向保卫大元帅府的营长胡新进行收买，准备暗杀大元帅。幸得朱执信接到密信，而洞悉其奸，因嘱我暗中监视胡新的行动，并和他的连、排、班长密切联络，以了解胡新的阴谋。我得朱执信的指示以后，则带同亲信数人到大元帅府，执行朱先生交给我的任务。以后我查出福军营长胡新受桂系收买是李福林暗中授意的。但孙大元帅有严密的保卫，敌人阴谋无法得逞。于

是李福林以胡新被海关密告走私有罪，将其枪毙。

当孙大元帅亲自指挥炮击观音山以后，桂系军阀对孙大元帅的仇恨更为加深，而秘密地请海军总长到广西南宁，进行面商如何对付孙中山先生的一切问题。结果是取消大元帅府，改组为七总裁的军政府，以岑春煊、陆荣廷、孙文、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总裁，而在 1918 年 5 月，孙中山先生就离粤赴沪了，不耻与这些官僚军阀混在一起。并在 1919 年 5 月间发表了护法宣言，但得不到南北两方官僚军阀的响应，因此，未达到国会恢复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与永久合法的和平和重建中华民国的目的。

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致死的原因，是他受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邀请秘密到广西南宁面商反对孙中山先生，而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张民达等认为程璧光是拥护孙先生的护法运动而起，现在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护法运动而告终，这是绝无宗旨及反复无常的无耻行为，决定置其于死地。因此，派了数人到海珠长堤附近，待他过渡到长堤码头的时候将他枪杀，以警告绝无宗旨之徒。程璧光在海珠附近长堤码头被枪杀致死后，桂系军阀莫荣新提交军政府，在程璧光被杀死的地点建立了铜像纪念他，广州解放之后，将程的铜像拆除。

### 三、粤军由闽回师

1920 年间反桂系军阀时，是孙中山先生命令陈炯明、许崇智领导所部在闽南漳州一带的粤军回师讨伐桂系军阀，并派朱执信和古应芬、孙科、吴铁城、胡毅生、李朗如等分负反桂系运动的任务，并以李朗如和胡毅生负责运动魏邦平、李福林两部独立以达到对桂系形成了大包围的形势，而消灭桂系军阀的目的。

朱执信奉孙先生命从上海到香港，主持政治军事经济等，联络和策反广东人所部的军队，夹击桂军。

朱执信并在香港中环东京酒店设立讨桂系办事处，以便就近指挥和各方面的接洽与联络。

在 1920 年秋间，粤军就开始回师了，同年 10 月底陈炯明部的粤军回到广州，并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兼任广东省长。直到 1922 年 4 月，陈炯明因反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北伐，而被大总统免去了他的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及大本营内务部长职务，专任陆军总长。

1920 年 10 月间，桂系军阀莫荣新因鉴于魏邦平和李福林各领导原有所部和秘密扩编的军队约二万人，9 月中旬在河南及珠江三角洲一带宣布独立，而粤军那时已由闽南回师将抵达惠州的时候，桂系军阀所部就开始向广东北江撤回广西了。

#### 四、魏邦平、李福林宣布独立的真相

1920 年 5、6 月间，李朗如和胡毅生开始向李福林、魏邦平进行策动反桂系的时候，经多方设法秘密说服，都得不到李魏两人的决定，还是在犹疑不决的敷衍中，至同年 8 月初，朱执信派陆满向李福林催促要他立即独立，并向其说明现在克复汕头的粤军遭遇到桂系军阀林虎所指挥的大军的反攻，战争在激烈进行中，如果李福林不立即独立起来响应粤军的回师，那么粤军的回师难免遇到再前进的困难。但李福林对我说：时机未到，不能妄动等语。当我再这样问他道：“是否待粤军到达惠州以后才独立呢？”而他只说：“到时再考虑吧！”直至 8 月 20 日下午，我再往催促时，李福林说：“执信已被杀死了，还干什么呢？”我便答他道：“朱三哥既被害，李司令应该立即独立以竟朱三哥达到讨桂系的意志，而为朱三哥复仇，这才真是朱三哥的亲密朋友！”李福林回答允许再考虑。

同年（1920 年）9 月间，粤军已回至惠州在战争剧烈而紧张的当儿，李朗如用激将的办法，先向魏邦平说：“现在登哥（即

李福林别字登同)已答应从速独立以响应粤军回粤,但登哥说丽堂(即魏邦平别字)是否有此勇气和胆量呢?”魏邦平就表示说:“登哥有此勇气,我丽堂素来都不在登哥之后,请转知登哥立刻准备。”当时李朗如得到魏邦平的同意之后,立即往李福林处,仍用激将的办法向李福林说:“魏丽堂已答应和准备独立了,但丽堂说恐怕登哥没有下大决心的勇气,这就有些担心了。”李福林即表示说:“魏丽堂有此胆量,我李福林素来都不会落后于他的!请你转致丽堂准备共同独立吧!”李朗如听完了李福林这番话之后,就对他说道:“请李司令今日和魏司令见一面,但既经双方决定了,只见一面而不要时间过长和多谈话,以免外间知道,泄漏了秘密,妨碍工作的进行,这是最为重要的。”

于是约定在第三天的早晨,李朗如和李福林同坐乘小电船前往二沙头颐养园和魏邦平见面(胡毅生已在魏处等待)。当李魏见面时,由李朗如先说:“大家已决定独立了,不用再谈吧,只有待双方准备妥当后,则决定独立的日期而宣布独立好吗?”这个意见经李魏两人同意后,即分别了(李朗如向他们进行策反时就劝他们不要见面,以免泄露机密。有事商量可由李朗如和胡毅生代为转达。因此,利用李魏二人没有机会见面同时用激将办法来完成策动李魏独立的任务)。于是,李魏决定在9月中旬(即1920年的中秋节晚上)宣布独立。

李魏两人作出独立的决定后,李福林则扩编民军20营,连原有的军队14个营,共同34个营的兵力,约有官兵人数12000余名。魏邦平所部有10个营,连扩编的9个营,合共有19个营,官兵人数约8000余名。那时候并利用假战争骗取莫荣新命令江防司令申葆潘调江汉、江巩、江固(江大则因损坏在河南民船厂修理中)和广元、亨、利等10余舰归魏邦平指挥(广东当时的舰队是以江大、汉、巩、固四舰为最强,其次是广元、亨、利、贞,其余的是没有什么战斗力的),前往香山小榄一带,向

香山起义的民军进攻。魏邦平得到了这支舰队的指挥权后，立即命令各舰的舰长，出发开往新会县属的猪头山附近集中待命。当魏邦平抵猪头山指挥时，布置了扣留各舰长的计划，以命令各舰长到来参加讨论进行战斗会议为名，待各舰长到齐之后即发出暗号把各舰长一律扣留。以后，每舰派出一排陆军驻舰控制和监视舰上官兵，以便指挥至数日之后（1920年的中秋节）宣布独立。并伪装被官兵虏获的民军分押至中流砥柱和南石头炮台，这时并将两炮台占领之。这个计划是获得成功的。独立后数日间组成李魏两军合作的联军司令部以便统一指挥而免各自为战。这个联军司令部直至1920年10月下旬，当粤军回抵广州之后才撤销。

却说李福林在预定宣布独立前两天又发生了恐惧和害怕，因而派张炳独自乘轮船到猪头山见魏邦平，要求缓期独立。魏邦平听过这番说话之后即表示说：“独立日期是在秘密会议时决定的，任何艰难险阻绝对不能延期，请炳兄回复李司令，如果他不干，我丽堂个人也依期干了。”当李福林派了张炳去见魏时，李朗如就分派我们在河边等张炳回来了解魏的答复。若魏同意李福林的要求，则请张炳反说魏是依期独立，以促使李下决心独立。但得到魏邦平的坚决答复以后，就在1920年中秋节的晚上11时许，李福林将司令部的参谋人员和李朗如、胡毅生等移驻五眼桥附近河边的船上，并派陆满乘电船去白鹅潭外，和魏司令派来的代表魏询联络交换情报，但候至次晨三点半，魏询还未有见到，于是陆满诚恐魏司令因事延误，以立即回到五眼桥报告李福林和李朗如，当时李朗如提出立即布防，待天将亮时，向河北进攻表示主动，使桂系不敢向我方进攻。于是李福林向我们大发牢骚，经李朗如安慰之后，他同意再派陆满往白鹅潭，胡毅生也请李朗如到小舰商量。胡说假如李福林翻了脸，将我们绑解到莫荣新处献礼赎罪，

这又怎么样去对付呢？于是，李朗如立即想了一个办法，请李司令派胡作代表去魏司令处联络，如果到天亮后，魏还没到的话，胡毅生则乘省港轮的日船去香港，这就可以避免危险了。这个决定得到了李福林的同意，于是胡毅生就乘小电轮离开李的司令部，至5时左右，魏军已到达了。魏司令派来联络的代表魏询也和我见了面，并说中流砥柱和南石头等的炮台已完全收复了。陆满即乘电船回到五眼桥将情况报告了李司令。当时李大为高兴，连声说好消息。第二天即将临时司令部迁回河南以固守河南阵地，留视敌方动静，魏邦平、李福林的宣布独立至此得到实现。

1920年10月初间，桂系军阀莫荣新鉴于力量薄弱，不能持久，想利用分裂的手段使广东人同室操戈，于是派杨永泰作代表来见李、魏（杨永泰是当时的省长）协议和平解决。并且约在潭礼庭的安兴煤行会见（这煤行是在西濠江口对面的金花庙前可以在河边后门上煤行）。当时我随李福林前往和杨永泰见面，（魏邦平已先到）在会谈时，杨永泰说现在莫督军不忍糜烂广东，想和平解决，但对陈炯明部一定要作战到最后一兵一卒为止。而对李镇守使（李福林兼广惠镇守使）、魏司令是多年同事关系，没有什么问题的。因而想将督军的职责交给李镇守使接替，省长职务则交给魏司令负责，请两兄体念莫督军爱护广东的苦心等语。当时魏邦平答复说：“莫督军既然爱护广东人而不忍糜烂地方，我们广东人是非常感激的，但对督军印和省长印交李司令和我接任的事情，实难接受。请杨省长回复莫督军请将督军和省长的印移交到省参议会，然后待陈炯明总司令回到广州时再决定吧！”杨永泰说了个“好”字就走了。

直至1920年10月下旬，粤军回到惠州时桂系就经粤北退回广西。陈炯明数日间回广州后，以粤军总司令而兼任广东省长职务，至1921年春再向广西进发，把桂系军阀消灭于数月间，并派广西人马君武为省长，至此反对桂系军阀的任务大功告成。

## 五、朱执信牺牲之内幕

1920年7月间，粤军回师汕头的时候，李耀汉，周之贞等负责运动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独立，反对桂系，得到邱渭南接受。于是在8月中旬邱渭南宣布独立，并由朱执信派蒋光鼐、吴京骑船到阳江将陈铭枢部一营队伍调到虎门来巩固。但独立后不数日，邱渭南暗中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杀害朱执信。先是，由邱渭南制造虎门要塞的台兵与在东莞起义的邓钧所部的民军发生冲突，因此派员乘虎门要塞司令部的差遣舰追云号到香港邀请朱执信到虎门调解民军和台兵冲突。朱执信在1920年8月19日夜乘追云舰往虎门，20日早就亲身赴前线进行双方调解，但朱执信刚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台兵的连长龚金就立即开枪向民军射击，造成混乱局面，乘机开枪将朱执信打死。

桂系军阀失败后，邱渭南和龚金逃到香港广泰来客栈居住（该客栈是邱渭南所开），并由邱渭南派龚金为广泰来客栈的总经理。以后，我们从多方面调查知道龚金是邱渭南的妹夫，在杀害朱执信之后由邱渭南代领到桂系军阀莫荣新发给的奖金港币8000元。

我们为了捕杀凶手和替朱执信复仇起见，商量如何进行，在讨论中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一方面向邱、龚之间挑拨离间和制造龚金亏空广泰来客栈的资本，使得邱渭南将他开除，并使他离开广泰来之后生活无所依靠；另方面则利用各种方式方法诱他到广州来将他捕杀，以泄公愤。结果龚金被诱到广州时，即将他逮捕，押往朱执信墓前枪决。

（1959年）

## 驻粤滇军内部分化的见闻

徐祚新\*

我的亲戚白之翰（号小松）在云南任唐继尧幕僚长时，经其介绍，我于1915年担任唐的秘书，后改任参政。护法时期，我奉唐命往返滇粤桂，考察驻粤滇军的情况。在张开儒任大元帅府陆军部总长时，我受聘为参议，并由大元帅府军事厅委为参赞。因而我对孙中山与桂系的矛盾，以及李烈钧与李根源为争夺驻粤滇军军权勾心斗角的内幕，略知一二。但事隔40多年，且年老多病，当时的具体细节大半遗忘。现就记忆所及，叙述于下。

—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军政府，就任大元帅，通电全国声讨段祺瑞废弃约法。陆荣廷与唐继尧虽曾先后表示拥护约法，而对军政府中的元帅职却迟迟不就任。这就表明陆唐二人利用孙中山护法遂行其割据自雄的阴谋，实际上他们与孙中山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当时，桂系实力正控制着两广，湖南的谭延闿、赵恒惕均以陆荣廷的马首是瞻，亦步亦趋。陆荣廷身为北洋政府所委派的两广巡阅使，自然不愿在既得的势力范围之内再找一个顶头上司。唐继尧当时自称靖国军总司令（通称“八省联帅”），自然不把军政府放在眼里，且欲实行联省自治。孙中山为掌握军事实力，除将巡防部队20个营改编为粤军由陈炯明统领外，并极力拉拢驻粤滇军。他委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为军政府陆军总长，第四师师长方声涛为广州卫戍司令。这是桂系极不甘

\* 作者时系大元帅府参议。

心的。

这年11月初，桂系军阀莫荣新继陈炳焜当了广东督军。陆荣廷、莫荣新见驻粤滇军实力雄厚，亟欲掌握在自己手里。陆荣廷与李根源关系密切，意图通过李的关系拉拢滇军。恰在这时李根源自陕脱险去到北京，陆、莫遂连电邀李南下。次年2月中旬，李根源来到广州，住在政学系骨干分子杨永泰家里。李根源最初诱劝张开儒与莫荣新合作没有成功，就改变手法挖张的墙脚，从张的部下着手。

当时驻粤滇军中的中下级军官，大多为李根源在云南讲武堂任职时的学生。李通过张部团长杨益谦等的活动，得被推举为驻粤滇军总司令。莫荣新很高兴，特将往日的将军衙门拨作总司令部。但是，李根源意图进一步掌握实权时，却受到张部第四师的军官如那博夫、张怀信等的反对，不能那么得心应手。张开儒的秘书长崔文藻，甚为张所信任，言听计从，倚之为左右手。李根源即命张大义与崔文藻拉拢，以潮海关监督为饵，诱崔上钩。崔认为这是他升官发财的机会，颇为所动，但感到应经张开儒同意。当崔文藻将莫荣新、李根源的意思告知张开儒时，张遂将桂系与孙中山的矛盾及李根源想夺取驻粤滇军军权的阴谋向崔详为剖析，最后并说：“你当我是朋友，就帮我；你当我不是朋友，那就一切不用谈了，只有听从高就。”崔在此情况下，只有拒绝了莫、李的诱惑，表示一定拥孙帮张到底。崔当时不仅是张的秘书长，而且还兼任着军政府的陆军部次长，与孙中山左右的黄大伟等往来甚密。后来莫、李恐崔泄露了他们的阴谋，竟出以毒辣手段，将崔逮捕，立即枪杀于燕塘。

## 二

1918年春末夏初，段祺瑞命吴鸿昌等率部突然进攻粤北南雄，进窥始兴。时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兼南韶连镇守使张开儒正

在广州，得电即星夜赶往韶州，调集所部，迎击北军。因两方力量悬殊，经过数日激战，即对峙于始兴马子坳一带。李根源得报，以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名义，也率部进驻韶州，并将滇军第四师部队调往韶州集中。李烈钧这时也得到军政府令，率部阻击南侵的北洋军。北洋军受到三路攻击，势不能支，乃由始兴、南雄向大庾岭、信丰撤退。后经护法军连续猛攻，北军又放弃信丰，退往赣州。护法军部分队伍随之进入江西境内。

李根源因张开儒不肯与其合作拥桂倒孙，心中怀恨已久，今见北军侵入张的防地，就与莫荣新勾结，借口张开儒部放弃南雄系奉张密令行动，遂将张本兼各职一律撤免。当我随张开儒自南雄前线回到韶州时，李根源派军拒绝我等入城，并拒绝与张会面。张在韶州城外呆了一宿，次晨即乘粤汉路车返广州，于午后车行至黄沙车站，即被莫荣新事先派好的队伍包围，将其随行的护卫人员全部缴械，张遂被莫囚禁于观音山。这是5月12日的事。张既被囚，莫荣新又派兵将军政府陆军部卫队枪械全部收缴，并将部内人员驱散。张开儒所统率的靖国滇军第三师，则经李根源等向陆荣廷、莫荣新联络，征得唐继尧同意，由滇军老团长李天保继任师长。

孙中山因桂系军阀日渐跋扈，咄咄逼人，于5月4日愤而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举行会议，在桂系的支持和政学系的议员操纵下，通过军政府改组案，选出岑春煊、唐绍仪、陆荣廷、孙中山、唐继尧、伍廷芳、林葆怿七人为军政府国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政学系骨干分子杨永泰当上了广东省长。从此军政府成为以桂系为首的西南军阀的工具了。而桂军、滇军、赣军、粤军等也各立门户，争权夺利，搞得广东乌烟瘴气，社会秩序非常混乱。

这时李根源已取得了驻粤滇军的军权，控制着粤北曲江、南雄、始兴、仁化等15县，大肆搜刮，苛捐杂税，放赌抽捐，贩

卖烟土，出口钨砂，不一而足。李根源凭借这些政治经济方面的优越条件，扩军办学，并派政学系分子四出活动，希图大事发展。

正当李根源在韶关招兵买马，大事发展之际，也是驻粤滇军内部发生尖锐矛盾走向分裂之时。由于李根源无视于唐继尧的命令，加之又遂意更动军官，冠扣军饷，上嫌下怨，滇军内部倒李运动也就随之形成。

### 三

唐继尧见李根源专事奉承桂系意旨，本早有撤换之意，加以驻粤滇军军官的一些诉苦怨言，就更促动了他的决心。他为了保持住他的驻粤部队，长期以来与李烈钧声息相通。李烈钧与李根源因争权夺利，早有芥蒂，今见滇军内部如此情形，即与江映枢、杨德源、朱培德等秘密进行推倒李根源的活动。1919年冬李根源罢了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李天保的职务，莫荣新也下令免去李天保的南韶连镇守使兼职，并令李根源以靖国联军参谋长杨晋继李天保之后接充滇军第三师师长。这是桂系兼并滇军的露骨计划。唐继尧闻听之下，极为震怒，于1920年2月9日发出电令：(1) 派驻粤靖国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参加军政府建设会议滇首代表；(2) 解除李根源驻粤滇军总司令及靖国联军第三军军长职务；(3) 撤销驻粤滇军总司令部，驻粤滇军均归滇省直辖，暂由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就近指挥。

李根源接到唐继尧这一电令后，为了防止滇军变乱，当夜即在韶关实行戒严，并立即召集亲信幕僚开会，进行秘密部署，将韶州城防警备交由讲武堂分校学生担任，由该校教育长张鉴桂负责指挥。部署就绪后，李根源本人随即急遽乘车前往广州。

在广州的李烈钧、朱培德预料李根源接到唐继尧这个命令后，必返广州，就派一团队伍在江村车站附近监视，准备扣押李

根源。讵料李根源行动迅速，所乘车辆又系普通客车，竟于夜间混过江村，未被李、朱所派队伍发现。李根源到达广州后，李烈钧虽派人催其办理交代。但桂系为李根源撑腰，莫荣新并派军队监视驻在广州附近的滇军和赣军，同时声称，如有对李根源不利举动，将以武力干涉等语。李根源这时则派人四出奔走，对军政各方均进行拉拢。桂系所办的《广州日报》也不断发表言论，肆意讽刺谩骂李烈钧及和唐继尧有关人物。专靠捧军阀拿津贴过的政学系人物，更是到处散布溢言，支持李根源。事态既然演变，顺风转舵的自有其人。桂系趁机抢夺地盘，改派沈鸿英为粤赣湘边防军务督办，命其率军进驻韶州。不久，莫荣新复派李根源督办广东海疆防务，兼雷琼镇守使。这些情况都是后来的演变。

#### 四

驻粤滇军易帅，既未能实现，双方在粤北开始火并。

朱培德自收到唐继尧电令后，乃秘密离开广州，在四会与张怀信会合，纠集滇军部队向韶州、乳源、始兴集中，希望能保持一部分实力，以免被莫荣新、李根源全部搞垮。但为桂系发觉，派队来攻，朱、张率部且战且走。至连县，因团长杨宜春已倒向李根源方面，前有阻兵，后有追军，朱、张为保存实力，乃改途转入湖南省界。

李烈钧鉴于李根源既得桂系庇护，无奈他何，更感到莫李对其决不会善罢甘休，乃借出巡为名，秘密带领亲信部下和警卫人员出走，由从化过白沙、翁源，奔向始兴。莫荣新、李根源得知后，即派队搜查截击。莫荣新为了根除孙中山在广州的革命势力，以便实行桂系与政学系在政治上的合作，派出军队2万余人交由李根源指挥，水陆并进，向粤北各地追捕李烈钧。

李烈钧在广州出走后，沿途纠集的部队约有3000余人，因

其系走偏僻小路，未被桂系大军发现，沿途虽与桂军小部有所接触，因系采取迂回而进的办法，伤亡不大，竟逃脱了莫荣新、李根源的包围。

李烈钧到达始兴后，经与滇军鲁梓材、杨益谦两旅长诉说桂系与李根源的阴狠手段和企图后，鲁、杨都不满莫、李所为，并慷慨激昂地表示愿与莫荣新、李根源所派的追军一战。他们为了免除后顾之虑，乃与驻在南雄的成桃进行联系，希望联成一体共同行动。不料成桃早受李根源拉拢，已倒向桂系方面，反声称要鲁、杨二旅让出始兴。话不投机，只有诉诸武力，鲁旅与成部即于3月25日开战。战未一日，因成部军心厌战，立被击溃，放弃南雄。接着李根源部赵德裕旅已追到江口，与李烈钧部警卫团及杨益谦旅展开战斗，进行颇为激烈。经过二日一夜的激战，双方伤亡甚重。赵旅因后续部队未到，前线稍却；而李烈钧部也因力量关系未作反攻，双方遂形成对峙状态。

正在此时，广州军政府岑春煊派高级顾问吴介璋（吴在清末曾任江西武备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南昌起义时被推举为江西都督，是李烈钧的老师。）及参赞徐祚新赶到始兴前线，用讲情面卖老资格的方式要求双方停火。经吴、徐往返劝导，二李始渐有允意。三月末岑春煊也亲到韶州调处，并加派李书城等与吴介璋共同奔走。经过数度商谈，吴、李、徐挽李烈钧到韶州与岑会面，由岑为二李拉合。二李在岑及数位老友面前，表面言归于好，但仍然貌合神离，各自心中拧劲，只是没有机会再行火拼罢了。

驻粤滇军，经岑春煊、吴介璋、李书城等调停，采取了旅团自决办法，即愿随杨益谦、朱培德的，统由李烈钧率领移驻江西；愿随李根源的，改编为广东海疆军，由李率领开赴琼州。

当时驻在仁化、始兴、南雄一带的滇军，奉唐继尧命改编为三个旅，旅长为胡国秀、张怀信、鲁梓材。李根源也将其驻在韶

州至广州铁路沿线一带的滇军，改编为三个旅，旅长为李根沄、梁说、周兴权，并另编一个独立团（团长蔡炳环）和一个炮兵团（团长张鉴桂）。不久，李烈钧部即由粤入川，往依驻川滇军，李本人则随吴介璋、李书城等由韶州回广州，旋即离粤赴沪。李根源部则陆续开往海南岛。

后来陈炯明率粤军回粤讨伐桂系，李根源为了支持陆荣廷、莫荣新所在广州的统治及其既得利益，指挥所部海疆军在东江一带，为桂系作殊死战。结果，所有海疆军除伤亡者外，全部被陈炯明缴械解决。李根源见大势已去，遂秘密逃往香港，不久即转沪北上归附了北洋政府。

（1965年）

## 方声涛护国护法及援闽经过

邵孔昭 \*

方声涛，福建闽侯县人，与其胞弟声洞均生于前清光绪年间，性抗爽勇毅，多才德，乡人称为难兄难弟。稍长愤清政失道、外侮日甚，声涛奋志投考，取送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此时全国有志之士投笔从戎，考入日本士官生者不少。如李烈钧、方声涛、蔡锷、罗佩金、殷承献、顾品珍、唐继尧、李根源等辈，既已加入孙先生的同盟会，更复约将来同心戮力，共勦革命大业。当士官生六期毕业，中国留日生纷纷回国。当时锡良总督云贵，成立陆军第十九镇。全镇武器，均从德国购买；结束武备学堂、陆军速成学堂、学兵馆等，扩大云南讲武堂，接收各学校员生，更加招收来省应考优拔职者的秀才于一炉而冶之，所以教员学生蓁蓁济济，盛极一时。方声涛即于此期任步兵科长，年壮气豪学富，讲堂、操场、野外均亲临作示范。全副武装跑步，由昆明本校跑出东门 30 里到黑龙潭，方声涛穿马靴、呢绒衣，带指挥刀，领先到达目的地，人多羡慕之。

方声涛、李烈钧等为革命的急进派，光绪三十四年，黄兴在云南河口举义，总督锡良率重兵驻扎通海县防剿之。方等在省即拟响应黄兴，同人以事权未集、饷械两缺、官兵均未能应战，且锡良亦有谋有备，而英法环伺，谓未易轻举。方、李等因此即离职。方应四川第十七镇统朱庆澜之召到镇任镇参谋官。四川铁路风潮起，清廷派端方由鄂率北洋兵前往平定。此时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方声涛在川得密函，知其胞弟方声洞参与此役殉难，绕

\* 作者时任方声涛部少校参谋。

室抚剑，悲愤不已。镇统朱庆澜知其然也，谓方声涛曰，国家从此多事矣，我与端午桥不契，行将去职，但我身份不能在南方活动，行将北上，你可随缘而往，相机行事，机见有期，后勿相忘也。朱随即辞官北上，方亦辞职至赣，与李烈钧等合。武昌起义，云南重九响应，并出师援川。川军亦反正，赵尔丰、端方先后被戮。以后各省次第反正，孙先生由美回南京任临时大总统，终让位于袁。此时西南各省，多为国民党人（前同盟会）当权。袁氏欲独揽大权，先排除异己，密派武士英等刺死宋教仁于沪，国内大哗，深责袁氏。皖督柏文蔚、湘督谭延闿、赣督李烈钧、粤督陈炯明，先后讨袁，均失败。方声涛任赣讨袁军重职，亦因南昌有内奸响应李纯，林虎、杨益谦等属方部者，均溃败走闽出日本。袁氏帝制自为，云南军人作反对准备。果登极诏一颁，护国第一军讨袁即入川境，第二军则前抵剥隘。方声涛任护国第二军第二梯团长，在昆明组成梯团部，我被调为少校先遣队长，坐火车到阿迷（现改名开远），即令由朱培德营派王均排长率兵一排，派给我枣红马一匹，先行向广南沿路侦察，宿营绘图，指出交通险阻及一般情况呈梯团长。年终方梯团长到广南县时，第二军李军长烈钧已先期到达。此时前方袁军与一梯团张开儒部相持，双方进退狼狈，在山高林密的险道中苦战。

此时二军后方奇变，袁军挺进军长黄诚伯部游击队打麻雀战，大肆侵扰；护国军交通中断（电线断），辎重给养被截劫，唐电入桂军原地固守待命；方梯团兵力两团，李桓生一团是老兵，已到广西西林县，于被调入川应援；杨益谦一团在开化新招未成立；炮兵余汝钦一队，机关枪杨正清一队，均不足一连人；朱培德一营、毛本良一营均未编组。而匪情在架衣、板郎、石碑、龙潭的报告迭至，此时军部也只有新招卫队一连，防攻剿捕均归方梯团长负责。方梯团长先令上校参谋伍毓瑞、少校参谋鄧之镜（字孔昭）率朱培德营及机炮一部向板郎、架衣进剿，但到

目的地无踪迹。据地方人言早上有持枪穿普通民装的人三三五五穿梭般的经过，不知其去向，搜索终日无踪影，奉令回城。于石峒、龙潭又告警，方梯团长亲率朱、毛两营及机枪队进剿，到目的地时开冷枪漫放，乃部署分进合击，只见远处十一个持枪匪分头四窜，而村内则时有机枪声发响；乃立命尖兵冲入，到村内殊少见人，响声处是匪以爆竹连火绳置洋油铁桶内，计定时则火烧到药线而爆竹在铁桶炸声如机枪也。如此情形，殊费力多而成功少。方部回营共议：须联合地方绅耆团队联合劝抚、分别清剿，方声涛深然之，乃陈塘督饬地方照办。

不久，知四川督军陈宦已反正，陆荣廷已将其亲家龙济光部解决，黄诚伯已通电辞职出港。二军部经剥隘向桂推进，方梯团部奉命经西林前进，到西林县那劳地方停军待命。那劳是前云贵总督岑毓英的祖籍地，他四胞弟岑毓琪 80 多岁尚健存，见滇军甚喜，其侄岑春煊正在高要作都司令讨袁。方梯团长善敬老尊贤，相得甚欢。他老人家号召乡中子弟出一营交方梯团长，方令少校营附鄂之镜率领训练入粤（营长中校参谋邹棠有任务出差）。又那劳开拔时，朱培德营全副武装皮背囊皮子弹盒皮鞋等，士兵均苦于负带，全寄置于四宫保家（岑毓琪，土人均称呼为四宫保，岑府原是世袭土司职），长途陆水行军，官兵辛苦备尝。方梯团长到百色即先乘轮船到高要商军事，梯团部到了肇庆，我率新编营到七星岩驻扎。李根源来劳军（李任都参谋长），不数日，李来说，都司令以袁死他大责已过，不忍以家乡子弟暴露戎行间，思将此营兵送返原籍。我说有令来即遵照，后由梯团部来令照办。我回梯团部随即出发，乘船由三水转源潭驻扎，与龙济光军相持于从化、花县一带。此时杨益谦新兵团已到，驻花县狮岭墟一带。时已入冬，粤无霜雪，但部队无衣被，夜冷起来跑跑步御寒，积久官兵多生脚气病，肿到膝盖以上即多不治。杨益谦团 1500 多人，经冬及春死了数百。方梯团长以次，每一念至，常

为垂涕。

龙济光死守广、惠一带，北廷已是袁死黎继，段内阁派朱庆澜到粤调处，结局朱庆澜任广东省长兼总广东警卫军40营，龙出任两广矿务督办驻琼州，陆荣廷任两广巡阅使兼广东督军，张开儒任滇军驻粤第三师师长兼南韶连镇守使，方声涛任滇军第四师师长驻广州海珠，旋迁移靖海新街天后宫驻扎。方军后因无收入饷绝，所幸朱庆澜为旧友，朱尝告方声涛云，你是护国滇军驻粤师长，我是广东省长，名义所在，职责所关，我应当对你全师如股肱心膂，一切军费我当备也。所以，方声涛在朱省长任期，一切非常奋发，国会议员休于桂军对孙中山先生拥护不力，不敢迎孙回粤，方师长首当迎孙大任，密与桂军林虎合，倡定期迎孙回粤。派驻广雅书院驻军三十三团长杨益谦率全团在天字码头全副武装迎迓，孙中山乃在广州士敏土厂开大元帅府。

护国滇军第二军李烈钧有事如沪，率全体滇军初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于垒垒荒冢中。方声涛继续其志，命我测量冢址画图，捐资足数（各方面亦多有捐助），令副官萧冲、军需包任民督修，副官长吴树董成，围四方大石围，中竖一长方碑文曰“七十二烈士之墓”，方声涛亲笔所书也。石围南侧立一烈士名碑，令秘书长刘通调查烈士姓名，其时仅得30余人，首名为方声洞，即方声涛的胞弟。方见碑乃曰，只要有名，先后皆一体同尊了。

方声涛在驻军广东期间，整军经武，有条不紊，全师旅团部，都亲临检察，炊事场、厕所、马正、器械军需、军医病室，一如日本军式执行：在操场检阅时对步伐精神、士气尤为留心观察。野外战斗演习场选在龙眼洞瘦狗岭一带，作战演习完集合讲评，其精神不减于当年在云南讲武堂作教官时也。在黄埔架桥演习尤为精彩，盖方声涛幕中，由滇出发时只有一参谋长林中庸是日本士官生，其僚佐很少，到粤后有一中校参谋杨子明，闽人，是中国陆大毕业后再考入日本工兵科大学，又加少校参谋蒋光

鼐、上尉参谋李章达、上尉副官陈铭枢，其余僚佐不少，济济一堂，甚为和乐。胜地不常，到前民六七年，粤省开全国两院会议北伐，有军权者交出民权，有民权者交出兵权，这样一来，广东省长朱庆澜，就要递令。朱是北派，不得不走。

广东督军陈炳焜既志得意满地握军事全权，于是不得不依法通电就北伐军总司令职；殊此电一发，使在北京竞选副总统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功亏于一旦。陆荣廷一气出都门，遁入苏州，乃撤换陈炳焜，着谭浩明代理。谭系陆内亲，虽有军功，但性情老好，不能御两广之烦，陆更以莫荣新代粤督，而调谭督桂。莫前清时以秀才投笔从戎，阅世甚深，老谋精算，为桂系之冠，对大元帅府令阳奉阴违，广州报界闻人容伯挺、大元帅府军政要员崔载勋等人则阴杀之，种种恶行多不利于大元帅府；所以大元帅一怒于1918年1月3日夜率舰炮轰督军署，示惩莫荣新。广州陆军桂军密布，滇军四师方声涛部，黄埔、沙河、老将军署、东山、靖海街等地分驻，联络难周。大元帅炮惩莫荣新以前，帅府有一职员名刘少廷，云南腾冲县人，年30岁上下，他眼近视，脾气古憨，惟家富有，常出资跟随大元帅，大元帅亦宠之。他先奉帅令与滇军联络响应，刘君不知军事，又好大言，他向师部卫兵排长说，在最近期间，帅府将以军事处罚桂莫，你们师以次均奉密令，不必多言，到期闻炮行动可行。到广雅书院三十三团第三营对马连长亦作如是说。此时，方师长正迫于组织援闽，而三师长张开儒及七旅朱部多谓军队忌分解，暗中不决。忽方师长在东堤桥头车上被刺，枪伤穿颈部。师部僚友到公馆慰问，方不能大声，只摇手微声云，不要紧几天可愈了，刺客我得明白不究了。不数日夜间炮声大作，师部机关枪排长莫有文吹哨集合出发。为值日少校副官制止：不奉命令，不准妄动。广雅书院三十三团第三营值日连长潘成龙，亦复如师部莫有文行动，被团值营团长吴斌制止。夜间桂军往来如梭，都调集长堤沿岸，并来通

告，略云海军闹饷发炮，桂军深有准备平息，请各军原地警戒，勿向外出发，以免误会等语。同时方师长亦病中传令：情况不明，除加紧戒备外，通知邻近军警，天后宫（靖海街）、老将军署、广雅书院、东山寺贝底、沙河陆军兵营、黄埔兵营有我师分驻，我师互派联络传令兵，请查明放行等语。翌晨解严渐知其略。而广东督军的通告来了，略说查明昨夜动乱，有海军一部、滇军四师部卫兵一部及广雅书院三十三团一部，均企图响应，分请查明办理见复为荷等语。海军总长程璧光已在海珠设军法审判组织。滇军方师长亦不得不照办，组织军事法庭：方声涛师长为审判长，第七旅旅长朱培德、第八旅旅长伍毓瑞、中校参谋郜之镜、杨子明等为审判官，秘书刘通为审判书记，开庭审讯、判决连长马成龙、排长莫有文等四名撤去职差、依法处有期徒刑若干月，移交南海县署代执行管押，并复督军署在案。闻海军开庭审判时，大元帅亲临法堂，明示海军是奉帅令执行，不得科罪。程总长既是奉大元帅明令，则此法庭当然不能成立，着即遵帅面令撤销，并以此得粤督署在案。第四师方声涛部犯法的四名连排长，亦以刘少廷在元帅前一力承当是自己处置失当，四连排长无罪呈请，大元帅令帅府条谕南海县：四名滇军官无罪，一律释放复职。惟滇军三十三团第三营营长段毓贤，方师长以他是日本留学生，又曾加入同盟会，而对此大事事前事后颟顸畏缩，手足无措，委实无能，着即撤差，闻后段在沪见中山先生，先生仍优遇之云。孙大元帅既炮惩莫荣新，见其罔有悛心，乃决计之沪，事前设宴招滇军方师长四师部少校以上军官赴帅府（河南士敏土厂），宴中开始训话，精明简切，出口成章，其要语是陈炳焜时使我自生自灭，我有办法；莫荣新时对我有灭不生，我便以海军大炮警戒之。方师长席上因颈伤新愈，出言对答，发音不甚响亮，但切切衷语，报答主帅，惟望以忍，养我全锋，终期有成等对言。不数日即闻主帅移沪矣。

方师长当朱省长离职，在伤病中即感全师饷需无着，重以大元帅又敝屣尊荣，洁身之沪，更苦矣，而粤局机陧，龙军已入南路，四邑西江告警，此时我已奉令出发讨龙往南路。方师长乃根据朱、陈、夏的密计，编成驻粤滇军援闽总司令部，方师长为总司令，所部第八旅长伍毓瑞旅编为第一军，夏述唐旅编为第二军，吴树、杨子明各新编一团，林耿南为独立工兵营长，积极援闽。事先朱省长与粤军陈总司令已有默契，保证方军入闽，粤军即由闽撤退。朱并告方，如援闽能占有地盘，他回北方可以向段说将闽督别调。方以此稍得自慰，立即传令出师援闽，第二军夏部先发（夏系广东警卫军中的佼佼者，朱省长深倚畀之，不甘心编为桂系督率，故朱事先商同陈炯明、方声涛、夏述唐同意编归方师）。方声涛总部及新编部队居中进行。以第一军（伍毓瑞第八旅）殿后，收回赖世璜部共同跟进。夏旅得粤军密助已长驱入闽，方总部续进达闽达，并催令伍军前进。殊知在此期间，伍旅发生奇亦，中有歹人龚氏（前在赣李方失败，此人曾投敌李纯内应），类申公豹，唆动李烈钧请唐继尧改伍为援赣第四军总司令，驻粤潮梅一带候令云。闻伍（伍参谋长）、龚等在潮梅军风纪均坏，戴滇军红边帽，人民怨沸，称为红头鬼云，伍一军（八旅）既奉方总司令命，停兵不动坐地剥削，其叛参谋龚氏尚来函凌辱一通。晴天霹雳，这一打击，使方声涛总司令陷入绝境。军事消息灵通万变。闽督李厚基侦知方内部的伍部在后叛逆也。乃透夏部再深入，以数倍兵力围夏二军而全歼灭之，夏述唐军长亦以身殉。方司令得悉此噩耗，知一切无望，只得略带亲随，即当浮海遁沪。前广东省长朱庆澜在沪任全国赈济总会长，悉方声涛先生之如此下场也，曾招之入会作慈善事业。未知方先生今仍在世否？数年前传说方已病歿。方处世如锥处囊中，多年不闻其名，不见其人，料已作古人清净觉地了也。

方声涛援闽失败一段事，是我在 1921 年，由粤援湘回滇，

东滇当道派我为代表到湘任务毕，由沪到港，船中忽遇吴树（吴系方妹夫，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告我这般情况，相对不觉泪下。

（1966年）

## 程璧光被杀内幕

许让玄\*

1917年北洋海军第一舰队司令程璧光，率领海圻、海深、海容、飞鹰、肇和、永丰（以后改称中山舰）等舰南下到广东，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后来程璧光意志动摇，想把来粤护法的北洋海军，北归投降北洋军阀政府。孙中山不满意程璧光的所为，这事被孙中山忠实信徒南洋大霹雳（马来西亚）归国华侨张民达知道，他会意孙中山不满意程璧光。张民达乃在广州组织暗杀团，以暗杀程璧光为目的。团员有张民达、萧觉民、罗伯炯、李汉斌等人，以张民达为首。

张民达的暗杀团使用的武器，有炸弹与左轮手枪。萧觉民被指定专使用炸弹。

执行暗杀程璧光的是广东兴宁县人李汉斌。他用二号左轮手枪，在广州长堤海珠码头窥伺程璧光赴海珠海军司令部办公时，把程璧光杀死。李汉斌达到目的后，将手枪甩在海珠码头地上，乘乱混入人群中逃脱了。李汉斌说：他当时甩掉手枪的原因是万一被逮捕，身上已没有武器，可以狡赖，不承认自己是杀人的凶手。

上述的事是1923年我与李汉斌同在张民达的粤军第十八团同事时，他在江西北伐行军中亲自对我说的。

（1962年）

\* 作者时在粤军第十八团任排长。

## 关于援闽粤军的回忆

李朝彦\*

1917年陈炯明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援闽粤军，进行援闽以至回粤，其中经过已有不少人记述。笔者当年在熊略部下当第十七营长，亲身参与是役，克复漳州后，又当汀漳龙道尹公署秘书；兹将当时一些见闻，详人所略，点滴记之，以作补充。

### 一、炮击督军署时的一些内幕

当援闽粤军正酝酿组织期间，桂系依然对护法进行种种的阻挠，孙中山先生为了贯彻目的，决定铲除障碍，统一广东内部，因而在1917年冬布置一次军事行动，准备用军舰首先向观音山和督军署炮击，继之以陆军围攻，消灭桂系。当时布置就绪，不知怎的泄漏了军机（一说李福林告密），结果军舰虽然开炮轰击，而陆军却没有出动，桂系始终也没有还击一枪一炮，计划因而失败。事后我听到的内幕原来是这样的：

初，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知道消息时，便集合了谋臣策士商量，时国民党的冷遹、耿毅等认为军舰炮击起不了决定作用，而在广州市的桂军当时不及孙中山指挥的军队多，开炮还击反而引起骚乱，胜负未定，不如设法将孙的陆军稳定下来，事情就不会扩大。桂系军长马济便打电话给陈炯明，问他对这事采取什么态度。陈回答说：“我不知内情，不便过问。”马济就和他约定，互守中立，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听说后来炮响时，叶举在陈的左右，还主张举兵响应，陈制止他说：“你的酒意未醒，不要乱

\* 作者时为熊略所部营长，汀漳龙道尹公署秘书。

讲，快去休息吧！”

事隔几天之后，莫荣新那班谋臣还替他导演一幕活剧：叫他到中山面前谢罪。当他到元帅府时，着随人高声喊道：“莫荣新求见。”中山先生见他亲自前来，只得接见。莫装得十分恭顺，中山先生指出他在广东搞的一塌糊涂，烟赌林立，民不聊生的种种错误。莫也口头承认了过错，表示今后当注意整饬，还虚伪地问大元帅有何困难。参军祁耿寰在旁答说：“大元帅府经费支绌，工作人员每天每人只领到伙食费四角，请莫督在广东省财政收入拨出一定的款项作为大元帅府经费。”莫也连声诺诺。中山先生怒亦为之稍解，乃挥之使退。

## 二、三河坝的退守

对于援闽粤军的组织和各个战役的过程，已有不少史料谈到，其中大埔一役，张酿村先生写的《一九一七年护法时期广东援闽粤军的建立和援闽、回粤、援桂各个战役的胜利》一文，认为援闽粤军是夺取全局决定性胜利阶段，我当时适在这一路的军中，见到有些关键问题尚未谈及，似有补充的需要。

初，1918年夏间，援闽军事开始之后，粤军旗开得胜，连克永定、和平等县的外围据点。北京政府闻讯大为恐慌，忙即调兵遣将大举增援，闽督李厚基收拾残部调集唐国模旅，企图从我左翼大举反攻。

时军事已开展月余，我军消耗弹药不少，而粤督莫荣新始终不给予一枪一弹支援。陈眼看大战正在眉睫，前方将士纷电请求补给，无法供应，正在纳闷。适是时，孙中山先生到三河坝总指挥部视察，询问前线情况，陈告以弹药奇缺，军心浮动，敌军反攻，恐难坚守。孙先生再问：“现在士兵每人平均尚有多少子弹？”陈答：“每人平均有八粒。”先生说：“我们万人就有万粒，瞄准才放枪，就可杀死八万个敌人。”陈说：“战士习惯最后的五

粒子弹，就要留作护身，不肯轻易使用了，何况每开一枪，不一定就打中敌人。”孙说：“那就不是革命军人了，我们革命军人，应当以革命精神号召士兵，坚守阵地，等待敌人进前，然后放枪，枪无虚发，一定会取得胜利的。”同时，中山先生召见前方各重要将领，亲自鼓励。前后一星期左右，先生才回到汕头，不久又来电催促陈炯明下令出击。而陈还是犹豫不决。北军以开始反攻，和平、永定各个据点，相继复为北军占领，进逼大埔。

陈炯明连忙召集军事会议，对弹药问题，仓促间仍无法具体解决，陈心也冷了下来，睡在床上，连电报都不想看，还准备退守惠州。

这时北军以乘胜之师，向大埔方面进攻，我军纷纷向后转移，大埔县遂陷敌手，敌并有向三河坝前进模样。当时的上校参谋蒋介石看见形势危急，乃向陈炯明领了一排宪兵，扼守要道，下令说：“总司令有令不准后退！谁退就枪毙谁。”第一支队司令李炳荣见此情状，大为错愕，与蒋在陈面前争辩起来。蒋说：“我们如果败退惠州，桂系就会乘机前来缴械。我要求你们坚守一个星期，我自有破敌办法，否则我愿受军法处分。”两人立下了军令状。李炳荣也只得上前与蒋介石竭力压住了阵脚。

其时北军亦不知我军虚实，见我军定了下来，也再不敢穷追。然而那时敌人毕竟是腐朽的，作战没有明显的政治目标，唐国漠两个团攻占大埔之后，便把其中一个团长封了大埔县长。他们两个团长便自相矛盾起来，谁也不肯再前进，因此，我们退守三河坝后便有机会准备反攻。

但有些文史资料，说北军忽然停止前进，是由于韩江水势暴涨。这恐是记错的。

这次蒋介石算是立了功，但有些人说：蒋那时实在也拿不出什么破敌之策，只凭着斗胆幸而制胜而已！

### 三、克复漳州

在三河坝一线稳定下来之后，我们立刻进行整补，一面向民间收集子弹，一面在汕尾设立一间临时修配厂，将弹壳翻装，不久每人便补足了 100 粒。前后休整了一个多月，我们又开始实行进攻。

这次我们粤军采取了大胆的进攻战略，把原来在潮汕指向诏安的右翼洪兆麟、罗绍雄两个支队的主力，全部调向左翼来，集中大埔峰市以南一带，准备向敌人猛攻。当时所以采取这样较为冒险的战略，实在由于我们已处于在南北军阀的夹缝中，环境十分恶劣，只有前进才有出路，因此，却能上下一心，斗志昂扬。

反攻开始，适连天大雨，大埔被山洪淹没。大埔城外的北军，被断了接济，身又湿，肚子又饿，加上峰市后面有一条河，敌人以过河背水，形势大大不利，因此士气低落，无心作战。我们有了士气，一举渡河克复了许多据点。前头部队，继续前进，北军唐国模退守永定。

洪兆麟、熊略等部合围永定，五天未攻下来，陈炯明调来洪兆麟和徐连胜两军增援，徐到先看地形，担任由阵地东面的高山冲击，各部一齐冲锋。敌阵由动摇而退却，我军遂占领永定。敌把东门桥拆掉，企图阻止我军前追。我军这次缴获过山炮五门，枪弹无算，粤军拥有大炮，从此开始。

陈炯明得知前方胜利，每兵发奖金五角，下令穷追，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陈又亲到永定鼓舞士气。我军一直追到龙岩也无抵抗。我军再进到水潮地方，遭遇敌军增援两团，李、熊两部首先应战，打了一天，又适洪兆麟部迂回敌军后方，敌始仓皇败退。我军乘胜再进克复南靖，再进遂克复漳州。浙军陈肇英率一旅向我投降。

当我军在左翼大获胜利的时候，敌军中路童葆暄师和右路臧

致平师，恐后路有失，也连忙由海道退到厦门，我军也跟着追到厦门附近。时厦门泊有北洋舰六艘，我军未敢过海。叶举写信给某舰长，声称我军不日攻取厦门，劝他参加革命或谨守中立。该舰等复信拒绝，我军遂守着江东桥没有再前进。

一个月以后，大局起了变化，皖系和直系发生矛盾，粤桂又紧张起来。闽省和粤军同觉疲惫，各有休息的需要，于是协商划界分守。我方派叶举为划界委员，初时争论界线颇烈。不久，彼此得到孙中山先生在军事上和段祺瑞协调的消息，又彼此退让。议定后，明天正午互相撤兵，两线相对，举枪作别，彬彬有礼，一刹那间遂化敌为友，互相关照，这是1919年七八月间的事。以后我们的官兵，还可以通过厦门，由海道返广州。如是和平相处者约有一年多。

#### 四、陈炯明在漳州的一些措施

孙中山先生自从那次来到三河坝回到汕头，不久就离去广东。援闽粤军自以陈炯明主持一切。粤军自克复漳州后，陈当时即派出洪兆麟为汀漳龙镇守使，熊略为汀漳龙道尹，张友仁、张国桢、何国樑等十多人为县长，掌握闽南的军政大权。但援闽粤军自组成以后，长期以来都没有正式薪饷发给，官兵那时能够过着艰苦奋斗的生活，这实由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精神鼓舞所致。陈在漳州，虽有十多县地盘，但这些县份地瘠民贫，筹饷十分困难。孙先生在沪迭向华侨募款接济，究竟为数有限，官兵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如我们当官长的，每月只能领到三几元的零用钱，就是这样也不容易支给。当时有些部队，见闽南多大樟树，伐之制成樟脑，可裕饷源。于是各军相率效尤，数百年的老樟树，为之砍光。有些偏僻的地方，还种上鸦片，以为筹饷的手段。对这些陈只眼开，只眼闭，不作处理，颇引起当地人民的反感。

陈炯明在漳州的时候，也正是“五四”运动发展的初期，那时各种反帝、反封建的主义学说，都颇吸引人们的耳目，陈也请了陈孚木和刘思复的两个弟弟等无政府主义者到漳州来，办了《闽星》报，替他做宣传工作。一方面陈又叫漳州财政局长周醒南替他搞些市政建设计划，一时使人觉得漳州有了新气象，吸引了一些华侨回来观光。陈又派人向华侨募捐，成立一个“侨款保管委员会”，保证捐款全部用于地方建设，不移作他用。记得陈嘉庚也返过来观光，听说有人意图请他资助些军费，陈嘉庚答复说：任何政府军队，我从来都不捐助。只有一些学校，得到他的捐款。

陈在漳州年余，周醒南确能帮助他搞了几项较大的建设工程，如拆城、筑海边长堤、开辟漳州公园等；公园里还建立支大华表，请了孙中山先生和有名的人题了字，据说当时搞这些建设工程的钱，都是华侨方面捐来的多。

除此以外，陈在漳州搞的较为新鲜的事，那就推体育运动会了。这次运动会从购买体育器具到建筑运动场，足足筹备了大半年，才能举行，可称煞费经营的。

由于有了《闽星》报的宣传，又搞了一些新建设，在那时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自号为“模范省”，但却有人说：今天的“模范省”当推闽南了。

陈炯明在国民党内是受着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但我们看不到他对中山的学说主义怎样热心宣传，有自己的一套。他生活上表现得十分俭朴，对于下属似乎很关心，待人接物也没什么架子，因此，能够笼络了一部分军人。他常常标榜他实行的是“平民主义”。

有的人说，陈炯明善于沽名钓誉，看来倒是不错。1920年六七月间，云南唐继尧和贵州刘显世通电废除自己的督军职务，自称川、滇、黔联军总、副司令。我当时见到陈有一电报致唐，

大意说：联军总司令的名称，犹有军阀的气味，也应该废除，而陈自己却仍称援闽粤军总司令，虽援闽粤军和唐的联军性质不同，而陈只在名称上做点文章，只顾沽名钓誉，而不觉其自相矛盾。

无政府主义在漳州，陈炯明虽利用来为自己宣传，但在军队中却暗遭亲信，防止他们的活动。有一次他们有位党人问士兵说：“你的手脚是谁的？”士兵说：“我的手脚自然是我的。”那位党人说：“你的行动，都是受着他人的指挥，所以你的手脚，都不是你自己的。”旁人有人听到这些话，便马上报告陈炯明的弟弟陈炯光，作为异端邪说，煽惑军心，还将其人扣押起来，送交陈炯明处理。陈亲自和他谈过之后，才把他释放。

## 五、返旆回粤的点滴见闻

(一) 当孙中山决定命援闽粤军回粤扫除桂系军阀的时候，曾派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人先后来漳州与陈炯明磋商办法，但都以军费无着没有作出具体决定。后来朱执信携了孙先生给的开拔费来，才决定行动。参谋长邓铿一方面积极进行军事部署，一方面又设法麻痹敌人的戒备，使猝不及防，正苦思不得其法，后乃想出其岳父某某（忘其名）和桂系头子陆荣廷颇有私交，邓就派了他到广西进行活动，樽俎酬酢之间，极言粤军不会回粤。就在这时陆荣廷已得到消息，粤军已开始行动，不禁大怒。后来其岳父回来说：这次狼狈万分，险些就被陆荣廷杀害。

(二) 援闽粤军回粤之际，陈炯明是颇注意宣传工作，在政治上提出以“粤人治粤”、“实行民主政治”为号召；在军队上又编出歌谣，如“广东米，好煮饭”、“广东水，好煲茶”等等。粤籍士兵出征两年多，备尝艰苦，一闻要打回广东，人人欢跃。虽财力和装备数量，比敌人都处于劣势，然军心思乡甚切，士气旺盛，皆抱有灭此朝食气概。而桂系军队其中亦有不少粤籍官兵，

又针对这种情况，大事宣传“广东人不打广东人”、“一定要粤人治粤”种种的口号，令敌人内部自起猜疑，动摇其军心。所有这些宣传，都起了不少作用。我当时虽不清楚有没有派人到桂军粤籍官兵中策动反正，但当我军左翼从诏安前进攻击时，桂系军长兼惠、潮、梅镇守使刘志陆部的统领关澄芳、林良彝、苏理中等部纷起倒戈，不到五天时间粤军便全部占领汕头。守潮梅的统领周辉甫、魏耀奎二人，也各率所部投降受编。整个潮汕一线只有在浮山接触过几小时，以后便结束了战斗。原来刘部本是粤军部队，官兵多是粤人，在第二次革命失败后，刘率部退到广西依靠陆荣廷，夤缘上升，陆亦倚为心腹。当桂系统治四年，祸尽广东，稍有良心的人，自然对此不满，今见机会到来，自上而下，都不愿粤人自相残杀，特别是下级官兵，都自动起来反正。如连长车渭英听到粤军回粤，就马上起来响应，刘志陆初时还企图大力镇压，将车枪杀，以示淫威。但这时已军心涣散，压也压不住，连他的参谋长杨幼敏，都被怀疑在通敌之列。刘在慌乱中就不得不只身逃回广州。粤军左翼的迅速全胜，也加速了桂系的失败。

(三) 桂系军阀在潮汕和东江上游被粤军击溃之后，还调沈鸿英、林虎、马济等主力部队分头驰援，企图顽抗。两军正在河源、惠阳一带扼要固守的时候，突然广东警察厅长兼江防司令魏邦平和总领李福林两部乃在省河宣布独立，初以兵谏为名，劝莫退出广东。同时李部则在广州河南布防，魏也驾江防炮舰沿省河示威。桂系闻之甚为震惊。但他们知道李福林是个投机取巧、唯利是图的人，并不是真心真意的拥护孙中山，乃使省长杨永泰向他许以特殊的权利，同时，也不断使人拿着前线“胜利”的电报给他看，恐吓他要快些撤防。而魏也知道李有动摇的状态，乃亲自见李说：我们约定倒桂到底，今天你又想反悔，中途撤兵，我就先不肯放过你了。由于魏以强硬的态度威胁着李，李才勉强地

支持下去。魏李两人后来虽然作为内部响应有功，但事实的经过却是如此。

(四) 桂系中当时在广东以能战闻名的海疆军，本来是驱逐龙济光是由李烈钧率领张开儒、方声涛两师从云南来广东的。这支滇军，桂系在广东得势后，李根源便凭着桂系的势力，夺取一部分过去平时由其弟李根沄亲自率领，必要时李根源才出来指挥的部队。这次粤军回粤，桂系在东江上游败退下来，李根源便率海疆军（约一个混成旅）驰赴河源一线。不料沈鸿英中途撤退，粤军乘胜追击，李见孤立无援，大势已去，也将海疆军撤回广州，驻在农林试验场。粤军开到广州后，李根源、李根沄等人也离去广东，留下的海疆军也不及撤回广西。这时张开儒已无兵权，居在广州，思欲乘机再起，乃亲自见陈炯明说明他愿出来收容海疆军。陈一面虚与应付，但恐张在海疆军中旧属不少，日久复生。即日密令熊略所部将海疆军包围缴械，并将它收编，海疆军就此结束。其余还有些桂军如黄业兴等部，都不及退回广西的，也加以一一改编整顿。从此粤军才统一了广东。

(1965年)

## 粤军回粤策反活动的片断回忆

范 准\*

1919年至1920年间，广东督军莫荣新获悉援闽粤军（总部设在福建漳州）有回师广东的动向以后，为了巩固他在广东的统治，加速收编军队，积极戒备，饬令广东护国第四军总司令兼潮梅镇守使刘志陆（字伟军，梅县人）把主力部队第一统领兼军副司令卓贵廷（广西人）、帮统兼营长覃桂一所属三营，第二统领林良彝（字仲循，梅县人）所属李炳奎（广西人）、廖翼佐（字宁方，大埔人）等三营，第三统领关澄芳（广东人）、帮统周辉甫（梅县人）所属三营（第一、二、三统领系第四军内部的称呼），并从其他各军抽调张驻云统领（广西人）、帮统兼营长车渭英（广东人）所部三营及苏理中统领所部三营共六个营兵力，归刘志陆指挥，分布在饶平的黄冈，澄海之樟林、东陇、外沙这一线（右翼）；饶平之上饶、茂芝前，大埔之枫朗、高陂，潮安之凤凰山这一线（中路）；以及大埔城、三河坝、松口这一线（左翼）各线上，以图固守。另外，还有魏炯球（五华人）率领的独立营一营以及由中校参谋兼营长饶富（字仲仪，大埔人，与刘志陆有同学关系）统率的护士营（在钦廉一带新招募的），在潮安训练了半年，一律配足粤造六八枪弹，装备整齐，超越第四军各营之上，刘志陆没有把这两营调往前线，作为保卫后方及总预备队之用。莫荣新在第一道防线上配备的兵力，计有17营之多

\* 作者先任刘志陆部之营部、帮统部书记，后任邹鲁的粤军义勇军司令部军需处副处长。

(约1万多人)。

孙中山先生为了贯彻护法主张，就必须坚决彻底摧毁桂系在广东的军事势力。特别是面对着摆在第一道防线的桂系军事势力，必须首先解决。当粤军准备回粤期间，1919年冬，陈炯明曾派参谋长邓铿往上海谒见孙中山先生请示并商议对策，研究结果，认为策反工作，可以分化敌方势力，可以瓦解敌方官兵斗志，可以减少作战兵力的伤亡，适当配合作战部队，就能够快速取得胜利，有必要把策反工作在开始进攻之前做好。同时又了解到刘志陆所部第四团的上中下级军官多数为广东籍特别是潮、梅籍人士，人选问题也要慎重考虑才能收事半功倍之效，于是决定以当时在潮梅地区有声望、地位的姚雨平、邹鲁担任这项任务，会议决定后，就通知姚、邹二人，加速开展策反工作。

1919年冬，姚雨平秉承孙中山先生意旨，并得陈炯明的聘请，由上海前往漳州，担任援闽粤军总司令部顾问之职，随即函约他的族叔公姚海珊到漳州，密商策反工作进行事宜，择定刘志陆部下的帮统周辉甫和独立营长魏炯球为对象，并委托姚海珊负责。姚海珊返回平远原籍，约同平素与姚雨平关系密切，具有声望，又与周、魏有朋友关系的林德光、谢赉孙、凌上宾等往汕头，先同周部的排长谢重高（姚雨平先前的卫士）会商后，分头与周辉甫、魏炯球联系，转达姚雨平对他们的要求：“在粤军回粤战争中，乘机起义，驱逐桂系势力，贯彻孙中山先生的护法主张。”由于他们平素信仰孙中山先生和姚雨平，对粤军回粤一定胜利也有信心，故工作进行颇顺利。但因为在联系过程说话和行动不够谨慎机密，排长谢重高和林德光、谢赉孙、凌上宾等四人被捕，刘志陆以“煽动军心、图谋不轨”的罪名，把他们杀害。杀害他们时正近黄昏，由于将入夜，来不及把他们的尸体掩埋。其中谢重高一人，子弹没有打中要害，在一度昏迷醒后，爬起来，跑到奇碌吴家祠粤军驻汕后方办事处（马育航负责），由该

处派人护送到日本医院医治后，再化装成日本人搭轮往香港（后改名谢再生）。这些经过情况，是根据省参事室主任姚雨平口述的。谢重高死而复生事件传出后，当时潮汕地方，街谈巷议，认为是空前未有之奇闻。

另一方面，邹鲁接受孙中山之命回到香港后，知道我在刘志陆部下林良彝统领所属的七十五营营部任书记之职。当时全营官兵已经调往枫朗驻防，营部设在高陂商会，营长廖翼佐，营附丘肇周（字源生，大埔人，与邹鲁关系密切，因为原第四连连长林忠调往汕头讲武堂训练，连长一职由丘兼代）也在高陂。邹鲁派刘次负回来找我，传达邹鲁交给我的对廖营的策动任务。我当时考虑到廖翼佐营长与邹鲁素不相识，没有感情，同他联系，有很大困难，与丘营附研究结果，商请与邹鲁友好而又有地位、为廖营长所敬重的刘织超（做律师和法官）和林渭庵（商会坐办、县议会副议长）去见廖营长，说明邹鲁对他的要求：“拥护孙中山先生护法，在粤军回粤战争中，乘机起义，共同推翻莫荣新在广东的统治。”并说明粤军回粤必然胜利的道理，以加强他的信心。廖经他们的说服，勉强答应。不料同年夏初第七十五营调回潮安，营长一职，由刘志陆另派邓硕甫（梅县人）接手，廖翼佐升任帮统（帮统部设在潮安城的旧考棚内，与统领部隔邻），我调帮统部任书记兼办部内事务。交接手续告一段落后，该营调往凤凰山（接近茂芝前）一带驻防。邹鲁了解这一变化情况后，派谭启秀来潮安找我，可我已往汕头，没有见面，约隔一个星期，又派蒋光鼐（谭来找我是蒋告知的）前来。蒋了解第七十五营虽然易长，但尚有丘营附兼代的第四连和蔡纵（大埔人，与邹鲁有友好关系）的第三连可靠，廖翼佐升任帮统，没有实权，恐有问题的情况后，又提出邹鲁交给的另外一个任务，即对刘志陆的护士营营长饶富（字仲仪，与邹鲁有同乡朋友关系）联系。当时护士营是在潮安城内训练，当晚我约同蒋光鼐往该营连长罗兼柔（与

邹鲁有密切关系，与蒋在反袁讨龙活动时相识）家会谈。罗兼柔得悉蒋的来意后，对蒋说：“我可以接受邹鲁交给的任务，但饶富营长与刘志陆关系密切，不好商谈，如何进行，我们当慎重考虑，情形如何，再行奉告。”蒋光鼐在这一晚商谈后，即于次日往汕转轮返香港复命。我和罗兼柔也于第二天和该营书记蓝逸川（系邹鲁同学好友）密谈，结果决定商请与饶富营长平日友好又与邹鲁有密切关系的同乡邹敏初、涂云史、范韵琴、江公伟等与饶富密谈，提出邹鲁对他的要求：“拥护孙中山先生护法主张，当粤军回粤战争中，乘机起义，协同推翻莫荣新在广东的统治。”饶富在同乡好友的大义压力之下，无法推却，不得不答应“相机行事”。饶富的得力助手，在该营有相当威望的营附丁伟（广东人）平日很信仰孙中山先生和邹鲁的，通过蓝逸川的联系，也得到他的完全同意。

1920年8月，粤军回粤部队分三路进攻的前夕，在中路饶平县之上饶前线的桂系防御部队统领张驻云，在一天中午把睡在帆布床上的帮统兼营长车渭英突加枪毙（据说是因车很欣赏粤军提出的“广东人不打广东人”和“粤人治粤”等口号，在言论中流露出来，被张驻云报奉莫荣新电令执行）。这一事件发生后，所属绝大多数的粤籍官兵，痛恨桂系军人的专横，粤军开始进攻时，就响应“广东人不打广东人”的口号，向粤军投降，上饶防线遂突破。张驻云狼狈逃亡，不知下落。茂芝前、枫朗、凤凰山一带防御部队，也很少抵抗，节节后撤，黄冈前线的防御军队，在粤军左翼部队猛烈进攻之下也败阵。周辉甫帮统领所部与魏炯球的独立营（左右翼紧急时调往前线的）联同起义，也向汕头后撤。左翼卓贵廷部也因为中右两路溃退和起义的影响，迫得向五华、龙川方面败退。刘志陆在各线的崩溃情况下，带同护士营来潮安，驻在统领部（饶富和罗兼柔随侍在侧），企图作垂死挣扎，整天用电话指挥茂芝前、高陂、凤凰山等处前线部队作

战。廖翼佐帮统已往凤凰山前线指挥，我在帮统部听到刘志陆在电话中说“不得后退呀”、“一条枪也要顶住呀”之声不绝于耳。当天黄昏后，他和汕头镇守使署通话说：“既然澄海方面电话不通，情况不明，就把一切重要有关军用物资搬上轮船离开吧。”我听到这些话，知道刘志陆的大势已去，认为这正是护士营乘机起义的时候，适罗兼柔来我房抽烟，我提醒他说：“时机到了”，他点头后回饶富旁边侍候，当晚约10时左右，刘志陆带同随行人员离开统领部，饶富、罗兼柔随行，往西门上火车，车行抵浮洋站，停止行驶，刘志陆下车向揭阳方向前进，饶富在这个紧急关头，考虑到刘志陆一败涂地，自己没有理由再跟他走，在丁伟营附和连长罗兼柔的坚决和强硬的态度挟持下，已有了决心。但面对刘志陆如何处置问题，仍大伤脑筋：把他扣留起来，挟天子以令诸侯，而他的部下已经纷纷投降起义，不起作用；把他置之死地，又因同学友好和上司关系，不能忘恩负义。经过充分考虑的结果，避不与他见面，派出一排兵护送他向揭阳方面逃亡广州，而自己带同全营官兵上火车向汕头进发。饶富这一次行动，就最后结束了莫荣新在潮、梅地方的统治。

饶富随同全营官兵（缺一排）当晚2时许车抵汕头后，即通知留汕的邹敏初和各同乡，次日早邹敏初携带“粤军义勇军司令邹鲁”的旗帜（这个名义是孙中山先生和邓铿会议时决定的）前往汕头火车站，引导全营官兵进入汕头市区，在奇碌一间大洋楼，设立粤军义勇军司令部。邹敏初以粤军义勇军司令部参议名义代行邹鲁职权，委任侯腾（字铁梅，梅县人）为汕头商埠警察厅厅长，维持市区地方治安，全市关门已经四五天的商店才开门照常营业。第三天，邹鲁由香港来到汕头后，委任饶富为参谋长兼第一支队长，谭启秀为第二支队长，蒋光鼐为副官长，黄坤南为军需处长，范方甫（本文作者）为副处长代行处长职务，萧冠英，温建刚等十余人分任参谋、副官，收编刘志陆所部的溃败投

诚官兵共约有两个营的数目（原调凤凰山前线的第七十五营的丘营附和蔡连长所属的三、四连在退回潮安后，也开往汕头，收编在粤军义勇军所属的支队里）。

邹鲁到达汕头的第三天，陈炯明到达汕头，姚雨平也同时到达，即委任姚雨平为潮汕卫戍司令。姚雨平就职后，以起义的周辉甫三营，魏炯球的独立营为基本部队，并以新收编的刘志陆部下的投降官兵大约两营，负责维持保卫潮汕地方治安。

粤军义勇军司令和潮汕卫戍司令先后在粤军回粤部队占领潮汕地区的前后出现，并不是偶然的。他们在粤军回粤作战的前后过程中，吸引着莫荣新摆在第一道防线上的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军事力量，转化为自己的力量，这是策反胜利的标志，是孙中山先生正确领导的结果。

(1964年)

## 对粤军回粤虎门各路联军活动的一些回忆

叶少华\*

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1920年命令驻闽南陈炯明部回粤讨伐桂系，驱逐盘踞广东的莫荣新等势力。驻防四邑和河南一带的魏邦平第三师与李福林军为着配合粤军西下，同时宣布独立。各地民军纷纷响应，虎门要塞司令丘渭南在各方压力下，也宣布独立。朱执信到虎门调停驻军与东莞民军的冲突遇害，丘渭南逃往香港，虎门要塞司令一职由沙角炮台台长吴礼和继任。其后驻虎门有魏邦平部两个营、李福林部两个营和一些民军，张惠长和陈庆云带领的飞机数架，并有少数护机队伍，陈策率领的兵舰数艘，也有些陆战队。为此，陈炯明派龚振鹏为虎门各路联军总指挥，以泊沙角国民兴商轮作为总指挥部。当时我任总指挥部秘书。经由虎门出口的船只颇多，多数是载运禽畜（如鸡鹅鸭生猪等），吴礼和对出口船只必勒索一笔款项，才肯放行（每只三鸟要三几角钱）。有的为着筹纳缴款，停留数天，以致三鸟生猪死亡不少，于是民怨沸腾。我常被派往香港领取军费，必须向要塞借用小船前往。有一次吴礼和不肯借船，谓我们借口往香港饮花酒，因此激怒了陈策、陈庆云等，以借船为名，向吴礼和争论，言语间冲突起来，拔枪相向，当场击毙吴礼和之侄（是要塞副官），并将吴礼和绑起来，押送陈策海军的一艘小兵舰。于是龚振鹏委任总指挥部参谋长何振为要塞司令。不久释放了吴礼和，吴到香港向陈达生哭诉（陈是陈炯明之弟驻港主持有关事务），并送一笔勒索得来的贿赂与陈，于是陈炯明电令吴礼和复职，何

\* 作者时任虎门各路联军总指挥部秘书。

振只好遵令交代了。其时粤军参谋长兼师长邓铿已到达石龙，龚乃率领魏李几个营前进厚街，指向东莞县城。我刚从香港归来，即赶上队伍。在东莞县城桂军守将是李易标，由于腹背受敌，不得不降。我随龚进驻莞城，在李易标军部商量收编办法。李是桂军一名悍将，见他剃光头，赤膊，只穿一件满袋子子弹的帆布背心，两边插有两枝驳壳，该部四周及门前架了不少机关枪。龚令他暂退城外听候改编。结果李的部队退出莞城外，仍随桂军退返广西。

(1965年)

## 朱执信先生虎门殉难记

何 博

我在执信学校供职十余年。执信死后，其家庭间的琐事亦时有帮忙，对执信生平知之颇多。执信是死于民国9年（即1920年）9月21日下午3时至4时间，他是9月16日从香港秘密到虎门的，同行者有何振（仲达）及卫士杨安。当时虎门独立，已举定吴礼和做虎门要塞司令，吴已在沙角炮台设处办公，执信到后，和吴礼和住在炮台内。21日执信因邱渭南部和民军邓钧部冲突，即前往邓钧部调停，因而殉难的。

讲到当日的情形，最可靠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何振，一个是杨安。何振随同执信前往，同遇险难，幸得不死，杨安被囚屋内亦得不死。何振报告，朱执信先生之弟弟朱秩如现仍健在，所记内容如下。

此次朱执信在虎门寨遇害始末情形，余均在场目见。自虎门各炮台与太平一举为我军克复后，余与先生住沙角炮台，21日午，正在办公所与吴礼和司令等商议防守事宜，朱先生忽牵余手，示有密谈，余乃尾随入室。先生语余曰：顷闻东莞方面有两连人退却，未悉何事，盖同往太平一查。遂相与乘船到第四军司令部，详询李哲夫参谋一切，一面遣人到大较场邓钧所部民军处，磋商议和及编队办法。

先是邓钧率领戴沛等民军数百人，于甘夜潜近虎门寨第五支队司令部（钟新基之第四军即旧肇军邱渭南所部）念一日向该部拂晓攻击。该部不及备，被缴去枪支数十杆，由是两军势成水火。邓钧与朱先生亦素相识，惟其事前并未有通知，故事发后朱先生即派人诘问，数往均无结果，乃出名片请彼前来面商，邓复

请朱先生就商。先生调和情急，遂挺身径行。时钟部梁营长适在座，即曰朱先生此行甚佳，深望能将枪支劝还，以免两伤和气。朱先生果去，我以电话告司令部，避免误会。盖该部距民军驻地甚近，亦系民军所必经之路也。先生遂安然率余及李哲夫参谋同往。临行时并谓梁曰：此事定可办到。及抵邓营，邓果从先生请，愿将枪支交还该部，其军队之编遣，亦悉愿听先生之指挥。时为下午3时40分，先生与余等正欲辞回，而枪声徒作，方知钟部向民军反击也。该部居高临下，瞬间即将民军包围，民军不支，纷纷散走。先生与余初伏后墙以避，嗣以火势集中此处，猛烈异常，遂又跳墙随民军而走。讵所过皆草地，平坦无障，时后方进击甚急，弹如雨下，目睹民军应枪倒毙者无数，余与先生遂同卧地下，不敢再前。余自念与朱先生此时不为乱枪所中，私心甚幸。然未几，追军已到，余乃勇敢起立，以身障先生，扬手大呼曰：余等是来调停者，朱执信先生在此，请勿放枪。言时大队散兵已到，时先生亦急起坐，扬手疾呼曰：我系朱执信，请勿放枪。其声甚细，几不可闻。余即接声连续代喊，众兵果不放枪。不意有绕出余前十步左右者，竟举枪向先生一轰，中先生之胸部，旋即移枪向余，余急闪避于一兵之侧，而紧执其手曰：请你保护我，我系自己人，亦系同朱执信先生来调和者。幸该兵不拒，并且摇手示其人勿放枪。在此瞬时，先生尚能睁目视余，意曰：余不幸已中要害，谅不可救，汝万一能免，仍当与各同志努力，前进勿馁也。余挥手连呼道：三哥唔怕，三哥唔怕，语未毕而先生倒矣。

余此时亦不知命在何时，只得仍紧握该兵之手，而随其进退，盖余自念一离该兵之手，生命立可不保也。未几又有大队散兵至前，喝令毙余，该兵亦谓自己人勿开枪，众兵遂遍搜余身，将所有时表指南针千里镜及零碎银物抄去，劈裂衣服。抄已，又复喝令毙余，余在此万分危急之时，忽见有一紫铜衫裤者，余知

必为统领长官之属，急趋握其手，乞该统领如前护余，后知为喻统领（朱秩如云喻字是错，实是余统领余六吉）。该统领即挥手令众兵追敌去，众不听，必欲毙余，该统领大怒，顿足挥手，方始散去。该统领素不识余，遂握执余手，若恐余逃。余曰：余决不逃，但朱执信先生已被误击，请即往救以验生死。因余此时已距离先生数十丈，不复知先生何如也。该统领不答，仍执余手如故，后将余交一副官潘某押余回营中，余随语以所历，并求往救朱先生，潘副官不应，惟叹息吾国失此一大人物而已。及抵彼营，则见李哲夫参谋缚于石柱上，因早已为众兵捉获，遍体已被殴伤矣。潘副官本认识李参谋，遂立为释缚，扶入休息。余到后，即大呼请往救朱先生，但无有应者，后梁营长来，余急责之曰：朱先生偕余至民军营中调停时，君言代电达司令部，以免误会，奈何有此祸变，今朱先生已被弹中要害，其速使人护送回营，验有救否。梁营长遂嘱某副官带兵数名前往，实则余固心知先生必无可救也，不过存此希望而已。后知先生果不可救，余遂由梁营长保护回钟新基之司令部，将手足伤处略为包裹，即匆匆乘船回沙角炮台。时周之桢适从香港来，遂与吴礼和三人商议善后，决定办法两条：一是不信任第五支队，限即晚离开太平，否则开炮将其轰击。二是对于朱执信先生尸体之处置，要乘夜由周之桢先生亲往交涉。以上两条卒得彼方完全承认。22日即电吴司令派人往港报告一切。23日晚，余与周之桢先生亲将朱先生之灵柩用飞云兵舰运送往港，以待各同志之议葬焉。

凡上所述，均据实记录，自信无一错漏也。民国9年9月27日，何仲达记。

杨安报告：

杨安是执信先生的卫士，先生逝世后，在执信学校当庶务员，据他说当日情形如下（杨安又说，下面这些话，我在省长公署报告时亦是这样说的）。

我随执信先生于9月15日晚由香港新界落船，秘密前往虎门，在船上一夜未睡，16日9时到太平，上岸察看了一会，再乘船到沙角炮台。吴司令出来迎接，我和何振都随先生同住在一间房内。

21日12时，我随先生及何振前往太平，至邓钧驻地，先生和何振、李参谋入邓营，我时时紧随先生左右，未有离开。

先生和邓钧等谈了约一个多钟头，站起身来正想回去，忽然枪声响起来，一排一排地落到屋顶上，穿过瓦面射下，我即呼曰：先生即站到墙角，勿立在台边。先生和何振果跳过台面，站到我对面的墙角。我心颇安，以为先生已在安全的地方了。

我见先生和何振蹲在墙角下，我即出门，拟看看外面情况，究竟是什么事。邓钧等20余人亦一拥而出，当时枪声更密，有七八个人被射倒了，邓钧亦中枪倒下，十余人往后一推，连我也陷在水坑内，被几个人压着了。

经过了半个钟头，枪声离远了，我即爬起，跳过水坑进入屋内寻先生，谁知一进门，被伏在屋里的几个人用枪指着，将我捆绑，我大呼，我是跟随朱执信先生的，你们不要绑我。各人不听，我举眼四望，不见了先生和何振。

一直等到6时，我被解到邓军司令部，他们问明了，将我松了绑。我便问他们朱执信先生在何处，他们说：朱执信先生受了伤，现在外面，你可跟随这个勤务兵前去。我跟了这个勤务兵跑了半个钟头，到先生肇事的地点了，我见先生已死，胸上中了三枪，头上中了一枪，眼珠都被打碎了。我心痛得很，跪在尸旁不敢动。一直守着尸体，至晚上始见何振和周之桢先生等到来。

这是杨安在执信学校不止一次的向我说的话，每次都是这样说，可知是真实的。

(1961年)

## 朱执信先生之死

徐直公\*

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按：这篇史料是广州市文史馆馆员徐直公先生采访东莞太平镇虎门寨老人林绍棠后写成的。林妾邓氏，系邓钩之妹，邓、林两家过往极密。林对徐说：“邓钩部下参加暴乱的人不少，曾对我缕述一切经过甚详。几十年来，我始终没有揭发这个秘密，认为已经有两个替死鬼代邓钩伏罪了，就不必再暴露自己妻舅的罪恶丑史，让死者被人鞭尸。今天党与人民政府敬老尊贤，访遗搜轶，自己理当把这件事情真相公开出来，以证史实。”此前，徐先生还曾托其香港友人代访何振本人，了解当日虎门要塞变乱经过，所谈事实与林绍棠老人所述吻合。

1920年夏，孙中山先生命陈炯明、邓铿、许崇智等率领驻在福建南部的粤军回粤，讨伐桂系军阀陆荣廷。大军很快就克复了潮汕，转向东江方面进攻，节节得胜，直达紫金、河源一带。当时的桂系督军莫荣新组织所部桂军不断涌到增援，人数不少，双方展开过几次激烈战斗。这一地区经过三得三失，形成拉锯式的状态。战事拖延下去，一时无法进展。

朱执信就在这个时候到了香港，派人运动虎门要塞独立起义，同时又策动东莞民军头领邓钩，许以在响应虎门要塞起义成功之后，由他接任虎门要塞司令之职。邓钩又与当地一个所谓绿

\* 作者为广州市文史馆馆员，本文为作者采访邓钩妹夫林绍棠后所写。

林豪杰万沛联成一气，声明随时可以动员虎门要塞附近几百个绿林兄弟支援。当时的虎门要塞司令邱渭南出身商界（广泰来旅店经理之子），平时只知夤缘钻营，毫无政治军事常识，临时仓皇失措，知情势不妙，早在要塞官兵起义之前，闻风先遁。虎门要塞独立成功之后，敌人后方受制，广九铁路沿线和东江一带，两条水陆补给线又被完全截断，大受威胁。粤军得以争取主动，扭转战局，顺利向前推进，朱执信的策反计划，至此完全成功。虎门要塞独立之后，朱执信乘坐虎门要塞起义官兵派遣到香港迎接的追云舰于9月19日到达虎门要塞，对起义官兵进行慰劳。当时他的随行人员中有国民党人何振（仲达）。何是东莞大汾乡人，清末搞过新军起义运动，1917年大元帅府成立时，当过虎门要塞司令，对于虎门要塞一带地方情况熟悉，人缘也不错。虎门要塞内部旧日官兵，还有不少人对他颇有好感。朱执信先生抵达要塞司令部之后，起义将领们从谈话中才听到虎门要塞司令一职人选定了邓钧，大都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虎门要塞官兵，曾经参加过对万沛等人所统率的一群“绿林兄弟”的围剿，彼此有过几回交锋，害怕将来邓、万等人上台之后，可能挟仇报复。同时又向朱执信先生反映了不少当地群众控诉邓、万等人的部队军纪不严、横行霸道、荼毒乡里、为非作歹的罪迹，坚请改变原来的决定，朱执信先生接受了众人的意见。9月21日在虎门要塞司令部召集全体起义军官及邓钧、万沛等人谈话，首先赞扬他们弃暗投明奔向革命的义举，同时宣布虎门要塞司令一职，由何振接任，邓钧、万沛等人响应独立有功，俟广州光复之后另有安排，并勉励大家同心协力，为革命效劳。

散会后，邓钧、万沛二人心中非常怨愤，杀机顿起，在家密商对策，决定阴谋暴动，乘乱杀死何振，除去劲敌。就在当天晚上纠合部队，从东莞太平镇附近袭击虎门寨内的虎门要塞司令部，邓、万的部属首先从东门攻入要塞，纵火焚毁火药库一座，大火冲天，枪声大作。朱执信先生闻变，惊起出视，惨遭郑、万

部下乱枪击毙，壮烈牺牲，时年 35 岁。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惊闻噩耗，痛哭流涕，对身边的人说：“这是革命的最大损失，今后党内像朱执信这样果敢精明的人，已经不多了。”事后革命政府明令追褒，每年 9 月 21 日开会追悼，以志哀思，并在广州举办执信女子中学，永留纪念。

当晚，何振本与朱执信先生同在虎门寨内的虎门要塞司令部歇宿，半夜闻变惊起，不顾一切，夺门而逃，逃向西门，爬过高墙，攀岭爬山，直到听不到枪声才敢停下脚来，侥幸逃得性命。邓钩、万沛二人，亦在战乱中被炮台官兵击毙。事变后，群龙无首，人心惶乱，邱渭南在这时候又曾一度回到虎门要塞主持善后，所以来盛传朱执信之死是由于邱渭南暗中勾结桂系军阀莫荣新，接受巨金贿赂，有意布置阴谋，派舰将朱执信先生骗到虎门要塞，制造炮台起义官兵与东莞邓钩、万沛所率领的民军和“绿林兄弟”的冲突事件，乘机将朱执信先生暗杀，即此之故。

广州光复后，陈炯明当上了广东省省长，命当时省长公署政务厅长古应芬召见何振，追询朱执信先生殉难的经过。何振将上述情况陈述一番，古应芬偏信外间所传邱渭南勾结莫荣新接受巨贿谋杀朱执信先生之说，痛斥何振有意歪曲事实，后来终于扣留了两个虎门炮台的军官作为凶手，押往朱执信先生墓前枪毙，事前吩咐何振作证，何振始终支吾其词，不敢肯定，使古应芬大为不满。从此何振投闲置散，终身不被录用。

（编者按：关于朱执信先生之死，有不同说法，请参见黄梦熊、朱秩如等的《朱执信传略》，刊于《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1 年出版。）

（1961 年）

## 第一次北伐时一次军械运输

张带山\*

1921年底，孙中山先生进行第一次北伐，于12月4日亲到桂林，驻扎于桂林“王城”时，即令陈策成立大本营抚河船务管理局。陈当局长，设局于桂林，并在梧州、昭平、平乐三县设立分局。总分局负责军需运输事宜。

1922年1月间，桂林大本营已调动滇、赣、湘、粤部队，纷纷准备出发向湘境前进。当此之时，陈策奉命即将储存在梧州分局的军械和服装一大批速运桂林，以补充前方部队使用。这批军械和服装系由广州运到的，数量记不清有多少。但在运输时则雇用大小民船约有100艘才能装载完妥。起运时，陈策和我（当时在分局当科员）随船同去。另由大元帅府警卫团团长陈可钰派第三营营长张发奎率部护送。因张发奎营在团部成立时以补给调集部队关系，未能于孙中山先生离开广州时随行，于此时补给调集完妥，开到梧州，因而乘便护送。大约船行28日才到桂林，随将军械服装移交清楚。距不久，在广州竟发生刺杀第一师师长邓铿之事，因而孙中山先生有回师改道之举。陈策又奉命将存桂林很多军用物品运回广州。我当时经手处理，也用大小民船约有百艘，装载完妥后，派来有一连人护送回梧。

抚河冬令，春初水浅，滩石嶙峋立在河面，我们船只顺流而下，到某滩（忘记滩名）时，不知前面大石背后已埋伏大帮土匪，准备抢劫。侥幸距离约有一里路左右，碰着一只鸬鹚艇，通知我们最先行的船，嘱不要再下，说前头约有五六百人，系来劫

\* 作者时为抚河船务管理分局科员。

我们的，于是我们立即通知各船分两岸停泊。所有人员一齐登陆，准备作战，以待贼讯。但不久，贼知有备，纷纷逃跑到岸上，不阻船只通过。陈策乃率领二三十名士兵开道径向贼方前进，探听贼方堂口与贼首姓名，原来系梁胜广所属，梁与陈策原来是旧相识，复经通过，传达梁胜广则亲自出来迎接，且放鞭炮欢送我们。此后一帆风顺，浩浩荡荡而由梧州到广州，毫无阻碍。

(1966年)

# 1922年参加飞机队北伐亲历记

胡汉贤\*

## 一、回国效力

1921年，我在加拿大学习航空毕业回国，同时华侨筹有款项，交我带回亲交孙中山先生，为北伐军费。是年10月，到达广州，适中山先生已率领北伐军到梧州。当时任广三路局局长兼广三警备司令的夏重民带同我往梧州，面谒孙先生。奉谕：飞机队正在改组为北伐队，你可回广州，到航空局报到。饬重民同我返回，暂在广三路局安置。我回广州后，到大沙头航空局报到，被委为少校飞行员。夏重民征求我的意见，委我兼路局第一段分巡官，代理总巡官职务。我于是年11月到差，一面回航空局练习陆空联络飞行。第一段分巡官，请文书胡卓汉代理（陈炯明叛变时，袭击路局，击断胡卓汉右手）。至孙先生改道北伐，我对护路尽责，曾得到奖励。

## 二、飞机队改组为北伐队

航空局所辖飞机队原有两队。第一队队长为张惠长，第二队队长为陈应权。为适应北伐需要，将两队改编为一队。编余人员留广州，为后备队员。北伐飞机队编制：正队长张惠长，队附陈庆云，内分三小队。第一小队长陈庆云兼，小队附张爱同；第二小队长周宝衡，小队附陈秀；第三小队长胡汉贤，小队附蔡斯渡。各小队队员与炸弹师、摄影员、地勤人员共30余人。每小

\* 作者时为航空局少校飞行员。

队配定陆飞机两部，水飞机两部。水机因前方水机场关系，暂留广州，陆机随队出发。其总队部编制，除正副总队长外，主要人员有秘书吴光洲等，副官宁克烈、宋绍殷、军事委员雷子定等。军需与地勤员工、炸弹师共200多人。另编飞机掩护团一团，统辖三营，团长为张振武。队伍组成后，集合广州大沙头，听候命令出发。

### 三、飞机队的装备

当时北伐飞机队的飞机一共有12架，有内陆机6架，水机6架。

陆机有美制和英制两种。美制的有3架，名称T.N.6，每架110匹马力，时速100英里，飞行高度10000英尺到12000英尺，如果增加油箱，还可以再高飞。这种飞机原用于教练与侦察。飞机队买来后即作为轰炸与侦察两用。飞机上装置有手提机枪两挺、照相仪器一具、炸弹架4个、自制瞄准仪一部、座位两席。这些飞机是由美国华侨捐送。另有3架为英制，名称A.V.N，译名XI维安，每架90匹马力，时速80英里，飞行高度达10000英尺，增加油箱后，还可以再高飞。这种飞机原为教练机，因军用改为侦察机，如安装炸弹架，可以用作轻轰炸机。机内装有手提机枪一挺，照相仪器一部，陆空联络通讯袋各种齐备。这3架飞机系由当时的航空局购置。

水机6架均为英制，名称A.M.L，每架100匹马力，时速90英里。飞行高度为9千英尺，增加油箱后，还可以再高飞。这种飞机的性能可用作侦察与轰炸。北伐时没有水机场，所以水机都没有使用。

飞机队使用的炸弹有两种：一种是广东兵工厂制造，有100磅和50磅两种；一种是美国制造的30磅的TNT。

## 四、出发前的人事纠纷

1922年5月1日，奉命出发，集中大沙头机场。孙先生于百忙中亲到检阅，并作训话。同到者有黄大伟、陈友仁。孙先生训话后，有编留飞行员陈炎长擅向孙先生请求为出发北伐飞行员。孙先生查询航空局长与飞机队长，均称陈炎长初由美国返回，对空陆作战未经练习，而且该员素有神经病，不守军风纪。宜暂留在广州后方。孙先生即对陈炎长面谕：前后方均为国效力，俟候有需要时再委任到军前候用。但是，陈炎长因未能达到要求，心怀异志。随后陈炯明叛变，陈炎长就投靠陈军，在肇庆轰炸我军，为虎作伥，致遭杀身之祸。另有航空局长朱卓文爱女朱慕菲，曾在航空队搭机飞行，自称为女飞行家，与周宝衡热恋，亦请求为出发北伐飞行员，想追随周左右。但周因其貌寝久已厌恶。而朱慕菲仍一再请求其父支持。朱卓文竟委朱慕菲为北伐飞行员，但是，张惠长、陈庆云均不同意。在会议上，发生冲突，航空局与飞机队各有意见，互相倾轧，上下不能一致。

## 五、全队出发先到始兴县都塘铺机场

1922年5月5日，全队出发到始兴县都塘铺机场，掩护团分驻仁化、始兴、南雄等处。团部与总队部在都塘铺机场附近。飞机6架同时直飞抵达。张惠长与杨永安机着陆时，因机场新辟，机轮到地时，机身与地面相碰，损伤两翼。其他陈庆云与张爱同机，周宝衡与陈秀机，蔡斯渡与胡汉贤机，均安全降下。黄臻与机械长杨标机，余启成与炸弹师机降落始兴城外。各机到达后，均重新检修。

6日，张惠长、陈庆云飞南雄向总指挥部报到及请示。带回许多传单，着派机带往敌人据守各城市散发。

7日，胡汉贤与蔡斯渡带备传单，飞往信丰城与王母渡等

处，绕道回龙、南康，侦察敌人情形，及散发传单。同日，周宝衡与陈秀亦带传单向大庾、崇义、赣州，折回南康、新城散发传单。敌人初次见我机飞到，不大惊慌。是日，我机任务专为散发传单，警告敌军快速投降，对人民群众安慰。

8、9两日，大雨滂沱，不能起机，专整理内务及研究地图。随接总指挥火急电示：(1) 左翼敌人在南安建筑抵抗工事，在南康、新城派重兵布防；(2) 右翼敌人在信丰、王母渡一带挖渠筑堤，日夜动工。九渡外用民工运输较忙，即派机前往侦察报告。

10日，张惠长带同总指挥部派来的黄参谋，及陈庆云带同摄影员，分驾两机到左右翼侦察，将敌人布防与所建筑防御工事，分别摄影带回，交黄参谋转报。

11日，我与黄臻直飞南康、新城侦察。见新城路上，敌人由南安向北溃逃。转飞大庾，见我军已占领南安，摆出我军符号。我们很兴奋，又向南安东北飞行追查，亦见敌人有一部分向崇义线退却。回场报告总部，着明日再飞往侦察实在情形及敌人退向。

12日，我与蔡斯渡、周宝衡与张爱同，分驾两机，早上6时起飞，见退到崇义之敌向江口渡河。周宝衡、张爱同在江口高空，用手提机枪向敌军扫射。我与蔡斯渡迎头施放炸弹。敌人纷纷散开凫水到附近村庄躲避，该处民众亦受损伤。

13日，陈庆云驾机飞往侦察回来报告大庾、新城、南康已无敌踪。我军前头部队占领崇义。同日，我们又飞信丰、王母渡等处。在王母渡，仍见敌我两方各守阵地。在信丰不见我军符号，不明敌我阵地。但在信丰至回龙路上，见有大军前进，我机低飞扫射，我军急将联络符号摆出。随后查知我军占领信丰后，赶速行军，向南康出发，竞争入城，忘却向空联系，是行军中之缺失。

14日，派机向信丰出发，信丰已为我军占领，敌人向王母

渡北走。

15日，接总指挥部命令：（1）我军左翼已占崇义。敌人在江口、上犹做防御工事，尤其在江口、塘江加强防守；（2）我军右翼已占领信丰，王母渡在争夺中，即派机带弹向王母渡炸击；（3）九渡水残敌尚在顽强抵抗，火力甚猛。据探报，有重炮数门掩护，但炮兵阵地忽右忽左，是否掩护退却，情况莫明，即派机飞往侦察；（4）总指挥部最近移动赴前线指挥，到达地点再通知。在为通知前，各报告仍照旧；（5）飞机队机场距离前线较远，如能在新城、南康间辟一机场较好。

15日晚，队长召集各队员会议，传达总指挥命令，讨论以后任务。（1）中路赣州之敌，左翼塘江上犹之敌，右路王母渡、罗家渡之敌，现在是主要，我队每日派机向该三路轮飞侦察，及协助陆军作战；（2）派员迅速往南康修整机场，限7日内完工取用；（3）南康机场修好后，全队开往，都塘铺机场留作后方；（4）俟克服赣州后，电广州航空局派员将水机飞来，因赣州以上，可以采用水机；（5）掩护团留守一连驻始兴，保卫后方机场。其余与总部一律迁移。

16日，派机三部，分左右中三路侦察。我军向敌人进攻，均占优势。中路我军已过九渡水，敌人炮兵阵地已无敌踪，只见火烧栅栏。右翼王母渡敌人，仍据守抵抗。左翼我军已过江口向塘江前进。

17日，胡汉贤带同副官宋绍殷飞往南康，在南康南门外操场用迫降着陆，往见南康县长，同往南门外视察机场地点。留宋绍殷在南康，会同县长雇用民工修辟机场，日夜动工，先修起机地带。18日胡汉贤飞回报告新修机场情形。

17日上午，接到总部临时火速命令：据探报，三南、仁化等处有大股武装人员出现在我后方，未知是残敌窜扰，还是土匪乘机抢掠；着立即派机侦察具报。当日，张惠长、陈庆云分乘两

机，一往龙南、虔南、定南等处上空搜查，各县城市集没有敌踪，只见农民在田野耕作。二往仁化、城口、扶溪等处。民众见我机飞到，齐集仰望，没有敌视举动。

18日，决定整队转移往南康机场。掩护团依照议决计划先行开动，其余除留守外，一律由陆路启程。先到南雄转乌径到回龙直达南康，限三日内抵达目的地。但是机场未修妥，飞机每日飞往前线，仍回都塘铺机场起飞、着陆、加油。

18、19两日，两日暴雨能见度甚差，飞机不能起飞。开往南康队伍改用民船，到南雄起陆前进，照计划阻迟一天。

20日，暴雨乍停。我们各队员起机4部，分两路出发，侦查敌人动向。因暴雨，我军没有进攻，敌人亦各守阵地。在罗家渡至赣州线，敌人运输络绎不绝，水陆并进，似有加重增援。我机在赣州城南敌人运输途中，投下炸弹两枚，又在王母渡扫射，仍不见我军符号。

21日，奉命起飞，携带传单再向赣州散发。

22日，我们飞机三小队全部飞往南康新机场。但地勤人员有一部分未到达，因运输炸弹、汽油阻迟。

## 六、在南康机场对敌侦察与作战经过

5月23日，全队到达南康机场整顿内务，同时召集会议，讨论此后任务。是日，县长送来慰劳食品猪、牛、酒等物。全队由广州出发以来，举行第一次会餐，还有在南康征集民歌能手助兴。

24日，飞机6部，除一部在修理外，5部出动，分头助战与侦察。胡汉贤、余启成飞往万安、兴国散发传单，并在万安、遂川间选择机场。蔡斯渡、陆露斯驾机往泰和、吉安散发传单。张爱同、黄臻向左翼巡视塘江，上犹敌我两军阵线。周宝衡、陈秀侦察右翼罗家渡与赣州附近王白岭之敌。张惠长、杨永安机到赣

州城内电灯局投弹轰炸。随后张惠长之机回防，检查机翼被敌放枪射中，伤破支柱与翼骨，连螺旋桨亦有数弹洞。此机要大修。惜无支柱材料，即电广州航空局派员送来。

25日，我们又起机两架往王母渡侦察，已见敌人由陆路向赣州方面退却。我机迎头扫射，敌军散开，将辎重弃却逃避。又向赣州飞行，见敌人在赣州南门附近王白岭山顶建筑炮兵阵地。岭侧左端开挖散兵壕与堡垒。另在赣州河架有军桥，似有久守企图。

26、27、28日，飞往视察，无进展，敌人见我机日间扫射与轰炸，改在夜间行军与作战。

29日，我军由王母渡前进，迫近赣州城。但敌军据守王白岭，用巨炮扫射，我军不能前进。又到左翼塘江线，敌军有重兵据守。再飞上犹附近，我军已占领上犹据点。

30日，我机到左翼塘江向敌人投掷炸弹。我机低飞，敌军用步枪密集对我机射击，我机亦用手提机枪扫射。

31日，总指挥部派员携带物品到我队来慰劳。有罐头等食物及毛巾、线衫等物品。是日未有起飞。

6月1日，陈庆云同总部派来旅长张民达飞往赣州南门外附近王白岭侦察。指示敌我两军阵地。又飞往右翼，见我军向罗家渡包抄。但敌人在雩都山峡架设重炮，似欲坚守雩都。又到左翼上空，我军正绕道向沙地前进，包抄五云桥。但敌人有死守五云桥状态，在遂川有敌军由水陆络绎南下增援。陈庆云与张民达回防，再派我们起飞，并携带重磅炸弹，分别飞往轰炸助战。

2日，周宝衡、陈秀飞往右翼雩都山峡轰炸，帮助我军向罗家渡前进。蔡斯渡、胡汉贤向中路出发，直达赣州城附近，炸毁敌人军桥，并在南门外王白岭向敌人扫射。见我军占据王白岭右侧山背。张爱同、黄臻飞往左翼五云桥，投弹轰炸，并在遂江炸沉敌人运输轮船、民船等。

3、4两日，细雨纷飞，我们仍起机分头侦察。敌我两军乘雨作战。

5日，周宝衡飞往右翼，见我军已渡过罗家渡。敌据守桃江沿岸，作争夺战，非常激烈，敌人在山峡用重炮轰击，我军损伤极大。周宝衡返回再带重量炸弹，飞往向山峡敌军炮位轰炸。胡汉贤、蔡斯渡带TNT炸弹在雩都山峡轮流炸击。敌人受炸弹威胁，死伤极大，散开在战壕躲避。我军乘时越过桃江，向王白岭进军。

6日，我们奉命向雩都扫射，见雩都敌军向罗家渡我军进逼，与据守桃江上游敌人，企图夹攻我军。我们侦悉敌军作战企图，快速飞回我军阵地，用传讯袋投下，指示敌人有夹攻行动。但是此次飞行甚久，汽油将罄，立即飞返机场加油，同时向总部报告。再起数机飞往助战。果然敌人在桃江上游而下，向罗家渡我军反攻，还在雩都山峡，用远程重炮射击。我军受此威胁，有退守罗家渡之意。另罗家渡左岸，有敌人偷袭。在此危险情况下，幸我机飞到，轮流向敌军轰炸与扫射，使敌军不能抬头。我军乘势将偷袭的敌人击退。桃江上游之敌，不敢前进。我军恢复罗家渡据点。

7日，派机飞到王白岭，见敌军顽强抵抗。我与敌各守阵地，只见互放冷枪警戒。敌沿兴国方面大队增援而来。左翼五云桥方面，敌我两方严阵对峙，常有拉锯战。

8日，我与敌主力战在王白岭展开。我机在王白岭散发传单，促使停战投降。

9日，王白岭争夺战非常激烈，数次抢夺，数次反攻，两方损伤甚重。我机参加助战，整日在空中监视，向敌投炸不下百多次。又将敌在贡水、桃江之间架设的桥炸毁。

10日，我机协同中路军，向王白岭我军阵地增援。炸毁敌人堡垒数座。我军新增援兵，勇气百倍。敌军作战，比昨日稍

逊。

11日，左翼我军已占据沙地公路，堵塞敌人增援。同日，我机飞到王白岭，将敌人防御工事炸毁。帮助我军作战，敌人只有防守，不敢反攻，我军在王白岭已占优势。

12日，我机飞到赣州上游江口，炸沉炸伤轮船各一艘，并有民船向北逃走。又飞到王白岭，见敌人炮兵迁移，停止射击。阵脚移动，有退却可能。我中路军迫近赣州南郊，左路我军沿公路向遂川进军。是日，我们各机整日轮飞，均至黄昏时，始返抵机场。接总指挥部命令：敌人全部向北溃退，仍要派机向敌追击，并侦察退向，及派机分头向左、右、中三线监视，搜索有无残敌未退。我军先头部队已向两岸追击矣。是晚我军开入赣州城。总指挥部于13日迁入赣州城。

13日，我机两部飞往赣州城视察。但赣州城水涨，未有机场降落，转向赣州两岸搜索敌踪。见敌人向良口、万安退却。右翼我军先头部队已占领雩山。左翼已得遂川。我机返回南康，准备全队开往赣州城，掩护团先行开往赣州城候命。又接我队派赴赣州军事委员雷子定电讯：赣州城外洲心有一小岛，可以为临时机场。但该岛沙积而成，落机时要注意。我机两部由周宝衡与胡汉贤分飞。14日早晨，飞赣州城，安全着陆。即电南康机场，全数飞来。是日下午，留南康之机飞达赣州新机场。部队员亦同日抵达，遗留器材交县长保管。

## 七、到赣州以后的任务

6月14日，我飞机全队开到赣州城。总部派员到队慰劳，并传达总指挥命令：现在飞机不能休息，要乘胜追击，侦查敌人退却方向；现送来传单，克日带往吉安、樟树、南昌等处散发等等。是晚队部召集会议，讨论以后空勤地勤任务，及分派工作：（1）赣州飞机场现不适用，要向万安附近开辟机场，派军事委员

陈世一带同员工，于 15 日赶往万安，选择机场，会同县长雇用民工开辟，限 5 日完成跑道应用；（2）电广州航空局将 6 部水机派员飞来，不能延迟；（3）请求总部，向赣州城美孚汽油公司交涉汽油接济；（4）派胡汉贤、黄臻驾机向兴国、泰和侦查敌踪，派周宝衡、陈秀直飞吉安、樟树、南昌，散发传单；（5）其他各机留赣州修理，着机械长杨标督率员工，日夜赶工；（6）掩护团要在赣州洲心岛附近分驻，由张团长择地，不能离机场太远；（7）本日赣州城商会送来劳军物品，由副官按单位分发；（8）我队员工兵等，初到赣州城，要注重军风纪，不得乱搞商场。带来军用纸币照市面价值使用。

15 日，按照议决执行，胡汉贤飞往泰和、兴国，不见敌人。在兴国、江口，有我军符号。周宝衡飞往吉安、樟树、南昌散发传单。在吉安以上河面，有民船大帮，由火轮拖带，向北走。右侧公路有马队运输。敌人零星散伙，沿途溃逃。没有布防发现。

16 日，我机飞往万安，视察新机场工程。看见民工将一桃园推平。估计三数日可以建成跑道。又飞往兴国，见我军有一部向北公路线前进。是晚我们过了自出发以来最欢畅的一晚。商会请我全队员工观看江西南训班的表演，我们尽情娱乐。

17 日，我机飞到吉安、樟树等处，见敌人在樟树布防。沿右边公路至临川，沿左边公路至新喻，余均有重兵把守。并建筑防御堡垒及掘散兵坑。我军前头部队左翼已入福安，右翼未见我军符号。我机再三盘旋，只见乐安至港潭路上有运输辎重兵。适我机机器发生故障，即飞万安迫降。该处已做成新跑道，临时修理，飞回赣州，时已万家灯火，不见着陆地带。机场员工，满布火堆，指示着陆。

18 日，因赣州河水涨，机场跑道被浸，不能起飞。

19 日，我机两部飞往万安新机场。在空中巡视，发现新机场跑道高低不平，正在赶工修理。我机仍飞回赣州。下机后，队

长宣布陈炯明在广州造反，围攻总统府。孙大总统不知下落。全队员工闻知，非常激愤，大家签名，请缨回师讨逆。

20 日早晨，总指挥召集全军高级会议，队长与队附均往参加。会议后，回队宣布昨晚（即 19 日晚）文官长胡汉民与韶关行营会计长林云陔由韶关赶来，请北伐军回师广州，援救大总统。因广州总统府于 16 日晚上，被陈炯明举兵围困。幸大总统突围，已到海军永丰舰。亟待我北伐军回师援救讨逆。各军全体议决一律回师。现赣州地盘交赣军总司令彭程万率领赣军留守。各军限即日起程，仍以粤军总司令许崇智为总指挥。我机队于 21 日将万安员工调回，限 22 日起程直回南雄。飞机照原日出发北伐计划，仍以三小队编制，亦于 22 日起飞到南康，俟部队各员工到南雄，机队即飞南雄候命。张队长随总指挥部回师。陈副队长指挥全队员工及押运军用物资，由陆路起程，限 5 日内到达南雄。掩护团随同全队回师。

21 日，我们虽到赣州数日，各因任务关系，还未认识赣州面貌与风景。是日乘未起程的机会，尽日到各地方游览，选购土产与瓷器等物，带回广东。

22 日，我们三小队飞机共 6 部，除两部未修好外，能飞者只有 4 部，全数飞到南康。等候先头部队员工们到达南雄后起飞。

26 日，我们已在南康候了五天，计期各员工已到达南雄。又因我们回师讨逆心急，大家不及听候电讯，三小队同辞别南康，起机直飞南雄。到南雄上空，见机场仍在修理，地面员工用旗通讯，不能降落。转飞都塘铺。该处跑道被雨冲破，更无法降下。飞到周田，见周田有一大沙滩，可以临时着陆。我们各机降落后，见该处已有粤军先头部队许济旅先到。当即知会粤军派兵守护，并电南雄请示。接张队长电复，暂留周田候命。

28 日，飞机总队部由南雄雇用民船而来，派员赴仁化选择

机场。幸在仁化靠河近五马归槽之间，得一天然机场，不用修理。我们三小队各机于29日飞到仁化机场。飞机总队部亦到达指挥飞行任务。

## 八、回粤讨伐逆军

6月30日，我们将各机检修，在机场附近试飞。

7月1日，起机两部，飞往韶关、马坝、大坑口等处侦察，同时散发传单，声讨陈逆炯明反叛罪状，警告军民人等，不可附逆。我机环绕一周，见逆军已在韶关城郊布防，企图阻止我军回师。

2日，我们机场距离韶关较近，恐敌人奸细利用土匪偷袭机场。着掩护团加紧注意。同时加派我们员工，在机场范围内放哨，加设警号。是日晨6时，起机飞往韶关、马坝，见有火车运载逆军到马坝下车，分东西两路行军。见我机到，散开躲避。又在韶关东北各山岭加筑堡垒防守。但是我逆两方未见有接触。我军大队由大桥向东南前进，又有我军迫近韶关之北。

3日，细雨蒙蒙。我机飞到马坝见逆军用火车运输军用品，连续而来。我机低飞侦察，并向火车迎头打圈。见有卡车装载山炮与军用汽车。我机即投下炸弹，弹已命中，惜未爆炸。回队后检查各雷管，因在运输时，被雨潮湿之误。队长将管理弹药员工，扣留示警。

4日，接总指挥部命令两道：（1）我逆两方已在大塘接触，派机飞往助战；（2）黄大伟军与梁鸿楷军失了联系。派机飞往各处，侦察两军去向。是日，周宝衡机飞往大塘助战，向逆军扫射。同时发现我军在韶关西北、黄冈以上一带，与逆军对峙作战。逆军据守黄冈以南，布防抵抗。胡汉贤、蔡斯渡驾机四处侦查，见有军队从城口向仁化而来。我机低飞环绕，该军摆出符号，是黄大伟军。再回机场加油往始兴，沿东江侦察。到定南，

有军队在定南城外操场集合。约有一团之众，作训话式。我机向该军左右摇摆，问取符号。不见答复。再低飞打圈两次，才摆出前北伐时梁军符号，没有摆出讨逆军符号。（因北伐陆空联络符号已改换讨逆军符号）。我机回防报告。

5日，接总指挥部电话：我逆两军已在韶关之北，帽子峰附近各山岭展开争夺战，各争取据点。派机带弹飞往轰炸助战。同时侦察逆军主要阵线。是日，陈秀、张爱同驾机飞往帽子峰敌人阵地，投弹两颗。逆军被炸伤多人，我军乘时占据主要山岭。同日，蔡斯渡、余启成带弹向韶关火车站与军桥投炸。

6、7两日，各机轮回飞往敌人阵地，扫射助战。见帽子峰各山岭争夺激烈。我军争夺据点数次，逆军亦频频反攻。敌方损伤甚大。更兼我机轮回炸击，敌人火力稍减，我军得占主要据点，控制逆军。逆军仍陆续加兵增援。我机又飞到大塘方面侦察。见大塘已为我军占领，我机轰毁马坝火车铁桥。

9日，张队长同总部派来滇军参谋飞往前线视察指示。在帽子峰一带，我军是滇军朱培德军，黄冈以北是李福林军、黄大伟军，我军主要在大塘、火山一带，该处为张民达旅、许济旅、陆学文旅，另黄大伟军有一部分加入帽子峰西北端作战。

10日，因天气乍雨乍晴，没有起飞。各飞行员奉许总指挥令，往周田聚餐，并听训话。

11日，仍因雨阻碍，各机飞到中途，看不见地面而回。

12日，大雨已过，天色晴朗，我逆两军战争转在大塘。逆军数次向大塘反攻，均被我军击退。我机到达助战，逆军不敢顽强反攻。我军乘逆疲困，再作包抄马坝进军。

13日，逆军企图死守韶关待援。我机飞到韶关，将韶关电灯局炸废，并轰炸东西两河军桥。

14日，我机又飞到韶关，见帽子峰逆军整理阵地炮位。同时在帽子峰北端，逆军在埋藏地雷。但是我机飞到市内，见人民

群众惊惶乱跑，向东西两河对面逃避。大约系因昨炸毁电灯局、火车站及军桥之故。逆军在行动中亦有散开。

15日，黄冈以北一带，我军已占领主要山岭，控制黄冈逆军阵地。逆军在十里亭后边山岭，掘防御战壕。

16日，接总指挥部命令：帽子峰一带我逆两军，在各山头争夺，有肉搏之势。逆军连日增援。在帽子峰最高处，用大炮向我阵地射击，我军被逆控制，不能立足。速派机带重弹飞往轰炸逆军炮位，务将炮兵扫灭。我们分头飞往轰炸，轮回如流水一般炸击。逆军受此威胁，炮兵不敢逞凶。我军乘势占据帽子峰的东北主峰，逆军反而受我控制。

17日，韶关逆军将东西河军桥改用民船临时架用。马坝火车铁桥亦修复，用火车运输增援。敌人作战，非常紧张。我机向运输火车扫射。

18、19、20日，因飞机检修，又因汽油在南雄没有运到，又接前线各路军事委员电报：各线各守原防，没有激烈战事。我们得以休息3日。

21日，接总指挥部命令：梁鸿楷师仍在后方按兵不动。派机飞往三南及广东东江等处侦察该部行动。如见梁部驻地，将带往之信用传讯袋投下，勿稍疏忽云。队长即令我与周宝衡二人同飞往三南及东江，照命令而行。我两人奉命起机，先向三南侦察。该三县已不见大军驻守。飞过九连山，欲向东江等处凭空侦察，惜汽油已不够用，又时已下午，时间亦不许可，即转直飞而回。带去传讯袋未能照命令交到。此次飞行不能达成任务，在九连山几乎失事。同日，派机到东、西、中三线侦察，我逆两军仍作争夺战。

22日，陈庆云同滇军朱培德派来弭高级参谋，到帽子峰观察阵地，准备总攻作战计划。

23日，队长传达命令：许总指挥召集各军将领到南雄开军

事会议。到会有李烈钧、朱培德、李福林将领。议决准备日间向逆军总攻击。各军务须补充军实。飞机队要预备多量汽油、炸弹。俟确定总攻击日期，立即奋勇向前，不得退缩违误。队长传达后，饬令全体员工准备候令出动。

24、25两日，队内员工各守岗位。先将各机检修，检查炸弹与雷管及机舱。在机场内戒严，不准外人来往。

26日，我们飞往前线。帽子峰最高点已为我军所得。大塘许济旅、火山陆学文旅、马坝附近张民达旅，各占优势。逆均已无反攻能力。韶关火车总站各火车头转移到大坑口站。不敢在韶关停留。

27、28、29日，连日侦察，逆军阵脚移动。帽子峰、黄冈等处，逆军只有死守待援，没有反攻。

30日，派机到马坝侦察，忽见铁路火车，突然增加援兵，络绎不绝，日夜运输。见有新增援兵由大坑口至乌石、马坝纷纷增防。我机飞回报告，但总部已据探报，梁鸿楷军叛变，陈修舜、谢毅两团向我军反攻。立即多派飞机侦察叛军行动。

8月1日，我机7时起飞，到大塘、火山，已见叛逆两军向我军反攻，同时，帽子峰与黄冈逆军亦向我军反击。

2日，我机到前线，仍见我军把守原有阵地，但久战疲乏。敌不过新增叛军。幸各将领身先士卒，率领抵抗。我机向敌人投弹与扫射。

3日，我逆两军仍在争夺战，但逆军已占优势。

4日，我军在火山陆学文旅阵地动摇，牵及许济旅。在大塘与敌肉搏，卒被陈修爵叛军冲破阵线，溃散。陆学文旅只有退却。所余张民达旅，孤军在马坝被逆军包围。张民达不惜牺牲，带领全旅官兵，突围而出。是日湘军陈嘉祐军由湖南赶来增援，已来不及。在火山、大塘退却之军又牵动到韶关。占领帽子峰的朱培德军及占领黄冈的李福林军、黄大伟军，于4日向周田、始

兴、仁化分途退却。当各军未退却之前，许崇智亲率卫兵营到火山指挥，亦无法挽救。在4日各军未全退前，我机仍于中午飞往马坝、火山、大塘等处助战。虽见激烈争夺，仍是作拉锯战斗。至下午5时，我队派赴前线军事委员雷子定赶回报告。我军在火山、大塘崩溃退却。我们欲起机飞往侦察，已近黄昏，不能起机。张队长用电话向周田总部请示，总指挥已赴前线指挥，留守者回话谓：所有地勤人员，一律是晚撤退，先到周田，明日一早向始兴后退。各军用品，不能带者，弃之。飞行人员保护各机，明晨飞往始兴候命。队长临时命令全队除飞行人员留至明晨将各机起飞外，所有人员与军用品，即刻起程，开往周田。明晨转始兴。飞行员胡汉贤、蔡斯渡、周宝衡、陈秀，留在机场度宿，明晨起机飞往始兴。我们飞行人员依照命令与留守机场的掩护团在机场警戒，终夜不息。

5日，早上5时，将机起飞。我机起飞后，在机场环绕飞行一周。已见地下逆军赶至，向掩护团进攻，掩护团且战且走，向仁化而去。张队长跟总指挥部人员退却。陈庆云指挥全体员工由陆路到始兴。我们飞行人员6时已飞到始兴南门外降下。见退却军队沿途而来。先有李福林军营长秦棠乘夜退却，已先我们而到。至下午4时，陈庆云与各员工全队开到，狼狈万分，整日不得一食。是晚，在始兴露宿一宵。6日晨飞往南雄着陆。已无汽油，只有望机兴叹。以后我们飞行人员停止飞行，为地勤工作，随军退却。

以上是我每日飞行作战笔记。到南雄，飞机已掉了，无飞行任务，不做笔记。以下凭我记忆所及写出。对于日期与经过地点或有记忆错误，望参加此役者指正。

## 九、向福建进军

8月7日，各军退却，由始兴到达南雄。粤军、滇军、湘军

将领与首长多数齐集。除粤军梁鸿楷师叛变，黄大伟未赶到外，一律在南雄临时总指挥部开会。许崇智主张整顿队伍向逆反攻，李烈钧、朱培德均赞成。即令各将领回防，听候命令反攻。

8日，各军将领回防，将退却队伍整理，加以补充。划始兴一带为第一防线。飞机队尚有飞机两部，可飞回始兴修理，补充汽油与械弹，听候出发反攻。

9日，张民达旅担任先头部队，向周田反攻，正在准备开动中。

10日，接香港孙先生英人顾问来电，谓孙先生已离广州往沪。各军闻知大总统已离粤，我们失了领导，反攻计划应即停止，免致损失。各军自行择地退却，保存实力，听候大总统反攻计划。于是李烈钧率领朱培德联军陈嘉祐湘军，向湖南而退。许崇智率领李福林军、张民达旅与许济、陆学文散军向江西、三南、瑞金转入福建。我们把飞机队所有飞机及弹械破坏，免为逆用。部队分两路走，张惠长带同一部员工跟李烈钧、陈嘉祐入湖南，另一部由陈庆云率领，随许崇智往江西、三南。我们飞行人员一律同陈庆云暂编入许崇智粤军总部。各军于11日分别离开南雄，分途起程。

12日，我们随粤军总部先向龙南出发。第一日到粤赣边界水口已近黄昏。

13日，一早起程，下午4时到达龙南。适黄大伟军由翁源赶到会合。但军食已缺，在龙南征集军粮，逗留两天。16日，各军向安远前进，行至下午4时，将到安远地界，据探子报告，沈鸿英勾结北洋军阀，从连山来向我截击。我军中途停顿，派队警戒。又据探报告，该逆军离我军尚远，要乘夜前进。一面警戒，一面绕道行军。卒至是晚1时，抵达安远城。我们已极疲倦，不能再动。因日夜走路，且用急行军，因此疲劳已极。蔡斯渡、陆露斯已经无法起立，病势甚重。在安远休息两日，陆露斯

病已垂危。我们又不能掉队，迫得将陆飞行员抬到基督教堂，请托牧师与当地基督教徒照料。我们 19 日又跟队向会昌前进。是次行军，第一日到广东江西交界寻乌边界休息；第二日到盘古隘至筠门岭线。我们行到筠门岭，见有豆腐花摊子，非常欢喜，各人争相倾囊大吃。后至者将豆腐花水亦购食尽净。第三日抵达会昌城。安顿后，急往教堂打探陆露斯消息。据当地教会说，接到安远电讯，说陆露斯在我们离开安远第二日已死了。我们闻知，非常悼惜。到会昌后，周宝衡等中途掉队回粤。我们又在会昌停留三天。25 日，随同大军向瑞金进发，在途中与李福林相遇。李福林将罐头食物给予我们，各人沿途大嚼。同行者又有福军旅长袁德墀（即粤剧名艺人蛇仔秋），沿途仍不忘粤曲唱调，令我们在疲劳中振奋精神，洵亦行军中之乐事。26 日到达武阳圩，离瑞金不远。但各军在行军中衣服破烂，且有衣不蔽体，连草鞋亦无。在武阳圩停留两天，稍为整理补充。29 日，全部抵达瑞金。蔡斯渡之病因旧病复发，当时我亦生病，在瑞金临时军医院留医。陈秀、黄臻等又掉队。向古城，长汀到上杭，出汕头回广州。随后，许崇智得福建同学王永泉（当时为北洋军驻闽旅长）接济，补充军实。同时又接孙先生在沪电示支援，各军整顿军风纪，在瑞金停留两旬后，全军出发，向闽省进军。当时闽督李厚基绝无防备，我军分数路长驱直入，到水口一战，李厚基军全部崩溃。李厚基在乱军中逃亡。我军于 10 月初旬（不记得日期），全军进入福建省城。我与蔡斯渡抱病随军，安抵福州。于 10 月初旬，离福州往沪就医。

（1964 年）

## 桂林韶州随军回忆录

陈海瀛 \*

海瀛曩者于粤于桂于韶州于白鹅潭，随中山孙公左右，回忆所及，有可得而述者。

方夫西南护法之役，偕北京一部分国会议员及海军至广州也，以1920年改组军政府，公被推为首席。海瀛应辟入府受事秘书处，时别置机要室，专办公与各方往来函电。不属秘书处者，以海外党部、学校、教育会、工商会及社会各团体为多。调海瀛司其事，属稿称公意，尝书海瀛姓名，以茗瓯覆之，左右以告，窃不知何以得此于公也。

翌年5月5日，公就任非常大总统，军政府改称总统府，秘书处改称秘书厅。是年冬初，出师北伐，以大总统大元帅事命海瀛兼掌印，以任重坚辞，乃别属。仍充记室载笔从大本营，既自广州起行，留梧州一月，曾记以诗云：“元戎牙纛次梧州，野宿霜严夜气遒。缚帚书旗呼杀贼，书生志岂在封侯。”大元帅督师旗，海瀛所书，同行有以班超投笔封侯相戏者，故云。

自梧州西上多危滩，舟行，21日始达桂林。大本营设于广西省议会独秀山，在其后风景绝佳而气候较寒，不似广州。公向皆短装，居此亦但着粗制青布羊裘而已。岁方暮，有自远道馈公特种年糕者，公亲临大本营，邀集同人分颁共尝之，一食之微，其意亦至可念也。时滇、黔、赣、粤、桂各军咸集桂林，公排日讲演“军人精神教育”，中山集中有文言讲稿一篇，乃承公命就所记原稿，略加修饰者。平日仁爱为怀，见讲稿中曰：“有救人

\* 作者时任孙中山秘书。

之仁，有救国之仁，以谓仁有大小、轻重之分，盖志在救亡，不以救人救国为已足也。”

先是，规划北伐，原定由桂入湘，以既据湘、鄂，则可出师长江，乘势席卷。乃湘督赵恒惕北通吴佩孚、南联陈炯明，军事受牵制，不易进展。公以蛰居此间非计也，于是改道攻赣，移师入韶州。抵韶后，部署即定，而陈炯明谋叛日急，公又以后顾为虑，退返广州，尚冀晓以大义也，招炯明不至，而其所部叛将叶举将以6月16日围攻总统府。有闻其期者，林直勉入府劝公行，公初不允，直勉曰：“革命事业，唯先生是赖，何以轻身殉之。”挽公出居永丰军舰。大本营仍留守韶州也。不数日，叛军络绎至，所过破扉入室，恣搜掠，海瀛随身小藤箧，亦被搜。

越七日，火车通，仍潜踪入广州，投上故人萧姓家。翌晨，乘车至沙面，雇船赴白鹅潭，甫半渡，大雷电，以风，船几覆。比登舰谒公，公温言劳问，秘书杨熙绩、参军林树巍、马湘数人咸在。时来舰通消息者多为撑舟人，公一一接之以礼，于今思之，其情深犹在心中。

公初至白鹅潭，时英领事来见，谓公曰：“帅舰在此，敝领事当悉力保护之。”公正色曰：“本大总统在本国领海及内港停泊，舰艇自由行驶，却无须何人保护。”英领事不敢复言。居月余，公之沪，海瀛亦取道香港回福州。

越三年，公应北政府邀请入都商国事，肝疾发，疗治无效，遂卒，春秋五十有九。凡念革命先行者，则皆眷眷莫能忘也。况海瀛随从，又余心之所向慕而瞻依，安能以无言，而言之不长，岂足以尽公昌明、博大、奇壮之志业于万一哉！

(1965年)

## 孙中山北伐时的赣军先遣支队

胡运鸿\*

1922年夏，孙中山率师北伐，以粤军许崇智、黄大伟部为主力，并辅以滇军张开儒部、黔军谷正伦部、赣军彭程万部等部队，号称20万之众，由参谋总长李烈钧指挥，孙中山亲至韶关督战；一举攻克江西赣州，正乘胜沿赣江北进时，陈炯明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在广州叛变。孙中山被困在永丰舰上，北伐回师靖难被挫，退入福建，北伐遂告中止。

赣军彭程万部有两个混成旅，第一混成旅李明扬，第二混成旅长赖世璜。赖氏江西石城人，企图在江西家乡扩充队伍和地盘，派易简为先遣支队长，取道定南、安远、会昌、瑞金、石城、广昌乘虚出赣东，这一路北洋军队驻军不多，望风而逃。该支队很快就占领了南丰、南城。南城为赣东重镇，距南昌仅300里，江西督办蔡成勋急调常得胜师一部驰援南城，此时由于北伐军正面主力部队撤走，该支队亦于8月间退回广东。

易简支队在这一战役中，由300人发展到近千人，支队长兼第一营长易简，支队附胡祖玉，第二营长温晋城，连长罗志清、谢溥福、周士达、陈又新、林中植等，均江西籍。枪支有五响和九响毛瑟枪，还有村田枪、荷包枪以及土造单响枪，每连也有几支三八枪、六五枪、粤造六八和汉口七九枪。这些枪支，指定可靠的班长使用，子弹更缺乏，每枪配备多者二三十发，少者十余发。所到各县，委派县知事（即县长）筹军饷，收编民枪，招募兵员。当时江西人民苦于北洋军阀的压迫，对北伐军深表欢迎，

\* 作者时任北伐先遣队队部司书。

力予支持和协助。

当时部队官兵，不懂革命，也不懂三民主义，认为自己是跟着孙中山革命，军队就是革命军，北伐就是要赶走北洋军阀。中下级军官的目的是升官发财，高级军官的企图是扩充队伍和地盘。赣军官兵每月只发伙食费，逢年过节，发例支（即饷）尉官由10余元至30元，士兵由6元至10元，内还要扣除伙食费军官6元、士兵3元。冬季，士兵只有毛毯一条御寒，生活颇苦。

这一次北伐的失败，主要是由于陈炯明叛变，但军队的装备差也是原因之一，我军不仅没有重武器，即步枪亦多属粤造、土造和杂枪，战斗力薄弱。各军之间，畛域之见甚深，互不合作，在两广为了争防区，争捐税，经常发生冲突。特别是官兵缺乏正确的政治指导思想，这一些都是失败的重要原因。

（1962年）

## 孙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时的警备军

张可廷 \*

### 一、警备军成立前的广州局面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背叛中山先生后是年冬，中山先生令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讨逆滇桂军沿西江东下，陈炯明知难抗拒，再度自动下野出走香港，令叛军东退，希图卷土重来，叛军遂退据惠州潮汕一带。中山先生旋自沪回广州，设大元帅府于河南士敏土厂。

滇桂各军入广州，目的不是为了拥护中山先生讨逆，志在夺取广州的肥美地盘，获厚利以填欲壑。如滇军杨希闵在梧州誓师出发时对官兵讲话，便举出广州怎样繁华，如此如彼，说得天花乱坠，形容尽致，借以鼓动官兵，自可以知他谋入广州之企图，桂军亦不例外。所以到达之后，即分布市区，不特擅收原有的各种捐税，且多方巧立名目，重重剥削，包烟包赌，控制广三、广九两条铁路路权。凡此种种，均以兵力逼胁，横行霸道，强驻民房，到处滋扰，有时两军因争收捐税开枪火并，致群众大受惊恐。

滇桂各军驻广州时，骄横专恣，目无法纪，中山先生徒建大元帅空名于上，命令不能施行，推究造成这般坏局面，都系由陈炯明叛变所引起的，中山先生因无兵可用，为着捍卫地方、遏止暴乱，实有建军之必要。

---

\* 作者时任警备军秘书长。

## 二、警备军的兵源

1923年1月，陈炯明的叛军东退后，纷纷择地分踞。林虎部踞兴宁，洪兆麟部踞汕头，尹骥部踞潮安，李易标部踞龙川，熊略部踞河源，杨坤如部踞惠州。

中山先生以叛军东窜不予解决，终贻后患，惠州为岭东重镇，居广州近，特先注意，乃任姚雨平为中央直辖警备军军长，往惠州收编杨坤如部。姚于1923年2月自广州出发，乘广九车经香港，渡海至宝安的葵涌登陆，循陆路至惠阳属的淡水，群众夹道欢迎，假座淡水商会设筵款待，住一晚，次日即至惠州，驻善后督办署（前清广东陆军提督衙门），成立警备军军部，着手收编杨坤如所部，是为警备军的兵源。

警备军的组成：

### 1. 军部组织。

军长姚雨平。参谋长林震（原北伐军师长），吴雨苍（与林不分正副）。副官长黄范一。秘书长黄炼伯、张可廷。财政处长李益三。

李益三是惠阳钜商，为惠阳县议长调兼财政处长，因姚先生介绍杨寿昌为惠阳县县长，众不赞成，遂以李益三充任，所遗财政处长职，由吴雨苍继任，此举其主要成员，余不详记。

### 2. 部队组织。

杨坤如部分踞惠州一带20余营，中央直辖警备军成立后，将杨部编为警备军第一师，辖三个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共27个营，另独立营一营（拨一连为护士连），兹将主要成员列出：

师长杨坤如。第一旅长钟子诞，第一团长徐武东，第二团长杨廷芳，第三团长韩俊升。第二旅长李祥，第四团长由旅长李祥兼，第五团长黄某（忘其名），第六团长刘学修（后为云浮县

长)。第三旅长骆凤翔，第七团长黄世华，第八团长黄振熙，第九团长张英。

杨坤如就编后，即电中山先生，略云：“一介武夫，渥成知遇，值沧海横流之会，体人民望治之殷，仰秉谋，追随鞭策，只知报国，决不徇私，敢推伯约之赤心，誓捧虞渊之皓日。”当时各报均有加以“且拭目以观其后”的评语。

### 三、警备军成立后的变动

杨部编师后，以惠州女子师范学校为师部，门前挂起木雕的大字招牌，文曰：“中央直辖警备军第一师司令部”，布置堂皇郑重。自电呈中山先生后，人人认为系向往中央，服从编配，不料竟彷徨歧路，翻云覆雨，新招牌挂了不满一个月便倒戈从叛，率部窜河源，编为粤军第六军，就近与踞兴宁的林虎联系，林给予1万元，即于1923年春夏间复踞惠州。姚先生以杨又叛变，遂由惠州返广州。

在杨坤如复踞惠州的同时，叛军总指挥叶举已与北洋军阀曹锟勾搭妥，回至惠州的平山，指挥杨坤如和编为粤军第五军踞河源的熊略等部。在潮汕已由李烈钧受中山先生命收编的叛军，亦由林虎为总指挥，洪兆麟为副，与叶举互相呼应（叶称粤军各路军总指挥，林称潮梅粤军总指挥，洪称副总指挥），竖起反孙旗帜，惠潮梅一带复现混乱扰攘之状态。

杨坤如叛踞惠州，中山先生于1923年4月派桂军刘震寰、刘玉山全部，滇军第一师胡思舜全部共2万人合攻惠州。杨坤如负隅顽抗，由1923年4月13日起，战事持续三年之久，至1925年4月7日攻下惠州，杨逃港，战事始结束。

### 四、姚雨平安抚叛军

当杨坤如负隅惠州，滇桂各军合围之时，姚雨平曾奉中山先

生之命往惠州对叛军安抚，望他弃暗投明，俾能缓战祸而解民困，共体中山先生济世安民之宏愿。乃叛徒执迷不悟，空费姚雨平殷殷晓谕，于是姚雨平重返广州。

(1966 年)

## 大本营警卫团成立经过

李洁之\*

1921年4月，国会参、众两院议员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选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并授予北伐全权。随即旧桂系军阀陆荣廷、谭浩明、陈炳锟通电反对，并发兵侵犯粤省边境，企图打垮孙先生的革命政权重据广东。孙先生于5月5日在广州就任大总统职，成立新政府与北洋政府对抗，旋命陈炯明统率粤军西上援桂。在陈炯明出发前，孙先生亲到粤军总司令部召集各将领开军事会议。据曾出席这个会议的张碌村先生后来对人说：当时孙先生在会上对大家说：“我们这次出师不仅在援桂，还要在平定广西以后立即移师北伐，收复中原，统一中国，以完成革命建设大业。”陈炯明听了这些话而呈难色说：“出师援桂已是迫不得已，倘再移师北伐，更是谈何容易！”孙先生知道陈的志向在保守地盘，另有企图；便接着说：“将来竞存（陈炯明字）可留守两广，只负担接济北伐军的军需。在粤军方面我只带领汝为（许崇智字）、登同（李福林字）两部去北伐，他们的部队跟我三个月，施以革命主义的新教育，必可成为能征善战之师。要打倒北洋军阀是可操胜算的，你们不用担心。至若大本营警卫问题，请仲元（邓铿字）在第一师中派一个步兵团担任就够了。”粤军援桂战事节节胜利，经过两个多月的时间就攻占了梧州、桂平、玉林、南宁、柳州、平乐、桂林等各要地，旧桂系军阀宣告瓦解。孙先生亦决定前往梧州、桂平、南宁巡视，然后转到梧州再往平乐、桂林成立大本营，调集各方大军，准备假道湖南出师北伐。

\* 警卫团成立时作者系二营五连之排长。

在孙先生出发前一个月，再催促邓仲元在第一师中赶快抽调一个步兵团跟他出发，为大本营的警卫部队。邓师长为此，曾征询师参谋长、师副官长、旅长和各团（营）长意见。据叶挺先生后来对我说，当时各团长都认为这样分割部队，会削弱第一师的实力，应另想办法应付。独立营营长邓演达则力排众议，认为孙先生乘此次援桂军事的胜利，率师北伐，是打倒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最好机会，我们第一师应全力支持。现在派一个团去拱卫大本营作为先遣队，决不会削弱我们的实力，相反的将会随着北伐军事的进展，把实力扩充起来。因此，必须遵照孙先生和邓师长的意旨，以革命意志较坚强、指挥能力卓越、兵员装备较充实的部队编成大本营警卫团，才能担任大元帅的拱卫任务。参谋长陈可钰说：孙先生已把拱卫大本营的光荣任务交给我们第一师，这是义不容辞的。我们天天说拥护孙先生的革命主张，连这个任务都不愿承担，那还成话！现在的步兵团既不愿抽调，可否拨出一部分队伍编成警卫团？如果没有适当的人选我愿毛遂自荐，担任这个团长的职务，率领出发，请师长加以考虑。以后邓师长遂决定这样一个方案：原有团的建制不动，将素质较好的师直属部队并编为大本营警卫团；同意调陈可钰为团长，而以副官长李济深继任师参谋长；以薛仰岳（即薛岳）的机关枪营改编为该团第一营，并先派兵一个连出发护卫孙先生；将李章达的工兵营改编为该团第二营，以叶挺为营长；将现驻粤北的北江游击队司令李安邦部改编为该团第三营，以张发奎为营长；团直属队另行设法成立。后来派人去点验李部还不到两百人，枪械又劣，不能编为一个营，乃命张发奎从速派人往各地招募新兵补足。

这个方案在双十节前报请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同意后，便依照上述方案正式编组了大本营的警卫团。它的编制原先是采用当时陆军步兵团一样的编制，后因于短期内在筹集装备，招募士兵上有困难，乃暂行规定为三三制营辖数个步兵连，连分三排，排分

三班，每班战斗士兵 14 名，全连合计 126 名；团直属队亦暂付阙如。至第二年 4 月因改道江西北伐，该团由桂林调回广州后，才照陆军步兵团编制补足，即每营增编一个连为四连制，其番号由第一连至十二连，还增编一个团属机关枪连，其人事也有一些更动，并改称为大本营警卫第一团，以华振中为中校团附。由李章达升任第二团长。兹将该团初期的团、营、连级军官佐姓名分述于后：

#### 团本部

团长陈可钰，中校团附李章达，少校团附邓定远、蒋光鼐（张猛说，他是粤军总部副官处派来服务的），上尉副官张国森（即张猛），军需陈聘寰，军医兼卫生队长李澄之，书记邝××。

#### 第一营

营长薛仰岳（即薛岳），营附郑树勋，第一连连长缪培南，第二连连长梁世骥，第三连连长梁公福。

#### 第二营

营长叶挺，营附梁端寅，第四连连长李扬敬，第五连连长李振球（当时李洁之在该连当排长），第六连连长简棘苑（即简作桢）。

#### 第三营

营长张发奎，营附李步瀛，第七连连长陈榆（陈克华），第八连连长韦就，第九连连长王仲根。

这个团的装备是：石井兵工厂制造的新七九步枪。官兵服装：冬季是草青色的绒军服，夏季是黄斜布军服，军容之盛为其他部队之冠。

这个团编成后，第一批出发桂林的为团本部和第一营，第二批为第二营，第三批为第三营，全部到达桂林时，约在 12 月左右，均驻在王城内大本营所在地。除担任拱卫外，并积极从事教育训练。它的教育于军事学术外，还有政治和社会常识。政治方

面着重于《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浅说》、《革命军人精神教育》，因而武技娴熟、纪律严明、朝气勃勃，堪称为北伐军的模范军队。

这里附带对张猛先生所写《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团》和李章达先生遗稿《六十自述》两文作些订正。

1. 《广东文史资料》第7辑，张猛先生写的《孙中山先生的警卫团》其中有：（1）1921年……孙大总统即计划北伐……叫邓师长将北江游击司令李安邦所部扩充为总统府警卫团……邓以参谋长名义请示呈炯明……陈不答应；（2）邓又请示陈，陈提出将陈炯光全部改编为大总统警卫团，并指定陈炯光为团长。证以叶挺先生、张碌村先生所说，以及李章达先生遗稿中所提到的（内容详所引的本文）事实，都有很大的出入，尤其是作者所说陈炯光当时是粤军第四路司令，据我所知他辖有六个步兵营，还有炮兵连。援桂时期吴奇伟曾在该部工作。就在情理上说，也不会无端地把他降为团长的。

2. 《广东文史资料》第10辑，李章达先生遗稿《六十自述》其中有：在广州的将领有实力而最积极革命者只有邓铿一人，孙遂嘱邓在其部队中挑选青年干部组织警卫团，随帅府行营任警卫之责……陈可钰任团长，我任副团长，陈可钰兼任师部参谋长，不能离开广州，故警卫团实际由我率领开赴桂林负担任务。这个内容有些亦与事实不符。如：当时团的编制，只有中校团附，并不称副团长；陈可钰调任警卫团团长后，师参谋长即由李济深继任，并非仍由陈兼任；陈是第一批率领团本部和第一营出发桂林的，到达目的地后从未离开部队。至第二年4月改道江西北伐时，亦与部队一同行动回粤，这是众所周知的。李的遗稿所云，可能是替他记录的写错了。

（1965年初稿，1981年整理）

## 附：张猛、李洁之的有关讨论

### —

1. 李洁之先生确实系在广州总统府警卫团第二营（叶挺营）第五连（李振球连）当排长，但洁之先生是否有到过桂林去呢？我就记不清楚了。

2. 洁之先生写题目是（大本营）警卫团就错了。我所记得1921年秋后出发桂林，北伐军师次桂林时，中山先生是设立桂林行营驻扎在桂林皇城，孙先生住在独秀峰脚下那座楼。我们警卫团团部住在大门前楼，内围由卫士队（一个排）担任拱卫，各围并皇城四周由警卫团负责警卫，直至转道韶关，仍然是用大元帅行营名义，到了1923年北伐才是用大本营的招牌，那时我是大本营副官。从1921年至1923年这段时间我记得很清楚。

3. 蒋光鼐不是少校团附，是粤军总司令部少校副官，派到警卫团随营服务，所以叫蒋光鼐是蒋副官，叫我是张副官。

4. 李章达将工兵营改编为警卫团第二营时，以少校营附叶挺任警卫团第二营营长，李章达是中校团附，后来从韶关护卫孙中山先生回广州的是第一营（薛岳营）、第二营（叶挺营），并成立警卫第二团，调李章达升第二团长后，蒋光鼐及第八连长韦就调第二团当营长，遗缺以邓演达的独立营少校营附华振中升警卫团中校团附。阮宝洪接任第八连长，后来华振中率领陈瑜、阮宝洪这两连在韶关投降到翁式亮那里去了，张发奎在韶关只带了王仲根一连人回到南雄、始兴当土匪去了。

5. 孙中山先生北伐时想成立一个大的警卫队，但未有决定团或旅或师，第一个决定李安邦部改编警卫团是事实，这事黄惠

龙、李安邦亲口对我说过多次。还说陈炯光想将他全部队伍拱卫孙先生北伐，如果真的陈炯光达成愿望不一定系警卫团，或者警卫旅也未可知，这是警卫团未成立以前的酝酿中的事。李安邦还说不但警卫团长当未成，就连他辛辛苦苦成立那个游击营都被张发奎连枪支也带走了（后来张发奎拿了百十条杂式枪换新七九步枪，是我经手代领代发的）。我还向黄惠龙取笑李安邦这个“烟鬼”怎么能当团长呢？黄说李是孙先生的忠实同志，陈炯光是靠不住的，所以孙先生才同意陈可钰，单只新编一个团，所以后来才拟扩充两个团。如果系陈炯光的话，也许早就是警卫旅，至少陈炯光也是少将团长，孙先生就会被他们监视包围了，孙先生不上当是自然的。

洁之先生这篇稿除了我证实和改正之外，其余都同意。

张猛 1966 年

## —

我写大本营警卫团成立经过的目的，是订正张猛、李章达所写的有关这方面的史料。现在张对我的订正稿又提了一些意见，无非是坚持他以前的说法，这问题我想是可以弄清楚的。

1. 可送请张醣村先生审核。
2. 可送请梁世骥先生审核。
3. 大本营警卫团这个番号，我没有写错。不过在上面我省去了大元帅三个字，而保留一般的简称而已。
4. 蒋光鼐当时是副官抑系团附，这不是要点，无须争论。但我只记得，当时大家叫他蒋团附。
5. 孙先生回驾广州时，第二营尚在灵川剿匪，是最后一批回广州的。抵达时为 5 月 11 日。
6. 大本营警卫团改为第一团，另由李章达成立第二团，系

在孙先生回抵广州以后的事。而李扬敬始终是第二营的连长，并未调任机关枪连连长。

7. 第二营确是第二批出发桂林，当时顺便护送段祺瑞的代表徐树铮往桂林，也不是李章达率领的。我们第二营到达桂林时，孙先生和第一营已先到达了桂林，团本部亦如此。

8. 从粤军第一师工兵营成立，以至改编为大本营警卫团第二营及陈炯明叛变在总统府作战，我都在该营任排长，是亲身经历的。

李洁之 1966年1月30日

张猛插入：1. 同时要成立三个机关枪连，人选是李扬敬、梁世骥和我（张国森），并扩充卫士大队，李、梁两连分配一、二两团，我配属卫士大队的，但没有成立就被围了。2. 又，李章达率叶挺之第二营出发达桂林，第一、三营是随后与团部一起出发的，不是第一营先出发，洁之先生记错了。

## 北伐军大本营将校团始末

曾其清 \*

1921年5月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后，决心北伐，并积极罗致军事干部。准备编练一支新军。适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简称武校）15期华侨学生250余人行将毕业，商得云南滇军总司令顾品珍的同意，悉数调用。1922年春这批学生陆续回抵广州报到后，进韶关北伐军大本营将校团，集结候命。是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将校团也被叛军包围抢夺而瓦解。笔者是将校团成员之一，以下忆述其经过。

武校招取华侨学生，由云南督军唐继尧开其端，滇军总司令顾品珍继其后。唐与华侨本无渊源，其招取华侨学生，是有企图的。唐自护国讨袁取得胜利后，因缘时会，独揽滇省军政大权，好大喜功，野心勃勃，以“东大陆主人”自称，亟谋逐鹿中原，统一全国。惜财力薄弱，无从解决，和他的“宏图大志”不相适应。护国战争期间，曾因经费短缺，致军队出发几成问题，幸李烈钧从海外带回华侨捐款30余万元，才解决困难；复得华侨捐款源的资助，军需供应，得以无缺。唐对华侨为国输将的义举，异常钦佩，感激之余，极愿与华侨取得密切联系，认为招取华侨子弟回滇学习是与华侨交好的桥梁，可替唐对华侨起宣传影响作用，借以利用华侨的人力物力，加强力量，达成称霸中原愿望。

云南矿藏丰富，惜缺乏资财和技术力量，倘华侨回滇投资，并运用华侨工人的熟练技术，发展工矿事业，开发富源，可增无可限量的财富，改变云南的贫穷面貌。（1920年马来亚侨商梁谷

\* 作者系云南讲武学校毕业生，时为北伐军大本营将校团成员。

欣、梁燊南等应唐继尧的邀请，带一批矿业技术人员回滇访问，准备投资开发矿藏。梁等曾深入矿区作调查研究，因资源未明，且萑苻遍地、治安没有保障而罢。)

华侨原籍，多属广东，素富爱国爱乡热情。当时广东正被广西军阀陆荣廷、莫荣新等盘踞蹂躏。广东人民莫不愤恨。唐继尧认为如在武校培养一批华侨子弟，作为骨干，在云南编练一支新军，以讨伐广西军阀作号召，配合驻粤的滇军（约两个师），向两广进军，不仅有人地相宜、事半功倍之效，即枪械所需，华侨也会热烈支持；从而占领两广，完成珠江流域的统治，作扫荡中原的基础。

唐继尧有了以上的企图，乃利用护国讨袁的声望，先后派闽人陈觉民、粤人符赞坊、张杜鹃、曾维南、叶守誉等为代表，赴印度支那、马来亚、荷属东印度（即印度尼西亚）等地宣慰华侨，并以半公开方式招取华侨青年回滇就学，除主要进武校学习外，如进其他学校，同样欢迎。继因在海外招取的学生人数不足，复向广东福建增招中学毕业的侨属学生百余人，其中虽有部分不是侨属子弟，因粤闽人民与华侨有千丝万缕关系，故也当作华侨子弟而招取。先后进武校学习的侨生侨属青年共 350 多人。计 1917 年进 12 期的有叶剑英、符昭骞、梁国武、萧君勉、陈静庵、陈均成、张坤理等 80 余人，1918 年进 13 期的有张猛等 6 人，1919 年进 15 期的有黄涛、梁秉枢、练惕生、丁荣光、侯梅、李明、曾俊伟、陈杰夫、施恕之、张思教、林君勋、区剑涛、郑介廉、吴宗泰、曾其清等 250 余人，1921 年和 1923 年进 16 期和 18 期的有张涤海等 20 余人。这些人多为学生，而中小学教师和工商业者也不少。各期毕业的华侨同学大多数回广东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从事军事工作。

1921 年秋孙中山先生准备北伐，派总统府参军何畏（云南人）到昆明宣慰滇军，并召集快要毕业的武校 15 期华侨同学在

两粤会馆讲话，大意说：“孙大总统决心北伐，急需军事干部。同学们毕业在即，孙总统特派我慰问大家，并欢迎同学们回广东参加北伐，我经和顾品珍总司令（唐继尧于1920年春节前又被顾品珍、叶荃等所推倒，由顾任滇军总司令）商量过，他也同意大家回粤工作”云云。同学们一贯是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又得到他的关怀和信任，引为无上光荣，因此莫不兴奋愉快，热烈响应号召。

1922年春15期华侨同学毕业后，除少数人留滇工作和回南洋各地从事教育及工商业外，绝大部分去了广州。孙总统派员欢迎，并在龙藏街旅店和府学西街西园旅店设立临时招待所，并派先期毕业在穗工作的华侨同学前来招待指导，同学们感到无比温暖。

中山先生认为在粤原有部队，素质不良，组织复杂，干部水平低，拟以武校华侨学生为骨干，编练一支新军。因经费一时筹措不及，且受陆军部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掣肘，致未能实现。又由于这批学生是中山先生宣召回来的，蓄意叛党的陈炯明异常歧视，不予任用。除服从中山先生的将领如邓铿、张民达等任用一部分外，余均苦难安排。中山先生乃在广东韶关组织北伐军大本营将校团，暂行安置，候命随总统北伐，俟形势发展再编练新军。中山先生对武校华侨同学的信任和培养苦心，同学们是很感动的。

中山先生派叶荃为将校团团长，贺守衷（湖南人）为副团长（或系参谋长）。叶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早期毕业生，同盟会会员，对佛学研究颇有心得，护国讨袁时的滇军健将，生性豪爽，讨袁后驻军四川；值护法军兴，率部偏师远征陕西，与中山先生领导的陕西于右任部夹击北洋军阀部队；回师云南后，与唐继尧的政治路线相反（唐是反对中山先生的），且不满唐的腐恶行为，与顾品珍等合谋推翻唐的统治后，到粤参加北伐。闻中山先生立

意以叶负编练新军之责，故以叶为将校团团长云。后叶在国民军第二军（军长胡景翼）任副军长，对推倒曹（锟）、吴（佩孚）和欢迎中山先生北上支持国家大计，叶都作了一定的贡献；后来出家做了和尚，在杭州灵隐寺当了方丈，不久病死。他不失为是中山先生坚定的拥护者。

将校团于 1922 年 3 月初成立至同年 6 月因受陈炯明的叛军企图抢劫而瓦解。该团是储备人才的临时机构，且时间短促，无完整的规章制度，也没有编队组织。成立初期报到的团员 150 余人，均系武校 15 期毕业的华侨学生。因部队陆续调用和一部分请假回南洋省亲，到后期经常在团的约 60 人左右。团员为见习军官待遇，值政府财政支绌，除入团时发给一套布服装外，未再发过装备。每月领伙食零用生活费 16 元；与当时一般部队的尉级官佐的待遇相同。

团员日常活动除每天作早操运动外，没有固定的课堂和学科训练时间。间由团长、副团长讲话。记及叶团长曾说：“总统是为国为民，不断革命的，我（叶）誓毕生追随总统而革命。革命事业是一定成功的，要同学们坚决为革命而努力”云云。由于有些同学怀疑北伐的兵力薄弱，装备不良，没有胜利信心。叶团长针对这思想情况分析说：“孙总统从事革命之初，只有几个人，没有一兵一枪，但推倒满清政府的革命已胜利了。现在有数万人的枪。复有无敌的三民主义，敌人的兵，敌人的枪，就会变为我们的兵，我们的枪，胜利是有把握的。”贺副团长说：“职业不分高下，人格一律平等，任何革命岗位，都是高尚的。”这对团员的教育启发是很大的。

1922 年 6 月 16 日陈炯明叛变后数日，叛军翁式亮部包围将校团，公私财物被抢劫一空。在团同学的财物被抢，复因人地生疏，借贷无门，致狼狈万分。

当时武校华侨同学较多的部队，如总统警卫团、海军陆战

队、叶剑英团、石井兵工厂警卫团，均悉被陈逆军缴械抢劫。贼兵所至，奸淫抢劫，无所不为，广大人民恨之人骨髓，陈逆纵兵淫掠的罪恶是无可恕的。

陈逆叛变后，叶剑英、张猛等十余人，在广州小马站宗圣公祠秘密集会，以武校全体华侨同学名义，通电海内外（电文带香港发出）表示坚决拥护孙总统，声讨陈逆。电文大意：“……陈逆炯明，假联省自治之名，行军阀割据之实，包藏祸心，阻挠北伐……称兵叛乱，袭击总统……贼兵所至，奸淫抢掠，无所不为……同学等誓为前驱，歼灭逆贼……”各地华侨报纸，均登载电文。由于同学们对侨居地亲友，有广泛的关系和影响，对陈逆的口伐笔诛，起了很大作用。

陈逆叛变后，武校华侨同学多往投福建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部工作。1923年初东西两路讨贼军，会师讨伐陈逆时，在陈逆军里的同学，也不少起义参加讨贼；迄参加过大革命和抗日诸战役而牺牲的不下百余人。武校华侨同学的大部分是没有辜负中山先生教导和期望的。

(1965年)

## 陈炯明部将在背叛前后的言行

李朝彦\*

笔者自粤军援桂军事结束以后，因患严重瘰疬之疾，即辞去一切军政职务，在广州家中休养。后来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一系列行为，因为没有亲自参与，所知很少。但前前后后常与陈系中人相往还，多少知道他们的一些言论行动，有些自己还参与其事，谨就回忆所及，述之以备参考。

—

1920年秋间，援闽粤军誓师回粤讨伐桂系，广东人民历年在桂系军阀统治压迫剥削之下，民怨沸腾，援闽粤军得到广东人民大力的支持，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内就把盘踞多年的桂系军阀，全部逐出粤境。援闽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回到广州之后，孙中山先生随又命陈兼任广东省长，陈也派他的得力将领洪兆麟任潮梅镇守使、李炳荣任惠州善后处长、熊略任东宝增龙善后处长，同时驻军其地。一方面请金章等人草拟“联省自治”计划和民选县长办法，企图实现他的“联省自治”、“粤人治粤”的政治主张。

陈醉心于“联省自治”，固然有他的政治野心，同时也迎合他的将领们的落后思想。多年来，广东在龙济光和桂系军阀统治之下，粤中军人自然希望粤人治粤，在政治上有所出路。援闽粤军胜利回师广东，这时陈的将领多已高居要津，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他们便认为“革命”已达到目的。对孙中山提倡革命、彻

\* 作者曾任熊略的下属，与陈军将领熊略等有密切交往。

底消灭军阀、统一中国、实行三民主义的主张，心里就很不赞成。我听过熊略说：“孙先生天天讲革命，革命、革命，不知革到何时了？”我当时虽然是一个中级的军官，听来也颇入耳，所以今天仍然记起来，熊这番话，实在可代表陈系将领们当时的一般思想。

在此时期陈系的将领们早已看到援闽粤军收复广州之后，孙中山先生决意回粤，陈炯明的态度是殊不高兴，次年4月间，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会议，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陈炯明更不同意。其中经过，已有不少文史资料说明，不必再赘。陈系将领见陈对孙中山这种态度，自然不免私相测议陈老总的政治意图。有些人认为陈的最大政治目的是获选副总统，陈所以积极搞他的“联省自治”，也就是搞他的政治资本。时东南各省军阀，陈和他们都有勾结联系，他还帮助过唐继尧驱逐顾品珍重踞云南。从一时声望来看，陈也俨然以为众望所归。“联省自治”一旦实现，总统一正一副，自分南北，南方票数可能不及北方，而副总统一职，自以陈的希望为最高。孙中山先生虽然是国民党领袖，在理陈也应该让他。但在“联省自治”形式下的统一，孙是不会被选为总统的，孙也不愿意当这样的总统的。副总统仍会落到陈的身上，以上是当时陈系将领们闲谈时对陈的政治意图这么猜测，我虽没有直接听到陈有明确的表露，但也认为虽不中，亦不远矣。后来陈卒至背叛孙中山，主要原因未尝不在于此。

正因为陈炯明不服从孙中山的政治领导，也影响到他的部下将领对孙的不满。我记得在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的日子里，广州各界人士都表示热烈祝贺，到处搭有彩楼。有一次，我和熊略行到天字码头附近，他指着那挂着庆祝标语又高又大的彩楼对我说：“你看这座彩楼，摇摇欲坠，风一吹就倒啦。”其不满情绪可想而知。

## 二

孙中山先生于1921年5月间就任非常大总统后，即决心进行北伐。为彻底消灭桂系残余力量，解除后顾之忧，乃以“援桂”名义，讨伐陆荣廷。陈炯明迫于形势不得不出兵援桂。可是在这时期后，陈在后方即与他的谋臣策士们大搞“粤人治粤”的把戏，以省议会名义公布“广东宪法草案”、“广东县自治条例”、“县自治暂行条例”，随即进行民选县长，我在这时也就曾任过短时期东莞县民选县长的监督职务，而陈这时在后方这么热心地树立他个人的政治势力，对北伐事业自然也就推诿消极。援桂战事结束之后，孙中山先生主张继续进行北伐，陈更多方阻挠，甚至以辞职来对抗。这时党内人士如胡汉民、蒋介石等极力主张免陈职务。如廖仲恺、林森等为免影响北伐全局，则极力奔走转圜。1922年4月间，孙中山先生由桂回粤，行次三水的时候，林森犹力劝陈炯明前往见中山先生，当面解释一切。陈对林说：“在革命道路上，孙先生好比是一个汽车〔 辈〕，我好比是一个人力车〔 辈〕，怎努力跟也跟不上。”后来经林再三说服，陈始勉强准备专车前往。恰在这时，免陈粤军总司令和省长职务（保留陈的陆军部长）的命令由专人带到。陈愤然即日离粤赴港，转回惠州。

陈炯明回到惠州后，就居于西湖百花洲，组织他的私人办事处，一方面阴命叶举移师回粤，一方面经常制造谣言，密令他的旧属防备别军袭击，敌视孙中山。这时只有宝璧兵舰久停在天字码头等待修理，陈也来电说：“宝璧兵舰烟囱起烟，就是孙命令解决你们的暗号，须要严加戒备。”如此种种挑拨旧属情绪之事，我听到的不止一次。这时连市面上也听到有“孙陈将要火并”的传言。不久，叶举也率军回到广州，那一天我适在熊略司令部，廖仲恺恰也到来见到了叶举，顺便向他说：“你们为什么回师广

州？”叶举诡辩说：“在广西军食缺乏，不得不早日回来。”孙中山先生知叶等回来，即也为叶设宴洗尘，并遍请陈系各将领。可是他们均避不赴席。尽管他们这么狂悖无礼，孙中山先生还跟着派廖仲恺到惠州会见陈炯明，企图说以大义。但陈闻廖来，即派人在石龙将廖扣留。廖夫人也急得来请求熊略帮忙想法将廖释放。熊略只得安慰她说：“没有什么事，不日就会回来了。”

叶举回来后，陈炯明见军事部署已经成熟，为促使他们早日行动，又来电诱以高爵为他卖力，电文大意说：“省长一职，拟以熊略担任，其次拟属意李炳荣，嘱由叶召集主要将领密商。”这次会议也就在叶的办事处召开。熊略说：“我满脚牛屎，怎能当得起省长，请李来吧！”李炳荣说：“你当不了，我更当不了。”他们两人推来推去，都不敢答应。这时，洪兆麟却说：“你们不当，我来当。”大家都默不作声。由于他们内部矛盾，省长一职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然而陈炯明仍命叶举等迅速行动。终于6月15日陈系将领联名通电胁迫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16日进而爆发了炮击总统府的一系列叛逆行动。

孙中山先生脱险后，即移居永丰舰亲自指挥，进行反击。同时下手令海军总长汤廷光、卫戍司令魏邦平、第二独立旅长熊略三人举兵讨贼。孙本来也知熊略和陈炯明、叶举等人关系很深，事前为了希望他不参加叛逆集团，曾任他的父亲熊长卿为总统府参议，这时下令给他还希望他能转变过来，而熊接到孙的手令，却置若罔闻，仍然当陈的帮凶。魏邦平则无嫡系军队，汤廷光的海军却早为实力派温树德所把持，已被陈所收买，魏、汤两人只得以调人的姿态出现。孙中山先生对内援既已失望，不久许崇智等北伐军回师讨伐又告失利。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于8月9日退出广州，旋即赴沪。

陈炯明自孙离去广州后，跟着由惠州回到广州，即刻召开军事会议。陈这时以为大局已定，志得意满，决定自己复任粤军总

司令，同时以军人不干政为理由，提出港商陈席儒为广东省长，叶举改任司令部参谋长。当时陈系各将领见陈推一个寂寂无名的港商来当省长，无非借作傀儡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但也不敢作声。只有叶举是陈向来倚重的，陈的叛逆行都叫他领衔出头，自己遥在百花洲操纵，到这时只落得一个参谋长，于是更怒形于色，即拂袖离席。陈急忙拉着他说：“有事慢慢商量，有事慢慢商量。”叶愤然推开陈手，掉头不顾而去。此后，陈通过一番形式手续，8月底省议会选出陈席儒为省长，至9月中旬陈就公开出场复任粤军总司令。跟着撤销叶的广东粤军总指挥处，明令改为参谋长，叶仍不到差，陈再三派人去劝叶举，才又回来。到这时陈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章太炎曾讥之为“刑印不封”，似是指这些内幕的事。

### 三

正当陈炯明在广州复任粤军总司令之后，趾高气扬，踌躇满志之日，也正是孙中山先生在沪布置政治策略成功之时。孙一方面命在闽的许崇智北伐军改为东路讨贼军，伺机西上；另方面，暗中派人运动滇、桂军和留桂粤军组织的西路讨贼军也已酝酿成熟，突然于12月底誓师东下。陈炯明在东西夹击之中，不到一个月，也就退出广州。但在那时，陈系中人有部分主张东迎西拒，酝酿早日停火，卒之以黄强的阻挠，未能实现。致使后来陈军残部，负隅东江一带兵连祸结两三年，广东人民受尽痛苦，在这里似值得一述。

先是，陈炯明为防备孙军的反攻，认为主要的是在闽的许崇智，其次才是广西。一方面派洪兆麟出兵援助闽军李厚基，嫡系军队集中东江上游布防；同时也命熊略为梧防司令。有一天，我在广州忽然见到市面非常变动，各种谣传很多，看报才知道杨希闵等滇、桂西路讨贼军已移师东下，分路进攻，陈军纷纷退却，

即修书一封托廖天麒（时任熊部差遣委员）专程带给熊略。信中大意说明广州市面的情况混乱，谣言甚盛，军队多不思战，前有强敌，后方未稳，劝他要见机行事，当机立断，以免广东再受“亡省”之痛。不日，廖某回来对我说：“熊已离去梧州，乘船东下，我在中途徒步他的船中找到他，熊见我，问我来做什么，我不得不将信当众呈交了。”我问道：“当时情况如何？”廖答：“熊看信后，递交叶举说：‘你看介孺（笔者别字）广州的来信，广州的谣言真多。’叶看后又递给李济深。当时各人都看了，没有什么表示。”廖继续对我说：“我看你还是暂时走避一下好，叶回来恐会对不利。”我心里想，叶举无兵，依靠的是熊略等，熊在众目睽睽之下，信不得不给他们看，他们当时既无表示，决不会对我怎的。跟着陈军节节败退，熊略个人也退回广州。

大约过了新历年（1923年）的一两天，时局越来越紧。有一次，我到长堤熊略的司令部里探听时局消息。时已在座的有宪兵司令陈修己、广州市长吴飞和伍观淇、陈国伦（两人忘其职务）等人，他们正在谈开了，熊略见我来，说：“你来得正好，目前形势你看逃之乎？打之乎？”我看看当时座中都是老友，而且我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因此就放胆地对他们说：“目前情况，逃也不是，打也不是，最好还是改换招牌，迎接许汝为（崇智别字）快点回来。”其实这时谁都看到败局已定，只量大家不敢说出向许投降。我这话刚说出口，大家话匣子打开了，你一句，我一句，有的说：“过去滇、桂部队都来过广东，搞得广东一塌糊涂，好不容易才驱逐出去，今天他们又要回来，我们应当设法拒绝他们东下，一方面快叫许汝为回来。”有的又说：“今天我们背上叛逆恶名，都是因为有陈老总在，他已成为众矢之的，能够设法请他离去那就好办了。”熊略说：“我今天正见过老总，他说：‘时局如此，他个人出处没有问题，只需有人出来替他收拾，随时可以离去。’现在就是如何收拾这个残局？”经过一番讨论，大

家都同意定出一个临时过渡办法，就是请魏邦平回来（时在香港）做保安司令，维持社会秩序。但魏无兵柄，可由熊略副之，一面死守三水河口拒绝滇、桂军东下。同时也讨论到魏未必肯负这个责任，谁能够去挽他出来呢？吴飞说：“由我来负责找他。”后来又讨论到用什么名义产生这个保安司令的问题。大家又经考虑，认为最好是由广东的各界社团推出。因为前一个时期，在孙、陈两军相持中，省长乏人之际，魏曾被社团推为省长，不过那时他没有就职。今天仍可用各界社团的形式来推举。但由谁来运动各界社团呢？陈国伦说：“我愿前往找江孔殷，由江出面运动社团。至于将我们这次情况转达陈老总，同时请他离去，最适当的我看还是请叶举去对他说。”后也决定由陈修己去找叶（时在三水），这时剩下的是派人联系陈的东江派的嫡系部队问题了。大家都认为黄强去最好。恰在这时黄强也就来了。于是熊略便将大家说的话对他重述一遍，话还未讲出请他去向陈的嫡系部队联系的事，黄便猜透几分。他先插嘴说：“广东人的脾气真怪，食面有人喜欢用浙醋，有的又不欢喜（意思是说亲陈亲孙各有各的主张）。今天问题的解决，最重要的是打一胜仗，则万事解决，老总也可以下台。”“真不真啊，打个胜仗老总就会下台，那我就打番份啊。”伍观淇从旁冷笑地接了一句。陈修己也接着说：“目前要想打胜仗，谈何容易啊，军费又无着，怎么能够打呢？”黄强继续说：“你们不打，我明天就和公续（熊略别字）到前线去指挥。”大家见他情见言词这么死心塌地要替陈撑持下去，一时无话可说，会也散了。

第二天，他们这班人又在陈德春的公馆专为这事继续座谈，也邀黄强参加，我以局外人未有参与。闻说这次也因黄强坚持要打，卒之东迎西拒、早日停火的计划也就中断了。

黄强，字莫京，惠州龙川人。当时在陈军中担任什么职务，我记不清楚。他曾留法国学军事，为人能言善辩，外表漂亮。民

初归来，得陈炯明的大力提拔，常叫他办些外交工作，逐步爬上来。惠州派的军人如杨坤如、陈炯光等，都是不学无术，黄则有一套军事理论。因此，他们互相结纳，无形中成了惠州派军人的师爷，起着左右的作用。熊等当时要通过他去联系，原因也就在此。

#### 四

1923年1月中旬，西路讨贼联军占领广州。陈炯明即率军退守东江惠、潮、梅一带，残部约有2万余人，陈尚企图重整队伍，进行反扑。4月间，许崇智率东路讨贼军自闽开抵潮梅，陈虑东西夹击，即加紧与北方军阀勾结，派叶举赴天津谒见曹锐。后来（忘记日期），北京政府还派叶为广东省长、陈炯明为两广巡阅使，其部将林虎为广东督军，只以一再反扑失败，势穷力蹙，没有敢把招牌公开挂起来。

到后期，陈的部属与部属之间，因统属不明确，矛盾逐步扩大。如叶举称粤军总指挥，林虎也称各路粤军总指挥，洪兆麟也称粤军副总指挥，权力不清，互争雄长。加以盘踞的地方饶瘠不同，搜刮收入不等，矛盾无法调和。有两次陈炯明都想回来加以调解，却为林虎所拒绝，说道：“你不回来还会好些，你回来更难搞。”陈也无可奈何。

由于陈军内部种种矛盾根本不能解决，各有各的打算，直到1925年春间，建国联军（这时东西路讨贼军已改为建国粤军、建国桂军等番号）第一次东征，分三路进攻，陈军洪兆麟等部纷纷失败，电请林虎救援，参谋人员忙将消息报告林虎，林虎正在和僚属搓麻将，对他的参谋人员说道：“你们慌什么？他们失败也好，我将向他们的背后，一齐驱之落海。”卒之盘踞惠、潮、梅多年的陈军残部给建国军逐个击破，林虎也败退赣南。

至于陈炯明与北方军阀相勾结之事，有些文史资料说他是通

过叶举和熊略与曹锟、曹锐勾搭的。这实在不错，我上文说的叶举谒见曹锐，其时熊略等军正在败后，军食无着，熊走投无路，使人找到我，由我居间介绍给许崇智的军长张国桢加以接济，嘱他带队东走向许军靠拢。不料叶举回来，和熊略密谈之后，熊略的态度又变了。可知熊对曹锐也是很相信。又记得有一次熊略对我说：“人们都说吴佩孚对陈老总有资助，这都是道听途说，齐燮元对他有资助，那倒是真的。”他这话是无意中泄漏了出来，可惜我当时没有问清楚齐资助的是什么。还在早些时期，陈炯明正在洋洋得意大搞“联省自治”的时候，便有人问他：“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中国，你搞的联省自治，闻说吴极为反对，你以为如何？”陈说：“吴佩孚算得什么东西？你看我将来就要打倒他。”后来陈背叛了孙中山，他有无和吴勾搭，我当时尚无所闻。不过吴佩孚也好，齐燮元也好，他们两人都是曹锟的大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很大，陈炯明与军阀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的。

陈炯明自失败后，即住在香港，后来穷极无聊，连电灯水费也交不出钱，给水电公司截了线，有人将这情况转告黄强，黄也若无其事。正在陈的生活极为落拓的时候，那时北方旧军阀也多已倒台，他们不甘寂寞，图谋再起，知道过去北洋海军将领毕庶澄手上有一笔大公款，于是大家要挟他拿出来作活动费，南北大军阀各有分赃，陈炯明也分到20万元。回来后有人问他准备如何活动，陈说：“现在还搞什么，这将是我的棺材本了。”此后，陈便在香港度过寂寞的残年。

(1965年)

## 关于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的一点补充资料

区摹常\*

读《广东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马湘先生的《跟随孙中山先生十余年的回忆》一文，其中第六节“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的经过，和我当时的见闻印证，大致相符。但马湘先生没有举出当时将陈炯明叛变行动通知陆志云的那个连长姓名。这个人对孙中山先生能在紧急关头，及时逃离险境，避免遇害，关系甚大。兹将我所知补充如下。

事变前，陈炯明将叛变的消息甚嚣尘上，中山先生亦有所闻。中山先生一生以至诚待人，认为陈炯明谋变是一个谣言，不可置信，并且屡次说：“陈炯明是不会谋害我的。”

1922年6月15日下午，陈少白先生亲到越秀楼告急，力劝中山先生暂时离开总统府，以避其锋，同时，来电话及亲到劝驾的还有很多。中山先生均答以“这是外间谣言，不可轻信”等语。至深夜11时，陈策、魏邦平等连续以电话向他报告陈炯明谋反的确实消息，并说明情况十分危急，劝中山先生出府暂避。中山先生表示无论如何决不离开总统府，他说：“我只知为国家为民族，从不为个人谋利禄，这是人所共知的。陈炯明必不肯谋杀我！”

通知陈炯明叛变进攻总统府消息的那个连长姓赖名达，是信宜县人，和大本营辎重大队长陆志云是同乡。赖为陈炯明属下熊略部的连长，于出发进攻总统府之前，借故离队，跑到陆志云家里报信说：“陈炯明决定在今晚举行叛变，1时开始进攻总统府。

\* 作者时为孙中山的随从。

口令是‘吃饱饭杀民贼’。现在事势紧急，请立即报告中山先生离开总统府暂避。”

陆志云即偕同赖达跑到参军林树巍家，此时因在夜间，无特别出入证不能进总统府。林又偕赖、陆二人奔至总统府机要秘书林直勉家里，由林直勉带领他们三人进总统府报告消息，力劝中山先生离府暂避，中山先生仍不从。

时已深夜1时，叛军攻击马上就要开始，楼上已听到远处有集合号音，俄顷，连部队的嘈杂声也能听到。中山先生从卧室出来，命令卫士准备迎击。林树巍、陆志云、林直勉等再次力劝暂离越秀楼，中山先生说：“竞存若胆敢作乱，我便负平乱之责，如力不足，惟有一死以谢四万万同胞。”林直勉等见情势紧急万分，力劝无效，于是不待中山先生同意，数人用力挽着中山先生跑出越秀楼。当林、陆、林、赖和中山先生一行五人，行至德宣路时，即闻叛军进攻总统府的枪声。到惠爱路桂香街口，被叛军哨兵拦阻，经林直勉等多方解释始得通过。

叛军目的在于谋杀中山先生，且他们探知发动攻击前数分钟，中山先生尚在越秀楼，因此攻击进行得非常猛烈，排炮、机关枪、步枪一起来，开始攻击数分钟后便发动冲锋。数十次冲锋均被警卫团击退。中山先生能够平安离开险地，没有遇害，这是叛徒们意想不到的。赖连长的告密是出于至诚的，决不是有人主使。当时若非赖达连长冒万险告密，后果将不堪设想。

叛乱平定后，中山先生曾召见赖达，嘉奖备至。邓泽如、赵士觐任盐运使，均委赖达为缉私舰舰长。赖与眷属寓广州市温良里，与余比邻。一别多年，未与通讯，闻已归道山了。

(1963年)

## 陈炯明军炮击永丰舰目睹记

苏济川 \*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授权叶举，以粤军总指挥名义，发表通电请孙下野。炮击越秀山麓总统府，并派兵攻省政府等机关。中山先生登上护法南来之永丰舰，反击叛将，一面下令待命入湘的许崇智、李福林、黄大伟等军，自粤北南下，剿叛解围；一面下令粤地各民军如徐树荣等部，分途起义，以分敌势。但当时叛军势盛，强弱悬殊。南来海军的主力如海圻、海琛等舰也受运动，见利易帜。黄埔势难久守。中山先生鉴于当时黄埔无法久驻，乃定入驻白鹅潭之计（叶举及其参谋长徐军雁判断，咸认为中山先生之入驻，实欲凭沙面国际势力为掩护）。

时为1922年7月1日上午，永丰炮舰启程乘潮流溯流而上。事前粤军叶举有所闻，乃派熊略率所部林国光团扼要截击（林系前清将弁学生毕业，与熊同学，海南岛人，字星桥，林廷华之父，滇桂联军东下后熊部退驻惠州，在淡水改编为粤军第五军第一师第一旅，国光任旅长，师长为林烈）。林国光团时驻河南海幢寺，熊率之布置阵地于凤凰岗、南石头到白蚬壳、沙园一带，而以后白蚬岗为临时炮兵阵地，置重机枪、迫击炮于白蚬壳天后庙前及车歪炮台，扼要俟击。

余时以总指挥顾问身份，忽为奇想所驱使，欲观此一幕近代剧，笔之于日记，使后之人能得此日之真相。以熊为我童年之交，在北京时也同居共饮，因此以欲观海陆交战为名，请随行。熊笑谓：“汝不畏作大炮灰同行可也。”

---

\* 作者时任陈军总指挥部顾问。

当时兵力只有三营及机枪、炮兵各一连，仅得七生五山炮三门，轻重机枪十余挺，余均是步兵；武器则全部是粤造七九。每兵配备手榴弹二枚，火力并不强大，以之截击装甲的永丰舰，虽河道狭窄易于命中，亦实难损其毫末。我见此情形，乃笑谓熊曰：“你今日以此为儿戏乎？否则如此布置，恐杀者是自己而非永丰舰上之人。”熊笑曰：“你真是书生昧于大势，孙今日虽无实力，亦今日之广东共主，岂能杀之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此事是洪湘臣所力主，‘老烟’亦知其不可（民元时各地绿林均编为民军。胡汉民入南京助孙中山先生，陈炯明代为广东都督，民军不识“炯”字，误读为“烟”，群称“陈烟明”，此后粤人多呼陈炯明为“老烟”，尤以新军中人为普遍），老叶不过奉命执行者耳。他及你我均曾同时在陆军大学，岂此等兵力不能摇撼铁甲舰也不识耶？实欲逼走老孙以免他在此搞风搞雨而已。驱之人潭，严密警戒四周，粮尽自然求外国人送下港。今日许汝书生同往亦知必无危险，使你一开眼界，此中秘密许后人知，不可令今人知之也。”言后相视会心微笑而罢。

是晨，知中山先生必来，我等率参谋何君谋（新会人，抗日时为韶州师管区区司令）、团长林国光同至南石头阵地。巡视一周后同返白蚬岗炮兵阵地。此时三门山炮已放列完毕，各炮兵也均各就序列休息，候令进止。

不久即见白烟袅袅自视线外上升，徐徐自远而至，盖永丰已溯流来也。熊略神色渐现紧张，一言不发，取望远镜向发烟处探望。良久嘱余及君谋细视。始见一黑点朝前蠕蠕而动，不久已辨清为轮船，尚有较小者二冲接而来。又久之所随小者停滞不前，只大者继续上驶。熊乃下令准备近击。迨永丰已近至射程以内，炮兵连长即命开炮射击，各兵技术尚属纯熟，神态也相当镇定，盖临阵久的老兵也。所发出各种弹亦多命中，弹多落于两舷甲板上，但无开花者，均实心弹也。证明熊对我前言，知其不欲多杀

人也。当时弹中钢甲，金铁相撞，发声铮然，都反跳落水，浪花飞溅，白沫迷目，步枪机枪亦互相争唱，汇为反响，若燃串炮。永丰亦发炮还击，亦有命中阵地前沿者，始终亦未伤人，至终仅毁掩体数处而已。历时约 30 分钟，永丰舰已徐驶而过。并未疾行者，盖河道狭，不敢疾也。及驶至沙面前白鹅潭中即停航，态度舒徐，若没有这回事的样子。这场战斗彼此均似演习，方式均无可观。永丰泊白鹅潭后，时总有月余，双方均无接触，只陈永善（港商陈赓虞之子）曾放水雷一枚欲炸毁此舰，但未及即炸，并无损伤。此后亦未再举，窥其用意似亦属恐吓性质。其中尚有一小事须述者，某日有我方的通讯队长徐某（已忘其名，在南宁时我认识之，人均呼为小徐）自北江前方返，因潮流关系误入永丰警戒线内，人船被俘，此后失踪，恐已被杀却矣。中山先生居永丰舰中直至闻许崇智等败耗的确讯，始乘英舰摩轩号赴港转沪。

(1964 年)

## 第一次北伐回师靖难失败的回忆

梁国武 梁秉枢\*

笔者梁国武和梁秉枢，曾于 1921 年间，孙先生北伐时，在粤军第一路第二统领部队中担任工作，参加过改道出师北伐、进入江西省的战斗，以及回师靖难的失败，和后来攻克福州城等战役，仅就当时回忆的事实。叙述出来，提供编写孙先生革命史料作为参考。

### 一、从桂林回师广州改道北伐

孙中山为了贯彻护法主张和实现中国统一，实行出师北伐。但当时因桂系军阀陆荣廷，尚拥有广西一省的军权，因不甘心 1920 年桂系莫荣新在广东的失败，调集全部桂军于桂粤的边境，企图收回广东省的地盘。因两广的局势，尚未得到安定和巩固，会影响北伐的进行，因此孙先生首先必须解决桂省，然后举师北上，乃于 1921 年间，即命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分兵三路，向广西省桂系军阀陆荣廷进攻，左路从广东高州经钦廉上思攻占广西省龙州；中路从广州肇庆溯江直上攻梧州，经藤县、桂平直捣广西省会南宁；右路从广东四会广宁经怀集、贺县，攻取广西省桂林。大约经过两三个月的战斗，始将桂系军阀的全部势力消灭，从而使两广的局势，获得暂时性的统一和安定。孙先生乘得胜之师，准备北伐，于 1922 年春间，即下令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

\* 作者当时均在粤军第一路第二统领部任职。

和粤军第一路黄大伟部等军队，先后集结于桂林、平乐、昭平一带，正在计划向湖南进发之际，不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见粤军攻占广西后，竟暗中与北方军阀吴佩孚和湖南省赵恒惕等，互相勾结，合唱联省自治，反对孙先生北伐和护法的大计，阻挠北伐军事的进行，不接济北伐军的粮弹，不派他的亲信部队，参加协助北伐。由于陈炯明的野心阴谋，越来越显露，孙先生就自桂林率领许崇智军和黄大伟部，回师广州，采取严厉措施，一方面免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的职务。另一方面随即令其余各军先后集中韶关、马坝等处，重新布置北伐计划，取道南雄进入江西北伐，以上所述，就是孙先生第一次北伐改道的过程情况。

## 二、粤滇赣军进入江西开始北伐战斗

1922年5月间，北伐军各部队，在韶关作好了一切军事的布置，就在韶关举行誓师，当时北伐军是分为左中右三路出发，左翼以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担任，率领该路第一、二、三统领，从广东仁化向江西崇义、上犹前进；中路以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参谋长担任，率领滇军朱培德师和赣军李明扬、赖世璜部，从广东南雄向江西大庾、南康前进；右翼以粤军第二军长许崇智担任，率领该军和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及李福林部，从南雄向河西信丰、王母渡前进；另以湘军陈嘉祐师为总预备队。各北伐军在战斗的过程中，黄大伟部前进至上犹县城时，就遇到北军第九混成旅邓如琢部一个营，固守该城抵抗，战斗仅有半天，就被黄部第二统领第四营，攻克县城，缴获步枪20多枝，俘虏北兵10多名，第一、三两统领也有缴获。攻占上犹县后的第三天，第一路部队前进至塘江圩时，因这个圩是赣州外围的重镇，关系赣州城的安危，邓如琢把他的主力部队，布置在这个圩的周围，企图顽强抵抗黄部的进攻。经过一日一夜的激烈战斗，始将敌军击退，

这一役，敌人伤亡狼藉，黄部各统领的部队，损失也不少，黄大伟的参谋长张唯圣就于这役阵亡，可见其损失之大。接着黄部乘胜追击，势如破竹，一直追至泰和县附近的马家洲，暂时停止候命，等待与中路滇赣军取得联络后，再继续前进。中路李烈钧所率领的滇赣军，前进至大庾小梅关和梅岭关时，就与防守这个关的北军蔡成勋部遭遇，经过一日两夜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滇赣军缴获很多，因李烈钧是江西人，地形熟识，并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引路和协助，避实就虚，绕道追击前进，就在是年6月13日攻占赣南最大城市的赣州城。正在准备向前继续推进的时候，而退往惠州的陈炯明，竟于6月16日夜间，在广州围攻总统府。孙中山移驻永丰舰，在该舰讨伐叛军。另一方面电令江西的各路北伐军，星夜回师广东靖难。这时黄大伟在得到孙先生急电后的次日，就召开第一路上尉以上全体官佐会议，公布电文。但是黄因别有用心，当场既不表示态度，也不下令回师，只是按兵不动。一星期后，黄部第二统领陈得平，觉得他的举动，异乎寻常，迟不回师，就从各方面调查了解，始知他暗中同情陈炯明联省自治的阴谋，想借按兵不动的期间内，派员与北方军阀湖北督军王占元和反复无常的沈鸿英勾结，私通函信，静观时局的变化，才乘机而动。陈得平认为粤军第一路的部队，是孙大总统所领导的革命军队；黄身为司令，在孙大总统蒙难的危急关头，违抗命令，投靠北方军阀，玷污革命军人的名誉，第二统领部队，决不能跟随黄背叛革命，陈就召集第二统领全体官佐会议，当众揭露黄不回师靖难的阴谋，在会上大家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孙大总统，要求马上随同各友军回师戡乱。会后，陈即亲赴第一路司令部，慷慨激昂地对黄忠告。黄在第二统领全体官兵的压力之下，不得不下令第一路的部队回师粤北，比各友军迟十多天才到达广东翁源，加入粤北的作战。

### 三、北伐军回师靖难失败主要原因

1922年6月中旬，在江西各路的北伐军，接到孙大总统回师靖难的电后，当时回到粤北南雄的部队，首先是许崇智军和李福林部，其次是滇军朱培德师。梁鸿楷师叛变，擅自将该师从江西调往广东东江老隆方面，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李烈钧接到孙大总统的电时，他力主继续北伐，攻取江西省会南昌后，才转师回粤戡乱，因许不同意，他就率领赣军留守赣南，作为北伐军后路的屏障。黄大伟部，因他别有企图，受到部下的责备和反对，恐他的部队发生分裂，是出于不得已才回师。湘军陈嘉祐师，当各北伐军开始返粤的同时，已向湘南和粤北边境移动，行踪不明。这次能够参加粤北作战的军队，只有许崇智军、李福林部和朱培德师等部（黄大伟部后回参加粤北作战）。当时归由许崇智指挥，由南雄出发，取道始兴周田，分三路向韶关一带叛军进攻。朱培德师担任右翼，进攻韶关帽子峰。许崇智军担任中路，进攻韶关火车站和东河坝。李福林部担任左翼，进攻韶关右前方的大小火山，并相机绕攻马坝火车站。双方展开激烈战斗，大约经过廿多天，因北伐军接济补充困难，伤亡惨重，朱部争夺帽子峰阵地，曾经两次的得失，转为与敌人相持。许部也因夺取韶关火车站，经过三次的进退，转为攻势防御。黄大伟适在此时，率领第一路部队到达始兴县城。原来许崇智进攻韶关的军事计划，是想黄率领第一路部队，担任翁源县这条路，进攻英德河头火车站，彻底破坏河头铁桥，截断广州和韶关敌人的交通运输，因为黄的部队具有相当的战斗力，分派黄部担任这方面的任务，对韶关整个战局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但因黄的部队回迟，不能协同各友军一致战斗，只是由许派出一小部分军队，向翁源县方面警戒，防止敌军抄出许军周田后方，这样就造成进攻韶关战略上的一个缺陷。黄部这时到达，可以补救这个缺陷，尚未为晚。但在

军事行动上分秒必争的时候，他回到始兴后，又赴周田会许崇智面商机宜，只是命令第一路的部队，继续向翁源前进（听说因他这次回师到迟，怕许崇智的责备，会许解释一切），耽误四日时间，就跟不上前线的队伍。当他的先头部队陈得平部行抵翁源城时，即与叛军洪兆麟师遭遇，展开战斗，由于各统领的官兵奋勇，经过半日的战斗，就将敌军打得溃不成军，向英德河头退窜，此时如黄亲临前线指挥，乘胜猛追，占夺英德河头，把河头的铁桥破坏，截断敌军增援，动摇韶关敌人的军心，同时也鼓起许、李、朱等部队官兵进攻的勇气，韶关是能够攻破的，从而粤北的整个战局，会转为对北伐军有利。可是因黄赴周田，行程延误时日，不在前方指挥，任由各统领自行作战，虽是把敌军击溃，因军中无主，而各统领不敢擅作主张追击，坐失有利的机会。因此，敌军就利用黄部尚未进出河头前的时机，一方面用火车由广州大量增援韶关；一方面用各个击破的办法，集中优势兵力，先将李福林、许崇智和朱培德等部打垮。接着即调集陈炯光、钟景棠、熊略、陈修爵等叛军（这时陈修爵已投归陈炯明），抄出翁源后的司前圩，截断黄部退路，第一、二、三统领的部队，就被敌军层层包围进攻，战斗异常激烈，死伤枕藉。黄这时刚从周田回抵司前圩，也给敌军包围。在当日夜间10时左右，他就派第二统领梁国一营为先锋，冲出敌人的包围圈，经始兴、南雄退入江西安远。许、李两部，已于前两日经始兴、南雄退入江西的会昌。同时留守赣南的李烈钧部，也遭到江西蔡成勋部和沈鸿英部的背后攻击，不知去向。朱培德部，因许、李两部败退，侧背受到敌军袭击，不能退入江西，就向湘南和粤北边境撤退，情况不明。至此，粤北的战局全线总崩溃，这就是因黄大伟的个人误时失事，造成北伐军回师靖难，在关键时刻失败的主要原因。当时许、李、黄等残余部队，退入江西的边境后，陆续到达瑞金县城集中，进行缩编和调整，原来许崇智军有四个旅，调

整后，只存两个旅；李福林部原有四个团，调整后，存不到两个团；黄大伟部原有三个团，存不到一个团。这时孙大总统获知各北伐军在粤北的失败后，就于8月间，离开了停泊在广州白鹅潭的永丰舰，前往上海，重新策划他的革命工作。

#### 四、攻占福州和改造东路讨贼军

北伐军许、李、黄各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缩编和补充给养，虽不如过去北伐时期的强有力，但是总可以负担战斗任务。是年9月间（可能时间有出入），孙先生和段祺瑞协议，共同反对曹锟为首的直系，并得到段的亲信徐树铮多方奔走和联系，就由徐策动驻在闽北延平的西北边防军第二十四混成旅王永泉部倒戈，反对福建督军李厚基，并与北伐军合作，联合进攻福州城，打倒李后，夺取福建省的统治政权，从而建立北伐军和段系势力的根据地。同时孙先生就由沪电令北伐军的各部队，从江西瑞金出发，兼程前进，到达建阳后，就分兵两路：一路由许崇智军担任，直进延平会合王永泉部进攻福建的水口镇；一路由黄大伟和李福林部，取道建瓯直下古田，进袭福州城。当时李厚基闻报王永泉旅独立，正会合各路北伐军向水口进攻的消息，心惊胆战，就匆匆忙忙由福州城调派防守军史廷扬部驰援水口。福州城防务力量单薄，只有一团敌兵和一营宪兵，在福州城外洪山桥一带高山布防。黄大伟和李福林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如入无人之境，直进至洪山桥高山时，才遭到敌军抵抗。北伐军因子弹缺乏，一味冲锋，激战仅半天，敌军败退，李厚基也在此时，离开福州，逃往厦门，黄、李两部，就攻克了福州城。许崇智军和王永泉旅在攻克福州的第二天，攻占水口镇。这时，黄大伟和李福林部在福州城的实力，只有两千多官兵，为了防止李厚基部反攻福州，当时李（福林）部就负责福州城西门和西门外高山一带警戒；黄部第二统领梁国一营，就担任福州城北门和北门外一带警戒。史

廷扬部在水口和白沙两处被许、王两部击退后，闻知福州失陷，就从白沙率领残余败兵，想乘机向福州反攻。李福林部在西门外高山一带警戒的部队，只是看见敌人，不经了解清楚，就认为是敌人大部队反攻，便撤入西门内，关闭城门防敌。李接到警戒部队的报告后，恐被人围困，就慌忙率领他的司令部人员，退出福州城的东门。黄大伟看到李撤退，他也盲目地跟着李后退到东门外，并且还下达第二统领退却的命令：“福州城战事突然发生变化，对我军不利，着该统领即率所部到福州城东门外集中，准备向浙江方面撤退。”但是第二统领接到黄的命令后，觉得此事突如其来，很为奇怪，认为我军现时既未与敌人接触，又不听闻敌人的枪炮声，为什么忽下命令，说是战事对我军不利呢？如果是水口许、王两部进攻失败，致使不能固守福州；但这时退往浙江，天气严寒，官兵没有寒衣，补充和给养更加困难，这不是好的出路，倒不如固守福州，才是办法。当时第二统领陈得平和营长梁国一，就表示决心：一方面不执行黄大伟向浙江撤退的命令；一方面由梁营即向福州西门外高山一带搜索前进。不久，果然发现大部队的敌军，沿着闽江左侧道路，向福州方面前进，但觉得敌军的队伍混乱，战斗精神涣散，不像是反攻的行动。梁营就判断这些敌军，决不是反攻，而是在水口和白沙等处，被许、王两军击败退回的。因此，梁营就严阵以待，并吹出战时的“问答号音”，敌军不能回答，我军就以密集火力，向敌军射击。这时许军孙本戎部攻克白沙后，也跟踪追击至洪山附近，复与梁营会合，前后截击败敌。此役敌人死伤惨重，有一部分敌军企图逃渡闽江，溺死水中；有一部分敌军逃入福州南台日租界，给日军解除武装，残余的敌军，尽被梁营和孙部缴械。于是福州城一时的惊险，就得到了稳定。李福林和黄大伟这时闻知我军已将敌人全部消灭，就从城东门外回到城里坐镇。次日，许崇智、徐树铮和王永泉等，也先后到达福州。与此同时，孙中山先生就任命林

森为福建省长。徐树铮也根据他和孙联合共同驱逐李厚基的协定，挂起“制置府”的招牌，并任命王永泉为福建省总司令。徐树铮的目的，是想占领福州，作为发展皖系军阀势力的根据地。而北伐军是要扩展实力，为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作准备，这就形成了当时福州同床异梦的局面。黄大伟部第二统领陈得平，攻入福州城时，占据福建省军械库。该库存有各样各式的步枪，约有2万枝，除拨给其他的部队约有3000余枝枪外（即是拨给陈策海军陆战队2000枝枪，别动队司令冯熙周1000多枝枪），所有的枪枝为数尚多，黄认为有这么多的枪械，正好乘这个机会，扩充自己的军队实力，别树一个旗帜，摆脱许崇智的统辖；于是，未经请示孙先生的允准，就迫不及待地擅自将他的第一路改为国民军，自称为总司令，大行招兵买马，扩编军队，擅行任用他的心腹和戚友在财务、税捐、行政等机关部门工作，为他收入扩军的本钱；随行把他所统辖的第一、二、三统领部队扩编为国民军第一、二、三旅，还增编一个第四旅，就调回已经他派充海关监督的龚师曾兼任旅长。可是第二统领的全体官兵，一向是忠诚和拥护孙先生的，对于黄这种妄自尊大、扩充私人势力的行为，不愿意跟从他改编。但他为了达到扩充势力的目的，竟不惜采用卑鄙的手段，想分化和瓦解第二统领部的团结，企图收买第二统领第四营长梁国一，怂恿他起来反对陈得平，越级提升梁为第二旅旅长。殊不知梁对于孙先生的革命一贯拥护，也是反对黄狂妄行为最力的一人，不但不受黄的利诱，而且还将黄的阴谋诡计，向陈得平揭露。陈听了此消息后，非常愤怒，就派他亲信徐天琛为代表（徐曾留学日本，后来转变为改组派）赴上海面谒孙先生，报告黄大伟在福州的胡作乱为，及他在江西时期勾结王占元和沈鸿英，企图投降北方军阀的事实。同时孙先生也接到许崇智电告攻克福州的经过，及黄大伟狂妄的情事。于是孙先生便派廖仲恺、汪精卫、蒋介石等前来福州劳军，并转达孙先生的意旨，邀

请黄到沪面商机宜，其实是调他离开福州，撤职处分。但黄这时，因他一向干过对不起革命的事情，做贼心虚，恐赴沪之行，必受到孙先生的责备，犹豫不决，就召集各旅长会议，征求各旅长的意见（陈得平仍以第二统领身份参加会议），以作最后的决定。由于第三、四旅长邱鸿钧和龚师曾，与黄有私人的关系，均默不开言。首先由第二统领陈得平，对黄婉辞劝告：“孙大总统有事候你赴沪面商，作为革命军人，应该服从命令，你要赶快起程才对。”第一旅长王懋功，也跟着坦直地对黄说：“孙大总统既然有事请你到沪面商，如果不去，就是违抗命令，你呆在这里，不是办法。”黄大伟见他的部属一致主张要他往上海，就不得不身溜之。黄赴沪后次日，许崇智即宣布孙大总统的命令，免去黄大伟国民军总司令的职务，和取消国民军总司令部的机构，并将国民军的第一、三、四旅，改编为东路讨贼军第一军的第一、三、四旅，原来第二统领陈得平，因不愿随同黄非法扩编，这时也改编为该军第二旅，并分别任命王懋功、陈得平、邱鸿钧、龚师曾为第一、二、三、四旅旅长。东路讨贼军总共编为三个军，许崇智为总司令，并兼第一和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任第三军长，各军统辖四个旅，各旅辖下有两个团，后来又改编敌军一个旅为第十三旅，任命张毅为旅长，直属第二军控制。那时各军改编完竣后，经过一个时期的补充和训练，于1923年春，得孙大总统的电令，回师广东讨伐陈炯明，就在福州的东较场誓师，分三路向广东的潮梅一带前进。

（1965年）

## 陈炯明叛变时护法议员的遭遇

高子厚 \*

当陈炯明叛变时，叛军遍布广州全城，商民惨遭劫掠，如虎扑食，无一幸免，长堤及十三行繁华区域之大商店，莫不被劫一空，住户被害的更不计其数。

是时国会两院议员在广州的约 600 余人，连其眷属在千人以上，散居各处约有半数，均遭搜劫，自不待言。而集体住招待所的，则遭劫更甚。我当时住在士敏土厂内（停工已久，房子空闲）。该厂是议员招待所之一，前楼底层为大本营一部分卫队驻扎，目标更为显著。叛军于黎明前来此缴枪，战斗遂即发生，枪声密集。余于睡梦中惊醒，不知为何事，霎时枪弹由楼板穿入住室，既不敢下楼，又无处可避，较之前线尤觉危险，幸只穿入子弹三粒，未久枪声渐稀，战事即告停止。紧接着就是履声索索，荷枪士兵蜂拥上楼，厉声叱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答以国会议员。兵即说国会议员全不是好东西，是孙中山的走狗，助纣为虐，藏着枪枝没有，赶快交出。答以没有。也不再问，即行搜查，翻箱倒箧，见物就拿，一批刚走，一批又来，络绎不绝，不下十数起。先来此拿好的，后来的拿坏的，最后的见无物可拿，连书籍笔墨亦取去，甚至门帘蚊帐也席卷无遗。狡黠者更以未搜到钞票，大大失所望，乃搜检衣兜，居然得到一些，遂哈哈大笑。

劫完之后，遂将全楼所住议员和眷属不下六七十人，统统逼迫离开，令自觅居住之地，不愿走的，即鞭挞随之，于是在枪杆威胁之下，不得不俯首听命。

\* 作者时为南下国会议员。

对岸即东堤繁华之区，除荷枪军队外，关门闭户，阒无行人，我等怅怅无所之，即步行至西堤外投奔同乡暂避，以前虽然闻兵燹惨状，而今则亲受之矣！过江时只著单衣裤，并大褂无之，可称是妙手空空身无长物。

以后中山先生调集援兵不到，遂乘轮赴沪。陈炯明对护法议员素来仇视，但中山已离粤，卒未加害，即任其自由行动。议员乃纷纷离粤，不少投入北洋军阀之怀抱，未几演出贿选曹锟为大总统之丑剧，而第一届国会之寿命，在全国唾骂下，未久就消亡矣。

（1962年）

## 陈炯明统治广东时期的若干措施

王鸿鉴 黄绍声

陈炯明于1920年10月下旬莫荣新退出广州后，由东江率领粤军进入广州。在乘汽车进广州市时，与邓铿、魏邦平同乘一车，显得神态自得。当其合宴部属群雄，鹤翊金章，畅饮一堂（陈军将领聚饮，常佩鹤翊金章军服），正在兴高采烈之际，湘人洪兆麟，带有酒意，恃其功高，指骂魏邦平反复无耻，以致引起彼此吵骂，喧哗声、排解声，乱作一团，完全暴露出军阀跋扈骄横的丑态。陈氏回粤，打起粤人治粤的招牌，就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职，全系想实现其联省自治，亦即军阀割据的变相，而不是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准备北伐，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事业而奋斗。因而一系列的措施，都不能超出此范围。兹将其返粤至1921年冬闻见所得，略述如次。

陈炯明就兼广东省长职后，任古应芬为省长公署政务处长，任其表兄马育航（马原为陈氏之兄，后过继其母家改姓为马）为财政厅长。将市政公所改为公路处，委其堂弟陈觉民充任处长，所有公路、马路公产统由他管理和变卖处理。荐委邹鲁任两广盐运使仍兼义勇军总司令。派魏邦平继任广东全省警务处长兼广东省会警察厅长。现将陈炯明统治广东时期的政治经济措施详述如下。

### 一、继续使省议会开会

莫荣新率领残部退出广州时，将广东督军和省长印信交给省议会保管。省议会于陈炯明入穗后，得其同意，由琼山县选出的议员郑汝铎通知各议员到会开临时会议，由郑汝铎为临时主席。

所有政学系的议员如林正煊、成符孟、李锡贞、江景淹等均在逃，予以撤销。由其原籍的候补议员补充。表面上虽云尊重民意机关，其实陈氏对于由异派培植起来的省议会，极端轻视和压制。各议员在此环境，不敢以立法监督机关自居。对于陈炯明所交议案，无不通过，实质上等于陈氏的一傀儡机构。

## 二、地方自治的黑幕

陈炯明返粤后，积极推行其所谓联省自治，在本省则实行所谓地方自治，各属设立所谓地方自治的筹备机构。但所谓自治，只是按照军阀变相的意旨，找些土豪劣绅出来，假以名义和权威，压榨人民罢了。首先选择较大的县，如广属的东莞、顺德，西江的高要，北江的曲江，东江的惠阳、梅县，潮属的潮安，高州的茂名等县成立自治筹备会。进行县市参议员、区公所区长、乡镇公所乡镇长的选举。但搞一年多，施行较好的，没有几个县。多数是徒有其名，高挂自治的招牌，加重对人民的压榨。就我们所知道，他所委派筹备的人，类多是贪污分子，每勾结土豪，饮食酬酢，礼物馈送，公开贿赂，金钱竞选，风气所播，全省骚然。加上各县都有一二大姓和有势力者把持和包办，如从化全县以李、黄姓为大族，所有参议员和乡区镇长，多数系其本姓和亲友有关系的人充任。又台山、开平两县，以陈、李、黄、关、张为大姓，且各有丰厚祖尝和产业，最少有数万元的出息，此款类多给族人读书和运动做官及竞选地方参议员区、乡、镇长席位之用，以增加本姓的权势。更加东莞明伦堂每年出息，总在一二十万元以上，完全由大绅士把持〔前清翰林举人进士如徐维扬（按：原文如此。）等，民国后博士硕士如王宠惠兄弟等〕。所有地方自治机构当权的人员，多系豪绅所支持的人物，才能获选。其余琼山、澄迈的王姓，文昌的陈、林姓等，大概也是如此。陈炯明这样做作，仍有资产阶级民主的萌芽，比一些军阀，

到底是高明些。

### 三、民选县长的内幕

陈炯明就广东省长职后，于翌年（1921年）在省长公署下，设立选举县长筹备处，颁布民选县长章程，实现民选县长。他的实现民选县长，并非如建国大纲所规定，凡筹备自治之县，经中央查明后其县长应由民选那样，而是为避免国民党各派系和各军、师、旅、善后处长的保荐，而实现其独裁，树立拥护自己统治的计策。

在当时选举县长的内幕中，同陈氏一派争夺最厉害的，是孙中山一派国民党人。陈氏的实权在握，所派监选和主办的人员，多是他派系的人，因而在竞选时获票最多，奔走陈系门下的亦多得便利。同时每县推选候选县长三人，虽规定以票多为当选，但仍须经过省长公署的审查圈定，最后决定之权仍在陈氏。其次有些陈氏的力量，远不及孙系的国民党人时，复利用其亲信爪牙，来收买一些流氓，冒充民众去省长公署请愿，撤销对方的县长，或者极力攻击，使其不能上任。又或有纠纷时，利用司法的权力。如茂名县熊轼与梁冠民争选县长，梁比熊原多十票，梁系地主，比熊富有，但熊有政治背景，其子熊英在广东高审厅充当书记官长，熊以暴力谋夺得梁的十多条票，发生选举纠纷。梁起诉至高审厅，终至败诉，结果为熊轼获选茂名县长。又如琼山县参加竞选县长吴安邦，吴系随陈氏到漳州的爪牙，一时没有优缺安置，乃嘱他回原籍参加竞选县长，并授意主办者予以便利。当时有一金铺富商谢杰生参加竞选与吴争衡，耗去万多元，尽力收买选票。吴乃用种种欺压手段，攻击谢某目不识丁，串同省长公署的选举办事处人员，欺蒙压胁，多方恐吓，谢某空费万多元，卒让给吴安邦当选琼山县长。又连县人、邓铿的营长李睿，与走陈炯明路线的现任县长莫飞熊竞选县长，票数和权势相当，陈氏左

右为难，卒圈第三人刚在广东高师毕业的何诗迪为连县县长。更有台山县票数最多为刘栽甫、李海云、刘小云三人，都是国民党而非陈派系中人。陈派乃因是陈派落选，暗使爪牙廖某、伍某等，来广州收买数十名流氓向省长公署请愿，散发传单攻击刘某等，并向广东审判厅提起选举诉讼，企图撤销当选县长，而改选陈氏派系中人充当。类似事例，举不胜举。

#### 四、禁烟禁赌

陈炯明就粤军总司令兼广东省长职后，唯一政绩，是本其过去严禁烟赌的精神，不经过省议会开会讨论，毅然禁止桂系统治时期，经省议会通过的公开卖鸦片烟和开赌筹饷。将当时本市满街满巷和各县乡镇林立的摊馆银牌、“谈话室”等烟赌场扫荡一空。

陈氏严禁烟赌，确具决心。他授意粤军总司令部军法处长钟兆文（五华县人，与陈炯明同是广东公立法政学堂速成班毕业）对于烟赌案件重大者和军政人员触犯者，以军法从严处理。闻曾将一犯禁的赌棍张某、烟贩梁某枪毙示众，以博取人民信赖。所以当时本市一些烟赌之徒，为避免风头，多迁往沙面租界和郊外聚合赌、吹。军政界和富商、议员等躲到沙面或沙基深邃的楼房赌麻雀、牌九、掷骰及吹烟等。四乡的烟赌，则在暗僻巷尾屋角，放哨偷吸和聚赌，只是没有过去的明目张胆罢了。更有十分好吹、赌者，则走去澳门，度其醉生梦死的生活。

#### 五、司法事项

陈炯明就广东省长职后，委派陈融为广东高等审判厅长，陆国垣为广东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曹受坤为广州地方审判厅长，陆嗣曾为广州地方检察所检察长。孙中山回粤，恢复军政府，特任徐谦为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徐委派黄镇磐为广东检察厅

检察长，陆国垣被两广盐运使邹鲁调去另有任用。林云陔由上海回粤，陈融奉省长令准筹办广州市不动产登记局，因而委林云陔为登记局长，附设在广东高等审判厅内。陈炯明特命陈融统筹办理广东全省普设地方审检厅分庭事务。陈融于广州、澄海地方检察厅外，增设高要、曲江、惠阳、茂名、合浦、琼山等处地方审检厅。委派陈鸿慈、林熙畴、阮秉钧、翁翰中、区宗汉、罗延襄、董凌鸥等为地方审判厅长和检察长，各县除新会、顺德、中山、台山原有分庭外，其余一律成立分庭，定名为“某处地方审判厅某处分庭”。大县如中山、台山、新会、东莞、顺德、潮安设监督推检和推检，次县如阳江、清远、揭阳、梅县等分庭设推检和候补推检，其余各分庭一律设长驻推检一员。原有新会、顺德等分庭检察官，广州、澄海地检厅检察官、书记官、全省管狱员、监狱看守所长，仍由高检长黄镇磐委派。杨永泰移交的司法讲习班人员，经在高、地两所实习期满，陈融即派各员充当推检和候补推检及登记局办事员等。各县既通设法庭，除盗匪案件，依惩治盗匪条例，仍由各县公署，受总司令军法处审核处理外，所有民、刑事案件，一律划归法庭办理。在这一年多，关于司法事项，有比较重大者，详述如下：

### 1. 开办登记局

筹办广东全省不动产登记。先开办广州市登记局，附属在广东高等审判厅内。初期委林云陔为局长，陈鸿森、马宝森等为登记官。颁布广州市不动产登记章程，除铺底登记依广东都市土地登记及征税条例施行细则所定，依照广州市清理铺底顶手办法及登记简章办理之外，关于广州市土地所有权、永租权、典质权、长期批租、抵押权等登记及征税条例所定土地权利之设定，保存、移转、变更、消灭及处分之限制，均须登记之。

## 2. 颁布广州市清理铺底顶手办法条例

广州为华南商业都市，铺地寸土寸金，主客对于铺业铺底之争，向有所谓千百年换业主不换铺客的广东特别习惯，铺业一经认定有铺底，则业权显有一种物权的限制，无论上盖如何烧毁，铺客只要按照它所订的租约交纳租金，辗转顶手，业主不能过问。又远年所订租金，比较时值，距离甚远，纵要加租，仍受全市一律标准的限制，不能任意加租，以为取铺的理由。因此关于铺底的涉讼，双方均出死力以争胜负。高、地审厅的法官，和商会的执事，经手的律师、讼棍，均视此为最肥的利路。因漫无标准，容易滋生争论。而证据的取舍，事实的认定，决定之权，完全在法官。控诉第二审，上告第三审，发回重审，确定后再审，反复胜负，闹个不休。广东高等审判厅长陈融，因此与广东财政所长程天斗、广州市市长孙科，召集商界、省议会议员，商订广州市清理铺底顶手办法条例，呈请广东省长公署核准。三厅遂于1921年11月9日以布告第96号颁布广州市清理铺底顶手办法条例，把千百年商家与业主争执的纠纷，定有解决的标准。

## 3. 开办司法日刊

广州市登记局办理不动产和铺底登记，由《群报》按日将应登记事件公布，月须给《群报》登记告白费千多元。同时在审判中，发觉当事人提出的报纸内载告白事项，报纸本身有伪造情况。如《广州七十二行商报》，原属广州市有名稳健的商报，但发觉竟有把全张报纸依旧从新排印而插入告白一段，持以为重要证据，案经终审判决胜诉后，但又经刑事判决确定系属伪造，需要再审，推翻原案，增加讼累，类似事例，还有多起。高审厅长陈融，认为须由司法机关办理司法日刊，方能从根本上杜绝种种流弊。又徐谦任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大理院庭长卢兴原

长于英文，在香港充当律师有年，所谓西洋派，对于本国法律不甚钻研。广东高审厅厅长莫鸿秋、冯需、潘应荣等均有旧学问从事法官多年者，对卢原瞧不起，而卢等偏将高审厅第二审判决上告案件，予以废弃或撤销。莫等常指责大理院判决前法优于后法违背法律原则，颠倒是非。又所解释多不能自圆其说，更宜在司法日刊增加论辩栏，对有商榷事件，在该栏根据法理、事实，反复辩论，尽量发挥，期得情理之平。同时高审厅没收得时报家私、印刷机器等件，因于第七甫开办《司法日刊》，专登载司法公文、论载、主文、批语、判词、告白、杂录等，日出报纸两大张，所有登记和一切买卖法律行为告白等均须登载该刊，始能认为有合法的证据。委派高审厅民刑庭推事，地审厅长、庭长、推事等为编辑，邓惠芳为常务兼经理。广州市报界公会各报，联合向广东省长公署控诉，谓广东高审厅垄断告白生意，后改为登载各报亦得视为证据之一种，解决了争执，但从此各报告白收入颇有减少。

#### 4. 关于法律援用问题

本省自桂系莫荣新治粤，委政学系徐傅霖为广东高等审判厅长，梁炎芳为高检厅检察长，关于司法事项即与北京政府司法部断绝关系，岑春煊的军政府司法部、大理院，和孙中山恢复的军政府及就大总统后的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对于法律的援用，多用明文公布，在民事援用大清律，采用现行例，在刑事仍照新刑律而为审判，其余对北京政府所公布的法律、命令多不采用。大理院的解释和判例，只作为参考，但军政府的大理院和司法部，因军事时期，人事变迁无常，法律、命令、判例、解释，多未发表，适用时每发生问题。但邮政系由英人管理，本省邮政局与北京政府邮政总局及交通部相通，北京政府于1921年10月12日公布的邮政条例，其中有不少条文当时经广东邮政总局转

谘大总统对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徐谦多方商讨，卒准援用。

## 六、教育文化

陈炯明就省长兼职后，推动教育文化工作的改进，设立广东教育委员会，任陈独秀在北京大学的学生陈公博任广东宣讲人员养成所长，于本市水母湾木排头办一间《群报》。陈独秀、陈公博与陈秋霖等在《群报》大发表其政治兼及教育新文化等理论，发生很大的影响。在此同时，基督教风极盛，教会学校空前发展。大理院长兼管司法行政事务徐谦于每周星期六晚或星期日下午，亲与主任胡雅觉率同全体职员和牧师黄旭升及许多教友在长堤青年会开会讨论时事，兼有关主义和耶教文化等问题，徐在未就大理院长职前，常与钮永建等发表基督教救国的谈话。就职后还与孙科、伍朝枢、钟秀南等四人为花地培英中学、小学筹建河南白蚬岗校舍的董事，分函省内外绅商学军政界募款。陈炯明首捐一千元为之倡。岭南大学在钟荣光主持下，更向海外教会富商，募捐巨款，建筑教室、宿舍和购置设备，为官办学校所无。真光、培英、培道等校在长堤光楼设一理财部，推美教士方约翰为部长，宣传大事扩充，宗教教育，可谓盛极一时。

## 七、经济金融

陈炯明再度治粤，严禁烟赌、取消厘金等措施，博得当时人民的称誉。可是这三项系省库的巨大收入，桂系统治时期，省议会通过打烟赌，理由系为维持军政饷项的巨大支出，陈炯明不经过省议会讨论通过，毅然施禁和取消厘金。当粤军回粤，军队的整编和扩充，行政的大量支出，如何筹垫，没有整个的预算计划。因此把龙、莫统治时期，除此三项外，所有屠牛捐、垃圾捐等等一切杂税，均保留继续征收，更由公路处长陈觉民、市政厅市长

孙科尽量变卖所有公产、牵涉民产，保证去想办法筹款。又举办广州市铺底登记、不动产土地登记并推行到全省，大事搜刮仍属不敷，乃授意造币厂长和广东省银行长以含银量六七成，减低至四五成大量铸出低质的双毫，纸币一毫二毫至五元滥发，无可统计。但用种种方法，赤字仍属甚巨。乃向港富商利某和总商会董事叶兰泉及澳门富商在清朝以开山铺票起家的卢九等借贷巨款，以资维持。在该时期，香港汇丰银行陈廉伯，三大公司，如先施公司马应彪、大新公司蔡昌、真光公司黄在朝等更与陈炯明有所联络。因此洋货大量涌人，广东的金融，无形操纵在港澳富商手里。

(1965年)

## 我被陈炯明叛军拘禁的一段经历

杭 豹 \*

1922年6月间，我在广州大本营参谋本部当副官，晚间宿在濠畔街浙绍会馆，早出晚归。几天以前就听说孙中山先生（当时任非常大总统）要陈炯明率师北伐，而陈则与北洋军阀曹锟、吴佩孚勾结，高唱联省自治，借口财政困难，短发北伐军军需补给，百般留难（陈是广东省长又是粤军总司令），孙先生则要统一中国，坚决北伐，双方抵牾。传说陈将有异动，想取消总统，赶走孙先生，形势日趋紧张。

有一天深夜，我已在睡觉，听到街上有部队行动。嗣又听到有军号声，正疑虑间，旋闻枪声、炮声，似在总统府附近。其时天已微明，忙穿衣上街去看。乃四处布有步哨，不让通行，随即折回寓处，枪炮声仍未停止，总统府方向火光烛天。思忖莫非陈炯明叛变，事情糟透了。大约7时以后，枪炮声渐渐停止，我跑出街头，步哨已撤去，随沿惠爱路向总统府去看，仍有步哨阻挡不能再进，望见总统府大门已被炮毁，天桥亦被打断。再去参谋本部，则大门洞开，已被抢过，图书文件撒满一地，空无一人。沿路商店闭户，行人稀少。想打听孙先生下落，也无从打听。只得回到寓所再探消息。后见报上说陈炯明实行兵谏（推说是陈的部下做的），要孙总统下野，实行联省自治。后来听说孙先生已在白鹅潭海军兵舰上，未遭毒手。第二天下午珠江长堤一带又有炮声，乃是海军舰队向叛军轰击，要叛军投降，店铺又纷纷闭门。打听参谋部人员也不知去向。那时“外江佬”被歧视，一听

\* 作者时任大本营参谋本部副官。

是“外江佬”口音到处遭受白眼，没人理睬。我那时并未估到要遭难，身上未带分文，只得向会馆同乡告贷。后来打听到参谋部次长蒋尊簋先生（总长是李协和先生，蒋号伯器）在白鹅潭兵舰上，我就坐一小艇向兵舰上去找，没有找到，遇见了陈肇英（他过去是浙军司令，其时在大本营），他告诉我一些大概情况，说孙先生要许崇智部队从江西撤回来讨伐陈炯明，事情还有希望，叫我暂在广州看情况，不要离开，又给我一点零用钱糊口。我回来过了几天又去探听消息，据说许已在江西向广州旋师，陈炯明正派部队往韶关抗拒。陈肇英受孙先生委任为别动队司令，要在北江组织队伍响应许军。他知道我先前为蒋伯器先生在北江收编有民军队伍（蒋是滇黔赣联军司令，仅有名号而无基本队伍），要我发动这支民军在北江起义响应许军，我就答应下来。我两次去白鹅潭，发觉有人对我跟踪。不多几天这支民军果然在琶江附近炸毁了粤汉铁路（这是叛军主要交通线），这是在报上看到的，我派去的人未回，还没有接到正式报告。

一天早上我还未起床，就听到房门打得很急，不待我去开门房门就被撞开，进来一批持枪兵士，还有几个穿便衣的，把我绑上，随即翻箱倒柜，到处搜检（都是朋友的东西），也搜不出什么违禁东西，后来在我衣袋内找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蒋伯器和我自己的姓名，这字条是我第一次去白鹅潭时因语言不通，写给舰上卫兵看的，忘记毁去，但也没有其他字眼在内，不能作为把柄。后来又在桌上的玻璃板下面找到一张名单，上面写有几处民军的枪支人数以及首领的姓名，这名单，乃是我朋友写的，还在他们叛变以前的事，上面记有日期。那个穿便衣的就指使枪兵把我连字条名单一起押走，我一个助手朋友高玉亭，刚走上扶梯，也被他们一同带走。来到天字码头后面一所房内，抬头一看，挂着军警稽查处牌子，我才明白逮捕我的就是他们。我和高被关在一个黑暗的地方里，内有十多人，有几个是华侨，听他们口气也

像是因为这次事变而被捕的。我在这里一天一晚没有饭吃，第二天早上又把我和高钉上脚镣，押上汽车，向东开驶，一直到白云山脚被枪兵押下车来，向山上走去，我不知他们要怎样对待我，且随他去吧。爬过几个高坡到了山腰，路旁有一茅亭，亭中系着几个人，山上面还有一座庙宇，都有枪兵站岗守卫，我和高就被押进这茅亭里，里面有5个人都钉有脚镣，用一条铁链往脚镣中贯穿起来，两头栓在两根柱子上面，有4个枪兵看守，我和高也照样被穿在这铁链上。一直到下午4点才有人送饭来，7人吃了一餐默默无言，也不便说话。

这茅亭，四面绝无栏杆，地板下面是架空的虚谷，一条小溪流向山下。广东天气温暖，我们身上都穿的单衣胶绸衫，但一到夜晚谷内的山风吹下来，溪里的寒气冲上来，实在受不住。每天饭后大小便一次，连串的由枪兵押着同去，十分不便。饭是一天两餐，时冷时热，有一点菜汤下饭，有时还是残羹。

几天以后，我被押着到上面庙宇去，里面是法庭模样，有法官坐着，旁边有记录人员，问过姓名以后，问我“外江佬”都走啦，你为什么还不走。我说钱被抢光了，没有路费走不动身。他说你身上那张字条是什么意思。我说蒋伯器是我长官又是同乡，想找他帮忙路费。他又说那张名单做什么用的，你想搞捣乱活动吗？我说这张名单不是我写的，可对笔迹，并且这事是一个月以前的事，可以调查。问毕还押原处，穿上铁链。又叫高玉亭去问了一次，大概照我所说，问毕还押，不再审讯，我想大概在搜寻证据吧。过了几天又有两人先后被押解上来穿在铁链上，成为9人了。

10多天以后，慢慢的互相偷谈起来，知道内中一个是洪兆麟部的副官（洪是叛军师长），因同情孙先生而运动部队反正失败被捕的，还有一个是华侨从香港来，被搜出炸药而被捕的，其他5人也同样在反陈的情况下被捕，大家无言会意，认为难友，

彼此照顾，晚上冷的时候，就背靠背睡觉。日子久了，和送饭的炊事员熟识了，就恳求他们找到几张麻袋铺在地下，晚上半垫半盖。从士兵的谈话中知道这是陈炯光的司令部军法处。

后来我们9个人中每天被他们提出去问话，去了总不见回来。山底下枪声响处，炊事员或者是个善良士兵，向我们打手势，意思是说下面枪毙人啦。后来只剩下我和高两人，我们估计免不了死在一起的了。有一天我们正在商量写一块木牌，把姓名写在木牌上，托炊事员在我们死后，把木牌插在土堆上，免得找不到尸身（他们毙人没有棺木，只刨土坑埋掉，也不布告姓名罪状，近于谋杀）。这时有人来提我和高，手里拿着一卷字条，把我们绑上，有枪兵押解向山下走去，望见一向枪毙人的草坪边了。我思想上泛起一阵阵的波浪，心想这是死的时候了，最好枪弹从后脑壳打来，我譬如受到袭击，没有痛苦的死去；又想起金圣叹在杀头的时候感到痛快，如果在今天不知怎样；又想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那首诗来；又想到七十二烈士的就义。思潮的波动，复杂极了。又想到我被这叛徒谋害了，而你这叛徒也终究受到惩罚，同样会死去，等等。最后我挺直脖子，增加了勇气向前走。

出乎我意料之外，经过草坪，不叫我站住，还是往下走，一直到最后的平地，有几辆汽车停着。那个士兵把我两人押上一辆汽车，向市区驶去，我心里嘀咕着这是什么把戏？经过七十二烈士墓、东山、长堤、双门底到司后街，在一所墙门外停住了，外面没牌子，看不出是什么所在，里面是四面木栅栏的一所牢房，关着二三十人都钉有脚镣，我和高玉亭就被他们关进去了。难友中有一个和我认识的萧芹，他是总统府参军处的副官，他告诉我，这是看守所，我也顾不得问他是哪个机构的看守所。心想从白云山转移到看守所（市区）大概谋害不掉我了吧。

在看守所里虽然同样有人监视着，比起白云山的茅亭自由多

了，脚镣仍然在，已不用铁链贯穿一起了，也受不到风吹雨打，地面上也铺些稻草，夜间没有被盖也顶得住。每天两餐饭吃，也是热的，看守员兵也没有像茅亭内那样杀气腾腾。

我和外界隔绝已有一个多月了，有一天我问看守能不能让我通个信给朋友送点替换衣服，借点钱用。承他答应了，我随即写一便条托他带给我的朋友俞则民（俞是魏邦平的军需处长），俞知道我在看守所，随即带回几块毫洋给我。过一天又送一套短衣来，嘱我安心，他在外面营救我。后来上海方面也知道我被捕，就托褚辅成（联省自治派）打电给陈炯明询问。又经俞则民托魏邦平讲话（魏是粤军师长，陈正要拉拢他），我遂被释放出来。

我自被捕至释放前后两个多月，只审讯过一次，糊里糊涂进牢，又糊里糊涂出来。而糊里糊涂被谋杀的人，又不知有多少，想起那些无名烈士，我不禁怆怀悲悼，泣涕难言矣。

我出看守所以后，知道孙先生已去上海，我不能在粤停留，即去香港转轮赴上海。

(1963年)

## 关于叶剑英曾任海军陆战队营长的辨正

胡应球 \*

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蒙难，这一段历史后人撰写者当然很多，其中有些人不是亲历、亲闻、亲见而叙述的，乃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讹传亦成事实，现在举一例以言之。

1921年孙中山认为护法舰队的权力集中于闽派海军将士手上，在筹划改组北洋海军内部，同时海军陆战队也同样不服从调动。孙中山欲增强海军陆战队内部的实力，向陈炯明提议委任叶剑英为海军陆战队营长，请陈拨给一营兵由叶带领。同床异梦的陈炯明，当然很明白而不会支持的，但碍于总统之命令，于是阳奉阴违，在陈军内部的军队委叶剑英为海军陆战队营长，仍隶属于陆军总部指挥，不归海军陆战队管辖。叶是梅县人，但与海陆丰派的军人，如陈炯明辈不相融洽，而与参谋长邓铿相友善，所以海陆丰派军人私运鸦片为邓铿破获一案，对叶营长无与焉。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军围攻观音山，企图伤害孙大总统，当时叶剑英所部没有驻防广州，当然没有参加此役战斗。不久以后，孙中山率舰队驻守黄埔，温树德率舰叛变，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带领陆战队攻入长洲炮台，使孙中山受困，而冲入白鹅潭。当时叶剑英营名义上是陆战队，实际上不归孙祥夫司令调动，当然也没有参加这一战斗。近来写史料的人仅凭叶帅曾任海军陆战队营长一事，联系到孙中山由观音山脱险的事实，竟然说：“叶营驻扎在观音山保护孙大总统”，又说：“剑英个人保护孙先生出走落下永丰舰。”试想陆战队会执行总统卫士营的任务

\* 作者时任永丰舰二副。

吗？当营长的职责能够个人离开队伍去保护总统吗？他们是为了推崇叶帅，表扬其功绩的观念出发而撰写文章的。但另有一个反方面却说出：陆战队司令率领陆战营攻打长洲，陆战营的行动是叛逆，这就为叶营长抹黑了，历史要正视事实，事实要合乎情理的。

叶剑英元帅一生光明伟大，国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一致尊敬其盖世的丰功伟绩，笔者有感于此，特写此文，为海军陆战队营长一职辨正。

(1987年)

## 关于卢焘率滇军入桂的回忆

黄梦年\*

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桂林组织北伐，当时有粤军、赣军、湘军、滇军、黔军云集邕柳桂各地。其后各军各自为谋各率所部回归各省区自寻出路去了。北伐事业的失败，虽则说是广东方面陈炯明加以阻挠有以致之，亦由于各军并非有北伐雄心和革命事业的大志。他们也不过借着中山先生北伐的大旗来做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而已。当中如滇军胡若愚、李友勋、胡瑛等部就在1921年冬由唐继尧率领回到云南夺取顾品珍的政权，以致演变成卢焘率滇军入桂事。

其次说黔军，确是卢焘派遣入广西随同中山先生北伐的。当时卢派第二旅旅长谷正伦、第四旅旅长胡瑛（胡系滇人，所部亦多滇中子弟）分两路进入广西。惜乎当日卢焘未亲自率领该两旅入广西，如果亲自率领的话，广西当日局势必大起变化，不应在其后率滇军入桂时作昙花一现。黔军分两路入广西，一路是胡瑛率领，由贵州黄草坝进入百色，这一旅的人数武器是相当充实的，不过他在暑热天远道而来，行至百色，官兵因水土不服染疾的在半数以上，死亡亦多有，因之实力锐减。到柳州时人数已不多，滇人回滇，黔人回黔，胡瑛在颓丧之余只得随滇军行动去了，武器也给了滇军。其次是谷正伦旅，他由西江进入广西庆远、柳州时，解决了陆荣廷系的贲克昭旅，实力就膨大了起来。他把所部王天培、彭汉章扩充成为两旅，而自称为黔军总司令（是不是中山先生委任我不知道），在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过了一

\* 作者当时在卢焘幕中任职。

时，他的野心就勃发起来，在滇军回滇时，黔军就回黔去争取省政。其部下王天培与驻在湖南常德一带的袁祖铭有旧。在这时袁祖铭也就由湘西回贵州争省政。

卢焘本是广西宜北县人。因王文华与袁祖铭争夺省政时两不相下，结果他二人自愿将政权交给卢焘去主持，卢焘竟以一个外省人主持了贵州的军政。当时卢是第一旅旅长，隶属王文华。第二旅是谷正伦，第三旅是张春甫，第四旅是胡瑛，第五旅是何应钦（由地方团队编成，实力很差），他们隶属关系我不清楚，卢焘当总司令兼省长时期，他们都是受卢节制的，何应钦更兼卢的参谋长。当时，卢看到袁、谷这两支人马同入贵州，就一筹莫展，准备袁、谷二人谁先入到贵阳，他就将省政交谁，由和平得来和平送出。卢是早打定了主意的（卢曾亲口对我说）。我本人为着广西在陆、谭倒后，省政虽有马君武先生主持，但命令不出南宁三里，民不聊生，乱象益加严重，是以有披发走贵州之举，因谷正伦回黔之便，就随尾而行。当时谷率王、彭两旅入到贵州下江县时，谷正伦先率卫队一连，进驻下江的西山地方，其大部分驻下江县城。不意事出非常，王、彭两旅布告反谷了，他们拥护袁祖铭回黔主政。谷得知讯息，即连夜率卫队逃进贵阳，这时何应钦是与袁、谷不和的，自己力量又薄弱，只得弃职逃走了。谷正伦到贵阳后，即联络张春甫布置抵抗，进兵龙里县城（距贵阳60里）以待王、彭到达。那时王、彭兵抵独山（距龙里约三日程），看到谷、张从事抵御，王请我为代表先行见卢，要卢劝张息兵。我就借此先行，到贵阳，将前事对卢说明。

卢本是一位好好先生，恐两军兵联祸结，糜烂地方，危害人民，因劝谷、张离开贵阳。谷、张亦以力量不敌，不能抵袁、王之众，只得出走乌江。袁、王两部进入贵阳后，卢即以两颗印信送给袁，袁却不接受。揣其意是以谷、张两部仍在，上台又下台，于面子有关，袁因是请卢继续摄理省政，推三阻四地闹了几

日，袁请卢暂维持三个月后再谈。

事情还不只此。唐继尧回云南之后，顾品珍死了，其部属三杨（希闵、如轩、池生）、范（石生）、蒋（光亮）五个团在顾死后，无人领导，迫得出走贵州。此时兵抵安顺，如谷、张二人与之拉拢，局势发展如何，谁也不敢断言。因此，袁只得请卢暂维持三个月，卢亦只得接受。一日杨希闵偕同范石生来贵阳观风色，并对卢（杨、范与卢是同学）表示愿以实力相助，抵抗袁、王，巩固黔政。但卢不愿以个人的得失遗累黔民，就谢绝了范、杨之请。有一日，范请我谈话，要我劝卢接受其请，说袁、王是不难解决的。我说，我此之来，亦欲请卢回广西主政，卢尚且不允，我说如两位有意助卢，何不为助卢回桂，倒是一个折中的办法，不知二位有意否？范说既有此事，我们从两方面去进行罢，卢愿主黔则主黔，不愿主黔则主桂，亦未尝不可，我们都可以帮助做到的。其后，我将范、杨之意转卢，并说我们何不借其力，以救广西的人民呢？卢说，我老实对你说，他们的来意我早已知道，他们为什么愿意为我卖力，实则他们被唐继尧驱走出来之后，没有给养地区，饥军是不能久持的，所以他们急于要人来领导，我何必为他人作嫁，将来领导了起来，事情就难于处置了（卢是指以后送出去的话）。今日他们饥则来就，明日他们饱则扬去，我岂不是获罪人民吗？我打算苟全性命，不求闻达。我当时见卢如此回绝，便说，因你是个广西人，乡邦多难，你忍心看着广西人民罹于浩劫吗？你回广西省，就知道人民所受的痛苦，恐怕你也不肯坐视吧。

经多日向卢陈说，并得袁祖铭愿以一旅相助，卢才允就滇黔桂联军的事，布置就绪，卢又坚持不要袁的部队，只要他给予军需弹药的帮助。所以滇黔桂联军的名号，只有滇军，桂军只是卢焘一人，黔军是没有的。事情大体的决定了，卢即派我到湖南去与赵恒惕接洽，要赵给予援助，如将来广西平静之后，联省自治

可望成功。再要我到上海去找张其煌，要他向吴佩孚接洽，请予以援助。我到湖南见赵，赵在口头上说明，如要我帮助的话，请以后给我通知，我一定办到。我离湖南到了上海去找张其煌，请他也给卢援助，卢的交代我都办到了。卢当日率领滇军五个团，到榕江时，才正式就了滇黔桂联军总司令职。军入庆远下柳州，与自治军林俊廷战于来宾。林大败，逃去南宁（林当时是驻在柳州），余存不过千余人。卢请杨等向南宁进军，杨等推诿不动。卢对杨说，此后滇军的饷械，或回云南，都由广西负完全责任，杨等仍不动。到柳州后杨等派人与孙中山先生取得联络。其后，中山先生也派人到梧州来洽商，条件就绪，事情就发表了。杨、范请卢一同下粤，卢不接纳说，我是回来救广西人民的，不是来做官的，诸位如有高就，我就去职好了。因此，卢就即日取消联军总司令名号，与杨、范等回到梧州，杨希闵就称为滇军总司令浩浩荡荡地杀到广东去了。我在梧州见了卢焘，我与他说明我出湖南一段经过，并说卢的处置不当。我说，你若不去掉你的名义，同杨、范到了广东，你请到大元帅的命令也可达到主桂的目的，你又何苦一意孤行呢？他也说给我离贵阳后的情况和作战的经过，在其时如要取得广西只要两团的部队就可以完成大业。李、黄、白只是以一营的兵力起家的，惜乎卢这个人真是不慕名利、淡泊为怀的人。他到广州去赋闲，我也到澳门赋闲去了。

（1962年）

## 滇军经桂东下讨陈的经过

杨右丞\*

1921年9月前后，中山先生曾数次致电西南各省，号召西南各省联合北伐。是时，滇军总司令为顾品珍，曾回电响应号召，表示愿出师北伐，并请中山先生指示行军路线。中山先生即派张佐臣前来联系，滇军当即准备北伐，并组成北伐先遣军，司令为范石生。

然而，军至罗平，唐继尧率部回滇，与顾品珍争执滇省牛耳。在唐、顾争滇之战中，总司令顾品珍被杀。副总司令张开儒由宜良赶回，率所余部队由曲靖、宣威经免场至贵州盘县。第三天，杨如轩（第四旅旅长）亦率部队由八大河（罗平）退至盘县。在盘县稍作休整后，至镇宁整编，决定取道贵州、广西进行北伐。作出决定后，即向广西进军。

杨希闵（第三旅旅长）率杨池生（第一旅旅长）、杨如轩（第四旅旅长）、艾党生（第五旅旅长）等部走独山进荔波（广西）；范石生（第八旅旅长）率蒋光亮（第七旅旅长）等部由鸡场向荔波前进。然范、蒋因与前黔军总司令卢焘（广西人）有秘密联系，卢焘企图利用滇军武力帮他统一广西，以遂其图桂之政治野心，并允范事成之日，委范为广西省省长。范在镇宁改编后即派其部属第十六团团长杨复光为代表，前往贵阳与卢焘联系。杨复光走后，团长职务即由我担任。军至八洛，范、蒋即停止前进，等候卢焘。俟卢到后，范、蒋即向长安（广西）进发。

杨希闵等一路到荔波后，又继续前进。至怀远，桂军驻南宁

\* 作者时为滇军团长。

总司令林俊廷以为滇军意在图桂，遂令所部堵击，滇桂两军在怀远发生战斗。后滇军派人前往交涉，说明此行并无别意，系假道北伐，目前只是路过，略为休整后，即离开广西。经交涉后，林俊廷即率所部撤退，杨希闵等即率部到鹿寨暂停休整。

范石生、蒋光亮等一路由长安行军至柳城时，林俊廷部前来堵击，双方在柳城展开战斗，由我率第十六团以武力攻下柳城，随即乘胜前进，猛力攻下柳州。桂军柳州守将刘玉山（广西柳江道警备司令）不得不订城下之盟，并表示愿与滇军合作，一齐东下。驻军柳州后，一面屯兵休整，一面派我带队前往鹿寨，将杨希闵等接回柳州议事。是时为1922年夏。

在向广西进军中，北方和广东政局发生变化。在直（曹锟、吴佩孚）、奉（张作霖）战争中直系胜利后，曹、吴想垄断全国权力，遂支持陈炯明叛变。1922年6月陈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先生被迫移驻上海。时驻粤滇军溃散，一部分由李根源率领撤至海南岛；另一部分由朱培德率领撤至桂林。

孙中山先生到上海后，派总统府上校参军寸性奇去桂林与朱培德部联系。然行至柳州与杨希闵、范石生等巧遇，寸性奇即将中山先生意图告知杨、范等，指示滇军东下讨伐陈逆炯明。滇军杨、范两路在柳州会合后，因代总司令张开儒与各旅长尤其是三杨间有矛盾。于是，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范石生、蒋光亮等五大旅长，在八旅十六团团部以开会议事为名邀请张开儒出席。会上五旅长闭口不言，与会二团长（韦降魔、朱世贵）则斥责张开儒。斯时，下级军官与士兵不明真相，群起哗然，几出乱子。幸而我前往劝阻，始未及乱。会上，张开儒下台，并推举杨希闵为滇军总指挥，统率全军。

第五旅旅长艾党生原系张开儒亲信，这时被解除实权，扣留在一旅旅部。艾所属部队，一团归杨池生统率，另一团则由杨如轩统率。

此时之广西，政局颇为混乱，一些人招兵买马，坐地为王，均称为自治军总司令。滇军进驻柳州，一驻二月有余，卡住北上桂林和南下南宁的咽喉。桂军一看滇军按兵不动，虎视南宁，颇有图桂之嫌。于是，林俊廷及各地自治军群起围攻滇军，步步进逼柳州，情况异常紧急。滇军出于自卫，决定由杨希闵亲率杨池生、杨如轩等部南下出击来宾，范、蒋则暂守柳州。

出击来宾时，以原桂军柳州守将刘玉山为前锋，负向导、开路及架设电话联络等职责，人熟地熟，官兵奋战，来宾之战告捷。来宾得胜，杨池生、杨如轩等意欲乘胜直取南宁，颇有图桂野心。后杨希闵谆谆告诫，始将两杨说服撤兵。然两杨与范有矛盾，想回兵柳州解决范石生。殊知，范亦老奸巨猾者，来一个不告而退，自柳州撤出，沿江而下，柳州遂为桂军自治军韩彩辉、韩彩凤占领。两杨不知范已不告而退，因而围兵柳州时挨了韩氏兄弟一闷棍，碰了钉子后即撤至石龙。此时范亦率部退至石龙。约于9月，双方在石龙巧合，石龙会师后，决议坚持东下，进军广东。

前进至宣武，攻下宣武城，桂军守将陈天太表示原与滇军联合东下伐陈，至勒马滩即分兵两路东进：杨希闵率杨池生、杨如轩等部从贵县到桂平；范石生、蒋光亮率本部及杨希闵部韦降魔团护船经大藤峡至桂平，两路沿江前进。杨希闵一路在桂平城西南约30里岑头村驻军，范石生一路则在桂平城西北距城五、六里山下扎营。林俊廷一看滇军又围住桂平，意图难测，就每天派兵攻打岑头村，窥探动静。

为了解除图桂嫌疑，杨希闵决定不作停留，继续东进。然范石生曾受卢焘引诱，名为东下，伺机图桂是实。此时即谰言广东方面船坚炮利，进恐无益，遂按兵不动。滇军上级将领意见发生分歧，进乎？退乎？亟待决策。总指挥杨希闵当机立断，亲至范处，正言相告，备述利弊，并取得范部主力第十五、十六两团负

责人杨廷培、杨钟弼同意，决定东进。范石生一则因滇军实力大部为杨希闵掌握，再则自己的主力第十五、十六两团负责人已同意东进，只好接受总指挥意见。

作出决定后，总指挥杨希闵即率警卫数人进桂平城与桂军守将刘达庆（桂平自治军司令，刘玉山之兄）见面，告知滇军志在伐陈，实无歹意。开会协商后，刘达庆表示愿助滇军东下，共讨陈逆，并立即给滇军准备好船只给养，部队遂离桂平沿大黄江而下。

为了壮声威，振士气，滇桂两军随即在白马誓师，联合东下讨伐陈炯明。当时滇军代表为杨希闵，桂军方面有刘达庆、刘玉山、陈天太等人。

卢焘则一直以滇桂联军总司令为名（徒有虚名，并无实权）跟随滇军，当时曾将我团调至联军司令部负责警卫工作。白马誓师后，卢之图桂野心已成泡影，再随滇军东下实无多大意义，行军至蒙江圩，即由水路到香港当寓公去了。

白马誓师时，杨希闵即派夏声（杨之副官长）、周兴权、那博夫等为代表去上海找孙中山先生联系。后滇军攻到梧州时（是年腊月中旬），即接到中山先生派人送来委任状，任命杨希闵为滇军总司令。

白马誓师后，军至蒙江圩，陈炯明一看情势不妙，即派人送来港币12万元，企图以重贿拉拢滇军将领，破坏联军东下计划，但滇军并未因此改变东下决定。

桂军驻藤县师长刘震寰，本是倒向陈炯明的，这时滇军东下，声威颇壮，遂派人来与滇军联系，表示愿与合作。而动摇于各军阀之间的沈鸿英，拥有一定的实力，陈炯明叛变后，沈已靠拢陈逆，这时亦倒戈与滇军合作。

滇桂军势若破竹，马不停蹄，直扑梧州重镇。时粤军驻梧州独立旅长熊略及杨坤如等，颇识时务，不战而退，滇军遂于是年

腊月中旬占领梧州。

滇军作战，向称勇猛，与桂军联合，士气更振。陈炯明部又分崩离析，因而联军长驱直入，仅在六步（广东）与陈炯明部发生战斗。然仅接战三四小时，陈军即溃退。自此，毫无阻拦，直捣广州，陈军退守惠州，次年正月初二联军进占广州。

1923年春，陈炯明为滇桂联军所败，孙中山先生再到广州，被誉为大元帅。

#### 附记：

(1) 滇军第五旅旅长艾党生在代总司令张开儒为三杨、范、蒋五旅长搞下台后，因艾系张之亲信，遂被解除实权，软禁在杨池生（第一旅）旅部，后滇军部队离桂平下大黄江后，被杨池生所害。

(2) 滇军代总司令张开儒被搞下台后，就在刘玉山指挥部闲居。后滇军至濛江圩时，张因接到孙中山先生派来代表叶夏声送来的委任状，即由刘玉山指挥部（平南）乘船至濛江圩，邀三杨会面。彼此见面后，杨池生、杨如轩即拂袖而退，到后面内房去了。张开儒就对杨希闵表示，以接到中山先生委任状，任张为滇桂联军总司令，任命杨为滇军总司令，任命许崇智为粤军总司令。张开儒想乘此机会察看三杨的态度。殊知话音甫落，杨如轩就唱起隔壁戏：“还在做梦！该醒醒啦！”并告诉刘玉山的副官长说：叫他们两个（指张开儒和叶夏声）明天早晨七点以前滚开，否则……当然，张、叶两人只得“遵命”离开。

后滇军至梧州，张即由水路去香港。1923年春中山先生回到广州任大元帅时，张开儒亦到广州，并任大元帅府参军长。

（1964年）

## 滇军朱培德部入粤片断

卓仁机\*

1916年（民国5年），蔡锷在云南起义，率领护国第一军北上四川，李烈钧另率护国第二军南下两广。朱培德原是云南督军唐继尧所部营长，护国起义后，拨归李烈钧第二军节制，随第二军南下两广。朱营是滇军中装备和训练比较好的部队。第二军南出广西百色，朱营为前卫部队，行至云南省与广西省百色县属交界的山地时，突中广东督军龙济光之兄龙觐光部的伏击。龙部约有五个营兵力，成马掌形把朱部压缩在一个山谷里，情势万分危急。朱培德临危不乱，指挥部队原地掩蔽还击，等侦察清楚敌人的火力后，集中兵力击敌最弱的一点，卒之突破敌阵。适后续部队赶至，遂会合一起，继续追击龙部，反危为胜，迫龙部退百色。广西督军陆荣廷与龙觐光为儿女亲家。龙部从广东开驻百色是广东督军龙济光与陆荣廷共同商定的部署，意在监视滇军，并伺机攻打云南。及至滇军大败龙部后，陆荣廷见势不妙，就看风转舵，也宣布起义，反把退至百色的龙觐光部缴械。滇军由此长驱直入，部队经南宁直下广东肇庆。朱培德因百色之役有功，擢升为团长。

护国军经两月余的行军进抵肇庆后，出三水河口，经清远转入琶江圩集中。然后，李烈钧派盛荣超一旅乘火车北上攻打曲江，朱培德团则留守源潭，阻击广州北上之济军。盛旅乘火车进抵曲江车站后，即对曲江守敌镇守使朱福全所部展开攻击。滇军架设在车站上的德制退管山炮，第一炮击中城北帽子峰碉堡，第

\* 作者系粤军第一师第一旅旅长。

二、三炮又击中城内镇守使衙门和守兵要害，吓得朱福全慌忙率领部队向乐昌坪石溃逃，至乐昌后自行溃散。盛旅攻占曲江后回师源潭，会同朱培德部迎攻北进源潭之敌。源潭一带尽是高山峻岭，济军攻势锐猛，朱部与其逐个山头进行争夺，经两天两夜战斗，才把济军攻势打垮。济军被迫向南溃退，朱一直率部当先追击。济军退至花县狮岭，续作抵抗。李烈钧误以为济军把主力设置在狮岭，为避免打硬仗，消耗部队战斗力，便调主力朱培德团，经福源水下花县县城，沿黄婆洞、三元里一线，包抄济军后路，占领广州；而令参谋长成桃指挥盛荣超旅和赵德裕团沿铁路线，经银盏坳、军田直攻击狮岭。但济军只在狮岭略作抵抗，又向江村、高塘撤退。滇军尾追至高塘、江村。参谋长成桃过分轻敌，没等整顿好部队，便陆续投入战斗。滇军一鼓作气，冲过江村河，一直追至石井兵工厂，却不料济军在石井凭借坚固工事，顽强抗击。滇军伤亡颇大。成桃这时才重新集结部队，再行攻击，但是部队锐气已经受挫，又兼远离后方，弹药一时接济不上，无法攻下。李烈钧见势不妙，只得把已攻占花县城的朱培德一团调来江村河北岸布防，把进攻石井兵工厂之盛荣超旅等部队调回江村镇整顿补充。其时，桂军由西江出击石围塘济军，也屡攻不下。双方战事相持两月有余。不久，袁世凯病死，段祺瑞为保全龙济光实力，把龙调往琼崖，战事遂告结束。这时朱培德升任为旅长。

护国战争结束后，朱旅两团分驻四会、广宁一带，朱本人则带领护国时期入粤的一营驻防源潭。1917年冬，旧桂军莫荣新接任广东督军后，为巩固桂系在广东的统治，与政学系骨干分子李根源相勾结，企图通过李根源（1918年李为滇军总司令）将驻粤滇军置于自己控制之下。这一阴谋当即遭到朱培德等滇军将领的反对。李根源知道朱培德不服自己指挥，便派其亲信部队赵德裕团，沿铁路线占据各要点，监视朱部行动，并密令部队捉到

朱培德便就地枪决。朱培德得知消息后，乔装潜到广州转往香港，再由港乘船返肇庆，绕山道回到四会部队，继续进行反对李根源勾结莫荣新吞并滇军的活动。

李根源密谋杀害朱培德的阴谋落空后，为了讨好李烈钧，把朱守源潭那一营兵拨归李烈钧作警卫部队。李烈钧当时是七总裁军政府的参谋总长。他借视察部队为名，率领一千多人的卫队（其中包括朱培德独立营和部分赣军）至北江与原来驻守在南雄、始兴的鲁子材炮兵团和杨益谦部会合，摆脱政学系的控制。李烈钧率队抵达源潭后，便遭到莫荣新派遣的桂军前后堵截。朱培德独立营和赣军一起，拼力抵抗，前冲后突，掩护李烈钧杀出重重包围，沿途又冲破桂军重重的堵截。当李烈钧本部抵达始兴坝子圩，李根源派驻翁源县城的赵德裕团一部闻讯，于第二天拂晓向坝子圩李部进攻。赵德裕本人虽被李根源收买，反叛李烈钧，但士兵却不甘为其卖命，两军相接并不开枪，彼此言和道故，只有赵团炮兵打了几炮，炸伤李部数人。因此，李烈钧得以从容率队撤出坝子圩，转道江西省的苦瓜营、都坑至罗坝。鲁子材这时也已率领他的卫队至罗坝迎接。两支部队终于会师。这一战，朱部起了重大的作用。

李烈钧率队离开广州后，七总裁内部发生分歧，伍廷芳出走香港，转道上海与孙中山、唐绍仪共同发表宣言，不承认广州军政府。岑、李（根源）想挽回残局，由李根源亲往始兴向李烈钧道歉，急请李烈钧回广州。李烈钧当时不明七总裁政府垮台情况，于次日回到广州。岑春煊马上派出一连兵以卫护李烈钧为名，监视李烈钧行动。李见势不妙，托词去观看飞机表演，带着一个勤务兵，由东山尾搭小轮船到白鹅潭转乘火轮到了上海。岑、李（根源）想钳制李烈钧的阴谋又落空了。

朱培德独立营没有跟随李烈钧南下广州，与杨益谦等部分驻北江。原驻四会、广宁的两团人，在朱培德亲率下，经阳山、连

县移驻湖南边境的临武、蓝山两县。一年后，陈炯明率军回粤。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临时国会，誓师北伐。朱培德即移师广东曲江，投归孙中山之麾下。不久，陈炯明叛变，北伐部队回师，朱培德只好又带领部队再返回湖南省南武县。

(1965年)

## 杨希闵部滇军人粤及被消灭的经过

张适南 \*

杨希闵部未被消灭以前，我任杨部第一师师部编修兼管参谋处档卷，整理有关军人整训、补拨等事项，所以对当时的经过知道一些，现在回忆起来，把它分写如下。

### 一、杨希闵部攻入广东

杨希闵部原属云南顾品珍部，1922年3月唐继尧反攻云南，顾品珍率部御于宜良属天生关，顾阵亡。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等合计1万多人被击溃退到曲靖、宣威到盘县集中；在盘县收编一部分正在裁遣的民团，分两路入广西。一路是经独山、荔波，一路是经古州、长安到广西柳州会合。沿途由地方供应，给养极为困难。在柳州会合后，共编制了五个旅，辖十个团。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杨池生、杨如轩等分任旅长，张开儒任总司令。当时有前黔军总司令卢焘（号寿慈，广西人）想借杨希闵等力量以及自己在广西的势力夺取广西政权，遂与杨等商议组成滇桂联军，共推卢为联军总司令，张开儒以不愿受卢指挥而去职。当时流落在广东的龙济光振武军旧属云南人听到消息，都赶来广西向杨希闵献策，希望进入广东。当时陈炯明也与杨等有信使往还。杨等备述滇军苦况，陈先接济20万发子弹，30万元军费。后来杨等商讨结果，还是东下广东，并派人去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孙先生赞成攻广东，并设法接济他们15万元经费，委杨为滇军讨逆军总司令。杨在广西时并联络桂军沈鸿英、刘震寰和粤

\* 作者时任杨希闵部第一师师部编修兼管参谋处档卷。

军第一师等进攻广东，一直由肇庆、三水进攻广东，陈炯明由广州退至东江。从此滇桂军就分别占领广州及西北江一带，此是1923年初之事。于是派员去上海请孙中山先生回粤主持，孙先生回广州就组织陆海军大元帅府。滇军进入广州后就扩充为三个军辖五个师，杨希闵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辖第一师杨池生、第二师杨如轩；范石生任第二军军长，辖第三师杨廷培，另加一个补充团；蒋光亮任第三军军长，辖第四师朱世贵、第五师胡思舜。

## 二、沈鸿英、杨池生、杨如轩之叛变投吴

杨希闵、沈鸿英等入广州不久，分别占据广州市，抢占财务机关，大开烟赌，造成极大恶感。沈又阴谋与吴佩孚勾结，推翻广东政府，向滇军进攻。滇军勇敢善战，拼死把沈鸿英打败。沈狼狈向北江逃窜，至粤汉路英德附近，值吴佩孚援军赶到，沈又反攻，结果沈与北军失利，由韶关、南雄退出广东。从此广州市便成为滇军天下，分点余润给刘震寰，刘此时已经被任命为桂军总司令。

滇军杨希闵部师长杨池生、杨如轩，因内部争权夺利，遂为吴佩孚拉拢投往江西，两杨部队原驻北江韶关，据说系受吴佩孚40万军饷投过去的。于是杨池生第一师师长就由赵成梁充任。并调韦杵为总部参谋长。赵升师长后由曾万钟任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由廖行超升任。第一师驻防韶关、南雄、始兴一带。第二师驻防广州市西关及其附近。广州市就全部为范石生部把持。佛山、三水全部由第三军蒋光亮所把持。

## 三、杨希闵部的内幕与蒋光亮的下台

杨希闵到广州后，内部各自为政，杨希闵有职无权，对范石生、蒋光亮两军的编制、指挥、军饷、甚至行政用人都不能过问。对他直辖的第一、二师一切编制、调拨年费收支也由廖行

超、赵成梁作主，任用人员也是决定后报杨任免，履行形式而已。

蒋光亮在佛山、三水，不到两年个人财产达数百万元。1923年他的第三军进攻东江陈炯明部，被陈部反攻击溃下来，退到广九铁路石龙站附近，部队都上了火车，但蒋光亮上了车头，乘车头装水时，蒋即命令不要挂车，催车头开往广州。其部队只好步行沿广九路退到广州。蒋的师长对蒋的贪婪胆怯颇为不满，于是设法把他赶走，胡思舜即继任第三军军长。蒋携巨款逃往上海，为当地财阀、流氓等将款骗光，遂流落贫病而死。

#### 四、范石生的离粤与赵成梁部的扩充

范石生占领广州中心地区，司令部门禁森严，令人望而生畏。他的第三师师长杨廷培因包赌包烟赚有数十万巨款为范所忌，又因在对沈鸿英作战中，杨有携款潜逃企图，被范逼死。范在广州二三年已有扩充，装备精良，一面与贵州军阀周西成联系，派人到贵州招兵带到两广补充。他亲率两军全部由广东开入广西，借口为父报仇要打回云南。后范回昆明当医生，为他所枪杀的参谋长杨蓁的二子刺杀，杨氏二子并自动向法院投案（当时我正在昆明）。

滇军第一师师长赵成梁，心有未足，当时建国第三军卢师谛部驻在韶关，卢师谛随孙中山先生赴北京，其部队交参谋长明超北带领。卢军原是龙济光部改编的，官兵多属云南籍，赵成梁知道卢师谛不愿再回广东，即与明超北商量，把卢部改编过来，自己可以扩充成军。明超北也愿这样作。但后来赵了解这一军人数不多，枪支也差，改编过来反成自己负担，遂用缴械办法把卢部吞并过去，并出布告谓“卢部因易将风潮发生，不守纪律，扰乱地方，由本部予以缴械听候处理”等语。

范石生离开广州后，广州防区就由赵成梁部接防。赵原在韶

关有四个步兵团。第一旅曾万钟辖第一团团长张桃、第二团团长梁睿；第二旅旅长韦杵辖第三团团长和庆善、第四团团长陈传文。赵在未调驻广州前与云南黄子实之妹在广州第一公园结婚，搭宴客彩棚工科费用即用 7000 余元，其平日生活之骄奢就可想而知了。

## 五、滇军入粤后广东的混乱局面

滇军到广东后，两三年间，广东始终是割据局面，异常混乱。陈炯明从 1923 年初退到东江，到 1925 年两三年间，都占据着潮、梅、惠州一带地盘。邓本殷占据南路高州、雷州、琼州一带。广东政府本省军队有许崇智部（粤军，又叫东路军），李福林部（粤军）计有一二万人。外籍军队，有赣军李明扬部一二千人，山陕军路孝忱一二千人，程潜攻鄂军几千人，豫军樊钟秀部三四千人，湘军谭延闿部一二万人（鲁涤平、陈嘉祐、宋鹤庚等分任军长，共计五个军），桂军刘震寰部一万多人。大元帅府直辖的有：中央直辖建国军第一军朱培德部三四千人，中央直辖建国军第三军卢师谛部一千多人，以及海军、空军，新创立的黄埔军校及新编的教导一二团等等。这些部队的一切供给都是由广东人民负担。到 1925 年熊克武的川军也开到北江，滇军还不断派人回云南招兵。广东驻有上述的军队，应该是省内秩序井然，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但是事实完全相反，遍地土匪杀人越货视为寻常，水上往来船只，都需军队保护。这项任务由李福林部担任，来往船只都需收保护费。最令人奇怪的是海军官兵也有乘夜抢劫之事。有时在河里打劫商船及过江大小船只，于是河道大乱，行人见而生畏。

当时，广东军队的供给薪饷，绝大多数靠番摊馆的赌税及烟馆税收为来源，各赌馆的门口有滇桂军总司令部派的武装保护。各军军人前往赌博的也很多。在金融方面，陈炯明在时，使用广

东银行纸币，陈退出后银行倒闭。滇桂军入粤，市面通用二角毫洋辅币，二角以下就是铜币，各省常见之大洋一律不用。但毫洋成色不足，最高八成，甚至只有二三成的，各军都私自购银制造牟利。因此毫洋信用不高。英帝国主义就利用这个机会大量向广东内地流通香港汇丰银行钞票，吸取广东人民血汗。

广州所驻军队，大多数是滇军。1923年尾至1924年初谭延闿湘军入驻北江，也有一些直属单位驻在广州市。当时广州市治安由滇军和市公安局维持。但是滇军行动异常横暴，吃饭、购物不付钱是常事，有时竟将警察当活靶击毙。因此警察除了管理交通外，对军队任何行动都不敢过问，群众对滇军畏之如虎，但也无可奈何。黑夜时关门上窗并与亲友约定信号，否则决不敢开门，恐受骚扰。1924年元旦，孙中山先生召集各军将领开会，对滇军将领沉痛地说：“我住在上海，你们打进广州派人到上海请我回广州主持，说是要实行三民主义，现在你们为所欲为，戴着我的帽子，践踏我的家乡。”滇军将领面面相觑不敢作声。

## 六、滇军被消灭的经过

滇军入粤后，把陈炯明赶到惠州、潮、梅一带就不再前进，有意留陈存在，养寇自重。曾一度进攻东江，被陈打退回来，从此与陈在惠州、博罗一带形成拉锯战，长期对峙。地方受害惨重，有些城镇居民在1924年前后，由数千户减少到几十户。

孙中山北上时，由胡汉民代行大元帅职权，胡对滇军行为本有所不满，孙先生逝世后，对滇军更觉有割除必要。而在广东省各军对滇桂军把持税收干涉民政深恶痛绝，群众对他们的骄横凶暴更有切肤之痛。当日广州政府想要统一财政，把各军所截留的税收一律收回，滇桂军抗不交回；政府要实行党治，军队组织党部，滇桂军也抗不筹备；另外云南唐继尧对在粤滇军采取拉拢手段，赵成梁曾先后派人回云南大理招兵。1925年三四月前唐继

尧派李雁冰、詹秉忠入粤与杨希闵有所协商，被胡汉民等侦知，认为对抗迫切，如再迁就势必贻误。此时滇军尚不自觉，继续把持财政，但外面风声已很紧张。以前广州报纸不敢公开披露滇军不法行为，而此时已不再保持缄默。由各方情况看，政府军与滇军已如箭在弦，有一触即发之势。

当时政府军驻扎区域，据我所知大致如下：所谓党军即黄埔学生军与新成立的教导一二团，驻黄埔附近。以这一部分为主力，进攻滇桂军。其他李福林部驻珠江对面的河南，谭延闿的湘军驻北江粤汉路沿线，韦杵一旅也驻粤汉路沿线中间一段。朱培德一军，虽是云南军队，但也站在政府军一面，不与杨希闵合流。还有滇军第四师师长朱世贵由滇军分化出来站在政府军一面，驻在清远县。一部分粤军驻在广九路之石龙、增城。

桂军刘震寰的部队驻防区域不甚清楚。

滇军的布置：第一师赵成梁三个团及两个新兵大队驻广州市区，第二师廖行超部驻西关及花县一带，滇军第三军胡思舜部驻石围塘及佛山、三水一带。滇桂两军约二三万人左右，在开战前一星期赵成梁的师部由观音山脚的旧水师行台衙门迁到大东门省议会内。在快开战前滇军总司令部召集滇军将领举行一个秘密会议，讨论作战计划，有的主张外线作战。赵成梁则主张固守广州，就照后者决定。

在未开战之前为分化滇军内部，曾派人示意第三军军长胡思舜与第二师师长廖行超，只要他们不向政府作战，可以保留他们的地位，因此胡、廖部意存观望，没有积极准备。

滇军布防情况：以第一二师防守广州，第三军开往东江截击政府军，第二师抽出一部分开往北江截击湘军。桂军防御西江一带，详细情况不甚清楚。滇军第二师原驻西关，距粤汉路黄沙车站极近，队伍开拔时铁路工人罢工无法开动。第三军胡思舜部原计划抽调大部分乘广九路开往东江，但广九工人也罢工无法开

出。当日赵成梁第一师布防，系由广州东郊龙眼洞、瘦狗岭起沿广九路石牌车站至广州市长堤。第二师廖行超部即接任第一防线沿西濠口至西关。第三军胡思舜部即布防佛山、三水。实际滇桂军已在四面包围之中。

6月12日，政府军以学生军为主力，向滇桂军进攻，滇军隔江还击，枪炮声日夜不停，达五六昼夜。大约是6月12日八九时赵成梁在瘦狗岭被政府军开炮命中击毙。学生军由石牌对面抢渡珠江，侧击滇军之背。此次作战滇军士气低落，闻赵成梁被打死便全线动摇，溃退时毫无秩序。第三日上午八九时白云山上枪声稠密，事后知道是第三军胡思舜从东江返回广州参加战斗，到了近郊才知滇军已战败，想绕道逃窜，被政府军截击，在白云山北侧三元里全部缴械。

滇军被缴械时，大小军官纷纷换便衣逃走，大部分逃往香港、上海，有些逃不及的就逃往沙面租界，据说须交数百至数千元的保护费才准进去住一二夜，赵成梁的军需赵传典（云南丽江人）在赵成梁作战时，他带了十几万广东银行纸币，同赵成梁在一起。赵打死后，他就带纸币躲进法人办的韬美医院，过一二夜为一师人所知，不断向他要钱，他即逃往香港。第一师官又追往香港，逼他将此款交出分配了事。

滇军缴械这一天，广州市居民都手持木棍铁棍，在街上痛殴溃退下来的士兵以出怨气。有退下来的官长白天不敢在街上行走，在东郊坟墓或树林里躲藏，晚上才偷跑出来。第二师一个营长范咸晋说，那天他跑回家去，见他的两个孩子都被人杀死。由此可见广东人民对他们的仇恨程度。滇军缴械后，广州警察领着军队，按户搜查，平素作恶的军官，被人民当面证实，都被逮捕。

杨希闵所部从1922年6月自云南宜良天山关溃退出来，至1925年6月中旬在广州被消灭，时间是三年零两个月。

（1964年）

## 1923年北军入粤记

任启圣\*

1923年孙中山在广东就任大元帅，所辖滇桂各军分赃不均，各抢地盘扩充自己势力。广西军人沈鸿英出身土匪，野心极大，想独霸广东，惟兵力不敷，乃勾结洛阳吴佩孚给予援助。吴以陆军第九混成旅旅长邓如琢为北洋军第三镇出身，比较服从可靠，乃指定邓旅援粤。江西督理蔡成勋则以邓为陈光远旧部，久驻赣南，军威素著，恐日久对自己不利，亦欲邓远离江西而去肘腋之患。邓如琢在此种特别条件之下，乃于1923年春由江西吉安经赣州、大庾越梅岭过南雄、始兴直达韶关。自清初尚可喜领清军入粤之后，二三百年来粤民未观北方军队攻入。斯时南北界限甚深，预闻邓旅开到，居民咸感将大难临头，四出逃避，商团皆荷枪实弹在碉堡或天桥上作预备放射姿态。沈鸿英恐军民发生误会，所有邓旅官兵应用一切物品，均饬地方官预先筹办，并犒军三日，每连官佐送海参席一桌，士兵每人散毫洋3元。旋以沈鸿英在广州与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部发生冲突，战况不利，邓如琢即率第九旅（以下皆称九旅）全部4000余人沿粤汉路挺进，先头部队到达石井车站，时沈部亦由广州撤退，九旅即在银盏坳布防，与滇桂军开始激烈战斗。邓如琢利用火车头代替坦克车（当时铁路未毁），上架机关枪猛冲，步兵继追，直越军田车站。桂军刘震寰部首先溃走，当场虏获刘之坐轿一乘、自用鸦片烟枪全套。正乘胜追击中，得沈鸿英电话谓清远失守，沈部李根沄、沈荣光等尚被包围，邓如琢当派步一团团长李克信回渡琶江

\* 作者时任北军第九旅炮兵营书记长。

口敌前登陆，团附萧涤泉另率一部配合炮兵向右翼战斗最激烈之点攻击前进，又令后续部队夜雨中迂回数十里，前后夹击，始获大胜并追至飞来峡。

邓如琢率九旅追至狮岭后，滇军胡思舜将精兵5000人忽向左翼包围，并派奋勇队抄袭军田车站。军田为兵站所在，粮秣弹药皆囤积于此，并无战斗部队，仅有机枪连长张子贞带少数兵士留守，尚有一部负伤官兵在此休息。张子贞忽见头戴红箍帽子滇军从车尾爬进，乃背出机枪一挺急向站内站外四出扫射，而车内负伤之官兵亦开始肉搏，始将奋勇队击退。邓如琢接车站电话，即由狮岭前线回援，而两翼包围之滇军越来越众，四面皆发现枪声，乃于黄昏后全部撤退。北军初次入粤，地理不熟，又不懂广东话，全旅4000余人只沿一路退却，拥挤践踏，伤亡甚众。迷失方向者，亦遭乡人杀害。北洋政府初闻银盏坳告捷，尚委邓为南韶连镇守使，晋授陆军中将，赏六狮军刀一把。及命令到达，邓已败至南雄，疮痍面目，啼笑皆非。某日，邓向官兵集合讲话，谓只知奋勇前进而不知两翼被抄，以致伤亡惨重，自责指挥混蛋，非为我官兵作战之咎也。

吴佩孚闻邓如琢挫败，一面严令不准再退，一面又派赣南镇守使方本仁为援粤各军总司令，率江西陆军第三旅曹铁林之一团、省防之蒋镇国团由赣州兼程来援，并派洛阳巡署参议苏荫森来粤监军。方本仁当即率军反攻，出始兴绕韶关之后直扑马坝，将正面之敌击退后，进至英德。旋以英德铁桥炸断，铁路阻绝，民军四出截击，凡后方输送给养以及负伤官兵后撤者，皆受种种限制。前线又呈胶着状态，方本仁恐蹈邓旅前辙，乃下令撤退。邓如琢与沈鸿英开车退至罗坑隧道时，司机尚不知隧内路轨被毁，迨车头开进洞口，车厢忽然颠覆，车厢均碎，邓、沈两人由车窗爬出幸免于死。

方本仁、邓如琢率队回赣州后，经数月整补，于是年冬后复

奉吴佩孚令再行反攻。此次出发部队为第九旅全部、第三旅全部又省防一团合计约万人，并无沈军在内。甫至始兴北20里，即与湘军谭延闿部遭遇，第三旅旅长高凤桂昔在袁州讨伐张宗昌时即与方本仁发生意见，此次方置高旅于左翼，而将自己带领之省防蒋镇国团为总预备队，高大为不满，前线接触未久，高凤桂旅首先撤退，致全队动摇。赖邓如琢苦战数日，始徐徐后退。高凤桂自动将所部撤至信丰，即将团长曹铁林、唐福山扣押，带队径奔广州，经孙中山委为大本营直辖奉军（高自称奉天人）总司令。

总计一年之间三次入粤，而损失最重者为邓如琢所率之第九旅。该旅计有步兵两团，炮工辎各一营，手枪队一连，共计四千七八百人，步枪4000余支，克虏伯野炮12门，轻重机枪七八十挺，在江西北洋军队中装备首屈一指。经此次苦战，阵亡四五百人，受伤者六七百人，失踪者二三百人。因广东气候炎热，溽暑远征，北人不服水土，沿途染疫及回赣州病故者超过阵亡受伤失踪总数几倍以上。炮兵一连百余人，欲挑选强健士兵数名守卫站岗皆不可得。当时医药不全，军医人员亦非专门医科毕业，惟赖延当地中医治疗。所患皆头痛发烧或呕吐抽筋等病，药方一律，各营连均用行军锅煮药分碗送服，死亡枕藉。每日死亡公文皆用汇报方式，必待日暮汇齐始行呈报。余时年二十有三，年富力强，虽随军进退，并未置身前线，只以奔走过劳，所着白夏布裤褂皆为鼻血染红，几濒于死。凡年老军佐不能健步者，不死于病亦掉队死于乡人之手矣。

我军入粤之初，以官兵体格强健，武器精良，每战必当前锋，见沈鸿英军杂乱泄沓，则相视而笑。迨军退却，腹背受敌，风声所至，几如惊弓之鸟，仓皇四顾不成队形。而沈军从容步行，毫无畏惧，凡北军抛弃枪弹、衣物等项皆随地拾取，置于行囊如获珍宝。盖沈军常年作战，到处皆家，其行动已成流寇。

官兵带女眷者几占十分二三，或荷枪实弹，或行军锡灶，随其夫夹于行列之中，钗光刀影，俨若舞台。入夜则问暖嘘寒，情话喁喁，身在沙场而有室家之乐，非为天地间一怪剧乎？

在 1923 年间，孙中山所辖滇桂各军，皆不听命令，抢夺地盘，各府县皆有司令，其部众千数百以至数十不等，枪械亦不完全，皆称大本营或各军之委任，实皆土匪出身，漫无纪律，到处横行。各地普设饷牌公司俱乐部、谈话处等等，以筹饷为名，公开赌博、吸鸦片，土匪蜂起，民不聊生。以广东富庶之地，沦为人间地狱。余初至韶关，见书肆中出售《三民主义》、《建国方略》诸书，皆用宣纸印刷，蓝皮丝线，古色古香。而方略一书尤具立国规模，颇慕孙中山之为人。及在粤日后，觉事实皆与此相反，始知孙中山徒拥虚名，号令不出帅府一步。樊钟秀原名樊老二，为豫著匪，吴佩孚招抚派赴援粤者，其部队不满 2000 人，开至赣州后闻方、邓挫败，即开始掠夺方邓部队伤兵枪支，逃入广东，亦经大本营委为直辖建国豫军总司令。真所谓“关内侯，烂羊头”，司令之多，甲于天下焉。

第九旅旧人在京者现在只有我及萧涤泉二人。萧曾充九旅炮二连连长（余任炮营书记长）。入粤时萧任步一团团附，嗣后第九旅扩编成师，萧为师参谋长又兼代赣北镇守使。此篇复由萧君口述与余互相印证而成，不夸张，不虚伪，为亲历真实之材料。惟月日及作战详细情况，则记忆不清，此为缺点。

（1962 年）

## 参加驱逐陈炯明战事的片段

罗良斌\*

1922年8月间，孙中山先生由上海派我到广西平南，会同滇桂联军讨逆总司令张开儒、参谋长夏声等策动集结蒙江的滇军杨希闵部参加讨逆。同时孙中山先生还派我为滇桂联军讨逆第一路司令。

当时滇军正派有代表在广州接洽向陈炯明投降，并将孙中山先生所派赴广西的李义斋、李树山两同志枪杀于蒙江，以作为诚意投降的表示。

到12月3日，张开儒总司令以江电通电讨逆，下令动员，并命我先由广西潜赴广州，会同在港的廖湘芸策动驻扎广州的洪兆麟部李云复师的一部分起义。李部在占领广州市财政厅后，我即以滇桂联军讨逆第一路司令的名义布告安民。

这时陈炯明正在三水前线督师，与滇桂军鏖战之际。闻广州局势已变，军心大乱，即绕道溃逃石龙。广州未发一弹即告克复。我一面急电上海报告孙中山先生，一面通电全国。孙中山先生闻报后即电知在港的胡汉民、魏邦平、李烈钧及古应芬等，在他本人未到粤之前，派他们为广州善后委员；并派胡汉民为广东省长，派杨西岩为广东财政厅长，派伍学焜为广东盐运使。

那时，沈鸿英部桂军以有率先入粤之功，竟派人员接收行政、财政各机关据为已有。接着在江防司令部军政联席会议上出席的滇桂军将领李易标等将魏邦平绑起来，胡汉民、杨西岩等见势不佳，乘隙逃往香港。凡孙中山先生所派在广州的人员亦相继

\* 作者时任滇桂联军讨逆第一路司令。

逃港。广州市顿成群龙无首的现象，混乱异常。当时陈炯明正在石龙坐观动静，企图卷土重来。

我看见这种危险急迫的情况，即铤而走险，立即邀同与夏声有交的刘希无到农林试验场会见了夏声，对他说以利害。我问他：“江防司令部的会议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他气愤地说：“我们军队在濛江没有饭吃，到广州还是没有饭吃，就是雇人打扫后也该有饭吃。他们一班人（指胡汉民等）把孙先生筹的款子拿到江门去收编陈炯明的军队。所以江防司令部的会议才有捆绑魏邦平的举动。”

我说：“魏邦平是孙先生派来的善后委员，听说孙先生的行李本已上船，准备即来广州。但今天这么一来，他就只会听香港的电报，本人就不会来广州了。陈炯明有五六万人，你们只有万把人，打走陈炯明是孙先生三民主义的力量，决不能认为是单纯的武力解决了问题。”我又告诉他，陈炯明还在石龙，他随时可以卷土重来。孙先生的人完全到香港去了。如果孙先生不来广州，则他在香港的一班人也不会回来，你们恐怕要步陈炯明的后尘。我抓住关键问题继续说：“当今之计，你不妨和杨司令商量，通知全体将领表明态度，欢迎孙先生回粤主持革命大计。”

谈到这里，夏声要我们稍坐一下，他去报告杨司令，不一会儿回来说：“司令同意照办。”于是我和夏声当晚赶到香港，会见胡汉民。但胡表示不把桂军打走，他们不能到广州来。

夏声见不得要领，立即要乘船回广州，他气冲冲地对我说：“胡汉民这一来，只有激得我们与沈鸿英一致行动。”我又恳切地说：“孙先生在上海，当然是听他们的电报。你回广州宜再和杨司令商量，派代表去上海欢迎孙先生吧！”

后来我同孙科、伍学焜、张启荣等即日买舟到达上海，并会同陈少白先生一同到莫利爱路见到孙先生，报告广州新近情况，请他即赴广州主持大计。但孙先生对此尚感犹豫，他说：“不将桂军驱逐出粤，我不能即去广州。”我说：“今日不是消灭桂军的

问题，而是如何团结的问题。先生到粤后，如他们不听命令，不将财政等机关交出来，那时义正词严，随时可以消灭他们。若今操之过急，就可能激起滇桂军的一致行动；何况陈炯明是广东人，他的军队尚盘踞在石龙，无时无刻不在企图卷土重来，更难免不促成他们三方的合作。为了不致使革命根据地再陷敌手，不致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先生必须迅电广州安慰人民，并通知滇桂军说明先生不日到粤主持一切。同时还宜先派一宣抚使到粤并更换省长（胡汉民与滇桂军矛盾甚深），以慰滇桂军心，并布置一切，先生随后动身。千万不要听从别人（指胡汉民）的主张，切勿认为不消灭桂军就不能到粤，那样就贻误大事。”我最后说：“滇军派的代表不日就到上海欢迎先生。这是我们的愚见，望先生考虑。”接着伍学焜、张启荣及陈少白等亦相继痛陈利害，使先生不能不从新考虑这个问题。孙先生沉思了一会说：“那末，以谁去当省长为最适宜呢？”我说：“像徐固卿先生，他是广东人，其声望足以安定广东人心。”孙先生默然。他对我们说：“休息一会，再从长计议吧。”

恰好这时候滇军的代表夏声也到了上海，更促成了孙先生的决策。次日孙先生召集我们谈话，表示同意我们的主张。他并宣布派杨庶堪为广东宣抚使，派徐固卿为广东省长，要他们即日乘轮出发广州。孙先生自己随即经香港转粤。广东大局由此得以安定，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我回粤奉命将军队开赴增城，担任进攻及消灭陈逆余孽的任务。惟因我忽在军中患病，需要回省住院治疗，即将军队移交第七军刘玉山军长改编。我病愈后往见孙先生，他对我说：“你熟习湖北、河南两省情形，革命要向中原发展，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你可担任这个先遣人员的任务。”他即密派我为鄂豫军事联络员。我即离开广州，来到豫鄂两省进行活动。

（1961年）

## 建国攻鄂军始末

唐菊庵\*

建国攻鄂军，是1924年在广东成立的一支反北洋军阀的部队，是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的前身。攻鄂军第一旅成立时，李国柱即邀我担任旅部参谋，随后我带职调入讲武学校受训；二次东征之前，被调到攻鄂军政治部宣传科工作，编辑《奋斗》周刊；改编为第六军时，调在军司令部供职。本文所叙系就个人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再三回忆，并访问了曾在攻鄂军工作过的湖南省参事室成员张际泰、漆启予、彭子国、萧昌烈、李拔夫、王认曲等人，参照他们提供的资料综合整理而成的。

### 一、攻鄂军的编成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第二次直奉战争也在酝酿中，有一触即发之势。孙中山先生认定这是出师北伐，讨伐曹（锟）、吴（佩孚）的有利时机，就于9月5日开军事会议于广州大本营，决定组织北伐军。同月13日，中山先生由广州出发赴韶关，以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务。调往韶关参加北伐的军队，有谭延闿的建国湘军、朱培德的建国滇军、樊钟秀的建国豫军和吴铁城的警卫军，谭延闿任北伐军总司令。杨希闵、刘震寰所部的滇桂军，则依旧盘踞广州附近各地，不受调遣。程潜时任大本营军政部长，也随军出征。广东北伐军到达韶关以后，中山先生为了扩充实力，迅速取得北伐的胜利，任命程潜为建国攻鄂军总司令，叫他新编一支队伍。当时，中山先生领导的南方政府

\* 作者时任建国攻鄂军第一军参谋。

拟称建国政府（1924年9月24日发表《制定建国大纲宣言》，但后来建国政府未成立），因此，他所统率的军队，也在番号上冠以建国二字。

程潜是湖南人，所部官兵又多是湖湘子弟，为什么中山先生给予的部队番号却叫作攻鄂军呢？原来，谭延闿在1923年随中山先生由沪赴粤后，任大本营内政部长，由过去君主立宪派和联省自治派，转入革命阵营，取得了中山先生的信任，同年秋，又赤手空拳回湘讨赵（恒惕），带走了湘军一两万人。有了这笔政治资本，谭就被任为建国湘军总司令。而程潜与谭素来政见不合，此时虽能共事，仍是貌合神离。在湖南问题上，谭延闿希望卷土重来，程潜也希望有敬恭桑梓的机会。中山为了调和谭程之间的矛盾，决计让程潜自成一军，并内定北伐成功后，将湖南交谭，湖北交程，故给程以攻鄂军的番号。关于谭程不和，程潜后来有诗谈到：“南韶披忠肝，调和遵睿谕。相共赞远猷，内外值多故”，就是指这次北伐的事。

当时的湖北，处在直系军阀萧耀南的统治下，横征暴敛，人民怨声载道。中山先生指定程潜成立攻鄂军，以表示对湖北人民的关怀，争取群众的同情。据曾任攻鄂军总部秘书的姚大慈（现任湖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回忆：当时湖北驻军中有两个师长不甘附北，倾向革命，曾派代表何祥安（平江人）到广东谒见中山先生，表示如果北伐军发动攻鄂，他们愿为内应。中山先生派林伯渠偕一个外国人前往湖北与两师长接洽，在汉口租界一家照相馆里接了头，并委以名义，发给关防。因此，在兴师北伐后派程潜组织攻鄂军，借使声威远播，促湖北军阀部队倒戈归顺。程潜与当时奔走驱萧的鄂籍国民党人李书城、何成濬等都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同学，又为同盟旧友，交往甚深，这也是他出总攻鄂军的有利条件。

在当时革命策源地的广东，革命党人组织武装力量的办法有

二：一是自行筹集饷械，编练队伍；二是招安或收编旧军队。陈炯明所部粤军，原来就是朱庆澜部 20 营老军队，从旧桂系手中收编给陈的。攻鄂军的成立，上述两种方法兼而有之，最先编成第一旅、第二旅，随后编成第三旅，后又编成第四旅。共计四个旅，有人枪两千多。

第一旅旅长李国柱，湖南嘉禾人，老同盟会员。攻鄂军未成立前，任大元帅府参军及中央直辖湖南游击总司令。程潜受命组织攻鄂军建制，参加北伐。李部编为攻鄂军第一旅，下辖两个支队（团）、一个独立营。第一支队支队长陈鹏，桂阳人；第二支队支队长李某（忘其名），嘉禾人；独立营营长胡鳌，宜章人（后在攻鄂军讲武学校受训，毕业后加入共产党，任红军师长时于赣南某地作战阵亡）。李国柱的部队酝酿改编时，中山先生在韶关有信给在广州的蒋介石，叫他在扣留商团的枪械（存放黄埔军校）中拨一部分给李，信中提到李为国民党忠实同志，应予支持等语。但是蒋介石私心自用，拒绝拨给。李部的枪支，一部分是收集嘉禾、宜章、桂阳、临武等地的民枪，一部分是自行筹款向广东石井兵工厂购买的粤造枪。部队最初编成时，名义上是一个旅，实际仅有枪 400 余，由湖南地区移驻韶关附近小北江、广埔一带。李国柱因书生带兵，不懂军事，关于部队训练指挥事宜，统由参谋主任丁伯纯、副官主任徐焕湘负责主持。

第二旅旅长王邦吉，湖南宁乡人，湖南武备学堂毕业。所部辖一个团两个营。团长曾琪、第一营营长蒋镇、第二营营长张某（忘其名），都是湖南祁阳人。该旅原为招安部队，中下级官佐多系行伍出身，士兵多系祁阳土著，缺乏训练。但官兵勇敢善战，很守纪律。这个部队是由曾琪率领由湖南去广东的，先隶属军政部，后编为攻鄂军第二旅，也有人枪 400 余。

第三旅旅长胡兆鹏，湖南邵阳人，湖南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初成立时，仅有一个团，两个营。团长余韶，平江人（余不久调

去攻鄂军总部任副官长，由曾任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军事教官的王尹西接充）。第一营营长程宣（程潜之侄，原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第三队队长），第二营营长钟奇，都是韶关陆军讲武学校毕业。下级官佐亦多系军事学校毕业生，如大本营讲武学校第三四队学生毕业后，大部分分发在这个团。士兵多系由湖南农村招募去的新兵。全旅有枪 400 多支，都是大本营讲武学校学生实习用枪新移过来的。它是一支新成立的训练较好的队伍，也是攻鄂军的基干。在本旅未成立以前，程宣的第一营就是攻鄂军总部的卫队营。

第四旅旅长王茂泉，湖南醴陵人。南北战争期间，王在地方夺取张敬尧溃兵枪支还家，几年间拥有几百人枪。他后来把人枪带到广东，在驻粤湘军王得庆部任团长。王得庆原在湖南赵恒惕部任宪兵司令，驻扎零陵，1923 年谭赵战争后，随谭入粤，任湘军宋鹤庚部旅长，驻扎东江平陵附近，与陈炯明叛军对峙。1924 年 7 月，陈部林虎与湘军宋鹤庚局部停火谋和时，王得庆受林虎勾引，突然叛宋投林，率部逃窜，于逃窜途中被王茂泉击毙（原文如此——编者）。事后，王茂泉不再依附宋鹤庚，而投奔程潜，由程收编为攻鄂军第四旅。管辖一个团，王茂泉以旅长自兼团长，官佐也多系行伍出身，共有人枪六七百。该部辗转播迁，缺乏训练，人事情况，也极为复杂。

## 二、攻鄂军的几次战役

1924 年秋冬，攻鄂军第一、二、三旅先后在韶关编组完成，即根据中山先生的命令，部署出征。当时，湘军和豫军已攻入赣境，攻鄂军按作战计划，应向湖南进军，取道湖南，指途鄂渚。在此以前，中山先生和谭延闿曾一再致电赵恒惕，劝他服从南方，共同北伐。赵恒惕始终采取暧昧的态度，按兵不动。攻鄂军未入湘假道之先，程潜也一再电赵，请其同意假道攻鄂。赵恒惕

对程潜的要求没有拒绝的公开表示，却在长沙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密商对策。显而易见，高唱省宪自治的赵恒惕，是把攻鄂军的取道入湘，看作敌国外患，一心想维持他在湖南的统治地位。

11月下旬，攻鄂军由粤北进入湖南宜章县境，即遭到赵部唐生智师（当时唐任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的抵抗。唐师驻宜章的部队为张元达团。经过激烈战斗后，张团被击溃，张元达阵前毙命，残部狼狈逃窜，攻鄂军即完全占领宜章，进入县城。正当攻鄂军准备乘胜前进时，唐部大举反攻。在兵力单薄、众寡悬殊的形势下，攻鄂军为保存实力，自动后撤，由宜章经临武退入广东（撤出宜章的日期，大约是11月22或23日）。攻鄂军退回粤境后，即越台莲洞到坪石、广埔，继又进驻韶关的马坝，在小北江一带休息整训，待命出击。

1925年1月，攻鄂军在马坝整训一个短时期后，又向湖南汝城进军，争取假道攻鄂的机会。当程潜率部进入距汝城县城的十华里的黄草坪时，湘军某部连长兰田率部起义，随军参战。攻鄂军所向无敌，于1月24日（农历甲子年除夕）占领汝城县城。其时，赵部刘建绪团驻扎城内，仓皇应战，一触即溃，纷纷向后奔逃。刘建绪本人深夜从床上爬起来逃命，连鞋子也顾不上穿了，即可见其惊慌失措。攻鄂军进入汝城，正准备继续前进，又遭到唐生智部的大举反攻，只好再退入广东，经乐昌仍回驻小北江一带整训补充。

1925年春，攻鄂军回师广州。先是，1924年冬，乘奉直两军战事激烈时，冯玉祥以及与国民党有历史关系的陕西陆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京畿警备司令孙岳等，忽于10月23日班师回京，推倒曹吴，宣言停战主和。冯等电请中山先生北上，主持时局，段祺瑞、张作霖也先后来电表示欢迎。中山先生回到广州后，于11月13日启程赴北京。1925年春，广东北伐军除樊钟秀部转战千里进入河南外，其余湘军、滇军、攻鄂军以及吴铁城的

警卫军，都陆续撤回广州。同年6月，国民党讨伐杨、刘，攻鄂军也参加了这次战役，归鲁涤平指挥。担任的任务是与鲁涤平的湘军在花县、新街一带堵截由东江增援及由广州突围之敌。当部队前进时，在花县太和圩与敌军发生了遭遇战。结果，堵住了增援敌军，还歼灭了不少由广州突围出来的溃兵。这次战役，接触时间不久，敌我伤亡均重。攻鄂军第三旅第一团第一营营长程宣、第二营营长钟青均阵亡。

1925年7月，平定杨、刘叛乱后，广州成立了国民政府，将一切名目不同的实力较厚的军队重新改编，将改编后的部队总称为国民革命军，攻鄂军此时虽未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却是忠于国民政府的部队。

同年9月，国民政府决定第二次东征，讨伐盘踞东江的陈炯明。攻鄂军也参加了二次东江战役，并且是左翼纵队的主力军。

这次东征军的组织，由蒋介石任总指挥，汪精卫为党代表，并为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组成了东征军总政治部，以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东征部队编成中右左三个纵队：中路纵队（第一纵队）由博罗、惠州前进，主攻惠州，指向潮汕；纵队长为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所部为第一师全师、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团长刘光环）、第一军第三师谭曙卿部全师、第一独立师吴铁城部全师。右翼纵队（第二纵队）由平山、淡水向海陆丰前进，策应中路纵队作战；纵队长为第四军军长李济深，所部为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部全师、第一独立旅张发奎部全旅，另有张和、余鹰扬、冯轶裴等三个支队归其统率。左翼纵队（第三纵队）由惠州向河源、老隆、五华、兴宁、梅县前进，肃清韩江流域左侧翼之敌；纵队长为攻鄂军总司令程潜，所部为攻鄂军四个旅，苏在安的鄂军和卫立煌的第九团。

东征军各路纵队于10月1日起由广州陆续出发，8日以前在增城、石龙、茶山一带集结完毕。按照作战计划，先攻惠州，等

攻克惠州后，再分路前进。攻鄂军在战斗序列上列为攻城总预备队，设营于飞鹅岭山麓，12日，攻城大战开始后，虽经主攻部队前仆后继地猛打猛冲，始终未能爬上高垒深沟的惠州古老城墙。14日上午，担任攻城的第一军部队伤亡惨重，蒋介石命令攻鄂军于下午4时接替攻击。当攻鄂军正准备轻装上阵时，下午3时40分，攻城部队爬上了城墙，架起云梯蜂拥入城。攻鄂军也相继入城，协同第一军消灭城内残敌。惠州攻克后，稍事休整，继续追击败敌，攻鄂军于19日由惠州向河源进发，21日到达河源对岸，次日攻克河源。当时在东江方面，盘踞有陈炯明部相当雄厚的兵力，河源附近残敌也未完全肃清。因此，程潜在进军战略方面，与苏联顾问铁罗尼发生争执。铁罗尼主张肃清当面之敌后，再向前推进；程潜坚持按预定的作战计划，以主力向老隆挺进，只留攻鄂军第四旅及卫立煌团担任肃清河源和警戒南湖方面之敌。最后，程潜拒绝接受铁罗尼的意见，仍按原定作战计划进军，于26日攻占老隆。28日拂晓向五华进发，经过一整天的急行军，于当天深夜攻占五华县城。五华之役，是在惠州战役后的一个关键性的战役。它对肃清东江、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有重大的影响。

自击溃五华之敌以后，攻鄂军继续前进，于10月31日午后占领兴宁。11月3日，占领梅县县城。扫荡梅县一带敌人后，又乘胜挺进，于9日进攻大埔，继即进入福建境内，在解决敌人的一连串后，即向永定猛袭，于11日占领永定县城。敌军在城内城隍庙贮存的军需物资，尽被缴获。当攻鄂军进入永定时，潮汕、饶平等地区，已为中路纵队军占领，残敌分向闽赣边境溃逃，东江境内遂无敌踪。第二次东征结束后，攻鄂军在永定稍事休息，又回师东江，先驻蕉岭、三河坝一带，继而进驻梅县、惠州休整。

### 三、攻鄂军的训练情况

1924年11月底，攻鄂军由宜章回师后，驻扎韶关马坝进行整训，次年1月由汝城回师后，又在马坝小北江一带补充整训了一个时期。第一、第二旅的官佐多系行伍出身，士兵多系土著，缺乏训练。程潜为了彻底改造部队，特在马坝南华寺开办攻鄂军讲武学校，调训第一、二旅行伍出身的排连营长及第三旅的少数官佐。

先是，程潜在广州任大本营军政部长时，曾创办一所陆军讲武学校，自兼校长，李明灏任教育长，有学生四个队。1924年9月，中山先生由广州进驻韶关，大本营讲武学校第三、四队学生奉命参加北伐，于10月初开赴韶关。留在广州的第一、二队学生，不久并入黄埔军校，李明灏出任攻鄂军总部参谋处长，陆军讲武学校无形结束。同年11月底，攻鄂军由宜章回师后，程潜决定在南华寺重新开办，取名为攻鄂军讲武学校，仍以李明灏兼任教育长。讲武学校有学生七八十人，编为一个大队（实际上就是一个队），先后担任大队长的有李明灏（兼）、余舆、徐焕湘；担任大队附的有萧昌红、彭子国、汤维扬；担任区队长的有唐金元、王介、叶谟、欧阳芬、廖少晖；军事教官有林伯森、傅良弼、廖士翹等。次年春，攻鄂军回师广州，学校亦随军迁回，以原大本营旧址广州河南士敏土厂为校址。1925年秋，二次东征战事爆发，讲武学校学生随军出发，参加东征。全体学生编为两个队：(1) 宣传队，由攻鄂军政治部秘书唐卜年率领，跟随政治部行动，担任战地宣传鼓动工作；(2) 督战队，由讲武学校大队附萧昌烈、彭子国率领，随司令部行动，负责巡察战地军风纪。直到这年11月底，东征胜利结束，攻鄂军从福建永定回师广东，驻屯梅县休整，这时，宣传队和督战队宣告撤销，随征学生仍回广州本校受训，同年冬结业，分发到第六军各部担任中下级军

官。

以上所叙，除了行伍出身的军官佐调讲武学校受训外，对于士兵的训练也极为认真。当时，不但对于典范令的讲授十分注重，并且进行了政治教育，主要讲解三民主义和宣传北伐（当时北伐的主要对象是打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意义。攻鄂军政治部办了一个《奋斗》周刊（以后改名《人道》），配合进行政治宣传工作，并注意做到平时的政治教育与战时的宣传鼓动紧密结合，如在东征之役中所作关于军民合作的宣言，收效很大。此外，对于图画宣传和口头宣传也很注意，军队所到地方，张贴画报很多，东征时还散发了许多小照片（孙中山、廖仲恺等人的），并派宣传队员到处召开群众集会，发表演说，阐明东征的任务。

攻鄂军政治部是由马坝回师广州后成立的。林伯渠任政治部主任，唐卜年任秘书。下设总务、宣传、党务三科，由唐际盛（共产党员）、贺树（共产党员）、王认曲（临澧人，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分任科长。攻鄂军的政治工作，最初由于人员缺乏，进展缓慢，到二次东征时才顺利开展起来。

#### 四、在艰苦奋斗中成长

当程潜受命组织攻鄂军时，正是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之际。他们把持广东财政，控制一切税收，使广东的财政金融陷于瘫痪状态。各省军队云集广州及附近地区，除滇桂军饷源充裕外，其他军队不仅谈不上按月发军饷，即每天的给养也很难筹措。在此艰苦岁月中，攻鄂军的给养，虽规定官长每天毫洋4角、士兵毫洋2角，也常常没有着落。记得攻鄂军总部驻扎马坝时，有一个军需（忘其姓名）在广州领到给养毫洋几千元，赌番摊输得精光，畏罪逃跑了，以致全军挨饿。第一旅旅长李国柱经常以私人名义在家乡筹借款项，接济军需。第二旅驻扎花县新街时，有个时期是靠每天卖枪一支维持伙食的。

在这里应该提到的，谭延闿在经济方面对攻鄂军帮了不少的忙。谭、程原为湘事摩擦，意见很深。自经中山先生调解后，又复归于好。当时，谭任大本营秘书长兼湘军总司令。湘军给养，虽较滇桂军差得远，但比攻鄂军活动得多，谭曾多次移挪接济。在攻鄂军初次攻湘受挫，退回广东坪石、广埔时，经济拮据，一筹莫展，谭延闿从湘军给养中，按月接济毫洋 5000 元。中山先生离粤北上后，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务，谭为签请增加攻鄂军经费，胡不同意，竟在会议桌上拍桌否决，给谭碰了一个大钉子。由此可以想见，当时攻鄂军的困难程度。

在此如此艰窘的经济环境中，攻鄂军内部团结很紧，整训工作认真进行，临阵作战亦莫不奋勇争先，无论平时或战时，都很注意军风纪。

攻鄂军的兵力，虽号称四个旅，实有人枪不过两千多，而且装备很差，有些枪支是所谓“吹火筒”（形容其破旧不堪）。但在历次对敌作战中，往往以少数兵力挫败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强敌，获得辉煌战果。特别是第二次东征期间，以少数兵力孤军深入，克敌制胜，对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这是值得一赞的。

## 五、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1925 年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统一了广东革命根据地。从此，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成立刚刚一年多的攻鄂军，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由程潜任军长，林伯渠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当时改编经过及人事变动情况是这样的：

以攻鄂军和吴铁城部为基础，加上胡谦的一部分队伍和其他少数杂牌军队，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六军。下辖第十七、十八、十九等三个师。第十七师由吴铁城部编成，此时吴本人已被蒋介石

扣留在虎门要塞司令部，蒋派邓彦华为十七师副师长，代理师长职务。第十八师由胡谦（江西人）的一部分队伍和其他少数杂牌部队编成，由胡谦任师长。第十九师由攻鄂军所辖的各部编成，由杨源浚（新化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任师长。改编完毕，在惠州一带地区整训了半年时间。1926年7月，程潜、林伯渠率第六军第十七师和十九师离粤北上，参加北伐；第十八师名义上属第六军建制，实际在惠州未动，后来也一直没有归还建制。

攻鄂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以后的人事变动情况，原第一旅旅长李国柱，因不谙军事，在二次东征前夕即已自请退职，北伐军由粤北上后，李亦自粤赴沪，息影沪滨多年。曾任第三旅旅长，后调攻鄂军参谋长的胡兆鹏，在部队改编为第六军时，因病赴沪休养，次年春第六军攻克南京后，一度出任大通榷运局长，后来转实业界经营工矿企业。曾任攻鄂军参谋长的张振武（张于1920年任湖南第一师第三旅第五团团长时，积极参加倒谭运动），在第六军成立时，任第十九师党代表，后任第六军政治部主任。参谋处长李明灏任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团长，后来升任该师师长。第二旅旅长是王邦吉，改编后任第十九师副师长。第四旅旅长王茂泉，改编后任十九师五十七团团长。其余中下级军官，除了极个别的在改编时离开部队以外，绝大部分都继续留在第六军供职。后来第六军两次被消灭，这些人中间坚持留下来的还为数不少。

最后应该指出，攻鄂军人枪仅有两千多，装备又低劣，成立的历史也不长，当时在广东一地，官兵人数多于攻鄂军的部队还不少，何以它能优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呢？据我看，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

首先是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攻鄂军政治部林伯渠是著名的共产党人，当时又是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他和这个部队有

较深的历史关系，熟悉部队情况，关心其发展前途。由于林伯渠的关系，有的共产党人（如张太雷等）被请到攻鄂军讲武学校讲课；同时，攻鄂军的中下级官佐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对部队的巩固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因此，中共方面是很希望这个部队能够及早加入国民革命军的行列，直接参加反帝反军阀斗争的。

其次，攻鄂军成立的时间虽不长，但它是在中山先生亲自领导北伐誓师韶关时成立的，又在讨伐杨、刘，特别是二次东征期间，打了几次漂亮的硬仗。因此，各方面对它寄予重望，愿意看到其发展壮大，担负起更艰巨的历史任务。攻鄂军不仅有它的光荣历史，而且部队军风纪较为良好，没有把持税收、派捐勒索等等劣迹，各方面对它有较好的印象，这也是促成改编的因素之一。

再次，攻鄂军在当时能够改编为第六军，和程潜个人也有很大关系。他是留日学陆军的老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时随黄兴在汉阳参战，以后在护国、护法运动中一直是忠心耿耿地拥护中山先生的，当时又是广东国民政府的 16 个委员之一，有较高的政治地位（国民革命军五个军长中，仅有谭延闿和朱培德是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李济深、李福林都不是）。加之其时有实力的国民党人，如熊克武、吴铁城等均被蒋介石扣押，许崇智是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部长，程潜则是不管部的委员，因此，在北伐前需要扩充国民革命军的时候，以程潜的攻鄂军为基础另编一个军，是顺理成章的事。

（1964 年）

## 刘震寰入粤前后

朱绍武 \*

### 一、白马会议

刘震寰以广西“民十”政变，得孙中山的支持，率部300人在梧州叛离陆荣廷，从民国10年的5月19日夜占领梧州起，背后恃粤军为后盾，分途纵横于广西全境，依次收编，不下2万人。当是年秋夏间，陈炯明部熊略、叶举、洪兆麟、关国雄等主力，溯邕江西上（关由抚河上）至百色西隆以上而止。陈立心叛孙，遂于冬月前收缩本系部队回粤，陆荣廷残部陆福祥、陆云高、刘日福、林俊廷、韩彩凤等，组建自治军，唱“桂人治桂”，逐步反攻于邕龙间及左右江。刘震寰以收编而来之众，独立支持战局，处境艰难，遂不得已于民国11年春后，退集钦廉转梧州一带屯驻，仅余下不过六七千人，静待孙中山后命。

这时，滇唐（继尧）方面，与粤陈（炯明）勾结，提倡联省自治。杨希闵、杨池生、杨如轩、蒋光亮、范石生、艾某某等旅长及朱世贵梯团长，在首领顾品珍死后出走黔中，合拥贵州总司令卢焘为傀儡，假道广西东下图粤。卢候袁祖铭入主黔政后率各旅人枪万余，于1921年夏，驱逐盘踞柳州之林俊廷、韩彩凤等散军，进占柳州作喘息计，暂时筹饷。其间曾绑架财主之子刘海如，下白马后至大湟江才放，又关押许多殷实户于柳州湖南会馆勒筹军饷。居间柳人阚宗骅时在百朋为卢之兵站部长，向卢缓颊，以同是桂人不可持之过激，后被杨希闵察觉，还派人找宗骅

\* 作者曾任滇桂联军总司令部副官主任，刘震寰部营长、团长。

算账，谓阚造谣破坏筹饷，宗骅几为所执。

滇军军纪废弛，流氓奸诈（在柳州龙角街曾缴艾旅长枪 300 余），不堪卒道。秋间开拔东下，柳州船只，悉被封用，地方粮食米豆油糖，被刮一空，道经武宣时被陈天太堵住，不让进城。其余武宣一带仍有其他部队，如刘玉山、刘达庆（老统领刘统臣之子侄）等重重关口，滇军此行，都无法与之抗衡，只得驯善通过，互不侵犯。卢焘乘坐的是东和轮船，湾泊至武宣下游白马（亦即叫勒马），总司令部只好在轮船上，有事则召集将领聚会，天天吸食鸦片，在船多日，议论纷纷。其时滇军旗帜并不鲜明，如何抉择，尚不确定。

民国 10 年冬，绍武缘在柳州覃哲民（前号哲卿，后被黄绍竑杀掉）的指挥部任副官主任。卢焘至柳，为了要筹款，大事征发，就地聘请了殷户刘吉廷（绍武之二姐丈）为总司令高等顾问，为了拉拢，绍武被任命为卢焘之滇桂联军总司令部副官主任之职，随同东下。卢离柳后，在桂境收编而来的何中权、刘炳权等杂牌匪军，概不相随，各返长安、罗城老巢。卢焘至此，毫无实力，呆在白马。滇军旅长，各出主意，以四担烟土之资，让卢焘下粤与陈炯明接头，陈明知卢无能为力，敷衍了事。卢就此孑然逃港去职。滇军大部至此莫之适从，实则杨希闵等已与孙大元帅有所联系。卢去不多时，大元帅派邹鲁及驻防三水之陆兰清与驻梧之刘震寰各派代表（刘派黎鼎鉴为代表）来白马开会，计议入粤剿洗陈炯明之策。滇军各部一方面推戴杨希闵为总指挥；另一方面又暗派人下粤会陈，谋骗饷弹。

## 二、江防会议

陈炯明叛变之后，孙中山致力恢复广东根据地，于 1922 年冬派人联络滇桂军向广州进攻，直至年末，局面已成，节节进逼，1923 年初，陈逆在广州仓皇退走，东撤东江一带。

沈军方面，沈鸿英于民国 10 年冬流窜湘赣边境，乞灵于吴佩孚，编为陆军第十七师。吴授沈以“协威将军”衔，补充既竣，兵精粮足，自窥广西省内空虚，遂又不听吴命，于民国 11 年冬初，自动以沈荣光、陈德春（后何才杰升补）、邓瑞徵、李易标四个旅，日夜兼程进驻桂东一带，掩有广西半壁，收编了广西省内的自治军如梁华堂、冯葆初等旅杂色队伍不少。他对陆谭残部、自治军混乱于南宁、柳州以西方面者视如囊中物，处之淡如也。沈鸿英从前历任钦廉、琼崖、韶关镇守使，觊觎粤中财富，虽梦寐亦作图粤呓语，自谓“打进广东，哪怕做三天督军也好”。是年冬末，继滇桂军东下之后，乃循孙大元帅号召，尾随东窥，企图会师穗垣，当派邓瑞徵为西江总指挥，分别向肇庆及清远、琶江、军田、芦苞一带出发，向穗垣推进。此一行动，师出有名，号为援粤，实则居心往抢广州。陈炯明被迫东撤，仍属大敌当前，沈军兵至东江，较之滇桂军杨、刘部稍慢一着，不获进入穗垣。绍武鉴于卢焘既去，滇桂联军总部无形取消，乃移席刘震寰部，缘舅甥之谊有责任为刘服务，同行取道肇庆、三水，进入穗垣，向称广西陆军第一师长之刘震寰乃易帜为粤桂联军总司令，虚张声势。刘震寰民国 10 年倒陆有功，民国 2 年又参加讨袁，因此为孙大元帅所器重。为了追击陈逆，刘自任先头部队，直进至东江东莞而止。震寰人枪六七千，武器亦不十分精锐，不过坚决拥护大元帅，具有相应作用。刘部在东莞前线，总司令部则设于天字码头附近之肇庆会馆。民国 12 年春之某日，开江防会议，各军尚未到齐，中山先生派之胡汉民已到，绍武之卫士营，派八名枪兵扈从刘总司令前往开会，开两部汽车前往会所江防司令部，时间约在当日上午 9 时。正式会议尚未开始，沈军师长刘达庆当场要捆绑魏邦平师长，邦平粤人，滇军杨池生师长认为不对，因会场在江防司令部，即该师师部所在，一旦出事，有所不便，当即出面劝止，谓有事从容商量，不必鲁莽。刘

达庆与同来之师长黄鸿猷遂悻悻然怒而离会，乘坐自己汽车离去，不料至天字码头，遇已戒严队伍，喝问来车，车门卫士答为“刘师长”，寻常高级军官汽车，车头列有蓝底白字的姓字旗，以示识别。戒严之沈军，一闻“刘师长”误为刘震寰，立即开枪射击，达庆、鸿猷当被击中毙命。<sup>①</sup> 江防司令会场争吵之际，刘震寰与胡汉民，见事不妙，乃从后门溜走，刘直溜沙面，跑到香港，等事定方回。

### 三、沈军与刘震寰之关系

民国初年，沈鸿英以著匪受刘古香统领部的帮统刘震寰招抚出任队长，后升管带、督带，民国2年刘震寰举义讨袁于柳州，沈投机驱刘，执古香献功。嗣沈受陆荣廷重用，即升统领、镇守使等职。民国10年刘震寰应孙倒陆，随后溯江水陆并进，派人分别向平乐、桂林收编散军。倒陆之际，沈军驻扎桂东，坐山观虎斗。陆败，桂林、平乐空虚，沈军乘机窃踞，一度称救桂军。绍武奉刘派上桂林向邓瑞徵要求棉军衣10万件，为邓不容，躲入龙启瑞翰林家获免。民国10年冬，孙大元帅五省联军会师桂林北伐，沈军迅窜湘赣。在这次江防会议，沈军刘达庆、黄鸿猷致死，自食果报，沈军更为恨刘震寰入骨，发誓灭此朝食。

沈军至此图占广州之心更炽烈，1923年4月接受北京政府任命，向粤垣进扑，此时滇军各部，初到广州，拒战沈军，战斗前后持续约数日之久，结果沈军不支，从北江逃窜，退回广西境内，此际已属筋疲力尽，休息整补后年底，又遇陆荣廷东山再起，酿成于民国13年春夏，围桂林70余日之事，此是后话。沈军向广州进攻时，市面非常混乱，刘震寰部这时在东江布防，未与沈军接触。

<sup>①</sup> 编者按：刘、陈被杀，另有材料说是当天夜晚，而非会后。

## 四、惠州跳城

刘震寰军下粤，向为前敌，前线除陈炯明军外，土匪亦极猖獗。严兆丰驻东莞，于民国 12 年夏，竟被著匪首袁虾九围困，一日数次请兵救援，后派韦冠英为总指挥，派我打右翼，覃德打左翼，才把土匪打退。

陈炯明盘踞东江，部下有健将杨坤如扼守惠州城，顽强抵抗。刘震寰屡攻不下，民国 12 年秋，乃率手枪队 200 人，冒死猛攻入城，援军不至，随被杨坤如包围，当情形紧急之际，乃跳城逃出，因以跌伤右足，赖卫士掩护始获生还。回到广州，住于法国人开办的颐养院医伤。由于刘震寰这次勇于负责，因公受伤，遂惊动了大小将领和元帅府的高级官员，各人纷纷前来慰问，伤势约月余始愈。

为了养伤，要人来往联络不辍，总司令身边，竟无一些像样一点的卫兵守卫。刘身边的人毫无纪律，毫无训练，毫无礼节，他部下的官兵，统是家乡子侄，一口“麻盖话”（客家话），平日，只晓认得刘总司令，不懂什么阶级。因观瞻所系，威仪所在，为此才设法交涉，每日向兵工厂领七九步枪七条。当日的兵工厂，每日出产步枪不少，都是滇军一手攫去。刘总司令不像范石生有防务经费（赌饷）买驳壳左轮，扩充实力，至此才由绍武领枪教兵，并又由元帅府荐来一批军事人才，来协助整训军队，计派有参谋长伍毓瑞（后兼第四师长）、参谋处长吴安伯、上校参谋张治中（安徽人）、副官长万荫臣，万、伍、吴等皆江西人。

## 五、商团事件

广州一向是各式军队此往彼来，以暴易暴，社会治安无确实保障，于是乃有商团的组织。民国 13 年初，粤人陈廉伯，自己想当省长，借办商团为名，私下购入大量武器，扩充实力，其间

的武器一批，运经黄埔被蒋介石察觉扣留，震动一时。滇桂军获悉，均要求瓜分，刘在私人居所“可园”请蒋吃饭，蒋业已答应。翌日，刘派绍武前往黄埔取枪，追着蒋之汽艇至黄埔军校码头，名片送入，却被免见退回，绍武回至广州，见范小泉（石生）具言其事，范亦云蒋答应拨给滇军若干枝，皆成画饼情形，言下异常忿慨。

自从陈廉伯枪被蒋扣，阴谋毕露。滇军多向商团为难，力图勒缴商团枪械，所有大新街、油栏门、仁济街一带，连日骚乱，此时恰值绍武挟梯团司令名义，拥有人枪千余驻扎于此，俱遵刘总司令嘱约束部下，恪守军纪，处处为商人方便，因此备得人心，当时报纸，大事吹捧一连月余。

滇军杨部与范部在广州，着眼各有不同。当绍武去军校取枪不获，归为范言，范亦痛蒋之狡猾，当明说“我们军人，吃饭靠枪，你回去和刘总司令说，总司令出兵两师，我出兵一师，开黄埔，我们把老蒋，他妈的干掉他去。”刘震寰当时把蒋看的不在话下，其事因循以寢。

## 六、昇昌事件

行驶省澳轮船，原有富昌、昇昌两艘，每日往来，一上一下。在民国 13 年夏间之某日，昇昌开入省城，到达西濠口湾泊，两昌事务，皆由油栏门万隆商行代理办其手续，昇昌办房（该船上经理忘其名）带人携有数个皮箱上岸，内装铜盒公烟，公烟有五六千两之多（每两时价约六元，每铜盒装六两），却被日德社警察分所所长侦悉尾追，将人、物一并扣留后，上报仅其半数。公安局长吴铁城，并去搜查万隆，此事案情重大，省港澳一时为之轰动，昇昌停航数日，不能开船。绍武驻地油栏门，商人颇能相信，纷纷前来请求排难，不得已，绍武乃亲往面晤吴铁城，铁城屈于桂军势力，即把办房释放。自此次桂军信誉传开，大得商

家拥戴，遂造成桂军在粤，军商合一，大发横财。更坏的事是鼓铸低成银毫，很多军官运回家乡买田买屋。事为大元帅府知悉，曾派员到我梯团部查过一次。刘震寰财政，是非常混乱的。他的堂叔刘吉廷，曾到广州代他管财政三月，看见他军需无序，知道他必垮台，未几即行辞去，到香港闲居。

刘震寰在广州霸得的防务经费（赌饷）较少，但聚敛民财亦不少，滇军霸得地方较宽，赌饷较多，但挥霍无度，理财无章，容易得来的银钱，处理上极紊乱，官兵只得伙食，钱财多归团长以上军官中饱。同时军中无隔宿之粮，每日伙食，多属按日零买，连长往往吃空名以自私，排长以下则穷得要命。

滇军的师长赵成梁在广州娶妻，请酒十几天，用了几十万。桂军第三师师长严兆丰，也曾娶一妻，仅用二万，不及滇军挥霍。滇军蒋光亮旅长，到了广州驻在最有油水的地方西关一带，捞得几百万，中途不做了，跑到上海，被青红帮敲竹杠去了几十万。

## 七、可园别墅

自从滇桂军 1923 年初入粤以来，桂军驻扎东江，担任警戒陈炯明前线。滇军以杨希闵总司令为首，率带的有蒋光亮、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所谓蒋范三杨，各军师旅团，分布于省城东西关。李福林部（绰号李灯筒）业已盘踞河南多年，朝秦暮楚，谁来领导广东都好，李是听编不听调的，河南赌饷，他一人独揽。所谓赌饷即番摊捐，大小赌台门帘是白布大书“楼上银牌”，形形色色，到处林立，约在 2000 家以上。每日赌捐，大台一二百元，小台则数十元，每天收入数万元。滇军把持税卡和牌捐花捐，更自不消说了。由霸收而来的税款捐项，其数目大得惊人。刘震寰只收东关一隅的赌饷，分赃不多。滇桂军由穷措大，落入银箩。在这里插叙一下：龙济光退居北京林下，死的时候连

棺材钱都没有。陈炯明在香港连过渡的钱也掏不出来。杨希闵回云南，据朱世贵（前梯团长）在云南河口（民国 24 年绍武在河口办防务经费即赌捐）对绍武说：杨连两毫子打垛都没有，打垛即打大字牌。这插叙来，是一笑话。滇桂军一时豪富，随之而来的便是奢侈淫糜，各级将领，无不自租房屋享乐，利用职权，作奸犯科，应有尽有。

可园一小花园，估计其建筑费不过数万元，小巧玲珑，花木错落，为广州城一别有天地足供憩息之所。刘震寰看上了这所花园，便租来居住，他于民国初年娶入的桂剧名演员玲珑玉和老太太银伯母，则住在香港，间月来省一回。广州当时风气爱讲“架势”（讲面子），如果认得一个总司令，那是相当光荣的。有些团体捐款，就利用美人计，上可园楼上，要求总司令捐签，那是挺有效用的。刘震寰独居日久，就更显得可园风光，具有纸醉金迷的情调。这光景，直到民国 14 年，刘震寰垮台后始告消逝。后来，刘震寰至上海某厅跳舞，100 元港币丢下去，不找钱，给章太炎知道，责以钱财来之不易，教训了一顿。

## 八、云南之行

刘震寰于民国 2 年反袁，青年胆大，勇敢有为，已名重一时。民国 10 年，建立倒陆功勋，义举昭彰，更声闻粤桂。当唐继尧 1921 年受胡若愚、胡瑛、龙云、李友勋等拥戴回滇成功，李友勋在广西怀远担任殿后，被土匪闭十二等围逼自尽，其妻受伤流入匪手，旋由刘震寰起护，为死友护眷回滇，故滇军上下对刘皆有好印象。唐继尧盘踞云南蒂固根深，早与陈炯明倡联省自治抗孙。孙大元帅回粤后，并无进展。刘震寰在粤，环顾滇军杨、范势力日张，大元帅前途黯淡，遂于民国 13 年冬，微服简从，自走昆明向唐继尧筹商机宜，所以至民国 14 年夏初，便有唐继尧寇柳州，龙云寇南宁之举。范石生被李宗仁利用，狙击龙

云，使龙云折回云南，旋范亦被李、白缴械。

刘震寰当孙大元帅北伐之先，原驻东江部队，已与范石生换防，撤回广州西村北江高田一带驻扎。事实上，刘震寰与唐勾结，促成了民国14年广东革命政府武力解决滇桂军。战事开始，滇军师长赵成梁阵前丧命，于是滇军溃乱。西路刘震寰军，在西村之线同日被攻击，首尾截断，刘之堂弟警卫团团长刘震华当场毙命，据说刘震华平日吝啬，自己将饷银换得港纸，私下点数，被部下看见，部下有病借钱，分文不给，火线上便乘机报复。闻范石生说他是被部下打死的。刘震华阵亡，刘军震动，因其精锐全在警卫。刘震寰见景不佳，知有军心内变，乃只身逃向沙面，部下首尾两端，仍在高田方面作战。滇军往往无粮隔宿，至此全无接济，军心大乱，士无斗志，纷纷缴枪。张治中向刘军喊话缴枪者每人5元，愿随者随，安全遣散。刘震寰部乃迅速溃散。

## 九、办军官学校

话说回来，刘震寰自叛了陆荣廷，在民国10年间，节节收编，当时奉孙大元帅委为陆军第一师师长，名义是师长，当时的参谋长是冯卓勋，保定生，广东人，后来大元帅府派来了伍毓瑞、吴安伯、万荫臣、张治中，皆是军事人才，都是有学问的。刘震寰，柳州鸡笼村人，没什么军事学识，向来重用些家乡刘姓兄弟叔侄，冯卓勋位置等于闲曹，后来也当了军校的教育长。刘震寰在民国12年在粤要补充，就派了同村的刘纯武（纯武亦保定生）到了湖南郴州一带，招了几百新兵来。人是招来了，没有下级干部来领带，怎么办？如是开办一所军官学校，校址位于东关皮革公司。冯卓勋当教育长，张治中兼大队长，校内第一二三小队，为本军下级干部调训学员队，第四小队，则招来的学生队，定为一年毕业。

当初到广州，总司令部驻于肇庆会馆，无人守卫，曾命绍武

组织卫士营，没有枪枝就在兵工厂去检点锁头枪，是滇军不要的东西。仗姓朱的面子由人介绍，又收编了朱姓的朱广兴，又在广州方面，收来一些与陈军反对的杂军，组成了卫士营，后来，刘因为跳城伤足，才又在兵工厂每日分得步枪七枝，这护士营才像个队伍，不然的话，那军队就像土匪一样。

至于财政，初下广东之时，刘吉廷是绍武之二姐夫，也即刘震寰之堂叔，他家中拥有资财，为人又极开阔，刘震寰初下广东，就央得刘吉廷来综理财政。刘吉廷走了，就是堂大哥刘炳臣来接手，他们都不是理军需的人才。

## 十、与范石生调防

范石生下广东后，驻扎在西村一带，刘震寰的部队，与范换防其中也有原因。刘震寰打了几年陈炯明，都打不下，同时杨希闵、刘震寰对范也有疑忌。杨希闵等系民国 11 年被唐继尧回滇后挤出云南的，唐杨之间，虽属同为滇军，究之声气不投。滇唐为了想把在粤滇军分化从中攫取其一，因在昆明召令范石生之父筹商对策，欲由范父召令石生听他的话，范父不明唐意，误认为唐有意胁迫，遂寻自尽。范父死后，范石生意为滇唐逼死，恨唐入骨。至于唐氏，坐大云南，不以孙大元帅为意，对孙措施，向不尊重，种种矛盾，遂造成刘、范调防。表面上，各皆不露龃龉，实则勾心斗角，各行其志。这是根据我们在粤所见揣测的。

范石生字小泉，与我们刘部人员最为亲暱，范曾拜银伯母为契母，又叫他女儿拜刘吉廷为契母，称绍武为表舅。后来，滇桂军被解决，而范部独存。

(1963 年)

## 江防会议事变后的陈德春

王鸿鉴 \*

稍有点年纪的广东四邑人士，多知道在 40 多年前在新会江门一带有个小军阀叫陈德春。关于陈德春的家世，我不清楚，只知道他别字叫恩波，广东钦县人。出身于行伍，曾当过北海镇总兵苏元春的管带，后跟冯子材，仍任管带职。民国初年，冯子材的儿子冯相荣出任钦廉督办，他任帮统。及龙济光督粤，他从广西调至广东。当潮梅镇守使莫擎宇响应讨袁时，他任第一师长。其后，桂系军阀陈炳焜盘踞广东，与广东省长朱庆澜明争暗斗，两方均争取联合地方派军人，以增加力量，他乘机攫得江会地盘，被任为江门警备司令。1920 年 9 月，援闽粤军回师逼近广州时，他与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及广惠镇守使李福林一致行动，响应压迫桂系军阀，因此得任四邑善后处长。1922 年底，滇桂军从桂东下讨伐陈炯明，陈德春见陈炯明大势已去，便投机响应。

1923 年 1 月 26 日，发生江防会议事变，翌日，胡汉民、古应芬、邹鲁等出走香港，在东京酒店密商对策。古应芬认为滇桂军已占据广州，许崇智的粤军仍未回粤，而惠潮梅一带及琼崖各地仍为陈炯明、邓本殷所割据，邓承荪、吕春荣又态度不明，唯有五邑一带可以设法立足；特别是江门一地，为西江咽喉，可驻扎海军，如能得陈德春拥护讨沈，设立大本营办事处于江门，以策划指挥，伺机收复广州，似属上策。当时胡汉民、邹鲁等赞成此议，旋即商讨应当派何人前往洽谈。胡、邹等原属意于吴铁

\* 作者时任省议会议员，与陈德春有交谊。

城，吴不愿往，转推我为说客，说我是省议会议员，且与陈德春的参谋长林乾初及副官长王光海素有交谊，以个人关系前往联系，当有希望。胡、邹等乃嘱吴铁城找我到东京酒店商谈。我以陈德春与我是南路八属大同乡，陈任营长时，与王光海常到八属留省学会座谈，与我颇有交谊；且以我所知，陈与沈鸿英不太和好，对许崇智颇有好感，乃答应前往试探。随由胡去电上海向孙中山先生请示，孙先生很快回电表示同意，说可委任陈为两阳顺德香山八属讨贼军总司令。于是我便前往江门，先找陈德春的参谋长林乾初及陈的副官长兼江门警察厅长王光海，从他们口中探知陈德春正举棋不定，观望徘徊，我乃请他们向陈德春先行试探。后林王两人以初步了解情况告我，谓陈对沈鸿英桂系颇不满，只要维持他在四邑的地位，他愿意拥护讨沈，我乃回港复命。第二次我到江门，由林王陪同我与陈德春会谈。当时我向陈宣示广东局势及晓以大义，陈稍为筹思后即答允，我乃将孙中山先生的委任状交陈。当晚陈德春设宴款待我，并邀所部处长营长等作陪。

陈德春答允联合讨沈后，孙中山先生于同年2月6日，复委任陈为中央直辖广东讨贼军第三军军长，便趁宋伯芬回粤之便，写信致陈德春，勉陈努力戡乱。

就在这个时候，胡汉民秉承孙中山先生命委古应芬、程潜、梁鸿楷、陈德春、莫擎宇5人为大本营江门办事主任，将陈策所属海军及梁鸿楷粤军等集中于江门附近，派程潜为江门各军指挥官，拟以江门为基地，会合许崇智的粤军夹攻广州；同时收编南路、琼崖各处陈炯明残部和其他杂牌军队。

陈德春奉委后，以一营驻江门，其余仍旧散处在新会、台山公益广海及开平、恩平一带收取贿饷。这时杨希闵因洞悉沈鸿英奸谋，早将魏邦平释放，刘震寰所部桂军已撤防广九铁路沿线，粤军亦集中于西江江门一带，朱培德部的滇军亦将抵粤。沈鸿英

以广州无法立足，于是月 14 日率部退往韶关。孙中山先生亦于同月 22 日由沪抵广州，设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名义节制海陆各军。3 月 18 日，海防司令陈策及粤军第一旅旅长李济深的部队，突将陈德春所部包围缴械。陈德春闻警，仓皇持两枝驳壳枪从司令部冲出，旋跑至江岸，纵身跳入江中，泅水至江门往香港的客轮，适船将启程，遂逃往香港。

陈德春所部忽被缴械的原因，据当时报纸所称，谓陈抗命不受海防司令陈策的调遣，故孙中山先生密令陈策相机办理；但另据古应芬左右透露，则谓孙中山先生事前不知此事，系古应芬有意充实李济深所部力量，所以缴得陈的枪械后即给李扩充兵力。以我观察，陈为人反复无常，当时并非真心投靠革命，且向来横行江会一带，包烟庇赌，久为地方人士所不满，这是一个很大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陈德春所部军纪很坏，而当时粤军第一师纪律严明；同在一个地方，有这两种不调和的现象，自不能不解决陈德春所部，以维持军纪提高战斗力。

陈德春所部被缴械后，陈策兼任江门江防司令，吴铁城为五邑善后处长。自此，粤军梁鸿楷，李济深所部乃以江会为立足点，南攻两阳高雷钦廉，西进肇庆云浮罗定等地，逐步扩展，而李济深亦因此扶摇直上，由旅长兼任西江督办，镇守粤西。

陈德春逃到香港后，即匿居般含道私寓。我后因事往港，曾往造访。晤面时陈即骂我，说上了我的大当，并拿出他当时为乱枪击穿两孔的西装给我看。后隔一年余，陈病终香港。这个在江会一带作威作福多年的小军阀，从此便了结他的一生。

(1965 年)

## 入粤滇军范石生部最后消灭记

陈杰夫\*

辛亥革命以后，滇军曾先后两次入粤，第一次是李烈钧在护国战争时期率滇军第二军张开儒、方声涛两师入粤，参加讨伐袁世凯的走狗广东都督龙济光。第二次是杨希闵奉孙中山先生命讨伐陈炯明叛变。第二次入粤的滇军，视广东为征服地，无恶不作，结果归于消灭，而杨希闵的被消灭，是在国共合作的革命高潮下，为北伐肃清反侧，打下基础，在革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所以也比较引起人们的注意。虽当时杨希闵入粤是统率三个军，杨任总司令兼第一军长，范石生为第二军长，蒋光亮为第三军长，由于范石生与唐继尧有杀父之仇，于1925年春自行率部经桂入滇驱唐，失败后便流离于广西境内，任为16军军长驻平马。在讨伐刘杨之役，他没有卷入漩涡，独能保留原有实力。其后经粤北辗转湘赣边境，十余年间，一直抗拒蒋介石的改编和人事调遣，始终维持它固有的封建关系，内部虽有倾轧，而外人莫能问津。所以范石生去，曹文彬继，一脉相承，私相授受，苟延残喘。这是军阀割据时期的畸形现象，原不足怪，但旧社会的大鱼吃小鱼，军阀下场，究竟逃不出一定的规律。笔者对该部的消灭经过，亲与其事，谨就记忆所及，提供这方面的情况。

1936年夏，余汉谋在赣南大庾酝酿返粤，取代陈济棠，奉蒋介石电令赴宁授命的时候，范石生部曹文彬师忽自闽赣边境开抵大庾以北30公里的杨梅寺，由于该师自范石生因内部矛盾消极离职，不接受中央的调遣，由陈济棠暗中按月接济军费四五百

\* 作者时任余汉谋部的上校参谋兼炮兵指挥。

万元，与陈济棠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引起余部的极大注意，认为是受陈的命令尾随牵制。我那时是余军部上校参谋兼炮兵指挥，一天一位广东同乡、云南讲武堂同期同学谭天如突到我家里。他是曹师的旅长，据说赴粤省亲，道经大庾，特来坐访。异乡逢故人，这是旧社会里的所谓乐事，在我思想上立即掀起一番打算，认为天假良缘，奇货可居，情感上非常兴奋，故对谭特别亲热，殷勤款洽。经过一夕夜谈，了解到曹师的当前情状。原来该师经费自筹，无固定驻地，而且大都贫瘠，官兵伙食，时有中断之虞。我试探他此行是否负有向陈济棠求助的任务，谭完全否认，并力辟该师与陈有关系的传说。我认为有机可乘，乃以关怀同学义不容辞，惺惺作态，向谭表示，愿为帮助。我们两人各怀心事，形成默契。当时将晤谭情况向副军长李振球汇报，并说谭自云南讲武堂毕业后即在该师服务，由排长升至旅长，以一个外省人在云南部队而有此地位，足见有其历史渊源及一定的威望。在本军返粤倒陈之际，为避免后顾之忧，跟他们联系，是实在不可多得的机会。针对该师面临军费竭缺的情况，建议先行拨发该师补助费二万元，给以实惠，借资笼络。李振球极端赞同，马上命令发二万元给谭具领。我因此进一步向谭吹嘘余汉谋的发展前途，宣扬他为人的伟大慷慨，虚怀若谷，对部属的爱护周至，任何问题，都可以协商解决；暗示曹师归附之意，把今后自己可以从中撮合的责任挑明，彼此尽欢而散。

一周后余汉谋由宁回抵大庾，得知有谭天如之事，深为嘉奖，并指示加紧联系，要我克日代表他以第一军长的名义到该师宣慰，借观虚实，作进一步的拉拢。我邀功心切，正乐得一显说客身手，乃于某日下午，单人匹马到杨梅寺曹师驻地，黄昏到达时，不期在该师部门外，首先碰上旧同学王甲本，宽衣解带，独自在树阴下纳凉。乍见之下，彼此一番惊喜。他问我来此干什么，我答只为探访曹文彬师长而已。我问他曹师长在不在，他说

在里面，就让我独自进去，表情乍转冷淡，使我莫名其妙。因为在谭天如口中，并没有提及王甲本其人，王原是范石生离职后接任师长的第一人，他的父亲是范石生的同学，所以认他为义子，由于蒋介石对非嫡系部队采用釜底抽薪、蚕食鲸吞的伎俩，把王甲本调到陆军大学去训练，而委任一位云南籍黄埔第一期学生的白天民去接替王甲本的职务，引起该师全体官兵的反感，没有接受命令，另外拥戴原任该师旅长曹文彬为师长，从此跟中央的矛盾就激化起来，再不发生任何关系了。而王甲本在陆大毕业后，已另辟蹊径被安排给予某军副军长职务，徒具空衔，郁郁不得志。不知是受中央的指使，还是他个人的野心，刚好也在这一时期，到该师作客，显然是有所企图的。

我跟曹文彬见面时，先把同学关系，胡诌瞎吹，然后将余汉谋对该师的关怀诚意，表述一番。当然在他收到二万元的补助军费及得知谭天如接洽经过的情况后，已胸有成竹，所以显得很感激和热情。当晚设宴款待，全师团长以上军官作陪，惟不见王甲本在座。席间我试探王甲本的动向，提出王甲本是否回来任职的问题，曹说王是我们的老长官，这一次只是为访旧归来而已，别无他故。但竟意外地引起一位陈参议（后来知道是与该师有历史渊源的广西方面到此作说客的）勃然变色的一席话，说王甲本不能走了，也不会走了，说什么王甲本是本师的灵魂，没有王甲本就没有本师的灵魂，态度严肃。曹文彬从容表示不以为然，泰然处之。席散后我通过曹文彬跟该师的一位黄旅长谈话，我问他是云南讲武堂那一期的同学，他答是法政学校毕业后，投笔从戎由军佐书记而转为正式军官的，由他的自述，知道他是曹文彬一手提拔的，还没有摆脱书生的习气。我将会晤谭天如的情况及余汉谋对该师的关怀表述一番之后，他表示该师的一切与谭天如可以左右包办，同为拥护曹文彬的一派，暗示王甲本再不能在该师起任何作用，当时有该旅的一位黄团长在一块，由他介绍之后，知

道这一位黄团长是曹文彬的亲戚。

翌日我辞归向余汉谋复命，我踌躇满志地认为此行有莫大的收获，但经过分析，认为该师内部还有不少矛盾，很明显王甲本正在阴谋活动，陈参议又为之推波助澜，都各有他们的目的意图，同属不利于余汉谋方面。在当时情况下，余军急于返粤，对该师的处理，实属是首要解决的问题。经过军部会议的讨论，决定先以余汉谋军长的名义，命令该师克日集中安远待命，试探该师的动向，然后再制订策略。结果该师并不遵命，相反在现驻地拔队去崇义向仁化进发，有出粤北切断铁路线阻击余军或投靠广西的企图。一时揣测诸多，责难纷纭，军部为此哗然，有说陈杰夫徇私误事，有说陈杰夫贪功受骗。我迫于情势，无法自白，乃赌气向余汉谋请缨，指拨兵力四团归我调遣，负责堵截曹师，三日之内把它解决于崇义地区，保证完成任务，否则愿以军法从事。当时副军长李振球即对我说，这样一来，可能解决得了，但万一解决不了，那么当地老百姓就得向你敬礼了，意思是指散为流寇，贻害地方，大家默然，我乃不敢坚持。毕竟余汉谋头脑比较冷静，针对该师存在的矛盾，认为还有可乘之机，要我立即到仁化游说曹师，尽一切可能扭转局势，对我慰勉有加，寄以大任。我受鼓励，头脑发热，又抱着一番幻想，不顾生命危险，跟余军返粤先头部队彭霖生团一起启程，偕军需一员乘车由大庾起程经曲江直趋仁化，先到城内大地主卜庆堂家里住下。卜庆堂原籍广东梅县，落籍仁化，有同乡关系，是仁化县的参议员，当地官僚土豪恶霸三位一体的代表人物，左右地方，县长也得仰承鼻息，平日勾结军政人员，趋炎附势，无不极力逢迎。我把任务向他说明之后，即由他派人四出侦察曹师行动，同时制造谣言，到处宣扬余汉谋的部队为截击曹师源开向仁化，然后与曹师联系。待电话接通，与我通话的不是曹文彬，分明是王甲本的口音，我对他说，甲本兄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他答在长江。我问他谭天如

在那里，他说谭已过了长江。我问他贵师的动向怎样，到哪里去，他说一切服从余军长就是。到此电话戛然而止，以后就屡叫不通。我心知有异，判断曹师内部矛盾，正在爆发，分化已成定局，深为兴奋；但没有掌握真实情况，如何应付事机，胸中仍无成竹。翌日上午据报仁化长江来人，传昨晚曹文彬师部给他自己的部队包围，师长曹文彬只身由后门逃遁，不知去向。我意识到这必然是王甲本所作的勾当，认为发展下去，曹师无疑会走向反对余汉谋的道路，我心情非常焦急，无聊之余，乃出城散步，忽见曹师士兵一人匆匆迎面而来，情急智生，我用云南口音喝问是什么的，他答是送公文给黄旅长的，我要他把公文交出，他以为我是同师的军官，故毫不犹豫。我拆开一看，原来是曹文彬给黄旅长下达的命令，内容很简单，大意要该旅迅速越过粤汉铁路，并向始兴周田方面严密警戒，寥寥几句话。因此我知道黄旅尚在仁化以北，而这一道命令，更是王甲本在篡夺职权之后假借曹文彬的名义发出的。我把公文交回传令兵，要他继续送去；即回城嘱卜庆堂派人将仁化以北的所有电话线剪断，以隔绝曹师内部的通讯，一面利用仁化以北的电话线与黄旅联系，没有多久，即接通电话，我问黄旅长是否知道曹文彬的下落，他大为惊讶，我把王甲本驱逐曹文彬的消息及刚才所拆阅的曹师命令的情况告诉了他之后，要他让黄团长跟我通话。黄团长是曹文彬的亲信，是反对王甲本的中坚力量，经我轻轻一说，便义愤填膺，表示与王甲本不共戴天。我告诉他，王甲本的假命，马上就会到达，事实昭然若揭，再无回旋余地，并痛责谭天如的软弱无能，并通告余汉谋部为此采取的部署，威胁他们早作挽救办法。黄团长要我稍为等待，经过他与黄旅长商议之后，由黄旅长在电话上征询我的意见，向我求教。我以同情曹文彬为词，敦促他们首先不要听从王甲本的乱命，迅即率部直开仁化，向余汉谋表示服从，一切居间说项，由我负责。两黄在进退两难之下，答应照办，当日傍

晚全旅开抵仁化县城。我在卜宅盛宴款待该旅营长以上军官，我与黄旅长和黄团长两人虽仅有一面之识，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对我显得特别亲切，我除再次为曹文彬叫屈及表示余汉谋对该部的关切外，极力表扬黄旅长和黄团长对曹文彬的爱戴和忠贞，并把陈济棠联系广西军阀，引狼入室，为个人权位的情况作了简略报告，他们一致表示绝不能同流合污，情绪非常激昂。为了造成曹师内部对抗形势，我向黄旅长建议，为防备王甲本的袭击，将黄团长所部在城外占领阵地，向董圣方向警戒，他一一照办。由于谭天如旅尚在王甲本挟持之下，我们商议如何解除对谭的威胁及把他的部队争取过来，结果采取我的办法，由黄旅长、黄团长两人亲笔写信几十封，挑选可靠排长及军士向谭旅平日跟他们比较接近的军官，包括班、排、连、营长，指名秘密投送，力数王甲本罪行，号召为曹文彬复仇，归附余汉谋；并附奖励条款，带队归附者受奖，个人来归任用。一日夜间谭旅部队由营长以下军官率队开抵仁化的，约计 20 多人。至此王甲本能掌握的队伍不过千人左右，后来见大势已去，又自动放弃，陆续投归，王甲本人只随带十多人向广西方面逃遁。这是我部军官何国为所目击。当时还出现一场惊险的镜头，经过是这样的，我在仁化任务告一段落之后，要何国为乘车先回曲江复命（那时四路军总部已在曲江正式成立），大概离仁化 20 多里的公路上，突然给一小队云南士兵拦截，一位彪形军官，喝令检查，询知和我的关系之后，勃然大怒，拔枪作杀人状，何国为不知底蕴，力辩无辜，苦苦求饶。那位军官稍作思考，骂道：“陈杰夫这家伙竟把我的部队弄到这等田地。”才悻悻挥手放行。

我在仁化协助黄旅长收容谭旅的官兵，经过两日的时间，局势已趋稳定，因为谭旅两位团长，一位跟王甲本偕行，一位自行离队。由黄旅临时指定两位营长代理团长职务，把整个部队编成四个团，曹文彬、谭天如都没有下落，不知去向。这在黄旅长来

说，正乐得唯我独尊，顺理成章承乏师长职位。至于我呢，认为这样一来，不独解除了余汉谋后顾之忧，还意外地把曹师整个部队，拉到手中，论功行赏，自非寻常可比，心里暗算着副师长位置舍我其谁，还想进一步把师长接过来。想到这里，真不禁心花怒放。我奉余汉谋的电令，克日率队由仁化开拔，集中高桥待命。这个时候，黄旅长已对我绝端信赖，言听计从。我随军同行，将到高桥附近，余部罗懋勋团长相迎于途，首先要我为他隐瞒身份，伪称是总部副官，奉余总司令来迎接黄旅长的，我询其究竟，始悉高桥附近，已布置重兵，余已下达命令要在当晚曹师宿营后，就地全部把它解决，俘虏缴械，不能延误。晴天霹雳，使我不知所措。我对罗说，该师人强马壮，装备优良，且久经战斗，应该谨慎从事，罗以军令攸关，不敢决定，要我速向余请示。我把曹师的军容士气，详细报告，极力反对武力解决，保证有把握，不费一兵一卒把它解决。余答应电饬罗团暂缓执行命令，并派专车到高桥，要我当晚赶回韶关面商一切。我黄昏到达总部，会客室内，一堂济济，我尚来不及周旋，余一见我，即拉入内室密谈，对我大加奖励嘉许之后，由我汇报曹师来归的详细经过，我力为黄辩护，解说他如何向往本军，敬佩余总司令等等，希望保留整个部队，这与其说是友谊情殷，毋宁说是出于个人利益。毫无疑问，部队一旦消灭，我的幻想，也就无从实现了。余说曹师缴械，势在必行，中央已有命令，该师是叛逆队伍，早经判处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部死刑，严惩不贷。余还说会客室里的两位中央大员黄震球、钱大钧就是专程前来监办这一件事的。余见我左右为难，无限伤感，复对我说，对于曹师的处置，他可以保证全师军官生命的安全，要我不要为此顾虑。晚饭后余复召我商谈解决曹师的问题，我始终坚持不能操之过急，以防发生不测，并保证完全有把握可以将该师集合在曲江飞机场搭好枪架，听候总司令训话后，把它缴械。余有点不敢相信，推说目前

亟待返广州，我的办法缓不济急，没有同意。我又提出第二个方案说，可以调该师来曲江接防为辞，于到达韶关火车站的时候，控制附近高地，利用浈江水涨，在车站入城通道上，一个个地缴械。余不能遽决，乃叫参谋处长陈勉吾来征询意见，陈是高桥缴械方案的策划人，他认为这是再好没有的办法，还吹嘘他过去曾主办这样的成功例子，极力反对变更原定计划。余更迟疑莫决。翌晨余把这一问题交由副军长李振球及在曲江的师长张瑞贵研究取决。我把意见详述一番之后，并针对陈勉吾高桥缴械的计划，把李振球说过“如果解决不了，老百姓就得向你敬礼”的话，重述一次。结果一致支持我的建议。陈勉吾很不服气说：“这样我就不负责了。”李振球说，当然不要你来负责。余汉谋采纳了我的建议，即日以劳军为名，电召该师营长以上军官收到韶关总部宴会，在入席前把他们随身携带的手枪解除，然后迫令黄旅长下达命令，于翌日中午3时前全师由留队值星官率领开拔到韶关接防。事先在韶关火车站严密布置，在该师部队到达后，一一按原定计划，把它缴械，完全没有抵抗，很顺利完成任务。

我因为个人目的没有达到，反背上卖友求荣恶名，内疚心中，乃向余汉谋表示消极。余极力劝慰，答应从优安排善后，绝不使该师官兵为难，循我的要求，清发该师半年全部欠饷，军官愿留者原级录用，不愿留者一律资遣，士兵拨补余军缺额。记忆所及，只有黄旅长一人在总部报到，但也没有多久就自动离职。滇军范石生部之被消灭的经过，大致如此。

(1965年)

## 建国粤军第三师概况

曾其清\*

孙中山先生于 1924 年 1 月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政治方面出现朝气蓬勃的崭新面貌；军事方面也积极建设，开办黄埔军校以培养军事干部；复健全编制，减少指挥单位，取消讨贼军名义，改为建国军番号。当时粤军的系统紊乱，如从福建回粤的东路讨贼军是许崇智指挥的，其余粤军为梁鸿楷的第四军李济深的第一师、郑润琦的第三师等部队，都是直系于大元帅指挥的。系统已多，作战指挥难期灵活，乃令粤军和东路讨贼军均改称建国粤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成为一支整体的粤军。粤军第三师乃是时改编为建国粤军第三师的番号。

建国粤军编成后的主要部队为梁鸿楷的第四军；李济深、张民达、郑润琦、许济各师长所率的一、二、三、四师和其他独立旅团，总人数约 35000 人。

第三师系粤军宿将魏邦平创建的部队。1923 年 1 月 26 日，魏被滇桂军阀在广州南堤江防司令部会议时扣押。胁迫第三师（师长陈章甫）缴械时，该师魏巍明的第十一团驻在香山县，不在广州，未被缴械。后魏邦平以这一团为基础，并以海军陆战队司令张祖荣率带完整的四个营编入该部，以及收编散兵土匪和使用该师旧存枪械，拼凑之下，恢复第三师。以该师原第六旅长郑润琦为师长，巫琦为参谋长，李雄伟、张祖荣分任第五、第六旅长，魏巍明、何彤、麦翰文、周汉铃等为团长。改编为建国粤军

\* 作者时为建国粤军第三师师部参谋。

第三师的前后，复调整人事：师长为郑润琦；参谋长胡铭藻，但胡到任不久即调总司令部工作，由何彤接充；巫琦、何彤（兼）任第五、六旅长；第九团长周汉铃，第十团长姓名忘记，第十一团长邓龙光，第十二团长钟震华；工兵营（后改编为第十一团的一个营）营长李汉魂，炮兵连长詹某。分驻四会、广宁等县。该师由于新编不久，革命气息低沉，素质低劣，纪律废弛，干部、枪械均很复杂，如团长周汉铃乃绿林出身，其所部也不少是从土匪改编而来的，实是一支残破的队伍。

郑润琦，三水县人，是太平天国军的叛将郑金（花名大口金）的侄子，出身巡防营军官，是不学无术的公子，其内外各事悉赖参谋长何彤主持。郑尚能用人不疑，对何彤是信任的。

何彤，顺德县人，保定军校早期生。某次部队经济异常困难时，变卖他祖遗行走广州至大良的渡船以济军食，故深得部属的拥戴。何的方针是：服从孙大元帅，坚决与第一师靠拢，唯李济深的马首是瞻。当时孙中山先生特任李济深兼任西江及梧州地区的“西江善后督办署”督办，所有军民两政，均隶属督办署管辖，驻境内的第一、三师和黄绍竑部在李济深督办的领导下，团结互助，故当时有“西江三角同盟”之称。

孙中山先生设置“西江善后督办署”的动机，当时虽无明白指示，但估计是因陈炯明叛军负隅东江，久攻未克；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盘踞广州，不服从命令，可说是前有虎狼，后有蛇蝎，形势是很不利的。为未雨绸缪计，势须控制西江为回旋余地。是否如此，虽未证实，但李济深则确不负中山先生期望，在国民革命事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何彤对第三师的残破部队，亟思彻底整训，首先，挑选年轻身健、文化水平较高的现役下级军官进西江讲武堂轮流受训，毕业后回原部队做骨干。西江讲武堂设在肇庆，由戴戟任堂长，隶属于西江善后督办署，以轮训一、三师和黄绍竑部下级军官为目

的。其次，在四会开办军事教导大队，以轮训现役班长和优秀上等兵，调师部参谋余华沐、许元干和曾其清等主其事，办了两期才结束。此外，何彤特别注意延揽陆军学校毕业干部为骨干，如邓龙光、李汉魂、张达、韩汉英、陈芝馨、陈公侠、余华沐、黄世途、刘飞军、李锡朋、许元干、曾其清等。当时粤军部队中军校毕业生之多和能得到信任的，除第一师外，就是何彤部了。

第三师经何彤整训之后，面貌有所改变，战力亦有提高。但由于整训势难不淘汰一部分腐劣干部，那些腐劣分子深知整下去，就会难以立足，于是，结成反何阵线，阻挠和破坏该师的整训。

1924年3月底直属大元帅府的桂军刘玉山军约四五千人，由素称骁勇善战的所部师长陈天太统率，借口经过西江，攻占南路（南路由陈炯明部申葆藩盘踞），其实是要师假途灭虢伎俩。刘军目的，不是南路，乃是袭取西江和梧州，继取广西。经李济深以督办名义去电劝阻，亦不理会。李济深、郑润琦，黄绍竑等乃决心会师以武力解决刘军。黄绍竑攻其前，李师黄琪翔、蔡廷锴两营，郑师李汉魂营摄其后，海军江固舰等舰艇由西江水面向其侧背炮击，并截断其水道的交通补给。在都城附近激战后，生俘陈天太并彻底消灭该师。这是一、三两师和黄绍竑部合作后的又一次行动。

1925年2月孙中山先生卧病北京时，大元帅府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率粤军和黄埔军校教导团等出发东江，讨伐陈炯明，即第一次东征。许令第三师抽调一个旅出发。因何彤旅战斗力较强，故特指定何旅出发。该旅第十二团长钟震华贪生怕死，不服何彤指挥，借口行军费无着（当时因经济困难，行军费很少），拒不出发。何彤左右有人建议先行解决钟震华，以振纪纲，然后出发。但何彤认为大敌当前，决不能发生内讧，只得忍气率邓龙光的第十一团、师部炮兵连、第十二团的邓杰营（邓杰是邓龙光

的胞兄，是服从何彤的）共4个营和1个炮兵连出发。由于钟震华的阻挠，拖延数天，致虽急行军赶路，仍赶不及参与兴宁战役。幸许崇智深悉何的苦衷，未予处分。何到达潮汕后驻潮安候命。第三师对东征战役，可说是劳而无功。

东征军的作战序列是：黄埔军校教导团两个团、粤军第一师陈铭枢旅、粤军第二师张民达师、粤军第三师何彤旅、粤军第四师许济师、粤军冯轶裴、曾则生两个独立团和吴铁城的警卫军一个团。数量上敌众我寡，质量上我强敌弱，而且东征军得到中国共产党的东江各处农会和农民武装的大力协助，因此，以疾风扫落叶之势，所向披靡，给叛军以致命的打击。

1925年5月间驻广州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承孙中山先生之丧阴谋叛变，企图颠覆革命政府。到6月5日大元帅府以杨、刘叛相已露，无可挽回，乃下令撤免杨、刘的职务，杨、刘乃公开叛变。滇军占领白云山、瘦狗岭、石牌、东山，沿珠江北岸长堤亘西堤、黄沙、西村之线，构筑阵地，并不顾市区人民的损失，在西堤大新公司（现在的南方大厦地址）8层楼顶架山炮，当交战时竟曾向珠江水面海军舰艇和河南地区开炮百数十发。桂军在石井以北，三元里、龙洞一带沿流溪河南岸地区布防，以内线作战策略，对抗我讨逆各军的进攻。

大元帅府洞悉杨、刘叛变阴谋后，早已密令在潮梅的东征军忍痛放弃惠潮梅地区，回师讨逆靖乱，任进攻广州东线的作战任务，与进攻广州西北线的粤军、湘军、朱培德军、广州河南的李福林部和海军舰队及一些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协同作战。当时，杨、刘负隅广州，与侵占广西南宁和柳州号称十万人的唐继尧军，及屯兵大庾、窥伺粤北的方本仁军，东江的陈炯明叛军，遥相呼应，其气焰是异常嚣张的。但由于杨、刘逆军在粤数年，视广东为征服地，无恶不作，广大人民恨之入骨，尤其乘中山先生之丧而叛乱，军心民气莫不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工人和郊区

农民，在中共领导下切断逆军的交通运输线，瘫痪其军运补给，致逆军陷于四面包围、动弹不得的状态。我讨逆军的形势是绝对有利的。

讨逆各军于6月12日拂晓开始攻击。防守东线的滇军极为顽强，从攻击开始到结束，战斗都异常激烈。何彤旅在东线任瘦狗岭方面的攻击任务，全旅官兵均异常奋勇，与敌人反复冲杀，连长周某曾徒手肉搏，击杀滇军军官，其激烈情况，可见一斑。上午9时许，素称骁勇的滇军师长赵成梁在石牌阵地中炮毙命后，敌阵动摇，我军全线冲锋肉搏，滇军不支，向广州市中心区溃退，企图抢掠。我讨逆军跟踪追击，不予敌有喘息机会。复由于工人、农民、小贩等用担杆、锄头、砖石作武器，协助战斗，迅速将敌肃清，广州得免再受抢掠的浩劫。当时广州人民有“打田（田与滇同音）鸡，真畅快”之称，对滇军的痛恨可想而知。桂军同时也被我北线军在石井附近包围，于傍晚全部缴械。全线当天结束战斗，全歼敌逆。

第三师除何彤部在东线作战外，余部由郑润琦指挥，从三水沿广三铁路会同友军向广州扫荡，在石围塘、芳村一带与滇军作战。

杨、刘逆军肃清后，第三师奉许崇智总司令命令驻东莞整训，并增发一批枪械，准备扩编。9月中旬由于蒋介石施行排除异己阴谋。先将许崇智监视，假冒许的命令，以第三师通敌有据的“莫须有”罪名，迫令缴械。事前蒋又假冒许的电报令郑润琦、何彤等回广州开会，予以扣押，缴械后才恢复自由，其冤也可知。当接到缴械命令时，已被党军教导团和第四师（师长许济，该师于数天后也被蒋缴械）所包围监视，由于群龙无首，意见分歧，少数人主张抗拒缴械，向惠州突围；但多数人都反对说：“我们问心无愧，许老总要我们缴械就照缴吧，也足以表明我们的心迹。如向惠州突围，投降陈炯明，宁死也不干。”乃毫

无抵抗，遂令缴械。至此，建国军第三师成为历史名词了。广东部队除李济深师、李福林部以外，悉被蒋介石缴械消灭，故不仅第三师也。

(1965年)

## 刘玉山东下讨伐陈炯明的经过

陈剑崖 \*

刘玉山是刘达庆的堂弟，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生，自参加中华革命党之后，就常追随在孙中山左右，后来奔走上海、香港、广东之间作些运输枪弹及宣传革命等工作，在1920年粤军驱逐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等军阀进抵潮、梅时，桂系各部养尊处优，多狼狈溃散，零零星星的逃回广西。刘达庆的第六军也在那时率领残部由惠州转进回驻浔、梧一带。刘玉山在1922年奉了孙中山的任命为柳州警备司令，但是，手无一兵，无从进行；乃由刘达庆拨给官兵两营，枪约250枝，刘玉山立即率领来柳州就职，并继续将所部整理，前后收编罗镇江等600余人，陈祁昌与龙小凤两个支队共有500余人，与原有的部队合并勉强成立了一师，刘玉山自兼师长。

嗣滇军即杨希闵、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范石生各旅由黔入桂，奉命经柳东下讨陈（炯明），滇军是饷械两缺，尤以弹药欠缺为多，不少士兵持梭镖作战，但异常勇敢。官兵每月的饷项多以烟土作抵，沿途零星拍卖，打破了无粮不聚兵之说。范石生在未东下之先，曾取道梧州私出香港，骗得陈军的弹药400万发，港币4万元，遄返梧州时，又已吞没了一半有多，深为滇军各旅所不满，但处在那种战争状态中，亦莫可如之何了。及师次武宣，为陈天太（绰号陈大麻子）与盘踞在大藤峡一带的匪首徐颂平所阻。在柳江下游的碧滩这一带，山峦重叠，连绵不断，形势险要，军行诚属不易。孙总理适于此时加派了叶夏声携饷项与

\* 作者是刘玉山的同乡，曾任刘部参议。

任命状来改编刘玉山各部，着其会合滇桂各军东下讨陈，而后卢焘是时亦以滇军总司令的资格，派了周仲良来与刘玉山联络，并暂留在武宣与碧滩之间，等候他前去商酌解决各军前进路线。卢之印信，大几盈尺，将军斗大黄金印，信为不诬。范石生讥之曰：“黔驴之技，只此而已。”刘玉山也就趁此机会回返武宣与陈（天太）徐（颂平）两部洽商，结果皆能就范，乃任陈为前敌总指挥官，徐为旅长，两人所有部众，统归编入刘部内。以后，各军东下方得以顺利通行。沿河直下梧州，未经过任何战争，就前进抵肇庆。

时沈鸿英、刘达庆、刘震寰各部亦陆续到达，探知陈军大部业已分路退出广州向东江一带逃遁了。各军随即兼程东下，沿途亦未遭遇激烈抵抗，就进达省城，时在1923年的初春。嗣后各军各行其是，纷纷的抢地盘、谋扩充、开烟包赌、私铸银毫、截留税收。在海珠事变之前，沈（鸿英）实主谋对付刘震寰，岂知竟误杀了刘达庆与黄鸿猷两人。孙中山再度回转广州后，旋被举为大元帅。刘玉山移师回城不久，正值沈军叛变。沈在海珠事变后，不安于位，乃外结直军，内则希望桂军之两刘帮忙攫取广州为已有，一举而扑灭驻省中的滇军所部，分两路进逼广州城，右翼进攻石井兵工厂，不下转而直趋流花桥，为滇军击退；左翼业已进抵小北路与观音山脚前。

是时杨希闵在五层楼上，亲自指挥所部抵抗，李易标（沈的虎将）虽身先士卒，勇猛冲锋，亦不能再前进一步，横尸累累，死伤颇多，而后路又为刘玉山与刘震寰两军自龙眼洞与瘦狗岭两地冲出截击，沈恐遭全军覆没之虞，遂沿粤汉铁路向北退却。迨抵英德与马坝两地交叉处，又为自己新编之陈步谦独立团阻击，辎重损失殆尽，纷纷的将大洋钱（袁头）横撒于铁道两旁，其狼狈情形可想而知。刘玉山在此役战后，检查结果，也有少许的损失，而无丝毫利益可得，颇为懊丧。嗣为充实军力，补充各部，

又在本省容藤各县收编了土匪 1200 余人，而枪支有十分之七是土造，以李秉枢与黄首儒两人分统之。此等土匪军队，枪械虽不齐全，但为患地方、贻害于民则有余，以之作战则不足，玉山此举十分失策之至。然兵多饷缺，又无粮支持，多有困难。

5月，孙中山下令追击陈军于东江，而滇军三杨各部阳奉阴违，实已不可靠，乃命粤、桂各军兼程进讨，遂围惠州城。时守城将领是杨坤如，号称善战，以 5000 之众当数万之师，粤军任左翼东向河源方面推进，以截击陈军的联络线。桂军任右翼，刘震寰部就首先占领了飞鹅岭高地，可以俯视全城，而陈军至是以不克自如活动了。刘玉山所部除占领在博罗县城以东地区以外，更进而直薄惠州城下，猛攻了三个月，大小数十战，毫无进展。孙大元帅虽数出督战，并用重炮轰击城垣，亦不能跨进一步，非将士之不用命，亦实地势使然。

1924 年商团事变时，刘玉山也奉命分任一部分平定之责，一经接触，即告得手，商团纷纷崩溃，如鸟兽散。刘玉山因此也得到政府的一大部分奖金，但不肯分润部下，部下因之离心他去。而在 1924 年底广东革命政府以赣南地区尚结集有直军大部兵力，广东方面感受极度的威胁，乃令湘、赣各军及刘玉山所部移驻韶关方面，相机进取；并拟定北伐计划，谭延闿为总司令，以刘玉山为前锋。当检阅时，对刘所部训话，大意说：“玉山以区区两千多众的疲弱士兵，在作战上自难得有操必胜的把握，但楚以三户即可亡秦，希望鼓足士气，一举而直下赣南进取江西，以为广东的屏障。”于是师出南雄分两路跨过梅关，抵赣后，刘玉山旋被任为赣州城防警备司令。赣州城在章、贡两水夹缝之中，易攻难守，北军退出未及一月，复由邓如琢等部来攻，刘玉山感于后援迟迟不进，且众寡悬殊，迫得退出赣州，取道小梅关往金城渡江而回抵南雄。至 3 月得知孙大元帅已在北京逝世的噩耗，遂回师广州观变。

时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饷项多缺，各军纷纷移防各属就食，刘玉山也应总指挥官陈天太之请出兵一师及一警卫团前往三罗两阳方面就食，那知陈为人凶悍阴险，包藏祸心，明虽假道罗定出两阳，暗则勾通沈鸿英以图桂，师次都城即为李（济深）黄（绍竑）两部水陆围攻，全军尽溃，退至绝地大坡山时，统统被缴械，陈且因之成为俘虏。同时驻防四邑的各部亦为李济深部收拾干净，所剩下龙小凤等两个旅，又都陆续归降于刘震寰去了（刘当时号称桂军总司令）。陈被俘后，囚于梧州，未几即获释放回粤，对李、黄两人时思报复泄愤，以致后来有东亚酒店图杀黄绍竑之事发生。但事不成功，又重来迁怨于刘玉山身上，连刘仅有之手机枪、驳壳枪等 100 余枝亦皆被陈运动而去，归降于刘震寰。至 1925 年 6 月，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勾结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叛变，企图推翻革命政府，革命政府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在最短期间平定叛乱，陈亦当场被捕就地枪决。反复小人之结果，正是如此。

刘玉山以一文人来掌兵，自负太高，自称为总理的忠实信徒，而视金钱如命，对部属刻薄寡恩（当时他私铸银毫，每日出产有 5000 元，又在大元帅府领下 6000 元每日共有 11000 元的收入，全军人数不足 10000 人，而每天发给部队官长的伙食是由 4 角起至 1 元止，士兵伙食仅由 2 角至 3 角不等，视地位的高下与枪支的多少而互有等差），对沈、刘两人则视如仇，攻讦不遗余力，那又安得不败呢？我与玉山都是武宣人，有乡党的关系，在柳州时随军东下，在他部内挂一参议闲职，为他往来奔走，抵广州之后，旋即移居澳门养病，及国府参谋团成立，始应主任加伦将军与副主任岳森之约回团里工作。

（1965 年）

## 第二次滇军入粤始末

廖行超\*

### 一. 起因

#### 1. 孙先生号召北伐，唐继尧反戈回滇

1920年，粤军自闽回粤驱逐桂军，统一粤局，孙中山回粤，被选为非常大总统，通电西南各省，会师北伐，电到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小斋）响应号召，编组军队，准备出滇。

此时，唐继尧避居香港，与陈炯明暗中勾结，用釜底抽薪之策，使孙先生北伐大计不能实现。迨朱培德率领滇军王均、胡思舜、胡国秀三个旅循北江入赣，陈炯明即在广州叛变，炮攻总统府，孙先生被迫离粤。

唐继尧得陈炯明支持，亦由香港潜赴柳州，率领李友勋、郑开文、龙云各部，反戈云南，顾品珍闻讯，即令在准备中之杨池生、杨如轩两旅，开赴文山，迎拒唐军，并将后方军政大权，交金汉鼎（铸九）负责，亲出督师。

#### 2. 顾品珍以后方大权交金汉鼎，放逐杨蓁及杨在粤活动

杨蓁、邓泰中、金汉鼎同为护国军滇军骨干，而杨与邓又同为唐继尧心腹，护国滇军第一军第一梯团在宜宾与北洋兵作战，杨蓁任第二支队支队长，金汉鼎任工兵营长。泸州告急，由宜宾抽调两营精悍部队，前往增援。杨恃功而骄，梯团长刘云峰

\* 作者时任滇军旅长、师长。

(晓岚)电唐继尧将杨与邓一同调回云南，金汉鼎继邓泰中为第一支队长，率援兵开赴泸州，与第三支队长朱德，转战纳溪。四川独立，袁世凯退位，护国成功。金任驻川滇军第二军第十四旅旅长。1920年，驻川滇军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一、二两军退回昭通。1921年2月，顾军南下驱逐唐继尧，金汉鼎之力居多。杨蓁时在唐部下任第一梯团长，驻兵毕节，后派其监视顾军行动，杨乃暗通顾氏，亦迭电催唐下野，唐见多年心腹手握兵权，不予支持，反相促迫，较之叶荃举兵反抗，尤为痛心，始愤而出走。顾品珍进省后，杨自以为有大功于顾，目中无人。顾委杨为第三卫戍司令兼第七混成旅旅长，并未满其欲望。及至顾品珍率师北伐，在杨意中，以为后方大权，舍我其谁。岂知顾氏用人，自有权衡，终舍杨而用金汉鼎。杨蓁不满之情，由内心而见诸行动，几酿内变。幸金汉鼎率唐怀源赶到昆明，顾始将杨拘于五华山，拟予以严惩，后以多人要求，改为押送出境。滇军第二次入粤，杨已在大本营任参议，后来金汉鼎随朱培德军队到达广州，杨挟前嫌，对金肆意攻击。金汉鼎到香港，回杨一电，有“小儿争饼，得之则笑，不得则哭”之语。金即离开香港，到重庆组织定滇军；杨在广州，尝借顾与滇军接近。1924年冬，杨蓁乘杨希闵久在香港的机会，阴谋于大本营，欲夺滇军总司令之职而自为之，几成事实。幸李协和（烈钧）知之，言于大元帅：“滇军之事，还是由滇军自己决定，未得范石生及各将领的同意，以不发表为当。”此事遂被打消。

### 3. 在政权交代前的情形

1921年2月，唐继尧出走之后，云南军队之驻防：迤西有驻大理的华封歌第九旅；迤东有驻大关、盐津的范石生独立团；驻昭通的蒋光亮镇彝昭守备司令部及其所属各独立营；驻呈贡、晋宁有第三卫戍司令唐继虞的亲信部队，有王洁修、习自强、何

世雄、谭少卿（宗敏）等四个团。顾品珍派金汉鼎为迤南剿匪指挥，设指挥部于通海，顺路安抚诸团，允许他们保持原有编制，留用旧有人员，供给每月饷粮，确定驻在地点，即归金汉鼎指挥。金与王、习诸人，开诚相见，情感尚称融洽，上下亦相安无事。

唐继尧回滇消息，传到通海，王洁修等虽一再向金表示服从，而内心实持两端，何世雄且唆使营长张凤春率领全营官兵跑到六冲坝，与土匪吴学显会合，联络散匪，待机内应。唐氏党羽，更散布谣言，诬金汉鼎包庇唐氏旧部，迎唐反顾，致使军心民心，惶惑不安，而不满意于顾品珍者，更推波助澜，使顾氏心情，极为懊恼。

金为安定人心，表明心迹，嘱我写了一封给唐继尧的信。信中大意，略叙顾治滇成绩，并愿继续努力，以求郅治，劝唐以乡邦为重，勿作雀鼠之争，致陷生民于水火，节录于下：

“……顾公治滇两载，节用勤廉，库有余存，家无半亩。方期励精图治，贯彻始终，一德一心，登斯民与衽席，群策群力，固疆圉如苞桑，承我公未竟之初衷，作护法中流之砥柱。讵意谣诼繁兴，杯蛇市虎，有谓公以北伐之师，反戈内向；又谓愚如汉鼎，亦表欢迎。捏造黑白，重诬贤者，血气之伦，莫不痛心。我公护靖元勋，西南领袖，正宜翊赞中山，廓清中原，决不致兄弟阋墙，使生灵涂炭。……汉鼎敬恭桑梓，何能二三其德？……如化干戈为玉帛，则愿内外同心；若认忠言为逆耳，则谨执殳以待……”

此信发表后，金汉鼎反唐拥顾，态度鲜明，而阴谋逐鹿者，亦无以置喙，舆论澄清。而唐军到境，顾品珍召金汉鼎进省，授以留守之责。

## 二、顾军拒唐

### 1. 杨如轩旅放弃文山与亚拉冲之战

1921年1月，金汉鼎由通海回省，第四旅旅长杨如轩率步七团由通海出发，经曲溪、建水、蒙自开赴文山，编文山独立团为步八团，归入第四旅建制。团长李星槎（文汉）在1912年曾随唐继尧援黔，护国军时，在纳溪负伤，即留滇供职。1921年顾军南下驱唐。李星槎适在嵩明家居，金汉鼎由昭通进省见顾品珍后，即委李为文山独立团团长，此时编入杨如轩旅。杨以李在唐继尧部下多年，关系较深，又在前方，心存顾虑，并见杨池生军队不到，已陷于孤军深入，倘与唐军接触，一旦变生肘腋，必遭不测，遂放弃文山。

唐军初入滇境，军心未定，师行甚缓；一抵江那，知顾军已到文山，虽相距不远，仍未取攻势；继闻顾军后退，唐军不战而连得两城（广南、文山），士气因之大振，即刻跟我旅追来，我率七团三营为后卫，退到亚拉冲时，唐军已距我不远。我见地形险要，可以阻止敌人，杨如轩亦决定在此布防，并派朱淮率第二营在我左翼，控制交通大道。杨留下七团第一营及第八团全部，在防线后方。我部署方毕，前哨已与唐军接触。唐军展开攻击，来势甚猛。我以一营兵力，凭险固守。敌人见正面不能取胜，渐从右翼包围，激战多时，敌未得逞。及至下午，唐军火力已衰，我将前方情形，报请旅部，趁此时机，转移攻势，但久无动静。相持至夜10时，忽接旅部命令，令我撤离阵地，向后方转移。在下达命令时，朱淮前来看我，对我说：“后方情况不好，旅部已撤走多时，第二营官兵，在路边相待，望我迅速撤回，一同转进。”我问朱淮：“后方情况，怎样不好？”他说：“我在军用电话中听到，通海驻军不稳，迤南一带潜伏众土匪，受唐委任，纷纷

起来，向我进扰，巡阅使罗佩金已准备退出蒙自。”正谈话中，三营各连，均已到齐，遂向蒙自背进。到达蒙自，遍寻旅部不在，巡阅使署，亦空无一人，电话不通，消息沉寂，只得暂住一夜，折回碧色寨，利用铁道专线，打听消息，到车站时，适有上行空车一列，遇团副长潘宗绥衔杨如轩使命，来同我联络。

### 2. 我与顾品珍最后一次会晤

队伍到达宜良，知道顾品珍住在城内法明寺中，我约朱淮同去见他，到了总部，觉得人员稀少，冷冷清清，警卫不严，精神松懈。我将来意告知守卫，即由值日副官引导我们直到一间正殿，用蓝布幔帐，隔成两间，前面一间是顾品珍的办公室，后面一间是他的寝室。他在办公室内接见我们，招呼我们坐下，我把前方经过及一路看到听到的情形，向他报告。他沉默一会，忽然问我：“你们的旅长，何故退到丘北，是谁给他的命令？”我说：“我们都在前线，并不知道。”他又问：“你们知不知道杨池生的部队究竟在何处？”我说：“我们由文山到此，一路上都没有听到杨池生旅长的任何消息。”他又沉默一时，表现十分颓丧，说：“七团归你指挥。”我请他指示我们今后的任务，他沉默一会说：“以后吗，见子打子。”我见他精神疲倦，不便再问，即与朱淮辞出，临出门时，他起身说：“你们休息一两天，听总部的命令行动。”

### 3. 杨池生旅在大渡口之战与顾品珍之死

1922年3月19日，我接到总部的命令：七团20日午前6时出发，经大渡口、石板哨向天生关前进。我率队到大渡口时，总部又命我和林永庆团在大渡口占领阵地，待杨池生旅到来，我即将军队带上山头。林永庆对我说：“昨天，杨池生由南来见顾品珍，说他的军队被土匪吴学显袭击，虽将匪打退，但退得不远，

恐其复来。顾小斋低头不语，杨亦不好再说，默默相对。过了一时，杨池生说，我愿同唐继尧在宜良一战，顾小斋不置可否，杨即退出，今日总部仍照原令出发。”10时左右，杨旅赵成樑团在陈所渡与唐军前卫接触，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已将唐军火线推到田坝中。顾品珍接到杨池生的报告，由天生关折回鹅毛寨休息，临行时交代范石生，命他将队伍带到新哨，防止吴学显大股匪徒由路南窜来。范石生满口答应，但顾品珍一走之后，范就带领他的军队向阿尤寨而去，路南方面无人防守。鹅毛寨在山区旷野中，村寨萧条，大小行李，充塞满路，兵力不足，警卫薄弱，吴学显大股匪徒，由新哨侵入寨内，枪声起处，顾品珍与总参谋长姜梅岭（鼎和）同时殒命，军心动摇。我和林永庆正在山头，看见由昆明开到一列军车，在江头村车站停住，约有步兵2000余人，下车后由大渡口跑步前进，我们还以为是金汉鼎派来的军队，正高兴中，忽见这些队伍，向我赵团右翼包围，子弹已飞向山头，才认出是唐继尧的援兵。我们开枪还击，制止了敌人前进，赵团亦听到顾品珍遇害消息，无法制止士兵的后退，大渡口之战，于是结束。

当天夜里，我们七团和杨池生旅在一处宿营。杨旅士兵，谈到我们在亚拉冲作战的那一天，他们也听到了激烈的枪声，由枪声的方向判断，知道我们会在亚拉冲一带，与唐军作战，他们准备在第二天前来增援，不料到了第二天早晨，枪声已息，他们开到亚拉冲后，才知道我们已退回蒙自。

#### 4. 龙云谈亚拉冲之战

事隔一年，在1923年，我回到昆明，去见龙云时，他很高兴的纵谈往事，他说：“听杨如轩说，亚拉冲之战，是你的军队和我们打，你地势占得好，兵也沉着，我们仰攻困难，开火的那一夜，我们也为子弹补充不上，大部撤下火线，第二天拂晓，不

见动静，斥候回报才知道你们在夜间退走。”他又说：“在那一天，唐联帅真险，军队都追赶你们去了，他在亚拉冲午餐，刚刚起身，伙食担子才出村口，你们的杨池生部队先头，就从街尾进来，幸亏他们没有知道唐联帅才走，如果知道，即刻追来，唐联帅准在隘路中被擒。”

### 三、北伐途中

#### 1. 张开儒率滇军入黔与镇宁会议

大军退到曲靖，副总司令张开儒（藻林）率领余众，退入黔境，到达南安，清点兵员，各部官兵，均有逃亡者，由数人至数十人不等，更有成连成营的投降唐军。大家认为不早离开滇境，就不可能遏止逃风，拟退到安顺，休息整顿，于是继续前进。到了镇宁，贵州督军袁祖铭派代表十余人，前来军中，转致黔政府的关心和慰问，主要是来了解滇军今后的目的和动向。代表中有前驻川滇军第一军参谋长杜祚和秘书长李书城，他们说：“黔政府的意思，是请我们的军队，到此止步，不要再前进了，因为前方就是安顺，驻有黔军，恐引起误会，发生冲突，彼此均有不便。唐继尧已有电来，约滇黔合作，唐已派出追兵，请黔军协助，前后夹击，以解决由云南退出的顾军。”他们又说：“但请你们放心，黔军决不同唐合作，不过你们也应该下定决心，早离黔境，如决定北伐，则请改道入桂。在通过黔省时，黔政府自当尽地主之谊，代备粮秣，代雇弁役。到广西如有困难，此间尚有桂人卢寿慈（焘）愿来军中帮忙。卢系民党，曾任过贵州督军，孙先生处，他可以担任联络。”他们传达以后，张开儒在总部召集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征求各人的意见，当时发言的人很多，大家都表达了心中的愿望。我归纳有三种主张：一是打回云南；二是在贵州休息整顿两三个月，看看大局，再定行止；三是继续北

伐，完成出师本旨。主张北伐者占多数，且均系军队中之握有实力者，于是决定北伐。聘卢焘为总部顾问，并以北伐军副司令名义，对广西军政联系，我军同意由镇宁改道入桂。代表们以滇军的目的和动向已经明确，即回贵阳向袁祖铭复命。

### 2. 改道入桂与独山分进

滇军在镇宁休息数日，收容散逃官兵又有零星归队者。由镇宁出发，改经定番、广顺、都匀而至独山。我在独山清点七团官兵人数，三个营共有 1600 余人。

军队由独山出发，因给养交通关系，分两路入桂，到柳州集合。范石生、蒋光亮为一路，顺江而下，经长安、柳城到柳州；张开儒率两杨部队及艾丹生团，经荔波、摆金、思恩，由思恩架桥，渡过龙江，经镇远、怀远而到柳州。在思恩与地方军队小有接触，行军尚称顺利，在范石生、蒋光亮之先到达柳州。

### 3. 黔桂边境与广西币制

黔桂边境，人烟稀少，土地肥沃，粮秣补给，不感困难；惟道路未辟，交通不便，只有人行小径，驮马不能通行。行军时，前卫的任务，除备战外，就是开荒筑路，伐木造桥，所过之处，居民均逃避一空，田园任其荒芜。闻之乡老，云年年遭兵匪蹂躏，听到兵来，就远远离开。

我对此颇有感触，写过一首《满江红》录下：

软草平莎，春雨过，一番新绿。经行处，川明山媚，花攒柳簇。每每园田无限好，粼粼春水十分足。只农夫何事不归耕？草盈掬。

草堂诗，君试读；石壕歌，我还续。总伤心村老，尽转沟读。入耳怕听民疾苦，抚心惟有潸然哭。使人家十室九成空，何面目？

广西制币复杂，沿途市场交易，只用陈炳焜时代发行的纸币，破旧不堪，辅币缺乏，将一元券一张，撕成两半，或撕成四条，作为零星找补。一元券的四分之一，成为辅币最小单位。林俊廷也印过一些，但纸质薄劣，字迹模糊，信用不高，使用不广，不在他的势力范围以内，都拒绝使用，或贬值收买。军队中携有硬币如袁头及龙板者，均受欢迎。一枚袁头，可换得一堆纸币。一般居民，都肯与有纪律的军队交易，但最怕拉夫婢。

#### 4. 柳州会师与进兵南宁

我们在柳州驻扎了十多天，范、蒋两部，才从柳城南下，舳舻蔽江，帆樯林立，气象一新。这一路的军队，由于交通便利，应该比我们先到柳州。但据他们内部的人说，他们来自迤东，带有烟土，要绕道榕江，才能销售，所以耽搁。

范、蒋到来，意见愈多，张开儒的处境，愈感困难。当时我写了几首律诗，叙述这一段的经过，并寓规谏之意，今录一首于下：

满江楼橹接长空，声势而今便不同；  
制胜无奇唯一策，梦丝难理是三公。  
休将意气伤元气，莫把天功当已功；  
十万苍生翘首望，好留面目见江东。

此时，范、蒋主张占据广西，先取南宁，准备回滇。张开儒坚持暂住柳州，听候孙先生指示：因为孙先生在沪，已经得到滇军入桂消息，正派人前来联络。而范蒋执意不从，张开儒只有派杨如轩旅向南宁进兵。杨旅由柳州出发，攻占了来宾、迁江，直抵宾阳，广西军队节节向南宁败退。

#### 5. 孙先生来信，滇军东进到大湟江口待命

杨如轩旅在中途接到总部命令，孙先生已有信来，指示滇

军，靠近梧州刘震寰、桂平刘达庆军队，以待后命。杨旅折回柳州，会同全军，循黔江东进，至武宣，驻军闭城固守，我军攻之不克，船只不能通过。

武宣在藤峡入口处，城墙高峻，面江背岭，江面到此紧束，水流湍急，两岸悬岩峭壁，高数千尺，只有通路一条，绕至山顶；俯瞰城中，人物牲畜，历历可数，但均在步枪射程以外。停留几日，桂平刘达庆派人来军中调解，劝军队绕藤峡而过，病行李，仍由船运，通过武宣，驻军予以保护。我军同意，分水两路出发，到大湟江口集中待命。

当时六七月之交，江水暴涨，湿气郁蒸，军中瘟疫流行，十人九病，日死数人至数十人。由桂平请来医生，帮同军医治疗，而药材缺乏，医生束手，直至秋凉，病人才渐渐减少。我亦患烧热病甚重，时刘震寰为滇军向陈炯明领到一批军服和接济，由梧州换浅水轮送来，因回船之便，送我到梧州医治，同船有范石生、周自得、那博夫等。范、周与刘军接洽，那到香港转沪。我直到10月，身体恢复，军中来电，催我回队，我才折回大湟江口。

## 6. 军中易帅

总司令张开儒，在滇军将领中，资格最老，年龄最大。他是日本士官学生，云南讲武堂教官。护国军时代，李协和（烈钧）率滇军第二军入粤，他任第一梯团长，后任驻粤滇军第三师师长、第二军军长；南方军政府成立，任陆军部部长。自杨希闵以下，凡由讲武堂毕业者，都是他的学生。范石生、蒋光亮在辛亥革命以前毕业于讲武堂乙班。

杨希闵由讲武堂丙班生中选出的特别班毕业，护国军出川，任驻川滇军第一军的团长，赵成樑就是他团里的营长，他与杨池生在丙班同学，在第一军同事，与杨如轩同乡。顾品珍放逐杨蓁

后，委他接第七混成旅旅长，但接事不久，滇军北伐，他只带出艾丹生的一个团，随师入黔转桂。他与二杨、范、蒋、赵、周等嗜好相同，常常聚在一处，又因他年龄较长，和易近人，故在酝酿易帅时，他首得二杨支持，故军中有三杨之称。蒋、范两人，自知实力有限，且得擢升军长，亦觉满意，故一致推举杨希闵代替张开儒为滇军总司令。那博夫代表滇军到沪见孙先生时，即将军队拟定的人选名单呈上，孙先生即照名单给委，并调张开儒为大本营参议。

张开儒的性情，刚强急躁，与杨希闵的性格，恰成对比。张又偏爱艾丹生，不惟口头随时称赞，而一切供给，优于其部队。二杨、蒋、范已经不满，后来又提升艾为旅长，更触杨池生之怒，杨使人杀艾而并其军队，张开儒即由梧州转赴香港。

在酝酿易帅期间，我病在梧州，没有直接参加过意见。在梧州时，我与周自得同住同园，我们谈及此事，我说金汉鼎已到桂林，可不可以把他接来，大家商量。他说二杨、范、蒋，不大愿意他来，他们已经推出杨希闵。我说杨希闵在滇军将领中，比较温和厚道。

滇军进了广州，二杨见好的地盘，已被范、蒋占去，他们倒捡了便宜，而自己反一无所得，不惟不满意范、蒋，还迁怒于杨希闵。直系政客乘机拉拢二杨，要他们强迫杨希闵一同投敌，杨希闵不从，遂造成三杨分裂。前人说：“以利合者，往往利尽则交疏。”此亦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公式。

12月，滇军奉孙先生命令，联合桂军刘震寰、刘达庆两部军队，入粤讨伐陈炯明。我军在大湟江口誓师，次日出发，经蒙江、藤县而抵梧州。

## 四、入 粤

### 1. 奉孙先生命令讨伐广东陈炯明

1923年元旦，杨希闵在梧州就讨逆军滇军总司令职。当时滇军共编成三个军：

第一军军长杨希闵（兼）

第一师师长杨池生	旅长赵成樑
----------	-------

第二师师长杨如轩	旅长廖行超
----------	-------

第二军军长范石生	旅长杨廷培
----------	-------

第三军军长蒋光亮	旅长朱世贵
----------	-------

第一军部队，系前驻川滇军一二两军的正规军，武器精良，作战力强，人数约3000余人。

第二军部队，系云南十六团改编的昭通独立团，顾品珍北伐时，编为先遣支队，有作战力。第一营长徐德，第二营长杨祐臣，第三营长杨廷培。人数约1500人。

第三军部队，系迤东镇彝昭守备司令部所属的镇雄独立营，守备司令直属及朱世贵十四团，地方部队占多数，人数约1300人。全部滇军约7000人。

讨逆军由梧州出发，经封川、德庆、高要、三水而至广州，陈炯明军队，节节向东江退去，并未与滇桂军接触。

### 2. 桂军沈鸿英与江防司令部会议

沈鸿英军队，原属莫荣新部下，自退出广东后，散集于湘桂边境。此次滇军入粤讨陈，他率部乘机由德庆羼入滇军路线，同赴广州，紊乱行军序列，忽先忽后，一到三水，知陈炯明退回东江，即昼夜兼程，先进广州，将省市机关，派兵驻守，并占据石井兵工厂，军队集结于东北郊，占领观音山、白云山、瘦狗岭一

带高地。孙先生派胡汉民、李烈钧、魏邦平先到广州，组织政府，统一军政。胡、魏先来，胡筹备大本营，并接广东省长，两人工作，均受到沈军阻挠。胡与杨希闵商量，召集各军首脑会议，以推动组织工作使其顺利进行，商妥以后，即在江防司令部召开会议。是日杨希闵因病未到，由参谋长周自得出席。刘震寰到后，知杨希闵有病，又见情况不佳，临时退席。沈鸿英未到，由军长李易标代表出席。其他各部将领，都有列席者。胡汉民、魏邦平均准时参加，开会时提出魏邦平为广东省长，李易标即大声反对，掣出手枪，指向魏邦平，幸在旁滇军，高擎其肘，子弹出膛，未致伤人。一时秩序大乱，子弹横飞，滇军保护胡、魏脱险，而七团第一营营长赵连城被侧射将双目失明。事后听说，当日李易标刺杀的主要是刘震寰，幸刘见机先走，另有一桂军将领刘某（按：另有材料指刘某为沈鸿英部师长），在汽车中被乱枪击毙，亦系因刺刘而受到误伤者。

李烈钧后进广州，召集滇军将领会议，而三杨范蒋，都未参加，颇使李协和不快。他们不去的原因，据说是护国军时代，李带滇军入粤，有始无终，造成滇军分裂，此次避免又受他利用。

### 3. 孙先生回粤，下令讨伐沈鸿英

2月，孙先生离沪回粤，3月初在农林试验场滇军总部，召见旅长以上军官，谆谆鼓励，殷勤慰勉。我第一次见到孙先生，觉得他有一种真诚恳挚之情，使人望而生敬。

沈鸿英久蓄异志，至是爆发，突于某日清晨，袭击滇军总部，旋被卫队击溃，于是观音山、白云山及瘦狗岭一带高地的沈军，全部叛变。大元帅下令讨伐，杨希闵率领滇军，分两路进攻，主力攻观音山、白云山阵地，激战三日三夜。李易标抽调2000余人，绕出白云山西麓，企图由黄沙侵入市区，从后方包

抄我军左翼，但没有想到黄沙尚驻有一部滇军。李不加戒备，密集前进，我在黄沙车站，看得清楚，即将军队隐藏于墓地中，俟沈军接近，突以集中火力，向敌扫射。沈军伤亡甚重，纷向白云山退回，我军追至山腰，沈军右翼，受到威胁，正面滇军，发动全线猛攻，敌人不支，分向河源及源潭方向退去。

沈军大部退至源潭高地，与我军赵旅隔河对峙。杨如轩率七团一营及八团两个营，沿铁路进击，已至军田。沈军得赣南方本仁及邓如琢军队的支援，利用粤汉铁路，以装甲车头架机枪掩护步兵，猛烈冲击，杨部猝不及防，为敌军冲散，直退至银盏坳。大元帅亲临前线，杨希闵重新编组军队，部署攻防。我率黄沙部队，由铁路两侧，夹击敌人，掩护杨部退回广州。我由银盏坳前进，沿轨道两旁，尚留下断肢残骸，知道杨如轩所部损伤甚大。敌军亦退军田，占据车站后方高地，顽强抵抗。八团长杜星鹤率队猛攻，一时战斗激烈，赣军以优势火力，集中八团，杜团长阵亡，火线动摇，杨廷培适时增援，才制止了敌军前进。第三军朱世贵族由佛山经清远侧击敌人，北军始由军田狼狈退走，我军协同赵旅，合攻源潭之敌，激战一日夜，沈军撤退至琶江口，掩护大队向赣南退去。英德、韶关，次第收复。朱世贵族编为独立师，留驻英德，杨廷培旅折回广州，杨希闵率赵成樑旅及我旅齐集韶关。未几，滇军总部宣布大本营命令，杨池生、杨如轩通敌免职，任赵成樑为第一师师长，我为第二师师长，我奉令后，即将第四旅部队，交付朱淮，留驻韶关，然后率警卫营回到广州，接收杨如轩所带各营，委李泰为第五团团长，第六团团长游凤书仍旧，以参谋长李文彩负责整顿，我暂兼第三旅旅长，于是第二师建制才算统一。

#### 4. 大本营的两次会议，大元帅对第三旅官兵讲话

我参加过召开的两次军政联合会议，都是由大元帅亲自主

持，第一次是在 1923 年初夏，刚平沈鸿英之乱以后，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政府和军队的名称问题，胡汉民先作报告，发言的人很多。我初到广州，人事陌生，还不知道发言人姓名，只记得蒋光亮说：“1917 年，国会议员在广州开非常会议，选孙先生为大元帅；到了 1921 年，南下议员又在广州开非常会议，一致选孙先生为大总统；今天，孙先生又第三次回到广州，应该根据上两次会议，称孙先生为大总统。”最后决议在军事期间仍称大元帅，军队称建国军。

第二次会议，在 1924 年春，会议的目的是讨论财政统一问题，财政部长叶恭绰，首先说明了目前广东财政的混乱情形，政府急需统一，希望各军拥护政府的主张。各军将领都有发言者。滇军只有一人参加，军政部长李烈钧示意要我代表滇军发言，我知道滇军情形复杂，霸占地盘，宰割税收，政府的正项收入，视同已有，广东的财政混乱，滇军实难辞其咎。我事先没有和杨希闵、范石生、蒋光亮谈过，我怎么能代表他们发言？我表示拒绝，并请李部长代表。他在发言中，替滇军解释了一些，与我军的情形，不尽相符。待他发言以后，我作了补充，表明了我个人的态度，我说：“我拥护政府统一财政的主张，愿意首先交还政府，二师的财政，比较简单，防地只有西关一处，收入自然是烟赌花捐，但是由师部统一。三旅驻东江，四旅驻韶关，旅长只管练兵打仗，不管收入，各旅的正杂开支，都向师部承领转发，请财政部派员到我师部，会同军需人员，了解收支情形，核实每月应领薪饷，给以保证，即请派员接收。”后因各部把持不放，仍未统一。

第三旅将出发东征，我请大元帅莅临黄沙对官兵训话，在讲话中，大元帅回头指着停泊在白鹅潭的英美军舰说：“你们看，我们的国家衰弱，国势不振，才会让外国的军舰，来到我们的内江自由停泊，自由行驶，这是我们国家的耻辱。”他又说：“这些

年来，内战不息，都是由于文武官吏的脑子里，只想到升官发财，没有想到国家。”这篇沉痛的讲话，当时有速记员记录。

### 5. 东江战事与广州近郊之役

1923年夏天以后，东江战事，由弛而张，商业冷淡，税收减少，军事开支，日形拮据，又值东江泛滥，沿岸村落，屋舍为墟，军队粮秣不能就地取给，转折运输，军民交困。敌乘机进犯，围我杨廷培师于博罗，大元帅手谕，命我驰援，此时我师四旅，仍驻韶关。第二旅自参加东江作战后，即驻石滩一带。我奉令后，一面电告三旅，集结石龙待命，同时率警卫团赶赴石龙，向大元帅请示。时行营设在东面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汽船上，大元帅已回广州，由侍从参谋蒋介石接见。他叙述了敌我的大概形势，并出示军用地图，建议我由增城迂回。我以路程过远，缓不济急，经率队沿罗浮山麓，绕出敌人侧背，乘夜雨弥漫之际，袭败翁照垣部于城西，遂解博罗之围。陈军一部退入惠州，大部向海陆丰退去，我留三旅驻在太平圩，与博罗杨师，互相策应。

此时，参加东江作战部队，滇军有杨廷培师、胡思舜师、朱世贵师及我师第三旅，此外有许崇智粤军、刘震寰桂军、樊钟秀豫军、李明扬赣军、柏文蔚皖军、路孝忱陕军、何成濬鄂军，统归杨希闵指挥。除滇粤桂三军外，其他各军，人数不多，将领都在广州市，官兵离乡日久，士气消沉，加以饷粮不继，各有归志，因而流入市区，不相统属，军纪风纪，日渐废弛。

东江敌人，得到了广州混乱的消息，又得到洪兆麟、林虎军队的增援，集中兵力，大举反攻，夹东江而下，突破了联军防线，追过石龙铁桥，使联军部队，五零星散。范石生退到樟木头，杨希闵率胡思舜退到增城，二师第三旅退到石厦，各退一方，使正面空虚，广州暴露，洪兆麟追到石滩，无兵抵御，以为广州市唾手可得。

11月某日清晨，天气阴暗，沉闷如暴风雨之将临，我正准备到黄沙车站，见值日副官陪着陕军总司令兼大本营参军长路丹甫（孝忱，1913年曾任云南讲武堂战术教官）来办事处看我，我告以朱淮旅当日可抵广州，他大喜说：“这是好消息，应该早使先生知道。”他犹疑了一瞬又说：“你可不可以去见见先生？”我说：“可以，我此刻就同教官一道去。韶关军队，就要到来，军队一到，我就没有时间了。”他非常高兴说：“我们就走。”

我交代副官长，到黄沙车站迎接队伍，告之朱旅长，不要在黄沙休息，下车后一直整队开到东山，先以一部占领瘦狗岭。

我和路孝忱同去大本营，但在车中频频回头看我，似乎在察看我的神色，但我心中坦然，毫无顾虑。我对他说：“敌人不能打进广州，我是确有把握的。”车抵天字码头，我们换乘汽艇，横渡珠江，在大本营前登岸，他一直引我到大元帅的办公大楼，我看见客厅里面的陈设，不似以前的整齐，文卷箱放置凌乱，似有预备迁移的模样，大元帅看见我来，亲切的起身和我握手，我看他的态度，一如平日的安详。路孝忱首先对大元帅说：“我看见朱旅长来电，今天午前，准到广州。”大元帅说：“好！”正谈话间，吴铁城匆匆上楼，向大元帅大声报告：“廖师长的韶关军队，才过长堤，我们在南堤小憩放鞭炮欢迎。”大元帅说：“好，廖师长也在这里。”吴铁城回头见我，即来和我握手，他说：“你韶关军队整齐精干，士气旺盛。朱旅长说，你令他在东山待命。”我说：“是的。”我亦因军队到了，时间紧迫，即向大元帅告辞，说：“我要到东山和四旅官兵讲话。”大元帅说：“你先去我们随后来。”路孝忱喜形于色的说：“你的军队来得恰好。”他即派大本营电艇送我过江。

我到东山，见到朱淮，他说：“我已派了一营，先去占领瘦狗岭高地。”我匆匆检阅了军队，召集营长以上军官，将敌我情况告知，我说：“敌人突破联军防线，认为广州空虚，趾高气扬，

长驱直进，我旅卒然而来，已出敌人意外。他的后方，有我大军牵制，不敢持久，我们须以全部力量，一鼓作气，击破当前敌人。这是一战关系大局安危，不惜任何牺牲，一定要获得全胜。大元帅亲临前线，望官兵努力！”讲话完毕，军队即刻出发，向瘦狗岭前进。

其时，又得大元帅及孙夫人亲临前线的消息，官兵无不欢欣鼓舞，准备战斗。孙夫人先来，我由伍朝枢部长的介绍谒见。她的服装朴素，穿了一件蓝竹布的短衫，态度亲切而和蔼，给我以深刻的印象。正谈话间，瘦狗岭方向，枪声已起，我即辞赴前线，两军已经接触，我军从敌人左侧，以密集队形冲出，官兵无不踊跃争先，一以当十，冲锋号角，响彻四野，喊杀之声，山谷回应，经过一段短时间的白刃战，卒将敌军击溃，洪兆麟仅以身免。一切舆车文件、大衣毡毯、印信私章，均为我军夺获，向大本营报捷。朱旅长继续率队追击，在石厦会合三旅，一同前进。大元帅和孙夫人，又乘火车到石厦慰劳朱旅，于是范石生、胡思舜、朱世贵等军队，齐集石龙，杨希闵另编军队，分三路向惠州进攻前进，二师部队，又在九子潭一线战，击败林虎军队，恢复了福田圩、太平圩。洪兆麟、林虎两部，仍旧退回潮梅，陈军叶举，退至惠州，东江战事，从此又告一段落。

## 五、广州商人罢市

商人罢市，在1924年中，先后曾发生过两次。

### 1. 第一次罢市

第一次罢市，发生在五六月间，原因是西关商团二分团驻地，被人强占，市府限令商团迁移，继以武力，强制执行，商团不服，与警察冲突，遂激成罢市。

二分团驻地，原系庙产，当地西关商业繁盛之区，所谓尺土

寸金之地。陈炯明时，商会已取得业权，滇桂军入粤，商会又向新市府登记。1924年清理庙产，市府又将此地标价出售，为有力者暗中承购，并怂恿市府，勒令迁出。商团以业权并未宣布失效，标价又未接到通知，即拒不迁移，一面向市府陈述理由。旋即由公安局派出武装警察，前往拆毁房屋，气势汹汹。商团亦不示弱，闭门登屋抵抗，交相谇诟，几至用武，邻近商店，纷纷关门，并将街口铁栅锁闭，于是西关与城区交通，一时断绝。拆房警察，困在街心，公安局又派警队增援，人心惶惶，秩序遂乱。

第二师部驻在黄沙，西关治安，负有责任，闻报后即派副官长李康率警卫一排，驰赴出事地点，维持秩序及调查出事原因，将被困警察，送出西关，制止增援警队破坏栅栏，并劝告商人，恢复交通，听候解决；同时派中校参谋王西园到市府见市长孙科及公安局长吴铁城，请其下令撤回派往西关警队，并征询他们对此事解决意见，他们：“商团恃势骄横，抗拒政令，应将首事人查明惩处，至庙产业权，无案可稽，决照新标价售出，以维市府威信。”我又派军需处长杨仲潜，到商会找会长陈廉仲，将市府意见告知。劝其照标价认缴，另取业权，并劝他与市府协商，以便早日复市。他说：“广东商人，一向以全力支持政府，筹饷纳税，踊跃输将，些许小事，何致动以武力对付？已有业权，必须保障，再次缴价，须待商酌。至惩办首事人，二分团20余人，都激于义愤，难分首从。”双方意见，各不相让，而端午节已近在眼前，大多数商人，都希望在节前复市，以便清理账务，总结盈亏，使金融流通，少受损失。各行各业纷派代表，来师部请我继续维持，以便早日复市，我亦以罢市已久，人民生活不安，政府和商人均蒙不利，况东江战事，陈军新得补充，积极准备反攻，正在思隙而动，此时宜早结束内部纠纷，以期一致对外。但市府商会，成见已深，竟无转圜余地。有人向我建议，庙产由我购买，则瞒承之人，不便坚持，市府有款可入，威信亦无损害，

商团也不必此时迁出。警察处置过激，商团恃众抗衡，均有不是，可从轻惩处。如是则可以打开僵局，迅速解决。我认为可行，即将此种建议，通知市府和商会，征求双方意见。他们均无异议，我即派人将房价 2000 元，缴纳市府，市府以营业执照给我：我又将此照，派人转赠商团，一场罢市风潮，才告平息。

## 2. 扣械与第二次罢市

第二次罢市，发生在八九月间。先是广州商人以东江军事，结束无期，商务萧条，负担加重，长此以往，治安堪虞，乃倡议集资购买枪支，扩充商团实力，以谋自卫。此种倡议，为一部分当局所支持，托人向大元帅疏通，得到允许，并由大本营军政部发给枪支入境护照。

英国商人，得此消息，即将在库存欧战时用过的坏枪数千枝，经修理后，托香港汇丰银行兜售。广州商团总团长陈廉伯，为该行广州分行华经理，知枪价甚廉，有利可图，即与英人订立合同，备价承购。到枪支入境，大部在虎门被截，商团根据护照，请求发还，政府置之不理。

广州商会会长陈廉伯、陈恭受等，联名向省政府及大本营申请发还，大本营拟交省府解决。商人方面，又请范石生、杨希闵作出调人，讨论多时，迄无结果。

当时我在东江，闻广州罢市，回到黄沙，与陈廉伯晤谈，知道这件事的经过和他们的意思，是希望政府先发还公安局提去的枪支，我到二军军部，将商人意见，告知范石生。他说：“等秘书长杨沧白（庶堪）来时，请他面陈大元帅。”不多几日，接到大元帅给我和范石生的手书，内中有云：“……千言万语，在一诚字，如有诚心，则何事不可商量……明日你们约同商会代表，午后 2 时到大本营面谈……”次日，我因第三旅参谋长李文彩及

际，不忍离开，及电话通告范石生，请他单独带领商会代表到大本营，谒见大元帅。他们回来，范石生对我说：大元帅劝诫他们，不要为奸商所利用，还骂我是老虎，你们怕他。当晚谢无量秘书由大本营来师部办事处，问我知不知道孙先生骂我是老虎，他笑着用一张纸写“虎不伤人”四个大字送我。

此时广东省长廖仲恺先生，写了一封信给我，信中大意是说商团罢市问题，长久未得解决，今天怎么解决得这么快，到底是怎么回事？西关市内，有人游行，高呼“请孙下野”等口号，请我查明制止。我接信后，即派人转告商团，他们说：“游行是请愿发还枪支和释放队长，并未敢呼反对政府的口号。”

### 3. 罢市中的演变

自苏联的顾问来到广州，大元帅实行了工农政策，任廖仲恺先生为工农部长，此后工农组织渐渐加强，宣传队伍，时在西关边缘，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资产阶级”、“打倒封建军阀”。商团亦组织学生、商人在西关游行，大呼“发还枪支，反对赤化”，到了此时，政府与商团的矛盾，已到白热化了。

在我未回广州以前，范石生、杨希闵对解决罢市问题，确尽了最大的努力，凡有会议，无不参加，但讨论虽多，而毫无结果。我回到广州之后，知道关键所在，并不是单纯的枪支问题，已演变成政治问题矣。枪支数目不多，但关系甚大，黄埔军校要枪，吴铁城新编师要枪，即河南之李福林也要枪，如果枪支此时还到商团手中，已不是作保卫市场之用，而演变成了反对政府的工具，我还能为敌人说话吗？从此以后，凡来找我谈罢市问题及约我开会的，我一概谢绝，只注意东江敌情与商团行动。据报驻潮梅的洪兆麟和林隐青（虎）两部军队向惠州移动，我亦电韶关朱旅，做好准备。

### 4. 对商人罢市问题，大元帅给我和范石生的指示以及我们

## 的呈复

在这一段时期内，大元帅写过六七封手书给我和范石生，书中大意是希望我们以武力解决商团。信中说：“商团是仿效意大利棒喝团的组织，想以商人武力夺取政权。……”又说：“商人不满意客军，要请政府以武力送客，政府不同意他们的请求，因而不满意政府。……”又说：“商人以罢市要挟政府，你们可以将市存的粮食、布匹没收，由政府分配，世界先进国家有行之者，我们可以仿做……”

我和范石生研究了大元帅的手谕，分析了当前的形势，有不能执行者三点：

(1) 广州是大本营的策源地，为作战部队的大后方，稍一不慎，措置失当，必使人心涣散，基础动摇，大敌当前，心所谓危。

(2) 广州商团，人数不多，驻地分散，分团部多设在商业繁盛之区，成员尽是商家子弟，聚则成团，散则回家，虽有枪支，素少训练，战则不足，守则有余；广州市区域辽阔，人烟辐辏，商业集中，西关一区，更为殷繁，街道狭窄，屋舍栉比，每一街道口均有铁栅或木栅，栅门一关，交通断绝，商团分驻其中，譬之城狐社鼠，如除狐则恐坏城，欲去鼠则恐毁社。滇军一二两军部队，尽在东江北江，市内只有少数后勤人员及警卫部队，以此兵力，解决商团，不惟无功，徒滋纷忧。

(3) 大元帅将率湘、豫、赣、皖、鄂、陕各军北伐，客军多集中市内，一旦秩序破坏，谁敢负治安之责？

乃以此三点呈复大元帅。

## 5. 局势变化中的广州市

此时，奉军入关与直系作战，冯玉祥回师北京，幽禁曹锟，击败直系吴佩孚军队。段祺瑞主张孙皖奉三角同盟，大元帅认为

机不可失，设行营于韶关，将亲率客军，离粤北上。湘、鄂、赣、陕各军，已开到北江，皖、豫两军，尚滞留市内，师部中校参谋皖人陈新宇对我说：“柏文蔚将军率皖军千余人，整军待发，但需款甚急，望我帮助。”我即筹 1000 元交陈送去。皖军去后，市内只有豫军，人数在 3000 左右，驻地毗连西关，官兵不耐久待，时出怨言。邻近商人，惴惴不安，前来告我，说他们备有水火油和斧子，声称将抢劫西关，然后回乡。我安慰商人，不要轻信谣言，西关治安有我负责。次日我在南园设席，请豫军总司令樊钟秀及其亲信部属饯行，他们欣然赴宴。在谈话中，我问他行期定了没有？他说：“我的部下归心似箭，只要领到开拔费，即刻出发，像这样一天天呆下去，不要说走，连伙食都成问题。”我问他：“需款若干，才能成行。”他说：“有两三千元够了，只要把队伍拖出广东，我就有办法带他们回乡。”我答应尽力替他们解决。第二天我筹了现款 2000 元、米麦 1000 斤，使人送去，他非常感谢。豫军走后，市内仅有少数后勤及留守人员，维持秩序，比较简单。

商团日渐嚣张，声称欢迎陈军来广州过年，结队游行，高呼口号，并在香港报纸称我已在西关独立。借商团为政治资本的野心分子，竟公然联络东江陈军，想里应外合，倾覆政府，商团阴谋，至是毕露。我知道解决商团时机已到，主要则在打退当前由东江深入的敌人，我乃通知粤汉铁路局长陈兴汉，秘备车辆，连夜开到韶关，迎接军队，同时通电揭发商团阴谋，表明拥护政府，肃清敌人决心，旋接大元帅复信如下：

品卓兄鉴：代电悉。兄既知商团之叵测，实大局之幸。查商团本多安分，不幸其中有一二十人，甘心为某国鹰犬，通番卖国，图倾覆革命政府。多数商人无知，为其愚弄而不觉。吾同志军人，初亦失察，不奉行政府意旨，杀一儆百，遂至养成其祸。今商团竟敢开枪屠杀

庆祝革命纪念之学生与工人，残忍无法，举世所无。此可忍孰不可忍！对此野蛮举动，实非法律所能收效。今授全权于革命委员会，使之便宜行事，以戡定祸乱。望兄等革命旗帜下之军人，务要竭力拥护革命委员会，俾得命令厉行，斯反革命之祸可望消熄也。此致。小泉兄（范石生）同此不另。

孙文

于是各军分头行动，商团迫向革命委员会缴械，首要逃亡，团兵解散，第二次罢市风潮，与商团同时结束。

## 六、滇军瓦解的分析

### 1. 廖仲恺先生的一番话

某晚，大本营为纪念节日，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联欢晚会，有苏联朋友以及各界男女来宾400余人参加。席间开展“抽签对号给奖”的游艺节目，所有来宾均得人抽一签，签上编有号数，照签上的号数，给予同号数的奖品。奖品种类甚多，得奖者皆大欢喜。我抽签对号，独得“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小旗一面，给奖者高擎红旗，并说明是何人所得，来宾拍手称贺，苏联朋友，把我举在空中，连抛数次，并用大碗来和我喝酒，我一时高兴，喝得大醉。廖仲恺先生拉着我的手到背人处对我说：“滇军望你来领导，你要枪有枪，要人有人。”我说：“滇军不是有杨希闵领导吗？我怎么可以！”他说：“革命咧！”当时我因旧社会的封建意识，道德观念，中毒甚深，以为以下犯上在道义上是不许可的。我不认识革命的意义，更不认识军队是谁的军队。廖仲恺先生见我迟疑，就说：“明天你来东山俱乐部吃晚饭，我们谈谈。”到了第二天，我的酒还没有醒，模模糊糊地把这一天的约会忘却了，第三天我遇到伍梯云部长（朝枢，时长外交），他责备而又带着

笑说：“你昨天为什么不来？”我说：“前晚的酒我灌多了，昨天没有起床，今天还在头痛。”他说：“我们改天再谈，你一定要来。”以后东江战事吃紧，大家都沒有时间了。

## 2. 内部腐败

滇军来粤，为拥护孙先生主义的实现。但一进广州，以为目的已达，不想朝这个方向继续努力，停止下来，逐渐腐化，迷失了政治方向。

大元帅初到广州，对滇军极为重视，凡有会议，均请杨希闵参加。平沈鸿英之乱，大元帅亲见滇军官兵勇敢善战，深加赞许。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大元帅特指定杨希闵、周自得为云南党代表，参加一中全会，实希望他们经过三民主义教育，在滇军中作出贡献，使主义能早日实现。但大会以后，杨、周两人，均无表现，就连滇军入党问题，也漠不关心。我请大元帅对三旅官兵讲话时，他的侍从见我们只悬国旗欢迎，没挂党旗。他问师部副官说：“总部通知你们入党没有？”副官回答没有。大元帅走后，副官报告了我，我到总部将这种情况，向杨希闵汇报。他说：“滇军入党的问题，党部已来联络，只等范、蒋两部的名册报来，就可以办理手续，等下催催他们。”过了很久，仍无音讯，我又去问周自得，他说就办就办，毕竟还是没有办。在革命旗帜下的滇军，没有加入国民党的组织，迷失了政治方向，所以，一切行动，都与革命事业背道而驰，这就是瓦解的主要原因。

滇军将领，自讨平沈鸿英叛乱之后，不乘新锐士气，扫荡东江，自以为大功告成，志得意满，各据地盘，追逐享乐。或子女玉帛，纸醉金迷，或吞云吐雾，苟且偷安，腐化堕落，目光浅陋，在态度上、作风上、言语行为上、生活习惯上，都自成一套，使上下侧目。当时大元帅称之为有枪阶级，而又跋扈横行，

恣睢暴戾。杨延培在东堤为一苏州娼妓枪杀机关职员，朱淮副官在亚洲露天花园因私仇而殴毙警局侦缉，种种罪恶，目无法纪，滇军瓦解，又其原因。

滇军内部，组织松懈，又不团结，一切人事、行政、筹饷、补给均脱离了总部掌握，只有编制上的名称，而无纪律上的节制，以致各自为政，各逐其私，各行其是，各不相照，一盘散沙，精神涣散，平时犹然，战时可想。

滇军财政杂乱，第三军尤为突出，蒋光亮独霸佛山，据广三铁路为已有，各项税收，均被截留；放纵部下，包庇走私，烟赌花捐，谁收谁得，收入最丰，半饱私囊；单位庞杂，而兵源甚少。胡思舜原系朱培德部旅长，到广州后即脱离朱部，靠拢蒋军。胡思清名虽师长，兵员不满500人。李根沄原系海疆军团长，滇军入粤，收容得旧部二三百人，投效蒋军，号称旅长。个人都是为利而来，互相竞逐，蒋光亮不能控制，卒被大本营撤职，逃出香港，胡思舜升第三军军长，即参加东江战役，直到解决。

范石生住在市区，有市内烟赌花捐，又兼江防司令，有舰艇巡逻江面，然收入十之八九，握在杨延培掌中。

赵成樑驻韶关，有南雄、韶州、连县的三县烟赌花捐，以韶关监督的收入为主。

至于总部、总司令、参谋长、副官长均有各自的收入，但多少不等。

假使以滇军的全部收入，交还政府，军队自身，明耻教战，练成劲旅，以作孙先生的政治后盾，则当时所主张的召开国民会议，可能实现，而孙先生亦不致赍志以歿。惜乎散在各将领手中，徒供挥霍，掷黄金于虚此，如杨延培以8000元港币，购钻戒一枚。赵成樑结婚请客，以巨万金另扎敞篷，均属暴殄，真所谓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阻碍了革命事业，促进了滇军的崩

溃。

滇军的补给，大本营初委罗翼群为兵站总监，在与沈鸿英作战时，起到了积极作用，一切粮秣弹药，供应无缺，与各军将领联系亦好。自东江战事延长，兵站开支，不能应付裕如，大半任务，归各军自行负担。如最需要的弹药，要各师备价购买，自总部委副官长夏声为兵工厂厂长后，更要各师先垫弹款，后领子弹。他又克扣工价，子弹出厂，不先检查，发到各军，到作战时，即发生故障，影响士气，贻误戎机，滇军瓦解，亦有关系。

### 3. 杨如轩脱离滇军，投降吴佩孚

滇军退入贵州，杨如轩由丘北来会，一路经黔入桂，均少与官兵接近。到入粤讨陈，他在人事上、兵饷上表现自私，二三营官兵对他不满，将他请来黄沙，向他要饷。自此以后，他恨二营，尤恨朱淮，他以为这场风波是朱淮掀起的。到朱淮升团长，二营营长缺出，朱淮已保荐有人，而杨竟委他师部的李副官来接。朱淮反对，全营亦不欢迎，杨竟派七团一营及八团全部，包围黄沙，企图解决朱淮。朱淮不服，陈兵抵抗，八团营长杜星鹤率全营来归，其余官兵，亦不肯出力，相持数日。我通电杨希闵、范石生说明经过，请他们主持正义。范石生出任调解，派车来黄沙接我到他的军部与杨希闵会晤。我到军部，见了杨希闵，他说：“我已劝过杨如轩，而他不听，现在沈鸿英就要叛变，战事就在眼前，我已告知杨如轩把兵撤回，希望大家和好，一致对付敌人。”我答应转告二三两营官兵，与杨如轩打消前嫌。他又说：“战事发生，你负责黄沙的警戒。”

平沈之乱，杨如轩率七团一营及八团两个营参加作战，八团团长潘宝绥阵亡，以后又在军田遇到北军，士兵伤亡过半，退回广州。杨自知威信已失，又与杨希闵意见不合，经不住直系政客的利诱，便决然向吴佩孚投降，与杨池生逃出香港，吴佩孚委他

两人为师长，驻在赣南，便于派人来粤，运动军队。北江滇军不为所动，杨如轩又派人来到东江，利诱三旅六团，六团团长游民书得款3万，已经动摇，并约期举事；东江敌人亦派队来接，幸多数官兵反对，报告营长萧希贤，暗中准备。游知事泄，先期逃走，我闻事变，即到太平圩劳军，升萧希贤为六团团长。

#### 4. 范石生杀杨廷培后率第二军回滇讨唐

范石生自以为聪明才智，高人一等，言语尖刻，惯于讽刺；而又心狠手辣，使权用诈，每以小恩小惠，结纳士卒，一撮烟灰，一包成药，几句闲言碎语，都能起到离间官兵感情的作用。其部下战将杨廷培，性情直爽，御下严肃，临阵勇敢，与范石生性格，极不相容，每与范议事，常相抵触。范虽表面一笑，而心实衡之。平沈之乱，杨督战甚力，大元帅称叹其勇。东江溃败，杨愤而跑到香港，二军存款，在其手中，范亦追至香港，劝杨回粤。杨执意不从，范亦甘言蜜语，甚至向杨屈膝，声泪俱下。杨一时心软，同回广州。范将杨卧榻，移在自己寝室，明显表示亲昵，实则暗中监视。范又鼓动士兵，向杨要饷，包围军部，喧噪不休。杨希闵闻之，亲出劝解，兵始散去。杨将存款，全部交出。范并逼其钻饰，公私财物尽到手中，然后说他克扣军饷，卷款潜逃。大元帅闻之，爱杨将才，派杨庶堪到范军探查，杨廷培与杨庶堪对靠烟床，乘范石生不在，杨廷培用烟签子在烟石上写“他不但要我的钱，还要我的命。”杨庶堪知道杨廷培生命危险，要想设法使他早离开军部，回报大元帅，命令范石生将杨廷培解交大本营查办。范接到命令，知杨此去必蒙宽宥，非先下毒手不可，即于是夜更深，派亲信将杨挟出后门，以刺刀刺死，就地掩埋。次日以押解疏忽、杨廷培投水自杀，呈报大本营。大元帅闻之，深为不怿。杨廷培死后，范又欲杀其团长季树萱，季深夜逃匿我办事处，求我保护，我派人送他出港。

范军部下，军心动摇。范升徐德为师长。徐老实人，唯范之命是从，虽可以维持一部分人心，但元气已伤，无法补偿。他又用李宗黄为参谋长，以致同恶相济。滇军将领，很少同他们亲近。范石生内心亦感到不安，又知道杨希闵和刘震寰与唐继尧勾结，不早谋出路，将于他不利，遂与广西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约，范以军队助他们拒唐，希望他们助彼回滇。胡汉民亦愿滇军内部分裂，势力削弱，一经范石生请求率队回滇讨唐，即得到大本营批准，并予支持。

### 5. 外部影响

唐继尧对驻粤滇军，时刻在意，如芒刺在背，非拔去不可；想尽办法，拉拢分化，不能收为己用，必使消灭而后已。滇军初到广州，唐派张时初来，以同学关系，拉拢周自得、杨廷培。他们是陆军小学同学，辛亥革命以后，又与周自得、赵成樞和我在讲武堂同学，不料被范、蒋知道，使人用小艇沉张时初于珠江，他们以为从此可以杜绝唐再派人来粤捣乱。但唐心不死，更继续派詹质斋、李培天、陈维庚、李云鹤、邹若衡、杨镜涵等先后来香港，各找关系，分头进行工作。对我进行工作的是詹质斋、李培天和陈维庚。此时，范石生高唱回滇报仇，约我同行。他们很恐慌，请我不要与范合作，希望我在外发展。我当认为辗转报复，终无已时，徒使地方糜烂。我对他们说：“我不回滇可以，但我有两点要求：第一，我在外发展，要有新兵补充，将来我派人回云南招兵，请地方政府，予以帮助；第二，我第二师现有伤残官兵300余人，我要陆续筹款，分批次送回乡，请云南政府，加以保护，并协助他们借资遣费谋生。”他们答应打电给唐继尧，不久，我得唐回电，一概允诺。我即将第一批伤残官兵80余人，派员护送出发，并派中校参谋陈新宇为驻滇代表，办理招兵和资遣事务。他们到了云南，唐政府优予招待，并即转送回籍，适当

安插，护送人员，即在附近招募新兵，不到一月，招得300余人，送回广州。如是三月，将伤残及老弱官兵，资送完毕，新兵亦招得八九百人，补充各旅。双目失明的赵连城，回到姚州，地方上举他为县参议员。

1924年11月，孙先生准备北上，致电唐继尧，望其来粤就副元帅职，代行大元帅职权，勉唐以国事为重，词旨恳切。而唐复电骄纵，措辞不逊，虽然孙先生大度能容，而唐继尧已大失人望，护靖勋名，至此而一落千丈矣。我二师官兵，深致不满，即将驻滇代表撤回，停止招兵。

此时，段祺瑞派许世英南下，一方面敦促孙先生早日北上，共商国是；一方面劝唐继尧就副元帅职，并为唐游说驻粤滇军，与唐内外合作，分化国民党势力。我和许世英谈过两次，他说：“中国应当统一，南北不能再分裂下去，希望带兵将领，一致拥护这一主张，将来和议达成，国家统一，各军将领都有地位。”

1925年3月12日，孙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来，凄然北望，内心悱恻，如失怙恃。已知滇军处境甚危，唐继尧忽于此时在云南就副元帅职，并由广西、贵州分两路出兵，通电到粤。大元帅职权，早由胡汉民代行。胡不满意滇军，已非一日，滇军如不勾结唐继尧，此时应即明确表示态度，与政府站在一条线上；乃不此之图，而反持沉默，启人疑心。胡受到内外的威胁，觉得卧榻之侧岂由他人酣睡。杨刘之被讨伐，实属罪有应得，咎由自取。

唐继尧出兵以后，对滇军将领的联系，更为频繁而紧张，杨希闵调赵成樑师来驻广州，接范石生防地，唐驻港代表亦对赵进行工作。但赵自与黄家联姻后，系站在反唐立场，他们认为只要拉拢了杨希闵，赵就不成问题，故在周惺甫由京回滇路过香港时，唐即电派他约杨希闵、刘震寰到香港会晤，结果尚称圆满。胡思舜亦接受唐开出的总司令支票，只有我还在不即不离之间。

我从前同唐合作，双方已得到互利，自从唐不接受孙先生电召，我即将驻滇代表撤回。唐认为我的态度起了变化，就派了一个不大出名的县长蔡六安前来。因蔡是我的内亲，可以直到广州，无人注意。他由云南起身前，受到唐的殊遇，他也写出了包票，保证到粤以后，一定要把我和唐的关系拉紧。蔡来到我的寓内，看到华封祝、李增蔚一班反唐的人在我身边，觉得很奇怪。夜里他和我密谈，首先替唐解释唐在去年不接受孙先生电召的原因，他说：“唐 1921 年回滇以前，本来是计划到桂林会师北伐的，他计算有由云南拖出的五个旅，加上桂林的三个旅，以这些兵力同孙先生合作，政治资本就不薄弱。不料到了梧州，知道桂林滇军，赶走杨竹君以及派闲在上海的朱培德来接杨的事，都是李协和一手造成的，李在唐之先抓到而已。”我只唯唯否否，没有肯定的表示。

## 6. 瓦解时的情形

1925 年 5 月，解决杨、刘的消息已经传出。桂军全部，移驻西江，广州市只有滇军。杨希闵在总部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参加的人第一军有我和赵成樸，第三军有胡思舜和胡思清，讨论的目的是了解备师情况和如何应付时局。开会时空气异常沉闷，大家都相对无言。人人都觉得心事重重，各有各的打算。此时赵师驻广州市，我师驻石龙，胡思舜驻增城，胡思清驻石滩，朱世贵师已靠拢朱培德，其余王秉钧、李根沄、罗廷标各师仍驻佛山。我说：“能不能想个办法，避免无意义的牺牲，即使要打，我们也是出于自卫，我以后方不宜留过多的军队，应将能作战的部队，都集中到第一线来。不然，退出广州市，守石井之线。”胡思清以后方部队关系饷源，若一旦撤去，必受别部侵占；赵成樸认为放弃广州市，大为可惜，杨希闵主张以现有兵力，缩短防线，固守广州，第一军占领白云山至石牌车站之线，第三军迅速

开回广州，策应第一军。议定后，一二两师即照决议布防，一师由石牌车站至瘦狗岭，二师接一师左翼由瘦狗岭至白云山。胡思舜在广州市耽搁了三四天，到他回防时，铁路工人和搬运工人已经罢工，行李弹药，堆置车站。他又折回，改从陆路，尚未达到防地。而黄埔学生军已发动攻击，内有苏联人指挥，攻势甚锐，反复向我师冲锋。我坚守不退，激战至晚。次日，黄埔军队，转移攻击目标，以全力指向赵师，并以虎门炮舰，参加作战，集中平射炮火力，轰击石牌车站第一师师部，赵师长中弹炸断两腿，送下火线。一时军心动摇，纷纷退入市区；虽受到包围，但仍能固守原阵地，继续战斗。朱淮电话说：“由上海招徕的淞沪散兵。一听枪声，弃枪逃走。”我率领卫队出发前线，中途遇到朱淮、李恭、萧希贤三人，由火线下来，说电话已被破坏，前后左右，消息断绝，正检修中；战斗吃紧，子弹多不合膛，我们一同折回办事处，找军械官来问，尽是夏声当厂长时所造，嘱咐他调换。此时值日副官送来一件公文，是大本营委我为第一军军长的特任状。我问是何人送来。他说是一个普通人，递了就走。我同朱淮说：“大本营不郑重其事，其意可知。如果派一个军使，正式送来，我们还有商量余地：又或在未枪响之先，找我们开心见胆地谈谈，这一仗也可以不打。今若此，我不愿在这种时候、这种情况下接受任状。孙先生去世不久，问心有愧！我也不愿继续打下去。”我问朱淮：“你的意见如何，是不是你来干？”朱淮说：“要干大家干，打来打去，打到我们的头上！”我说：“我们是有过恶的，但士兵无罪，总要替他们想个办法。”我就派李恭转回前线，通知在火线上的官兵，停止战斗，在原地固守待命：又写了一封信，派萧希贤送给朱培德，托他收编滇籍官兵，勿使流离；又嘱咐卫兵司令，好好维持，不要跑散，等萧团长回来，自有你们的安置，我和朱淮才离开广州。胡思舜和胡思清的队伍，在第一军解决后的第三天才从增城开来，途中受到包围，亦被解

决。

## 六、结尾语

这篇材料，全凭记忆，自从我的《三十年军中日记》丧失以后，久未执笔记述。今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一再动员，并提出这个题目，一经思索，印象犹新。在那短短四五年中，仅就自己的亲身经历，也有涓滴的史料可记。以前忙于工作，或作或辍：今得退休余暇，而且身心健在，所以鼓足干劲，摆出事实。璩伯玉五十年而知四十九年之非，我亦受得新社会的教育，才知在旧社会的罪恶，奋笔直书，情难自己。回首当年同事，寥若晨星，后死之责，不敢不勉，其中难免不有挂漏或错误之处，请知者加以教正。

(1965年)

## 1921—1922 年的滇黔赣联军

龚师曾 \*

我在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之役中，曾任滇黔赣联军第一路司令部（司令蒋尊簋）参谋长，对滇黔赣联军的组成和解体，皆亲与其事，比较耳熟能详。兹就亲身经历、耳闻目见，笔之于书。惟事隔多年，记忆难周，尚冀参与其事的老同志，再加补充。

### 一、川滇黔三省的形势

要谈滇黔赣联军的组织，先得谈一谈川、滇、黔三省的形势。

唐继尧在就任云南都督时，即保刘显世继任贵州都督，把贵州摆在自己势力范围以内。后来蔡锷率滇军入川，蔡死后，滇军总司令罗佩金继任四川督军，唐继尧又把四川视同外府。1920年，川人提出“川人治川”的口号，全川军队联合起来，驱逐客军出境，滇、黔客军概被驱逐。唐继尧在西南各省宣布护法时，已将滇军改称靖国军（包括驻粤和援川滇军），俨然以八省联军总司令自居（川、滇、黔、粤、湘、鄂、陕、闽），就是“联帅”名称的由来。这时在川滇军顾品珍（第一军）、赵又新（第二军）电唐请援，唐以在川滇军不能为他扩充势力，反要他派兵支援，便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赵又新阵亡后，顾品珍遂班师回滇，唐获此讯，始用羁縻手段，派顾为滇东边防督办。顾的部将杨蓁建议，不就督办，而是进军云南去做督军。1921年1月，

\* 作者时任滇黔赣联军第一路军司令部参谋长。

顾品珍遂秘密率部由滇东向昆明进袭，至大板桥（往昆明仅一日路程）时，声称要唐下野。这时，张子贞（云南人、日本士官八期）驻在大理，刘祖武（云南人，日本士官八期）驻在蒙自，与唐、顾是同学，不便有所牵连，故按兵不动。拥唐部队如李友勋、胡若愚、李永和、王浩修，龙云等，有的不在昆明。城内驻有厄飞军（护卫军）大队及省防军若干营，但战斗力不强。唐继尧大恐，遂派我经滇越铁路专赴广州，向孙中山先生请援，拟把驻粤滇军调回来。我到海防时，适值阴历除夕，海轮无班。等轮船启航我到达广州向孙中山先生陈述时，孙中山先生告诉我说：唐已于 2 月 7 日（即庚申除夕）率其堂弟唐继虞等逃出昆明，出走香港了。那时，我任联军总部少将参议兼炮兵科长，唐已出走，我遂亦留在广州。

黔军和滇军一样，也在四川站不住脚，黔军总司令王文华也回师贵州，企图推倒联军副帅兼贵州督军刘显世。但刘显世是王文华的舅父和叔岳父，王有所避嫌，遂请假赴沪，派第一旅旅长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第二旅旅长谷正伦为总指挥，率师回黔。谷正伦回黔后，执行了“清君侧”的任务，刘显世被迫出走，贵州政变，告一段落。

## 二、滇黔赣联军的组成

孙中山先生在南下护法被推为大元帅时，唐被推为元帅，但未就职。孙中山被桂系排挤返沪，唐曾随孙中山先生通电宣言广州军政府无效。迨孙中山驱走驻粤桂军，重返广州后，唐已出走香港。孙中山以我原为唐继尧代表，遂派其秘书徐苏中（字药群、江西清江人）找我为去港劝唐来粤。我曾去港几次，唐仍迟迟不来，孙中山后又加派马君武、罗家衡、汪剑刚同去香港，坚邀唐继尧来粤。唐为了争取外援，也想了解广东形势，果然应邀来广州，颇受礼遇，孙先生着广东便服相见，表示亲近。这

时，广东虽由粤军收复，但南部高、雷、钦、廉及琼州，尚有桂军盘踞，桂系的广西巢穴，仍然未动。唐到粤后，与孙商量讨桂，提出组织五路滇、黔、赣联军计划：

第一路：以李根源（原琼崖镇守使，接近桂系）在原驻粤滇军张开儒部拉去的梁说、周兴权、赵德裕、赵德恒等部及赣军总司令彭程万所属李明扬、赖世璜等部两部分组成，这两部分军队均原驻广东，以参谋本部次长蒋尊簋任司令，龚师曾任参谋长。

第二路：李烈钧带往重庆的原驻粤滇军的朱培德部杨益谦、鲁梓材、张怀信等部组成，以朱培德任司令，曹浩森任参谋长。

第三路：唐继尧直辖滇军而又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境外的李友勋、胡若愚、张汝骥、龙云等部组成，以李友勋任司令。

第四路：黔军王文华旧部第二旅谷正伦（贵州人，日本士官毕业）所属部队组成，以谷正伦任司令。

第五路：黔军王文华旧部第三旅胡瑛（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所部吴传薪（厚安）、陆荫揖（保定军官学校）、刘辛园（瑞裳、保定军官学校）等部编成，以胡瑛任司令。

闻唐继尧初来广州，拟就元帅、陆军部长及参谋总长三个职位中猎取其一。这时军政府已改制，不用元帅名称，陆军部长已由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担任，不欲省外人染指。参谋总长早由李烈均担任，李与唐均是日本士官同学，又是老同事，唐亦未便取而代之。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意将滇黔赣联军总司令一职相委，但因在编组期间，尚未明令发表，唐亦以亟待布置回滇策划，又匆匆离广州回到香港，几经催促亦不再回粤了。那时，我已就任联军第一路司令部参谋长，随同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部到广东南路编组军队，对孙、唐间的联系就不甚清楚了。

### 三、滇黔赣联军的重要活动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讨桂计划，以粤军第一路司令黄大伟部

及黄明堂部攻打高、雷、钦、廉等地桂军，向广西龙州进军，并以陈策率海军收复海南岛。

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部为主力，以叶举为总指挥，又策反桂军刘震寰向梧州进军，直取南宁（其时南宁为广西省会）。

以第一路赣军由韶关经乐昌、连山、阳山、全州向桂林进军，会同粤军许崇智部攻桂林。

以第二路朱培德部由重庆南下，往湘边入桂，派杨益谦为总指挥，会攻桂林。

以第三路李友勋部由独山攻柳州，胡如愚部由靖县会攻桂林。

以第四路谷正伦部由贵州向广西柳州进军。

以第五路胡瑛部由贵州向广西百色进军。百色是广西西北境右江上游城市，也是川、滇、黔烟土的集散地。

第二路军尚有一部分原驻粤滇军赵德裕部，司令蒋尊簋曾派我随黄大伟部到高、雷、钦、廉，准备接收，等我到达合浦时，始悉赵部蔡子怡、王连璧叛变被粤军消灭。其队伍是由广州湾北海登陆，当时广州湾被法国租佔，队伍有驳壳枪 16 枝，曾被法国当局收缴，经我电告参谋本部即与法国领事交涉，枪支经如数归还。

1921 年 8 月，我由合浦回广州后，即随司令蒋尊簋经梧州到桂林，司令部除我担任参谋长外，吴宗慈（字霭林，江西南丰人）任秘书长，熊式辉（字天翼，江西安义人）任副官长。赣军司令部除司令彭程万外，张于浔（惠民，江西南昌人）任参谋长，陈锐（字纯方，江西赣县人）任副官长。当时攻桂林军队，粤军由陈炯明（陆军部长）指挥，滇黔赣军由参谋总长李烈钧指挥。李烈钧初驻镇远，乃移古宜抵长安，离桂林 120 里。桂林军事，由参谋本部次长蒋尊簋处理。经于 9 月 12 日召集在桂林的滇黔赣联军各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其有关于桂、粤各军事宜，

则召集各军将领特别会议行之。兹录二次军事会议决议案如下，以存史实。

### 第一次军事会议（1921年9月12日）

#### （一）军事会议会期及列席人员

会期：临时召集或由各将领请求召集。

列席人员：临时约定。

#### （二）桂全两属各军人数及月饷概算

各部分造册具报。

#### （三）枪之种类及口径

各部分造册呈报。

#### （四）开市、街市驻扎之军队移调由政务处办

#### （五）总执法处

组织各军之总执法处由李（明扬）赖（世璜）两梯团长接洽办理。

#### （六）桂林知事问题

加委并委派征收员由政务处办。

### 第二次军事会议（1921年9月14日）

#### （一）通电表明我联军援桂主旨

用各将领联衔通电表明桂林政务处及卫戍司令部设立之理由。

#### （二）桂林方面我军之配备

（1）市面原驻军队调郊外附近财源地区及交通要隘。

#### （2）驻扎地区之分配：

甲 城内及附近十里以内地区：由胡司令（若愚）所部驻守。

乙 桂林—长安线：由滇军三十八团分一部驻守。

丙 桂林—柳州线：由杨总指挥（益谦）所部驻守。

丁 桂林—昭平线：由滇赣两军分派驻守。

戊 桂林—全州线：由赣军驻守。

### (三) 对内对外办法

(1) 对内：甲、整顿军纪；乙、团结内部；丙、编新军歌；丁、组织本军将校俱乐部。

(2) 对外：甲、联络友军感情，对于桂军更须注意；乙、收拾地方民心，凡能便利民间认为可行者均切实施行。

## 四、滇黔赣联军的解体

在滇、黔、赣各军并粤军共同讨桂声中，唐继尧仍避居香港，迨桂林各地收复，唐即积极作回滇种种活动。他于中秋节前派王九龄（号竹村）、高向春、毛鸿翔、林丽山四人为代表，到柳州慰劳李友勋、龙云部队，坚定他们回滇的信念，又到桂林慰劳朱培德、杨益谦、胡若愚、张汝骥等部队，征询回滇意见。胡若愚、张汝骥系唐继尧的直属滇军，回滇自无问题，杨益谦亦表同意，朱培德则模棱两可。王九龄亦拉朱培德到香港，唐将在上海外国银行存款 100 万的利息，如数交给朱培德作为军队开拔费。所以在 9 月 28 日开联军第三次会议时，胡若愚表示，政务处渠负责至本月底，以后财政事如何办理，请公决。杨益谦谓：应自 10 月 1 日起，所有民财两政事，概请次长（指蒋尊簋）全权处理，各军伙食之需，亦由次长负责。蒋表示：此事关系甚重，须从长计议。次日复开会议，决定政务处仍旧维持，现在滇

军第一期（10月1日至10日）伙食，由银行担任筹措。

1921年2月，孙中山到桂林组织大元帅大本营，筹备北伐。唐继尧亦于1921年底由香港乘英国商轮至梧州，委李友勋、胡若愚、郑开文当第一至第三军军长，龙云为梯团长（旅）。孙中山闻唐有回滇意，遂与李烈钧商议，派我和耿毅（字鹤生）往柳州，劝唐一同北伐，要枪给枪，要饷给饷，要名义就给名义，并说：昆明虽被顾品珍占去，到底是自己人，肚量要放大些。现在北伐大业，在在需人，等北伐完成，云南僻在边陲，只需一纸文书，便可解决，何必急于回滇。但唐因执意回滇，又托我回报孙中山代他请假三个月，等把云南事件料理好，即由贵州出师北伐云云。朱培德亦将唐继尧拉拢事告知李烈钧，李因拥护孙中山北伐，当将杨益谦部廿营悉予缴械，另派所部团长胡思舜（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为旅长，乃归朱培德指挥（朱后来担任驻粤滇军总司令）。杨部团长李云楼被扣留，因其坚决拥杨之故。

如前所述，滇黔赣联军中之第一路军滇军赵德裕部已在琼被粤军解决。赣军彭程万部后由李烈钧率领北伐。

第二路朱培德部后亦以滇军的名义参加北伐。

第三路李友勋等部由唐继尧率领回滇。在经过广西怀远时，被广西自治军林俊廷将主力歼灭，李友勋、郑开文阵亡，仅胡若愚、龙云等部入滇。宜良之役，顾品珍被吴学显先遣军狙击毙命，唐继尧乃重入昆明。

第四路军谷正伦部在遵义与黔军第四旅旅长张春圃密谋回黔夺取政权，派兵向贵阳进逼，未参加北伐。不料部队已被黔军副总司令袁祖铭（总司令王文华在沪被袁祖铭狙击殒命）运动，迫谷出走，同时张春圃旅亦受第二旅的团长王天培的运动，谷、张乃逃亡重庆。

第五路胡瑛部虽是黔军，但胡瑛是云南迤西人，不愿过问贵州的事，把队伍交给团长吴传薪，自己回到云南，也未参加北

伐。至此，滇黔赣联军便从此解体了，我亦调任参谋部警卫军司令。

(姚肖廉记，1966 年)

## 邓本殷统治时期灵山钦县地区的贩毒略况

廖 燎\*

灵山、钦县两县当年属广东，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和缺乏种植罂粟经验等关系，素无鸦片烟土出产。辛亥革命以后，所有买卖的烟土，主要系远从云南、贵州两省偷运而来。云南的产品，色泽红润，称为“红肉云货”；贵州的产品，色较淤黑，称为“黑浆贵州土”。前者市价常较后者高出一两成，但是，当地的瘾君子和他方的烟贩（据悉，当时的烟贩，有远自北海、广州湾、高州和阳江等地方而来的），有的取其“物美”，有的利其价廉，两种均系畅销的毒物。黑市中交易的数量，为数颇大，再加以云贵的产价，与钦、灵的市价，差额很大。例如，民国八九年间，钦、灵的市价，每两约为白银毫洋五六元，而据悉，云贵产地的价格，仅为大洋一元左右，因此，便吸引了钦、灵地区一些绿林豪客亡命之辈，不惜跋涉千里前往云贵产地偷运。如灵山那隆乡的“承敷大”、“勒竹头”（“承敷大”原名劳承敷，“勒竹头”原名何永佳，系笔者同乡）、钦县小董乡的“疤头张”（忘记了名字）等绿林头目，就是以几年的贩运勾当，获得孽钱起家，在乡梓里建宅置田，一变而为地主，并由他们的所谓“发财致富”的榜样，在地方上贪婪不法的地主、豪绅中，掀起一道贩毒的黑流。

大约 1923—1925 年间，军阀琼崖镇守使邓本殷，勾结钦廉申葆藩、冯相华诸反动军政头目，把钦廉、琼崖联同一起，并出兵掠据高州、雷州各县，造成广东南路割据局面。他们为了大肆

\* 作者系灵山县人士，其父曾参与贩运烟土。

搜刮，在所统治的地区里，除了截留日赋、重加税役、滥铸银币（即所谓八县毫银，成色很低）和大开赌禁之外，更不惜毒害人民，上下其手，包庇鸦片，使贩毒的罪行，成为“合法”的经营。因而，一时钦、廉各处地主豪绅，便乘机而起，与绿林土匪头目等合伙，猖狂地从云贵贩毒。防城县的东兴、合浦县的小江、灵山县的平山和钦县的小董等地方，均有前往云贵贩运烟土帮队的组织，实行以武装贩运，其情况的汹涌，贻害之巨深，倒是空前无两。当中，尤以钦县小董一隅，有潘顺（灵山平山乡的绿林头目）、黎本廷（钦县广平乡的绿林头目）、晚叔（钦县小董乡的绿林头目）等四五帮，以此为集散地区，各按烟土当产季节，啸聚数十队众，更番贩运，更为猖獗。同时，小董圩这一山间的市集，也因之而成为臭名昭著的烟土集散地。

### 一、地、绅、商与绿林头目的互相勾结

当时，一些绿林头目在邓本殷的庇护下，到云贵贩运烟土获得巨利。地主、豪绅和商人，便认为“要富在烟土”、“要捞在烟帮”，主动地找门路与烟土帮头目勾结起来。同时，还由于烟土帮每队每次续集队伍，都以七八十人为限额（据说，为了适应广西西部和云贵山区村落稀疏、市镇细小的特殊情况，以便解决沿途粮食、住宿等问题，不能太多队众为一帮）、未能悉数容纳各方面的人数参队等关系，竟使在他们当中，发生了角逐参队的暗潮，演出了各式各样拉拢罗致的丑剧。

例如灵山县平山乡地、绅、商三位一体的陈铿鹏，灵山县城巨商朱万隆、仁泰等号的老板，都不惜运用各种讨好的手法，把灵山平山乡的烟土帮绿林头目潘顺，拉为所用。他们对潘顺，除了金钱缓急相通、代销烟土、代购枪支等等之外，还不时邀请潘顺过从，待如上宾一样，款以佳肴美酒，并于来往的时候，派出武装迎送，以保安全。又如钦县陆屋圩（当时陆屋圩归钦县管

辖）联聚号邹七叔（忘记了名字）、小董圩爱生号韦壁光、鲁兴号庞秉乾等巨商和士绅丘卿云等，对于黎本廷、晚叔等烟土帮头目，每次集队时，酒水招待之余，助予资金、枪支等，以壮行色。还有灵山松圩乡大塘派村地主谢华英（曾做过民军司令）、谢居之（前清秀才，历任乡长和民团长等职），为了与烟土帮头目黎本廷勾结，每于黎过境时，辄派武装扈从十人八人，远道迎送，加意招待；而且，谢华英还自动作伐撮合，以侄女与黎的儿子黎鉴泉联婚，借深勾结。

至于烟土帮的头目，各界本都把他们视作败类，只因贩毒的牵连，获得地、绅、商的青睐，但此辈尚有自惭形秽之感。因此，他们也要出各种巴结的手法，向地方巨绅“孝敬”，保障和扩大他们的贩毒行为。例如上述潘顺与陈铿鹏等之间，除了每次组队时，接受搭帮之外，更于每次前往云贵贩运归来，都把若干分量的烟土，折价托为代销：又必于云贵提回若干滇七（有名的药品）、火腿和茅台酒等物品，连同上等的烟土作为礼物，使送给陈铿鹏以及地方上的巨头，如劳快甫、陈冠三等，作为“孝敬”（劳快甫系平山地方的大地主，陈冠三系前清秀才，灵山县东部各乡的巨绅，由于陈系笔者先父的摯交，潘顺使送的各物，笔者也曾得尝试，所以知悉其详）。

烟土帮头目黎本廷的手法，与潘顺的伎俩差不多，即是尽量接受各个地主豪绅搭帮贩毒外，每于进出灵山县属那隆、松圩等乡推销烟土时，均依照当时的俗例，备办“鸡项”、“面条”等湿礼，连同烟土十多两，使送廖协虞、陈越群等地主当权派（鸡项一对，面条成斤，系当时地方上的一种成例礼物，廖协虞系笔者先父，历任那隆乡乡长；陈越群系松圩乡的大地主，曾做过灵山县县长），并由黎的伙伴的撮合，挽到那隆方茶子岭村大地主廖官茂等。代销烟土，八折五收取货价，借资巴结。

正是由于有了上述地、绅、商与烟土帮头目的勾结贩毒的关

系，当时，灵山县属的地主、巨商们，多贮有烟土待沽；烟贩掮客来往购销，城乡吸食者众多，情况不能尽述。同时，整个灵山县属，从东部东民、平山乡起，至西部太平、那隆乡止，纵横两三百多华里，所有各个村落的地主、豪绅，各市集的巨商大贾，或个人投资，或合资贩运，都卷入到这一贩毒的黑流中，以牟取暴利。笔者先父廖协虞，就于此时，也合污投以大洋 2000 多元，派出扈从数人，参加到黎本廷的烟土帮。至于钦县县属的情况，亦与灵山的情况差不多，兹不再赘。时人有以“一股黑风，吹遍人间”作为概括的描述，亦足以反映当时贩毒祸害的深巨了。

## 二、烟土帮的啸聚和活动

烟土帮的啸聚始于何时，无从稽考。但是，在辛亥革命后的一些年月里，都是三五个绿林匪类暗中去做。只有在邓本殷割据南路时期，由于邓的庇纵，才明目张胆，公开地活动起来。以钦县小董圩为组帮根据地，而又做得最长久，和最为地、绅、商等信托的那几个帮队为例子，他们啸聚活动的始末，有下列这些的情况：

每一烟土帮都有头目。这个头目，负责带领帮队穿越千里山川，踏着羊肠小径，从铁县小董地方前往云贵产地购运烟土。因此，他不仅需要熟悉途径，尤需要同沿途和云贵产地的地霸、绿林、土酋等有一定的勾结，才“吃得开”。而黎本廷、潘顺等烟土帮头目，若干年来亡命桂、滇、黔各地，与当地的地霸、绿林、土酋等，结下了渊源，所以，便有资格做起帮队的头目来。同时，他们“顺利往回”获得暴利的事实，使地主、豪绅、奸商们，把他们视作为“招财童子”，于是便与他们联合，这就是烟土帮啸聚起来的一般过程。

他们每次啸聚的时候，头目是早于个把月之前通知各个有意参加、有关系的人，来作准备（笔者先父当时派人参加，是于一

个多月前，便得到通知），接着便树起集队的幡招，即指派一两个亲信为助手，聚集羽翼七八人，配以各式长短武器（包括六八、七九、双筒、驳壳等枪支）为“打手”，找来专肩担挑的喽啰六七人为挑夫，更筹集了若干金钱，为贩运的资本，这样，便组起了帮队的总队部。

在总队部的下面，再约集到五六个小队，便算凑足成帮。参加小队的当事人，毫无疑义都是那些与帮队头目有着比较深交往的地主、豪绅和奸商，而一些陌生的或少交情的人，则休想问津。

小队大体由一个当事人，出具武装打手四人、挑夫五六人、管理员一人，共十一二人组成一队的称为“全东小队”；当事人出具的武装和挑夫不足数额时，由帮队头目调配足数的称为“合东小队”；另外，又有所谓“特别小队”，则是武装打手和挑夫的人数较多，而经帮队头目同意的小队；例如陆屋圩的巨商联聚号司理邹七叔，每次参队都派出武装打手七八人，挑夫八九人，管理员一人，共十七八人，自成为一小队，就是所谓“特别小队”了。所以，总计每帮的人数，约为八九十人，当中武装打手，约有三四十人，至于所携资金，以每小队大洋 3000 多元为计算，约为 2 万至 3 万元。

所有每个小队，均依帮队头目约定的日期至小董圩集合，再由头目安排行动时前后的次序，计由帮队头目亲带打手六七人，行在前头带路，叫做“打先锋”；派打手六七人，由助手一人率领随行在后，叫做“后卫”；其余的人众，则由另一助手带领，行在中间，叫做“队本部”：行动时，前、中、后三部分互相照应，以策安全，时人称前后兼顾，至于各个小队，只有服从安排布置而已。

帮队次序编过，即由头目决定起程日期。选定起程日期有一套迷信的仪式，即是由头目杀生鸡、烧冥纸、祈祷神明后，所看

鸡脚的血脉状况，以作定夺。有时，由于鸡脚的情况未符合所谓“吉利”的愿望，即推延十天八天，亦属常事。

烟土帮的路径，大抵分为左江、右江两途（以百色河为中线，挨左边的称为“左江”，靠右边的称为“右江”），至于行哪一途，都是临时因应两江间的军队情况而定。有时，更是两江穿梭行走，即是：左江有军队驻扎，则行右江，反之，右江有军队驻扎，则行左江，若果两江均有军队驻扎，则从间隙迂回而过，务使避免发生冲突。

烟土帮为了对付当地军队的拦阻，准备了两手，一手是万一碰上军队拦截时，则严阵对垒之后，由头目派出专人前与军队“讲数”，贿以若干金钱，换取平安通过。据一次笔者先父派出的管理员回报，于前往途次广西西林县境时，遇上百多名的广西军队拦阻，当即经由“讲数”，贿以大洋 500 元了事（该贿款则由各小队按资金数量比例科足付交）。另一手，则是对地方居民，悬出通报军队情况的奖励金，凡有地方乡民知道某地方有军队驻扎时，去向帮队通报，一般都给予十元八块作奖赏。沿途无数乡民，为这十元八块，成为烟土帮的谍报。

如上达黎本廷带领的烟土帮，一般都是到黄草坝邻近各地方采购烟土；有时，也多走几天路程，到遵义县的边区，以至大理县。他们到达采购的目的地点后，即挽掮客、地绅和酋长等进行交易，并预约下一次到达的日期和交易的数量。

他们交易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现洋交易，其过程为一般货物交易的情况，看货议价后，即以现款交易。但是，当时行使的银中，有“楂柱”、“飞鹰”、“大头袁世凯”、“小头袁世凯”、“大头孙中山”、“小头孙中山”之分，成色以“楂柱”、“飞鹰”最高，大头袁世凯、孙中山次之，小头袁世凯、孙中山又次之。所以交易中对银洋的分别，有不少的麻烦。另一种是以枪支换烟土，其中更把枪支的种类拟出交易的办法，据说每枝板面驳壳换

货 220 两左右，大机头驳壳换货 200 两左右，其他式样的驳壳则在 180 两之间。还有六八、七九、双筒等步枪每杆换货 150 两左右，日本村田式十响步枪和毛瑟九响步枪每杆换货 80 两左右，而每杆毛瑟单响步枪则仅换货 45 两（各式枪支均配子弹 50 发）。其他如曲尺、左轮等手枪，则很少交易。同时，因为有了上述的交易办法，在烟土帮准备出发之前，钦灵县属出现了一片找换银洋、选购各种枪支的活动，县内的银洋和枪支的售价，也相应地高起来；笔者先父于参加贩毒时，除了拿出自有的毛瑟枪三枝去换货外，还向别人购入几枝以换货。

所有帮队的交易烟土，不论现洋采购或枪支交换，都是帮队的头目指导下进行的，成交时，货主以零二交他作佣金，采购的小队，则以零五交他作酬劳，因此，每次帮队的采购中，帮队头目的收入数目是不少的。据一笔者先父派出的管理员回报，计帮中 6 个小队共采购烟土约 3 万两左右，帮队头目净收了佣金烟土 600 多两，酬劳烟土约 1500 两左右，两共 2000 多两。如上述的黎本廷，每年组帮四次，则全年有 8000 多两烟土收入，再加上他的总队部购入烟土的盈利，为数很大，所以，在黎搞烟土帮勾当这两三年中，赚了不少作孽钱，在钦县广平乡间，建造了称誉一方的住宅，购置了年收 1000 多担租谷的良田，又在钦县县城和广平圩中经营了两三间比较有规模的商店。这样，他便从一个绿林头目，摇身一变而为地主、商家，并挤到乡绅的行列。

各个小队的情况，真是不一而足，在所谓“全东小队”里，除了个别系名副其实者外，绝大多数都是“合东小队”一样，拼凑而成。仅出资本而没出枪支的伙伴，需要向出枪出资的伙伴，缴交约 10% 的烟土，作为枪支的报酬（又名刨枪价）。所有小队里的从役人员（包括管理员、打手和挑夫），更受到东家的严酷剥削和限制，每次贩运归来，仅由东家给予管理员和打手每人工资烟土 30 两，挑夫 25 两。贩运时，各人不能私带，否则便成为

犯例，受到没收和呵斥。因此，这些管理员、打手和挑夫等，只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往千里征途为各个东家牟取暴利，有时，积劳成疾，而东家则视若敝屣而弃之，那就更惨了。

### 三、邓本殷包庇烟贩的内幕

解放前，军阀官僚包庇贩毒图利，原属公开的秘密，而邓本殷在割据南路时期庇纵情况尤为猖狂。

自从邓本殷庇纵使钦县小董地方的烟土帮由地下转为公开以后，军阀申葆藩就以乡土之便，唆使侄儿申少议不断出资出枪，派人附搭黎本廷、晚叔等烟土帮头目，至云南贵州产地贩运。军阀余孽苏廷有、陈得春的儿子（忘记了名字）等，也步申后，交付枪、款，硬要各个烟帮头目，义务代为效劳（贩运中不交杂费和佣金酬劳），其他如冯相华等，也都凭借他们的地位，把魔手伸入烟土帮之中，情况不一而足。

至于军阀邓本殷的手法，来得更加狡猾。邓本殷于先一个时期，派出亲信的团长陈凤超（陈系灵山县陆屋圩人，当时在邓部下为团长，驻军海口，后邓擢为某司令），几次带领部队百十人，从海口往返钦县县城和陈的家乡陆屋圩，购运了大批烟土（数目未详）往海口推销，接着，又指使陈凤超于钦县县城和陆屋圩乡间，以联络乡亲为名，设宴款待当地的官僚、巨绅、烟贩和黎本廷、晚叔等烟土帮头目，从中组织贩运烟土的货源；随即由陈布置几艘大号木船，挂出“琼崖镇守使巡洋查缉队”旗帜，时人称为“师船”（初期两艘，后来增加至六艘），从钦县县城包运各烟贩的烟土到海口推销，以“抽佣”、“吃价”和“操纵”等手法获利。

据笔者先父廖协虞一次于钦县乘搭该师船贩毒海口回来，具说其中内幕颇详，兹忆其略况如次：邓本殷派陈凤超所设的“师船”，是包运与他们有关系的各烟贩的烟土前往海口销售的。他

们为了保护烟贩人货上落的安全，除在烟土的包裹贴上“琼崖镇守使”的封条之外，还派出武装人员，护送上落，务使所有海关人员、当地军警不会检查。每艘船上，更派有副官一人，带同武装士兵一班，随行招待保卫，计笔者先父同行的一次，共烟贩30多人，分乘了6艘“师船”，共贩烟土约十一二万两，当中最多的，系陆屋巨商联聚号邹七叔和小董巨商焕兴号庞伟男两人，各为1万两左右，其余各人，有一二千两，以至三四千两不等，而笔者先父则贩去两千多两。

当船至海口时，由陈凤超再派副官几人带武装卫队二三十人，从岸边迎接至大中华酒店安顿，酒店里，还有武装卫队十来人，日夜轮班守卫，以策安全。所有来回船费和住房租金，一律免收，而且每天还有早晚两餐颇为丰盛的饭菜招待。同时，于人货入酒店之后，各货主如需要款项应用，更可按照来货总值，预支两成或三成，以应开支，于货物脱手时，如数扣除。至于住酒店招待的副官们，还负责引来各个顾客，与货主们斟盘，并居间商议交易价格和料理交易中诸事务（包括看货、过称、收兑款项等手续），务使各烟贩免除麻烦。

烟土一经交易，陈凤超即按照市场中“九八行”的板样，接货价总值扣出2%为店佣，扣出5%为船费和保护费。

即以一次贩运烟土十一二万两来作计算，邓本殷、陈凤超的收入可以算出来：每两烟土售价大洋三元左右，其售值为大洋三十五六万元，扣出店佣2%，约共7000多元；扣出5%为船费和保护费，约为17000多元，“吃价”（商人购烟每两压价两三角，作为对邓本殷的孝敬）约为3万多元。两者合为5万多元，流入邓、陈的腰包，数目颇是惊人。至于邓、陈之间，如何分赃，无从知悉。

此外，邓本殷还唆使他仆僚，预先从香港购来驳壳、曲尺、左轮等枪支，转向各烟贩兜售，或转往云贵换取烟土，笔者先父

那时也购了两枝驳壳。据说每枝驳壳邓、陈等赚价大洋百元，每枝曲尺赚价三四十元，每枝左轮则赚价五六十元，所以，在出售枪支一项，邓、陈等又可赚一大笔。

#### 四、烟土集散地小董圩的情况

小董圩系钦县属内的一个山间小市集，横直两三条干道，居住着三两百户商民，以经营吐纳多民生活上和生产上各种物品为业务，初无其他祸害人民群众的事情。但是，在军阀邓本殷庇纵贩毒期间，情况则大不同。由于灵山、钦县两属的烟土帮，都是以这里为集散的地点，各帮贩运回的烟土，又有很大部分的数量在市销售，据当时的大概统计，每年内约有十五六帮烟土帮在小董圩集散，每帮运回的烟土，约有万两左右，在市内销售，年计有十五六万两之多，因此，不论在烟土帮集散的期间，或平常的日子里，都有成百上千的商人，到这里来买卖烟土。这样一来，这个市集，便成为一个烟土集散、烟贩麇集的圩市，随之而来的，便在市内新设了十多间吸食鸦片烟膏的铺子，横床直竹，毒雾翻腾；又有几间比较有场面的旅店和茶酒楼开设起来，供烟贩住宿饮食，更设有妓院两三间，番摊赌馆也设了几间。整个市场，笼罩上一片糜烂龌龊的气氛。

同时，各行商人，也都乘时而起，如经营日用百货的“丽生”等号，扩大了业务，从外埠运来各种生活的物品，在市内推销，据说，仅线衫便年销达几百打以上。还有从来未有开设过的大洋找换店，也开设了几间，争相为烟土帮众兑换货币，年度营业数目，达10多万元之巨云。

此外，于1924年农历正月廿四日，所谓“三婆神”诞期，烟土帮头目黎本廷、潘顺和地绅丘卿云、韦璧光等，宣称历次烟帮的顺利贩运，和地方上的安宁，都是有赖于“三婆”神灵的庇护，饮水思源，合当举办游神大会，以酬神恩，因而联同筹捐，

作为游神会的费用，一连三日三夜，沿街排设了几处有规模的花灯和歌坛，并辟地盖搭临时的剧院，上演粤剧。在游神的日子中，他们还别出心裁，出动舞狮、舞龙队，以凑热闹，又以妓女二三十众，化装各种神佛形象，并伴以武装打手百多人，蜂拥随行，显示出烟土帮队的“威风”，把乡民推入慕仰贩毒和迷信的境界中，成为一个烟土帮炫耀和宣传迷信的大会。

(1965年)

## 讨伐军阀邓本殷的回忆

冯 璞\*

民国 14 年秋天，我们的队伍——广西讨贼军第一纵队（包括第三团，团长李明瑞；第四团，团长黄超武）在纵队司令俞作柏率领下，从左江方面开到玉林集结，说是去打广东南路。官兵们觉得奇怪，连年在广西省内东征西战，和军阀陆荣廷、谭浩明、沈鸿英的部队及唐继尧侵桂滇军打了不少的仗，打得热火朝天够吃力了，目下广西刚刚统一，满以为可以休息一下，为什么又要打仗？箭头指向不是云南（第一次侵桂滇军上半年才被我们打败窜回云南，传说广西军要去打云南，叫做“援滇”）而是南路（广东西南部），广西和南路近几年没发生过冲突为何要打仗呢？这是官兵们普遍的想法。经过俞作柏说明，才知道陈炯明率领叛军从东江向广州进攻时，南路军阀邓本殷（僭称南路联军总指挥）率叛军数万配合陈逆部队的反扑，也向高要、江门等地区进犯，企图截断西江下游交通，会师广州推翻国民政府。革命军处在两面作战态势下，情况紧张得很。国民政府派李济深为总指挥，统率粤桂革命军讨伐邓本殷，派陈铭枢为第一路指挥官率领粤军张发奎等数团和桂军吕焕炎团迎击向高要、江门等处进犯的敌人，派俞作柏为第二路指挥官，率领第一纵队向高州方面敌人攻击。我们听了讲话知道任务重大，也就顾不得酷暑和官兵疲劳，只有服从命令。这两三年来，行军作战好像家常便饭，官兵们虽然没得到过十天半月的休息，但过去每战必胜每攻必克，把乱麻麻的广西统一起来，官兵都相信，这次出征，必能旗开得胜。

\* 作者时任广西讨贼军第一纵队第三团第一营营长。

马到成功，士气是非常旺盛的。民国 12 年在梧州，白崇禧曾对我们说过：想统一广西，就要把陆荣廷、沈鸿英的 13 个旅长打倒 12 个，才能够实现这个理想。现在不但已做到了，还把两次犯桂的滇军 10 万人打得落花流水，邓本殷叛军属乌合之众，我们感觉胜利满有把握。俞作柏对此次出省作战，人地生疏，叮嘱官兵们要严守纪律，谨慎小心，免犯骄兵必败的危险。

## 一、合江之战

我军由玉林出发经陆川北流进入广东化县（现化州市——编者），敌军数百人（头子姓陈忘其名，绰号烟屎勾）占领合江圩抗拒，我即向之攻击，该敌不堪李明瑞团第二、三营之一击即告溃败，我俘虏和打死打伤敌人数十，缴获武器相当，我团伤亡很少。合江是化县的屏障，既经失守，县城不战而占领过来，敌军司令吕春荣率叶大森团向我输诚。我军以后利用他们建立情报网和维持地方治安，收到一定的效果。由于我军军纪良好，首先是不妄取百姓东西，给养使用银毫，又不强买，当时我军输力是骑马装备，行李辎重不用临时雇拉挑担，南路民众久受匪军的滋扰压迫，所以对我军表示热烈欢迎。

## 二、高州（茂名）战役

化县既克，我军迅速向高州敌人进攻，期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敌军陈凤起部约千余人，布防城外高地，从事抵抗，我军将近，敌人在山顶阵地上，不管我们已否进入他们防御火网的有效射程就猛烈开枪射击，同时助以喊声壮胆，以为这样以来可以阻止我军前进。我军从敌人占领阵地地形来看，认识到敌军指挥官缺乏战术修养，阵地构筑属于临时性质，阵地前面完全没有设置障碍物；从敌兵射击情形看，知道敌军缺少训练，装备比我还差，步枪子弹肯定不是完全属于原装货，射击不准，军纪坏，军

官指挥拙劣。李明瑞就把我团第一、二营（营长冯璜及俞作豫）展开，第三营（营长钟毅）为预备队。第四团接着第三团右翼展开。李明瑞传令各营散开前进，非奉命令不得射击，我们即以散兵线的队形，沉着、勇敢上前，敌人射击子弹如雨点般飞过头上，虽然足以震人心弦，少数士兵受伤倒地，除指定战友看护外，其余士兵跟着指挥官迈进，并没开枪还击。这种战斗方式真有点似古代欧洲战争的横队战术，不过我们是散开队形而已。我团散兵线接近山脚，进入敌火力死角，敌弹效力更微（敌人没有手榴弹又没有侧防火力的组织，消灭不了死角），我们稍把散兵线整顿后，采用跃进方法冲上山去，刚到山腹，敌人已经慌乱，纷纷放弃阵地向后逃跑，狼狈退入城内。我军一弹不发占领敌人阵地，接着便派出追击部队吊尾猛追，第二营六连排长某（已忘姓名）率同士兵十数名紧跟敌后，守城敌兵来不及关闭城门，竟被我的追兵冲入城去。为因这些勇士们跑得太快，后面战友赶不上来，敌兵看见我追兵少乃把城门关起，把我们的排长和十数名士兵完全消灭于城内，真堪痛惜。此番战斗令人不能忘记的教训是：如果先头追击队的营连长能够洞察敌我情况，紧紧掌握部队，密切协同一致行动，一举就可把城拿下，减少牺牲，收获更大的战果。

高州城城高而厚，倚山靠水，相当坚固，我军既无炮兵又无炸药，当日不能攻下，只好把城包围起来。第二天拂晓敌人居然开城向我反攻，敌我在城外高地展开激战，肉搏冲锋，喊声震天，结果敌军不支，遗弃数十死尸退回城内，我军六死，伤数十，正欲尾追入城，被城上敌火所阻而止。俞作柏看清楚情况，命令各团构筑阵地防止敌人外窜，徐图攻城方法。此时，我们接获通报得悉进犯江门敌人，在单水口被我友军击败，向水东梅菉方面退却；又从电报线里偷听知道伪琼崖督办冯铭楷已经退回海南岛种种有利消息。将近黄昏时候，接到叶大森的确实报告，距

离高州城约 30 华里的石鼓村，到有由前方败退下来敌“右翼军”苏廷友部数千在该处宿营，有企图联合高州敌人夹击我军模样。俞作柏知道苏廷友是邓本殷的一员勇将，他虽败退下来，实力尚存多少不得而知，仍然不能轻视，我军应出其不意，先发制人，各个击破，于是决定抽调精锐于当晚袭击石鼓敌人而歼灭之。俞作柏命令第三团（缺第三营）连夜出发攻击敌军，适值李明瑞喝醉了酒，不能马上出动，等候若干时刻，在李明瑞半醉半醒的状态下和豪言壮语中“不怕他是苏廷有，有廷苏，我要把他打得片甲不留”扶他上马出发。行军部署是第一营为前卫，第二营为本队，向石鼓村敌人搜索前进。当李酒醉不能动弹时，从俞作柏以下各级官兵都十分着急，深恐敌人主动连夜来夹击我军，难于应付，现在看到李能乘马出动皆大欢喜。

### 三、石鼓村拂晓战

第三团第一营营长冯璜率领营的主力在尖兵后头沿公路向石鼓前进，走了几个钟头，发现距离我营不很远的前方有许多火光，料是敌人无疑，一边报告团长，一边叫尖兵停止前进，把全营散开埋伏公路两旁，准备迎击敌人。不久李明瑞来到，共同观察敌情，商量部署战斗，过了一些时候，仍未见敌人接近，细察敌人灯火几乎完全没有移动，仅有少数向左右移，判断敌人此时正在煮饭或吃饭中。李明瑞命令部队继续向敌急进，趁天亮前解决敌人。因为高州城下，我军兵少，不能多抽部队下来，我第一、二营枪支不过五百，比较敌人处于劣势地位（这里就人枪数目比较，不是从军队训练、官兵素质指挥艺术等比较），若果候至明天敌人向我进攻时以伏兵邀击的话，可能获得胜利，但主力决战可能由于敌众我寡，敌人会采取顽强态度和我一决雌雄，胜利熟操至是难说，我此时采取积极勇敢行动，以饿虎下山态势向敌袭击是完全符合战术要求的。我跑上一步和尖兵长一齐前进以

便迅速了解敌情，免致遗失战机。走了不够一个钟头，接近了敌人步哨，敌人喝问：“口令？”我们不答，更迅速的靠近上去，敌兵大叫：“再不回复口令，我们就要开枪了！”我亲口回答说：我们是陈凤起的部队，从高州败退下来，口令已经遗失作废，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们放心吧。对方又喊：既然如此，你们赶快派官长过来联络吧。我答：就派，等等，不要误会。我和敌人答话时已把队伍散开迅速前进，不意部队行动时发出音响，已被敌人察觉不是友军，猛然开枪向我射击。发出的子弹从我们头上飞过，声如鞭炮，特别是德造七九步枪弹响声特殊，弹离枪口发生两种声音。晨光曦微雾色朦胧更方便于攻者的战斗行动，我军经过猛烈的战斗驱走了敌人警戒部队，再用跃进的行动很快超过了稻田，望见前有村庄（事后知是苏廷有的指挥所）发出更密的“自来德”式手枪和步枪声。我紧紧记住李明瑞团长：“我们利在速战速决，要在天亮前把敌人解决”的话，不顾一切指挥全营飞跃前进，接近敌人。到达村边天已亮了，敌人拥挤在前面水塘塘基顽抗，敌我距离不到一百公尺，我营暴露在敌火力之下续有伤亡，敌不敢进，我不能前，彼此成了拉锯状态。我打算调整战线，抽一部分兵力从右翼侧击敌人，这时候展开于我营左翼的第二营已经向敌猛击，激战不久敌人全线崩溃向后退走。

我团除以火力追击敌人外，并速集队伍追击敌军，追不多远，发现前面几里路的高地上蚁集着一团团的敌兵，起码有两三千人，他们企图占领阵地继续抵抗还是马上向后撤退，不易看出来。李明瑞命令停止追击，集结队伍，阵亡受伤士兵和虏获东西迅速处置或运返高州，全团采掩蔽行动离去，敌人不明究竟，竟然不敢追。

这里插段笑话，事情是这样的：李明瑞和他的两个营长一样，这次战斗是采取孤注一掷的打算，从开始就不留一个预备队，他带着副官和卫士、通信传令兵、号兵等十余人跟着战线直

后行进，途中拾获一枝步枪，随手交给身边的人，不知是谁发觉带枪的人背有写着“右翼军”三个字的斗笠，面目生疏，问他你姓什么？答姓张，又问：你是那个部队的，你跟谁走？答：是右翼军，和部队失去联络所以跟你们走。再问：你的指挥官是谁？答：苏廷有。李明瑞面对着他问你认识我吗？那个士兵这时才慌张起来。李明瑞明白他错认了人没有行凶的样子，便收缴他的武器，送到俘虏队去。

此番战斗双方各有死伤，但我比敌多，共掠得敌步手枪百数十枝。苏廷有后来投降我军，曾在钦州见面，他说：想不到你们进兵这样快，打得这样辣（厉害），一下就冲到我的指挥部来。

#### 四、高州撤围

李明瑞团返回到高州，得知本日双方没有接触。俞作柏召集营长以上干部开会分析敌我情况并作出今后的行动方向。

(1) 陈铭枢部追击敌人到了什么地方完全不知；(2) 邓本殷还有多少实力，尚不清楚，可能尚有残部继续退回这方面来，如果他们和苏廷有部会合来高州找我决战，于我极为不利；(3) 高州城坚急切不能攻下，不如诱敌出来狠狠的打击；(4) 邓本殷失败已成定局，除逃往海南岛外，其他部分四分五裂不足为患；(5) 我纵队几番战斗，伤亡不少，均未得到补充，官兵很疲劳，也需加休整。

基于上述种种理由决定于今晚把部队撤围过江，对敌人仍然严密监视相机捕捉而歼灭之，夜半，月光暗淡，我军悄悄过河，水深没膝，直到渡毕敌人完全罔觉。到了天亮，探报城内敌人已经逃走一空，仅剩空城一座。

#### 五、底定南路

我军次日入高州城，安民后继续向西追击，经廉江、合浦而

达钦州，沿途都没有发生战事，敌人除窜海南岛外，大部投降，少数上山为匪。在路上我们得知第一路军正向海南岛敌人追击中；广西龙州对督督办胡宗铎奉李宗仁、黄绍竑命令率兵两团从上思县方面向钦州、防城进军，不战而占钦防，敌申葆藩部旅长杨腾辉率众投降，至此南路除海南岛外算是完全光复。我纵队抵钦州后，探报尚有小股残敌窜据防城之某处，俞作柏派第三团第二营某连前往搜索，该地毗邻越南，只隔一衣带水，法帝国主义殖民地军队仍似过去一样蔑视国际公法，欺侮我革命军，居然对我部队开枪射击，打伤两名士兵，我们官兵愤而还击，不久停火，对方当场被我打死伤官兵数名。事后法方向我提出抗议要求抚恤道歉等等，我们置之不理，这个有关国际的小风波然就不了了之。我军驻钦数月于1926年春开回南宁整编准备北伐。海南岛经过粤军的进攻已告光复，整个两广均隶属于革命政府之下。

(1963年)

## 林俊廷在廉州的失败

李家诜 \*

本文主要叙述林俊廷投向孙中山的一些内幕，其实林出兵钦廉怎样会遭到失败，中间还有许多曲折。当时我在林所组的八属军务督办署任秘书，林在筹组军务督办署时，派我偕同他的弟弟林毓麟先到廉州与各方面联系，林俊廷由离开南宁之日起，直到失败之日止，有许多机要函电是经我手办，还有很多事情是我亲历其境的。兹就回忆分述如下。

### 一、筹组八属军务督办署经过

当广州大元帅府发表任命林俊廷为广东钦廉高雷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后，林于 1924 年 2 月派出林毓麟和我出发廉州，任务是筹备设置及进行联系各事宜。出发前林嘱我此行须严守秘密，他虽没有明白说出原因，但我领会到是恐怕泄漏风声给张其锽、陆荣廷他们知道。同时在林直属的工作人员，里面又有两个派系：一为防城派（林原籍防城，当时掌机要的人员多属防城人，我是接近防城派的一个），一为宁明派（林的参谋、副官和各科室人员多属宁明人，这派多属陆荣廷旧人），防城派主张联孙，宁明派是不主张联孙的，由于这样，所以林不但不许把联孙风声透出外面，就是里面的人员也想瞒着不给知道。

当日钦廉善后处长是申葆藩（申与陈炯明关系颇深），善后处设在钦县。我们这次进行工作，第一步须与申取得联系，在出发前夕，经以林俊廷名义函申，因此我们就先向钦县这路前进。

\* 作者时任八属军务督办署秘书。

达到钦县时，善后处职员说申已赴北海，我们只得改由水路进发。船抵龙门港，恰值农历除夕，这处驻有水师一部分，统带郭某，坚要我们停船留钦，席间在郭某口中探知申葆藩已由北海再赴海防。这晚，我对林毓麟说，申处长应该接到督办的信，为什么不等我们呢？林答说：“申处长和督办是很好的，相信不会有其他。”我便止住，不好再说。

第二天达到北海，因申已不在这里，于是我们乘汽车进入廉州。廉州设有善后处的办事处，我们到了之后，每天都是找处里的高级职员接洽，其中有黄姓参谋（名知元）是我的旧友，他和我闲谈，无意中透露出一句：申处长去高州，可能没有这么快回来，这与赴海防之说，又有点不同。当黄说出这话时，突然表现出一些不安，我也不追问下去，过后细想，申行踪这样神秘，必有原因，但林毓麟个性很强，所以申赴高州一说，始终不敢向他谈。

到廉州约两星期，林俊廷来了一封密电，着林毓麟以旅长兼任钦廉卫戍司令，克日在廉成立司令部。这时，廉州办事处已接得申的来信，并把信交给我们看。申信里大致说：他本人不日返回钦县候接林督办，所有筹备事宜，着由办事处与林旅长妥洽办理等语。办事处得了申的指示，从此我们的工作进行就容易得多了。到了4月初旬，筹备事宜，已渐有头绪，督办署择定在旧廉州府署，卫戍司令部和各部队驻扎地，也都分别指定在某姓宗祠或某处庙堂。在这当中，由南宁开来的林毓麟所部，已陆续到了廉州，林毓麟随于4月下旬赴钦县候接林俊廷。5月初旬林俊廷达到钦县，逗留数天即来廉，八属军务督办署就于这时宣告成立。

## 二、永丰舰开抵北海

林俊廷带来廉州的部队，计有三个旅（名额不足数，仅

4000多人），旅长一为林毓麟，一为陆云贵，一为施少卿。到达钦县时，申葆藩把所属张瑞贵部拨给与林，因又另编为一旅，旅长为张瑞贵。这些部队，饷粮发给和子弹补充，都属重要问题。林俊廷到廉后，曾电请广州大元帅府酌发，可是去电多时没有批复。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当林俊廷投向孙中山时，中山派代表温雄飞赴邕和林商定条件，条件里最主要的是：林俊廷出兵钦廉之日，须即发出讨伐邓本殷通电，但直至林到廉就职，这个通电还没有发出，因此，这就成问题了。林俊廷不穷究原因，仍一再电请，广州大元帅府随派出温雄飞为代表，许崇智也派出闵天培为代表同赴廉州晤林。他们此行的任务，就是先要林发出讨邓通电，然后再谈饷弹问题，在温、闵二人未起程前，温与林的驻粤代表王正卿代林拟一电稿，打算带同这稿给林考虑。因此，温、闵到了北海，温个人先入廉州见林。谈到通电这事，林坚持要先得饷弹，才肯发电，辩论很久，不得结果，林对温并有斥责语气，温悻悻而出。后由闵天培居中调停，晤林时，表示对林让步，允予带林意见回省复命。这是林到廉后与广州大元帅府发生问题的头一件事。

温、闵回省，即由许崇智约同胡汉民向孙中山进言，果得中山允许对林让步，准先发饷弹给林俊廷，但主要条件，仍须林领到饷弹时，马上要发出讨邓通电，克日进兵高、雷。

许、胡得到孙中山指示后，决定派出永丰兵舰带同饷弹开赴北海，一面通知林俊廷驻粤代表王正卿，准备随同兵舰前往，告林依照条件执行。时林俊廷派有副官刘大山在粤听候消息，永丰舰出发之日，王正卿因事来不及同行，随舰同行者仅刘大山一人，王正卿则改搭商船于次日动身。

7月初旬，永丰兵舰开抵北海，随带的饷弹，计饷银为3万元，子弹10万发，一概点交刘大山运入廉州。永丰舰到后第三天，王正卿赶到廉州的同时，申葆藩也由钦县来到了。当王正卿

把许、胡所嘱各节传达时，并把代拟讨邓的通电稿给林，林摆手说：“这稿可暂搁下，因为介臣（申葆藩别字）今天到来，他很愿意到琼州，劝邓本殷把高、雷让出，相信介臣此行，定有把握，这样，兵不血刃，唾手而得高、雷，岂不好吗？不过，永丰舰已经开到这里，我打算还是请它暂留北海，看介臣进行情况怎样，再定决策，所以我对这通电，还是以暂不发为好。”王正卿见这事又有变卦，怒气冲冲地与林争辩很久，结果林仍然坚持原说，王仅住一夜，第二天就垂头丧气离去。当时永丰舰长是欧阳格，他此次奉到命令是协助林部进兵高雷琼崖，现林俊廷按兵不动，内容又不清楚为着什么，每次晤林，总是说那敷衍的话，因此，也把留驻北海情况，经常向广州大元帅府电告。

在这当中，粤方要人如许崇智、胡汉民、孙科、古应芬等，滇、黔、桂驻粤各军首领如杨希闵、范石生、刘震寰等，随时都来函来电，鼓励和催促林俊廷在八属方面早日立功。所有属于这类函电和一切机要文稿，林指定我和参谋长黄均超负责来办。督办署里不主张联孙的宁明派，还是和在南宁时同样的多。这就使我们太吃苦了，什么密件，日间在办公厅内不能办，只好留待晚上来干，可是林俊廷的生活是以昼作夜的，每天总在午后才起床，起床后，先抽一顿鸦片烟，开第一餐饭起码要在入夜后8点钟，膳后，他的办公室早有一班所属将官和来宾围在一起等候，林出至办公室躺下烟床，跟着便有人轮流替他打荷（替人烧鸦片谓之打荷），他便一面抽烟，一面谈话，又起码谈到11点多钟，客才完全散去，这样，我们要把当天事情向他报告，总要交到12点左右。又因为林不认得字，所有来文都要读给他听，读完之后，对某件应怎样办，怎样复，又要逐一听他吩咐清楚，这才执笔。黄均超要等我办好稿，逐件替林画了行，亲交机要室人员缮译，通常一齐同走，都差不多是天亮时分。这就是永丰舰到后督办署内日常公务的大略情况。

### 三、永丰舰撤回广州

申葆藩赴琼崖一去没有消息，永丰舰停泊北海将达两月了，林俊廷还是抱着乐观态度，每天过着他舒适的生活。

月中旬某夜，我因送家属出北海留医，没有回去，这晚交到1点左右，督办署忽派一部汽车接我，回到署时，林俊廷一见我就说：“马上赶快办稿。”随手交出一封电报给我，原来这是广州大元帅府分送永丰舰的一等急电。电文里是着永丰舰克日开回广州。我看过后，林接着说：“你要把挽留永丰舰的话说得恳切一些。”我拟完了稿，经过林和黄参谋长、严顾问（名星阶）详细研究过稿中词句，即晚就画行译发。第二天午后，驻北海交际委员彭光中带着欧阳舰长一封告别信给林，并报告永丰舰已在拂晓时开行。

永丰舰离去北海不到一个月，开出前方各线守卫的部队，同样得到邓本殷出兵攻廉的警报。林俊廷着实焦急，一面将情报电告广州大元帅府，一面派林毓麟赴粤，与王正卿、温雄飞商量，搁了多时的讨邓通电这才在粤发出，时已交到11月初旬了。

### 四、派员赴粤求援及林溃退经过

林俊廷发出通电后，邓本殷攻廉的风声一天天的紧张起来，到了12月中旬邓本殷攻廉部队已与林的部队前线接近，林俊廷这才深悔为申葆藩所卖。但敌军已经压境，海道方面，敌方有舰，己方无舰，怎么办呢？这就更使林俊廷加深了忧虑，因此连续发出急电，请大元帅府迅速派永丰舰前来协助。可是，任何促请，粤方均无电复，而前方部队又急须发饷和补充子弹，林俊廷在这时候，真是彷徨极了。后来经过多次密商，以我与温雄飞有友谊关系，且机要文件经我办，一切情形比较详悉，决定派我赴穗。

这时，我在廉州刚刚失婚，一群小儿女跟着是很成问题的，因此，我得到这个任务，便带同这群小孩子离开廉州。

船抵香港，这时已是阳历年底了，我这班小孩子，便嘱托相熟的港梧轮带回家里，我本人即搭夜船入广州。天刚亮，我到达温雄飞处，得知王正卿回防城家中过年，我便不去找他，随把来粤任务向向温说明。温不待我说完，便插说：“我早识到林莆田（俊廷别字）应该受此挫折，但目前情况如此，我姑替他向胡代帅（时孙中山已赴北京，大元帅由胡汉民代）转个圜吧。”这天下午，温雄飞答复我说：“胡代帅还是不相信廉州有这样紧急，因为莆田惯扯谎，经我说了许多话，现已答应仍派永丰舰前往，不过永丰舰还有其他任务，需要一个星期左右，才能开去，胡代帅着尔赶回廉州，叫莆田放心一些，不要着急。”我得了温的答复，随即搭船复出香港。

林俊廷香港住宅，在般咸道 58 号，当我到他住宅时，他的儿子林继武拿出廉州来电给我，这才晓得前方已经开火。我于是又带着这封电报再入广州晤温雄飞，温复去见胡汉民，结果答应永丰舰 3 天后才能开出。我觉得任务已完成，打算出至香港，即搭船赴廉。怎知刚到般咸道 58 号，林俊廷在廉的家眷已一并回来了。我料到事情一定不妙，便向他们询问原因。林眷属中以他的第五妾知道情形比较详细，她随叹一口气答说：“这次莆田给申葆藩害透了，他到琼崖不是善意，莆田受了他的骗，已是可恨，现在前方开火的第二天，他拨来的张瑞贵一旅，就在这天晚上都叛变了，由于这样，所以全部迫得退却。我们是在前方退却时，漏夜出海的，究竟莆田现在怎样，我们正担心着呢！”我听了这番话，廉州是不能回去了，只好留在香港再听消息。

1925 年元旦后，廉州督办署逃跑出来的职员都陆续到了香港，询知廉州已为邓本殷进占，林俊廷全军向钦县方向退却。我认为林虽已塌台，但我此次赴粤任务仍须交代清楚，因把入广州

情况写了一函留交林宅，嘱他们有机会与林通讯时替我附入寄去。手续办完后，我随即离港，从此与林就不通讯联系了。

(1965年)

# “五卅”运动与沙基惨案



## “五卅”惨案第一枪

周 尚\*

1924年一个荷花刚刚展瓣的夏天，我在上海家里接到厦门大学的开除通知，这是我第四次因为叛逆而为学校当局所不容，于是进入来自厦大出校师生创立的上海大夏大学，我又回到上海的怀抱。

沧桑弹指，我快戴学士帽了，然而生活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激烈的历史时期，我们怎能像今天这样安心读书？我毕业前一年，是1925年，东风吹柳日初长的二月，听到日本商人开除的棉织厂工人要求改善待遇罢工。罢工浪潮激起全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卷入漩涡。日帝有份的上海公共租界政府工部局，暴戾恣睢地压制工人，并利用工贼捣乱，结果不起什么作用，乃由上海总商会会长虞洽卿出面调停，风潮才息。用不着奇怪，铜钱眼里翻斛斗的日商，哪里会有像中国传统的商业美德的信用？他们是流氓，是骗子，是无赖，他们不守信自己的话，谈判讲好的条件，原是一种黠滑巨诈，面孔一捋，背约排异了。他们错误地以为中国人好欺，妄想继续进行剥削，把工人陷入半饥饿的深坑里。

经一再据理力争，厂方独断专行，粗暴野蛮，置之不理。厂主是个小皇帝，他的意志就是法律。交涉到生门闭而死门开，工人忍无可忍，眼看没一线好转希望，迫得重行走出工厂，苦斗加上苦斗。厂主变本加厉，竟动武击毙有胆有识的革命工人顾正红，伤7人，巡捕房又逮捕去好多工人，引起血气方刚的各大学生愤起援助。大家咬牙切齿，摩拳擦掌，誓必反帝报仇，兴问

\* 作者是上海大夏大学学生。

罪之师，作工人后盾，着力于反帝爱国斗争。

酝酿到 5 月 30 日下午 1 时，全市学生遵照学联议决案，分散到上海四处宣传讲演。我认为，我们不能像“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完全无补于事。演讲“分散”不如“集中”，分散力量小，作用亦小，群众一盘散沙，凝结不起势力；向租界会审公堂即法院控诉评理，何异与虎谋皮，洋人享有“治外法权”，洋人在我国，不从我国法律，仍受洋人本国法律支配的权利，洋人法律会秉公助中国人吗？依据形势发展，非集中于南京路宣传不可。

南京路是上海的象征，是上海最热闹最繁华的一条马路。集中在这里活动，气势大，影响大，容易激起市民不平则鸣而敌忾同仇，进而造成群众实际行动，目的是全市三罢——罢市、罢工、罢课，扩大斗争，取得最后胜利。

我有过“五四”运动与工部局斗争等经验，集中在南京路宣传的愿望是符合客观实际的。五卅那天，我单独发起大夏大学演讲队 16 人共赴日升楼。南京路热闹甲上海，日升楼热闹甲南京路，它是以一片茶楼名称而闻名，地点位于南京路和浙江路的十字路口，即今上海服装商店（旧时先施公司）东面的南京东路 636 号门牌即今之沈大成点心店那里。我们 16 个同学大多来自厦门大学转入大夏大学的闹风潮健将，孙惕、童祖庆和罗良干等，个个是革命志士，热爱国家，宁死不屈。我们选择了日升楼楼下，当时是一家织补店，亦即沈大成点心店，借了一只长凳，同学们轮流站立凳上为被压榨被侮辱被杀伤的工人们痛哭流涕伸冤，讲明帝国主义列强挟商品资本瓦解我国经济，掠夺同胞劳动力，工人们为全家老小，商柴计米，日日夜夜，流汗又流血，饱受折磨，被埋在社会最低层，丧失人的起码生活，既害怕死亡，又厌倦人世……

演讲开头半小时，就来了两个印度巡捕，嘴里断断续续叫着

听不懂“阿得利买得利”的印度话，好像是骂人语言。两人一面骂，一面双手各抓了两个同学直向南京路老闸巡捕房而去。从日升楼西向巡捕房步行约几分钟，众同学抱着有难同当的一颗心，默默地跟随印捕一道走，预备共进捕房。将到捕房门口，我念头一转，一道被捕去送死，未免太消极太不值得，应该做点积极的营救工作，并谋扩大事态，完成原来企图“三罢”计划，于是大家迅捷折回到日升楼，布置了准备好的四辆自行车，出发到四处演讲队，紧急通知各校学生，火速奔驰去老闸巡捕房示威营救遭难同学，同时，我们仍在原地点宣传讲演。

我刚登上凳子讲演不久，人丛中忽来一个穿蓝布中山装的中年男子，神神秘秘的样子，塞进我右手一卷 16 开宣传品，翻开一瞧，印的是新 5 号“红”字，我心里明白肯定是中共的传单，来不及详阅内容，倘给洋人见到，我的头就要搬家，还牵连同学和工人以及示威的群众，小辫子抓牢，有得借题发挥，故我迅雷不及掩耳抛散给人群，任务才完竣，但见又来两个印度巡捕，一个捉住我上端衣袖，我对他弹眼落睛，目光炯炯地一眼不眨，眼光直射他的眼睛，我的眼光泄露出我的意思，他捉捉放放，放放捉捉，既凶恶又胆怯。正在鬼怕人的时辰，从捕房方向匆匆赶到一个英国“三道头”巡捕，把我自长凳上拉下地，一手揪住我左臂，一手揪住陈祖谋同学，两个印捕抓住四个已忘姓名的同学。

三个同学和我泰然自若，从容就道，其他伙伴们怒发冲冠的作出共命运的行动，纷纷跟随同走。老闸巡捕房在今南京东路 772 号光明钟表商店，离今沈大成点心店有一小段路，不免惹起店员和行人注意。捕人鼓舞了这些好心的群众，越来越多地拥挤前来，不知情的因好奇心驱使当新闻看，知情的因爱国心驱使想出一把力。

洋人估计中国人不敢在老虎头上拍苍蝇，故巡捕房前面没围墙，没大门，白天敞开，审讯室即办公室大概放两只写字台，除

隔一柜台，完全暴露外面，任何人可通过大天井直冲到那里。这次却出于他们意外了，跟我们去的群众比初次被捕同学时多出几十倍，势如潮水涌去，加之大夏大学自行车队的报信，四面八方的学生一齐集合，共约数百人，群起抗议。

当我们正被解除皮带、搜去裁纸小刀和其他可作自杀的东西，快进捕房内一间拘留所时，忽听得一发手枪声，立刻使我吃了一惊。后知这第一枪是英捕爱佛生在胆怕时企图通过极端野兽本能冲动寻求压迫和恐吓中国人而向群众开的枪。

爱佛生带头开了枪，其他巡捕随之一犬吠影百犬吠声，变本加厉地开枪了。俄顷，一个做翻译的中国人，到底是中国人，悄悄地告诉我们，外国巡捕开枪了，死了几个人。这是第一次枪声。后来听到连发的枪声，翻译朋友又来汇报似的讲，当场一共死伤40余人。子弹多从背后穿进，分明群众已退走了。

这场人命攸关的灾难，自然激起市民普遍愤懑，中国人的眼泪难道没尽头吗？我们被捕的伙伴更加壮怀激烈，愤慨达到极点，恨不得插翅飞出来，“手执钢刀杀尽胡儿勿罢休”。一轮残阳西沉，巡捕房假仁假义，笼络我们，送来上等饼干和白煮鸡蛋作晚餐，可伙伴们恨饱了，怒饱了，气饱了，哪有心情下咽。

受拘留的学生20余人，除大夏大学外，尚有其他大学的学生关在里面，仿佛雏鹰经风雨，锻炼锻炼也是好的。这里是另一个世界，我们没一人黯然伤神，决不作楚囚对泣，对血海深仇的斗争，相信最后胜利必属于我们。一次深思熟虑胜过百次轻率行动，在场各人认清形势，分析具体情况，讨论对策。首先遵照兵家孙武所指：“动而不速，举而不勇”探索敌我实情，又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倡导救人先救己，我们先要走出铁牢才是第一着，然后如何实现全市三罢，如何扑灭如火的侵犯，如何拯救工人同胞出水火……我们讨论到深夜，不由得因过度疲劳而双眼睁不开了。正巧半夜子时，睡梦中骤听得铁锁声响，原来大家由各大学

校长保释，碧眼胡儿随意指了几个说道是为首学生关押不放，留派以后用场。

我与众同学步出捕房，相约翌晨联合各校再接再厉。青年是最敏感的，最肯牺牲的。这倒不是初生之犊不畏虎，而是对真理、对国家、对人民的赤诚炽热。大家先以全市“三罢”为目标，经我们活动，6月1日，南京路永安、先施两间最大百货公司领先在公共租界中国商店拉上铁门停业，同时霞飞路即今淮海路几家大商店开始与永安、先施等亦步亦趋。顷刻间，上海全市罢市了。

闸北中国地界极为偏僻的青云路上有一所简陋的上海大学，其中多进步师生，有名的中共地下工作者和左派国民党人，宣传马克思主义，教导社会主义，培养中共青年党员，但不勉强学生入党。学生中千金小姐、公子哥儿亦不乏人。学校原为国民党人办的，校长是于右任，邵力子（仲辉）讲《易经》，陈望道（V.D.）上古文课。中共负责社会科学系，主持者瞿秋白，邓中夏、田汉、沈雁冰（茅盾）是文学系教授。丁玲和王剑虹是文学系学生。后来上海大学搬到公共租界西摩路（今陕西路），“五卅”惨案中起了带头作用。帝国主义者就把上海大学开刀封闭！罢课学潮愈演愈烈。

惨案发生后，上海总工会宣布全市总罢工，声势浩大。刘少奇同志是当时总工会总务科主任，指挥运动，千辛万苦，斗争的风雨，风险浪惊。20万工人及其家属顿时无米难炊。工会筹发每人16个铜板一天，那时大概1000铜板上下调换一块银洋，大米6元左右一石。工人们勉强维持稀粥和咸菜最低生活，市商会发给的所谓“救济费”有时停发。罢工坚持到8月，鬼子利用顾雪桥其人冒充顾正红烈士族长，妄图以10000元抚恤费廉价结束罢工，工人报以惩治事寝。

又壮丽又曲折又险恶的斗争中点燃起全市乃至全国人民的革

命之火，中国政府难以袖手旁观，不得不派出四人抵上海与英、日、法、美、意、比六国代表谈判，我方提出要求 13 条，未得协调，我们工商学三界改用持久战。6月 22 日，商界暂先复业，各界号召全国抵制日货当时称东洋货，给日帝一个致命伤的打击。

首先，我们解释抵制日货是反帝武器的大道理，如：说明从鸦片战争以来，列强以炮舰政策打开我国闭关自守的大门后，海关权被诸洋人夺去了“保護政策”，进口税低到荒谬程度，遂令洋货充斥，国货被排挤得一蹶不振，遭到灾难性的厄运，市面上泛滥的商品多冠着一个“洋”字，至今社会上还存在着改不过来的“洋火”、“洋伞”、“洋油”等名称，加以洋商利用廉价原料和劳动力暨他们的技术机器设备，就地设厂生产便宜货，我民族工业普遍破产或半破产，导致民穷财尽。

我是调查焚烧日货负责人之一，白昼奔走上海大街小巷，调查出各商店囤积和出售日货，立即车到闸北广场，入夜付诸一炬。烧日货时，群众围观如堵，熊熊火焰，光亮冲天，全上海高处都能看到，我们乘机教育民众，灌输和启发爱国主义思想。每次烧日货时，人民热情洋溢，拍手称快。记得我有一句话：“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与日货烧得一样快”，最令观众发出掌声如雷，气吞山河。

复有不顾工人之急、国家之难的奸商，唯利是图，从中作梗，商品鱼目混珠，商标李代桃僵，包装改头换面，货单弄虚作假，运输瞒天过海，库货暗渡陈仓……令人投入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在严重困难中必须千方百计找出证据，才得起走日货。奸商们深知我们不受威胁利诱，于是到处给你泼点臭水，造点谣言，让你领教他们的“厉害”，举例说，有一次他们咬定我们弄错提货单，烧错了货物，硬要我们赔偿，几个恶棍气势汹汹前来问“罪”，其中有一个戴极其深度近视眼镜的圆脸家伙责问我们：

烧日货根据什么法律？租界法律？民国法律？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是中华民族不成文法律，是爱国主义习惯法，他们频频来交涉，缠扰不休，我们忍心耐性加以说服，务使狠凶、狡猾、贪婪、卑鄙的奸商心服口服，自动收起鬼蜮伎俩。

最后，奸商老板日帝出场了，满城风雨传说要来暗杀学生。抵制日货不遗余力的我，怎能免于他们的计算。我一向福来不喜，祸来不怕，无动于衷，照样执行任务。然而，父母毕竟有爱子之心，亟亟逼我去南京到新婚妻子叶华那里，因此租界当局控告我所谓“肇事”学生，只好被缺席裁判，而巡捕房血腥屠杀中国同胞，子弹从背后穿进去，惟有让世界舆论裁判了。

(1981年)

## “五卅”惨案亲历记

何志明\*

1925年元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群众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日本人开设的纱厂先后罢工。影响所及，在上海发生了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倚仗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武力，枪杀了上海日本纱厂罢工的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引起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又由于英国巡捕开枪射杀了许多游行示威的学生、群众，造成了有名的“五卅”惨案，激怒了全上海市的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全市罢工、罢课、罢市，全国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了全国性的反帝高潮。这一运动，严重的打击了帝国主义。在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邓中夏领导下，在6月1日成立了上海总工会，选李立三为主任，领导了20余万人的总罢工，坚持了3个多月，直到8月中旬才复工，使帝国主义在上海的经济受到重大的损失，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揭开了大革命高潮的序幕。

我有幸参加了这一运动，虽事隔56年却依然记忆犹新，仅就记忆所及，记下当时的亲身经历。

1925年5月29日，何秉樊偕上海学联代表梅电龙来告，党委决定为支援日本纱厂工人顾正红惨遭杀害并打伤多人一事，许多工厂相继罢工支援，准备发动全市工人、学生举行反帝游行示威，要我全校同学参加。经国民党区分部与学生会委员商决后，下午7时举行全体学生大会临时会议决定：1. 明天全体去参加反帝示威大游行；2. 募捐支援罢工工人；3. 全校组成4个中队、

\* 作者原名何志球，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早期共青团员。

16个小队，由陈宝聪总领队，吴羹梅、尹景一副领队；4. 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由袁文彬、陈必耽、沈新民、陈维新、金柯中、吴中士等负责，并分派讲演与散发传单张贴标语的专人。我负责与市学联联系。

我们在30日上午自吴淞出发，到达南京路，已见各路工人学生纷纷聚集，旗帜招展，口号声、演讲人的大声疾呼与掌声响成一片，场面异常热烈。就在此时，忽见巡捕抓学生关入老闸捕房，一经呼喊，游行队伍就自然地涌向捕房，这时我亦被捕。在纷乱中忽有英国巡官进来将我们放出，正在群众后撤时，发现捕房内还关押有工人和学生，愤怒的群众又冲向捕房，声势之大，惊天动地。在这刹那间，捕房门口一英国巡官鸣枪，旁边的印捕80号举枪向手无寸铁的人群开一排枪，一时秩序大乱，我即跳入捕房东侧的水果店内，回头望看马路上，发现有10多人倒在血泊中，其中有我校尹景一同学、上海大学何秉樊同志及南洋中学的同学等。我见此状，飞奔市学联找到恽代英同志，汇报了南京路伤亡情况，请示该怎么办；得指示迅即收集失散同学回校，明天继续大游行，立即成立尹景一同学的善后和治丧会。为了揭穿帝国主义者诬蔑是学生夺枪为自卫而开枪的谎言，市学联、市总工会聘请律师邀请各界代表到各医院实地调查，证明伤亡者的弹创全是从侧背射入的。在事实面前，帝国主义的阴谋才破产。

5月31日晨，再接再厉的示威大游行浩浩荡荡而来，租界各巡捕房、英租界的工部局、会审公堂都有武装巡捕、外国水兵把守，他们用消防水龙头向示威队伍喷射，企图阻止队伍前进。这却更加激怒了人群，奋不顾身地冲向前去抢夺水龙头，双方扭成一团，又有不少的工人学生被捕、被打伤，也冲散了一些队伍，大队就改变方向齐向政府驻沪外交署请愿，结果是来一官员声称，政府完全负责向租界当局交涉，请群众回厂回校，静候解决。

市学联与市总工会派人分头与上海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联系，要求他们举行罢市以作声援，适他们正在天后宫开会，为罢市声援问题与总商会争论不休。示威群众闻讯前往要求改开市民大会来决定，其中以大资本家为主的总商会因会长虞洽卿进京无人负责不能表示态度，而中小商的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表现积极。这个联合会是“五四”反帝运动与总商会发生矛盾而分化出来的，思想比较进步。这次屠杀事起，他们的子弟、店员就有不少人在示威行列中和被打被捕，因之表示不惜牺牲，愿意罢市支援。在各界的压力下迫使总商会站了出来共同签署了在6月1日起举行全市总罢工、总罢市、总罢课的命令。为了统一指挥，组织了“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以总工会、市学联任正副主任，总商会仍不愿介入。

在这一运动中，突出而令人难忘的是上海华侨主办的“友联影片公司”，他们将摄影机放在小轿车内，车上插着英国旗，在各个租界拍摄游行、讲演、学生与巡捕抢夺水龙头混战和学生工人被打被捕以及我校同学抬着尹景一烈士棺木游行出葬等情况，制就后在上海放映，被租界禁映。但影片由各界支持在中国各地及东南亚各国放映，揭露帝国主义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宣扬中华儿女的英勇斗志，这可吓坏了他们，对“友联”进行威胁利诱并要高价收买底片，但有高度爱国心的“友联”，始终不为所动而为“五卅”惨案留下了真实的纪录。

最令我伤心的是，我在上海山东路仁济医院停尸房抱着尹景一烈士遗体入棺。我朝夕相处的战友，我的好同志，我怎么也忍不住失声痛哭，痛恨那万恶的帝国主义夺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同他的家属和学校当局代表，随全体同学抬棺出葬游行，从市学联出发经法租界大马路到徐家汇东汉记路山东会馆停放（有的说是齐鲁别墅），以备日后合葬于由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与上海地方政府交涉的在闸北宋教仁公园旁开辟的“五卅”烈士公墓。在

“五卅”反帝运动被镇压消沉后，这公墓的修建亦成泡影。

6月5日，由上海工商学委员会主持，在沪南斜桥体育场举行隆重的“五卅”惨案死难烈士追悼会，参加的工人、学生、商人、市民约20余万人，上海地方政府及驻沪外事署未派人参加，群众极愤恨不满，故在会后列队在华界游行示威。我为此日夜奔走，内外联系，布置会场等，从6月1日至5日，不休不眠。大会开后，我只身回校一睡而不醒。直到市学联怕我被捕，来校找我把我弄醒。

这一风暴之后，帝国主义并不甘心，勾结反动政府迫令各校提前放假，强迫学生离校。等暑假后我从常德回到同济，才知我被学校借故开除。后来我经上海团区委安排在吴淞镇平民夜校任教，兼做工人运动并与学校内国民党区分部联系。

1925年初冬，同济大学为驱逐反动校长阮尚介，发生学潮，在反动政府和校当局高压下，积极分子被开除三四十人出校，使学潮失败，我亦不能留于吴淞，又由团区委介绍到上海党区委，由罗亦农派我到杨树浦工人夜校做工人运动。那个启发我、介绍我参加革命组织的杨幼炯在时代的大浪淘沙中，却可耻的叛变了革命，投入了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怀抱，成了蒋帮的高官，后听说已逃往台湾。

(1981年)

## 我在“五卅”惨案发生后的一些活动

江森裕 \*

1925年2月，上海日商内外棉织工厂的我国工人，因要求改善待遇而罢工，后全沪日商纱厂的我国工人一体加入，工部局徇日商之请，进行压制，没有效果，继由上海总商会调和始定，奈厂方违背约定，开除为首工人，从而重行罢工。至5月15日，劳资又发生冲突，厂方日人竟把工人顾正红杀害，并打伤7人，捕房又出面干涉逮捕多人。因此各大学学生群起援助，分头宣讲不平，捕房进一步逮捕学生多人，并严行监禁，至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扩大宣传，是日下午游行学生在南京路被捕数名，当时学生及路人共千余人皆徒手随至捕房门前，要求释放，英捕开枪，当场伤毙四五十人，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杀，日有数起，上海各大学竟遭封闭。至此，群情万分激愤，工商学界代表齐集天后宫桥下上海总商会开会（总商会地址不属租界范围之内，捕房不能干涉拘人），当时工界主要代表李立三等多人参加，商界由各路商界总联合会会长邬志豪等多人参加，学生联合会主要代表林钧等多人参加，共同集议抗英对策。我代表中国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沪局，亦连日参加会议随同讨论。当时总商会会长为虞洽卿，副会长方椒伯，虞有事去北京不在沪，会内主要人员以事涉排外取慎重态度，没有参加会议。

5月31日下午议决，6月1日起，全沪华商罢市，并定6月1日下午在南市陆家浜、沪军营举行“五卅惨案”抗英后援大会。

\* 作者当时是上海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沪局代表。

我连夜到北山西路底，近杨家坟山大有兴印刷纸店印制传单2000张。6月1日上午，我把印好的传单装入卷烟纸盒内扎好，雇人力车过盆汤弄桥，经北京路通过山西路，途遇抄班（捕房巡逻队在戒严时期专查往来行人），我当时镇定若常，下车任其抄身，人力车上卷烟盒内传单未被发觉，幸免拘捕，传单即于1日下午在大会中散发。

大会中群情激昂，各界代表纷纷站在凳上和高处演讲，有的甚至痛哭陈词，熟人王梅卿在大会上用小刀割破手臂把流出的血，在布上写“雪耻”二字，系在竹竿上以激励人心。大会议决电北京政府请求严行交涉，并电伦敦英国政府要求阻止这一暴行，同时成立上海工商学会。此后每天假总商会或小西门少年宣讲团开会坚持斗争，我一直参加会议。

北京政府派曾宗鉴等委员4人来沪与英日法美意比6国代表在沪交涉讨论，中国要求十三条件未得要领，工商学会接受政府委员劝告改用持久抵制办法，于6月22日由政府委员领导全市华商一律先行复业。

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农工学各界议决募捐援助，并于6月23日大游行，与沙面英法军冲突，中国人死伤200余人，酿成沙基惨案。

上述文件本有较详记载，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中遗失，深觉可惜，为了使这一惨案永远不忘，现在把记忆所及重新简略写出，以供参考。

（1978年）

## 回忆“五卅”运动片断

王光钊\*

我是江苏省泰州人，1918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学，1922年从该校毕业升入复旦大学土木系，4年后大学毕业赴美国留学。我的学生时代，祖国正处于民主革命的转折关头。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面对军阀的连年混战，每一个热血青年都以不同的方式投身于时代洪流之中。

1919年5月，北京学生集会游行抗议政府出卖祖国主权，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上海，上海各校学生立即行动起来，声援北京学生的斗争。我们大家组织游行示威，联系各方面爱国力量积极开展斗争，同学们自己动手刻蜡版，印传单进行爱国主义宣传。

1925年，当时我正在读大学三年级。这年的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纱厂工人为了抗议日本资本家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棉纱七厂的日本经理竟然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并打伤10余人。这一惨案激起了上海各界人民的无比愤怒，大家纷纷行动起来支援棉纺工人的斗争。

5月18日，顾正红的灵柩运往闸北，24日内外棉纱厂工会在潭子湾举行顾正红追悼大会，大会由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主持，有工人和各界代表10000多人参加，恽代英在会上讲了话。会后，上海各校学生进行爱国演讲、募捐，帝国主义巡捕大打出手，先后逮捕了文治大学、上海大学等院校学生数人，并决定5月30日在会审公堂会审。中国共产党为适应群众爱国要求，

\* 作者当时先后任复旦大学学生会副主席、主席。

当即决定扩大反帝斗争。这样，29日上海总工会派出代表到各厂校进行宣传。这天我们复旦也开了动员大会，总工会的代表在会上痛陈帝国主义滔天罪行，号召同学们与工人联合起来与帝国主义分子坚决斗争。于是同学们积极行动起来。为了更好领导这次运动，复旦大学成立了学生会，选举费福熊为学生会主席，并推我为学生会副主席。学生会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决定次日全体学生罢课，上街参加反帝大示威。我能当选为学生会的副主席，当时也感到很突然，虽然我极信仰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但毕竟是一个啃书本的学生，我没有申请加入过任何党派，作为一个无党派人士如何胜任呢？

现在仔细想想这个问题，我觉得也许由于下述原因乃促成这一事实：第一，我虽然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但我年少时受我叔父王鹭庭影响很大。他在辛亥革命后是位议员，袁世凯称帝后，响应孙中山号召去广州参加护法运动，是个革命党人，这样在五四运动中我胸怀爱国之心投身于斗争之中，从而能赢得广大同学的信任；第二，我虽有爱国之心，却是个无党派人士，以这种身份负责学生会工作较为合适；第三，顾正红是阜宁县人，与我算得上苏北老乡，当时上海码头工人中除湖北帮势力大以外，苏北帮的势力也不小，因而我这个“苏北老乡”的身份更利于开展工作。

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对同学们的信任责无旁贷，让我干我就干。

5月30日上午，我代表复旦全体同学到南市爱国女学参加一个报告会，与会者均是上海中等以上各校的学生代表。会议由上海总工会代表做报告，他身穿一件月白色的杭绸长衫，高高的身材，他一开口就自我介绍说：我是个湖南人，家住江西。接着他控诉了日本资本家惨杀顾正红和血腥镇压工人、学生爱国行动的罪行，并号召同学们和工人联合起来进行反抗。他说：只要工

厂不开工，交通断绝，轮船无人驾驶，货物无人装卸，上海港就成了死港，这就能沉重打击帝国主义（解放后，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当时在京召开的几个专业会议代表，我荣幸的参加了这次接见，当时我一眼就认出那年在上海做报告的人正是刘少奇同志）。大会的主持者向各校分派了任务，我与浦东中学的两位同学被派往码头鼓动码头工人罢工。

午饭后，上海各校同学分成小队由南市到会审公堂游行示威。我们这个分队有十几个同学，从城里经东新桥，过南京路，向西藏路口，大家一路高呼反帝口号。下午两点多钟，游行群众汇集南京路、浙江路一带，人山人海，口号声此起彼伏。

这时巡捕包围了游行队伍，他们无视中国主权，到处抓人寻衅。大约下午3时许，西捕头目英国人爱活生下令“开火”，瞬间枪声四起，外国巡捕的子弹像雨点般的射向手无寸铁的群众。据我所知，当场被打死的有电话公司接线生唐良吉、上海大学学生何秉樊、同济大学学生尹景一、南洋大学附中学生新加坡归侨陈虞钦等11人。

惨案发生后，根据党的指示，上海总工会就在6月1日宣告成立，号召上海工人一致罢工，“报仇雪耻，反抗残暴杀人的外国强盗”。上海工人热烈响应共产党的号召，自6月2日起至6月7日止，英商电话公司和电车公司、怡和纱厂、英美烟草公司、祥生船厂及属工部局铁工厂、电灯厂、工程处职工以及清洁工、自来水厂工人、洋文报纸印刷职工，洋商银行及洋行职工全部罢了工。

在日商方面，内外棉系统的几个厂在顾正红事件后就一直在罢工，自6月初到6月12日所有日商纱厂工人及一些日文报纸印刷所和日本洋行的职工也都纷纷罢工。外商轮船公司中国海员经过酝酿准备也都离船罢工，太古、怡和、日清3家轮船公司20来艘轮船搁浅在码头动弹不得。

6月1日，我和浦东中学两位同学到浦东码头与码头工人取得了联系，6月3日浦东码头工人全体罢工，罢工斗争就这样一浪高过一浪，从6月2日起到6月17日为止，总计上海工人参加“五卅”大罢工的有25万人。

与此同时，大中学校也积极罢课，复旦大学的组织工作由学生会主席费福熊负责，我是学生会副主席负责宣传工作，学生会在学校大礼堂旁边一间空房里办公，我每天骑着脚踏车到处采访，打听斗争消息，回校后整理成文，抄成大字报贴在饭厅门外布告栏中，供同学们了解并掌握情况。

采访新闻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一次我到《春申晚报》联系事宜，刚出胡同口，一个西捕二话不说端起刺刀向我扎来，我一躲身跳下自行车，险些没扎着，他问我是什么的？到哪儿去？我用英语编了几句假话骗过了他，才放我去了。

上海人民一致行动实行“三罢”，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对此，帝国主义开始用武力镇压中国人民的斗争，他们宣布租界戒严，军舰开入黄浦江，军队登陆，万国商团荷枪实弹全体出动，仅6月上旬打伤打死20余华人。

6月4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宣告成立，它由上海总工会、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的，作为统一领导全市反帝运动的公开机关。6月7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发表宣言提出17项交涉条件，作为这次反帝运动的斗争纲领，具体内容是：

#### 先决条件：

工部局迅速实行以下四事，表示希望解决此案之诚意。

- 一、宣布取消戒严令；
- 二、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
- 三、送回所有被捕华人；
- 四、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学校原状。

**正式条件：**

- 五、惩凶，交出主使开枪和开枪凶手论处；
- 六、赔偿，包括死伤、罢工、罢市和学校被毁等四项；
- 七、英日两国公使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 八、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 九、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的绝对自由；
- 十、制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工人，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和罢工的自由；
- 十一、分配华人任高级巡捕；
- 十二、撤销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 十三、制止越界筑路；
- 十四、收回会审公堂（附款从略）；
- 十五、华人有担任租界董事及纳税人代表之权（附款从略）；
- 十六、取消领事裁判权；
- 十七、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

6月11日，南市举行市民大会，有工人和各界人民10万人参加。大会通过了17项条件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的决议，散会后举行示威游行。

同日，上海总商会会长、亲日买办虞洽卿在事前组织起“五卅”事件委员会，通过了13项条件，删去了17条中“永远撤退驻沪之英日海陆军”、“取消领事裁判权”，并把“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自由”改为优待工人的空话。上海总工会等团体复于6月17日在闸北召开10万人的群众大会，反对总商会修改条件。6月19日，总商会的会议上顺从了虞洽卿的主张，中小商人同意在6月26日（端午节后一日）开市。6月20日总工会召开代表大会，大家一致主张商界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不服，工界要坚持到底，决不复工。6月30日，上海20万人民，以工人为

主力，不顾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阻挠，举行了“五卅死难烈士追悼大会”。“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烈士报仇”等壮烈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费福熊是袁克定的女婿，当三罢运动日益高涨之时，他却辞去复旦大学学生会主席职务，这样我就出面接任学生会主席一职。

反帝统一战线分裂后，为了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力量，避免在不利的形势下孤军作战，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斗争策略，以解决部分要求为条件，主动收缩总同盟罢工。8月下旬，由日本资本家抚恤顾正红家属1万元，并补偿了工人在罢工期间一部分经济损失。9月上旬，工部局电气处复工，工人领到了罢工期间一半工资。随后，英商各工厂工人和英轮海员也在一定条件下复工，坚持了3个多月的轰轰烈烈的反帝大罢工，至此告一段落。

至此，我们学生会也就自动解散了。

(1983年)

## 国民革命在同济

何志明 \*

上海同济大学的前身是上海同济医工大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德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为基金而扩充兴办的，任教者多为德国人。听说以前只有德国人办的上海宝隆医院和医学专科学校。1922年学校为了提高学生质量，在医工预科前，增设德文补习班，专补德文和其他理化等课程，暂借炮台湾一个旧校址（是江苏水产学校或是旧海军学校校址，我记不清了）开学，是年秋新生入学有我们北京考入的学生一批，其中有在北京参加过五四运动和“三·一八”运动的，思想比较开阔，具有反抗精神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思想。而同济大学的学生革命运动发展很快，配合了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为第一次大革命迎接北伐军，奠下良好基础。我当时正在这学校读书。为纪念我校校庆75周年，仅将我亲身经历记下，以供编校史作参考。

### 一、同济学生运动的萌发

在全国“五四”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革命运动的影响下，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鼓舞下，在有拯救中华民族壮志的知识分子奔走呼号下，饥饿交迫的劳苦群众和知识青年学生看到了前面火红曙光，逐渐苏醒。尤以工农群众更显活跃，可是我同济大学的学生在顽固的江苏教育会系的控制下，只啃书本，为日后成名成

\* 作者是上海同济大学学生，早期共青团员。

家作打算，讲究吃喝，不问政治，不谈国事，明哲保身，就连体育运动也开展不起来，全校暮气沉沉。到 1922 年夏季，德文补习班新生入校后，我们这批由北京来的思想较活跃，具有反抗精神的学生，使同济大学炮台湾部的学生萌发出朝气蓬勃的气氛，逐渐影响了其他部分的学生，也踊跃地参加了在炮台湾校内举办的田径赛运动会。

我这个北京京师第四中学的穷学生，受过五四运动洗礼，没有奴颜婢膝的性格，见到不平的事，就要议论，要提意见，要在群众中叨叨。学校当局看到我就头痛，我们这个班同学又推我为班长，我这忍不住气的班长，常以维护同学利益，向校方提出意见和交涉。校方负责人袁希洛（或袁希涛，我记不清了）多次训诫我，进而恼羞成怒，在学期末，给我最严重的“开除学籍”处分，寒假亦不准我留校。我只得在沪西同德医校附近，赁民房亭子间度寒假。我反复思考，就认识到学生不组织团结起来，专靠个人单枪匹马是争取不到民主和改革的。

1923 年春，学校在吴淞镇附近新建的教学大楼、教学工厂以及教职员和学生宿舍大部落成，我炮台湾的学生全部迁入新屋，这又使我们与同学们接触面更广阔了。有一日我在上海街头遇着在湖南常德高小同学杨幼炯，他在复旦大学政治经济系读书，我在他那里看到许多进步书刊，如《向导》周报、《中国青年》、《新社会观》、《社会发展史》等，启发我对时局有进一步认识与对新社会的向往。因过往较密而由他那里认识了复旦大学的章渊若、上海大学的何秉樊等进步青年同学，也懂得了怎样去宣传这些新思想和要革命的道理，这也影响了我身边的同学们。

1924 年春，经杨幼炯、何秉樊同志的介绍，我参加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S·Y），编在复旦大学杨幼炯领导的团支部。由于每周星期六到复旦参加团生活会，又结识了南洋中学周继业（湖南人）同学、上海同德医校的陈长胜和中共上海区青年

工作部的恽代英同志，不久社会主义青年团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C·Y）后，我就介绍我校机械班（中专班）尹景一同学参加“共青团”，也编在复旦的团支部。

当时因中国共产党和共青团都不能公开活动，我和尹景一奉团的指示，分别由杨、何介绍加入了国民党，也编在复旦的国民党区分部，并积极在校内进行国民革命活动，对有影响的同学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业绩和国民党的政治纲领。以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宣传中国革命的必要性。我在德文补习班是比较活跃的，在宿舍里我挂有孙中山先生的像和订有《民国日报》，又接近医预科的同学。尹景一同学在教学工厂内学习，同工科的学生接触较多，我们就分头介绍许多同学参加国民党，组织成立国民党第四区分部，由我和尹景一、吴羹梅为委员，受江湾国民党区分部领导，继而我在吴淞镇附近由梁启超办的中国公学内，以同乡关系联系同学进行革命宣传活动，又成立了国民党第五区分部，由袁勋安负责，这在上海学生的革命号声甚为高涨时，吴淞镇这角落里也热气腾腾起来。

那时恽代英同志兼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传部干事，其部长为汪精卫，组织部长为叶楚伦（兼民国日报总编），由于我经常请恽代英同志来校讲演以及何秉樊常来校参加我们组织的学生活动分子座谈会，畅谈恽代英同志讲演的对时局的形势分析与三民主义的精髓见解，以及国民革命的重要意义与爱国青年的神圣任务，这就使全校学生的思想起了极骤的变化，请求加入国民党的同学增多了，区分部委员由3人增加到5人，继而增为7人。上海宝隆医院的医本科学生，由于医预科的同学们的活动，也有了反应。为扩大革命核心外围群众组织的学生会，在冲破学校当局的种种阻挠和威吓也正式成立了，选举吴羹梅、陈宝聪、尹景一、袁文彬、陈必耽等为委员进行活动，我又和尹、吴等商量，为促进同学们的进一步革命化，请国民党名流来校讲话，我就到

上海环龙路44号国民党上海执行部，请恽代英邀请汪精卫、叶楚伦来校讲演，虽学生未能全到而大礼堂内已无虚席。在恽代英与叶楚伦讲演时，我就把我校兴办情况以及学校当局受江苏教育系控制，学生是学自然科、学工与医的，只专心学业为成名成家，个人主义思想极浓厚，更谈不上有救国救民的革命意志向汪精卫作了介绍。汪精卫针对这一情况而阐述士农工商不是生活在真空里，仍是存在于社会中，不能逃脱腐朽的反革命势力的宰割，若不团结起来投入革命熔炉，推翻反革命统治，就是学成也无用武之地。他更进一步说明近代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抛弃精湛的医术，奔走呼号，推翻鞑虏，创建民国，虽多次武装起义失败，而仍再接再厉、百折不挠地踏着革命先烈的血迹奋勇前进，我们青年还有什么理由不奋起直追呢？待他讲完后，学生鼓掌长久不息，学校当局也不敢前来阻止。就这样，同学们的思想更跃进一步。为了贯彻国民党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政策，由学生会出面在吴淞镇开办平民夜校，招收镇上的贫民和纱厂工人入校读书，由我负责，这就为宣传革命道理和发展共产党组织铺平了道路。

1924年11月间，何秉樊同志来校告我说，我党上海区委和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决定，在孙中山先生由北上经上海去北京时，组织国民党员和学生工人群众到上海外滩夹道欢迎，要我们学校国民党员组织部分学生前往欢迎。到那天，我同尹景一、吴羹梅、陈宝聪和许多国民党员和部分同学前往，并见到很多学生市民伫立于码头等候，更见有散发《向导》周报的同志来往于人群间。不久，孙中山先生乘坐的小火轮靠岸，由孙夫人宋庆龄陪同上岸，频频挥手向欢迎的群众致意，随即登上汽车开往寓所。欢迎群众自发地结队尾随，想不到走到租界距英利爱路不远，被巡捕阻拦，经孙中山先生委派汪精卫与租界交涉后始通行。欢迎的队伍到孙先生住所前伫立等待，而孙中山先生出迎，立于石阶上

接见群众并讲演，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齐心协力，打倒军阀，打倒列强，召开国民大会，建立民主的国民政府，平均地权，使“耕者有其田”，节制资本去发展生产，使国民生活水平提高，并给人民自由平等的权利。这时群情激奋，口号之声响彻云霄，个个都是心情激昂地回校回厂。我们在学校又组织座谈孙先生北上的重要政治意义。

随着上海革命形势的发展，我校的革命空气也越来越浓，当时我陷在事务圈子里，对共产党、团员的发展未能跟上去，到“五卅”运动前夕，仍只有我与尹景一两人，尚未成立团支部，更无党组织。幸其他的派别如无政府主义和乌托邦思想尚未侵入我校。在恽代英经常来校驳斥国民党右派对三民主义的歪曲，阐述了三民主义的精髓，有时到中国公学讲演，就是立宪派梁启超虽在中国公学有影响，而我们所掌握的中国公学内国民党第五区分部尚能活动与我们较接近，故我校没有受到梁启超多大的影响。

## 二、“五卅”反帝运动时的同济

1925年5月29日，何秉樊同志偕同上海学生联合会代表梅电龙来校告知：我党上海区委为支援小纱渡内外棉纱第七厂工人顾正红惨遭日帝枪杀并打伤多人事件，激发其他工厂相继罢工，反抗日帝暴行，而日帝勾结租界帝国主义阻止学生募捐来救济死伤工人，并逮捕大批学生，决定发动全市工人学生举行反帝示威大游行，要我全校学生赴沪参加。我就同代表与我校国民党区分部和学生会委员商讨，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临时会议，当日下午7时前，全校学生已聚集大礼堂，门外亦挤满了人，吴羹梅、陈宝聪主持开会，由上海学联代表梅电龙同志报告工人顾正红惨遭杀害，打伤多人和各厂工人罢工支援同帝国主义进行艰苦的斗争，以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逼迫我政府派武装警察来取缔的情况。

慷慨激昂的报告，使全体同学义愤填膺，高呼口号，互争上台演说，尹景一同志以激昂演词，提出除参加游行外，还应解囊相助，当时决定：1. 明日全体同学参加上海反帝示威大游行；2. 募捐支援罢工的工人；3. 全校组织四个中队，16个小队，并选派陈必耽、沈新铭、陈维新、金泽忠、吴中士、何同泽对募捐、讲演、散发传单及张贴标语等进行筹备，又推陈宝聪、吴羹梅、尹景一和袁文彬负责领队；4. 组织纠察队维持秩序。我则负责对外和与市学联联系，校内由吴羹梅、陈宝聪负责。

5月30日上午7时，全校同学在校操场集合，估计工科、医预科、机械班和德文补习班的同学已到百分之八九十左右，在群情激昂兴奋情况下，学校当局未敢前来阻止，但亦无人参加。我们到吴淞镇乘火车到上海北站下车，经浙江路沿途散发传单和贴标语，演说并呼口号，向南京路出发，见各路已有工人学生进行宣传。吴羹梅一队，则穿过南京路到其他马路去游行，随其他队伍向北洋政府驻沪外事交涉署请愿，要求向日帝提出强烈抗议，严惩枪杀工人的凶手，并给以抚恤金，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而南京路的示威群众特多，并时有听闻学生、工人被捕，更闻南京路老闸捕房内已拘留百多人，促使学生慷慨，都向南京路靠拢，聚于老闸捕房前。要求释放被捕同学的口号声，震耳欲聋。这时我亦被捕入内，进入待审室就见到已有被捕学生10多人，我也见到熟悉的同德医校的陈长胜同志，我正与他谈话时，进来一英巡官轰我们出去。约在下午3时左右，我们走出捕房门口，示威群众见我们走出，就慢向后撤，后知尚有未放出者，人又涌向捕房门首，更显激愤。在这刹那间，捕房门首之英巡官爱华生鸣一枪，印捕80号即举枪对群众放射排枪。当时秩序大乱，示威群众急向两侧商店躲避，我则跳入捕房东侧一水果店内，回头向马路眺望，约有10多人倒入血泊中。我再往前注视，认出我身后的尹景一同志和上海大学的何秉樊同志，以及南洋中学的

一同学。我急奔南市亚东医校上海学联，找到恽代英和其他同志，汇报了南京路伤亡情况，并请示今后怎么办。得指示要我迅速收集失散同学回校，明日继续来沪游行，我即走出学联，找到吴羹梅、陈宝聪等同学，要他们率队回校，我则留在上海学联工作并与党团取得联系。同学们得知尹景一同学负伤已送入山东路仁济医院，因流血过多而牺牲，同学们极为悲伤义愤，即成立了尹景一烈士治丧委员会，更报与校当局和尹景一家属共商善后。为了揭穿帝国主义者诬蔑学生前去夺取巡捕武器而为自卫开枪的谎言，市学联市总工会联合聘请律师，更邀请各界代表到医院实地调查，证明死者的弹孔多是从侧背射入的，在事实面前，帝国主义的谎言才为之破产。

5月31日晨，再接再厉的示威游行，浩浩荡荡地来到上海各马路游行和演讲，这时租界各巡捕房、工部局、会审公堂都增添了武装巡捕和外国水兵把守，更备有消防车用水龙头向群众喷射，以阻止群众队伍前进。这就更激怒了群众，都奋不顾身的向前夺取水龙头，双方扭成一团地混战，又被捕了和打伤多人，我校陈宝聪同学也被击伤头部，示威群众乃改变方向齐奔政府驻沪交涉署请愿，而门口也是军警戒备森严，经派代表进入交涉，要求向日英帝国主义提出强烈抗议，严惩肇事凶手，赔款损失等，经政府官员出来对群众宣称：政府完全负责，希望群众回厂回校静候解决。示威群众只得回厂回校另筹他策。

上海市学联与市总工会得党中央行动委员会指示，在邓中夏、李立三、恽代英等直接领导下，为扩大反帝运动又到各阶层去结成联合战线，一致向帝国主义进攻，就分派代表到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总会，要求他们举行罢市声援。5月31日，他们在天后宫开会，讨论这一震惊全上海的帝国主义大屠杀的惨无人道的侵略行为，抱什么态度的问题。以大资产阶级的商业、工业、银行业、买办为基础的总商会申言不罢市，可以作第

三者名义作调解人，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是五四反帝运动时与总商会产生矛盾时分化出来的，由思想比较进步的各马路中小商店组织起来的，这次惨案受害者中亦有商人和店员及其子女，故心情比较气愤，要求联合总会王筱、赖申明，愿意牺牲、主张罢市为学生作后盾。双方争论不休，示威群众闻讯，结队前来支持各马路商界联合会总会，要求改开上海市民大会来决定，如是议定三罢命令，迫总商会在总罢市、总罢工、总罢课命令上签字，而总商会副会长推说会长虞洽卿已赴京无人负责，在群众促之再三再四始签字，于是6月1日起全市罢市罢工罢课实现了。为了反帝运动的统一指挥，由上海总工会、市学联、全国学联、总商会、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及其他爱国团体各派6人共同组织“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为总指挥机关，而总商会仍不愿派人参加。

在这一运动中，突出而令人难忘的一件事，是上海华侨主办的“上海友联影片公司”携带摄影机，放置在小轿车内，镜头在车后，前插英国小国旗（是英是美记不清了），来往在租界各马路拍摄群众游行演讲散发传单和学生工人与巡捕抢水龙头的混战以及学生被打被捕情况，也有我校同学抬着尹景一烈士棺木游行出葬，经法租界大马路到徐家汇的镜头，摄完就放映，租界当局禁映，并提出高价收买拷贝底片，遭到有高尚爱国主义精神的友联影片公司的拒绝，后获各界的支持在华界放映并运往东南亚（南洋）各国放映，向全世界揭露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滔天罪行和中华儿女们的英雄顽强的斗志，这就为“五卅”惨案实况和帝国主义狰狞面目留下了历史的见证。

当尹景一烈士遗体入棺时，我不禁眼泪盈眶，忆及我朝夕相处的战友，烈士生前在校时热心帮助同学，对任何人都和蔼可亲，无论在课堂或实习工厂，都是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学习和操作，对不公平的事都是挺身而出，见义勇为，谈起时局则慷慨异常，真是一位爱国忧民的好同志，我怎能不痛哭，怎能不痛恨万

恶的帝国主义者夺去了我校革命柱石的生命。同学们都非常悲愤交集地与校当局代表及家属共同抬棺游行出葬，和市学联组织送葬队伍经法租界大马路至徐家汇东汉记路山东会馆停放（有的说是齐鲁别墅），以备日后合葬于上海闸北宋教仁公墓侧另辟的“五卅”公墓内。这“五卅”公墓是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向上海地方政府交涉开辟的，但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被镇压消沉后，这公墓的修建恐成泡影。

6月5日，由上海工商学联合委员会主持，在沪南斜桥体育场举行隆重的“五卅”惨案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参加的工人，学生，商人和市民约20余万人，上海政府和驻沪外事交涉署无人参加，由市总工会李立三主持，恽代英代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参加并讲了话，群众极为悲愤，尤其对北洋政府不满，乃于会后列队在华界游行示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要租界撤退海军陆战队，解除武装巡捕，赔偿损失等口号声震撼上空。

在这反帝风暴震动了全国各都市，特别是学生工人都纷纷起来，大大小小罢市、罢工、罢课、示威游行不断涌现，群情激昂的口号，为同胞报仇的呼声，到处都可听到，而帝国主义是不甘心的，勾结北洋反动军阀政府迫使各校提前放假，强令学生离校，瓦解了学生的组织和团结，斗争热气逐渐消沉了，又用欺骗手段分化资产阶级，在威逼利诱下，罢市的劲头消失了，加之国民党右派和工团主义的工贼大造谣言，说学生会都是共产党，中小商人也跟着“赤化”了。虞洽卿回沪后另有他的打算，设法拉住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威胁工人，最后只剩工人阶级孤军作战了，我党在万分艰难的复杂环境中斗争着。自开学和开市后，形势更恶劣。帝国主义与军阀看清“我民族的各阶级联合战线”破裂，就獠牙毕露地开始围攻罢工的工人阶级，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我党为保住工人阶级的组织和已得到的胜利，改变了罢工的策略，就以经济斗争与局部解决相结合的政策，到8月底各厂先

后复工。这一有伟大历史和政治意义、震惊世界的“五卅”反帝运动，虽未完全取得直接的胜利果实，而一泻汪洋地推动了全国人民进入国民革命的高潮。

在这年暑假后，我回到学校才知道我被学校反动当局开除了。我不能入校继续求学了，而校内的国民党组织、学生会及吴淞镇平民夜校尚存，幸而吴羹梅、陈宝聪与市学联梅电龙已取得密切的联系，我又不能再留在吴淞镇，而校内又无共产主义者的组织，复旦大学的团支部杨幼炯叛变了革命，走到了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去了。我只得到上海找到共产主义青年团区委杨××（名字记不清了，是当年秋季蒋介石在苏北失利，名义上宣布下野时在杭州陆军监狱内牺牲的）安排我暂住吴淞镇平民学校内，做工人运动兼与学校内革命组织联系。我就在吴淞镇永安纱厂和市贫民中发展了几个团员组成了支部，受上海团区委指挥。

1926年春，同济大学的同学们虽因轰轰烈烈的“五卅”反帝运动被镇压消沉下去了，学校当局反动校长阮尚介亦步亦趋地跟随教育厅加紧对学生施行专制管束，学生会的活动受到极大限制，而经过“五卅”反帝运动洗礼的同学们思想尚未僵化，又经常与我和市学联联系，而掀起了大规模的驱逐反动校长阮尚介的运动。校当局在反动政府的支持下，调来了大批军警围困学校，限制学生活动的自由，并开除活动积极的学生吴羹梅、陈宝聪等数十人，更激起同学们的义愤，斗争更为激烈。在残酷的高压下，大批学生冲击校门，派代表到省教育厅请愿，另派代表去广州与中山大学交涉，有些同学转学问题，得其同意和支持，就到中山大学求学去了。

同济大学校长虽被逐走，而校内的革命力量损失殆尽，我在吴淞镇亦不能逗留，经共青团上海区委介绍到上海党区委罗亦农处参加党组织并派我到杨树浦清凉路工人夜校工作，而吴淞镇则由团组织另派同志前往，因此我就与同济大学分开，而走上新的

岗位去了。

(1981年)

## 关于沙基惨案的见闻

张适南\*

沙基惨案发生这一天，是 1925 年 6 月 23 日。当时我住在广州市德宣马路前面靠近第一公园北面的一条街道同乡家里，队伍游行时，我还出街去看热闹，惨案发生于这天下午五六时左右。现就我所知的情况写出来以供参考。

### 一、惨案的起因

1925 年 5 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枪杀共产党员、上海纱厂工人顾正红，引起上海全体工人罢工。接着，上海市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枪杀顾正红，举行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在南京路又遭到英帝国主义的枪杀，引起上海市民罢工、罢市、罢课，这就是有名的上海南京路惨案。这两个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广东人民就愤不可遏的要加强反对英、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暴行。这时，正是广东政府配合着革命的群众消灭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才一个多月的时候，广州市民反对帝国主义勇气更加增长，因此，在革命政府支持和领导之下，为向全国及国际表示这一慷慨，向英、日帝国主义抗议这一野兽暴行，号召广东军民联合起来。事前广州全体军民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 6 月 23 日在广州组织有约 10 万人的示威游行大会。

### 二、惨案发生的情况

游行队伍是在广州中山大学操场及操场以外的马路上集合

\* 作者系沙基惨案目击者。

的。队伍因当时的各工会、各学校、各机关、团体以及当日的黄埔学生军、驻广州市的部队组成的，出发游行时间大概在下午2时，路线是由中山大学向西转惠爱中路，到永汉北路入口直走永汉南路，到天字码头转长堤向西，经西濠口沙基沿西关向北走德宣路，到观音山脚旧总统府前面散会，预定游行路线是如此，除了特殊情况外，每次游行路线大都如此。这时广州气候已很炎热，我在下午3时左右，特意到永汉路去，看见游行的队伍很有秩序，也很激昂，每人执着红绿纸小旗，各个游行单位的人都在队伍两旁散发传单，沿途贴着引人注目的标语，游行队伍的次序，是军警单位在前，其次是学校，再次是工会及广州的各社团，人数约有八九万。沿途高呼口号，此起彼落，前呼后应，没有停止。这种游行，在广州是很经常，从没有发生过意外，因此也就没有想到会发生法帝国主义继英日帝国主义之后，枪杀广州市民这一暴行。游行队伍浩浩荡荡沿着珠江长堤由东直走，下午5时二三十分经过西濠口转北弯沙基准备向北直走。沙基西面河堤是法帝国主义租借地的东岸，与沙基一河之隔，在平素这个地方，法帝国主义有武装兵站岗来往巡逻。在广州政府平定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部队前后，增加了岗哨，堤边堆起了沙包，防止广东军队或者溃军进入沙面。杨刘消灭后，我经过沙基几次，见沙包并未除去，广东市民不以为怪。这天法帝国主义知道广州市民游行示威，增加了岗哨，岗哨并换短枪为步枪，又增加了机关枪（我记得这是惨案发生后，从广州报纸上知道的）。游行队伍经过沙基时，法帝国主义特设的岗哨禁止队伍通过。游行队伍在自己的国土游行，当然不理。这时，最前列武装队伍还没有完全过完的时候，岗哨就开枪射击，前面的队伍，听到后面发生枪声，不知为了什么，还继续前进。后面快要走完的队伍，一齐卧下准备还击，但为领队官长制止。这时岗哨径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游行队伍秩序大乱，纷纷逃走。事后检查，听说死了十三

四人（因时间已久，数字记得不大清楚了），伤了二三十人，死伤大都是工会及市民团体，也有军人带伤的，打死的还有妇女。敌人这种暴行是有计划的。惨案发生后，这一不幸事件立刻传遍广州市每一角落，广州市民非常哀痛，想不到这种野兽行为，就是号称文明的法帝国主义所为。广州市军民怒火与哀恸交炽，无法抑制。当晚广州政府就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除向法帝国主义提出最严重的抗议，要求惩凶赔偿认罪外，并保证不再发生同样事件。广州市各工会各社团联名组织，号召对沙面总罢工，并追溯这一惨案的发生与香港英帝国主义有关，对香港举行总罢工，把香港变为臭港（因为粪业工人罢工无人打扫公私厕所），市民还提议收回法帝国主义所租借的沙面运动。从这天以后，广州市政府就把沙基这条马路改名为六二三路，作为对惨案的纪念。

### 三、沙面简略介绍

沙面地区面积并不很大，位于广州西北角，就是沙基对面的西北面，在珠江的西北边上。法帝国主义由腐朽的清王朝取得这块土地的租借权。里面的房屋建筑不多，一律是洋式，没有中国式的建筑物，也没有中国居民住在里面。在法帝国主义占据的时候，只有它的驻广州领事馆设在那里，另外还有些法国和日本商店开设在那里，它对广东人民的利益危害不小。它与发生惨案的地点，仅仅一水之隔，宽度不过 10 多米，深度也不过 10 多米。平时广东罪犯行凶作恶，只要越过这条溪河，逃进里面，广东政府就无法过问，要想逮捕罪犯，必得按法权引渡。能不能引渡，又是另一问题，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在惨案发生的前一月多，滇桂军杨希闵、刘震寰两部被消灭时，他们行凶作恶的大小军官，在队伍被缴械前几分钟逃进沙面，政府军追击部队，看着这批作恶分子跨过河桥，束手无策，要想引渡也有困难，结果望河兴叹。

扫兴而回。遂使杨刘余孽腰缠累累，辗转逃往香港、上海过其荒淫无耻的生活。

#### 附记：

惨案发生这一天，天气非常晴朗，太阳照在人的皮肤上，显得特别炎热，珠江静静淌着，大小船只挤得满满的，都不愿动，虽然事隔快 40 年，我还记得非常清楚。

惨案发生后，广州市民对沙面罢工，一些为法国人喂养孩子的奶母，都罢工回家，他们得到政府的照顾，在没有找到新的职业前，一样领救济费。可是法国妇女就非常感到刺痛。我每次走到沙基时，见法国妇女亲到珠江边提水，她们要想剥削中国妇女也不可能了。

我每次经过越南，来去都要向法领事馆取过境护照，所以对沙面有一些熟悉。

(1965 年)

## 沙基惨案的一鳞半爪

宋瑞珂\*

沙基惨案是在 1925 年 6 月 23 日，我虽然参加了这次示威游行，但那时候，我只是黄埔军校的一个学生，接触面狭窄，见闻有限，且事隔 38 年，多已淡忘，能回忆的也不周全，仅能写述一鳞半爪，以供参考。

### 反帝怒潮

五卅惨案，帝国主义血腥的罪行，迅速传遍了全中国，激怒了中国人民，中共号召全国被压迫阶级的群众起来反抗帝国主义残暴的大屠杀，全国反帝怒潮风起云涌。在这反帝大浪潮中，香港工人开始了罢工，声明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对“五卅惨案”提出的条件，并提出了本身的要求，香港当局用戒严和封锁对付罢工，引起了罢工群众的愤怒，纷纷离港回到广州。此时，沙面（租界）洋务工人也举行了罢工。

当时，广东革命政府刚平定了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的反革命叛乱，我们黄埔军校学生参加了这次战役后，驻在广州东山桂军军校旧址，尚未回到黄埔。

### 惨案经过

6 月 23 日晨点名时，连值星传达要声援上海和香港工人的斗争，举行反帝大示威游行的指示。同学们莫不义愤填胸，踊跃

\* 作者当时为黄埔军校学生，曾参与游行。

参加。我第五连有一刘志陆同学，本来担任当天的采买勤务，为了要参加游行与病号同学（南京人，姓名忘记）调换，在沙基惨案中英勇牺牲了。

上午8时整队到东校场集合。参加游行的是一部分回到广州的香港工人和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男女学生、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学生军教导团共约10万人，举行了反帝示威大游行。经惠爱东路永汉南路，到长堤，沿长堤马路西行，经过沙面对岸时，遭到英法帝国主义事先布置好的水兵射击和停泊在白鹅潭军舰的大炮轰击。当场死50余人，重伤170余人，轻伤不计其数。这一大血案，更加激起省港群众反帝的怒火。

当天游行队伍秩序良好。工人、农民和学生在前，黄埔军校学生和学生军教导团随后。沿途一面行进，一面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法水兵在沙面江岸上堆有沙包，东西濠口桥上设有刺丝拒马。英法水兵在沙包掩体内用枪瞄准，对着我游行队伍，我军校学生过东濠口后，正在行进中，沙面方面突然枪声大作，射击我们，当时倒地者数人。帝国主义的野蛮残暴，激起我们的愤慨，便自动卧在沙基马路上还击。我连当时死亡徐仁江、刘志陆等三人，重伤孙嘉博（中达姆弹，两膀被打掉肌肉如碗口大）、蒋铁生（身中10枪）等数人。排长李启楫见伤亡惨重，卧在马路上毫无掩蔽，将遭更大牺牲，命撤到沙基北侧商店内。我与张廷孟同学交互掩护，另有工人数人，撤到卖汽水的小店内，英法水兵仍向店内射击，该店门窗玻璃多被打碎。

英法帝国主义惨无人道，施行大屠杀，群情激愤，教导团士兵奋不顾身，冲到东濠口桥上，领队强制撤回。后来一位参与其事的教导团军士某（姓名忘记，安徽人）对我说，他们当时想冲进沙面去，歼灭帝国主义，收回租界，以免帝国主义者在我国领土上继续横行霸道。我们撤到汽水店内的同学和工人，当时商量过。若无一水之隔，无论冒多大牺牲，我们也要冲过去，为死难

同胞报仇。

约 11 时左右，我连排长谢力虎从邻店内爬到屋顶上，大声喊叫，传达廖仲恺党代表命令说，革命政府对帝国主义的暴行，已向英法提出严重抗议，将用其他方式制帝国主义的死命，要我们撤出沙基，免再多遭伤亡。可是，这个商店只有前门，正对沙面。人一露头，英法水兵就射击。我与张廷孟等研究冲出去的办法，一广州工人说，隔壁是一私人医院，其后门有小巷可通大街，如在墙上开一洞，便可由其后门出去，不至遭到射击。我们遂请他与店主商量，经其允许，工人同志便在室内找到一根钢钎，在西墙上开一洞。我们都由此跳出，到小巷时，全连正在集合。除伤亡者外，都到齐后，整队回原驻地。伤者由红十字会收容送医院，死亡同学的尸体运回黄埔，葬于平冈烈士墓。

在革命政府的支持下，中华全国总工会于 7 月初，在广州召开香港、广州两地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建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用罢工、排货和封锁与帝国主义作坚决斗争，严重地打击了香港英帝国主义的经济利益，使它的全部经济活动陷于瘫痪状态。迫使英帝国主义不得不承认“1925 年英国尊严的堕落，实为中英通商二百年来所未有”。

### 买办造谣

香港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的买办阶级反动武装商团，于 1924 年 10 月中旬，在广州发动了反革命叛乱，经黄埔学生军和一部分革命军队平定了。其头子陈廉伯逃往香港，但其党羽尚有潜伏广州的，沙基惨案时，他们造谣惑众说“游行队伍先开枪，英法水兵才还击”，为英法帝国主义的野蛮暴行作辩护。这完全是颠倒是非，混淆视听，直到 30 多年后的今天，还有人不明真相，以这种说法问我，可见买办阶级为其主子推卸责任，用心阴险，贻害深远。沙基惨案的真相是：英法帝国主义早就准备用大屠杀

来对付游行群众，兹举两件事，可资佐证：

1. 英法水兵事前已沿沙面江岸堆满沙包工事，开设枪眼，桥上布置刺丝拒马，水兵登陆进入阵地，军舰上大炮脱去炮衣，炮口对着沙基。如果帝国主义不是准备采取高压手段，镇压反帝运动，对群众进行屠杀，何必这样如临大敌？我们示威游行群众列队前进，都有领队，秩序良好。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撤退外国驻华的军队”，“为死难同胞报仇”，这些口号，是当时中国人民一致的正义要求。买办阶级认贼作父，在他们看来，是冒犯其主子，遂造谣诬蔑游行群众。

2. 在沙基惨案之前，4月间的“福州惨案”，5月间的“青岛惨案”以及“五卅惨案”，群众并未携带武器，也遭到屠杀。当时福州在北洋军阀周荫人的统治下，青岛、上海在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在租界的直接统治下，请愿和游行群众赤手空拳，并无革命武装部队参加，竟遭到大屠杀，难道这也能说是群众先开枪吗？

(1963年)

## 忆“六二三”沙基惨案

杨维泉\*

1925年，正当第一次国共合作后，反帝反封建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浪潮澎湃于中华全国各地，帝国主义者惶惶不可终日，最先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惨杀为反对日本资本家的残酷压迫，进行罢工而抗议的工人领袖顾正红，从而激起了上海工人、学生、商人、市民的义愤，举行罢工、罢课、罢市集会宣传，游行示威等义举，又遭到了英、日等帝国主义的开枪射击，打死打伤我游行群众数百人。帝国主义者的这种灭绝人性的野蛮侵略暴行传至广东后，革命的黄埔师生无不怒发冲冠，义愤填膺，誓以鲜血来声援我上海遭帝国主义惨杀的爱国同胞。在共产党的领导教育下的有志之士，这时以周恩来为政治部主任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二、三团，正当第一次东征，打垮了叛变革命的陈炯明之后，胜利回师广州，讨伐窃据广州的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的叛乱。在回师广州战役中，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总队，3个营9个连，共1000余名，黄埔热血青年学生，抱着为实现孙总理的遗训，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热烈参加担任讨伐叛逆杨刘战役之侧翼进攻广州任务。6月初，同学们接到这个战斗命令之后，个个斗志昂扬，将从校学得的军事知识，可以应用于在打倒军阀的实地战场上，大家奋发精神，枕戈待旦，从黄埔乘木制拖船向鱼珠方向挺进，大约有一、二小时，靠近鱼珠，防守在鱼珠的敌滇军部队，即向我学生军（当时外交报纸所称谓的名称）以步机枪猛

\* 作者当时系黄埔军校学生。

烈阻击登陆。我渡江的学生军，不发一枪，沉着前进，我海军炮舰以猛烈炮火向岸上守敌轰击，游弋于渡江学生军船队之周围。这时，学生军勇气更加倍增。我学生军对这次渡江作战，尚属首次临阵的实践，敌人的枪炮击来也是第一次的经历，其中初出茅庐的一些小伙子，包括我在内，听到第一声枪声所飞来的子弹声之后，两脚立即发了抖，一转瞬间，就平静了。船快靠岸，同学们飞跃登岸，在枪林弹雨中，以白刃冲入敌阵。这时助学生军渡江作战的两门苏俄援助黄埔军校学生教练的野炮，已拉到了升旗山山腰约 8000 米的距离，在俄国顾问的指导下，向猎德一带作射击准备。在学生军登陆进攻时，滇军某师师长率作战人员出车站指挥时，即被我升旗山炮兵阵地学生所发现，当即向这一小撮敌人开炮轰击，第一炮就命中，这一小股敌人包括师长，一命呜呼，敌军阵营失去了指挥官，军心涣散，又经不起学生军的前仆后继勇猛冲锋，不到数小时，就被学生军冲破了阵地，敌军狼狈溃逃。进入敌阵后，只有敌尸遍野，战斗胜利结束。学生军就经东山进驻广州了，于是在广州，参加国共两党共同领导发动组织起来的工人、农民、商人、市民、学生、爱国人士，及黄埔军校第三期全体学生和黄埔教导团一、二、三团官兵，于 6 月 23 日上午 8 时在广州东校场，召开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惨案死难同胞游行示威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人士多达 10 万人（这是当时外国报纸的报道）。大会后接着游行，队伍行列，工人为先导，农民、商人、市民、爱国人士、学生、黄埔军校学生、各界人士，各执五色三角小旗，上书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列强、为上海“五卅”惨案死难同胞复仇、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借地、收回领事裁判权、国民革命成功、中华民族万岁，黄埔学生则以全副武装，每一个同学均备子弹 200 发、“三八”式刺刀、手榴弹两枚，还背着橡皮雨衣和毯子、包裹、水壶、干粮袋，打绑腿、穿草鞋。

当时黄埔学生大都年龄在 20 岁左右的有志青年，他们是无私无畏的革命好男儿，鲜艳的各色小三角旗插在步枪的枪口上，接在女生队伍的后面，浩浩荡荡地向沙面，向帝国主义的租借地对面沙基前进，一路上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为上海“五卅”惨案死难同胞复仇，收回租借地，收回领事裁判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行至沙面对岸沙基时，帝国主义的刽子手在隔河的对岸新建筑的桥头堡上，枪口已对着游行队伍，走在黄埔队伍前面的女子中学学生，一派巾帼英雄的气概，她们的步伐健壮有力，口号声和歌唱声坚强雄伟，这对游行队伍增添了无比的鼓舞，这女子学校的校服是白短衫、黑裙子，十分整洁美观。黄埔军校学生跟在她们后面做后盾。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环绕着沙面前进，一面高呼收回租借地，愤怒的口号和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歌。沙面帝国主义分子以猛烈的步枪和机枪，向游行队伍及站立两旁观看游行盛况的民众扫射，黄埔学生立即散开，各自进入商店门口屋柱下掩蔽，向沙面租借地帝国主义分子的碉堡沉着地猛烈还击，直使洋鬼子躲在碉堡内抬不起头。我则尽找沙面洋房窗子为目标，连续射击，前面游行队伍中的女学生队先后安然脱离险境，黄埔学生一直坚持战斗数小时，自上午 10 时至下午 3 时，才撤离战场，有一位黄埔三期入伍生第五连的同学，在这次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示威游行中，就壮烈牺牲了，一位从日本弃学回国的黄埔四川籍同学也牺牲了。我在这次惨案中也被子弹擦过了项颈皮，这使我永远不会忘记帝国主义的暴行。下午 2 时下了一场阵头大雨，侵略与反侵略的搏斗暂时中止了，我们奉令通过商店后门离开沙基，集合开回驻地。晚上，于驻地以班为单位，召开对帝国主义造成的沙基惨案讨论对策小组会，同学们一致向国民政府要求，对沙面各帝国主义提出“哀的美顿书”，要立即以武力收回沙面租借地，优抚死难同胞，严惩造成惨案的凶手，如不归还租借地和惩凶赔偿损失等，就以大炮轰击。决议

第二天由官长转达，国民政府对于学生的建议表示关切，但由于准备北伐，解决惨案问题先以外交途径，与各国交涉，举世震惊的沙基惨案就不了而了之，这也是我们祖国在半个世纪前处于半殖民半封建社会时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侮压迫屠杀和剥削的惨痛史，是我们中华民族所不能忘怀的。

(1982年)

## “沙基惨案”亲历见闻

张采庵\*

“六二三”沙基惨案是上海“五卅惨案”的发展。

“五卅惨案”震动了全国，各大城市纷纷举行“三罢”以作声援，并促使政府进行强硬交涉，“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口号响遍了全国。

革命策源地的广州群众，听到“五卅惨案”发生，无不义愤填膺。当时我在广东大学读书，学校在前门大操场举行过“援助沪案”的群众大会，会后有数千人作示威巡行，并散发传单，抵制英、日货。

随后，香港工人举行大罢工，每天都有不少罢工工人及其家属回到广州，真是热火朝天，其中也有我的亲属张窝（广九铁路段机工）、张涵（茶居工人）、张勉余（电车司机）及其他友人。大街上每天都有不少宣传队四处宣传，尤以东山川龙口外旧称“望海观音”的大空地为最炽盛。一到夕阳西下，这里便聚合千多人听演讲，演讲者多是罢工工人和学生，悲愤激越，声泪俱下，听者莫不动容，间有振臂而起，大声疾呼。

沙面的洋行工人及文员亦为正义所激动，同声响应，决意一致罢工。当时我住在兴隆街恒源糖面店，这是我的叔父经营的，也是乡中兄弟们的来往聚集点。沙面工人罢工前，我的兄弟张德明（是一家沙面英国商行的文员）就得到一些消息，他说英国人的态度很强硬，已通知市内所有侨民迁入沙面。同时，一个名叫

\* 作者当时系广东大学学生。

山崎龟之助的日本商人是经营台湾砂糖的，恒源店和他有交易。他曾在恒源店微笑对我们说：“你们小心吧！”

因为学校罢课，我常到沙基观察沙面的动静。6月22日上午，见泊在白鹅潭上的英国战舰水兵登上沙面，东、西桥的铁闸已关闭，有印度兵在堆沙包，一个军官模样的在指挥。沙基各商店的人员都走出来观看，路人也驻足而观。有人说外国人怕我们，有人说外国人吓我们，也有人说外国人居心叵测。总之空气是紧张的。

当天下午我又到沙基去，只见沙包在沿河分堆垒起，凡七八堆，连“域多利”、“屈臣氏”等洋房也堆有沙包。白鹅潭的外国兵舰也增加了，而且卸去炮衣。我看这情景觉得不是味道，回到恒源店看到一张通告（什么组织名义发的已忘记了），决定23日12时开各界大会，地点在东较场，会后作示威大巡行。我的叔父劝我不要参加，我心里实在不安，正在犹疑，同族兄弟都叫我不要去，于是我就含含糊糊地答应他们不去。

23日早上，我又走到沙基，望见沙面一片死寂，不见人影，桥门紧关，只有英、印兵和法国、安南兵全副武装，上了刺刀站着，分守东桥和西桥。我以为他们只不过提防我们示威游行队伍冲进沙面而已。但最刺眼的是一艘英舰竟驶进省河西濠口对面的江面，卸去炮衣，把炮口指向长堤。同时，沙基一带商店都不敢像往常大开门户，而是半掩门，一些经营谷米和杂货的“三江帮”也堆起米包和货物于门后以防枪弹，行人也比以前稀少得多，有点惶惶然。

各界大会是于中午在东较场召开的，我因没有参加，会场情况不清楚。因想看看巡行队伍的豪壮气势，早饭后，即由十三行走到太平南出长堤折向东去，沿途熙来攘往，热闹如常。堤边不少人以愤怒眼光聚观驶进内河的英舰，仇恨之心是一致的。有人以蔑视的态度说：“这有什么可怕！”壮语惊天，令人振奋。我行

至先施公司（即今华夏公司）附近，忽听人声喧哗，“来了！来了！”向东望去，但见旗帜飘扬，口号声震天，巡行队伍果然来了。观看的群众马上列成人墙，夹道而立。最先行的是打着一面大旗的罢工工人队伍，接着是农民队伍和学生队伍。走在学生队伍前头的是广东大学，最后也见到有军队，沿途高呼口号，此起彼落。队伍是列成四路纵队行进的。

当广东大学的队伍行近时，我一眼看见同学林伯强、何锡光、姚文达，不由得叫了他们一声，他们便走过来拉着我，递给我一支小旗，要我参加巡行，我便走进游行队伍中去了。

浩荡的人流向西而去，传单纷纷飞舞，天空也有飞机散发传单。当行近粤海关前，大钟“当当”打了两下，正是下午2时。这时我心情特别紧张，像上了火线。一个工人和一个手执白旗的警察站在粤海关西堤验货厂的旁边，大声叫大家“严守秩序！切勿暴动！”大队随即转进沙基去。

东桥戒备森严，除沙包和外国守军外还装了铁丝网，竖立的一个小牌上写有“立入格杀”四字。经过东桥时口号特别响，而且队伍停止前进，向着东桥振臂高呼“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为上海死难同胞复仇！”等口号。洋兵站在沙包后发着冷笑。

沙基路上看巡行的人不少，但商店都关上大门，警察站在河边维持秩序。沙面沿河的沙包，每堆都有安南兵伏着，但路上不见有人行走。队伍继续前进，行至西桥，情况和东桥一样。我们随着前头队伍，过了西桥转入内街的刹那间，不知何故突闻西桥枪声响起，继以机枪，密如串炮。回头看时，后面同学们和人群像决堤洪水，争向内街奔避，各自寻觅躲身地方，耳边枪声不绝，且杂有炮声，我且躲且走，到梯云街才算脱险。这时碰上林伯强，另外有两个手受轻伤流血的同学，我们即叫来两乘轿子，送他们各自回家。那时枪声已疏了下来。林伯强说：“后面队伍

是岭南大学的，死伤一定不少”。

我回到恒源店已是下午4时，别人见我有仓惶之色，都来问我，我将刚才情况说了一遍，大家非常气恼。街上顿时也热闹起来，居民互相探问，互相传播消息。更有人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

晚饭后枪声已止，又有不少人到沙基观察现场。我由兴隆街走出西堤二马路，但溶光街口和对面已拦着一条长绳，吊挂着一张纸，写着“前面危险勿进”，有警察守着不准通出沙基。我向沙基一望，但见死伤满地，鲜血横流，而且刚下过一场雨，尸体湿透，惨不忍睹。有人沿路痛哭寻尸，有“十字会”在救伤，也有法院人员检验伤、死者，收殓尸体者，看来不下几十人。我不禁为之泪下。

听人说，沙面帝国主义者射击我们的都是“达姆弹”，伤口特别大，杀伤力也特别强，也较难治疗。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是惨无人道的。

有人说沙基内街多，当惨案发生，巡行队伍即纷纷各就所近的内街躲避，否则死伤数字更使人惊心了。

我们又向后转出西濠口，但由二马路的天桥（当时有一道天桥横架在路口）下至对面嘉南堂也拦着一条长绳，挂着同样的字条，也有警察守着。虽然出不得西堤，但可见到一艘英舰竟蛮横无理地泊在省港船码头，卸去炮衣，水兵荷枪实弹在甲板上耀武扬威来回踱着。此后我被派到“大良渡”做宣传员，每天我们乘坐的船，都在它身边驶过。大概10多日后，这艘舰才撤出省河。

（1965年）

## “沙基惨案”目击记

李纪麟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广州工农兵学各界举行募捐援助及示威游行，6月23日先集会于东较场。会后工人、农民、黄埔军校入伍生、警卫军、各大中学师生、群众团体等陆续出发，沿惠爱路（即中山四路）到财厅前转永汉路（即北京路），出天字码头，折长堤大钟楼（即粤海关），直趋沙基。沿途都听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收回沙面租界”等口号。

沙面的英、法租界早有准备。他们在水塔顶、屈臣氏汽水厂等高处架起重机枪，环岛布置了电网，集结在白鹅潭的外国战舰也脱去炮衣。当游行队伍进入沙基路时，突然听到西桥“嘣嘣”两声枪响，继而枪声大作，跟着水塔顶及屈臣氏楼上的机枪“咯咯”地向群众扫射，一时东、西桥头、新兴大街口、沙基东中约、十八甫和沙基路面及骑楼底的群众中弹倒地者无数。被击中者的伤口，枪弹出处如碗口粗大，甚至大腿中弹后亦均死亡。长堤和沙基（即今六二三路）转角处有一学生模样的少年，口部中弹，整个面部飞去，只剩下额头。岭南大学教授区励周腹部中弹死亡，该校大学毕业生许耀章阴部亦中弹当场牺牲，这次死难的不少是黄埔军校入伍生和工农群众。

特别要说明的是，英、法租界打过来的枪弹是国际禁用，只可拿来猎凶猛野兽的“达姆”弹。沙基骑楼石柱中的弹孔有饭碗粗大。惨案发生后一刻钟左右，突然下“白撞雨”，受伤者挣扎在雨中和血泊中。我救护队赶到冒雨抢救伤员时，又遇沙面的机关枪扫射。江面英、法等国军舰还开炮助击，以至增加死亡。自枪声响后，巡行队伍与观众挤在一起，秩序大乱，中弹与未中弹

的迫作一堆，眼见从各街口夺路出来的人，不少是满身染血，但幸未受伤。这次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大屠杀，据事后统计，当场牺牲的 51 人，送入医院救治的达百余人，自行回家医治和有些跌落水失踪的，没有计在内。

这次死难烈士，并不是立即出殡，而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宣布国葬。国葬那天，以乐队奏哀乐引路，继而三亭一棺。第一亭为烈士遗像（上书姓名，查不出姓名的几个，均写“烈士无名氏”；没有生前相片的，均以死难后遗体照片挂上，照片放大约 24 吋）；第二亭为烈士血衣（血衣是张开挂的，血衣不论是衫还是裤，中弹处入口和出口都使人看得很清楚）；第三亭为檀香炉（香炉口直径约 30 公分，古铜色，插入檀香，香烟袅袅）；最后为烈士棺木（棺上覆盖着当年的国旗，两旁由各校派出学生护灵），送至东沙路（即先烈路）沙基烈士场安葬，立一石碑，刻有 50 余位烈士的名字。

# 北 伐 战 争



# 梁鸿楷等大塘会议倾覆政府事泄被扣案

林 祥\*

## 一、肃清滇桂军引起腐朽军队的变异

1924年冬孙中山先生北上，由胡汉民代理大元帅职权。1925年1月16日，大元帅府颁发第一次东征命令，指示粤军许崇智、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等，分三路肃清盘踞东江、韩江的陈炯明部，以巩固革命政府。粤军许崇智遵命出发作战，滇桂两军按兵不动，并且暗中与陈炯明勾结，往来密电均为许崇智所截悉。滇桂两军反侧面貌暴露，许崇智正在战斗途中，苏联加仑将军亦随军协助，虽知后方事变，仍冒险前进，率粤军单边直进。幸军事行动很顺利，不及两个月，光复东江、韩江两江地区。粤军许崇智驻防汕头，加仑将军经香港回广州与胡汉民研讨肃反计划。许崇智前后受敌，乃放弃东韩两江地区，革命军奋斗占领之地，重为陈炯明残部林虎、洪兆麟所盘踞，情势所逼，实非得已。粤军回师，5月下旬动员出发，6月16日，将屯聚广州的滇桂两军肃清，革命政府重布新猷，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于广州，取消大元帅制，建立国府委员制。当时汪精卫表现左倾，被推为国府主席，宣布实行孙中山三大政策，胡汉民于中山先生北上时代理大元帅职权，国府成立时论资望，胡当然为主席，但由于胡汉民右倾反共，拂逆世界潮流，以故落选，任为委员兼外交部部长。胡派人物和右派分子，表示不满，四处流言反共，廖仲恺当时为

\* 作者时任许崇智的卫士连长，宪兵营长。

黄埔军官学校党代表，于革命工作为最积极。一般反共分子，常指廖为共产党，肆意攻击，尤以林直勉为甚。

军人方面，有一班高级将领，平日拥兵自重，据地抽剥，安富尊荣，腐朽堕落，不愿革命，觉得滇桂两军实力雄厚，尚且被新兴革命力量解决，殷鉴不远，休然忧心，新改称第五军的福军李福林、失意军人魏邦平、新改称第四军军长梁鸿楷等均如是。梁是政治面貌不清的人物，素与蒋介石不睦的张国桢，和桂军投降过来的新升旅长杨锦龙、新升司令的梁士锋等，于7月间在广州河南大塘李福林家乡开反共倾覆政府的会议，拟首先推翻实力派粤军总司令许崇智、黄埔陆军军校校长蒋介石，重组政府。8月20日廖仲恺、陈秋霖同在惠州会馆被凶徒狙击逝世，当场捉获受重伤的凶手陈顺（绰号“斗零”，意即五分钱），缴获大号曲尺手枪一枝，拿该枪回粤军总部查对枪照存根，知系郭敏卿的自卫手枪，即行逮捕郭敏卿归案。郭系朱卓文的亲信，任梅光培部参谋长，线索牵连，查出系朱卓文、胡毅生所主使，朱、胡闻风潜逃，乃逮捕梅光培到案交宪兵营看管，旋转解黄埔军校广州办事处（造币厂），后经过一段时期释放，郭敏卿则被依法处决。又逮捕胡汉民之兄胡清瑞，问话后当日释放。廖案发生后，追缉紧张，四方八面侦察平日反共分子，专以高级军政人员为对象。李福林恐怕东窗事发，会将他如滇桂军一样解决，于是出而自首，分向许崇智和蒋介石两方面告密，将大塘会议的反动主张和人名和盘托出，许、蒋据报，分由粤军总部和黄埔军校双方同时逮捕和扣留各反动分子。许崇智佯称开军事会议，召第四军军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郑润琦、新编司令梁士锋（忘其军队番号）到总部开会，是1925年9月上旬的时候，当日受召将领准时到达，随同梁鸿楷入总部的有总部舰务处处长招桂章。梁鸿楷入总部，许崇智即传知梁上楼在参谋长室暂坐，着卫士将梁监视，同时发下手谕令宪兵营将梁士锋、招桂章二人扣留。郑润琦在副官

处候见，睹此情形，面无人色，满额大汗，不敢动弹，至当日下班时，许始谕郑师长先回去，改日召见。郑闻之下，甚于皇恩大赦，急步趋出，行至大门守卫宪兵向之行礼，也不知答礼，行离总部二三百步，始掏出手帕频频抹汗，叹气数声，有如惊弓之鸟，此是当时一个紧张的镜头。张国桢、杨锦龙、魏邦平由黄埔军校学生军奉蒋介石命令逮捕，夜间进行。惟魏邦平机警，在楼上见有兵夜间到他的门前，知必有事变，即行逃跑，当晚进入沙面隐避，转到香港，故以漏网。林直勉实非大塘会议人物，但因他平日言论反共，对廖仲恺訾詈最多，亦被逮捕交宪兵营看管。

## 二、涉案者的前因后果

魏邦平，曾被许崇智聘为粤军总部高等军事顾问。孙中山先生对魏甚为器重，曾到魏寓劝魏支持革命事业。魏表示反对国共合作，拒绝中山先生的好意。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魏毫无位置，不甘寂寞，想搞起一场风暴，浑水摸鱼，因此与李福林、梁鸿楷等在大塘开秘密会议，以反共为旗帜，倾覆政府为前提。他的实力以第三师为后盾，但开会时第三师师长郑润琦未有列席，故捕魏而留郑。魏机警漏网，逃往香港。许崇智下野几天后，第三师在东莞全部缴械，也是受魏影响所致。

梁鸿楷，在1917年冬陈炯明成立援闽粤军时期，徐连胜任游击司令，部下有第六、第十两个营，梁是第十营营长，援闽粤军进攻漳州作战途中，徐连胜在永定下洋的大王岭阵亡，梁即升任统领，以营内连长赖冠春升营长。赖是土匪出身，沿途军纪甚坏，克复漳州后，同时第二支队司令许崇智亦占领永安，升为第二军军长，陈炯明司令自兼第一军军长。蒋介石系陈炯明的幕僚，粤军由广东出发胜利占领漳州，作战计划多出于蒋介石所拟，陈炯明有意提拔蒋介石，并因蒋介石自告奋勇愿率劲兵挺进永泰以窥福州，遂以许崇智升迁遗缺的第二支队司令任蒋介石，

拨梁鸿楷两营及丘耀西两营给蒋介石带领进攻福州方面，以展其才。在军次行进中梁鸿楷部勒不严，骚扰散漫，尤以赖冠春军纪极坏，屡遭蒋怒。梁鸿楷在军次中娶一少妾，随营伴宿，部下讥为压寨夫人。师至永泰，梁部轮值警戒任务，梁放任不理，官兵散聚，各开赌档烟局，敌方李厚基军队突然来袭，因四无警戒，被敌直冲入永泰城，无人抵抗，蒋介石几为俘虏，狼狈逃出，行李尽为损失，退回漳州。蒋介石在陈炯明面前又羞又愤，力数梁鸿楷种种不法，致误戎机，请陈炯明杀梁鸿楷及赖冠春，以肃军纪。陈不允，旋任蒋为炮兵团长，使其重新成立一个自己手创的军队。蒋以请杀梁鸿楷不行，愧愤交织，既失体面，又成结怨，蒋且平日在总部骄傲自满，自永泰失败，狼狈退回，备受同僚张国桢冷嘲热讽，蒋于是悄然出走厦门，转回上海。自此以后，蒋不复为陈炯明所用了，并且对陈怨恨甚深，对梁鸿楷极端仇视，这是蒋与梁鸿楷一段结怨极其深刻的历史。1920年来，援闽粤军回粤光复广东。翌年，邓铿组织陆军第一师，邓以粤军总部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梁鸿楷升为第一旅旅长。1922年3月间邓铿在广九车站被凶徒狙击逝世，梁鸿楷升代第一师师长。梁之治军与战绩本属寻常，无足可纪，因两次刺死其顶头上司承其部曲，得以跃升。是年孙中山先生由桂林改道北伐，许崇智率第二军及第一师取道江西北伐，光复赣州。6月16日陈炯明叛变，许崇智回师靖难，梁鸿楷心怀异志，率第一师迁出江西三南向广州陈炯明靠拢。许、陈两军激战于韶关，陈军正在垂败之际，梁派所属部队急速增援，将许部击溃，挽回陈军的败局。是役许崇智因足疾几被俘虏，当时胡汉民亦随许转进，至江西始悉致败的原因。许胡交谈，对梁深恨，笔者当时为许之卫士连长，尝亲闻之。1924年春，许崇智任粤军总司令，梁鸿楷部属乘机推梁为第一军军长，许对待之以礼，遇之以宽。但梁对许当面尚敷衍，背面则跋扈。梁军部于江门，许的参谋李毅为江门警察厅厅长，

梁以江门是其防地，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乘李回广州述职，即派人闯入江门警察厅署抢印，派其弟梁振楷接任。许闻报莫可如何，惟有忍气顾全大局与之协商，使人示意维持政府威信，李毅作为擅离职守免职，另派别员承乏，梁振楷则任开平县县长。第一师第一旅旅长卓仁机，属第一师师长李济深直辖。梁鸿楷以台山县长一缺饵卓仁机，以旅长兼任台山县长，使其直属军部，脱离李济深，李则重新组织一旅，以陈铭枢为旅长。梁以上官与部下争兵权，大失身份，许则听之任之，不加过问。及后政府派刘裁甫为台山县长，卓的部下以欢迎牌的空烟盒砌成欢迎二字架于机关枪上，表示将用机关枪欢迎。刘不敢接事，回报政府，政府莫奈伊何。梁不时赴港与陈炯明的高级将领花酒留连，无敌无我，机要军政在敌方将领面前尽泄无遗。常谓阿公死有得食，阿婆死有得食，表示面面皆通，脚踏两船。1925年第一次东征，梁之嫡系部队未有参加，及至东征胜利，回师肃清反侧军队滇桂两军，革命力量蒸蒸日上，国民政府勃勃有朝气，梁仍骄横跋扈，轻视革命政府，自命举足轻重，奔走运动，联系反动将领，在大塘开秘密会议，企图把整个国民政府推翻，以逞其大欲。事泄被扣，迹其罪状，罪无可逭。但乱世时期，国法往往屈就于环境。当时国府有以下数点不得不考虑：

（一）第一次东征，因滇桂军反侧，不能全部绥靖陈炯明残部，功亏一篑，将东韩两江地区放弃，仍由林虎、洪兆麟盘踞，予敌以重修军备之机，敌焰复炽，如不再事东征，或迁延时日，敌方更为坐大。

（二）陈炯明的琼崖督办邓本殷率师渡过雷州，侵入高雷各岛，蔓延两阳，接近五邑（恩、开、新、台、赤），徐汉臣团由信宜县进犯罗定，有出南江口的动向。革命政府其实只有广州一隅之地，设或杀却梁鸿楷，五邑梁部就会倒戈投向邓本殷，江门一带将沦入敌手，不杀梁鸿楷，可使其嫡系部队不致妄动。

(三) 李福林力请免梁鸿楷一死。李说：“我是顾全大局而告密，不是卖友求荣而告密，如杀了梁鸿楷人皆话我没有义气，有何面目见人呢？”

(四) 李济深系梁的属下师长，为当时政府一个军事重要骨干人物，举足轻重，与梁虽貌合神离，但过去曾得梁卵翼，为感恩心理所驱使，力求宽免梁一死，并痛陈当前利害。

政府审择当时环境情形，虽国法昭彰，不能不迁就实际，因此不杀梁鸿楷。但此偌大案情，也不能任其随便放过，素知梁鸿楷久驻五邑殷富之区，扒钱极多，乃商定责梁鸿楷缴款赎罪，缓梁一死。在梁扣押未几，五邑梁的嫡系部队梁鸿林、周明星，犹不知梁的犯罪内容，误认为卓仁机兼台山县长抗不交代所致，潜师入台山县城，将卓部突袭缴械，卓仅以身免，逃出澳门。周电报总司令，只得“呈悉此令”四个字的批复，毫无内容，梁鸿楷也不见释。1925年10月间第二次东征，周明星率三十四团参加，胜利凯旋广州，在石围塘船上被全部缴械。后枪械交给叶挺成立新三十四团（后改独立团），梁鸿楷的嫡系部队彻底消灭。

关于梁鸿楷被罚款的数多少，当时言人人殊，多属臆断。笔者北伐后回广州与梁振楷邂逅，谈起当年梁的缴款。据振楷说：一共缴款16万元，政府实收几多，不得而知，款项实由四处张罗借贷而来，负上一笔大债务。后来我兄（指鸿楷）与李福林合办防务经费（番摊）获得赢利，悉数清还，并在香港建了一座洋房云。

张国桢，与蒋介石积怨极深。1918年张国桢、蒋介石同隶属于援闽粤军陈炯明总司令幕僚为高级参谋，张常以陆军大学肄业资格傲视蒋，当面说蒋学问不如他。援闽粤军占领漳州作战计划，均出于蒋的手拟，因此蒋在粤军中颇负盛名，张更不服。陈炯明在漳州任蒋为第二支队司令，率梁鸿楷、丘耀西两部向福州方面进攻，蒋不幸在永泰失败，狼狈退回。张国桢借此对蒋大加

奚落，蒋张两人怨恨更深。蒋以陈炯明不接受他杀梁鸿楷以肃军纪的建议，愤然走回上海。迨至 1920 年秋粤军回粤，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率部担任右路军作战，与桂系部队沈鸿英及滇军改编的海疆军李根源鏖战于河源、回龙一带，进退得失者屡。魏邦平与李福林在广州独立响应粤军。沈、李退却，右路军许崇智乘势追击。许以激战数旬，露营感冒病重，不能行动；适蒋介石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特来襄助，许即命蒋为右路军前敌总指挥。笔者亦临时派人指挥部供职。蒋率谢文炳、谭曙卿、张国桢三部为先头追击部队，谢、谭两部均能依令进止，惟张国桢屡拂蒋意，并在公文中对蒋故意表示轻视。蒋不胜其怒。师至清远，指挥部抵龙塘，张国桢部进至清远城，张又以公文触蒋怒。蒋愤然在一天内兼程回到广州，在长堤八邑会馆第二军军部见许崇智，力数张国桢不服从指挥，许平日对张也器重，为之缓颊，蒋又怫然走回上海。1922 年许崇智回师靖难，由韶关转进，占领福州。蒋介石重来许部任参谋长，张国桢也来福州，许委张回粤收编流散军队，蒋极力反对用张，张、蒋又再加深一层怨恨。张离福州，蒋亦回上海。至 1924 年许崇智在广州任粤军总司令，蒋介石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兼黄埔军校校长，大触张国桢的嫉妒。因此参加大塘会议倾覆政府，其主要目的实想倒蒋，实非对许。蒋自据李福林告密，怕许崇智放走张国桢，即派黄埔学生军在广州麦栏街将张逮捕。张国桢于蒋有新仇旧恨，不能逃出一死。

杨锦龙，原是桂军投降过来的团长，后升旅长，常用轮船在珠江口外与外轮接驳大批烟土入口。杨实系一个高级军官兼大烟土商，只知升官发财，无所谓革命。他怵于滇桂军偌大力量反侧，尚且肃清，自知多行不义会及其身，平日谬论反共，因之参加大塘会议倾覆政府，妄图浑水摸鱼，事泄后为蒋介石逮捕杀却，军队被缴械。

梁士锋，原系桂军炮兵营长投降过来。他因为炮兵局限于武

器和编制，不能发展，请求改为步兵，扩展部曲，许崇智委他为司令（忘其番号）并拨发枪支数百，他平日腐朽堕落，只知升官发财，反共谬论激烈，大塘会议事发，扣留于宪兵营。他以重金贿守兵共同逃脱，被发觉转解黄埔军校依法杀却。

招桂章，随梁鸿楷一齐入总部，与梁同时扣留，外间皆谓与梁同案犯法，其实不然。招桂章原系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因第一次东征，他留在广州。许崇智回师围攻滇军时，招在宝璧舰获有一批烟土（数目不清），据为已有。因分赃不匀，有人向许崇智面前扩大烟土数目告密。许以数目庞大，足以军需之资，责成招如数上缴。招以数目过巨超出事实，畏惧不敢返公，久想亲自向许当面申辩，怕许不信，反而受到扣留。在外彷徨数月，招与梁鸿楷有夙交，闻梁鸿楷入总部会议，随梁同入总部，托梁面向许总司令转圜。岂料梁鸿楷当日被扣留，同时也将招交宪兵扣留，转解黄埔军校，后来释放。

林直勉，在宪兵营优待看管。直勉为同盟会会员，在国民党历史甚深，曾任孙大元帅的秘书。1924年冬，孙大元帅北上，以胡汉民代帅，直勉则为胡的秘书。胡、林两人乃是老同志，素称莫逆，也是两位一体的反共极右分子，常以谬论攻击廖仲恺。廖案发生后，以嫌疑被扣于宪兵营。林直勉是一个肺痨病者，特辟一优待室在总部会议厅楼上（即今之革命历史博物馆），因其地位高，并且有关国策问题，非普通法庭可以审问，国民政府特组织一个特别法庭审讯之，地点在粤军总部，以朱培德、谭延闿、李烈钧为法官，推朱培德为审判长，以宪兵营长为护庭法警。林直勉上庭，朱培德问其何以肆意反对国共合作。林直勉答：“共产党比之一株花，国民党一个花盆，国民党容共，无异借盆种花，将来将花培植灿烂，花根落地，国民党之花盆必爆，是以反对。”朱培德驳直勉：“先总理革命数十年尚未成功，事业艰巨，鉴之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及共产党党组织的优良和严密，

比之我们国民党内部之散漫，人各为政，确有不及俄国之处。先总理有鉴及此，订出政策，向革命前途发展。你看几个月来肃清反侧军队，成立国民政府，朝气蓬勃，你所见的。你是先总理久同患难的同志，先总理的信徒，先总理逝世未久，你就反对国共合作，这是背叛先总理的。”直勉语塞，乃宣布退庭。9月20日许崇智下野，林直勉被总部的学生军接管。后来送炮台羁押一个长时期再释放。

以上叙述各案，被逮捕拘押的人员，发生的时间，在8月20日廖仲恺被刺后至9月20日许崇智下野前一个月内，许下野各案未结，全部由蒋介石处理。《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第51页，罗翼群先生说许崇智下野一节，称先后派兵分别逮捕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关道、李基鸿、江维华、招桂章等八人，于事实系有先后倒置，按梁鸿楷、张国桢、杨锦龙、梁士锋、招桂章等五人，系许崇智下野前任内所扣留逮捕的，不是许崇智下野时被蒋介石派兵分别逮捕的。本案系笔者任广东宪兵营长驻在总部亲历其事的。至于关道、李基鸿、江维华三人系许崇智下野时离职，我之宪兵营长亦离职。本案系大革命时期军事政治一大转捩，合应纪述，以备治史参考。

(1965年)

## 有关张国桢的若干情况

叶少华 \*

关于我所知道的张国桢的一些历史情况，我曾在《广州文史资料》第8辑《关于廖案的一些再补充》一文里谈过，当时谈的主要是与廖案有关的一些事情，关于张国桢本人的情况谈得较少，特别是关于张国桢被蒋介石扣押杀害的经过，谈得不够详细，个别地方在细节上还有记错了的。现凭记忆所及，再谈谈有关张国桢的若干历史情况，作为前文的补充。李朝彦先生和我过去都是张国桢的同事和朋友，李先生的忆述激起我更多的回忆，我写这一篇也算是对李文的补充。两人所述，在某些细节上有一些出入，在我说来，不敢言校订，尽所知提供参考耳。

### 一、张国桢是怎样当了东路讨贼军第四军军长的

1918年，张国桢与蒋介石同在援闽粤军总部任参谋，粤军占漳州后，张被委为永定县长。嗣粤军受命回粤，驱逐桂系，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邀张为己助；张乃命永定县府总务科长代行县长职务，自己就任许的第二军卫队司令。作战时张曾担任第二军命令传达所所长代许指挥。其时蒋介石以总部参谋任第一军命令传达所所长，代陈炯明指挥一部分军队。张、蒋二人，此时已经常磨擦。一次拟定作战计划时，蒋以红铅笔在五万分之一的地图上画了一条线，指定某部依时赶到线头所指的地方。张问何时赶到，蒋答明天，张说：“不要说打仗，走也要走三天，你铅

\* 作者时为东路讨贼军总部军法官，第四军军法处长，张国桢之友人。

一笔一画是容易的。”两人意见分歧，诸如此类的事情很多。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委粤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陈炯明为陆军总长兼广东省长，同年6月，以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时许崇智以第二军军长兼任援桂军右翼总指挥，张国桢为许部第二军第八旅旅长。张在援桂时率所部与沈鸿英作战，进驻广西贺县，沈死守贺县属之八步，双方相持不下。时第八旅有一参谋胡朝俊（章民）曾当过沈鸿英的参谋，深得沈的信赖，因建议收编沈军，约了沈、张二人在八步会面。蒋介石派的人深恐张收编沈部（桂系主力，不下万人）增大了势力，于是大肆向张攻击，迫使立即作战，否则以通敌论。这一着使张十分难忍，陈炯明与许崇智对收编沈军的事，虽是知道的，但也无可奈何。后来条件未成熟，收编一时不能实现，蒋介石这时又唆使第八旅的一个团长孙本戎与张为难，张虽有所部许济（许崇智之弟，亦第八旅的团长）的拥护支持，但孙本戎恃有蒋介石作后盾，与张磨擦，张乃愤然辞职。

张辞旅长职后，在第二军军部挂名总参议，是个闲职。数月后，陈炯明委张为军官研究所（设在黄埔，即后来军校地址）所长。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率军回粤，取道韶关，继续北伐。是年6月，陈炯明叛变，围攻总统府，时许崇智部已进入赣州，闻讯回师，在韶关被击败，遂转道入闽，后得北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之助，进占了福州。当陈炯明叛变时，军官研究所解散，所有官佐和学员分在广州市各区组成军警督察处，负责督察任务，此时张已闲居。许崇智进入福州，就在福州就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仍自兼第二军军长。张国桢以后也到了福州（详下文），中间经过一段曲折，才就任东路讨贼军第四军军长，那是陈炯明被滇桂军逐出广州时的事。

许崇智就任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蒋介石充任总司令部的参谋长。为了说明张国桢就任东路讨贼军第四军军长的曲折过程，

这里先忆述一下许崇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内几个人对蒋介石不满的情况，这些情况和张国桢以后的出处有关。

蒋介石有个随从副官冯启民，原系前清东北镇统、反正后任东三省都督的蓝天蔚处任职，护法之役蓝天蔚任滇、黔、川、鄂联军总司令，冯任蓝天蔚的副官，我当过蓝的参军，与冯相识。冯曾向当时福建总司令王永泉告密说我在援桂时曾充马育航主持的广东经济委员会的参议，指我为陈炯明的人，钻到讨贼军总司令部来，企图逐我。王永泉据冯的密告，竟然写了一份公函给东路讨贼军总部，指名道姓的要许崇智清查。我当时是总部的军法官，这份公函就落到我的手里。我不便自己办自己，批了个“呈阅办理”四个字，送给许崇智。许崇智和蒋介石有没有看，我不知道，但事隔半月，没有下文。我继续催办，想弄个水落石出，当时第二军的参谋长罗翼群对我说：“这些事何必理它。”以后也终无下文。我曾经一连上过两次辞呈，第一次许崇智批了个“慰留”，第二次批了个“恳切慰留”。但我以王永泉的这份公文不作处理，再留在总部也没有意思，因此决心离开总部，买船票到香港（当时广州是陈炯明占据的，我不能回广州）。

在我未离开总部之前，李章达又被冯启民诬告，说李在滇军做过事，不是粤军的嫡系。这是护士营一个连长韦就在护士营告诉李章达的。护士营营长蒋光鼐听了怒不可遏，拔出身上佩带的左轮手枪要去把冯启民拉来在蒋介石面前打死，让蒋介石看。我怕这事牵连到我，连忙向蒋光鼐劝说：“等我走了，你们再打！”李章达也夺过蒋光鼐的手枪，阻止了蒋光鼐，并向我说：“我们一起走吧。”

原来李章达也有过一件事，触怒了蒋介石。有一晚，福建省省长林森派个秘书到总部与蒋介石长谈，谈到凌晨2时许，这位秘书要打电话回省府，走到蒋介石的对面房，即副官长李章达的房里去打。时李已熟睡，为这个秘书摇电话时吵醒了，连问了多

次“何人何事？”那位秘书不知是由于听不懂广东话吧，还是正在讲话，对李的话竟不作理会。李见没有回答，忽然披衣起床，打了这个秘书一顿。秘书挨了一顿揍，作为主人的蒋介石认为十分难堪，乃向许崇智大发脾气，但又无可奈何。因为李在陈炯明叛变时任总统府警卫团第二团团长（原是一个团，团长陈可钰，李本为陈的副团长，后分为两个团，陈任第一团长，李任第二团长。叶挺、张发奎、薛岳、蒋光鼐等当时都是营长），死守总统府，弹尽逃出，间道到闽，是孙中山先生要他来帮助许崇智的。李到闽后，虽然蒋介石主张仅委李为中校副官代理副官长，但许对李却相当尊重。在军事时期，那位秘书未先征得房主人的同意，深夜贸然闯进房内，虽挨了打，也不能取得人的同情。因此许对李之见嫌于蒋，内心是同情李的，蒋自然无可奈何。此后一两天的一个早晨，李章达、李扬敬、司徒非和我几个人在总部办公厅外晒太阳取暖，蒋介石走来，四个持驳壳枪的卫兵跟着他。我当时靠着一根柱子，蒋没有看见我。蒋介石指着司徒非说：“司徒副官，参谋长办公了，你们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这句话，当然不只是说的司徒非一个人，司徒非当时以声音不大不小的广东话说：“你信不过我们，我们也信不过你的卫兵！”原来这句话是大家积愤已久的话了。我们常见蒋介石带卫兵上办公厅，很不顺眼，由大门口至办公厅有三重兵守卫，他还要带着卫兵上办公厅，而许崇智本人则从来没有带卫兵到办公厅。司徒的意思我们都懂得：卫兵带了枪在办公厅是可能走火的，当然信不过。司徒非当日就上了辞呈，辞职不干。从来总部绝少批准人辞职的，这次却即时批准了，显然是蒋介石的主意。

我当时决心离开总部，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当时第二军的旅长张民达在入福州时虏获了北洋军李厚基部5门炮，蒋介石要调出这5门炮给顾祝同编为炮兵营。张大为不满，买了一张船票，到总部联合办公厅来，坐在我的办公台边，边举着船票边向我

说：“这 5 门炮是我用命搏来的，打仗从来不见参谋长，现在打胜仗就跑来，要我从敌人手里抢来的炮！我这个旅长不做了，我要到上海找孙先生去。”蒋介石的办公台与许崇智的是一排，离我的办公台不过丈余。张民达每到办公厅来总喜欢坐在我的办公台旁闲谈。他这一次的这种做法，又是在我的办公台边说的，我因此恐蒋介石疑我与张有什么关系，更促成了我离开总部的决心。后来蒋介石去上海，是与张有关的。

这样，我们几个人：李章达和李扬敬决心不辞而走（李扬敬是李章达的堂兄弟，曾任警卫团连长，当时充上尉参谋，李章达决心要走，他也觉得留下没有意思，也决心走）。司徒非则呈辞了便走，我则是请辞不准，也非走不可。我们 4 个人一同离开总部，到南台准备搭船回香港。蒋光鼐知道我们没有旅费，卖了两枝私人的驳壳枪给李福林部（李当时是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得领 400 元，送给我们做旅费。他还向我们表示，他也想走，但带兵的和我们不同，不能说走便走。正在这时，廖仲恺也到了福州，又送给我们 400 元旅费。张国桢也来了，他知道我们对蒋介石不满，对我们说：“你们回去很好，我正与汝为（许崇智字）商量要做策动陈炯明部队的工作呢！”他还表示，陈炯明的部队，他有办法拉过来。廖仲恺也嘱我们回广州要密切与张国桢合作。这样，我们离开总部时，把东路讨贼军总司令的一颗大印带到了广州。

我们在香港与张国桢会合后，就与张国桢原第八旅旅部参谋胡朝俊和邓仲元的妻兄李兰生一共 7 人，一起乘轮回到广州。我们在香港的德国人开的加厘洋行接头，租了该行在沙面的一间房子，到广州时，由一个德国人名叫加厘的驾一只电船把我们接到沙面，不用经过码头。我们租的那间房，原来是洋行里的厨房，又狭隘又潮湿，只好将桥凳架高了床板，将整个房间铺平，日间盘膝而坐，开会、吃饭，都在铺上。尽管如此，我们每月还要付

240 元的房租。陈策和张惠长也都各租了一间工人房，都在我们的隔壁，同样是每月 240 元的房租。陈炯明的部队，除叶举、洪兆麟、陈炯光等是陈死党外，多与我们有所联系，如师长梁鸿楷、熊略，旅长何国梁，统领杨锦龙，炮兵营营长梁若谷（驻观音山）等，都有密切往来。他们在陈炯明那边开了会，就跟着到我们这边来商谈了。记得有一回，梁鸿楷的第一师表示要与魏邦平的第三师一致行动，理由是第一师接受过魏邦平的 8 万元军费，而且以后还要靠魏的接济，不能不联系在一起。张国桢因此叫李兰生找了邓仲元妻李顺春去责备梁鸿楷说：“难道你竟因了 8 万元便出卖了第一师吗？”当初邓仲元遇难，梁鸿楷接了邓仲元的第一师时，陈炯明曾给予邓妻 10 万元算作恤金，李顺春这时还向梁鸿楷表示，愿拿出这笔恤金来给梁充军饷。后来张国桢派我到香港向古应芬要了 8 万元带回，大部分都给了第一师充军费了。

其实第一师要与第三师一致行动，并非完全因为军费问题，张国桢不过以李顺春来激励第一师的军心罢了。张国桢和我们当时曾多次谈到，企图用第一师和第三师来阻止滇桂军东下，时滇桂军集结梧州一带，待命东下，进取广州，许崇智部也正准备由福建回师。陈炯明部下既已被我们策反，内部分崩离析，大有朝不保夕之势，这种情况，第一师和第三师也很洞悉的。第一第三两师的地盘在西江至四邑一带，他们如果不一致行动，先取广州，则滇桂军从他们后面推进，他们的地盘势必保不住。如果按兵不动，让滇桂军先取广州，政治中心为客军掌握，他们也心有不甘的。他们这种想法，正合了张国桢的意图，张计划最好由陈家军迫陈下野，暂由他维持局面，并以第一第三两师握守西江，阻止滇桂军东下，请许崇智兼程入驻广州。张的计划没有完全实现，1923 年初，陈炯明被迫退守东江，但第一、第三两师运动较慢，滇桂军急速迫进广州，当滇桂军抵达市郊时，我们由沙面

很快便进入市内，并在东堤原第一师司令部（高州会馆）贴起了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部驻穗办事处的招牌，派一排人驻守。第二天，滇桂军进入市区，我们办事处的一排兵被滇军缴了械，连办事处的招牌，也被滇军拆了下来。我们从此就搬到大佛寺，以东路军受阻一时还回不来，张国桢便请准在广州成立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行营，张被派为行营主任，并以收编的杨锦龙、梁若谷等部编为第四军，张国桢兼任军长。当时行营参谋长是何振，副官长冯次淇，军械处长萧樾，军法处长叶少华，军需处长李兰生（李后调顺德县长，军需处由叶少华兼任），军医处长梁次尹。冯祝万、冯宝琛（祝贤）、冯宝桢（秩裴）、胡朝俊、王应榆等都是行营的上校参谋，但三冯没有担任什么工作，不久便到第一师李济深处去了。

这里补叙一下当时的一些琐事：

当张国桢和我们住在沙面加厘洋行时，陈炯明的侦探长黄福芝派了不少人在沙面附近侦察。加厘洋行近沙面东桥，我们的联络人员则特从西桥出入，以避免他们的侦察。我常到香港去付款，都不敢进出东桥或西桥，而由加厘亲自乘一只小电船，把我从河心送上省港船去，回来时也由他亲自驾电船来接，都不经过码头。他身上插两枝碌架手枪，保证我们安全上落，但每次每人要收“保护费”20元。

我们运动陈炯明的旅长何国梁时，曾刻了一颗“东路讨贼军第×师”（番号忘记了）的关防，又以带来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的大印，盖了一张委任状，连同新刻的师长关防派林小亚（张国桢第八旅时的副官）送给何国梁。林把那个关防包裹在一盒西式糕饼上面，作为送礼，送给何国梁。不料何不肯受印，只表示大家有动作时，他决不再帮助陈炯明。林为了避免路上危险，坚不肯把印带回，一定要何接受。何无法，只得派了一部小汽车和自己的卫兵护送林小亚把那颗关防带回沙面。

我们住的小房，因为人多，大家都坐在床上。有一回，用了印后，照例将印仰置床上，我当时忙于摺叠文件，那天发出的命令和委任状颇多，我竟坐在印上，印文印在我所穿的一条白裤子上，清晰可辨，直至傍晚在东桥附近散步时，才被发觉。这条裤子我还保留了许多年，用作纪念呢！送印给何国梁后的第三天晚上，我们在沙面外边即沙基一个小客栈里的联络点被陈炯明破获了，有6个人被捕，遭到杀害。林小亚原也在联络点出入，这一晚幸而回到西关的家里住，没有遭到捕杀。

至于上面所提密告了我和诋毁李章达的那个蒋介石的随从副官冯启民，后来在刘震寰部做旅长时，被蒋介石抓来枪毙了。

## 二、蒋介石对张国桢早萌杀机

1923年2月，孙中山先生回到广州，不久组织了大元帅府，蒋介石不久也到了广州。当时陈炯明退守东江，还不时向广州反扑。一次陈军洪兆麟部攻至石龙，滇军不支，败退至石滩，孙先生原想赴石龙督师，受阻退回。当时我与张国桢等人正在南园午餐，席间，吴泽理（归侨，曾充许崇智的护士营长）匆匆来告，说：“孙先生已回来，闻卫队身上也沾有血迹，你们还不回去布置！”我们听了，立即回到司令部。当晚不知为何，沿铁路有退兵不少，由石牌至农林试验场附近，都有发现，我们派出去的担架队，也为退兵所阻，不能通过。翌日，大元帅府得有情报，说有人亲见张国桢临阵退却，蒋介石因此请大元帅下了手令着就地枪决。这手令交邓彦华带给吴铁城执行，邓彦华与冯次淇是好朋友，以此事告诉了冯次淇。冯得悉，即随张国桢立赴前线。原来张的部队在前线仅千余人，且已另有人指挥，所以这次战役，他没有到过前线。张国桢和冯次淇坐了汽车向东驶去，到农林试验场附近，忽然车坏了，正打算下车步行间，吴铁城到了。张与吴说：“那边不要紧，打算到这边看看，车坏了，只好步行。”吴

说：“我到此处为止，你们坐我的车去吧。”张去后不久，邓彦华把手令送给吴看，吴说：“星羽（张国桢字）坐了我的车前去的。”乃电话报告孙中山，手令仍由邓彦华带了回去。

后来冯次淇和黄惠龙经常谈到此事（黄惠龙与马湘是孙中山随身的随从副官）。可见蒋介石对张国桢，早在廖案发生的前两年，已萌杀机了。

### 三、张国桢被扣押枪毙前后

1925年8月20日即阴历七月初六日，廖仲恺遇刺，当夜胡汉民被扣，次日即初七日张国桢被扣。张在被扣前，许崇智曾命张到惠州点编杨坤如的部队，杨坤如派其弟杨牯仔（启明）驾电船来广州接张前往惠州。张在被捕的当天晚上还与何振、胡朝俊和我等八九个人在陆羽居吃晚饭（陆羽居在今一德路天主教堂石室之左，不是后来太平南路的陆羽居），未开席时，副官处长冯次淇匆匆来告，说许总司令要派一排兵到张家保护张国桢。冯说这话时，是把张拉到陆羽居骑楼临窗处说的。冯语毕回到席上，有人问冯：今午是否扣留了杨锦龙、梁士锋？冯支吾不答。我们留冯一同吃饭，冯说，尚未开席，不能久等，而叫了一碗面吃。面送到时，他夹了一箸，说有蟑螂味，放下筷子便告辞了。这时何振问张：“为什么少田（冯字）这么慌张？”张这才告诉大家说：“许老总信我不过，要派一排兵保护我，我家里一母一妻，住不了一排兵，要监视我，派一班人已嫌多了。”胡朝俊听了，把袖子一拂，竟把烟床桌上的茶杯碰倒，跌到地上打碎。我们知道事有蹊跷，便商量张要不要去见许崇智。原来冯传达许的话时，还约张明早在总部会见的。明早去不去？今晚要不要避？都成了我们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当时大家的意见，不外是：如明早要去见，今晚不避也无大问题；但今晚如能在别处住一晚，看清情况，岂不更好？当时大家都在许的身上猜测，没有想到蒋身

上。大家最后主张，当晚张国桢不要回家，可在军医处长梁次尹家暂住一宿。梁家在宝源北街 18 号，屋内有花园，屋后有濠涌，地方广阔，别人不易察觉。但张不听大家意见，饭后终于回家。当张走出陆羽居时，还对我们说，要到永汉北路中华书局买书去。

据张妻（现在广州为某托儿所保姆）说，张当晚回家（在永汉南路麦栏街）已是晚 10 时已过了。张刚到家，解下外衣，便有人拍门。张着短裤亲往开门，来者是他前第八旅的属官（是不入编制的官衔，相当于后来的附员）、当时驻在钱局（今黄华路）的团长沈应时。沈叫了声“军长”（按张被捕时的职衔是南路八属剿抚总指挥，沈当时仍以旧职呼之），随说：“蒋参谋长请你去坐。”旋随张入内屋，张说：“等我洗洗脸。”沈与二兵拔枪跟入洗脸室，不久便把张押出寓所。张离寓时，见门里屋外，甚至房顶上都已有了伏兵，说了一句：“什么事竟搞到这样！”便被押到钱局沈应时的团部去了。张当晚在沈团部受了刑讯，是沈部一个连长出来说的，已忘其姓名。

翌日，张家人拟送些衣物去，冯次淇报告许崇智，许嘱加送加力香烟六罐，牛奶罐头及饼干若干，好像还派了总部的萧副官和张部的副官黎华伯，持了总司令的条子到钱局去。萧、黎到钱局时，始知张已被解到黄埔，二人又转到黄埔，遍查不知所押。辗转问讯，最后，萧见蒋介石出来，便向蒋说：“总司令叫我来见见张军长。”蒋说：“张军长连我不能见，你想见他？”接着连说了几个见不得见不得。萧无法，只好把衣服留下，把香烟饼干等带了回来。

张国桢被扣押杀害的情况，我在《广州文史资料》第 8 辑《关于廖案的一些再补充》一文中所不及的，这里作为补充如上。那篇文里，我把为蒋介石送船票的人误为刘峙，其实这个人不是刘峙而是许济师的参谋长蒋伯诚。至于在送船票之前，为蒋送信

给许的人，是陈铭枢，那篇文里没有提及，现在补述一下：

许崇智到上海后曾在家里做生日，自拿电影画机为我们拍摄影片。他对陈铭枢送给他的那封蒋介石的信，念念不忘，曾向我说：“老蒋的信叫我暂时离开部队，等他把部队整好，三个月后要叫我回去。现在时间将近三个月了，相信到时是会叫我回去的。”听了这话，忘了在座的是谁曾这样回答了他一句：“连你的兄弟许济都被解了兵权，你还能回去吗？”当时沈应时已升了师长，到沪医病。一日，黄范一（张国桢的副官）与冯祝万、冯次淇、龙思鹤和我几个人在上海东亚酒店开了房玩，黄范一说：“沈应时拉了星羽下毒刑，实在可恶！我认得上海青红帮，不如大家凑足两千元，乘这时把沈应时整掉。”我们不赞成黄的意见。沈后来不久回到广州，突然暴病而死，有人怀疑与蒋有关。我们在许崇智面前谈到张国桢的下场时，许曾喟叹说：“当时我叫少田去关照，说要派一排兵去保护他，他为什么不走掉呢？”

（1965年）

# 我所知道的张国桢和张被蒋介石杀害的经过

李朝彦\*

笔者与张国桢是广东陆军速成学堂同学，又曾一同在援闽粤军工作，后来笔者调在吴泽理第三警备司令部幕僚处，仍与张时相过从，后又一度做过张国桢第四军司令部参议。1925年夏秋间，曾目睹蒋介石为了篡夺许崇智军权，阴谋先把张国桢杀害，其手段之毒辣，颇令人惊异。今把我所知道张国桢生平一些事迹与蒋张发生矛盾的经过，记述下来，以供参考。

## 一、我所了解的张国桢

张国桢，字星羽，广东南海人，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毕业于广东陆军速成学堂第一期，同期新旧毕业的有黄任寰、李济深、陈国伦、苏慎初、何国樑、翁式亮、李朝彦等90余人。

张为人性格豪爽，好任事，在学堂期间，每好串房过舍，到处奔走，十分健谈。同学们给他一个绰号“老鸡乸（老母鸡）”，形容他到处飞扑，这也说明他的活动力强，大家或简化了叫他“阿鸡”。张形貌癯瘦，鼻有红根，很像猴子，后来他自刻有八个字的印章，内有“猴形鸡号”之语，不以为讳。

张的模仿性也是很突出，常常模仿教官的言行，引以为乐。如术科总教习日人井上璞，学术不错，穿起军装来，行动威武。张尝仿其状，以芦花作鹖冠，曳木当长剑，操其正步，令人捧腹。又如学生营管带王体端，东莞人，说起京话来，口音不正，

---

\* 作者是张国桢的同学，曾任张国桢的第四军参议。

常闹笑话，张也好学其口吻，声音一出，便惹得哄堂大笑。因此，有些教官认为张的举止轻浮，而同学们却觉有他在，空气便活跃起来。

毕业后，张做过排长，不久，又考入北京陆军大学，学习了几个月，不感兴趣，自动退学。当时军人都认为能考进陆大是好出路，有人问他为什么退学，他说：“读几年大学出来是带兵，今天也是带兵，何必再熬几年。”他还认为陆大的学科，自学也能得到。

在龙济光盘踞粤省时代，粤籍军人是无法插足的，因此张也落拓了几年，四处奔走，找不到适当的位置。

1918年陈炯明的援闽粤军总司令部成立，张任参谋，随军出发潮梅，经常到各处支队司令部联系，有时为许崇智筹谋划策，颇合许意，因而为许所赏识，以后转到许部任职，成为许的亲信助手。

在援闽军胜利，占有漳、汀、龙各地期间，陈炯明委张国桢为福建永定县县长。不久，张认为小小县官，不能施展抱负，辞官而去。

1920年秋，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率粤军自福建回粤，驱逐桂系。经五个多月的苦战，克复广东全省。在这时期，张在粤军第二军司令部当传达所长，在前方代军长许崇智指挥军事的任务。

1922年，援桂之役，许崇智为援桂军右翼总指挥，张国桢为第七旅旅长。

厥后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许崇智回师讨陈失败，随得福州，孙任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张国桢升为第四军长。迨滇桂联军由江西东下讨陈，进兵广州，同时孙命许军由福建挥军西进，许崇智特派张国桢先回广州部署，组设办事处于广州市大佛寺，为许军部负责一切联络事务。就在此时，笔者也被邀当了该处的参

议。张很注意广罗军事人才，收为己用。在那时军饷来源是艰难的，但军部还以谘议、参议等名义，安置不少人员，各给月薪百数十元，优礼有加。有一次他的左右认为虚糜公款，他说：“你知道什么！在这戎马纷争的时候，需要时一件任务的完成，说不定价值万金。”

同时张国桢也注意收容敌人的军队，削弱敌对势力，有时是不惜巨资的。我在那时就曾替熊略军作中间人，后来虽因情况变化此事没有成功，却可说明张国桢是有他的政治手腕的，在当时粤军中，是比较有头脑的，同时也可见他对陈炯明方面的一些态度。

当陈炯明军事失败，退出广州，大部分已退到东江一带。这时陈军熊略部队，孤军退守从化，进退失据，军饷无着，为了找寻出路，派其团长张寿来广州，找到笔者说：“我临行时熊军长对我说：不忍自相残杀，导致地方糜烂，愿意拥护孙先生。目前饷粮告竭，处境极端困难。对广州情况不明，嘱我向联军司令魏邦平或东路讨贼军司令许崇智商讨办法。”我说：“魏联军总司令既无实力，亦无财力。许尚在福州未回，他的第四军长张国桢已到广州，我可以介绍你见见他。你可带有熊军长的信件？”张寿说：“没有，但熊军长嘱咐过，只要枪口不向陈炯明，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至于如何进行，他嘱可以和我商量，便宜办理，不必请示。”我便引张到大佛寺见张国桢，重述来意。张国桢说：“公续（熊略字）的处境，我是知道的，本来陈军都应该消灭，但公续的部队，还比较好，我也有意想保全他的部队。但我并不是要求公续处我之下，不过目前还是在敌对的地位，如果他没有表示态度，我怎好接济他？”我说：“那应该由熊名义通电拥护孙先生。”张寿说：“通电可以，但对陈炯明怎样措辞呢？”张国桢说：“无须用对陈炯明过不去的话。”因即起稿，发电两通，一致孙中山，一致许崇智，大意说率部退守，听候处置的话。

发电后，张国桢即派员携款四万元，随张寿到从化前线劳军，一面命令熊军向东移动与许部西下部队会合。

熊获接济后，引军东行，至河源附近，知林虎部队，扼守河源。熊与林虎有夙嫌，不敢冒进，按兵暂守，而军粮咄嗟立尽。熊轻骑简从，往梅县家乡筹款供军食。回时，林虎已知熊的行动，派出他部猛将“三黄散”之一的旅长黄业兴，拦途截击。可巧熊、黄之间，过去却有一段因缘：先是援桂之役，黄业兴所部桂军战败，改编时熊略曾有帮忙，今次相遇，竟演华容道放曹操故事，指熊绕道铁场回去便妥，余无别话，黄便勒马掉头而去。

熊虽照嘱安然返防，但许军久不到，向东前进，又有林部截击，而军中伙食仍有问题，会陈部军长杨坤如从惠州来信，约熊移军到惠州外围之间，保证供应军食。熊为保全实力计，命所部向惠州靠拢，本人旋往香港，向各方面活动。

随后张国桢赴汕头见许崇智，许问：“熊略军队未有改变旗号，态度模糊，究竟怎么一回事？”张答：“熊军处境有困难，想谋夺他的部队的人很多，主要都是为了伙食问题。”许又说：“现在怎么办？”张说：“如果有军饷接济他，或者还有希望的。”许说：“那就牛死送牛丧吧！”命其弟松年再携数万元给熊军。

当熊略留居香港时，住不久，叶举从天津会见曹锐回来，找熊密谈，熊到此便又决心回防，复归陈炯明。我得到这些消息，知情况有变化，走告张国桢说：“看熊略态度摇摆，恐怕会被骗，我也犯了嫌疑。”张说：“大家都被公续骗倒的。”我说：“如果不是你我相知，这次连我也要‘走山’，不敢来见你了。”张亦为之一笑。

自陈炯明失败以后，粤军中将领，以许崇智威望最高，当时有些陆大派的军人，如冯祝万、冯宝桢等，都搞他的小集团，推李济深为粤军首领。张国桢有一次和我们闲谈，说起李济深时，他说：“现在有人想推李济深在广东做阿哥，几时轮到（他），

你问下毒是‘贵省’的呢？”（意指李是广西人）以张当时的地位，在众人中，这么口轻轻地不假思索而且有尖刻的味道说出来，我也为之愕然。而张隐然以粤军第二把交椅自居，也是很显然易见的。其实他和李济深没有什么过不去，只是自视太高，不免冲口而出。

据我所知，张国桢不仅对同辈的军人是如此，就是对政治上有地位的人物，有时也是如此。有一次，大元帅府秘书长古应芬踵门拜访，照理张不过一名军长，而古是国民党的元老重臣，张却对传达的人说：“你说我外出罢！”言时声音洪亮，为门外的古应芬听闻，懊丧而去。我向他说：“你为什么不见他？”张说：“这个烂大鼓（吉的混号）有什么用。”其实古这时正到处拉拢军人，加以扶植而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的。而张之对这些政治人物，也似乎看不在眼里。

张国桢生长广州西关，父母早丧，只有一姊。读过几年私塾，便考进陆军速成学堂。在他落拓的时候，连生活有时也难于维持。当他生活安定的时候，却好读书，家里购到的古籍也不少，虽然他读书多是涉猎性质的，但凭着几分聪明和记忆力好，聊起来海阔天空。他好音乐，但不喜欢丝竹清唱，而爱大锣大鼓，其性情爱热闹，从生活中也可以看出来。

## 二、张蒋的矛盾

张国桢和蒋介石的矛盾，是在援闽总司令部时开始的，是时司令部参谋长是邓铿，蒋介石和张国桢同在该部充参谋，蒋是上校，张是少校级。邓铿以兼任右翼军总指挥，经常出驻防地，总部参谋工作蒋与张常有直接接触，而意见多不相投，每见议事时争论至面红耳赤。张本有谋略，但其英华外露，不为之下。而蒋则阴沉奸险，气度狭隘，二人的矛盾，自然与日俱增，日后的猜忌摩擦，早以暗伏于此。

当时同在参谋部的陈国伦和邓以麤都曾对我说过：蒋介石拟出来的作战计划，时时打败仗，又不肯接受旁人的意见，刚愎自用，而蒋却认为粤籍军官对他有所歧视，蒋后来卒至弃职而去。可知与蒋摩擦的还不止张国桢一人。

蒋、张的矛盾，还不止此，最重要的张在粤军中的资历比蒋深。他尝主张安定广东局面，非新旧粤军合作不可。认为杨希闵、刘震寰纵兵殃民，祸害广东，就是由于新旧粤军分裂，给予杨、刘入粤的机会。张这一主张，在当时新旧粤军的高级将领中，有不少人的支持。1925年春间，建国粤军总部在汕头讨论回师讨伐杨刘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张这一主张却得到通过，而蒋、张的矛盾，却因此愈来愈深。

是时东征军已下潮汕，陈炯明残部多已退入闽南、赣南，只余杨坤如部困守惠州。原来奉命入粤讨伐陈炯明部的滇桂军，本来只是想占据广东富庶的地盘，自攻下广州后，就以为目的已达，抱着重温旧桂系统治的迷梦。负责进攻惠州的刘震寰部按兵不前，杨希闵部则着意由广州向北江发展，以便和北军联系，阴谋推翻革命政府。粤军总部得到消息，急谋应付对策，讨论回师讨伐问题，在会议席上，蒋介石不主张回师，认为陈军尚在闽边，惠州尚有杨坤如部，讨伐杨、刘，陈军将会乘虚而入，粤军便前后受敌。但当时粤军将领多主张先肃清杨、刘。蒋说：“如果有办法使后路不受追击，那也可以的。”张国桢便拍胸说：“有办法，我可以派人向陈军疏通，叫他们通电拥护革命政府，给以填防潮汕的权利，待扑灭杨、刘之后，我们再商量其他问题。”果然张的建议得到许崇智和大多数将领的赞同，跟着也得到陈军将领的拥护。东征粤军迅速回师平定了杨、刘，使革命政府所在地的广州得以转危为安。这场争执，蒋介石大不高兴，但却给他进一步认识了张国桢在粤军新旧将领中的号召力量，杀机也就暗伏于此。

### 三、张对蒋许之间的态度

蒋介石来到广东，在粤军是毫无渊源的，只以看中广东的革命形势，有机可投，又善于耍手段，装腔作势假充正经，而获得许崇智的提拔，升任参谋长。有些人说，许崇智如此提拔和信任蒋介石，是因为他俩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曾经结拜兄弟，我对此事却没有所闻。但许、蒋之间，也有他的渊源，早在1916年讨袁之役，孙中山命许崇智参加山东军事工作时，蒋曾当过许的助手，后来蒋到了广东又在许的部下工作，正由于他追随许崇智日久，也摸透摸熟了许崇智的心理，知道许有意整顿粤军。因为在那时代，粤军官兵来源复杂，陋习太深，军风纪也难于整顿。有的军官自恃有过战功，往往在许崇智面前要挟，要求不遂，便卸开衣服露出胸膛的说：“请总司令看看我的伤痕，请给我撤职吧！”类似这种情况，在许看来也难于处理。蒋就乘机秘密进言，要设法逐步淘汰旧部队，培养新的骨干，这一计划得到许的赞同。但他们这一计划，当时许又绝不敢向别一将领泄露。黄埔军校的成立，给蒋以机会。

蒋介石自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以后，一面在校中苦心来树立他个人的威信，搞他的小集团，一面在许的面前表现得更加惟恭惟谨，许也把他看成心腹。有时将领有事向他报告时，许不问情由却先说：“你见过蒋参谋长没有？”叫将领们先向蒋报告，而他自己反而不听。这样，许也自己造成使将领逐渐离去自己，而蒋的权威却因此日益增重。

记得有一次许的副官处长冯次淇曾对我说：“许老总对蒋介石，真是奉侍‘老爹’（父亲）都没那么好。”原来有一次许叫冯设法在东山找一所漂亮的房子，吩咐他要尽量布置得典雅堂皇。冯以为许有什么新的外室，也就替他悉心布置妥当请许去看，许看过之后，有些不满意，又叫冯重新布置，如是者两次，最后却

同蒋介石来，许才对蒋说：“请你把住在上海的家眷搬到这里来吧。”自然蒋介石是假意谦让一番，还说什么革命时期，不愿意家人在身边牵累的话。许崇智对蒋介石不但在公事上推心置腹，连他的生活也可以说是关怀备至。

其实当时蒋介石耍的手段，许的将领也有的看透的，深恐将来许会自食其果，但又不敢向许直言，便对许济说：“我们是不便对总司令说话，你是总司令的兄弟，应该提醒总司令，不要过于听信蒋介石。”许济得到的答复却是许崇智一顿的教训，说他听信别人的谗言，中了政客的计，不准他以后再说。

许崇智又尝说：“服从许总司令，就要服从蒋参谋长，许总司令就是蒋参谋长，蒋参谋长就是许总司令。”许这番话在将领中说出来，实在引起了很大的反感。

张国桢对许、蒋之间这些情况当然有所闻。平定杨、刘之后，有一次盐商谭润之在广州的盐船上请客，张国桢、顾锐民、龙思鹤和我都在席，席间也谈到蒋的专横跋扈，野心勃勃。张国桢说：“现在老蒋还要拿许氏的灯笼，迟三年啦！”在张当时的估计，以为蒋必要等他学校培养的学生出来了才有所作为，而忽视蒋的为人阴谋诡计，是什么手段都可以做得出来的。这不能不说蒋是对张有深刻的认识，而张对蒋那就不免皮相之见了。

#### 四、蒋杀害张国桢的经过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先生在广州被反动派暗杀。当时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召集紧急联席会议，蒋介石那时以“左派”的姿态出现，因而骗得的信任，被指定与汪精卫、许崇智三人组成特别委员会，处理廖被刺案。其实蒋那时候补中委员都选不上的。蒋介石看准廖案可以利用，借以夺取军事政治权力，正是借刀杀人的好机会，于是同汪精卫，天天在总部开会，研究刺廖的凶手，同时又下令公安局派出得力人员监视他们

怀疑的人，制造紧张空气，使得人人危惧，疑神疑鬼。

首先就叫许崇智自己出面，扣留了张国桢部下两个旅长杨锦龙、梁士锋于粤军总部，跟着又扣留了第一军军长梁鸿楷、师长谭启秀等一批将领。

在风声紧张时，有的朋友知道蒋、张是一对冤家，劝张走避。但张坦然地说：“廖死关我屁事。”有位朋友留他在家里躲避，张也仅勉强宿了一夜，明天又回家去了。在这紧急关头，张都如此镇定，仍然不防蒋会对自己下毒手。据我的解释，除了他对蒋的为人认识不足以外，一方面认为自己对政治活动少，与廖案无关，不会株连到身上来；另一方面对许崇智也估计错误，以为他和许的关系深，许是处理廖案的主要人之一，不会用自己的左手斩除右手。因此直到张国桢被捕前一二天，有人说：司徒非、萧继旗听到张的处境不利，还夤夜到他家里，劝他出走，张仍拒绝的说：“懸居（傻瓜的意思）！我都使走？”

可是，某天的傍晚，沈应时便带了士兵到他的公馆说：“蒋校长请你谈话，请你即刻去。”张登楼换衣服，沈即派两名士兵随着登楼。张妻看到情形严重，慌起来，张还安慰她说：“慌什么？我一去就返。”

押回黄埔后，没有见蒋。沈应时便开堂审问。张怒说：“你是什么人？有资格敢审我！”沈说：“我打你都得。”就动手打张。旋即拘禁于黄埔炮台，拒绝探问。原来沈前曾隶张部下充团长，在东江河源犯了罪，被张撤职。这时沈已成为蒋的亲信。当时张的朋友们，听到沈的审张消息，已料到张的生还无望。

与张同日被扣留的，还有海军司令招桂章、大元帅府秘书林直勉。

张在狱中，受刑讯多次，被打得皮破骨碎，张怒甚大骂：“蒋介石，你想杀我就杀，何必如此残酷！”陪审的人说：“现在你是想死，但蒋校长不愿你死得太快呢。”闻说：张在狱中被折

磨到肌肉都长了虫蛆，直到9月20日许崇智被蒋迫下台后，才将张杀害，时年仅38岁左右。

被扣留于粤军总部的杨锦龙、梁士锋，许崇智下了台时，总部的人忘记将他们释放，蒋介石知道，又忙派人将他们两人杀害。

张国桢死后，蒋介石也没有公布他什么罪状，只听说屡次审讯，都以沟通陈军为罪名，追问汕头那次军事会议的“阴谋”。显然廖案无可下手，于是就借题发挥，这是蒋介石一贯的手段。因此，当时有些不明真相的人，以为张的死因，是由于才气太露，积怨太深。其实，张遭到蒋的陷害，最根本的是由于他和蒋介石都要在粤军中寻求出路，但主张都绝对相反，与蒋是水火不相容的，有张国桢在，蒋就难以在粤军中掌握实权，也不容易迫使下台。

## 五、廖案时期许崇智的态度

在张国桢被拘留的期间，许崇智曾否设法营救，笔者不得而知。但他到那时仍然听任蒋介石的摆布，也不敢因为爱护一些将领而开罪蒋介石。这些态度，从下列的事实中，可资说明。

当蒋介石正准备拘留军长梁鸿楷的时候，听说他和许商量，许说：“梁未有刺廖嫌疑形迹，拘留他恐怕军心不服，反起来倒惹起重大麻烦。”他们正在犹豫不决间，恰巧该军第一师长李济深来到总部，蒋便问李说：“梁鸿楷对廖案有重大嫌疑，要撤职查办，你看部下能否控制？”李答：“没有问题。”许当时便没作声。次日梁便被拘留。

蒋拘留张国桢，我在后来根据所知的事实推测，蒋可能与许多次商量，许不同意，蒋那时是不可能拘张的。当处理廖案特别委员会成立后，许曾着令张于某日前往惠州点验杨坤如的部队，张妻以张生日在即，挽张饮过寿酌，张亦以点验事问题不大，拟

改日出发，在这时期，有一天张约顾锐民、龙思鹤、吴英理、叶少华、冯次淇和我等八九人在文园酒家晚饭，候冯未到，席间，冯忽赶来，拉张到别室密谈，随又离去，张复入席对众说：“老冯来说：许老总想派一排宪兵到我家里保护我，我的公馆没有那么大。要监视我，一班宪兵就够啦。”张卒没有答应他派宪兵来。不日，张便被蒋拘留。拘留次日，闻许曾派人送香烟、牛奶、饼干等探张，为守兵所拒，说：“奉蒋校长命，非有校长条子，任何人不得探望。”其人只得回去复命。

从以上一系列事实来看，许似早知蒋对张有不利意图，但不敢明言，才有点验任务给他离去，及到冯示意派宪兵到他家里，可能许仍未同意蒋的拘留，只答应派宪兵监视他的行动。后来许被蒋的逼不过，也就交由蒋去处理了。

迨蒋利用许把许自己的羽翼逐个剪除以后，便进一步图谋迫使许下台了。《全国政协文史资料》13期周一志先生写的《我对许崇智了解的片段》和《广东文史资料》第8期莫雄先生写的《由同盟会到到蒋政权四十年政海亲历散记》对这一问题有所谈到的，我不再谈。我所补充的是：在蒋派黄埔学生包围许公馆时，就四面放枪，造成紧张空气。跟着陈铭枢便带了蒋的亲笔信进来。许看信后，不觉的说：“啊！介石这么待我！介石这么待我！”言时眼泪夺眶而下。陈铭枢还说：介石请总司令即时离去，现已买定了上海船票，今天大局已是如此，为了安全，我保护总司令下船。最后陈铭枢又卖弄一下风说：“别的人我不知，我陈某的一师人将来总司令有任务吩咐时，绝对服从。”许就在陈的陪同下悄然下船离去。至莫雄说的是蒋伯诚带信，许似是未见到蒋伯诚的。

（1965年）

## 蒋介石迫逐许崇智下野前夕见闻

林 祥 \*

1925年9月19日晚上，粤军总司令许崇智被其部下参谋长蒋介石逐迫下野，蒋介石夺取了许的兵权。

蒋介石当时除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外，还兼任黄埔军校校长、广州卫戍司令。许崇智和蒋介石，原是拜把兄弟，蒋在许前，至为恭顺，实则内怀篡夺，秘密进行各种手段对许。当时粤军总司令部，便在广东省旧咨议局，前面是东校场，蒋任外职，甚少到总司令部办公，总部来往公文，由参谋处长冯秩斐办理。副官长陈可钰患病，久不到职，由副官处长冯次淇暂代，冯又兼中山筹饷局长、军法处长，极为许崇智所信任，故总部事务，全由他一手包办，成为粤军最红的一员。但冯好货财，庸碌无能，蒋之倒许，策划甚久，冯却茫然不知。许虽微有所闻，但不详其真相，在部内又无可共相商之人。他的兄弟许济，任第四师师长，亦是无能之辈；且许济部下的参谋长蒋伯诚、旅长谭曜卿，皆为蒋所收买。第二师师长张民达是一个有见地有能力的将领，1925年春，攻克潮汕之后，愤蒋行动自专，目中无许，知蒋久后必反，亦欲除蒋。他由梅县乘船往潮汕，决心解决蒋介石时，不幸船经潮安湘子桥溺水身死。许失去张民达以后，剩下来的不是利禄之辈，就是碌碌庸才，几乎无一人可作许之左右手者。

蒋之倒许，酝酿时间很长，计划周密，除收买许济部参谋长蒋伯诚、旅长谭曜卿外，其他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和该师旅长陈铭

\* 作者时任广东宪兵营营长。

枢等均为蒋介石收买过去。谭旅驻守广九路的石滩，监视在石龙的莫雄旅和第三师（后来这两部均被缴械），第一师独立旅张发奎早知风声，先已开入高明县附近。

蒋介石布置已定，乃发动倒许，时在9月19日晚，当晚8时许，忽有军队一连人左右，从外间开来，先在东校场，面对粤军总司令部立定；继而横排前进，向粤军总部外分左右散开。当时我任广东宪兵营长（系独立营，由总部直辖），营部驻在总司令部内，卫兵将门前有兵向总部开来情况向我报告，我以粤军总司令部系国民政府高级军事机关，且又是最高的行政会议所在地，居然有人敢派兵将总部包围，感到惊异，立即点起“广东宪兵营”灯笼，向该包围部队长官质问。他们答称是“奉卫戍司令部命令，来向粤军总部警戒的”。我转到后门查看（即现时的先烈路），又见有重兵扼守、包围。我见这种情况，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更不知如何应付。我想只有打电话向总司令报告，才能清楚原因，便立即到楼上看看有什么人在，走到副官处，只见冯次淇独自在那里看公文，其余各处，都寂无一人。我对冯说：“总部现在被卫戍司令派兵包围。”冯闻言即面色苍白，额汗涔涔，不能置答。正惊惶之际，冯的老婆在家打来电话，说家中四面被军队封住门口，不许进出，冯颤声答以“唔怕唧！唔驶慌（不要怕，不要慌）！”仅仅两句，放下电话，颓然坐下不发一言。我对此情况，还是不明所以，只有下楼，指挥宪兵加强门卫，并亲到门外马路站立，观察动静。忽有一部汽车驶来总部门前，我即喝令停止，问是谁人，车内一人下车，我认识他是许济的参谋长蒋伯诚，我对他说：“今晚总部戒严，汽车非经检查，不许通过。”蒋即取出一封信，信封外面写“呈总司令许钧启”几个字。说：“这封信是蒋参谋长（蒋介石）要我送去面呈许总司令的。”我即任他通过，又到楼上告知冯次淇，冯神色惊惶，不知如何是好，我们想不出什么原因，对坐默然良久，心情十分不安。约半个钟

头以后，桌上电话铃响，是许崇智给冯次淇的电话，冯听过电话把耳简放下后对我说：“刚才蒋伯诚送参谋长的亲笔信去见总司令，函内大致说：‘广东军队把持财政，总司令太过忠厚，无法整理，请总司令暂行离开赴申三个月，俟打理就绪，请总司令回来’等语。”我即对冯说：“这是参谋长倒总司令的台了。包围总部就公然造反了，不如我们乘夜打出去，保护总座出石龙、东莞，这是一个彻底的应变办法。”冯说：“这是不能轻举妄动的，事情内容如何，有国民政府负责。”我年少气盛，愤愤不平。谈话未已，忽电话铃声又起，又是许崇智给冯次淇的电话，许说：“我将今晚之事，用电话告知汪先生（汪精卫），汪先生答我说：‘这是对的，应该明日去上海暂住，等大家整好财政后，请你回来就好了’。汪先生都这样说，我没办法了。”冯次淇悲容满面，漫漫长夜，行坐不安。第二天（20日）拂晓，黄埔学生军闯进总司令部，把全部公物看守冻结，不许翻动，全部接收了。这天早上，第一师第一旅旅长陈铭枢，带着蒋介石出去面见许崇智，说陪同许崇智即日启程赴申，船票早已定就了。许已被劫持，任人摆布，于是废然随陈铭枢前往上海。许的粤军总司令，便被蒋介石夺过去了。陈铭枢也是被蒋介石收买的，倒许的密谋，他也参加，目的是想升任师长，许被迫下野，以后蒋介石升他做第十师师长，但人数不够，便将广东宪兵营拨归他凑成第廿九团，以孙绳为团长，这时，我就离开这宪兵营长的职务。

是日（9月20日）晨，何应钦自造币厂来电话，询问尚有何人留在总部，我答以“有冯次淇在，余无他人”。何以惊诧的语调问我：“冯次淇还在吗？”我告知冯，冯惊得面无人色，颤声问我：“现在黄埔学生军把守门口，如何出得去呢？”我答：“不怕！我有办法，今晨适追悼廖仲恺，借总部为追悼会会场，你可卸去军服，改穿长衫，带上黑纱，作参加追悼会的人，杂在追悼人群中混出去。”我刚把冯次淇过关之事设计好，罗翼群因追悼

廖仲恺入来与我迎面相遇，我将昨夜与今晨的事变告罗，罗即匆匆退出。果然冯次淇照我的计划，混出去了。许崇智被蒋介石迫逐下野一事，就这样结束了。今天，冯次淇不知何往，只剩下我一人，这有关历史事实，我是目击者，我年已垂暮，如果不提供，会把真正历史遗漏或者可能以后会失实。罗翼群曾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写过陈铭枢带蒋介石信面呈许崇智，请许赴申，这是9月20日早晨的第二封信，9月19日晚上，蒋伯诚奉蒋介石命带信给许崇智，请许赴申，才是第一封信，罗翼群写陈铭枢带信是所闻失实的，这里一并订正。

(1964年)

陈铭枢带信给许崇智，是事后许对我亲面说的，没有说到蒋伯诚带的信。我写的回忆在《广州文史资料》第4辑发表后，陈铭枢并无否认，可见陈之带信是实。至蒋伯诚所带之信是否同一封，或许拒不见蒋，抑或许不接纳蒋介石意见，介石乃又再派陈铭枢前往劝许离粤亦未可定。我所写决非传闻之误。

(罗翼群 1965年9月23日注)

## 北伐前后我参加大革命的经历

沈沛霖 \*

### 乘法轮 Paul Lacut 号自法归国

自 1925 年下半年起，留法同学中加入团体者，陆续有去苏联学习，或回国参加国民革命行列，在法人数大减。时旅法 CY 负责人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陈延年、聂荣臻、穆清诸君均已回国，或赴苏。团体由方至刚（韩之，湖南临湘人）负责。团体发出号召：“努力研究，从早归国。”当时国内形势亦发生极大变化：自民国 13 年（1924）国民党一全大会（一大）召开后，实行“联苏、容共、农工”三大政策。民国 14 年（1925 年）夏，广州国民政府建立，旋积极筹备北伐，以消灭军阀割据势力，统一全国。为此，需要各方人才甚多。总之，从广州传出的消息确是鼓舞人心的。

屈指算来，我来法已 5 年多，学业上已获机械工程师学位，经济上亦略有积余，政治上顺应时代潮流，加入团体，积极训练，乃决意归国。找到巴黎支部方至刚兄，表达归意。方说很好，旋为我们开具了组织介绍函，嘱我们到广州后，可去找团体在穗的机构。方并对我说，我们走后，他亦要赴苏学习，旅法团体将不复存在，少数留法同仁，如何肇绪等，将在法国共产党中，设中国语言组，作为留守机构云云。

1926 年（民国 15 年）3 月底，我与留法同学吴琪、林祖烈

\* 作者又名沈清尘，当时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中校主任秘书、第四军二十六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

(林祖涵弟弟，C Y 成员)、顾仑布、江涛、金诒荪等一行，在马赛乘法国邮轮巴尔加 (Paul Lacut) 号离法归国。我们坐的是三等舱，其中吴琪坐的是水手舱，是不花钱的。这艘船的水手中，有许多是中国同胞，颇讲义气。我记得他们中间一个负责人是浙江宁波人，对我们颇为友好，一路常请我们吃饭。航线与赴法时一样，惟在锡兰岛 (今斯里兰卡) 之科伦坡没有停留。船经过新加坡时，上来二位客人，一位系旅居安南的华侨，为一富商，订的是头等舱位，见到我们，问长问短，非常热情。另一位要去上海，是在吉隆坡某校任教的女教师，姓吴，是江苏人，国语讲得很好，对我们亦非常热诚坦率。彼性格开朗，不拘小节，我们彼此间谈得十分愉快而热烈。

船抵西贡，停泊三天。那位旅越华侨盛情邀我们及吴教师上岸观光，共至其寓。旋用小汽车接我等在市内兜风，一路风驰电掣，吴老师在车中引吭高歌，唱的都是爱国主义的歌曲，模样楚楚动人，此情此景，于今回想起，似在眼前矣。是晚，那位旅越华侨又请我们在西贡的一家华丽饭店吃饭，上的酒菜丰盛可口。饭毕又用小车将我们送至码头，方与我们一一握手惜别。真是不似亲人，胜似亲人。

船抵香港，我们要下船了，吴老师还留了通讯处给我们，其夫君郭后觉，供职上海商务印书馆。

我和金诒荪、林祖烈、吴琪在香港上岸后，即乘船赴广州。

### 在广州安排工作经过

我们到广州，时间已为 5 月初。抵步后，我先在同学金诒荪家 (金为广东人，家居广州，抗战前曾任南京市公用局科长) 住了一晚。次日，我即持旅欧共青团组织介绍函，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拜访林祖涵 (即林伯渠) 先生。时为国共合作阶段，林一身兼四职：国民党中央常务执委、常委会秘书、农民部长，同时

又是共产党中央的秘书长。我在林的办公室，还遇见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女士（国民党中央委员），她坐在窗前，然未及晤谈，她即刻惊呼起来：“快来看！东校场正在进行缴械！”后来获知，这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部队对国民党右派，时为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的所属武装进行缴械。吴嗣被解除公安局长职务并遭逮捕，是为先前之“中山舰事变”后续问题之一也。

晤谈中，林祖涵见我系留法学生，即对我说：“君之留法同学陈延年同志，现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你可找他一晤。”旋专函致陈，交我带往。次日，我即往广东区委办公处谒陈延年，因系熟人，无需客套，陈知我在法时与周恩来甚熟，当即告诉我周恩来同志亦在穗，任广东区委的军事部长，他已与邓颖超同志结婚，住在广州××路×号楼上，你可去找他。关于工作安排，陈说：“你乍来初到，可先休息一下再说，工作是一定有得做的。”旋将我安排至组织的招待所居住，招待所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距区委办公处甚近。同居一室者，有三位四川人：朱代杰、欧阳继修（即阳翰笙）、李民治（即李一氓），皆CP成员也，俱为等待组织安排工作的。不久，组织安排朱代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上校主任秘书。总司令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为邓演达。欧阳继修任黄埔军校入伍生团（部）政治部中校主任秘书，李民治任总政治部少校科员。我则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团党代表办公室中校主任秘书。四人之中，朱代杰和我先后离开组织，朱在抗战胜利后曾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1949年后为唐山铁道学院教授。李民治与欧阳继修则一直未脱离组织，其中欧阳继修在抗战初期曾任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的上校主任秘书，时我亦在政治部任第一厅中校科长，与其在武昌又见面，曾为对敌宣传资料事宜，与之接洽数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其被说成为“四条汉子”之一（另三人为周扬、田汉、夏衍），受批斗甚苦。李民治当时阶级成分最低，后来却一

直担任中共方面负责人。

关于我的工作安排，这里还有一段插曲应叙：我至招待所次日，即拿着陈延年给我的周恩来在穗地址去找他。周很热情地对我说：“老沈，你来了，很好！”旋请我坐下谈，并介绍其新婚夫人邓颖超与我认识，对邓介绍说：“这是我们在法国时 C Y 的同志。”邓亦落落大方与我握手。交谈中，我与周谈到工作问题。周说：“去第六军好了。”并说林祖涵即为第六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随即周写了介绍信给林。我见其处尚有客人访见，即起身告辞，复至林祖涵处。林看了周函，委我任第六军政治部宣传科的少校股长。次日，我去广东区委，将工作安排情况告之陈延年，惟陈不同意我往，理由是第六军 C P 及 C Y 的同志已经很多，我去不发生什么作用。“你应该做更重要的工作。”陈对我说。旋让我安心在招待所等待，一俟有机，他会通知我的。

不久，陈约我前往，对我说，决定派我至第二军去工作，以充实组织力量。陈即书函一封，致第二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李亦为留法同学，在法时，我与李及其夫人蔡畅均甚熟，至不敲门而入地步，李、蔡在法时曾育有一女，我们都去致贺过），让我带往。我去见李，李当表欢迎。复派我至该军教导团，任团党代表办公厅中校秘书。

### 在穗时对周恩来、陈延年、 恽代英、萧楚女诸君之印象

我在广州等待安排工作之际，常往周恩来家中访见。此处据说亦为广东区委机关之一，故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来访者多半为黄埔师生。时周兼职很多，工作甚忙，对来访之党内同志的谈话，多利用饭前饭后间隙进行。记得其中一次早上，我去访谒，见其正进早餐，他见我至，即邀共进早餐，边吃边谈，毫无架子。另一次，我去周寓，先看到邓颖超，我即高声问道：“恩来

同志在家吗？”邓很警觉地将我拉至旁边一小会客室内，对我说：“此间人太复杂，讲话要小心些。”显然，邓之语是事出有因。时为“中山舰事变”后，国共两党已初露分歧端倪，当时通过的《整理党务案》，即意在限制中共的活动。周恩来原兼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之职亦被解除。蒋复调周任黄埔军校高级班主任，有职无权。但蒋深知周是一难得的干才，便想驱使为其所用。故北伐前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任蒋为总司令，蒋复提周为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为此，曾约周谈话，征得周的意见，且提出一个条件：要周结束跨党身份，专做国民党员。周很得体地婉拒之，对蒋说：“我之所以能替校长做一部分工作，正因为我是忠于共产党并忠于国民党的。但我加入共产党在先，如果因为想做总政治部主任而脱离共产党，人家将要耻笑我，说我周某人为做大官而脱离革命，如此我将威信全失，也无法帮助校长了。”蒋听后，无可奈何，只有叹气。于事后发表邓演达为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政治部宣传科科长，朱代杰为政治部主任秘书。此事系我亲聆供职总司令部之某君所言，亦足证周公党性之坚定也。

陈延年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张国焘称其“老成练达，长于思考。”在法国时，他曾笃信无政府主义（亦称作安那其主义，时风行于法欧等地，且为留法勤工俭学发起人李石曾、吴稚晖所倡），后由赵世炎之劝，转变信仰，加入 C P。延年系陈独秀之长子，在广州时生活十分简朴，我去访谒时，见其用的是一个仅有两只抽屉的旧办公桌，坐的是长板凳，睡的是硬板床，蚊帐也是有补丁的，用两根竹竿撑起来。膳食亦非常简单，常常一碗光面就对付过去了。他对同志颇为诚恳，毫无架子，我去访见时，就坐在其办公桌旁的长板凳上，听其娓娓而谈。于延年处，我结识了来此造访的许多中共干部，有萧楚女、恽代英、张太雷、刘少奇诸君，而其中印象最深者，乃萧楚女、恽代英的宣传演讲才

干。

萧楚女是湖北人，时为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长得一脸大麻子。据其告我，他为茶馆跑堂出身，自幼爱说笑话，讲话时眉飞色舞，极为生动，博得听众欢笑。他告诉我，其在报刊中撰文署名楚女，许多青年男子见之，竟纷纷寄来求爱信函，却不知彼为须眉，且为麻子矣！毛泽东曾经说过萧楚女是农讲所最受欢迎的教员。

恽代英原籍吾邑常州，系黄埔军校的政治总教官。与楚女相较，恽讲话幽默风趣，演讲时态度镇静自若，不苟言笑，然却非常生动，听者为其吸引，听至精彩处，哄堂大笑，他却依然自若如常。演讲之余，恽代英喜欢读书，手不释卷。尝谓我曰，其演讲口才，得力于《水浒》很大。其生活亦很朴素，我曾往他家访见（时其已结婚），见屋内仅有一张大床，床下放着一只网篮，内放几本旧书及旧衣，如此而已。

此二君之宣传演讲才干，堪称一流，至今未见得其右者，惜其后国共交恶，彼二人竟先后死于国民党之清党，确系中共的一大损失也。

### 在第二军：从教导团到第六师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前身为谭延闿之建国湘军。中山舰事变后，汪兆铭离职，由谭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之二军军长职由副军长鲁涤平代理，负实际责任。下辖三师，依序列为第四师（师长张辉瓒）、第五师（师长谭道源）、第六师（师长戴岳）及一个教导团（团长陈嘉佑）、一个炮兵团（团长谢慕韩）。

1926年6月，我受团体之派，由广州赴马坝（韶关以南），任第二军教导团党代表办公厅中校秘书。

教导团（后扩充为教导师）是第二军一个重要单位。以原第二军军官学校学生为骨干组建，受苏俄顾问鲍罗庭支持，武器装

备均由苏俄供给。团长陈嘉佑，湖南湘阴人，留学日本东京士官学校，为谭延闿之至友，随谭多年，系国民党第一届中央委员，国民党左派，为人爽直而有魄力，北伐中任十三军军长。宁汉分裂后，陈氏反蒋甚力。团党代表韩毓涛氏，广东人，仪表很好，但能力不强，故工作局面很难展开。且韩、陈亦存有矛盾，似难调和，故我在此为时仅一月，至北伐军兴，即调至第六师服务，任师政治部中校秘书兼宣传科科长。

6月底，我至六师师部韶关报到。师长戴岳及党代表萧劲光对我到来，俱表欢迎。特别是萧劲光党代表，因同系团体同志，又知道我是由周恩来及陈延年的关系介绍来的，待我格外亲切，问长问短，关怀备至。

六师师长戴岳，字希鹏，湖南人，出身保定军校一期，时亦为国民党左派。宁汉分裂后，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反蒋。宁汉合作后，戴师长对部队中的CP成员，能做到以礼相待，堪称难能可贵。

六师下辖三团：十六团（团长黄友鹄）、十七团（团长廖新甲，于南昌之役阵亡）、十八团（团长刘风）。

政工人员情况：时国民革命军政工受苏俄影响很大，军师团均设党代表。部队长命令，非有党代表副署，不可发生效用。军师二级设政治部，主持政工业务。六师政治部主任为党代表萧劲光兼，中将衔，与戴岳师长同阶级。我为秘书，由于萧党代表多半和戴岳师长在司令部工作，故政治部工作由我代拆代行，政治部下设宣传、党务、总务三科，及一个宣传队。宣传科长由我兼任（北伐开始后不久，我专任秘书，宣传科长一职由江苏人某君继任），科员有朱学伊等。党务科长刘邦定，总务科长戴××，均系湖南人，CP成员。三科之中，以宣传科最为重要，系政治部工作之核心也。故宣传科长为中校阶级，而其余二科科长则为少校。我与党务科长刘邦定相交甚笃，北伐至南京后曾合影留念。

这张照片，经历沧桑，一直带在身边，逾 40 年，不幸竟毁于 1966 年 8 月的“红卫兵”抄家运动中。

师下辖之各团及营连的政治指导员工作督导，亦归政治部办理。在政工会议上，常晤面的有十六团指导员陈培苍、十七团指导员刘锡畴（后任第二军军医院党代表）、十八团指导员谢华，俱湘人，以上各级政工干部大部为 C P 或国民党左派，惟 C P 同志一般亦兼具有国民党党员身份，亦即当时所谓的跨党。讲的也是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决议。此亦为大革命时军中政治工作的一个特点。

我到任不久，曾随军参加过一次剿匪战斗，印象颇深。此为余初次参加之战斗，地点在马坝附近。时北江匪患为全省之首，尤沿粤汉路一段，常有打劫、掳掠之事发生，严重危害百姓及来往商旅安全，其中以乌石土匪黄某为甚。我部到达战斗现场后，师长及党代表等亲临指挥，余站在战壕中观看，匪军一发子弹打来，竟穿过余裤裆，将身后之水箱打了一个洞，惊险无比也。后在兄弟部队及曲江农军协同作战下，终将股匪歼灭，保证了粤汉铁路之畅通，及北伐的如期举行。

### 北伐之一：从韶关至赣西

北伐，为孙中山先生之遗愿，其目的，在于打倒军阀，以完成国家之统一。

1926 年 7 月 1 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氏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北伐军兵分三路：第一路为四、七、八军，攻入湖南，直取湖北，以消灭吴佩孚部为己任；第二路为二、三、六军，攻入江西，消灭孙传芳部；第三路为第一军，转进福建，向浙江进军。而其战略重点为第一路，即进取武汉，以吴佩孚部为首要目标。当时有一个口号，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要张作霖。”形象地说明了北伐军之战斗方略。

7月中，我随二军六师部队自韶关出发，开始了为时一年的随军生涯。部队沿着粤北山路，向湘南挺进，经仁化城口、汝城、桂东、酃县而达茶陵。茶陵为谭延闿之故乡，部队于此休整一周有余。我们政治部与师部同住一大院。时部队士气旺盛，纪律严明，提倡“爱国家，爱百姓，不贪财，不怕死”的精神。住处院内外种有柚子树百余棵，结实累累，却无一人采摘，记得如过酃县时，某兵士因买了一斤猪肉而未付钱，经查属实后，当遭枪决。

休整期间，政治部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宣传活动，按照总政治部制定的战时政工宣传纲要，切实进行，形式多样。有作战前之演讲——使部队官兵了解：1. 革命军之努力实现三民主义，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与使命；2. 作战之意义；3. 揭露军阀所代表者，及其罪恶；4. 革命军十不怕精神：不怕死、穷、冻、痛、热、饥、疲、远、重、险。有纪律教育，训练革命的人生观，官兵平等一致，严禁嫖赌等。此外，每周一上午举行的总理纪念周，部队全体官兵均参加，由政治部萧主任或我恭读总理遗嘱，旋全体向国旗党旗及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复由萧主任或我作政治报告及演讲，内容以总理遗嘱之内容为主，展开宣传反帝反封建及北伐之意义，以之鼓励官兵士气与斗志。最后全体高呼口号而结束。

除了对官兵进行政工宣传外，还有民众的组训工作。政治部组织师宣传队上街向民众演讲，张贴标语，教唱革命歌曲，召开军民联欢大会。联欢大会内容包括：1. 说明国民革命之缘由；2. 解释国民党之主义；3. 宣传军队北伐之作战目的；4. 军民合作之必要性；5. 对标语口号之解释。当时有一首脍炙人口之《国民革命歌》，官兵及所到之处民众，几乎人人会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在茶陵，萧党代表交我一纸 C P 成员表，让我填写。后来知道，此即为由团转党，惟未举行仪式。嗣复建立中共秘密支部，我亦为成员之一。

茶陵修整后，余随军继续北上，经攸县、醴陵而入江西境内。时占据闽、浙、赣、苏、皖五省，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以 10 万大军入赣，对北伐军形成很大威胁。赣西战役开始，国民政府发布讨孙宣言，指出：“孙利用保境安民之名义，承军阀割据之风，行鱼肉人民之实。”

9 月 6 日，我师与友军第三军（滇军）协同进攻萍乡，敌唐福山部未及交战，即相率后退。是日，我师进占萍乡，并即推进至萍乡以东地区。萍乡各界为欢迎北伐军，召开盛大之军民大会，情绪热烈，场面壮观。

萍乡既占，我师继续东进，连克宜春、分宜、新余。在新余附近与敌激战三昼夜，阵地尝得而复失，为我师韶关北指以来第一恶战，牺牲者甚多。然终将敌邓如琢部击溃。新余之占领，使敌赣中门户洞开，北伐军得以长驱直入，直逼南昌。

新余既克，我师一鼓作气，复克清江、安福。

自 9 月 6 日萍乡战役始，至 9 月 21 日克安福。半月之间，我师连克萍乡、宜春、莲花、永新、分宜、新余、万载、上高、清江、安福 11 县，取得了赣西战役的胜利。

## 北伐之二：南昌战役

南昌战役为北伐军江西战场最重要一役。为指挥是役，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白参谋长（白崇禧）专程抵赣，设总司令行营于萍乡、分宜、清江、高安等地。调动各军，有程潜之六军、李宗仁之七军，及一军一部等，协同作战，然由于战线太长，补给供应不及等原因，六军攻克南昌城后，又得而复失，损失很大。

行营复组织二打南昌之战。此前，我师受命攻克吉安。嗣沿

江北上，渡过赣江，向新淦进发，连占新淦、永泰、樟树、丰城。孙部联军江西总司令邓如琢遂发电引咎辞职。南昌城已四面被围。旋我师奉命攻击进贤、惠民、广润三门，于10月12日晨发起进攻，官兵组织敢死队，架设云梯登城，惟敌军火力甚猛，未及登上城头，即已大部牺牲。时南昌城外许多低矮民房，便于攻城部队隐蔽。孙部联军发现后，竟命士兵用水龙头注射煤油，放火烧房，连古今闻名的滕王阁亦被烧毁，使我军无法掩蔽，损失很大。六师十七团团长廖新甲及友军的两个团长先后阵亡。联军援兵亦源源开来，我军陈兵于坚壁之下，背水作战，处于十分不利之境地。后经居于南昌城之美英侨民某君等出面协调，双方停战，革命军暂时后撤30里休整。二打南昌，复告失败。

经短期休整后，行营又制定新的作战计划：集中主力于南浔铁路（南昌至九江）沿线与联军决战，消灭其主力于赣北。二军属右翼军右纵队，担负进攻抚州之任，以扫清南昌东南外围之敌。我师继克卢坑后，复与敌在南浔路之牛行车站附近激战，我军与友军第三军共阵亡团长3人，伤亡2000余人，几被敌围困，情势危急。幸援军及时赶到，方予解围。敌见大势已去，仓惶渡过赣江向南昌东北方向滁槎逃亡。我军乘胜追击，于滁槎追上逃敌，将其2万余众悉数缴械。

北伐军在南浔线大获全胜后，江西战场胜券已握，各军复回师南昌，将其三面包围，仅空出沿河一面。11月8日，发起总攻击，士卒登城成功，进入城内，守敌一万余人全部俘虏。守将岳思寅逃入美国人创办的南昌医院地窖内，被我捕获，守将唐福山、张凤岐亦于南昌城外被擒，后由“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判处死刑，执行枪决。

### 北伐之三：经闽北、浙皖转进南京

南昌战役结束后半月，我复随军转战闽北，沿临川、资溪、

光泽、邵武、建阳，直抵建瓯城下。时福建督办周荫人率部逃往浙江，建瓯守敌投降。我军顺利开进建瓯，师部驻天主堂，安民告示，并筹建建瓯县行政委员会，组训工作，一派生机。时驻扎建瓯附近之敌何麓昆部 3000 余众，慑于北伐军威力，主动向我方投诚，旋被收编。何在建瓯设宴款待我们，戴岳师长和谢秉参谋长一席，萧党代表与我一席。席间菜肴之丰盛，前所未见。

我师在建瓯休整待命约月余，于 1927 年 1 月离开建瓯，目标是南京。先至浙江衢州附近，与敌孟昭月部激战。复入常山，于此受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常委执委、中共党团书记宣中华等人的欢迎。又经遂安入皖，经徽州、绩溪、宁国、宣城，直指金陵。在徽州、绩溪、宁国时，因原县长逃跑，师部先后任命三位中少校级的秘书及指导员担任代理县长，受到群众欢迎。记得其中一名陈毅者（湖南人），担任宁国县长，任内开展反霸斗争，搞得有声有色。在宣城，由我主持召开军民大会，余即席演讲，宣传北伐之革命宗旨，受到民众的欢迎。当有青年多人投入军中，可见民众对革命的热情及向往十分高涨。

部队嗣经高凉、溧水、秣陵关，一鼓作气，攻克了雨花台，至 3 月 24 日上午，南京克复。我师自中山门进城，沿途数万市民燃放爆竹欢迎革命军，场面热烈。孙传芳残部逃往苏北。至此，长江以南地区，已为革命军控制。

### 宁汉分裂前，回乡省亲

南京光复后第三天，我向部队请假，拟回乡省亲，看望辞别七载的亲人（时常州亦已光复）。行前，我至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公干，并告之将返常省亲事。省党部常务执委，亦为中共党团书记的侯绍裘（江苏松江人），及省党部工人部长刘重民二君，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到常州后督导武进县党部做些组织和宣传工作，并委我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派员名义。

当时的形势颇为复杂，早自南昌克复后，国民党内部为迁都地点，即已产生歧见。左派主张迁都武汉，并力主限制蒋氏权力，视其为新军阀。蒋氏则以成立南昌国民政府，与左派相对抗。是所谓党权与军权之争。中共的主张是支持国民党左派，故我在南京安徽公学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内，侯绍裘谓我：“我们的方针，是拥护三大政策，反对个人独裁。”我返常后的工作，即根据侯氏此一面示进行的。抵常后，我住在常州华商旅馆，并于此召集武进县党部负责人（均为 C P 成员）恽长安（即恽逸群）、吴中一、徐水亭、杨锡类、陈梦玉等开会，商谈了改进党务的方法。会中，我向彼等传达了省党部提出的对当前形势的对策精神，并以此作为县党部今后的中心任务。依据当时局势，会后改组了县党部，成立了特别委员会，以恽长安负责，另有陈际云、陈志翔、孟心如、蒋钟麟等人参加。次日，县党部发起于天主教凯乐堂召开军民大会，推我为大会主席。我就拥护三大政策，反对个人独裁此一题目发表演讲。计到各界代表人士 300 余人，群情激昂，口号声此起彼伏。与我同至常州的省党部翟健雄也在会上讲了话。会后，我即返前桥村探望了亲人及众乡邻，并祭扫了母亲及外祖母墓。想想母亲离开我已 11 年，她临终前仍叫我争气。儿今日以革命军人身份回到家乡，母亲在九泉之下可以瞑目了。时在家乡的二弟佳霖于县师毕业后，也加入了中共组织。

此后，形势却日趋紧张而扑朔迷离，沪宁一带的消息不断传到常州，“清党”之风日甚，终成上海 4 月 12 日之事实。其后，无锡、常州等地驻军亦仿效沪上，配合商团，声称“护党”，并封闭左派县党部，我一方面叮嘱恽长安等采隐蔽之方式以保全实力，一方面辞别父亲，轻装简服，离常返宁。抵宁后，方知部队早已开拔，西移武汉，南京已由蒋氏之第一军部队接防，“清党”甚急。我与随行之勤务兵及挑夫 3 人，乃日夜兼程，赶赴武汉。

## 武汉、宜昌、仙桃镇战役

武汉，时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亦被称之为“赤都”。由于日前蒋氏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极端手段“清党”反共，故武汉的左派东征讨蒋之声，不绝于耳，盛极一时。我在武汉才追上部队，回军销假。惟部队中的气氛已今非昔比，二军及六师官佐，多为湘籍，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由于涉及到军官家属，为彼辈所不满，尝言：“我们在前方打军阀，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分田地，革我们的命。”对军中政工人员，尤其是籍隶 CP 的政工，竟侧目而视。

我在武汉期间，曾与萧党代表劲光偕行，访见时任中共中央代表兼中共湖北区委书记的张国焘。这是我初次与张见面，16 年后，我与张同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计委员，且同隶一组。张当时颇为健谈，当萧向其汇报部队官佐思想情绪不稳时，张即指出，农民运动的过激将成为国民党左派与中共分道扬镳的契机。当时我们对张此议论，颇感吃惊。

时萧劲光已与朱仲止女士结婚，住在汉口某旅舍。我去祝贺，萧将仲止介绍给我，说这是长沙朱剑凡先生之女，亦为 CP 同志。仲止毕业于南京金陵女大，国英文俱佳，至今仍与我时有通信往来。

未几，川军杨森部奉南京政府指令，自宜昌、沙市沿长江北岸东进，进抵仙桃镇附近。时夏斗寅、何键部均已脱离武汉政府，清党反共，武汉危急。六师奉令乘轮溯汉水而上，抵仙桃镇，屯兵南岸，与友军一起，与杨森部决战，以解武汉之围。六师担任主攻，交火之下，杨部溃退。闻杨部川军，系大烟兵，战斗力甚低，一经接触，即望风披靡，向宜昌方向撤退，我师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一直追至宜昌，杨部复退，遁入川东。仙桃镇一仗，大获全胜。

我随军抵宜昌后不久，以肺疾日益严重，复请假回武汉，住汉口同仁医院调治。同住一室者，为第九军（军长朱培德）二十八师师长韦杵。韦系黔人，似为少数民族，在病房内曾谓我该民族之风俗习惯，与汉族有很大的不同。他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北伐时为第三军师长，参加过江西战役。时革命同志之间，情义极重，闻我住院，朱仲止偕其弟妹3人代表萧党代表来院探视，我陪她们至长江边散步，仲止知我尚未结婚，指着其妹对我说：“你们结婚！”给我以极大的安慰，病体竟觉轻松不少，虽事过境迁，惟印象仍极深矣。

### 离开六师，潜行沪上

国共分裂终不可避免的到来了。1927年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分共，中共退出了国民政府及国民革命军。与南京政府采取激烈手段“清党”相比，武汉政府之分共，一般而言，尚属和平。8月，我病情稍愈，由汉口复至宜昌。时萧劲光已离开六师，戴岳派任的秘书亦已到任，政治部同仁多已易人。我去办移交时，某些极端分子以为有机可乘，将我的工资及生活用品统统拿去，并扬言要将我拘押，情况十分危急。我见此况，当机立断，即去司令部呈见戴师长。幸戴岳思想较为开明，见面后即与我握手，客气地与我交谈，表示他奉命分共，惟不会危害CP同志的生命安全，且有保护之责。辞别时，戴又将一支盒子枪送我，并亲自陪我下楼，送我至司令部大门口卫兵站岗处，方与我握手告别。我见师长态度诚恳，胆子也大了，即回政治部，向有关人员追回了工资及衣服等生活用品。当日下午即自宜昌乘船返回武汉。就此离开了生活了14个月的第六师。

在武汉，我住在位于武昌的中共机关内，等待着组织的安排。时第四军准备回师广东，不少人随四军南下，后参加南昌暴动。亦有人登报脱离中共，成为纯粹之国民党员。最后，我被告

知，先离汉赴沪，再决定去向。

是年9月，我在上海住在组织租赁的位于沪西的一所招待所，为一楼一底建筑，余住楼上，楼下为房东自居。同居者有七八人，均系等待安排的组织同志，其中有一独臂者，颇引人注目，惟姓名已忘，听说以后此人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在此，我与萧夫人朱仲止重逢，乃知劲光兄已赴苏。仲止告诉我，她不久亦将赴苏，与夫君团聚。我们谈到国共的分裂，及国民党的清党，都有一种变化太快，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觉。仲止要赴苏，我陪她至先施公司选购衣服及日用品。在清党后的上海，充满着恐怖的气氛，我们一举一动须十分小心，才不致出差错。故我们在购物及步行时，都尽量用英文交谈。不久，仲止动身，随行者有刘志敏同志，亦为CP同仁。我去送行，时间大约在晚10时左右，自旅馆到杨树浦码头，我们雇了一辆黄包车，用来放行李。我们三人步行前往，路很远，大约步行一小时多方至码头，我直到彼等上了船（是一艘苏联邮轮）才离开码头。一路灯光暗淡，行人稀少，路上还遇到一个红头阿三（印度巡捕）的盘问，随时有被捕的可能（当时在上海的杨虎、陈群辈，执行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恐怖政策。若被指为共产党嫌疑，不必经过法律手续，即可予以秘密处决）。幸没有问题发生也，回忆及此，真有不堪回首之叹！仲止赴苏后，亦吃了不少苦头，且被迫与劲光兄离异（受王明路线迫害），现健在北京，膝下子孙环绕，堪称晚年幸福。惟与仲止同行之刘志敏，却早已长眠地下——自苏联回国后，于1935年在福建漳州被捕（据刘家乡党组织来函告），不屈牺牲，后被追认为烈士。

### 再度赴粤，任职第四军二十六师

我送朱仲止等赴苏不久，大约10月间，组织派我到广州第二方面军第四军黄琪翔部工作。我自沪乘船前往，到广州后，通

过组织关系，找到了代总指挥兼四军军长黄琪翔的主任秘书郭慕亮同志（中共党员）。郭向我简略介绍了广州方面的情况：张发奎和黄琪翔等粤军将领是反对南京政府的，对驻广州之桂系李济深亦表不满，故与中共方面有联系，用了不少 CP 人士在部队中从事政工。关于我的工作，拟由郭出面，介绍我至第四军二十六师政治部工作。时该政治部刚开始组建，新任政治部主任陈卓凡亦在广州（二十六师驻西江高要，即肇庆，距广州约百余里，广州设有该师后方办事处）。我旋持郭函，访见陈卓凡氏。陈系国民党左派，广东人，印尼华侨出身。北伐前，曾任广东揭阳县长、福建漳州各属（十三县）政治监察员（专员）等职。交谈甚洽。彼明知此时外省人来粤军部队一定有来历，亦不加过问，即委我任师政治部中校宣传科长。

工作决定后，在离穗赴高要前，我复谒郭慕亮同志，请示今后工作。郭说：“除公开的宣传工作外，拟注意两点：1. 稳住原有组织同志，并注意吸收新同志；2. 联络军事人员，特别注意连排长，借机掌握武装，俟有相当实力，必要时可举行暴动。”关于暴动时间，郭说，届时将另行通知。郭旋将二十六师内 CP 同志名单口头告我，我一一记下。

### 介绍吴祖培至二十六师政治部工作

吴祖培，今名吴晓铃，江苏吴县人，系今之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席、北京舞蹈学院院长。可谓名人矣！惟在当初，吴还是一名初出校门的青年，自家乡来到广州，我经其内兄之介绍，与其相识，交谈甚欢，嗣应之请，介绍彼至二十六师政治部任上尉宣传科员，复介绍其加入 CY 团体。

我在广州时，某次，经友人介绍，得以认识任职广东中央银行之常州同乡金联方。时在粤同乡甚少，于他乡听到乡音，倍感亲切。金复邀我至其寓作客，并介绍其妹夫吴祖培与我见面。吴

时大约 20 出头的年纪，面带几分忧郁，谈话间，吴道出来粤缘由：彼父母俱亡，有一继母，对彼不好，故决心脱离家庭，并愿意投身革命。当彼知道我将赴高要二十六师政治部时，即向我表示，愿一同前往，请我介绍。时金联方亦在旁插话，请我一定设法，我允之。次日，我即将吴之情况面告师政治部主任陈卓凡，说其为我江苏同乡，年轻有为。陈听后，说我们正需要青年人参加，乃嘱我偕吴来见。见面后，陈问了吴一些问题，见其对答不错，即委吴任该师政治部上尉科员。

### 高要兵运纪实

广东西江之高要，即肇庆，距广州百余里，二十六师驻节于此。约在 11 月初，我随师政治部主任陈卓凡、秘书王鼎新（留日学生）等一行，乘船离穗赴任。船中，陈发给政工人员每人勃郎宁手枪一枝，子弹 100 发，以作自卫之用。

抵步后，陈即介绍我们拜访师长许志锐。许为老四军的一员战将，粤籍，北伐中为四军团长。惜于翌年（1928）初，在桂粤战争中阵亡。

我在二十六师担任政治部宣传科科长，这是名义上的。实际上按照组织的部署，从事兵运工作，以配合驻广州之四军教导团举事（第四军教导团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CP 成员甚多，团长为叶剑英）。时于广州外围曾发生粤桂战争：张发奎、黄琪翔会同李福林，乘李济深离粤之际，发动事变，以护党为名，将桂军逐出广州，留穗之桂系黄绍竑亦被迫逃亡。广州城内军力空虚，仅留教导团驻防城内，为暴动之绝好机会，惟尚需各方配合，以壮大革命力量。故我抵高要后，即依郭慕亮提供的同志名单，先于高要城内一饭馆内，约二十六师团体负责人徐某（公开身份为团政治指导员）谈话，了解组织同志情况及工作环境、一般军事人员思想动态等。徐一一告知，并对工作进行

了研究。我将郭慕亮所示之在军事人员中发展组织同志的精神告知徐，嘱其注意。在以后不太长的时间里，我们先后发展了七八人加入组织，大多仍系团、连两级的政治指导员及师政治部的工作人员，至今记得名字者有陈书赤（连指导员）、卫聚贤（连指导员）、吴祖培（政治部宣传科科员）等，另有一团指导员梁××要求进步，拟吸收他，但未及办理手续即发生广州暴动。军事人员中，亦有一二名吸收对象，因事变突然，未及进一步联络。此外，我们建立了中共秘密支部，拟定了工作计划，记得其中一条即为配合广州教导团暴动。

12月11日，广州教导团因计划内容暴露等原因，被迫提前暴动，事前亦未能与其他部队中的团体同志联络，仅在广州市联系了部分农工群众。由于系仓促发动，损失很大，仅三天时间就告失败（张太雷亦牺牲于暴动之中）。12月13日10时左右，暴动失败的消息传至高要。陈卓凡比我早知道数刻，急来敲门，告知此事：“广州教导团兵变，情况紧急，请速作准备。”我待陈离去后，即速将二十六师组织同志名册及工作计划、会议记录等借上厕所为名，在厕所中烧毁，并通知师部团体同志，请作应变准备。至于分散在各团的同志因距师部有相当距离，而未及通知。

次晨，接许师长志锐通知：全师部队长及政工人员于大操场集合，听候黄总指挥训话。陈卓凡率政治部同仁皆参加，从广州赶来的黄琪翔讲话，严斥是次教导团的行动为“叛变”，嗣宣布：1. 广州共产党暴动，本师官兵应团结一致，严守纪律，不为所动；2. 师政治部即行解散，所有军械交枪械处封存，全体政工人员一律遣散；3. 全师整装待发，开赴广州平“叛”。集会后，陈卓凡率我等将枪械等收齐交师军械处，文件等交师部。陈复召集全体政工人员（包括师政治部，及团、连指导员）集会。陈于会中提出政工人员中，愿意离开者可随他前往，不愿走者，听候许师长发落。是日下午，我们10余位政工人员，有政治部王秘

书、徐某、梁××、陈书赤、卫聚贤、吴祖培及余等，即在陈卓凡率领下，离开高要前往广州转香港。

广州气氛时已大变，军队盘查甚严，遇有不懂粤语者，即可予以拘捕。幸我等一行，除我及吴祖培外，陈卓凡等皆粤人，故未受到伤害。

我们在广州住了一晚。我有幸在一家小旅馆中找到了自常来粤的二弟佳霖、三弟喜霖。我在高要时，曾写信给他们，邀彼等来粤发展，不意兄弟俩抵穗时，适逢广州暴动发生，两人躲在一间小旅馆中，不敢外出，才未遭伤亡。我给了他们盘缠，告知情势突变，嘱其速乘轮赴沪转常，另图计议。

次日，我即随陈卓凡、王鼎新等一行，乘穗港班轮赴港。

### 香港·上海

香港，这个英国殖民地，这是我第三次来此。惟心情与前二次不同，前两次俱为路过，是以一旅游者之心态看待一切。而这次，却是广州暴动失败后的逃亡，前途莫测。船抵香港，我们政工人员与陈卓凡、王鼎新两人分手，陈卓凡还留了其在港的地址给我，说有事可以找他。以后的事实证明，陈卓凡先生是很够朋友的，他明知我们 CP 组织人士，不仅没有危害我们，而且在我嗣后被港英巡捕房拘押后，不怕涉嫌，帮我代寻铺保。对此我是很感激的。陈先生后加入邓演达先生之第三党，任其中重要干部。1949 年，见报载，他又任全国政协委员，代表农工民主党（即昔之第三党），一直住在广州，惟却无缘再度相晤，实为憾事也。

与陈卓凡分手后，我们先住一间小旅馆内，拟择机寻找组织。后来，我找到了组织在港的交通站（在穗时，曾由广州组织开具了赴港联系介绍信），由交通站安排，我与吴祖培转往一位 CP 同志刘一得家中居住。其余广东同志，则有亲友在港者，居

亲友家，没有亲友者，亦由团体安排住下。刘一得夫妇待我们甚好。次日上午，该交通来访，将穆清同志（留法同学，四川人，时任广东区委的组织部长）的地址告知，我即去看穆清，至其居所，适其外出未归，穆妻与另一位同志在，我即坐下等候。约1时后，穆归，因系熟人，略事寒暄，我即向他报告二十六师工作经过，并请示今后工作。穆说，你们往下再说，工作问题，容我们商议后另行告之。后我问起广州暴动之况，彼谓牺牲很大，要恢复恐非短期内可以办到。我见其工作甚忙，旋起立与之握手告别。穆后于1930年牺牲于四川，惟我一直不知道此事，至“文革”以后，报载有新华通讯社社长名穆青者，我甚感高兴，即刻去函问候老友，然一直未有回音，后来才知，此穆青非彼穆清矣！

（上缺字）处，见其正坐在床头与李立三（隆郅，亦为留法同学）谈话，旁边还有一蓄小胡子的中年人在场。聂见我至，即自床上站起，与我握手，旋将该中年人介绍给我：“这是贺龙同志。”我即与贺龙及李立三（在法时已熟识，故聂无须介绍）握手致意。聂旋将我拉至靠窗的桌边，请我坐下。聂首先谓穆青已将我等情况告知，复谓：“你们到广东东江去工作，如何？”我答：“我等均无家室之累，愿服从团体安排。惟我本人不懂粤语，此行是否会有麻烦？”聂考虑了一下说：“你是负责人，有些具体工作可交由其他同志办理，且你们一行多数人为粤籍，少数同志问题不是很大。”并谓：“你们此行东江，可在汕尾一带登陆，再转赴海陆丰地区，择机建立根据地，根据地建立后，由你全权负责。”聂旋将东江情况语我，大意是说，东江为中共现存的一块苏维埃地区，彭湃同志于此经营多年，有相当基础，利于开展工作，根据地建立后，请与彭湃等保持联系云云。当我问我们如何前往时，聂答称拟用汽船，并说俟联系就绪后，即由交通通知我们。

过了3日，交通来通知我，说是汽船已准备好，请我们次晨

去××码头上船，届时彼将于码头迎候。次晨，我率二十六师广东同志10余人，带了简单的行李，来到码头。见该交通已在，海边停着两艘汽船。彼领我们上船后，即行离去。不意汽船开出码头仅2里许，即听身后汽笛声声，有香港巡捕数十人，分乘汽艇多艘前来围捕。我见事不妙，即迅将组织介绍信及有关文件，小的吃入肚内，大的撕碎掷入海中。港警将我等团团围住，连人带船，押送回港，关押在捕房内，记得媒体（报纸）还为此事作了报道。

在捕房，我们每人都经个别传讯，问到我时，我说我叫沈清尘，江苏人，身份是小学教员，来港找工作无着，拟赴广东，未暴露真实身份。其他人亦编造一番说法，亦未暴露。经多次审讯后，最后，捕房因查无实据，不得不宣布将我“交保后即刻驱逐出境”。我按陈卓凡留下的地址写信给他，请代找铺保。陈接信后，即刻来捕房探视，对我代找铺保事，慨然应诺。待办好铺保手续后，我即获释。我因是江苏人，旋由捕房派一警员押送我至开往上海的某国邮轮上，直至开船，该警始离去。

我就这样孑然一身到了上海。追寻组织不着，就此与组织失去联系。

整理者按：本文作者江苏武进人，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生。1920年冬赴法国勤工俭学，毕业于索米尔工学院及里尔大学。1923年春，经赵世炎、周恩来等介绍，加入旅法共青团（CY）组织。次年（1924年），复以王京岐之介，加入中国国民党旅法组织（左派）。1926年春，自法回国，在广州参加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国民革命。旋随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北伐，历湘、赣、闽、浙、皖、苏、鄂七省之役。国共分裂后，由中共团体派至革命军第四军二十六师，从事兵运工作。以上就是作者对这段经历的回忆。

（沈建中整理，1996年）

## 关于北伐前后几件事的回忆

唐生智 \*

(一) 1926年3月，湖南军阀头子赵恒惕被迫出走后，我在长沙捕杀了张雄舆等人。当时实际的情况是：赵恒惕统治湖南时期，湘军由最初的1个师逐渐扩充到4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十师师长刘铏、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其所部名义上是一个师，实际上拥有5万人枪）。叶开鑫是赵恒惕的死党，利用葛豪（岳州人）与吴佩孚联系得很好，他是极力主张吴、赵合作的；贺耀祖的态度摇摆，刘铏对赵也不高兴。驱赵以后，各人的打算不同，如刘铏想拥唐山献（号梨严，邵阳人。1923至1924年间，曾任赵政府财政司长）复任财政司长；刘铏的秘书长萧汝霖（号培陔），是一个吸鸦片烟、诡计多端的人，也有他个人的打算；叶开鑫看到大势已去，把第三师留在长沙的一部分军队撤往岳州，依附吴佩孚，另一部刘重威旅驻洪江、武岗、邵阳，准备待机夹攻衡阳。3月15日，我从衡阳到了长沙，即电邀贺耀祖、刘铏、刘重威等旅长以上军官来省，共商善后事宜。贺耀祖和我是湖南陆军小学、湖北陆军中学的同学，彼此关系还好。我首先找他商量，希望他和我合作共事，大家在一起把湖南的事情搞好。并且告诉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北伐战事即将举行，广东方面我已派人秘密接头，他们内定我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他（贺耀祖）是第九军军长（后因贺游移未受，改派彭汉章担任。北伐军进攻岳州时，贺部才受编为独立第二师，由原来的防地湘西转入九江）。只等北伐军进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

入湖南，就可以发表新命。贺当时说：“我的队伍实力薄弱，既缺乏子弹，又没有钱。”我说：“子弹没有问题，我还有百把万发存在衡阳，可以送三分之一给你。钱现在没有，我向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借了30万元，也可以分一半给你。”（后来分了三四十万发子弹和15万元钞票给贺耀祖）贺问：“他们（指刘铏、张雄舆等人）怎么办？”我说：“如果他们听话，希望一起来搞。”贺又问：“他们不听话怎么办呢？”我反问他：“你看应该怎么办？”他犹疑未答，我接着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不干掉他们，恐怕他们也会收拾我们。”贺说：“还是想办法拉拢他们为好！”我表示再商量。经过两天的酝酿，还是没有办法“合作”，只好采取最后一着了。于是，就在3月25日，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当场扣押了第二师师长刘铏、秘书长萧汝霖、旅长唐希登，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人；派贺耀祖兼任湘西善后督办。

张雄舆过去和我在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他是被扣诸人中最顽固的一个。张到长沙后，劝我不要跟国民党走，他认为只有跟吴佩孚走才有出路。他对我说：“我们不跟赵炎午（赵恒惕）走是可以的，但一定要跟吴子玉（吴佩孚）走。”甚至在他被扣到衡阳以后，还想跟叶开鑫去依附吴佩孚，其顽固的程度可以想见了。当时，叶开鑫称病请假，派张雄舆代理师长职务，部队大部分驻扎在湘西洪江一带。叶是没有什麼作用的人，张则有谋多计，为赵恒惕所器重。刘重威也是一样，能猛打乱冲。我考虑到，如果把他们放出去，将来出师北伐又会多一些麻烦曲折，拖延一些时日。因此，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下令处决张雄舆、刘重威、萧汝霖三人（刘铏、唐希登两人，在关押一个短时期以后释放了）。这是当时的局势使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原因，而不是个人之间的私仇私恨。在尔虞我诈的旧社会里，统治阶级内部彼此勾心斗角，各有打算，有些事情作长官的是不能跟所有的部

下说的（如何键、李品仙、叶琪三人，就互不信任，各有意见）。刘兴当时不太了解情况，事后我也没有和他详谈过这件事。因此，他只能就某些表象来猜度张雄舆等被捕杀的原因。我现在谈的这些，就是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由衡阳到长沙接任代理省长后不久，吴佩孚调遣部队，增防鄂南，准备对湖南用兵。并派谭道南到长沙，要我接受他的命令宣布“讨赤”，或者率部回驻湘南，并让叶开鑫部回到湘西原来的防地，恢复赵恒惕被迫出走以前的状态。谭是长沙人，和葛豪、叶开鑫都有交情，绰号“谭棉花”。他到长沙以后，由省政府招待住在天乐居旅社。我们见面多次，总是谈不拢来。最后，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我们湖南人生就的硬脾气，要干就干。历史上的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够做得完的，人生在世，只能做好一件事。我生平不会虚伪待人，也决不欺骗人，既已答应了广东方面，就决不会去跟吴子玉走。‘讨赤’不干，回湘南也可以，‘省宪’恢复不恢复，待广东北伐军来了再说吧！”谭道南还要为吴辩解，我就干脆地说：“吴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至此，谈判完全破裂，已无回旋余地，谭道南扫兴而去，吴佩孚再也没有派人来和我谈了。

（二）自从1922年初发生劳工会领袖黄爱、庞人铨被赵恒惕杀害惨案以后，湖南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越发高涨起来。工会组织日益加多，罢工风潮此起彼伏。赵恒惕非常恐惧，害怕工会发动群众来斗争他。当时，湖南是先有共产党组织，后有国民党组织。1924年春国共合作以前，湖南没有国民党的公开组织，暗中活动也很少。国共两党合作以后，在湖南的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的组织，夏曦、郭亮等都是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的负责人，我和他们会见过（水口山工运蓬勃开展后，有一次把宾步程抓来游街，我托人向夏、郭疏通，才把宾释放了。否则，宾不止游街

了事)。李维汉当时是中共湖南省委的负责人，易礼容在省农民协会工作，我也会见过他们。我指定邓寿荃、邓介松两人和他们密切联系。他们帮助我们做了许多工作，希望我们早日参加国民革命的行列。在 1924 年到 1925 年间，我和广东方面已有了初步联系。1926 年春，国民政府派白崇禧、陈铭枢来长沙和我联系参加北伐的问题(陈和我曾在湖北陆军中学和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同学)，他们在郴州、衡阳、长沙等地都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也派了冯天柱、周鳌山先后去广州联络(周曾往返多次)，互通声气。在湘粤之间往返奔走过的，还有后来担任北伐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刘文岛，他也是我在湖北陆军中学的同学。其时，广州国民政府已经内定我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赵恒惕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被迫出走，吴佩孚任命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利用湖南人打湖南人，而以北军监视其后。我到长沙后，即派人去广东，催促他们赶快出师北伐，广东方面最初答复说起码要等一年。后来再去催促，说半年或三四个月以后可以出动，如北军全力来攻，为了保全实力，可以先撤出长沙等地，让他们来。广东国民政府给我的任命是 1926 年 5 月 21 日公布的。同时送来了军费 10 万毫洋。6 月 2 日，我在衡阳宣布就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北伐前敌总指挥新职。6 月下旬，两广北伐军陆续到达湖南，首先到达的是第四军独立团叶挺的部队，其后是第四军第十师陈铭枢部、第十二师张发奎部和第一军教导师王柏龄部。第七军和第三军也都是经过衡阳、株洲进入江西的。北伐军入湘后，第八军开始分路反攻，于 7 月 12 日占领长沙。1926 年冬，前敌总指挥部撤销，成立第四集团军，由我担任总司令。原第八军先后扩编为五个军：第八军军长李品仙，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第十二军军长叶琪，第十七军军长周斓。

(三) 刘兴遗稿中提到 1927 年秋的东征讨蒋(介石)，他认

为时机尚未成熟，曾劝我暂缓东征。我还记得，刘兴当时是向我提出过这样的意见的，这个意见有它一方面的理由。但是当时张发奎的部队已经按照汪精卫的意图开到广东，我早已答应了他共同反蒋的，不能自食其言。更重要的因素是：汪精卫当时极力主张倒蒋，我和张发奎都是拥汪的，自应采取一致的行动。毋庸讳言，我当时对汪精卫的印象是好的，觉得他能说会讲，过去刺过摄政王，有一段光荣历史。我到什么时候才看破这个人呢？直到1932年蒋汪合流，他当了行政院长，我才看破他是一个没有骨头的东西，过去刺摄政王也好，倒蒋也好，都是为他个人，自私自利到极点，我再也不愿意跟他搞了。

（四）1927年东征讨蒋失败后，我离开武汉东渡，赴日休养，临行前下令处决了第八军第一师师长张国威。这件事外间传说纷纭，实际情况是这样的：

这年8月下旬，宁汉双方举行庐山会议，决定分共及宁汉合作。汪精卫当时没有去南京，他在上海打了一个密电给我，说庐山会议决定宁汉合作，第二步将对付我，希望我早作准备。我派叶琪往南京找白崇禧谈谈，了解一下情况。他回来说，谭延闿、程潜主张先攻武汉，程与张国威、何键有联系，请注意。当时得到这个消息后，有人主张把他们一起搞掉，我回答说：“不要把队伍搞散了，以后才能再干。目前不必操之过急，先找他们来问再谈。”在离开武汉的那天晚上（11月11日），我把李品仙、何键、刘兴等人找来谈话，张国威也来了。我只把这个问题提一提，何键就吓得发抖。我说了大家今后要搞好团结才有办法等一大套话，随后就离开了会议的地方，并下令把张国威处决了，而没有处分何键。从当时情况看，张、何之受程潜收买，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并不奇怪，因为大家都是小同乡，又有些旧关系。

至于当时我为什么离开武汉去日本呢？

原先我以为谭延闿等都是湖南人，纵然不帮忙，至少不至于与我为难，哪晓得他们会和桂系搞在一起对付我呢？他们到庐山开会期间，黄郛同蒋百里来汉口见我。黄要会我，蒋百里先告诉我他的来意，我然后会见了他。黄郛来干什么呢？据蒋百里说：“膺白（黄郛别号）的主张，也就是蒋先生（蒋介石）同样的主张。现在是你和蒋、桂系、阎（锡山）、冯（玉祥）、张（学良）的势力最大，蒋与桂系之间已有意见，黄膺白主张你和蒋、张合作，而以你与蒋先生的合作为中心，再拉拢阎、冯，这样，桂系也不敢动了。”蒋百里强调我和蒋介石合作的重要性，并说：“你们可以拜把啊！”我表示不同意，因为根本对蒋无好感，不愿和他合作。

庐山会议以后，谭延闿等都到南京去了，蒋介石“退隐”奉化，快要到日本去。这时，他对陈公侠（陈仪）和蒋百里说，要我和他合作，莫离开部队。能打垮桂系则打，否则按兵不动，退回湖南，经济上由他负责接济。这个消息是蒋百里通过汪翊唐（时璟）转告我的。汪翊唐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他是汉口一个商业银行的经理。过去我在常德当旅长时，王天培（黔军袁祖铭部旅长）送了我几十担鸦片烟，寄存在汉口。北伐胜利后，我就以这几十担鸦片烟的价款在汉口办了一个商业银行（股金总额为50万元），预备以赚来的钱作政治活动的资本。汪翊唐在日本学过经济，他就是由蒋百里介绍来担任经理的。

汪翊唐把蒋百里的意见转告了我，我当时考虑到：蒋桂终究是要发生冲突的。如果这时候我不走，跟蒋介石合作，桂系也可能会变的，他们也可能跟蒋介石合作，这对我并无好处。同时又想到，这么多军队如果回到湖南去，供应方面大成问题（过去湖南军费不足，还要靠湖北、安徽等省的税收接济）。再则桂系与蒋是迟早要决裂的，如果我不离开部队，他们可能合起来打我；离开了部队，目标就没有了。因此，我决定离开一下。总而言之

之，当时估计蒋桂之间一定会发生冲突，我如不离开部队，纵然打垮了桂系，占便宜的是蒋介石；桂系把我打垮了，最后占便宜还是蒋介石。暂时离开一下部队，料想摆两三年还不会出问题，这并不是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也不是有什么特殊组织，而是估计凭私人感情的维系，可以拖住两三年不垮。

我当时既已决心离开部队，对于尔后的安排也拟了一个方案，并且在武昌到岳阳沿路驻有重兵，便于撤退容易。而不是像刘兴遗稿中所说的我是那么匆促地离开部队的。当时的布置是这样的：我自己东渡日本，部队退回湖南。以王德光（湘乡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的一团摆在零陵，周荣光、罗子雯两个团一起摆在洪江，刘兴的部队驻扎在衡阳、邵阳、新化一带。

（五）1929年秋，第五路军在河南对冯玉祥作战。当我军在巩县以西的黑石渡桥（黄河小支流）附近与冯军接触后，蒋介石到过郑州一次，同来的有总部参谋长熊式辉等人。其时，归我节制参加讨冯的部队，还有郝梦龄师。我到前线指挥作战，就住在郝梦龄的师部（驻关帝庙）。蒋到郑州后，打电话到关帝庙找我接谈，他在电话中说要坐火车到巩县来。我请他等一天，因为今晚将有一个拂晓攻击，如果获得胜利，即到郑州相见。这次攻击得手后，我到郑州见了蒋介石，就住在他的专车上（专车停在陇海花园里）。我们见面后，谈了许多话。蒋大概知道我和阎锡山有来往，故意对我说：“我们南方人性情直率，尤其是你很直率，北方人最阴险，特别是阎锡山、冯玉祥阴险万分，你无论如何搞他们不过的。”他又说：“这次战事结束后，杨杰的第十军以及徐源泉、杨虎城、蒋鼎文的部队，都拨归你指挥，请你坐镇西安。汉卿（张学良号）是东北边防军事长官，将来你就担任西北边防军事长官，负起建设西北的责任。”我不以为然地说：“建设西北嘛！我看起码是三十年后的事。”蒋看到我不想西北，便转口说：“如果不去西北，我们重新训练军队，德国顾问已找来了

(其时，蒋已开始走法西斯的道路，请来的德国总顾问，首先是塞克特将军，后来是法根浩森将军，此人后被希特勒迫令回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驻比荷总督），就请你负起这个责任。”我未置可否。他接着说：“你希望做什么，可以做什么。有机会到外国去一趟也可以的。”我和蒋介石的这次谈话，龚浩知道一部分内容。后来酝酿再度反蒋时，龚表示反对，他说我要求什么，蒋就给什么。这话不是无因的。老实说，我几次反蒋，总不相信他会把国家大事搞好，觉得他自私自利得厉害，没有一点为人民为国家打算的念头。只要自己想怎么样做，就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的。

(六) 1929年冬蒋冯战事结束后，有一次，我在郑州接到蒋介石的一个密电，大意是：据报韩复榘不稳，他到郑州来会你时，希予以扣留。所遗河南省主席一职，由你兼代。当时我正在酝酿再度反蒋，不打算执行他这个密令。蒋的密电到后不久，又派俞飞鹏来郑州，送给我一部分弹药和军费。随后，韩复榘也由开封来到郑州。他带了两个卫士到陇海花园里我住的专车上见我。卫士留在车外，韩单独上车和我相见。寒暄几句后，我对韩说：“石友三已经动起来啦，你对他怎么样？”（其时石友三在浦口发动反蒋）他答：“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把蒋介石的密电递给他看，他接过一看，脸色陡变，恐惧万分，双膝跪在我面前，哀求地说：“请总司令救命！”我边扶他起来边说：“你怕什么！我如果要为难你，又怎么会把这个密电给你看呢？不要怕，今后我们一起来反蒋吧！”韩这时才转忧为喜，感激地说：“我以后绝对服从总司令，您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因为俞飞鹏还在郑州未走，韩建议我把俞扣起来，我说：“这没有必要，何必打草惊蛇。”并嘱他赶快回开封去。听说韩回开封不久，蒋介石就派人携带巨款（大约是几十百把万元）去收买了他。以后我在郑州宣布反蒋时，韩就不再跟着来了。我现在想起，戴笠那时

虽然还没有搞起军统特务组织，却已在郑州做工作，我放走了韩复榘，很可能就是他向蒋介石告密的。说起来我们那时候反蒋也真幼稚，如第五路军成立以后，我用了蒋锄欧做铁甲车司令，谁知他就在铁甲车上秘密架设了无线电台，和蒋介石通风报信。（后来知道，蒋锄欧这样做，是林蔚文布置的。）

（七）刘兴的遗稿说：“杨虎城本来是反蒋的，又归唐指挥，唐认为是没有问题的，但到后来，杨背弃了唐，并向唐进攻，使唐受到致命的打击。”杨虎城的部队袭击我驻马店前进指挥所，这是意外的事。记得在战事将告结束时，杨部旅长冯钦哉曾来见我，请示机宜。我对他抚慰一番，并把郑州兵站存留的一部分弹药送给了他。（当时，杨是想依靠蒋介石回陕西的。）

刘兴遗稿又说：“唐生智通电反蒋，并把军队向确山推进时，武汉空虚……夏斗寅几次来电催我军速去，唐迟迟不动。”实际情况是：不是我迟迟不动，坐失时机，而是当时天降大雪，驻马店、漯河一带地方积雪两三尺多深（据农民说，这是几十年没有见过的一场大雪），气候严寒，部队无法行动。这是天时不利，也是人谋不臧。

（1963年）

## 北伐前北洋军阀动态片断

刘毓源

### 吴佩孚和冯玉祥

1924年，直系和奉系军阀发生二次战争。正在山海关决战之际，冯玉祥突然发动军事政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由古北口急行军，一夜之间，直趋京师。随即将贿选总统曹锟囚禁，给直系军阀一个致命的打击。吴佩孚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乘华甲舰由塘沽逃往湖南岳州，依存于赵恒惕，准备伺机再起。

在直奉两系决战之前，吴佩孚已窥知冯玉祥怀有异心，不过认为他势单力薄，料他不敢轻举妄动。尽管如此，但吴并未因此而放松对冯玉祥的警惕。所以日常吴对冯，无论在什么场合，表面上，尽管显示得如何器重，而实际上是处处加以防范，特别是在军事的部署上。当直奉战端既开，吴佩孚命冯玉祥任左翼指挥，进军古北口，而置胡景翼部队尾其后，盖吴深知胡景翼因陕西军郭坚案对冯怀有芥蒂，将胡置于冯后，吴可防止其异动。另外，吴某所以置胡于冯玉祥之后，不仅由于他们之间有着隔阂，主要的是胡某素常在吴面前殷勤表现获吴某信任。例如：胡某在吴面前经常这样表示说：“我是大帅（指吴）的狗啊，叫我咬谁就咬谁。”因此吴某用胡防冯，自以为万无一失。殊不知军阀本质，就是唯利是图，利之所在，任何背信弃义之事，都可做得出的。胡景翼当然也不例外。事后谁都知道冯玉祥的军事政变迅速成功，是得益于胡景翼和京师警备司令孙岳之助。但是他们三人的结合不是起于古北口之役，是早在曹锟贿选之始。尽管不无政治背景，而主要的都是因为个人的权力和地位的问题而趋于一致，

三人暗中联系密谋策划已非一日。古北口之战，吴某用胡以殿冯之后，正是给冯玉祥一个可乘之机。因此一举而拆了直系之台（一说冯某的军事政变，系奉张所收买）。吴佩孚失败后，冯玉祥、胡景翼以及孙岳，以原有之部队为基础，扩充三军，其势力所及，几乎遍于全华北，囊括陕甘宁。所不及者除山东外，仅山西一省而已。因此冯玉祥欲谋取山西，是势所必然的。

### 阎 锡 山

山西省襟山带水，形势险要。阎锡山自辛亥革命窃据三晋，垂数十年，在他统治的过程中，无论是军事、政治，以及经济，其本质与其他军阀无丝毫差别。但他在策略上与其他军阀则稍异其曲，一般目之为骑墙派。盖因其在军事上，是看风驶船；在政治上是标奇立异，为了保持自己长期统治之地位，采取种种不同之手法。民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在北伐之前，能以喘息无恙者，不仅由于其所在省的形势险要，而其为人的奸巧，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冯玉祥军事政变，其势力既然囊括全华北，对山西未尝须臾忘却，必欲得之。这在阎锡山来说最清楚。但考虑硬性与之对抗，恐势所不敌，因此，阎对冯玉祥一面虚与委蛇，曲意逢迎；一面联系反冯各派，特别是直系军阀湖北督办萧耀南，奉系军阀张作霖，以壮自己之威，掣冯玉祥之肘。

1926年鄂督萧耀南由湖南迎吴佩孚入鄂，成立所谓讨贼联军，由吴自任总司令，派靳云鹗、寇英杰率军入豫，驱走冯系督办岳维峻（原胡景翼旧部），由寇英杰督豫，并命靳云鹗继续北上，会直鲁联军（奉系），迫使冯军退入南口。根据当时情况，靳云鹗本应率师长驱而进，一鼓而捣塞北，可是靳云鹗竟驻扎保定，陈兵于长辛店北，按兵不动。其所以迟迟不进的原因，正如前面所述，出于唯利是图的军阀本质。事态一旦和个人利益有了冲突，其行动即有所变化。靳云鹗进军河南之初意，即为了攫取

豫督，作为个人发展之资本。讵料克豫后，吴佩孚却将豫督职位给予寇英杰。这就使靳云鹗大失所望和不满，不得已率师北上，以为今后的胜利，还不是为了别人作嫁衣裳？因此心怀异志密谋他图。

这时奉系军阀李景林任直隶督办，因在奉系中受少壮军人之歧视，郁郁不得志。靳、李同病相怜，通过政客游说和联系，进一步和冯系拉上关系，密谋推翻吴佩孚，建立所谓新直系。正当酝酿即将成熟之际，事为阎锡山侦悉，以为所谓新直系，如果获得成功，对自己是大大不利。因此急速派员赴武汉，向吴告密。吴佩孚闻讯随即率员兼程赶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晤，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免掉靳云鹗之职。冯、靳、李一场新的密谋遂告失败，在吴来说，这不能不归功于阎锡山，但这不意味着阎衷心拥护吴佩孚。实际上阎是为解除自己未来的威胁，而进行所谓联甲倒乙，或者是联乙倒丙的一种策略，也是他在山西多年来所实行的一种惯伎。

### 直系军阀的彻底失败

吴佩孚将靳云鹗免职，为安定军心，本人即进驻长辛店，进一步和奉系张作霖结成联盟，张、吴会晤于京师，释曹锟之囚，共谋彻底击败冯系军。当此时，人们都知道过去北洋军阀各系相互联盟，都是建筑在利害的关系上，所谓同利害则相亲，利害冲突则相仇，直奉的联盟也不例外。在他们联盟之始，直隶省由两系分治，吴佩孚委潘龄皋为政务处长，掌握保定、大名两道的81个县，但是所委的县长，常常被奉系驻军所驱逐，甚至有的连接任都不可能。尽管如此，但是并没因此而使两系发生冲突，这主要是直系吴佩孚因自己势孤，大敌当前，不愿再树敌。由此可以窥知，所谓联盟是不可靠的。

1926年，北伐军进入湖南，长驱北进，鄂督陈嘉谟告急，

吴佩孚返师援鄂，和北伐军会战于汀泗桥，形势危殆。曹锟由保定致电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求援，电文如下：“十万火急，孙馨帅于密，南军北进，鄂省告急，请念唇亡齿寒之义，出兵株萍路，以断敌军之后援，以解我军之危机。事急时迫，希勿延缓，幸甚。曹锟印。”在此同时，奉系直鲁军以援鄂为名，节节接直系军之防，而达武胜关后，即陈兵观望。汀泗桥之战，孙传芳坐观成败而未出兵，无补于败局，奉系军陈兵武胜关又坐视不救，以至形成直军进退维谷。不得已，吴佩孚率残部退至巩县，又由老河口南去，逃往四川，依附杨森。北洋军阀中，称雄一时的直系军，至此即全部消亡矣。

(1964年)

# 北洋军阀在两湖战场失败实录

刘少泉 \*

辛亥革命推倒清朝统治，改建民国以后的 15 年光景，军阀混战连年，民不聊生。广东国民政府为救民于水火，于 1926 年 7 月开始了北伐。早在同年 3 月，湖南先发起了驱赵（赵恒惕）大会，紧跟着是唐生智参加国民革命，进兵长沙，开通了北伐道路。广东北伐军未到以前，吴佩孚虽又派兵帮助叶开鑫重返长沙，但是湘粤两军既是同舟共济，工、农、学生又复大力支援，革命力量已经是势不可挡。所以，广东的西路大军一入湖南就很快地攻下长沙，并乘胜北进，席卷湖北全省，奠定了北伐胜利的局面。兹特缕述北伐时南北两军在两湖战场战斗的简要经过如下：

## 一、粤、湘、鄂三省战前形势

广东军政府从 1925 年 7 月改组为国民政府以后，在 11 月东征陈炯明，收复东江，统一了全省。1926 年 7 月就开始了北伐。北伐军分为东西两路，蒋介石随东路军行动。东路军包括何应钦、白崇禧、王柏龄等部，道出江西（东路军总指挥何应钦先由潮汕进入福建），经皖、浙直捣沪、宁。西路军进攻两湖，以唐生智为总指挥。部队有唐生智、张发奎、陈铭枢、方钰璜的第四军、第六军、第八军等部。另外在大军出发以前，先派叶挺率第四军一个很精锐的独立团为先遣挺进队，提前北进。同时，在部队出发的时候，省港罢工委员会组织了 4000 人的运送队随军出

\* 作者系直系军阀吴佩孚部将领。

发。

湖南在赵恒惕下野后，一时政局异常紊乱。北洋派的军阀、第三师师长叶开鑫奉吴佩孚令，设湘军总司令公署于长沙，兼管军民两政。所属部队分守长沙及粤汉铁路、株萍铁路沿线重镇。第二师师长刘铏已故，部下叶琪、何宣、刘兴、蔡鉴四个团长分为两派。蔡鉴先扩充成旅，拉到公安投归了湖北。贺耀祖的第一师驻常德、桃源一带。开始是存心观望，后来才向南军靠拢。独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走革命路线。奉广东政府令称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所属部队驻在衡阳以南，扼守粤汉铁路及其以东地区，与叶开鑫的军队对峙。原在湘西的零星杂牌部队大部分在两湖开战以后，先后分批归附了革命阵营。

湖北位处全国中心区域，为兵家所必争。所以吴佩孚一向是自兼两湖巡阅使，另以陈嘉谟为督理。除去在武胜关外备有靳云鹗、田维勤、寇英杰的精兵约近 20 万，以防中原之变。他把直系的精锐部队 10 个师放到湖北。以陆沄的第二十五师、刘玉春的第八师、刘佐龙的第一师驻武汉及鄂东。张联升驻襄樊，卢金山、王都庆的重兵镇守鄂西。在事变以前早就派下师长董政国协助广西将领马济防守岳州。叶开鑫返回长沙后，吴佩孚又分兵两路大举援湘。在东路以宋大霈为援湘军第一路总司令，指挥暂编第一师、第二十五师与董、马两人防守岳州。西路以王都庆为援湘军第二路总司令，率所属第七师、旧第八师的第十五旅、刘汉三的第三十六旅，及湘军蔡鉴的第三旅进防两湖交界。

## 二、两湖战场主力的演进

北洋军阀以吴佩孚势力为最大，他的主力又都放在两湖。所以湖南、湖北两省是北伐战争的主要战场。

在 1926 年 4 月下旬，北洋军打了胜仗，湖南的革命形势十分危急。谢文炳的粤军、唐福山的赣军、董政国的直军帮助着叶

开鑫从长沙向南推进，在朱亭、衡山战线上将唐生智的第八军打得难以招架。唐生智几次求救于广东。5月下旬，紧跟着是攸县、衡阳相继失守。第八军退到耒阳以南的永兴。这个时候，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叶挺率领先遣队，不分昼夜地冒雨急进，正好和那蓝、安仁退下来的一部友军会师。一个反攻就攻下攸县。不久，广东两路大军的主力也到达了前线，在7月上旬连克醴陵、浏阳两县。7月12日，又配合唐生智的第八军打跑了叶开鑫，克复了省城长沙，城中到处挂上了青天白日和革命红旗。

差不多同时，在平江县也发生了剧烈的战斗。平江的位置重要，形势险固。吴佩孚先委派了蒲圻镇守使为平（江）通（城）防御总司令。他利用极险要的鲁肃山和汨罗江，依山据险修筑了极坚固的工事。利兵密陈，严阵以待。北伐军为慎重起见，预先派回平江原籍的几个精干军官去实地侦察，并和当地极有力的农协联络好了，然后才发动总攻。这一次不止是军队打的是硬仗，还有农协早编好了的奋勇队、冲锋队、侦察队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所以他们胜利地强渡汨罗江，闯进了北门。北伐军完全控制了北洋军的阵地，致全线获得胜利。湖北军最后一着是吴佩孚在通城派兵一团前来增援，但是又被叶挺在团山铺截击歼灭。弹尽粮绝之后，紧跟着就是守将自杀，平江失陷。

平江失守的第三天，吴佩孚忽然南下到了汉口。因为岳州向称军事重地，兵家必争。这里防守的直军有宋大霈、董政国、马济、叶开鑫、唐福山等各省主要军队共六七万人。岳州得失对于南北战局影响极大，中外人士观瞻所系，重要非常。所以双方的主力全都放到这里。这次战斗最突出的一点是长沙、安源工人及各县农协群众助战的表现。全线上哪里有战事，哪里就有他们。到战争末期，革命军又借着他们的帮助绕到敌人的背后，似一把钢刀刺入了腹心。直军二十五师首先撤退，宋大霈、叶开鑫的军心一乱，演出了一场全线大崩溃。连那位南下督师的赵恒惕也都

随着大军逃走。革命军遂在 8 月 22 日夜间占领了岳阳。

岳阳丢失以后，吴佩孚因为痛心宋、马各军作战不力，节节败退，仓皇间亲自出马，指挥着武、长路的守军及从北方新调来的一个师，在汀泗桥重整旗鼓，凭险以待。满心以为能挽狂澜于既倒，但是，事实是实在出他意料之外。就在这时，北伐军总司令的专车忽然在蒲圻出现。起初本来在东路的蒋介石又带着白崇禧等前来督师了。汀泗桥这个难以攻取的天险，因为北伐军富有执锐攻坚，勇敢牺牲的精神，所以如湖北的守军动摇，就要把守不住了。吴佩孚这才又亲自督战，杀了一个旅长，一个团长，结果还是全线崩溃，大军北移。最后不得不在地形天险的贺胜桥做殊死战。但是大势已去，直军已成强弩之末，革命军乘胜猛攻，又得力于叶挺的独立团，杀得吴佩孚七零八落，最后仅以身免，逃回省城。在汉口查家墩的那个“讨贼联军总司令部”发号施令，戒备森严，还是余威尚在。喘息未定而不料患生肘腋，师长刘佐龙又出其不意而倒戈。他的部队已经变为革命军第十五军。刘又被委为武汉警备总司令。所以在宣誓就职不久，北伐军一鼓而攻下汉口和汉阳。吴佩孚迫不得已逃往河南郑州。刘玉春的第八军退守武昌城内。这时，广东的第四军、第六军和湖南的第八军以及各省归附革命的杂牌军队都到武昌城外会师。唐生智、张发奎、陈铭枢、程潜等军一面派兵向武胜关追击，一面围攻武昌城。刘玉春在武昌城内千方百计死力抗拒。9 月底，北洋军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派了大型军舰两艘出重兵援鄂，在黄石港一带示威。刘玉春又派兵缒城接应，但都被围城部队击退。后来终在 10 月 10 日黄昏，革命军先打破了一个缺口，攻克了武昌省城，全歼敌第八师，活捉了刘玉春及武昌守城司令陈嘉谟。两湖战事至此方才告一段落。

因为这次北伐是为民请命，革命军敢于牺牲，又有各省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所以能得到异常神速的胜利。

### 三、革命军左翼从湘西攻入鄂西

直军鄂西方面的军事是由王都庆负责，他的援湘军第二路总司令部驻公安县城。所属第七师、第十八师第三十六旅、第八师第十五旅、湘军第三旅等分防两湖省界。

革命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放在两湖的东半部，其左翼对于鄂西方向是助攻。革命军部队有正规军，有杂牌军，有客军。内有贺龙的原常礼镇守使兼暂编陆军第一师，还有陈光汉、唐生明两旅，陈策珍、蔡鉅猷两部，贺耀祖的一个师，及熊克武的一部分客军。

这些部队有先有后，忽进忽退，战事不甚激烈，行动类似拉锯。本来以前王天培就曾率领一军占领了公安县城。以后又一次攻过政公渡，占了黄金口，烧了英美油烟公司。1926年3月以后，双方战事频仍。4月中旬，湘西部队攻打松滋，想沿江直袭沙市，打得很好。湖北第八师的一个团损失很重。可是后来受了丁二虎二十七团的侧击重创，退回了湖南。

第二次进攻是1926年5月25日，部队不少。右翼从南县起，左翼至白洋堤止，战线横亘50华里。湖南第一师的某部在安乡突破了蔡鉴第三旅的防线，乘胜追击，到了藕池口又在虎渡河附近发生了相当剧烈的战斗。

第三次规模更大，经过的时间也久。战线右翼从华容起经安乡到津市、礼州。左翼的战事是伏路把关。右翼的战斗还夹杂着水战。地当三江九泽，到处都有农协民军，打击直军，帮助革命军。所以，湖北军前敌指挥部的韩参谋长在电话里说：“我们前线后边的老百姓都是敌人。”但是由于得到刘锦标十三旅的增援，湖北军反攻猛扑，又得转败为胜。于是湘军又从洞庭迤西退却。左翼进攻部队也是受了三十六旅的伏击，惨遭失败。战后，三十六旅进驻津市，第十四旅、第三旅入南县，第十三旅到安乡。总

司令王都庆率总预备队一个旅移驻礼州，相机而动。

8月22日，革命军攻下岳州，紧跟着吴佩孚又三战三北，放弃了汉口。于是长江上游和湘西的局面就完全变了。不久，王都庆忽然病歿。9月21日，师长阎得胜等不得不率领大军退回湖北，在石首、藕池、荆沙、宜松一带择要布防。湖南革命军自然是尾随跟踪而至。正当这时，吴佩孚忽然来电，四川杨森因旧日和吴佩孚的关系，要东下援鄂。经我到宜昌和上游驻军将领于学忠、卢金山、新编第八师师长张福臣（当时还有刘玉春的另一个老第八师驻在武昌，祥前）等会商结果，勉强通知川军在江口、董市登陆驻扎。

这个时候，省城既已不保，宜昌、沙市当然变成绝地。无粮饷、无领导，北军群龙无首，已经成了乌合之众。外围的环境呢？是湘军正在对峙，川军近在咫尺。更奇怪的是川军虽已归附革命，却还假借友军名义，直接开到沙市与彼同处。紧跟着利用直军的愚蠢，在10月15日下午发起攻击，荆沙守军全线崩溃。革命军接连着又在荆、宜各地，先后分期解决了直系残军五六个师。完全占领了宜昌、沙市两个商埠。附近各县都挂上了革命军旗。

从此，久居鄂西各地的全部直军都被各个击破。后来几经易地整编，才由原驻施南的二十六师师长于学忠率领着退到河南，归降了东北张作霖。另外一小部分由十八师的旅长毛永思（大毛）率领着，投向山东的张宗昌。鄂西十六县既已全部光复，两湖战争也就宣告结束。

（1965年）

## 武昌守城战役纪实

朱明轩\*

武昌守城战役，当时我充吴佩孚卫队团第四营营附，随卫队团两个营参加守城作战。进城后升团附。团长曹天明随吴氏逃郑州。关于守城苦战状况，当知梗概。现仅就回忆所及，对军民交困及惨重死伤、财产摧毁情形，概要述之。

汀泗桥、贺胜桥一役，吴佩孚部几乎全军溃灭。残部各军、师及吴氏卫队团两个营，连同武昌留守部队，共约3万余人。残兵败将，纷乱杂沓，全拥入武昌城。各部进城后，吴即令陈嘉谟为武汉守卫总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严饬固守待援。并将汉阳兵工厂枪炮弹药，大部运入武昌，并运入一批面粉，准备固守，作困兽斗，待援反攻。

### 武昌守城部署和经过

武昌城垣广阔，计有武胜、通湘、文昌、中和、保安、宾阳等十三门。城内部署，除留一部控制城内作警备策应外，并于街口扼要筑堡设哨防守，大部队分置城防，按各单位兵力，划区分段固守，我所在的卫队团任武胜门及其以西的一段城防。守城部队分防后，吴氏由前线退回城内，在武胜门左近城垣，召集各将领训话，严令各军固守，以十日为限；十日后，即亲率大军渡江解围，大举反攻。他自欺欺人地对大家说：“我们一时虽稍受挫折，胜败兵家常事，我们退守，是诱敌深入。握紧拳头，再打出去，力量是大的，且五指拳回，犹如各路大军将敌包围，一鼓即

\* 作者系直系军阀吴佩孚卫队团第四营营附。

可歼灭，大获全胜。”说时很为得意。训话后，即离城渡口返豫，调动部队，准备反攻，并电商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出兵苏、皖、赣，分向南攻，期收协力进攻之效。

守城兵力三万余众，配以充足军火，严密分守城防。各城垛口，均有密集兵力及轻重兵器防守，并悬有灯火滚木，备有石灰砖块，以防北伐军爬城。蛇山及环城要点，均设置很多炮位，各单位还控制许多预备队，昼夜环城巡查，随时策应。刘玉春也不断亲自带队巡查，直将城防守如铁城。

围城的北伐革命军，有第一、第四、第八等军及叶挺独立团等部；将领有唐生智、陈铭枢、张发奎、黄琪翔、叶挺，并有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和俄顾问加伦将军等，全是英勇善战的勇将。围城第二日和第五日，北伐军先后均编有带云梯的敢死队，在猛烈枪炮火掩护下，云梯队爬城强攻。先后由宾阳门、保安门等城外坡较低处攀登爬进，叶挺部爬城最奋勇，前赴后继，被炸弹机枪毙伤者至多。邓演达主任亲临督战。几次攻城猛扑，均遭失败。邓的马战死，邓的军服被穿洞。重要将领纪德甫阵亡。以后更用炸药轰城，油火焚城，暗沟攻袭（城门旁有暗沟）等，全没奏效，且伤亡极重。当时京沪帝国主义报纸将刘玉春描化为田单、张巡式的守城英雄。虽然城防“固若金汤”，但守城军警及机关人员三万余众，加之城内商民二十万众，旷日持久，军民食粮，确是极严重的问题。各败军仓皇进城，未能充分储粮。城内商民又向不存粮。粮坊大多在城外商埠，城内甚少。进城部队，第二天即感到粮荒。商民更万分惶恐，终至由于部队坚守，军民无粮，竟造成军民死伤惨重，财产荡焚，惨绝人寰的大浩劫。部队苦守共42天。围城部队，自9月1日至双十节，共围了40天。

### 武昌被围后军民交困的惨情

军队方面，在守城无粮时，有时打开粮仓，将为商民备荒年

储备多年的谷米谷糠，分发部队，维持了约两三天；有时挖掘坑藕分食，约维持了一天。搜集商民豢养的畜类，如骡、马、牛、羊、鸡、鸭等，维持了约一天。记得每营约四五百人共分到一头骡或牛，或几只羊、猪。又有时划区分街，挨户挨店（商号）搜取食物。只要能入口者，即可尽量搜食，约维持了一两天。又有一次，由各单位分派官兵一部，合编成三个团，称为抢粮掩护大队；另编成800副抬筐大队，利用夜间，打开中和门左右三个门打出城外，掩护抢粮。前边打，后边抢。当和围城军演成至激烈战事时，虽然抢了几百担粮，可是死伤了数百官兵，结果所抢的粮，仅维持各军的一顿稀饭。又有一夜，守城某部派队缒城抢粮，全部被叶挺部消灭。此次听说叶挺部下级官长，亦几乎全部伤亡。从此守城军再不敢出城冒险，后来守城各部队即各就防区范围，随时视机派兵夜间缒城到距城根外围附近拔取青菜或搜取食粮食物，各自设法维持。

商民方面，在无食时，满街商民带袋携篮，拥至街巷，整日往来奔驰，寻购食物。但毫无所获。有的无吃的，全家整日围桌饮水，或以小盘盛瓜子少许分食，或挖取菜根树皮充饥。有的给自己饲养的狗、猫叩个头，一棍打死，全家宰食。有的商号人，只要给他点吃的，绸缎衣物，就可以随便取用。有的青年妇女，给她点食物，即可任意蹂躏。又其间因无吃的，悬梁饮毒自杀者有之，被奸淫羞愤自尽者有之，此时城内树皮草根、鸡、鸭、狗、猫，甚至老鼠、家雀等全被吃光。听说还有吃土馒头馅饼（观音土）的。后来围城到二十多天，汉口、汉阳商民，发起营救武昌商民运动，经与武昌商民及敌对双方商妥，开放城内商民，规定时间，地点和开放接运办法，由文昌门出城，由汉口派轮接运。当日挨户发出城证，轮流进城。在开放日，由于商民拼死外出，致街市拥塞，前赴后继，赴者不能起，后者再继赴，竟至层层叠叠，压毙多人。其已逃出城外者，又因争上渡轮，坠

江淹死者不少。因此只接了一次，即告停止。

以上情形，仅就回忆见闻所及，约略举述。至于商民被枪炮打死，被烈火焚毙者，更不计其数。环城外围，商民楼房甚多，有的距城颇近，围城军登楼挖洞，向城垛守兵射击，居高临下，守兵只挨打，不见敌人，因此伤亡颇多。后来，守城部队奉令扫清城外射界障碍，各部队对距城甚近的城外楼房，即用衣被浇以煤油，燃着外投，竟将城外楼房、平房，大部烧光。熊熊烈火，延烧多日。人民死伤，财产荡焚，无法统计，惨状难以形容。

吴佩孚渡江回豫，企图调集部队，准备反攻。当时驻豫、鄂部队正规军，尚有靳云鹗、于学忠、方振武、张联升、徐寿椿、阎德胜、田维勤、田公育、马吉第、门炳岳等部，及张治公、任应岐、牛绳武、樊老二、镇崧军等匪军约数十万人（陕、甘、青等回、汉军还不在内）。但由于吴氏平日刚愎骄横，又迭遭惨败，这些部队多不听从指挥，大多接近靳云鹗（靳极不满吴，此时他另抱野心），而靳部又因分子复杂，各怀鬼胎，统驭指挥，亦极不灵。

守城部队竟苦撑至四十余日，终至援军无望，粮弹两绝，无法再撑，围城军的飞机，不断飞至城上空投撒传单。城内军民，终日惶惶，守城军是有偷缒城外和围城官兵谈话者。或要吃的，或要纸烟。城外兵也不断举起酒壶或食物逗引守城兵。因此守城兵益形动摇。陈嘉谟、刘玉春见势难苦支，当派人到城外第八军数次输诚，要求保全实力去郑，不加攻击，后被拒绝。不意竟在此犹豫徘徊期间，为他部下刘旅长（一说贺团长）抢了先着。刘与城外唐生智部秘密商妥投降办法，约定于10月9日夜打开宾阳门，中和门等数门，至时刘旅一面全副武装出城，一面另由一门接应围城部队。城垣大部在不知不觉中，即逐渐全部安全缴械。陈嘉谟、刘玉春等全被围城的第四军俘虏缴械。被俘部队一部立即出城释放，一部护送岳州，守城战役即告结束。

## 破城后我过江的见闻

我卫队团缴械出城后，大部无形释放。我即以棉大衣一件，给了江岸上小划子上的人，他即载我过江。我上船后，又跟上十数官兵一同渡江。到江北岸时，民众蜂拥而前，持棒握石，向划子上的人乱打乱投。后经北伐军劝解得脱。在登陆向旧德租界行进中，见跟在后边的有一吴氏家族充卫队团营附吴道洽者，身穿缎面小皮袄，被民众蜂拥追至痛打，并将其皮袄剥去。我在继续行进中，忽见到一辆小卧车由东向西飞驰奔过，还见车首插着白布旗，上书“刘玉春”字样。闻刘所乘卧车，即吴氏平日所乘者。旋我到德租界卫队团留守人员处，又听说武昌城破时，汉口跑马场北伐军正召集了十数万人开庆祝破城大会。忽传刘玉春被俘消息，群众立即欢呼雀跃，摇旗挥拳，狂呼怒号，竟将大会场呼啸成了一片犹如狂风巨浪的海洋，其痛恨守城罪魁的愤情，可想而知。会散后即游行。帝国主义租界的反动势力，几至全被惊破胆。

刘玉春被囚至省议会一间小屋内，黑暗无光，内有木床一张，刘在内面壁卧床反省。经党人面询刘氏，为什么不早日开城投降，刘答以军人只知服从军令，生死全置之度外。又问他究为谁服务，为谁守城，为服从命令竟摧毁无数人民的生命财产。刘氏低头不语，颇现忏悔状。又问他家有什么人。刘答有 80 岁的老母。如能法外施仁，得全性命，即回家孝敬老母，终生为农，不再做军人。后来党人认为刘氏在旧社会中还是不多有的血性军人，至 1927 年夏季，即恢复其自由。至陈嘉谟的情形，当时未有所闻，尔后亦听说未加严处。至于我到德租界后，隔日即搭日本船绕南京津浦，改搭火车到郑州，仍返吴氏卫队团。

(1964 年)

## 武昌围城见闻

高启东\*

1926年秋，武昌围城，奏响了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灭亡的丧钟。在历史上占极重要的一页。围城整整40天，有的说是41天，那是不准确的。围城是从9月1日起，到10月10日开城，9月月小，首位恰恰40天。我适在这围城之中，饱尝了40天围城的滋味。现在把我身历其境的见闻，就记忆所及的，约略写在下面：

冯玉祥的国民军是8月间从南口撤退的，其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军已经占领了岳州，武汉情势已十分紧急，北洋军阀和依靠北洋军阀的大小官僚，个个日夜盼望“吴大帅”回到武汉，仿佛“吴大帅”一回来，必定能把北伐军打退，他们的官便可以安然再做下去。

大约是8月25日左右，吴佩孚才从北方回到汉口。

这时北伐军水路已到武汉外围新堤，陆路到了汀泗桥。8月27日，吴佩孚和鄂督陈嘉谟及刘玉春3个人同往贺胜桥，就在火车上建起总部行营，立即前往汀泗桥布置作战，升任师长刘玉春为“讨贼联军第八路总司令”。

刘玉春是武昌围城时的北洋军主角。他原是驻宜昌第八师第十六旅的旅长，与师长王汝勤相处得不好，干不下去，就跑到洛阳，投奔吴佩孚。吴派他为巡阅使署营务处处长。后来吴把他那一旅由宜昌调来汉口，编为卫队，刘于是复当旅长，又升他为第八师师长。吴北上去打冯玉祥的时候，有大刀队500人，作为他

\* 作者为武昌城被围困时的亲历者。

的卫队。吴派刘为卫队司令，随车北上。这回又升他为第八路总司令，把他手下的三团兵力，也调来参加作战。刘对吴于是感恩戴德，死守武昌，牺牲老百姓来报答“大帅”。这一下，老百姓冤冤枉枉惨死者，数以千计。

大约就是在 27 日这天，吴军和北伐军在汀泗桥打了一个硬仗，刘玉春卖尽气力来尽忠报效，桥下死尸重重叠叠一层压一层，塞得水都难流，无奈北洋军阀早已丧失人心，乡下农民为北伐军引路，包抄到吴军的后路。从 28 日起，吴军不得不接连放弃了咸宁、贺胜桥、山坡和土地堂等地方，把总部移到武昌鲇鱼套来。陈嘉谟本是有鸦片烟大瘾的，退却的时候，烟枪也来不及收拾，全副烟具一概丢了。他手下的副官们幽默地说：“我们陈督理是缴了械，才得回来的。”吴和陈退回来，大约是在 8 月 30 日或 31 日，于是全城人心惶惶，有钱的人都准备搬到汉口租界里去躲避了。

吴佩孚向来以蛮干拼死命为能事，这回他仍然要蛮干，所以派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在阵后督战，军官兵士们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后退的不论是官是兵，就在阵前一刀一个，毫不留情。汀泗桥这一仗，据说竟砍了 9 个退缩的团营长的脑袋，兵士不计其数，但是仍然不能把阵地稳定下来，继续后退不止。赵荣华的大刀队，惨无人道的飞舞大刀，见后退的便一刀砍去。据说有砍去了半个脑袋，还跑了一大段路才倒下来的，因为正在狂奔，并没有停住脚，大刀劈来，头虽去了半个，脚仍在往前跑，格外见得这样的砍杀真是太残忍。据说这样砍杀，兵士们被砍得发了火，总归是要死的，索性向大帅的专车开起枪来，打死了一个副官、两个卫兵，这才不得不停止砍杀，让败兵退下来。就在武昌城里设了败兵收容所，人心又大恐慌，怕败兵打枪。吴的蛮干竟干不通了。

9 月 1 日，北伐军打到纸坊了，吴就下令关闭武昌各城门，

在城上安放大炮，沿城开挖战壕，高的地方为蛇山、黄鹤楼、抱冰堂和洪山等处，都筑了炮兵阵地，表示要死守这座城。他自己却不住这城里，当天晚上仍回到汉口查家墩司令部，他要关起城门来死守，乃是别人来死守的。

老百姓事前那里能知道会关城呢？即使晓得了，穷人没有钱又往哪里走呢？有钱的人，得了关城的消息，就纷纷过江，往汉口逃命，也有来不及逃的，便关在围城之中。我是在这天下午，吃过下午饭，才得着消息，匆匆的走到长街上（武昌的街名）。只看见人山人海，拥挤不堪，黄包车搬行李带坐人，为蚂蚁一般，牵线似的走。半路上听说汉阳门已经关了，不能出去了。这时又在要变天，有大风暴雨来临的样子，只有退回家来。就这样没有逃得出去，而在围城之中。

从9月2日起，这围城里每天都听得到轰隆隆不断的枪炮声，尤其是每夜下半夜到天亮，竟是一秒钟也不停歇的枪炮声。起初对于这种情形，真是恨没有地洞可躲，后来经多了，也就习惯了。北伐军攻打的是望山门、中和门、保安门和通湘门四门，我住在靠近保安门的恤孤巷，每夜吓得不敢睡觉，即使胆大不怕，这样的闹法，也是睡不成的。

3日，吴佩孚同靳云鹗由汉口过江来武昌视察防务，并派刘玉春为城防司令，吴在城上视察之后，对陈嘉谟说：“你在这里守守，我过江去了。”从此，吴大帅没有再来过武昌，陈嘉谟连日对他打电话报告军情，口口声声叫“大帅”，说情形紧急，问“大帅”过不过江来。“大帅”总是回答说：“马上就过来。”却始终不见“大帅”的影子。其实吴大帅就是过江来，又有什么办法呢？

6日，暗中归附北伐军的汉黄防御总司令刘佐龙，他的炮弹从龟山打到查家墩来了。刘佐龙原是吴佩孚派他援助高汝桐守汉阳的，吴亲自打电话问刘佐龙是怎样一回事，刘佐龙回答说：

“恐怕是弄错了方向。”话还没有说完，又来了一个炮弹，吴再问刘，刘不回答了。这一来高汝桐在汉阳当然守不住了，只有退到汉口来。吴佩孚晓得自己站不住了，就于7日早晨和靳云鹗两人仓皇逃跑了。

初关城的前四五天，每天平湖门和汉阳门开1小时，便利军事交通，老百姓是不许进出走动的。吴逃跑后，刘佐龙以北伐军委派的武阳夏保安司令并独立第三师师长名义，出面维持汉口、汉阳的秩序，这平湖、汉阳两门，就根本不开了。

守城军队据说共1万多人，刘玉春自己直属的军队，不过2000多人，其余是宋大霖、孙建业、吴俊卿和贺锐廷等杂牌军。刘玉春不但要主持守城的任务，还要监视这些杂牌军。（后来打开城门放北伐军进来的，果然是贺锐廷的军队。）

城门一闭，守城的军队，便把全城所有的米店，一律贴上封条，不准卖给老百姓，尽数充作军粮，不但米谷不准卖，各种杂粮也同样不准卖。当然老百姓饿死是无妨的。大街小巷各种商店，也全自动地关门，一点生意都不做，任何日用品，无处购买。家家户户，搜寻自己家里留下来没有吃完没有用完的东西，来划划算算地吃，划划算算地用。到后来，吃的吃完了，用的用完了，便只有不吃不用之一法。譬如没有煤油了，夜间便不点灯；没有肥皂，洗衣服便不用肥皂；没有米的，便挨饿。至于饿死的，我曾经看见过一个饿了许多天的人，其人乃是常常替我剪发的理发师，这人虽不是一个胖子，但是并不瘦，脸也很丰满，一饿饿得皮包骨，脸像骷髅，相见之下，我竟不认识他了。又看见过一个饿死的女人，旁边一个饥饿的孩子，伏在她身边，还在吃她的奶，这真是一个惨极了的景象。还看见一些很小的饿孩子，目光向前直视，呆若木鸡，一点也不活动，真是惨不忍睹。饿死的人，尸体看上去非常之软，其形状十分可怕，这是我在围城之中，所目睹的惨事。我曾经知道有三个江西年轻的学生，每

天只有一小茶杯米煮水，喝一点米汤来度命的，有时吃点梧桐树的皮和梧桐子，或者找点地上的野菜如马齿苋之类。这三个人饿到不能起坐，终日睡在床上，如要起来时，不能一下便坐起来要先滚到床边，然后勉强挣扎下床，用手扶墙摸壁，慢慢移动。空手走时，如果跌倒，那是爬不起来，没有这样力量的。别人也饿得没有力来拉，如果来拉，他也要倒下来，所以只有自己滚到墙脚边，扶着墙壁慢慢爬起来。这种惨事在平时哪里会想象得到呢？这三个人却没有饿死，开城之后，不敢马上就多吃东西，还吃了一个多星期的粥，渐渐增加食量，才恢复照常吃饭。因为有饿透了的人，一顿饱吃，便胀死的。

由于没有米，也有人每天吃一茶杯的黄豆，或吃一小酒杯高粱烧酒的。他们说酒是五谷之精，虽是一小杯，可以抵御得住一下饥饿，能有这一点东西可吃的，就要算是万幸的了。全城那时约计有 10 多万人口，因没有米吃而饿死的，据说有 2000 多人。其时天气还很热，吃的水也不容易得到。既没有自来水，又不能往城外挑江水，因之发生瘟疫，医生也停了诊，药店又关了门。所以说因瘟疫而死的，比饿死的还要多些。而死于流弹，以及每天下午来一架飞机，丢下两颗炸弹，被炸死的，却居少数。究竟有多少因围城而死的老百姓，没有准确的数字。

9月21日是阴历八月中秋节，自然是一点荤菜也难得，其实一点蔬菜也没有，对于这个佳节，人人都感到痛楚万分，没一个脸上有好表情的。而在这种凄惨环境之中，居然有结婚的，也还有贺客。宴客还备有筵席，名为麸子羹，乃是用糠粃来煮成的羹，在平时为猪的饲料。

吴佩孚离开汉口之后，汉口商会愿意筹 20 万元为守城北军的解散费，并且和北伐军接洽好了，保证守城北军将领平安出境。陈嘉谟愿意接受这个条件，刘玉春却不赞同，认为这样做对不起“吴大帅”，非死守待援不可。这就是我前面说过，他牺

牲老百姓来效忠报答“吴大帅”待他的恩惠。据当时传说，吴佩孚常有来电，叮嘱死守待援，孙传芳也有电来说援军不日即可开到，刘玉春深信不疑，所以坚决拒绝讲条件退出武昌城。一批倚靠北洋军阀的大小官僚，也个个盼望孙传芳的援军立即来到，他们竟没有想到那始终是一句空话。其实那时孙传芳也已经在江西被北伐军打得落花流水，自顾不暇。

记得有过一次飞机来撒传单，劝告北军不要死守，快点好好地自作打算，不可自误。第二天又来散传单，乃是限 24 小时内投降，如不投降，便要用大炮攻城。据说北伐军攻城的军队是战斗力最强的叶挺的部队，攻城司令是邓演达。他们计划集中火力打通湘门，要打开一个缺口进城来。老百姓听见这样的传说，着实非常恐怖，而住得靠近城墙的尤其害怕。

城被围了整个月了，军队的粮食要吃完了，于是下令搜索城内居民的食米。其时家家的粮，都快要完了，已担心会饿死了，一听到这个消息，更是家家惊慌失措，想尽方法，把所存的一点点米，收藏起来。结果，搜到的米极其有限，于军粮毫无补救，于是有保安门守城兵开了城门去城外抢米的事。那天一大早，我听说这件事，我就去保安门一看，果然城门开了，我徘徊许久，并不见有多少米推进城来，可见仍就是没有抢得什么米，只见士兵徒然显出一副狰狞的面目。

这时，老百姓饿死的实在多了，汉口商会和各慈善团体，分头与北伐军和守城军商议开放汉阳门 3 天，让妇女儿童出城觅食，居然办到，共放出妇女儿童 38000 多人。由于出城的时候，第一天人格外多，而城门只开了一扇，那边堆满了沙泥袋，另一扇门打不开，人又拥挤，而且饿久了的人，跌倒便爬不起来，竟跌死了一些人。到了码头上，还有挤得掉下水去的，又淹死了一些人，又演了一幕惨剧。没过多少天，围也解了，如果早些时放妇女儿童出去，那是可以少饿死些人的。

城围久了，城上的北军与城下的北伐军，竟常有交谈的，城下的北伐军把香烟和食物抛上城来，我曾经看见过抛上来东西，于是老百姓料想这围城该是快解围了。而事实上军粮尽了，又哪能守呢？9日下午，忽然听见练习吹号的声音，大家都面有喜色，说是交战时没有练习吹号的，这可见交战状态已经过去了，城门当然要开了。

10月10日一大早果然是开了城，据说是贺锐廷的兵把中和门和保安门打开了，放北伐军进城来了。北军纷纷投降，而刘玉春还是顽抗不肯降，率领他的残部1000多人，在蛇山脚下抵抗了一会，作最后的挣扎。然而大势已去，他的部下第十五旅旅长于信臣硬把他拉到文华大学孟校长家里躲藏起来。不料，孟校长雇的中国仆人到北伐军那里去告密，刘玉春竟被北伐军捉到了。北伐军对他还是相当的优待，并且给他一个纵队指挥的名义。他不愿意干，跑回天津去了，不久就病死了。陈嘉谟开城之后，剃掉头发，改装乡下人，希图逃跑，没有逃掉，也被捉住了。到1927年，他向唐生智花了一笔钱，才被释放。他手下的高级军官，有的逃到汉口，躲在日本租界里面。

开城之后，城里发生了一些抢劫的事，北方军阀军官家里被抢的比较多，老百姓家里也有被抢的。有大胆的奶奶们在被抢时，竟和抢劫的人对抢，说是因为你不去拿北方军人家里的东西，而反过来拿我们老百姓的东西，竟把他们拿在手里的东西，夺了回来。我在这10日下午得过江到汉口，由一码头起坡，碰着卖号外的，乃知是双十节攻克武昌城的。40天的围城生活就此告终。

(1964年)

## 对邓演达兼任围攻武昌城司令的回忆

文 强\*

武汉大学历史系张光宇同志提出，《文史资料选辑》第 67 辑所载《李济深先生略历》一文中，提到“邓演达为围攻武昌城的司令”一事不确，系根据 1926 年 10 月 15 日《汉口民国日报》在《从武昌克复时革命军通告城内军民》的报道中，提到了《攻城司令之通告》，其落款是“第四军副军长兼攻城司令陈可钰”。我了解《李济深先生略历》一文所载并无讹误之处，兹作为亲身参与者之所知，回忆说明如下。

—

回忆 1926 年 8 月初间，北伐军势如破竹，所向无敌，特别是在湘鄂边区战略要地之贺胜桥、汀泗桥战役，击破了北洋军阀直系吴佩孚主力部队后，乘胜猛追，进抵武昌城外。吴佩孚当时打出的旗帜是用“讨贼联军总司令”的头衔，亲到贺胜桥、汀泗桥最前线督战。眼看兵败如水，若两桥不保，武汉三镇即势必动摇，因此，吴佩孚不得不督率所部顽抗死守，有如困兽之斗。在两桥被北伐军攻占后的第三天，我乘湘鄂铁路火车经过两桥时，见漫山遍野都是敌军遗尸，两桥下湖泊中被浮尸填满了，汀泗桥桥头一棵柳树上，尚悬挂着戴金边帽的将级敌军首级。据机车工人证实，他们亲见吴佩孚亲临督战时，用战刀将溃退中一个旅长的头割下来悬之于树。不论大军阀们如何穷凶极恶，杀人如草芥，溃兵依然夺路而逃。连吴佩孚自己也是坐火车慌忙北逃，竟

\* 作者当时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宣传员。

不顾拥挤在火车轨道上的士兵，一时间，那些士兵血肉模糊，被碾成肉酱的也不知有多少。吴佩孚北逃到汉口也不敢停留。后来了解，他一直逃到武胜关外的鸡公山才驻下来。其失败之惨，狼狈之状，在当年是尽人皆知的。

自吴佩孚逃到鸡公山惊魂未定之时，尤不甘心失败，企图死守武昌城，待机卷土重来。吴手下尚有陈嘉谟、刘玉春收容的一些残兵败将，编成一个师作为最后挣扎的本钱（当年陈嘉谟是湖北省长，刘玉春是某师的师长，50多年前的事，也许记忆不准确）。武昌城是我国易守难攻名城之一，城墙修得坚厚，依山傍水，有天险的长江作依托，水上在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控制下，汉阳、汉口尚在敌手时，对武昌城内接济不断。后来在很快攻占了汉阳、汉口的大好形势下，表面上看来武昌已成为孤城一座，实际上却仍可得到帝国主义偷运武器粮食物资的接济。武昌城从8月初间死守到10月10日，即双十节国庆前夕才被攻破，主要原因是守敌不断得到外援所致。

北伐军攻城的主力部队，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所属的一个独立团，一般的人又称之为学兵团。团长是著名的叶挺将军，党代表是留法留苏的湖南醴陵人余增新。我当年了解这个团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国共产党，从团长、党代表到各级干部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和国民党的左派分子。听说这个团三分之一以上的兵都是CP分子或CY分子。而且由全国各地党团组织送去的工人学生居最多数。像这样素质的部队，它具有无坚不摧、攻无不克的战斗力。这支部队在贺胜桥、汀泗桥战役，击溃吴佩孚部主力的战斗中，起的是“铁锥子”作用，他们打开缺口，刺入心脏，的确起了先锋作用。也就是这支“铁锥子”部队在击溃敌人主力后，乘胜猛追，是最先进到武昌城下的部队。我当年从广东誓师北伐前起，就与这支部队中的上层人物和中下层人物不曾断过关系，因而直接或间接了解这支“铁锥子”部队不少可歌可泣的事迹。例

如这支部队经常伤亡很大，补充也是频繁的。他们前赴后继，以死为光荣，以苦为乐事。特别长于冲锋白刃战，我记得邓演达主任常常指出独立团阵亡牺牲者给我们看，他说：“请看这支革命部队的阵亡者，任何时候都是冲锋扑上前去的姿势，他们的身上不止一二处伤痕，而是遍体鳞伤，他们的军服口袋里几乎都有党证和团证，他们对党对团是这么忠诚可靠，我们国民党人，应该响应革命者向左来的号召，好好向革命忠勇的战士学习……”邓主任语重心长，这是一种永远难忘的教导。后来，国民革命军由第四军发展到第十一军等部队，在武汉一度被命名为“铁军”。

## 二

回忆 1926 年间，我在黄埔军校（又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二队学习，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凡在校受训的学生们，时刻都在思想上准备把头脑武装好，迫切地要求像雄鹰展翅一般地飞到大革命的战场上去。记得即将北伐举行誓师大会前夕，忽然得到通知，我被挑选到广东大学（日后的中山大学），接受一个月的特别训练，也就是提前毕业，然后分配到北伐的各个岗位上去。这个特别训练班的主持者，是在黄埔军校担任过教育长的邓演达先生。讲课的老师们，除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外，还有恽代英、陈启修、萧楚女、熊雄、李合林等一批政治教官。一个月受训期满，与我们一共受训的约 300 多人，其中一部分分配到各省去做革命工作去了。绝大部分 180 余人，则组成了属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宣传大队。实际上这个宣传大队像一个吞吐港，为革命工作而储才，哪里需要就挑选到哪里去。例如有的被挑选到各北伐军基本部队中去充当连营级党代表的；有的被挑选到去干农民运动的；有的被挑选去干青年和学生运动的；其中有一个名魏亮生的湖北籍政治科同学，被挑选到安源煤矿所在县当了县长；我与周恩寿（又名周同宇，是周恩来

的胞弟）被挑选到总政治部组织部社会股工作。我似乎还记得有少数人挑选到叶挺独立团去做营连党代表。

由邓演达先生主持的总政治部，几乎是紧跟第四军的部队，特别是与独立团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后来我了解邓演达先生于保定军校第六期毕业后，一直是在粤军部队中服务，由见习官升到团旅长的职位，到德国留学后，才被孙中山先生派到黄埔军校服务的，他到黄埔军校自第一期起，即充任过总队长，到第四期时，升到了教育长的高位。当年黄埔军校开创时的主要人物，如蒋介石、李济深、邓演达等等，都是出自粤军中的将领，是在粤军著名的头头许崇智的领导之下。由于邓演达在粤军中、在黄埔军校中的地位，兼之坚决拥护“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故以国民党左派自居。事实上，当北伐军控制了武汉三镇，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一个时期，邓演达是举足轻重的中心人物。

独立团猛追溃败的敌军进到武昌城下。敌军闭城死守，居高临下。独立团仰攻不易，几次登云梯而上，伤亡惨重。加上了第四军其他的部队围攻，连攻数昼夜不能得手。这时总政治部全体工作人员，便选择南湖文法大学作为临时办公地和宿营地。由于离城近，入夜不敢点灯，且流弹呼啸而过，每每被扰得入梦不安。有一天夜晚，一大堆青年人在柳林中休息时，其中有个青年开玩笑说：“在头顶呼啸而过的子弹这么多，好像小鸟在空中唱歌一样，这是天然的音乐晚会呀！”他说完，举手向空中一抓，不料这一抓，竟被一颗流弹击中他的手掌。由于流弹远射无力，手掌并未击穿，反而被他抓到了。接着那位青年又大喊大叫的说：“我得了头彩，子弹抓到了，烧得手心发痛呀！”我们顿时提高了警惕，也将这一偶然的情况向邓演达主任作了汇报。因此没住上几天，就转移到安全住所了。

### 三

邓先生任攻城司令，我记得很清楚，在攻城司令这个头衔中还有个“总”字，大家都称邓先生为攻城总司令，而不是攻城司令，时间是在1926年8月初旬。

攻城总司令究系谁委派的？就当时情况，北伐军是兵分东西两路长驱直入。东路由闽入赣，西路由湘下鄂，西路军的前敌总指挥由第八军军长唐生智兼。当西路军进抵武汉隔江对峙时，因敌军刘佐龙率领的一个师投诚，汉阳、汉口不战而得。这时西路军前敌总指挥部即推进到了汉口市郊外之花园，围攻武昌城的任务即临时落在邓演达先生的肩上，而且称之为攻城总司令，这是尊重他在粤军中的历史地位而来的。究竟是见诸明令，抑或是通过总指挥唐生智的口头的商定呢？我并不具体了解，但作为临时的攻城总司令，是千真万确的。我当年在宣传大队，被调到最前线用扩音的大喇叭，对敌军宣传、喊过话，是亲自参与者。

邓演达先生是一位顽强的以身作则、身先士卒、不畏艰险、不惜牺牲的好领导。他亲临最前线，蹲在战壕中三天三夜不下火线，滚得一身都是泥土。除少数随从警卫人员外，时刻不离他身边的是位苏联顾问。这位名铁罗尼的中年人满嘴胡须，连胸口上、四肢上也长满了毛茸茸的汗毛。据邓先生介绍，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勇士，是“十月革命”的功臣，有着光荣历史的一位布尔什维克。另外，还有一位长得白皙英俊的青年，名字叫纪德福的共产党员，是从留俄最优秀学生中挑选来的俄语翻译。当年总政治部的宣传科长郭沫若先生、组织科长朱代杰先生等也曾出现在战场上。我们宣传大队的宣传员们中，我算是最年轻的，刚满21岁。我们这些青年对邓先生、铁顾问、纪翻译充满敬意。

我记得邓先生满身尘土自最前线归来，为牺牲的纪德福先生

举行沉痛而肃穆的追悼大会时，他含泪宣布“纪德福同志因攻城献出了他的生命，为革命而死，是重如泰山的。”他还说到“这次攻城，将士用命，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精神，是真正可贵的革命精神。由于汉阳、汉口不战而得，武昌孤城一座，一定要计日而攻，并日而攻，活捉守敌贼酋首陈嘉谟、刘玉春”等语。往事历历，记忆犹新。

我认为张光宇同志提供的资料是宝贵的，是从实事求是的精神出发的。我作为见证人写成这篇简短的回忆，是为了反映历史真实。总的来说，《李济深先生略历》中所言，与《汉口民国日报》所载的通告并不矛盾。原因是，邓演达任攻城总司令是当年8月初旬的事，武昌城之被攻破是在10月10日国庆节前夕，时间相隔了将近两个月。邓先生当时已经成为武汉军事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他不可能长留在武昌城下。我记得北伐军总政治部于8月中旬左右，即由武昌城郊越过汉阳，迁移到汉口市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一座多层西式大厦中办公，邓先生是亲率总政全体人员进入这座大厦的。他在进入大厦不到三天，便坐着汽车，带着4名武装卫士，进入汉口英租界。流星一般地转了一圈又回到了总政所在地。这一英雄行动一时传为美谈。

(1980年)

## 附：审核意见

1926年10月底，我于武昌攻克后任第四军第十师三十团政治指导员。虽然并未参与攻击武昌的作战，但从部队军官谈及武昌作战情况时，也听说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曾担任过攻城司令。

据我对当时听说攻城作战情况的记忆，当时攻击武昌的部队除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指挥的为主力外，还有第二师及第八军唐生智属下的某师。唐生智的第八军编成最晚，由唐指挥第四军和

第二师的部队攻城可能不甚妥当，故在作战临时部署上改由与粤军（第四军由粤军编成）有较深关系的邓演达任攻城司令，统一指挥各部队。汉阳、汉口被北伐军占领较武昌为早，占领汉口后邓演达即到汉口布置其他大事，攻城司令部落到担任主攻的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身上。故10月15日汉口《民国日报》登载克复武昌的报道中落款是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兼攻城司令。这并不矛盾，只是一先一后。

文强同志所补写的内容是他当时的亲身经历和见闻，堪作北伐作战的参考资料。不过写得乱些，不够系统。独立团党代表余增新，我记忆是余乐醒。“由第四军发展到十一军”一语不明确，应为“国民政府由广州迁武汉后，以参加北伐的第四军第十师和第十二师作战有功，升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为第四军军长，升第十师师长陈铭枢为第十一军军长。也就是把参加北伐的第四军中的第十二师、第十师各扩编为一个军。其实，北伐中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战功最大，虽以独立团为基础扩编为二十五师（属于张发奎的第四军），但仅升任叶挺同志为二十五师副师长。”另“文法大学”，应为文华大学。

总之，我认为文强同志对武汉大学张光宇同志来信所提疑点的解释是对的，又周振强同志也说攻城司令是邓演达，我也有这记忆。

## 邓演达、恽代英派耿丹到汉口运动刘佐龙起义

李泽民 \*

笔者由越南回国，返武汉家探亲时，恽代英函邀我至广东，并介绍我与陈声煜相识（陈是汉阳城人）。因同乡关系，甚是亲密。适值北伐出师，恽、陈等介绍我至邓演达北伐军总政治部工作。邓以我是兽医人才，该部尚无马匹，暂以兽医名义，帮办事务。为此，恽、陈等对邓演达不满。我解释说：“他和我初次见面，不知我的能力与品德如何，哪能擅给重要位置？由我慢慢争取他信任再说。”恽、陈方得释然。

待北伐出师，邓演达与恽、陈商议，欲派耿丹到汉口运动直军将领刘佐龙起义内应。但耿丹和刘佐龙素无深交，只和杜邦俊好。知道杜邦俊与刘佐龙甚相契投，想找杜从中做桥梁，但不知杜邦俊的住处。恽、陈等亦不知道，转而问我。适我由家来广州之时，在汉口路遇孙铁人、杜家佑，彼此寒暄，问孙、杜等做何工作？答以“办直言通讯社。”问何人背景？社址设在哪里？答以杜邦俊的背景，社址设日租界成忠街5号杜邦俊住处。邀我至该社盘桓，与杜邦俊晤识。因此知道甚详，告恽、陈等转告邓演达知。（派耿丹到汉运动刘佐龙的事实，恽等当时未对我说知。迨及北伐军抵鄂，恽、陈等方才告我。）

耿丹直到汉口杜邦俊家商行，杜做桥梁和刘佐龙商定：北伐军委刘佐龙为十五军军长，相机响应。（后来耿丹任十五军政治部主任，杜邦俊任十五军的旅长，在反共时，刘佐龙忘恩负义，耿丹牺牲于刘佐龙之手，此是后话。）

\* 作者系北伐军总政治部兽医。

当吴佩孚东山再起，在汉统率的部队是北洋队伍，只刘佐龙二师是湖北部队。刘受到歧视。这时，武汉正危如累卵。故北伐军一来联络，刘即允响应。北伐军抵鄂时，吴佩孚尚坐镇武汉，一面调刘玉春协同陈嘉谟固守武昌，调高汝桐守龟山以为犄角，又令刘佐龙炮兵团驻汉阳城与高汝桐取联系防守。另刘佐龙的第二旅陈尧鉴驻汉阳赫山策应龟山，刘佐龙住汉口指挥。一面赶调河南寇英杰南下救援，拟扼长江之险固守。

刘佐龙以时机成熟，密令陈尧鉴派步兵一营，会合炮兵团长刘鼎甲全部，晚间乘高汝桐不备攻上龟山。高汝桐仓促抵御，不支败退，强渡襄河，淹死者甚众。高赶赴汉口刘家花园（吴佩孚总部）报告，而刘鼎甲已占了龟山，以龟山大炮向刘家花园轰击，吴佩孚的车厢被毁。高汝桐见大势已去，保护吴佩孚北逃。刘佐龙维护汉口秩序，商民无惊。计是役只刘部攻克龟山，牺牲营长一员（不知姓名），别无损失。北伐军围攻武昌 40 日，城内粮弹尽绝，终被攻破，刘玉春、陈嘉谟被俘。攻破武昌之日，乃 10 月 10 日。

（1963 年）

## 北伐会师武汉的回忆

晏勋甫 \*

—

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和第七军由两广出师，在湖南与第八军会师后，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统率这三个军和鄂军第一师夏斗寅部，由长沙、浏阳出发，经粤汉路沿线及其以东地区北进，大举北伐。8月17日第八军强渡汨罗江，将吴佩孚的直系部队刘玉春、宋大需及湘军叶开鑫师（原湖南第三师，因反唐而投吴）3万余人击溃。同时，第四军在平江将据守平江城敌人陆运旅歼灭（陆运在城破后自杀）。敌人向北退却，又在岳阳附近粤汉路两侧占领阵地，后被第八军刘兴、李品仙、夏斗寅三个师击破。战斗激烈，敌我死伤均重。第三次，敌又顽强地在粤汉路汀泗桥及其东西之线固守。吴佩孚调武汉陈嘉谟所有部队前往增援，连同其前线兵力，不下10万余人之众，企图阻止北伐军的进攻。此时第四军陈可钰代军长（军长李济深留守广州大本营）率陈铭枢、张发奎两师和叶挺独立团已由平江赶到。同时，李宗仁率第七军亦到达通城和大沙坪附近。总指挥部原来计划俟第七军进至与第四军的右翼取得联系后，与四、七、八等三个军同时向敌进攻，以期一举将吴佩孚全部歼灭。但因七军为最右翼，迂回动作比较困难，第四军赶到前线后，乘歼灭敌陆运旅的余勇，要求即对前面之敌开始攻击前进。总指挥部采纳建议，以四、八两军向敌猛烈进攻，为时不久，战况至为激烈。吴部虽以

\* 作者系北伐军总指挥部参谋处长。

倾巢之师，亦不能阻止北伐军凌厉攻势，敌遭沉重的打击，翌日即告败退。吴佩孚为企图挽回颓势，挟其必死的决心，曾亲到前线督战。北伐军追击敌人至汀泗桥车站附近时，见铁路桥上所遗弃的敌人尸体甚多，并有被杀死的马匹，致将桥梁堵塞。据当时路上职工的报告，吴佩孚凭这个桥梁仅有的一条通路（桥梁两侧是广阔的湖泊），力阻其前线溃退。吴亲自杀死退下来的官兵多人，并将某旅长所乘的马匹杀掉。同时我们见桥梁两侧湖内所漂浮的敌尸不计其数。北伐军为不使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乘胜猛追，致使敌人溃不成军。北伐军即于同年8月31日到达武昌郊外。计自长沙、浏阳出发，历经三战三捷，到武昌城下，为时不过两周余的时间。其所以如此神速，这是得力于党和军联合一体之功。

此次北伐军各军、师、旅都有政治部负责人为党代表，团、营、连都有政治指导员。在作战时，所有政治指导员，除在部队中作政治工作外，同时发动群众协助作战，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如我军渡过汨罗江后，人民群众都来诉苦。有的说敌人把他们家里仅有的一点粮食都倒去了。这个去了，那个又来，没有粮食，他说你藏起来了，搜查不得，临去时，还打人。人民痛恨敌人达到极点。有一次，我们一个炊事兵在岳阳属的更口小街外的山头喊了一声，就有21个敌人前来投降缴械。又我们的轿夫，也不时召来一些敌人的逃兵。这真是军民一致，合作无间，致使敌人逃生无路。事后大家一致认为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就没有共产党的参加北伐，就不可能取得这样伟大的胜利。实际情形确实如此。

但遗憾的是，北伐军迫近武昌城时没有一鼓作气冲进城去，反让陈嘉模、刘玉春等率其为数不多的残部，利用机会乘隙逃进城内，紧闭城门，固守待援。当敌人自汀泗桥溃退时，因第八军自长沙出发以来，迭次作战，疲惫过甚，伤亡亦大，即令其在咸

宁、贺胜桥一带铁路沿线，略事休息与整顿，而将追击残敌的任务由四、七两军担任。四军在粤汉路的右侧，路线比较直。第七军在四军右翼，道路较为迂回，因之第四军是跟踪敌人追击的。乃挟其围歼敌人的决心，未有急于设法进武昌城，以为猛进至徐家棚，可以防止残敌乘船东逃，并可出其不意围歼敌人，哪知扑了一个空。如果当时第四军分兵一部，一面攻占武昌，一面以其主力猛扑徐家棚，反而可以达到围歼残敌的目的。第七军此时亦追敌至武昌郊外。

因为第四军一时的轻敌和大意，致有 9 月 2 日晚围攻武昌城之举。当时围攻武昌计划：第四军围攻武昌城东南两面，计自忠孝门（小东门）、宾阳门（大东门）、通湘门、中和门至保安门，右翼与第七军衔接。第七军围攻武昌城北西两面，计自武胜门（草湖门）、汉阳门、平湖门、文昌门至望山门右翼与第四军衔接。

在围攻武昌城之前，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组织 500 人的敢死队。当攻城时，个个争先恐后攀登竹梯奋勇而上。至当晚 12 时以后，此 500 个敢死队员，都由大小东门一带登至城上，白刃肉搏与守敌作殊死战。当晚，北伐军总指挥部在武昌南湖前陆军第三中学堂内（蒋介石亦在此处），我们一夜未眠，所闻第四军方面的枪声和手榴弹声至为激烈。据当时第四军陈可钰代军长在电话上的报告：“我军已于深夜 1 时许将大小东门占领，我军一部进了城”。但自此以后，枪声渐疏。不久，又得陈代军长由电话报告：“当面守敌，得有增援，我们的敢死队，牺牲惨重，敌人将我们所攻开的缺口，又弥补上了。当我们攻击正紧的时候，第七军方面，未有同时进攻敌人，让敌人抽出兵力向我们这方面增援，致使功败垂成。”

## 二

当第四军方面战斗激烈时，我们在第三中学堂内未听到第七军方面有任何声息，而我们竖起来的梯子，都被守敌推倒了，我们其他的部队要继敢死队之后上城时，在守敌伏击之下很难接近。有的到了城墙脚下，也被敌人打死了。天将拂晓，攻城中止了。蒋介石在前陆军第三中学堂内召集开会。在会上蒋介石大发雷霆，责问第四军：“你们没有攻破大小东门，为什么说进了城？为什么这样谎报？”并说：“5月攻惠州城时，我们是用梯子上城攻破惠州的，为什么这次不能？”陈代军长将上述报告的情形，重复了一番，并说：“在我来开会时，据叶挺团长报告，集合检点 500 个敢死队员，现在仅剩下 20 个人。”接着李宗仁报告，否认他们没有开枪，并谓七军如何围攻，因此，陈可钰与李宗仁互相争辩，各不相让。在这样追究责任的会议上，闹得很僵。到会的人都是默不作声，彼此面面相觑。其实李宗仁所说的话，都是不真实的。

我是总指挥部的参谋处长，这次北伐战役，大家都是初次协同作战，不可让他们互伤感情，于是在此极端不欢的会议上，起来发言。我说：我们昨天为了准备登城的竹梯，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好不容易才预备了一个相当的数目。武昌城墙很高，我们所征发来的竹子，又是那么短小，绑上两个竹梯，约莫要有两丈高，才能应用。梯子预备就绪后，须在距城脚 200 米以外放列。攻城时，这样两丈高的竹梯；非有 4 个人抬不起来。且尚需经过 200 多米达的距离，还要通过城脚下宽大的壕沟。通过壕沟后，又要把它竖起来，这样一系列的动作，每一段都是极端艰苦的。就是排除万难将梯子竖起来，守敌不费气力的一手可把它推倒。我以为这种方法，在攻城时，只能用作佯攻。主要方法，还是以较长的时间挖掘战壕，埋上炸药，将城轰开。总司令说攻惠州

城，是用梯子上城的。我没有参加这个战役，但我可断言，惠州城一定比武昌城矮小，或因其他条件便于攻取。现在我们已经得了一个教训，就是我军千辛万苦所竖起来的一些梯子，当第四军敢死队伤亡惨重的时候，守敌把它都推倒了。是此后我们再攻城即不能用这个方法。又城内敌人，并不甚多，我们现在不必再事急于围攻，仅派必要的兵力监视，围困久了，敌人自必投降。现在我们必须急于要做的，我认为有比围攻武昌更重要的事并且是刻不容缓的事。就是我们大军到此已有两天，汉阳虽有新近收编的刘佐龙的第十五军，但其兵力有限，战斗力不强。闻汉口仍有少数残敌。长江上游的宜昌，有卢金山的部队，下游的南京，有孙传芳的大军。我军没有大炮，不能轰击北岸，所以现在上下游的轮船靠近北岸行驶，还是来往如常。假使孙、卢两军，无论哪个前来增援武昌，在我军这样的处境下，如何可以应付？我以为此时仅派相当的兵力监视武昌。其余大军，马上去占领汉阳和汉口，将长江上下游敌军的呼应截断，并一面进而占领武胜关，以阻止北来的敌人。这才是至关重要的事。蒋介石听了我这一番话后说：“我同意你的意见。”随即问我：“这样做，你们总指挥部以为派哪个军去占领汉阳和汉口？”我说：“四、七两军现在围攻武昌的态势下，不能马上撤下，第八军的何键师前日已到嘉鱼县的簰州，刘兴、李品仙、夏斗寅三个师都在咸宁、贺胜桥的铁路沿线，用第八军比较方便。”蒋介石同意了。

散会后，我和唐总指挥径回武昌白沙洲临时指挥所，下达命令。9月4日拂晓，何键师先头部队到达汉阳，与第十五军在龟山守备的刘鼎甲会师了。汉阳一时改由何键师占领。9月5日，刘兴、李品仙、夏斗寅三个师先后经过汉阳，渡过汉水占领汉口。略事休息补充后，刘兴师开驻京汉铁路广水一带。此时尚有残敌凭武胜关固守，经过刘兴师一个整夜的仰攻，始将敌人击退而占领之。夏斗寅师开安陆、应山。不久，何成浚以不得志于武

汉，他利用随县土豪恶霸的团防主任严山护企图反抗武汉政府。何率少数的人进至随县厉山时，被夏师所派一营兵力将其缴械，同时将严山护的团防予以消灭。自此，会师武汉的工作告一段落。

关于武昌城，是由第四军之一部一面围困，一面运用敌军旅长贺对庭（保定军校第一期生）作内应，迫敌于1926年10月9日开城投降，并活捉陈嘉模、刘玉春等，解到汉口西园屋指挥部看守（旧址即现在解放大道中山公园前半部）。他们被闭禁西园屋时，唐总指挥要他们阅读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等书。有一次，我看他们，陈、刘两人对我说：“我们以前，上面连报纸都不许我们看，哪里还能看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否则，我们也要作孙中山先生的信徒，起来革命了。”这虽是他们当时所说好听的话，企图取得我们的谅解，但吴佩孚对他们禁锢的政策确实如此。不久，得武汉中央政府的同意，我们把他们释放了。

（1963年）

## 1927 年的晋奉之战

鲁穆庭 王理寰 谢 珂\*

—

1927 年 6 月 6 日，阎锡山投机革命，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并挂青天白日旗。奉军张作霖认为不利于己，派参谋处长于国翰作代表赴太原见阎，表示好感，窥探阎的目的和今后的动向。于与阎系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劝阎与张合作，并代表张邀请阎接受军政府副元帅的职务。阎未允，但表示今后仍坚决反共，并说明挂旗是为了自保，不意味着与张敌对，托于对张致意。于返京后，对阎的真相亦未得出结论。

韩麟春是当时北京军政要之一，一天在孟公府（韩住宅）召集军团处级以上人员对阎的态度进行研究，鲍文樾、邹作华等均在座。韩判断阎绝不敢单独向奉军作战，并说阎素性谨慎，不敢冒险单干云云。韩与阎系士官学校同期同学，许多人以为韩对阎的为人知之较深，大家无何异议。因此，在京人士多半以为阎不敢单独与奉军作战，故当局对阎的防备亦未十分注意。

是年 8 月间，张作霖为了准备应付今后的局势，特命张学良、韩麟春积极补充、训练所部，准备一旦局势恶化，便于应付。该军团部设在北京光明殿，所属第九军、第十二军驻京绥铁路沿线，其余大部军队在京汉铁路上的保定、新乐、石家庄与任丘、博野一带驻防。张、韩奉令后，为了整饬军容，积极补充训练起见，临时编成三个校阅委员会，分头进行校阅，并于 8 月

\* 作者谢珂系奉系军阀军团参议处副处长。

中旬一律出发。第一组由于珍（军团中将参议）率领，赴察西、丰镇、平地泉校阅高维岳第九军；第二组由谢珂（军团参议处副处长）率领，赴保定校阅万福麟第八军和王树常第十军；第三组由栾云奎（军团部参议）率领，赴新乐、东长寿校阅荣臻、胡毓坤第十六、七军；另派一部分人员赴河间、任丘、博野等县，对戢翼翹第二十九军进行视察。

于珍等经过大同到丰镇校阅郭希鹏十六师，又到平地泉校阅董怀卿骑三十五师和孙德荃步十八师，校阅完毕，由该军参谋长刘维勇陪同送回大同。阎方大同镇守使李生达奉令将于、刘和校阅委员等突然扣留，并转送太原。于是，晋北呈现紧张形势，奉、阎两方接近的驻军，且小有冲突。张、韩闻讯，即下令所属各部，严加戒备，并命各校阅人员停止校阅，即时协同所在部队担任军事任务。同时，张、韩率参谋长鲍文樾和各处部分人员开赴保定，以光园为指挥部，对阎锡山拟出作战计划，并开始调遣部队应战。

阎锡山自挂出青天白日旗后，日夜筹谋，如何利用山路秘密进军，乘奉军不备，以迅雷之势把奉军击溃。表面上与南京诚意合作，骨子里还是同床异梦，其真正的意图是单独打垮奉军，独占京津，扩大自己的地盘，然后再向蒋介石要求平分天下。阎先是派南桂馨常住天津秘密与日军驻屯军司令新井来往，暗中获得了日军的支持，因而对奉军有些轻视。阎的计划是，一面积极扩军补充训练，一面考虑妥当时机驱逐奉军。但自扣留于珍以后，对奉军维持和平的假象被揭露了，“图穷匕首见”，只好与奉军开战。

9月中旬，阎命徐永昌为右路总指挥，与孙楚率步、骑、炮10余师，星夜用火车输送到获鹿以西下车，经平山渡滹沱河后，猛向新乐、东长寿的奉军袭击；另派一部打退了汲金纯部，攻占了石家庄。当时驻防新乐、东长寿的奉军十六、七军，未加戒备，突然遭优势敌军的奇袭，战斗失利，退守望都。阎军当即推

进，占领了定县，并继续向望都进攻，战斗非常激烈，形成互相争夺的肉搏战。张、韩急令驻河间、任丘、博野的戢翼翘军星夜兼程急进，向定县阎军侧击。戢军到达后，经三昼夜的激战，阎军不支而溃退。同时，进攻望都的阎军亦被迫撤退。这时奉军十六、七军与二十九军会师，与由保定派来的一部增援部队，一同乘胜向阎军追击。阎军经平山、获鹿退守娘子关，同时亦从石家庄撤退。阎部王东海部骑兵降奉，改编为骑兵师。奉军占领了平山、获鹿和石家庄等地，一部逼近井陉。这次战斗，时间虽只有半月，两方损失不小，阎军损失更重，因为两方都需要休息补充，遂形成暂时的对峙形势。

在徐永昌出击京汉铁路奉军的同时，晋北方面，阎派商震为左路总指挥，与张荫梧、李生达率军沿京绥路出击，奉方高维岳第九军稍事抵抗即行后撤。商军前进到宣化，奉方张作相、汤玉麟率军还击，因京汉路方面阎军败退，商震等奉令退守大同，并缩短战线，暂时放弃绥远，固守雁门关阵地。奉军当即进驻天镇、阳高等地，封锁晋军，双方亦形成了对峙形势。

## 二

傅作义守涿州是当时奉、阎战斗中有名的一役。傅以一师兵力，固守3个月，最后因粮食匮乏，陷于孤立无援的苦境，不得已而缴械，一时获得“善守”的美誉。

傅作义攻守涿州的经过，根据各方调查，大致如此：当阎锡山两路突袭奉军时，另外又派两个挺进队，一是傅作义的第四师，一是李服膺的第十四师。他们的任务是乘晋军两路进攻时，在京汉铁路线上截击奉军。该两部是由晋北广灵县出发，经过直隶蔚县，分头向京汉铁路方向前进。李服膺率队向北京前进到门头沟后，遭于芷山部迎击，撤回山西。傅作义第四师附炮兵一营，经易县小路直向京汉铁路前进，中途与晋军失去通信联络。当月，部队到达涿州城附近时，两路晋军已败退一星期左右了。

为了完成任务，傅部急向涿州城进攻。当时防守涿州城和车站的是于芷山部王之佑旅，该旅两个团驻防分散，意外地遭到优势敌军的进攻，抵抗不力，遂由傅部完全占领。

在傅部先头部队进攻涿州车站时，正值谢珂携带战胜阎军的“战斗报告”赴京见张作霖。专车抵涿州车站时，亲闻站外枪声四起，当令火车急开前站，不久，通涿站的电话即断绝，涿站即被傅军占领。谢珂抵京后，将涿站所见向张作霖报告，张立电张学良、韩麟春，速派大军限期收复涿州。

张、韩接电后，即派万福麟向各部抽调四个步兵旅围攻涿州，调工兵一营、坦克一队开到涿州，调邹作华率重野炮各一团，归万福麟统一指挥。另外派曹耀章带铁甲车一列，当晚与部队协同攻下了涿州车站，恢复了交通。

傅作义遭奉军大军压迫，令城外部队退入城内，固守待援，并时常以山炮向车站列车射击。

奉军当时围城的部队，南面为苏炳文旅，东面为安锡嘏旅（由直军改编，共两团），西面为王以哲旅，北面为黄师岳旅。在西南与东北城角数里以外，各设有炮兵主要阵地。万、邹商定，每次攻城开始前，先用炮兵集中射击，次用工兵的坑道作业轰炸城墙，然后利用破坏的洞口，或选守兵薄弱的地点，发动进攻。但是经过几次战斗，未获成功。3个月后，城内粮食净尽，人心恐慌，士兵无以充饥。奉军乃派人入城劝降。翌年1月上旬，傅始率部缴械出城。余部约7000人，编为国民革命军第36师，徒步开到通州的东、西仓暂住。傅作义本人则被送往北京，受张作霖接见后，转送保定军团部。张学良设宴款待，并让傅住在鲍文樾的家眷宿舍中，予以软禁。5月，傅作义化装逃亡天津。6月，张作霖被日军炸死后，傅出任天津警备司令。

（1962年）

## 阎锡山在“二次北伐”中取得京津地盘的原因

李泰棻

在1928年五六月间，北伐的军队，在京汉路是以第三集团军阎锡山所部为主力，此外还有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韩复榘军；在津浦路是第一集团蒋介石的所部陈调元、方振武等军独任攻击，没有别的部队配合。在第三集团军进入保定以后，张作霖决心撤退出关，并无抵抗；而津浦路的张宗昌、孙传芳两部，在南军过了泰安后他们就仓惶撤退，可以说自泰安以北，绝无战事，很快地陈、方各部即抵津郊；而韩复榘军以快速行军的步伐，亦先阎部而到达了北京南苑一带。以上两路进军的经过，已见于各种记录，且非本文主题，这里不必细述。

蒋（介石）部尾追张宗昌、孙传芳的军队，虽已到达津郊，但不敢进入津市；冯部韩军抵达南苑也不敢进入北京，韩复榘愤恨不平之气，溢于言表，<sup>①</sup>但亦只得束手静待，不敢有越“雷池一步”。几天之后，阎军居然堂堂入城；而在天津方面，只南桂馨、傅作义两人，不费一兵一卒，就接受了全市地盘<sup>②</sup>。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既不是传说的蒋阎事先有君子协定；也不是冯玉祥有意助阎扩大地盘，而是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阎的外交手段所致。

<sup>①</sup> 韩复榘到了南苑，我在一家澡堂子里（他的临时司令部）见他，问他何日进城。他怒气冲天地说：“哪有咱们进城的份，外交团等着阎老西哩，他妈的！”

<sup>②</sup> 傅就天津警备司令职时的卫队，还是张宗昌留给他的。

## 一、日本在华北的特殊势力

中国的北方大局，很早就被日本所操纵；东北奉系如此，段祺瑞所领导的安福系亦如此，这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无须例证。即曹锟、吴佩孚所领导的新直系，一向亲近英美，但也不能不买日本的账。例如1925年，吴佩孚在汉口组织司令部，北上讨冯。冯军退南口后，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吴主张恢复颜惠庆内阁，代行总统职权。新直系与颜本人，均属英美系。日本不予同意，经孙润宇向日方奔走疏通，始得有条件的谅解，从而孙就作了颜内阁的秘书长，就是一个例证。时移世变，日本对我侵略，日益显著。在1927年5月间，日本军国主义头子田中义一组阁，积极侵华，他看到蒋介石正率军由南京渡江北伐，立即出兵山东，前锋也曾进入济南。但武汉方面的张发奎发动东征，南京受到威胁，蒋介石不得不将进占徐、海等地的军队急剧南撤。日军虽到济南，已无用武之地，然侵略之心，并不稍退。所以，1928年，在蒋介石大举北伐时，就第二次侵入济南，制造了惨案。但蒋介石于惨案发生后，仅留两团驻守济南，其余完全撤出。四五日后，蒋受日本军最后通牒的威胁，将这两团也撤出济南，且允许胶济铁路的20华里内，不驻中国军队。然日军如此蛮横，终于也自撤兵的原因又何在呢？我们知道，在日本第一次出兵山东的同时，外务省曾召集了一个“东方会议”，决定重要的两项：（一）保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为了“自卫”，虽出兵亦所不辞；（二）对中国东北将负起整个治安责任，并使满蒙脱离中国而独立，这就是田中对中国政策的具体说明，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折》，就是在这时提出的。关于第二条以后再说。第一条就是以军事威胁，保持它在中国（特别是华北）既得利益，但当时还不需要强占华北任何一块领土，以免与其他列强加深矛盾，妨碍它达到第二条的狼子野心。因此，它就自动撤退了侵占济南的军

队。但蒋介石那时理解不到这一阴谋的症结，鉴于济南惨案的可怕，故兵临津郊，也不敢开入市内。他并不是让阎接收，而是无可奈何。

南桂馨先生曾告我说，他在 1927 年曾和英国驻华公使蓝普生见面，蓝普生表示最怕冯玉祥的军队占领北京。在 1928 年，天津的日本军部也表示不让冯的军队进入天津。依冯的历史看来，他不但和帝国主义没有勾结，而且经常有反对帝国主义侵华的言论。帝国主义对他不满，这是很自然的。这就是韩复榘早到南苑，而不能入城的原因。

## 二、阎锡山就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后的外交

在张作霖大元帅时代的前一阶段，阎锡山的驻京代表分两个系统：田应璜与李庆芳是应付张作霖的，专办内交；温寿泉、潘莲茹（法国留学生）、苏体仁（日本留学生）是通过安福系和日本联系，但也和英美有些往来，是专办外交的。到了 1927 年春，阎锡山拒绝了张作霖请他作副元帅的要求，并决定就北方革命军总司令时，田应璜已死，温寿泉也另有任务回了太原，阎就派南桂馨为驻北京代表，统一领导两个原有系统的人员，一方面对张作霖虚与委蛇，一方面作北伐成功后占领京津的地下工作。

南到京后，如何应付奉方当局，不在本篇范围以内，不必管它。他在北京的外交行动，择要叙述几点如下。

有一次，南偕潘莲茹和英使蓝普生会谈。蓝普生说：“阎怎么和蒋合作，岂不有失他一向的稳和态度吗？”南答：“阎一向是同盟会的盟员，又是国民党员，当然跟着国民党走！”蓝说：“蒋和共产党合作（这时蒋叛变之迹未显），打到京津，后果不堪设想！收回汉口租界就是一个最危险的例子。”南当时想，收回租界，触犯了帝国主义的既得“权利”，故他们害怕，因对蓝说：“阎如接收京津，定能尊重已往条约，一切照条约规定办事，你

能放心吗？”蓝答：“如此可以放心！”<sup>①</sup> 这话虽然简单，已经对阎进入京津，打下了外交团不予干涉和为难的基础。

又一次，日本大仓洋行（该行设在北京北池子路西，名为办理业务，实际已成为日本侵华的机构之一）经理增永，请南桂馨吃饭，日方在座者有日本使馆武官本庄繁少将、中国政府顾问多田骏，这都是后来侵略东北和华北的头子。南与本庄本系东京的旧识，席间谈了许多往事，并约南第二日到他宅里再行倾谈。第二日南偕苏体仁到了本庄那里，本庄问他：“你们到底能否和奉方合作？”南答：“要看奉方作风能否改变（指能否换旗，使全国统一）？”本庄又问：“假定不能改变时，你们又当如何？”南答：“我们干我们的，不过，奉方不威胁我们，我们也不对他有所举动（因为还在与张作霖虚与委蛇之际，故如此说）。”本庄又问：“假定威胁你们，又当如何应付？”南说：“我们和蒋、冯有联系，看他们怎样！”本庄没往下追，只说：“这是我的个人谈话，并不代表公使。”<sup>②</sup> 本庄所以要问阎是否能与奉方合作，就是他不希望阎、奉合作，得到南的表示，已经如愿以偿。他对阎有攻击奉方的可能，不作任何表示，也就是一种默认。本庄是使馆武官，但他是直接秉承侵华军头头的意旨办事的，“不代表公使”是他在这方面比公使还重要得多。

后来阎与奉张决裂，南在北京不能立足，苏体仁被张作霖捕押。南逃天津后，先住日租界须磨街，奉方要求驱逐，日本驻津总领事馆照例通知南桂馨，请他离开。而日本军部反把他隐藏在日人屈清宅中，照旧活动。凡南向阎有所报告，均由日本人转大

① 这两次谈话内容都是南桂馨先生告诉我的。在他的《京津使命》（稿本未发表）里也有。

② 这两次谈话内容都是南先生告诉我的。在他的《京津使命》（稿本未发表）里也有。

连电报局拍发（后来安设无线电，才能直接与太原和南京通报），日本军部参谋三野，亦常出入南的寓所，传递消息（当然也伺探消息）。凡此均足证明，南在天津是受日本军部的保护和照顾的。

接收天津前夕，蒋介石部的第二、三、四军团均已临近津郊，而张宗昌、孙传芳的各部，又已达到津郊。日本驻津军部，坚持任何军队不得开入津城，并在日界严密布防，如临大敌。其一触即发之势，宛如前一个多月的济南，因此，吓得蒋军不敢越雷池一步。而张、孙败军，更不敢存此幻想矣。正此时，不甘寂寞之齐燮元，想穿上国民革命军的外衣，<sup>①</sup> 招收孙传芳的军队，接收津城。而日军部遣参谋三野，寄语齐氏，不得作此妄图，结果齐亦只得罢休。徐源泉叛了张宗昌，已受南桂馨委为第三集团军的军长，但他还要求给以天津警备副司令名义，南不允许，他即从中阻挠张宗昌的再向滦河撤退。结果被日本军部加以威吓，终于就范。<sup>②</sup> 最后南桂馨得到日本军部的谅解，通告各国领事，说明和平接收天津获得帝国主义势力默许，因而当时逃天津的傅作义得以警备司令名义，手无寸铁，只身接收了天津市。<sup>③</sup> 我们试想，倘非日本军部帮助，绝难如此顺手，这是很显然的。可以说，蒋介石叛变革命，依附帝国主义，这时只在英美方面，作了一些勾结勾当；对于日本，尚未搞通。而冯玉祥则是

<sup>①</sup> 齐和旧军阀陈光远等筹款 60 万元，准备发放孙传芳的兵饷，并要求南桂馨电闻，保他为国民革命军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南知事不能成，姑漫应之。齐系新直系，曾助吴佩孚与北伐军对敌，蒋岂有委他为集团军总司令之理？况孙传芳部郑俊彦已受阎委，他借重孙军，也是空想，只见其不知自量矣。

<sup>②</sup> 南和张宗昌已经订有成约，张部向滦河方面退却，不予追击；徐以不得警备副司令之职，煽动褚玉璞部阻挡退走。但徐源泉家属住在日界，日军部以此要挟，使徐就范。

<sup>③</sup> 傅就天津警备司令职时的卫队，还是张宗昌留给他的。

没有注意这类工作，他也不想靠拢帝国主义。因而蒋、冯都不能接收天津，胜此任者，只推阎氏。日本又何以看重阎氏？第一，他们认为阎氏稳和易与，不至触动他们的既得的利益；第二，几年以来，阎氏通过安福系，对日本作了相当的联系，盖冰冻三尺，固非一日之寒矣。

### 三、奉军退出关外之背景

在北伐之役，奉军退出京津，表面看来，是由于京汉、津浦两路的军事挫败。张宗昌、孙传芳的两部，既放弃济南而北撤；奉军直属部队在京汉、京绥两路，亦节节后退，如再延迟下去，势将崩溃，从而不得不马上出关，事有固然者也。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隐藏在背后的，还有日本的强力压迫。

张宗昌、孙传芳两部分，从济南北撤时，仍拥有十数万人，而孙部战斗力还很强，关于它在撤退到济南之前，还将蒋军第三军团战斗力最强之龚宪师击溃而将龚宪打死。张宗昌部在津浦线上，只以不能抵抗蒋军铁甲车队的冲击而退，全军并未大损。日本如不愿张作霖失败，提前出兵济南，一面暗示张孙，不必北退；如再鼓舞，仍可反攻南下，至少达到徐州。这样，奉军只抗阎军，胜负当未可量。然而日本行动，恰恰与此相反。我在前面引本庄繁与南桂馨谈话中，已经看出日本并不支持奉张的口吻。稍后，阎锡山两路出兵：由阎亲督徐永昌、杨爱源军沿京汉路进攻；由商震率晋绥军沿京绥路进攻，均以北京为目的地。当傅作义师由易州攻下涿州，郑泽生师已抵怀柔一带时，奉张极为恐慌。那时，日使芳泽谦吉告姚震转告南桂馨说：“只要阎军进入保定，我们可以压迫奉方退出北京；如果奉张溃不成军，我们在山海关就把他们解决了！”<sup>①</sup> 虽然这次奉军在东长寿打败阎军，

<sup>①</sup> 这也是南先生告我的。

以致傅作义被围，郑泽生后退，从而两路晋军，均行撤出，奉军转危为安。但日本希望奉张早败，而且败到溃不成军，被日本彻底解决，方算甘心，这又是什么原故呢？

按张作霖在东北的政权，屡次扩大伸展，得日本的帮助不少，特别在郭松龄反戈回奉一役，如无日军帮助，沈阳势必不保，这是谁都知道的秘密。日本之所以如此是为了从张作霖手中取得东北更多的权利。张作霖做了大元帅以后，各国政府，均承认这一政权。日本希望在张当政期间，解决一切中日有关于东北的悬案，至少也要解决一部分重要条约，从而作为日本侵略东北的根据。但张作霖还常说：“我姓张的绝不卖国！”因此，他不办这种交涉，甚至不和日本人多见面。这当然激怒了日本军阀。更有甚者，张学良向美国进行借款，拟定新建一条从北京通过热河直达沈阳的铁路，以脱离日军在京奉路上之阻碍。事如成功，则美帝势力渐渐伸入东北。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酣睡！此又是日本积极毁灭奉张势力之近因。日本既不能为所欲为于张作霖之手，势必用军事行动强占东北，这就是前引“东方会议”第二条决定的由来。为实行它“对东北负起整个治安责任”，就不得不解决奉军。日军的计划是，压迫奉军退到东北，把张作霖暗杀，必然事起仓促，群龙无首，沈阳一乱，日军即借口出动，夺取军政两权。在奉军正向东北退却时，张作霖被炸死在皇姑屯，就是这一阴谋的表现。但日军没有料到，张部秘不发丧，从容部署，沈阳未出任何事故，因而把他强占东北的计划推后了三年。我们看，当蒋、阎两军积极进攻之际，张学良曾有表示：“只要南军渡河向天津前进，奉军即撤出关外，促成国家的统一。”<sup>①</sup> 岂有正在酣战之际，示敌以你进我退之理？如果有促成国家统一之心，何

<sup>①</sup> 见贺贵严：《1928年日军侵占济南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23辑。

不早时罢兵，必待南军渡河？如果愿意国家统一，何以自称保安东北，独树故帜？张氏在背后已经受到日本的暗示，不得不如此，关于芳泽之言，已可概知矣。是奉军之退却，亦以日军之力居多。

(1962年)

## 吴佩孚军队在两湖被歼的经过

刘维黄 冯 琦\*

### 一、革命军入湘稳定了湖南战局

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当时全军总编为八个军，分成三路进兵，一路突击福建，一路出击江西，一路直扑湖南。在湖南方面，首先入湖南的第四军，由副军长陈可钰率领的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两个师和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作为先遣部队。6月2日，这支先遣队即到达湖南安仁县，3日下午，军阀赵恒惕部队分两路来犯，谢文炳部约两团进犯碌田，唐福山部约千余人进犯黄茅铺，势很嚣张。革命军团长叶挺派第二营支援碌田，第三营支援黄茅铺，与敌相持多日。为迅速解决当前敌人，叶团长又令副团长周士第率第一营第三连增援碌田，并亲自率其余部队增援黄茅铺，于4日拂晓展开攻势。全线猛烈冲锋，守敌两路皆败退，分向攸县溃窜。革命军衔尾追击，5日又克服攸县。唐福山、谢文炳两部溃退醴陵。革命军乘胜追击，进攻醴陵，独立团任左翼从黄土岭向泗汾猛扑，破敌主力，全军乘胜迈进。敌唐福山、谢文炳弃城逃遁。由于革命军到处得到工人、农民的帮助，因此很快地破敌于永丰、衡山、湘乡等处，并于7月12日攻克长沙，将谢文炳等部消灭殆尽。是役先后俘虏3000余人，缴获步枪2000余枝。其时，湖南军唐生智投向革命军，从此湖南长沙一带战局告一段落，为革命军顺利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

\* 作者刘维黄系直系军阀吴佩孚军总部少将。

当革命军开始出征时，省港罢工工人就组织了一支拥有3000多人运输队、宣传队和卫生队，随军出发。人人吃苦耐劳，精神抖擞，翻越崇山峻岭（湘粤之交的五岭山脉），他们不仅在进军的运输上给予巨大帮助，也鼓舞了部队的斗志。湖南的工人、农民都自动组织自卫队，积极参加战斗，如株萍铁路工人协助革命军第四军克服醴陵，农民在永丰湘乡等处，积极担任向导和运输，给予军事上以很大的便利。叶挺领导的第四军独立团，纪律严明，在醴陵作战遇大雨时，士兵坚守纪律，不肯离开岗位，居民劝求在屋檐下暂避一下，士兵都婉言谢绝，得到人民的称颂。但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精兵第一军教导师，有的军官行军乘坐滑竿，鸣枪抓辫，也时有所闻。最奇怪的是行军作战还有携带老婆的。如教导师团长惠东升，行军带着是其中之一，同一个革命军与叶挺的军队相比，而本质不同，有天壤之别。这个师未到长沙以前，士兵已经逃走了不少，到长沙才新补队伍，前方革命军已多次血战，他这个师迟迟不前进，后来却迅速地坐上火车赶到了武昌城下。

## 二、汨罗江之战

### 革命军在汨罗江作战布置概况

8月12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先后到达长沙的有总司令蒋介石、参谋长白崇禧、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苏联顾问铁罗尼等，此外还有第一军新编教导团的一个炮兵团，拥有苏联式大炮，还有黄埔军校五期入伍生工炮两队，和三四期学生组成运输队、宣传队、卫生队。总部到达长沙，第四军、第八军于8月15日以前，完成进攻汨罗的军事准备，8月18日开始全线总攻。第四军全部先后集中在汨罗至平江一线，第十师担任主攻汨罗的任务，第十二师和独立团在长乐和平江县的正面（都在汨罗江南

岸)集中待命，向北岸军阀进攻。

湖南军阀唐生智投向革命军后，率所部的李品仙、刘兴、何键三个师，还有吴尚、张国威两个独立团等部队，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苏联顾问奥尼倚奇。还有夏斗寅所率的鄂军团，改编后，作战时归第八军指挥，作为第八军总预备队。第八军奉令由长沙推进至汨罗江南岸，以平江为界起，右至嘉义、长寿一线，集中待命进攻北岸敌人。

从汨罗江口起，向左翼经过长乐、平江、嘉义到长寿沿江形成约100公里的作战正面。军阀前线防守兵力大约5万人左右。配备重点在汨罗、长乐、平江三个地区。革命军在未作战以前，南北两岸对敌人何处设有炮兵和机关枪，兵力若干，何处可以徒步，何处丘陵平坦，村庄多少，宿营情况等等，均有详细侦察。并有几次对长乐、平江两处作过威力侦察，收集船只，作为佯攻强渡，以使敌人的兵力和火力暴露无遗。同时更作了政治宣传工作，南北两岸宣传标语遍地皆是，尤其是敌人后方标语更多。如“打倒吴佩孚军，活捉宋大需、董政国，北方弟兄们自己人不要打自己人”；“欢迎弟兄们携枪投诚，缴来步枪50块光洋、机枪200元、炮1门500元”；“优待俘虏，打倒帝国主义和国内军阀”等等。长乐、平江农民时与革命军通风报信，弄得军阀队伍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因此农民被军阀认为是革命军的谍报员，惨遭杀害者数十人。

各北伐军接总部命令，在汨罗江线攻击成功以后，分三路穷追：第四军以一路沿粤汉铁路向岳州追击前进；一路由长乐街经桃林，向羊楼洞前进；第八军一路由平江经南江桥、通山、崇阳、咸宁前进，总的目标直驱武汉。在战略指导上采取全面攻势，猛追猛打，使敌军毫无休整余地，以期达到一鼓而歼灭的目的。

### 吴佩孚军在汨罗江北岸的防御

自称“十四省联军总司令”的吴佩孚，鉴于他最可靠的湖南军阀赵恒惕的部队在湖南快被消灭的情况，为了巩固湖北地盘，由保定仓促南下，亲自上前线督战，抵抗革命军。联军总司令部驻汉口查家墩，当时的布置大致如下：湖北督军陈嘉谟，掌握全省行政大权，驻武昌；董政国为第四路总司令，驻湖南长沙的长乐街黄氏宗祠；宋大霈为第三路总司令驻汨罗；第二十五师陆沄部驻平江县一带；两湖边防督办李炳章守备岳州；潘守蒸原湖北第一混成旅改编成师，归陆沄指挥，驻平江右翼；刘佐龙原第四混成旅扩编为湖北第二师，驻汉口、汉阳、襄河一带；原湘军军阀赵恒惕部下叶开鑫为湘军总司令，率一个师和鄂军独立团驻岳州、汨罗，维护粤汉铁路；董政国、宋大霈、陆沄、潘守蒸等所率部队，都归宋大霈统一指挥，在汨罗江北岸凭江设防。

凡重要地点，如汨罗车站，左至平江、嘉义一带，都建筑坚固防御工事，凡徒步涉场渡口，沿江高地配备有山炮和机关枪阵地，并布置有地雷，按地形重要程度，作了很多不同的坚固防御工事。许多工事是大抓民夫，拆毁民房的砖石、木料建筑的，又向汨罗长乐街、平江县长寿街等镇市，要钱要粮要划杆，并规定当地人民每日送蔬菜鱼肉烧柴等，按期不送到就打骂或惩罚。官兵纪律之坏，也无以复加，每日三三两两的士兵，借故闯入民房，调戏妇女，以及被强奸妇女投河自杀的共计30余人。勒索敲诈之事，更是司空见惯，把汨罗江所有船只封锁在北岸，不准行动，官兵若得了钱，可以私放。尤其是官兵赌风很大，夜以继日，地方人民恨入骨髓，并常发现士兵被当地人民活埋、击毙。

长江方面，吴佩孚派有兵舰封锁江面，协同陆军作战，并不断护送军队，和运输给养。吴佩孚仍感到兵力不足，急令河南的

生力军南下。其中有驻保定的第八师刘玉春部、河南第三师张席珍部、陆军钢盔师高汝桐部、河南第十三混成旅娄永和（娄云鹤）部以及他的王牌——联军总部的军官团全部（由张席珍兼总监）。其作战计划，在战略上，采取坚守汨罗江北岸，等待援军，节节抵抗，以谋得时间的余裕，联合孙传芳部队到来协同反攻。

从表面看来，吴佩孚势力还是很强的，按兵力人数，超过革命军；按军械装备和粮弹充足，也不低于革命军。而且在直奉、直皖之战役中，官兵久经战事，有一定的作战经验。所以军阀首脑会议，曾发出狂语：“革命军不堪一击”。

### 战斗经过和军阀惨败

革命军与军阀军队两军在汨罗江南北岸对峙，严阵以待。革命军按预定计划于8月18日拂晓发起全面总攻。南北两岸顿时炮火连天，革命军官兵在炮火和机关枪掩护下，分向长乐街、平江县两处集中猛攻。因汨罗江面不很宽，河底有深有浅，当时冲锋号声、人声、马声震动天地，革命军个个不顾生命，奋勇前进、前仆后继，迅速徒步过河，直向长乐街和平江县制高点攻击，战斗非常激烈。第四军官兵徒步汨罗江时，被淹毙被击毙的很多。因敌人预备队增援出击，战斗更为激烈。经过几小时激战，叶挺独立团已登岸的官兵从制高点的侧翼围抄制高点的背后。经过几天几次肉搏，才将平江制高点夺取。双方伤亡惨重，吴军的团旅长被击毙4人。全线战至中午，吴军因阵地被中央突破首尾不能相应，以致全线动摇，炮声枪声逐渐沉寂，但较远的山谷间有机枪声、手榴弹声，不断发出，才知道北洋军开始总溃退。吴军高级将官早已逃遁无踪，军队被打成七零八落。当时叶挺的独立团和十二师二十六团黄琪翔部担任中路，跟踪直截平江县东北角。敌第二十五师师长陆运把主力部署在平江南面，北门

全无守兵，第四军独立团一路攻下童子岭，一路直趋平江县城东，后汇合二十六团，从北门入城，未遇抵抗。陆沄和以下高级军官逃遁不及，除陆沄拔枪自杀外，所部3000余人当了俘虏，革命军遂克服了平江县城。在长乐街方面，当天敌总司令董政国为了逃遁方便，先在长乐街北端的马鞍山高地布置了一个侧防阵地，作为掩护退却之用。经第四军第十师部队猛烈攻击，激战2小时，董政国仅以身免，所部悉数就歼。

军阀军队全线崩溃后，各革命军除派少数兵力打扫战场外，其余主力于当天下午按照命令，指向目标，日夜追击。第四军部队向粤汉铁路北进，守备岳州的敌军李倬章弃城而遁。革命军于8月20日占领岳州，8月25日，独立团到达中伙铺车站北端，截断了汨罗江败敌的归路，俘敌三四千人，并继续向汀泗桥挺进，一路经通城直趋羊楼司；第八军在嘉义和长寿两处与顽抗的敌军激烈战斗，迅速击溃敌军，全军汇合南江桥，一路继续向通城、崇阳、咸宁前进，一路由崇阳经蒲圻沿江经簰州、金口直驱汉阳。军长唐生智是个性直急躁，而且是有领袖欲望的人物，恨不能大跨一步进入武汉，以便在政治上、经济上扩大势力和影响。第八军自从汨罗乘胜追击后，沿途如入无人之境。

军阀自汨罗战败后，官兵闻风丧胆、弃甲曳兵，七零八落，败兵逃命三三两两。有的成连成排地向当地区公所缴械投诚，取得盘费，换上便衣逃命；有的纠合散兵到处抢劫。由于北方官兵跋山涉水非其所长，逃兵不敢向大路逃走，沿途遗弃军用品很多，步枪、手榴弹、刺刀、军刀、军旗、军帽、军服等到处可见。如夏斗寅所率鄂军团，由长沙出发，枪支并不充足，他的任务是第八军的总预备队，跟着部队前进，到达汉口时沿途拾得枪支几千枝，大大改善了部队装备。

### 三、军阀内部的矛盾

#### 吴佩孚已成了强弩之末

在 1924 年 10 月，当奉直战争处于紧张关头时，冯玉祥从前线班师北京后，联合奉系夹击直系，仅山海关一役，吴佩孚的实力已受到相当损失，河北地盘也随之失掉，所剩余的仅河南、陕西、湖北、湖南等省。自革命军占领长沙后，吴佩孚曾自称“十四省讨逆联军总司令”，表面看来，似乎强大，其实是纸老虎。这次他对革命军作战的兵力也是东凑西拼，以孤注一掷。

#### 新老直系的同床异梦

吴原定计划，想联合新直系孙传芳，并肩抵抗北伐军，特派他的参谋长蒋方震到孙传芳那里商谈联防。但孙传芳拒绝联防，以为自己兵多将广，实力强大，革命军不堪一击。9月6日，孙传芳还发表通电说：“革命军如果进攻江西，誓与周旋。”最后又发出通牒限蒋介石在 24 小时内，把进攻江西的部队撤出湖南。可见当时孙传芳气焰之嚣张。他对吴佩孚的要求，婉言谢绝，说：“自己地域过大，兵力不够分配，请吴帅好自为之。”吴的联络代表不得要领而回。孙传芳原定主意，是暂时采取观望态度，等吴佩孚失掉武汉后，再从革命军手中夺回也不为迟，且可以一举两得，只是此种“妙计”终属幻想。

#### 吴系将领不和互相观望

革命军占领长沙后，吴佩孚调兵遣将，手忙脚乱。董政国原来是一个空名，手中没有实力，因为是吴佩孚的嫡系，所以给他大权，便于指挥其他的部队，称为第四路总司令。宋大霈称第三路总司令，部队是由原来第三混成旅扩充的，东拼西凑，仍感兵

力不够，粮饷空虚，屡次向吴佩孚要求补充，无法兑现，因此彼此埋怨，互不合作。李倬章虽有两湖督办的名义，但无实力。董、宋心目中只有吴大帅，而不知李督办，不服调动。叶开鑫原属军阀赵恒惕部下的师长，及赵垮台后，依靠吴佩孚，称湘军总司令，其实包括鄂军团的一部（团长方殿甲），还不足一师兵力，且官兵都是湘鄂籍人，与北方军阀格格不入，意见颇深。这些部队中，有的军队整年不关全饷，有的欠三个月以上的饷，官兵连零用的钱都没有，发给军需品又少，士兵怨官长克扣军饷军粮，流露怨言说：“这次要到南边去打南蛮子的话，发一块袁大头，就打一块钱的，若是不关饷，干脆对不起，不打！”军心涣散可见一斑。吴佩孚为了要打大战，收买人心，给第四路总司令董政国 10 万现洋，犒赏官兵，规定将官 200 元、校官 100 元至 150 元、尉官 30 元至 60 元，并令迅速发放，但董政国克扣不发。

### 财政枯竭，士兵怨恨

吴佩孚军饷无着，税收有限，不得已西安、开封、汉口各处向商会筹饷筹粮。商民无力筹足，政治日渐腐败，民怨沸腾，招兵不易，这些也是加速促成其失败的原因。

## 四、汀泗桥之战

### 军阀宋大霖在汀泗桥的防御阵地及作战经过

革命军解决了湖南战事以后，进入湖北境内。这时，革命军在群众力量配合之下声势更为浩大。吴佩孚在这一带，仍然企图节节设防，顽强抵抗。两湖边防督办李倬章不战而逃，放弃了岳州。吴佩孚得知消息后，更为惊慌。不得不到前线亲自督战指挥，一面派人沿铁路南下收容溃窜官兵，一律在汀泗桥一带停

止，不准后退。但董政国、宋大霈、叶开鑫三个总司令早已逃到后方。吴只得收容残兵败将，仓促编成队伍，约 4000 余人，编凑成为 4 个步兵团，一面选定最好防御阵地，在汀泗桥准备节节抵抗，以等待南调部队和孙传芳援军到来，企图作最后挣扎。（吴佩孚早有急电催促孙传芳，把驻黄石港部队开到汀泗桥支援，但未实现。）并且把自己认为实力最强的王牌——联军总部的军官团（原驻洛阳西宫）调到汀泗桥占领阵地。又派最亲信第三师师长张席珍兼联军总部督战委员会委员长，克日到武昌，成立督战委员会。张席珍的任务：第一，组织强大有力执法总队，在汀泗桥以南地区收容退下来的溃兵，临时编组成军；第二，在汀泗桥以南选择形势险要的据点，布置主要阵地，在主要阵地的前面又布置前进阵地，防止革命军急进；第三，凡在战场上作战不力，不听指挥的官兵，就地正法，同时急电调保定的第八师刘玉春的部队星夜南下，开至汀泗桥一带布防。当时张席珍因在洛阳处理军务，不能立即南下，暂派总部少将刘维黄为督战委员会委员，临时负责，在汀泗桥筹备成立事宜。陆续到来汀泗桥军官团有军官军佐各队，共 6000 余人，临时编成两个军官团。团内以久经作战的下级军官为主体，把临时收编的几个营，也参加在内，第一团团长由刘维黄充任，编步兵三个营（都是下级官编成）、炮兵一个营、手枪队一个营（附大刀队）共约 3000 余人，在粤汉铁路汀泗桥前面左翼古铜角高地防守阵地。阵地前面一片湖沼凹湿地带，居高临下，展望宽阔，人马很难接近，下面高地有四门野炮，机关枪有 30 余挺，摆列成线，并且日夜赶筑防御工事。军官第二团团长是董政国亲戚张大庆，这一个团的编组与第一团略同，这一团布置在第一团右翼，地形险要，就全盘地形看来，是三面环水，正面被绵延不断的高地挡着，中间一条铁路，是易守难攻的阵地。后面又配备了生力军娄永和（云鹤）第三混成旅全部，共约 3000 余人，作为汀泗桥阵地的总预备队。

第二防备阵地，还有临时收容散兵编成约三个团。最后阵地是督战委员会，所设立的执法总队，内有手枪队、大刀队。整个汀泗桥战场，由总司令宋大需全权指挥，作战人员共计 26000 余人。吴佩孚自以为凭险扼守，有如金城汤池之固，乃自鸣得意之作。

### 北伐军第四军攻击汀泗桥概况

第四军自汨罗获胜后，不分昼夜兼程追击。探得敌人在汀泗桥企图抵抗。当先头部队到达汀泗桥南十余华里之处时，就地开始计划攻击部署。决定 8 月 26 日拂晓开始攻击，因敌军阵地正面不太宽，仅用两个团兵力就够了。革命军由独立团担任正面攻击，其余陆续到达在阵地后方休整等到拂晓，双方炮火均猛烈射击。独立团所占领的进攻阵地，不利于己，有利于敌，几次猛烈进攻，未能消灭敌人夺得阵地。独立团为了诱敌全部出击应战，以便全歼起见，表面战线上使官兵隐蔽起来，枪声很稀，表现气势衰退。直军认为革命军败退了，大举突出阵地反击，经独立团迎头痛击，直军死伤颇大，气焰大为减弱，但革命军牺牲亦很大。到 8 月 28 日早晨，由第四军第十师全部、第十二师一部，从远路迂回冲过铁路绕到白墩高地背后，从右翼包围直军的炮兵阵地，直军因疲劳又不知大军从何而来，官兵顿时混乱，其第一团官兵无法抵抗，同时四军派上校参谋到古铜角的第一团团部，劝说刘维黄投降。刘当时只提出了两个请求：第一，官兵身上都带有现洋不少，要求不要搜腰包；第二，官兵能留则留，不留的人请遣送回北方，以免流离。这两件都得到参谋应允，所以全团很顺利缴枪。娄永和（云鹤）的第三旅全部随之缴械，这样就结束了汀泗桥战役。直军除在汀泗桥以北，未参加作战的大部分官兵沿铁路北窜，一部分沿江边方向逃窜，总司令宋大需仅以身免外，被俘虏的有第三旅旅长娄永和（云鹤）、第八师少将参谋陈冲、军官团少将团长刘维黄、上校团长张大庆等以下官兵 1 万余

人。缴获野炮 4 门，山炮 10 余门，缴获步枪 8000 余枝，机关枪近百挺，及子弹粮秣很多。革命军将获得炮弹枪械粮秣及俘虏的伤兵人员押运到咸宁县，所有青年俘虏多愿意补充兵额，不愿参加的暂留在咸宁待运，处理完毕，第四军主力即日继续向北猛进。

## 五、贺胜桥之战

吴佩孚对于汀泗桥的失败还不甘心，仍力图作垂死的挣扎。8月 27 日，刘玉春第八师军队，陆续调运到贺胜桥，就在贺胜桥南面选择高地，仓促布置防御阵地，决心坚守。前面铁路两侧，及在主要道路和山凹等处，满布地雷。除主要阵地布置外，所有附近高地和主要两旁道路，都设置少数组队，并做了很多的工事，把战斗正面布置到 10 华里之宽，并不断发出机枪、步枪的冷枪声，作为疑兵虚张声势，同时禁止附近人民来往，违者枪杀，至 8 月 28 日下午，布置还未就绪。

29 日拂晓，双方就已接触，开火整天整夜，机枪炮声不断，中间夹杂地雷爆炸声。第四军独立团攻击正面，其余两师部队分左右两翼迂回包围，从中央突破，敌前线陷于动摇。同日下午 4 时，吴佩孚、陈嘉谟仓促乘火车逃到武昌，吴军全部开始溃退。到 8 月 30 日晨，革命军克复贺胜桥车站。在吴佩孚逃走后，吴军开始炸毁铁路桥梁和涵洞，并烧毁枕木。第四军攻击贺胜桥前进时，因敌军在铁路两旁及主要交通要道都布有地雷，恐有误踏，因此前进的队伍，多从小路绕进。及占领贺胜桥后，沿途看见有敌军遗弃军用品很多，车站也堆积了大批军用物资。这次战役，第四军俘敌 3000 多人，缴获步枪 1000 余枝、山炮 3 门。附近老百姓一听说贺胜桥到了革命军，数十里的人民群众一个个喜形于色地说，革命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他们有送来水稀粥的，有带鸡鸭鹅蛋来卖的，有各地用竹床送伤兵到站的。铁路工

人自动检修铁路，有的扑灭涵洞的残火，人民对革命军极为爱戴。在 30 日晚上，铁路已检修好了，当夜将车站所有伤兵完全转运岳州治疗，第四军主力次日向武昌的纸坊进发。

汀泗桥和贺胜桥两役之后，军阀吴佩孚在两湖作战的全部实力，总共不到 10 万人，已经被革命军消灭了百分之七十以上，这样就奠定了革命军最后胜利的基础。在这几个战役中，第四军自入湘以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尤其是叶挺将军所率独立团纪律严明，受命打先锋，勇敢善战，威名远播，湘鄂人民无不称赞，使整个第四军赢得“铁军”光荣之称。

(1963 年)

## 附：吴佩孚部被歼灭情况分别补充如下

刘维黄于 1924 年 2 月间，任江西督办军务公署交际处上校处长，同年 11 月调任淞沪护使署中校宪兵营长；张允明前湖北第五混成旅旅长，在沪扩编为师，兼上海淞沪护军使。当日军阀混战，割据称雄，各霸地盘，因此淞沪战事发生。失败后，刘维黄回汉向联军总部报到，派在军官团将校队，由上校学员起充班长、分队长、中队长等职，张席珍任大队长。

1925 年 8 月间，军官团移驻河南洛阳西宫，加速整训，联军总部由汉口移驻保定驻防，路过洛阳，顺便检阅。当日军队的学员精神振奋，操法整齐，成绩颇优，影响很好。如是张席珍以检阅的精神向吴保荐刘，当晚调刘维黄为总部上校承启官。随吴出发，有八大处、警卫团，及第八师刘玉春一部分，官兵同车同往。但前行的官兵到达保定车站附近，站外的扬旗未起，军车不能冒险进站，吴佩孚另起武装徒步前进。而靳云鹗的军队，已撤

在城内戒备，不来迎接。吴立即召集各处长及上校以上的军官佐开紧急会议，决定将靳云鹗撤职。命令已下，应派处长送达，在半小时内，气氛极为紧张，无人应允。刘维黄此时立起，自愿送达命令。吴此时转为笑容，向刘暗示，你有勇气，靳将军是杀人不眨眼的（吴佩孚从来重用直鲁豫省人，而不重用南七省的人，认为是不可靠的），你是南方人，有胆量去吗？可将家庭情况住址写上，并令参谋处晋升刘维黄为少将。他又说，大家知道，你们随我数十年，贪生怕死，没有勇气。刘维黄随我很短时，胆敢应声送达命令，忠勇可嘉。

第二日晨，刘随带侍从副官卫士各一人，坐吴的汽车进城。先以电话与靳云鹗的参谋长联系（姓名忘了，不记得），说明奉吴帅命令，闻靳将军有病，派刘维黄代表前来慰问，并陈述移防保定和撤职命令等情。那时刘极想要求参谋长帮助，他虽未明确表示，但面带惊慌、恐惧的状态，参谋长觉得此事亦有关自己，所以不得不同意刘的要求。带他同去谒见靳云鹗，说明代表吴帅前来慰问，并无他意。而参谋长应声说道，吴帅既然派代表问候，必须也要报告作战布置情况，回见才好。那靳云鹗躺在床上，吞云吐雾之间，说“也好”。即时整装同往，并随带卫士一排。刚到车站，刘早有计划，由警卫团将随来的卫士排缴械，刘将撤职命令递交靳看，扣留总部。吴佩孚即令前敌指挥部参谋长代行职权。于是第八师刘玉春部及总部警卫团等，安全进城布防。此时冯玉祥退至南口（保定经过京汉线北京至平张铁路线退到南口），当日靳云鹗之兄靳云鹏，素与冯玉祥有很密切的友谊，其中有莫大的关系。而靳云鹗又不是吴的嫡系，其中有些隔阂，所以靳按兵不动，不服调遣，想向冯靠拢倒吴，但吴意在消灭冯玉祥，稳定北方为目的，回头再来消灭革命军。

1926年6月间，湖南局势紧张，赵恒惕所属唐福山、谢文炳部，已被革命军消灭。叶开鑫一个师、方殿甲一个团，因赵垮

台后，叶开鑫仰靠吴的接济，吴是置若罔闻，所以在作战中，为保全实力，不肯牺牲，而又与北方部队少联系，互不合作，因此另图出路，径向江西方向而逃。董政国是一个空杆，虽是吴的嫡系但没有实力。宋大霈有一个师之兵力，曾数次要求补充粮饷，未能如愿，以致怀恨在心。李倬章掌握两湖督办之权，手中亦无实力，董、宋归他指挥，但不服从调遣。其原因是其目中只有吴没有李，吴自赏给董政国部 10 万现洋后，欲图挽回败局，反遭各个军阀首脑痛恨。在汀泗桥猛烈战斗中，吴来不及调遣，那时刘玉春、张席珍部，尚未全部调到，仅有张席珍之一部分和娄云鹤为汀泗桥之总预备队。但吴内部的矛盾，不胜枚举，终致将帅不和，自骄自尊，各想升官发财，各怀意见，各自埋怨，尤其是在汀泗桥战役指挥中，只有宋大霈、张席珍，其余董、叶、李已是先挂车逃遁。这就是最大的失败因素。

刘维黄在汀泗桥布置前进阵地，于铁路之左余家湾小高地，前面地形呈波浪式，射界宽阔，配置由第一营营长郭勋担任，其阵地为掩护后古铜角之主要阵地，易于出击反攻，又能固守。铁路右翼丘陵，为夹击据点，下面湖沼河流，不能通行，配置第二营营长曹金标。此据点是与余家湾小高地对峙，中间只有一条铁路构成交叉火网，排列机枪。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于 26 日拂晓向余家湾小高地猛烈进攻，冲锋四次约 4 小时之久都未能取得进展，双方伤亡颇重。直至下午 2 时，第四军又开始攻击，经 2 小时的冲锋，因受丘陵据点夹击，官兵伤亡很多。到了黄昏的时候，双方炮击一夜，未能停火。27 日拂晓，第四军独立团，猛击猛冲，另从铁路线伏击进攻。独立团官兵勇敢善战，不怕牺牲、前赴后继，亦未能夺得阵地。因受敌之密集火网夹击，双方伤亡很多，敌营连排长亦阵亡 5 人，受伤更多。不到 2 小时，独立团又来冲锋，仍未夺得阵地。两天来冲锋夺阵约在 13 次之多，在下午双方炮火猛击，均未停止片刻。这时刘维黄在古铜角阵

地，用电话请示总部增援并报告战斗情况。总司令部驻扎咸宁，当时总司令宋大霈和张席珍以电话口头指示，坚决固守，沉着应战，须用强大火力猛击，使革命军不能抬头，不易接近阵地。并调娄云鹤部两个营和第三师两个营增援阵地，而张席珍前来督战视察，认为凭险扼守，不足顾虑，必须谨慎防守。午后双方炮击，尤以黄昏火力更炽，似有冲锋夺阵现象。到了夜间9时，白墩阵地第二团电话不通，断绝联系，不明真相。第四军因攻击受挫，绕回铁路之右，将白墩高地敌之军官第二团和炮兵阵地包围，于28日晨将其缴械。这时刘维黄所率领军官第一团各阵地尚未变更，同时闻之右翼第二团被包围，刘维黄即抽调步炮两个营，很迅速地布置于汀泗桥车站和汀泗桥之街市，准备应战。不料叶挺将军闻刘某在此，有同学关系，即派人与刘说合缴械投降。如此娄云鹤、陈冲参谋长和军官一二团全部投降。汀泗桥这一大战役，就在此间告一结束。

刘维黄被俘时，十二师司令部设在咸宁，刘维黄第一次与叶挺将军见面彼此寒暄几句（在座有张发奎），谈到张发奎在汀泗桥失败之间，官兵抛弃军械枪炮等很多，请派人到湖中捞起。那时贺胜桥还未攻下。第二次到独立团与叶团长见面，说曾在古铜角阵地埋藏地图，请派人同往取出，作为作战之参考，取回后，亲交叶团长。因他忙于布置，无暇闲谈。第三次见面，战事已告一段落。接见时，是在汉口太平洋饭店谈了围城和外围作战情况（见编的围城之战和外围的经过情形，就是叶将军所谈的过程）。

第八军在嘉义和长寿击溃敌军后，全部汇合南江桥（即南林桥）分向蒲圻一带前进。但第四军不分昼夜穷追猛打，攻下了汀泗桥。第八军由此沿江而下，经簰州、白沙洲渡江，向鹦鹉洲、梅子山、龟山进军。这时，军阀高汝桐部尚在汉阳所属之锅山、黑山一带，敌闻风向河南而逃。革命军在战略上取得了一个大包围的形势，而唐生智与河南樊钟秀联合夹击武胜关和信阳之间。

那时，围攻武昌城有第八军两个师、一个独立团、一个教导团、一个炮兵团及黄埔第五期入伍生队工炮两营，还有其他直属部队，足够应付。敌人固守孤城，把打垮的残余官兵凑合成军，不足三师之兵，是如瓮中之鳖，有何能挽救。然而唐生智虽未有直接担任攻城任务，其外围更为重要，一则断敌的归路，二则堵截敌军支援，决不能使敌中央突破，压制其早日投降，并且第八军与第四军彼此随时互相呼应。在这样正确的战略上，是有利于围攻武昌城夺取胜利的。（城内的情况是刘玉春被俘时，在武昌文华大学与他见面所谈出的经过的情形。汉口及汉阳商会办理善后事务的经过情况，是商会会长周星堂、赵典之来我家所谈。）

## 关于东征军、西征军和第六军 被消灭的片段回忆

谢慕韩 \*

### 第六军第一次被蒋介石消灭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继攻克九江、南昌，击破孙传芳的主力后，沿长江两岸东征：第六军第十七师杨杰部、第十九师张振武部及第二军鲁涤平部、独立第二师贺耀祖部在江右军总指挥第六军军长程潜的指挥下，沿长江南岸前进，节节胜利，迅速占领南京；江左军李宗仁指挥的部队亦同时进抵安庆及津浦路南段之线。

这时，蒋介石谋叛之迹日益明显。当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的时候，他徘徊观望于九江、安庆间，怂恿地痞流氓，包围群众团体，捣毁反对他的国民党党部。武汉国民政府密令程潜总指挥将蒋逮捕。程以事关重大，且力不胜其任，主张商谋妥协，乃将六军军长职务交由杨杰代理，南京卫戍事宜交由贺耀祖负责，自己乘专轮由南京赴汉，与武汉方面面商。蒋乘此机会，运用手段，将贺耀祖收买，得以由沪潜抵南京。在蒋乘兵舰由九江到达南京时，程潜登舰欢迎，以市面秩序尚未恢复为词，请蒋暂时缓登岸，直接赴沪。蒋到沪后，召开会议。程在会议中力主调和，并愿赴汉劝合。会后，程即单身赴汉，劝合不成，乃潜赴采石矶，调第六军赴汉，为蒋所发觉。至此，蒋对第六军必欲剪除，并图加害于程。当即派遣其亲信徐培根（浙江人，保定军校三期炮科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独立第十七师副师长。

生)乘兵舰急往追程,追至大通,程预察兵舰来意不善,化装隐匿火舱中。徐上船搜索。这时,第二军参谋长岳森挺身而出,对徐说:“程总指挥不在此船,只我一人在此,有事找我好了。”徐既找不到程,只好将岳带到南京复命。岳面蒋时,问何事见召,蒋回嗔作笑地解释误会,并手令发给第二军薪饷一月,将岳礼送出门,借使第二军不疑有他变。程于徐将岳带走之后,乘船继续上驶,至秋浦,恐徐复追,便舍舟登陆,并电知驻在九江练兵的第六军参谋长唐蟠。程由秋浦登陆后,随行的有秘书唐菊庵、副官罗友松及卫士四人。唐携有纸币万余元,程要他丢弃。唐觉弃之可惜,乃分散给同行的六人,各藏一部。是日,步行18里,宿于农民家。越日,抵湖口,唐蟠已派兵及轿马来接。至是始脱险,经九江抵汉。

与此同时,蒋已密令第一、第七、第十各军及独立第二师担负解散第六军和第二军的任务。其做法是:先命令第六军随同第二军渡江,追击军阀孙、褚部队。当第六军过江完毕,又命令第十九师回师南岸。蒋已先就南岸预伏部队,等该师进入其包围圈内,即予以消灭。第十九师是由北伐前程在广东率领的攻鄂军编成的,是第六军的基本部队。所以蒋要予以彻底解散,另以陈仪的第十九军缩编为第十九师,以王泽民为师长。至于第十七师,由于师长柏杰新见信于蒋,部队得以保留,仅改派文鸿恩为师长;而以杨杰代理第六军军长。后来,蒋得知程又在武汉重新编组第六军,军、师的番号雷同,遂将南京的第六军改名为第十八军,并正式任命杨杰为军长。

当蒋在南京消灭第十九师时,第二军正与反攻南京的孙、褚等部在津浦线南段的乌衣、滁州等处对峙中,敌众我寡,请援不应。鲁涤平召开高干会议,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依据情况分析,判断政局定有重大的变化。第二军即由火线突围撤出,经皖北入鄂,有生力量尚无损失,仅被缴去储存在南京的战利品计步枪

8000 枝，野山炮 80 门，子弹数百万发。那时，我还在第二军任炮兵团长，曾派遣鲁涤平、喻镜渊、徐堃泉等分任炮兵指挥，随军出发作战。我率余部留驻韶关，担任卫戍。鲁于攻克南京时，俘获敌炮兵两个团，曾电我经江西急赴南京处理。我因卫戍责任，不能不向蒋请示。蒋要我经海道赴沪，并电其后方办事处长文素松（江西人，保定军校三期炮科生）指派永丰舰担任海运。正候运中，接谭延闿由武汉来电指示时局变化情形，嘱我经湘赴汉。我随即拔队启行，终以炮兵行动缓慢，被蒋派钱大钧师轻装追及于乐昌的唐村附近，我后卫一连被其消灭，本队已入湘境，得以脱险。此为蒋介石企图解决第二军的概况。

在南京的第六军被蒋介石解决以后，程潜在汉口重新编组第六军，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林伯渠等协助下，整理训练，很快又成为劲旅，并参加了第二次东征讨蒋。新第六军的师长人选：第十七师为李明灏，第十八师为张轸，第十九师为胡文斗；另有教导总队，总队长李国良，副总队长为汤恩伯。其时，南京的第十八军（即老六军）分驻在扬州、靖江一带。程考虑到该军与自己的历史关系很深，尚有可能争取过来，遂以军委会命令派我赴扬州改编。当我到达扬州时，杨杰已于先一日带侍从副官萧道钦携军饷 21 万余元逸去（萧为第二军军校学生，这事是他告诉我的）。当杨尚未离去时，六军的人如马崇六等力主将杨诱杀，以为背信弃义者戒。然终不肯出此。我秉承程意，对杨未加追捕，即对其留军亲近，也择优安插，例如副官处长文益善，仍原级蝉联。这为以后杨再亲程铺平了道路。（杨任参谋次长时，力主程任参谋总长，虽系自谋，亦含有报答之意。杨为此事，曾专赴江阴和我磋商，并表明当日心迹。）改编时，我考虑该部人枪很充实，大敌当前，过度缩编，不利作战，仅裁减陈隐骥团，余均保留，编为三团制的一个师，另一补充团，炮工兵各一营。团长为吴道南、文朝藉（吴、文均广东文昌人）、陶振武、邹增，炮兵营长

为贾宪民，工兵营长为张刚（陶、邹、贾、张均系浙江人，为陈仪旧部。工兵极完整，有架桥纵列）。兵力较普通步兵师多一倍以上，因而建议编为独立第十七师，师长仍以文鸿恩充任。王泽明调军委会，陈隐骥调师部上校参议。得军委会复电同意照办，并任我为副师长，督师沿运河线北伐。至此，原被蒋介石编并的老六军又回到程潜的统驭下。

### 桂系联程倒蒋，复联谭、程倒唐

1927年夏，武汉国民党政府实行分共、背叛革命后，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于反共虽已一致，但宁汉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南京方面以蒋、桂之间的矛盾最为突出。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为首的桂系拥有足以与蒋介石争雄的武力，对于倒蒋，与武汉方面又是一致的。

是年8月间，武汉政府正式下令征讨蒋介石，并特派程潜任东征军江右军总指挥。程奉令后，即率第六军、第三十六军誓师出动。蒋介石为了对付武汉，乃中止北伐，把布置在津浦路与北洋军阀对峙的部队转移到江南来。那时蒋的总参谋长李济深在粤，由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实际负责。据蒋的亲近说：“蒋曾以他的对付武汉方面的军事部署的复案就商于白。”白忽以第三者的姿态说：“北洋军阀是我们一定要打倒的敌人；武汉方面是兄弟间意气之争，总有一天会得到解决。放弃一定要打倒的敌人，从事兄弟阋墙之斗，恐怕国人不会谅解吧！”蒋听了白的这番话之后，黯然而去。次日，蒋复到白处，再以试探的口吻说：“我想趁此时休息休息。”白的回答是：“总司令如果真需要休息一下，我也赞成；否则徒然在政治上掀起一个大风浪，那就大可不必了。”至是，蒋已确定桂系是在逼宫，于是不待东征军到达，即宣布下野。这时，程的东征军总部已推进到芜湖，第六军在芜湖、正面直前，第三十六军在右翼，进到宣城的湾址，闻蒋已下

野，即停止前进。我随程先到南京。由于蒋已下野，程、桂之间的第一次合作遂告一段落。

宁汉合流后，唐生智受汪精卫的指导，拥有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十七等军，势力雄厚，以武汉为中心，据有两湖和安徽地盘，与南京方面抗衡。谭延闿、程潜以蒋既下野，都劝唐与南京合作，免招桂系之忌，未为唐所接受。由于桂系的根据地是广西，此时桂系的部队已伸到京沪一带，唐部横阻于广西与京沪之间，成为桂系把持中枢和它的前后方联系的巨大障碍，因而企图驱唐至为迫切。桂系想利用谭、程的宿望及其所部军事力量，遂与谭、程共谋倒唐。其时，我周旋于谭、程之间，得知有人曾向谭延闿建议：与桂合作驱唐，胜则徒利于桂，于湘有损无益（湘军自相残杀，势必削弱力量）；败则将予蒋以复起的机会；不如调集第二、第六、第十四各军驻防江苏，以巩固畿辅为首要，并保持朱培德（也是不满于蒋的）在赣的实力和地位，另以李宗仁主皖，作为宁汉之间的缓冲地带；对唐宜尽可能采取怀柔政策，必要时，还可作为制蒋的外援。如果蒋要复起，势必先策动第一、第九两军；那时，合苏、皖、赣三者兵力，即可予以击溃。谭、程素不以唐势坐大为然，与桂合作驱唐已成矢在弦上之势，没有采纳这一建议。西征结果，驱唐的目的虽已达到，但卒给蒋以再起的机会，并且发展到桂复联蒋倒程和蒋第二次消灭第六军。

西征出师为湘桂联军。桂军推程为总指挥，湘军担任长江以南，桂军担任长江以北，齐头并进，攻略武汉。战事进行由第六军攻击驻湾址的第三十六军开其端序，刘兴未作强烈抵抗，即向鄂南撤退。桂军第七军攻皖北，何键亦未抗拒，便向鄂北撤退。唐部由于扩编过快过大——以参加北伐前的湖南第四师为基础，一年之间，扩充为三个师的第八军，复扩充为三个军的集团军，因之，部队的质量提高远远赶不上数量的发展；在西征军的着着

进逼下，军心涣散，士无斗志，纷纷向程、桂挂钩，各寻出路。其中第八军第一师是唐部的精锐，由于该师师长张国威是醴陵人，与程同乡，早已暗中接受程委为第八军军长。张师驻防粤汉铁路线，当其他部队由前线溃退时，张已不服从唐的调遣，按兵不动，迫使唐不得不下野。唐于宣布下野后，立即将张国威绞杀，并将部队交由号称方面军总指挥的李品仙、何键、刘兴等协商指挥，向湖南撤退，本人遄赴日本。此时，唐的部队内部较团结、并且坚决拥唐的只有刘兴的第三十六军，第三十五军何键已不可靠。何键甚至怀疑刘兴可能将第三十五军吞并，因而迅速向常、澧撤退；李、刘两军则沿湘北逐渐南移。西征军入湘的作战方针是“剿抚兼施”。军队部署，以新附的叶开鑫第四十四军为右翼纵队，沿长岳铁路；第六军为中央纵队，沿岳阳、湘阴右大道；第十四军为左纵队，沿通城、平江大道，节节向南压迫。不意此时蒋、唐又已重新结合，蒋密令叶中途倒戈。当叶与长沙方面电话协谋时，被粗中有细的张轸所收听。张即一面调所部对右侧作勾形守势，预为之防；同时报程，急调第七军大部填补叶部空隙，配合第六军，将叶部击溃。当叶部叛变时，左纵队陈嘉佑亦令所部从前线撤退；而正在前线作战的谭道源，于奉命后，却秘而不宣，继续督师奋勇前进，将平江占领，从而威胁长沙。李、刘等既知叶部已被解决，遂不再抵抗，退往湘西，并向程、桂表示，愿听改编。此为主攻方面概况。担任助攻的第二军，已由荆、沙进驻澧、常，未再进击。至此，西征军入湘作战即告终结。

程潜率部进入湖南以后，忙于军队的整编和地方的“善后”，不仅湖北的军政实权已为桂系所掌握，同时统驭两湖的军政机构，如两湖政治分会、两湖军分会、两湖清乡督办等，名义上虽仍由程担任，实权亦均已为桂系所窃据，伏下了桂系联蒋倒程的祸根。

## 桂系联蒋倒程

程是处处顾全大局的，对于湘桂合作，推诚相见，初无二心；桂系则不然，李、白之流一向是以封建割据的广西为其根据地，企图通过广西大门的湖南来扩张势力，争霸全国。他们西征的目的是要把湖南置于他们绝对控制之下。因为唐生智不能作他们的爪牙，所以必须驱逐之，程潜同样不能充当他们的仆从，李、白当然知道。西征之役，他们仅是利用湘军的实力，特别是利用谭、程的宿望。程桂之间的根本矛盾是不可能调和的。因此，在驱唐目的达到以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倒程。至于李、白将程拘禁，所谓“专横跋扈，把持财政”的罪名，完全是摭拾一些枝节问题，作为借口而已。程所指挥的湘军原有谭、程两个系统，而谭、程之间存在着传统的矛盾；加以程赋性率直，平日接待部属，有时词色欠温和，因而也加深了谭系将领如鲁涤平、陈嘉佑、岳森等人对程的不满。鲁、陈都曾向我表示过：“不是畏公（谭别字畏三）的关系，我们为什么要受程的指挥。”岳森也向我说过：“在大通船上，我曾为程替过死，以后见面，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有，不太可怪吗？”我一面力劝鲁、陈等顾全大局；另一方面也曾向程委婉陈词：“鲁军长、陈军长虽是您的部属，但现在都是独当一面，接待要有一定的礼遇。又第六军编为甲种军，第二、第十四军编为乙种军。六军后来居上，这也是令人难以满意的。”程的答复是：“他们毫不注意自己的军队，尤其是护芳（陈嘉佑字）迷迷糊糊，自己有多少兵、多少枪、多少饷都不清楚。”谭系将领平时对程不能无间已为上述。其次，第六军内部也不是毫无问题。当时，合新老六军及向成杰部，实力已是够三个军的规模，程不能像唐生智那样大刀阔斧的扩编，又不愿把第六军军长职务让给热衷已久的唐蟒，因而第六军内部亦不够团结。正由于程所指挥的湘军内部存在着这些矛盾，使得桂军有隙

可乘，敢于发动倒程。

1927年冬，蒋介石下野后，国内大资产阶级，特别是江浙财阀仍然是支持蒋的，因而对宁汉合作后的南京政府，在财政上处处掣肘，甚至连饮鸩止渴的内外债都无法举办，以致浩大的军费无以支付，形势危迫，不可终日。蒋介石乘此时期，分派其所卵翼的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右派四处活动，图谋拥蒋复辟。当时，派我处的为黄埔四期生、孙文主义学会分子谷磊（谷是1924年我任湘粤边防司令时的书记，被保送入黄埔军校的）。他凭借着旧部的关系，以“财官两美”来诱劝我列名通电拥蒋，被我严词拒绝。我电请示应付大局的机宜。程复电：“一切与贺贵严联络，共同行动。”贺因曾协助蒋介石第一次解决第六军有功（此时程尚未明瞭此情）已升任第四十军军长，驻陇海路许家集。我去信联络，未得具体答复。未几，所有津浦、陇海两路军队团长以上的军官除我而外皆列名通电拥蒋。南京政府迫于形势，对蒋让步，蒋遂得以复职。

蒋复职后，随即赴徐州召集军事会议，第一道命令即是调何应钦为总司令部总参谋长，削去何的兵权（当时何任东路总指挥）。何因而不满于蒋。当桂系向蒋秘密通款时，何很关切地对我说：“你转告程先生不要上别人的当。他们三个人（指程、李、白）联衔打的电报，已有两个人出来否认，将来一个人吃苦头，犯不着。”后来，蒋第二次解散第六军时，何也持另一种态度。

西征军对两湖善后尚未完全结束，蒋已复起，于是高举反蒋反汪的旗帜。蒋为了应付这一局面，采用贺贵严的献策，要谭延闿兼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被谭坚决拒绝。当天晚上，谭以语我，我力劝其接受，理由是：一来可以统一湘军，不致群龙无首；二来掌握一个较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不致处于被动。谭答：“这正是贺贵严为蒋牵线的说法。更重要的是，我除了可受孙先生的指挥以外，不愿受其他任何人的指挥。”我说：“你是国

府主席，首先指挥蒋，蒋所指挥的是您的兼职，关系不大。”谭说：“国府主席只是执行国务会议的决议；总司令在职权上可以独断专行，发号施令。这样，所谓我指挥他是一个空名，而他指挥我就非服从不可，所以不能干。”我说：“虽然如此，但较大的问题，蒋会要商得您的同意，还不致那么专断；并且你接受了总司令的名义，可以请颂云先生担任副总司令或总指挥，负实际责任。对于团结湘军确有好处。如果您坚决不就，蒋提出别人，那就更不好办了。”谭肯定蒋不会提出别人。我说：“如何应钦、李宗仁不都有被提出的可能吗？”谭答：“蒋、何同床异梦，蒋、李之间距离更远。蒋不会提到他们。”仍坚持不愿受制于蒋的原意。

一天，李宗仁为了表彰他的龙潭战绩，举行阵亡将士追悼会，央谭书赠对联诔词，我和李侧侍谭挥笔。适王永恭（福建人，与程为日本士官同学）投刺来谒，谭要我代见。李旋辞去，谭、王直接谈些什么，我没与闻。当晚，谭写了一封长信致程（此信原存唐菊庵参事处，据唐回忆，信的内容大概是，首先略谈当时国内形势，指出军队的实力不及蒋，党的势力不如汪，同时反蒋反汪的非计，恐徒以虚言招实祸；接着建议对唐部不宜穷追猛打，为渊驱鱼，而要安辑收抚，备为己用，中有“家鸡打起团团转，野鸡打起满山飞”的譬喻语；最后还提到联桂终不可恃）。次日，唐约我赴汉一趟。当时，程、桂正在长沙举行会议。我持函面程，程阅后，对我说：“祖安坐在南京，完全不知道外面的事情。”我说：“他在中枢，接触面广，可以平衡全局；您处于一隅，因而和他的看法不同，在所难免，现在可以交换一些意见。”谈话是在会议的空隙进行的，匆匆数语，不得要领。我想约李明灏、李隆建（字仲庄，醴陵人，其时任湖南财政厅长）、张定（字叔丹，平阳人，其时任教育厅长）等商定共同主张，再向程建议。不料他们仍存着对谭的历史成见，都淡漠视之。我为了弥缝西征军的破裂，只好向桂系做工作。时白崇禧住在湘雅医

院，我通过他的参谋长王泽民会见了他。他首先问南京情况，我大致谈了一些。最后，我以第三者的态度爽直地说：“西征军如能始终团结一致，蒋对你们是莫可奈何的；万一不幸破裂，蒋就会一个一个地宰割，难免同归于尽。”他强调西征军会始终团结。我因何应钦的忠告，心中有数，更进一步地说：“西征军是湘桂两个力量组成的，就存在着一个天然的虚隙，容易被人利用。”他力言无问题。对于这个带关键性的问题，我曾向程表达自己的意见：对桂系一方面要争取团结，另一方面也要提防。程答：“德邻、健生对我都很好。”表示深信不疑的襟怀。据传，长沙会议时，有人曾建议派兵包围会场，捕杀李、白，被程顿足大骂而止。

1928年5月初，蒋介石秘密任命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和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在汉口召集会议，程在长沙，准备应邀赴会，左右多不赞成，程不听。会议开幕后，李请程到四楼暂时休息，随即宣布免程本兼各职，并将其拘禁的提案付表决。桂系出席的人自然兴高采烈，一致赞成；湘系出席的人则如晴天霹雳，阵容纷乱。表决时，鲁涤平举了手，陈嘉佑弃权，非法的议案遂以绝大多数的同意通过，桂系联蒋倒程的阴谋从而得以实现。当桂系对程极不相容，酝酿倒程时，其内部曾经有人提出湘军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应慎重考虑；白崇禧断然地说：“湖南人没有三个人以上的团结，可以大胆地干。”至是果如所言。

### 第六军第二次被蒋介石消灭

程被拘禁后，我即日到南京找谭，向他报告事变的经过。谭也把蒋介石和他谈话的情形告诉了我。谭说：“当颂云被扣的那天，蒋即来我处，喜形于色地向我说：‘程颂云倒了！’我问其故，他把桂系将程拘禁的事说了一遍。我明知他们是狼狈为奸，只好说：‘中华民国的人起来了便不会倒的。’他没趣地辞去了。”

我重述讨唐和不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失计。谭黯然良久，说：“这样的勾心斗角，殊非我始料所及。你去找找李协和（李烈钧字，当时任军委会常委）、杨幼鲸（杨树庄字，当时任军委会委员兼海军总司令），看看他们能否从中斡旋，早日恢复颂云的自由？”我遵照谭的指示，分别找了他们。李的答复是：“此时能保存生命就是万幸，马上恢复自由是不可能的，要我向哪个去说呢？”杨的答复是：“大家想办法吧！请转达畏公，我一定要尽到朋友的责任。”

我将交涉的结果向谭汇报。并要求谭直接致电话李、白，要他们尊重国家法纪，将程释放。谭说：“那是与虎谋皮。他不遵，第二步怎么办。我料他们还不敢置程于死地。此时最重要的是第六军不要乱动，免得他们有所借口。”我问谭，军队又如何自存呢？谭说：“你再去湖南走一趟，要永安（鲁涤平字）负责维持。”他写了一封很恳切的信给鲁，信中有“谨慎不要推卸责任，放胆不要疏于戒备”等语。我于旧历端午节前夕到达长沙，持函向鲁交涉。鲁完全接受谭的意见，向我保证：只要第六军不乱动，愿与共存亡；军饷按月由省库开支。此时第六军部队分驻平、浏、醴一带，军部驻醴陵。我即日驰赴军部。

当我到达军部时，军队的人事已大变动；第十七师师长李明灏已辞职，仍随军行，由团长彭亚尧升任副师长，代行师长职务；第十八师师长张轸升任副军长，仍兼师长职务；第十九师师长胡文斗升代军长，以张栩东升任师长；军参谋长唐麟已离职，缺虚悬；军参谋处长马崇六离职，调第十九师参谋长高卓东继任；军政治部主任虚悬。湖南省财政厅长李隆建亦随军行。他们见我来，均悲苦交集。我随即将在南京、长沙和谭、鲁等人交涉结果向他们汇报；胡文斗也将唐麟和汪精卫联络情况，以及军队打算经赣入闽，静待时局变化的决策说明。我亟言汪文人弄兵的不可靠；且颂公在武汉时，高举反汪的旗帜，此时又跟汪走，是

值得考虑的。诸将领已知非计；但先一天已令驻平、浏各部向赣边移动，电讯被破坏了，无法将部队追回。胡据情以实相告。我明知此路不通，且和我与谭、鲁所交涉的协议完全背离，只好向他们告别。他们一致要我担任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随军行动。我念程缔造第六军的艰难，认为保存这点力量，还可作为恢复程的自由的讨价还价的资本，也就应允了。当日，军部正拟向萍乡进发，忽报彭亚尧不遵命令，率领他的基本团，背道而驰。军部的紧急处置是：以补充团队徐焕湘（这一团是程初到南京所收编的王善一团。徐是第六军的老人。）继任第十七师副师长，率领其余两团向彭追去，冀其复返。不料这两个团又相继叛变。事后查明；原来彭是张辉瓒旧时的司书，他率这一团人投奔张去了；另外两个团中的下级军官多时醴陵人，受张其雄（保定军校三期生，醴陵人）的勾引，投靠何键，被收编为新编第十九师。第六军系甲种编制，各师都有三个团，加军直属炮兵一个团（团长任调），教导总队相当一个团，除第十七师外总计尚有步枪约一万四五千枝，山野炮 54 门、机枪 200 余挺，实力还超过一个乙种军。因此，我们并没有因第十七师的瓦解而变更原定计划。军行抵萍乡，当地驻军为第三军的潘希贤团，对我们假道尚无阻滞，军部及直属部队得以安全到达宜春。各师也由铜鼓、万载向宜春集中。由我电江西省主席朱培德，请其允许我军暂驻宜春，并请拨款 20 万元以维军粮。朱在政治上是唯谭的马首是瞻的。爱屋及乌，对于我们的请求完全应允了；但要我们派一个师转驻安福，担任地方绥靖。拨款也随即汇到。我们派了第十八师到安福驻防。

第六军开抵江西以后，主客相安，本来可以从事休整；但因内部意见分歧，军心甚为涣散。当时，胡文斗坚持暂到闽西的原议，认为闽西关山险阻，蒋、桂都奈何不得；张轸则主张到河南；马崇六、王西原（团长）等都是云南人，则主张远征云南；

而全军中的中下级军官绝大多数是醴陵籍，都想回湘依附何键；唐蟠则正在积极活动投汪。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我和胡、李、张等终日筹思，大家认为：蒋、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们暂时结合，只是为了共同倒程；现在倒程目的已达，他们之间的破裂仅是时间问题，蒋还有利用我们消灭桂系的可能；并且蒋在表面上还不承认桂系拘禁程是他的指使，作为一个最高统帅，对部曲阋墙之斗，不偏袒和支持一方对另一方进行穷追猛打，也是他应当和可能采取的态度，只要我们暂时虚与委蛇，渡过难关，前途还有可为。由于这种幻想，大家又推我和李明灏赴南京活动，企图依靠谭的关系，向蒋交涉驻防地区。还有李隆建与我们同行。我们行抵南昌，住江西大旅社。适唐蟠和傅良弼（九江市长，原是第六军的团长）已先到。唐此时已通过龚浩（唐生智的策士）向汪精卫领得活动费4万元，据唐说：买了万把块钱的西药，是来慰问军队的。我和李认为这位老参谋长也是来共患难的，深信其无他意；至于目前彼此主张不同，将来尽可从长商谈，不难求得一致。于是我们仍按原定计划，驻往南京。不料唐于我们离开南昌后，即勾结第三军军长王均，没有取得朱培德的同意，秘密截断了我们同第六军军部之间的电讯联络。他本人则驰赴分宜，勾结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徐焕湘（徐于第十七师瓦解后调充此职）、团长蔡雄和军部特务营长黎某等发动兵变。一部叛兵黑夜冲入我和胡的卧室，对准两个床位各击十余枪。胡文斗惨烈殉职，我因出差获免。另一部叛兵冲入我和胡的卫士卧室，一顿乱枪。卫士都在睡梦中，均被击伤，无一幸免。胡系甘肃天水人，日本士官十五期生，才识敏捷，胆气过人，极为程所器重，遇难时仅29岁。良友云亡，真令我肺肝为摧。

后来了解徐、蔡等之所以被唐蟠勾引叛变的原因是：当第六军于1927年攻下南昌时，徐焕湘当步兵营长，曾抢劫江西裕民银行纸币百万元（当时通货贬值，折合硬币为30万元），胡文

斗、张轸等向程告发，主张严办。程即组织军法会审，派唐蟠为审判长。徐贿唐3万元，唐即从轻判处，撤差了事。徐由是德唐恨胡。蔡雄原是专以小忠小信阿谀逢迎、取悦官长的能手。胡任团长时，蔡在该团当排长，被胡不次擢拔，不到一年，当上了团长。胡认为对他有厚恩，纵然斥责几句也无关系。在某次整饬军纪的训话中，当着全师官兵，将蔡罚跪，天真地以为“罚自亲起”，可收惩一儆百的效果。不料蔡竟忘恩负义，怀恨在心，蓄谋报复。因此，唐蟠便从徐、蔡入手，一一串通，酿成巨变。

张轸时驻安福，闻变，即拔队回宜春戡乱。叛徒10余人闻风鼠窜，唐蟠也知难而退。此后，即由张轸代行军长职务。我们到达南京后，两李（李明灏、李隆建）即赴沪。我因与第六军军部的通讯已被隔绝，还不知道内部发生了如此巨变，仍向谭求援，并向蒋、何交涉。何当时正想回贵州，企图拉拢我们做他的基本力量，故对我表示很好。蒋则日约一日，均以有他事为借口，屡次改约见拒。后来派葛敬恩代见我。我乘机向葛尽情揭发桂系窃踞长江上游形胜之地，企图与中央对立的阴谋；并亟言政治分会制度妨碍统一，应即废除。葛竟说我有意挑拨。我知道他是蒋的代言人，才恍然大悟。蒋、桂之间虽然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倒蒋之后，还须斩草除根；在此消灭第六军乃是他们共同的阴谋。

一天，谭告诉我说：“益之（朱培德字）来京，我已经托付他照顾第六军。益之较有担当，可以放心。”大约一星期后，朱培德匆匆地来到谭处，说：“事情糟了，蒋已明令要我负责解散第六军。命令的大意是：‘第六军军长胡文斗自北伐以来，所向有功；不料该军第十八师师长张轸公然叛变，戕杀长官，应即从严剿办云云。’”原来蒋事先已密调金汉鼎部开往江西。金部到达九江，合第三军力量，已足够消灭第六军，遂发布这个命令。谭、朱对话时，我在座。他们共同问我的意见，我一时真如雷轰

顶，五内如焚，想不出任何对策。三人反复商量，最后一致认为：军队存在，反而于程不利；如果军队消灭，能够换取程的自由，还是值得的。于是朱表示：只好遵令执行。我所请求于朱的是：设法招抚，避免萁豆苦煎而已。由于蒋施用流氓手段，捏造张轸搞兵变并戕杀胡文斗，我当时不明真相，因而对张是不谅解的。朱照蒋令执行，张率军东趋，至樟树附近，与朱的警卫旅遭遇，张采用正规战，将其击溃；旋朱、金两军全部到达，分进合击。张于苦战后，始向闽边突围，到达闽境，仅残存张际泰一营，为卢兴邦所收编。其时，南京方面发表杨树庄为福建省主席。杨以第六军还有遗留问题，邀我同行，协助办理。我到福州后，在法大旅馆遇见张轸，彼此交谈，始知全盘经过，当即据情告杨。杨表示他对程和第六军帮忙不到的歉意。长厚真挚，使我铭感。后来，还有第六军部分中下级军官由赣、闽流集到南京，蒋要我作证，发了类似遣俘的薪饷一个月。

驻在扬州、靖江一带的第六军独立第十七师，由文鸿恩充任师长，我充任副师长，已如前述。早在蒋介石复职的时候，即已将文调任上海市公安局长，以团长文朝籍升任师长；已将我调任总司令部参议，遗缺原拟由总部上校参谋林蔚调充，后来考虑到施伯衡原先是陈仪师的旅长，对于这个师的掌握更有把握，遂决定由施接充副师长。同时，还将团长吴道南调充琼崖警备司令。隶属第六军的独立第十七师，由于蒋得近水楼台之便，将其骨干一再撤调，终于变为蒋的嫡系部队。

至是，新的第六军再度被蒋介石所彻底解决了。

(1963年)

#### 编者按：

本文曾送请程潜省长审阅，程潜省长提出了订正和补充意见如下：

原稿提到：“武汉国民政府密令程潜总指挥将蒋逮捕。”程省长对此作了补充：“此项密令系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布上，交由第六军党代表林伯渠缝在衣缝内，带到南京转给我的。”

原稿又说：“杨杰曾将汉方密令献蒋告密。”程省长指出：“密令系由林交我，事机极密，杨杰不得而知。”我们根据上述意见，对原稿作了相应的修正。

原稿说：“当蒋介石乘兵舰到达南京时，杨杰登舰欢迎，初以市面秩序尚未恢复为词，请蒋暂缓登岸。”程省长指出：“当时登舰劝蒋赴沪，是我不是杨杰。”并补充说：“蒋与武汉不和，到沪后，召开会议，我在会中，力主调和，愿赴汉劝合。旋及单身赴汉，劝合不成，乃潜赴采石矶，调第六军赴汉，为蒋所发觉。至此，蒋对第六军必欲剪除，并派徐培根追我。”我们根据上述意见，对原稿作了相应的修正。

原稿的标题是：“……桂系联程倒蒋……”内容也仅仅叙述桂系联程倒蒋情况，把谭延闿说成是超脱事外。程省长指出：“谭是倒唐的主要人物，是搭桥拉线者。”我们根据上述意见，对原稿作了相应的修正。

程省长还补充了当日他与谭、桂商议倒唐的经过：“当时在南京，为了商谈倒唐，李宗仁、白崇禧曾先后两次访问过我，谭延闿也访问过我两次，并且在石板桥私宅设宴，议谈此事，赴宴者仅李、白和我三人。席间，李曾赌咒发誓：倒唐之后，如果拥蒋，将为天地神明所不容，云云。”

(1963年)

## 1927 年程潜由南京脱险经过

唐菊庵\*

我看了谢慕韩先生的《关于东征军、西征军和第六军被消灭的片断回忆》一文，其中提到程潜先生单身赴武汉，蒋介石派徐培根急往追程的情形。我是亲历其事者，当时事实如下：

1926 年和 1927 年之交，国民革命军在长江以南各省宣告胜利，进达长江流域，广州国民政府随之北迁，于 1927 年元旦开始在武汉办公。这年春天，第六军军长程潜任江右军总指挥，率部沿长江南岸东下。虽雨雪载途，军行甚苦，而进展极为迅速。其时，我担任江右军总指挥部秘书，亦随军东征。江右军由芜湖方面沿江东进，在雨花台附近激战大捷后，于 3 月 24 日进入南京。程潜写过一首《由芜湖趋金陵》的五言古诗以纪实，其结尾四联云：

感愤令前军，疾趋雨花台；  
扬旌牛首山，振旆采石矶。  
夷兵悉歼灭，余众咸依归；  
七日克金陵，昭苏怨来迟。

诗中所谓“夷兵悉歼灭”，是指歼灭了张宗昌所属的白俄雇佣军几千人。

到南京后，总指挥部驻扎城内三元巷。有一天（约在四月初，具体日期记不清了），我正在夫子庙闲逛，程潜的卫士萧家吉匆匆忙忙地到夫子庙找到我，他对我说：“总指挥找你，有紧要的事，赶快回去吧！”我回到总指挥部以后，才知道是程潜叫

---

\* 作者系北伐军江右军总指挥部秘书。

我跟他出差。随即由军需处送来中国银行钞票一万多元，交我携带备用。我跟程潜同车到下关江边上船。随行人员除我以外，还有第二军参谋长岳森、总指挥部副官罗友松（衡山人）和卫士萧家吉等4人。我们搭的是一艘小火轮。当轮船开动后，我问程潜：“颂公（程潜号颂云），我们有什么任务？”他非常严肃地答复说：“蒋介石要造反了，我们往汉口去！”这时，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走得这样匆促。我接着问：“我们第六军的部队怎样呢？”他说：“这很难说，不知道能不能逃出南京。”随即又说：“如果逃不出来，也就会牺牲的。”

当我们的小火轮上驶到大通江面时，忽然发现后面有一只兵舰在破浪猛追，不久就逼近小火轮了。兵舰上有人在高声喊话：“停船！停船！”程潜穿的是便服，他听到追来的兵舰有人喊话，心知有异，急忙躲进火舱里匿藏下来。我们则仍然站在船面上。兵舰越靠越近，有人又在喊：“程总指挥在不在船上？”我们回答：“没有在船上！”随即，兵舰靠拢了小火轮，徐培根（他当时在蒋介石总司令部任职，具体职务已记不清了）来到船上说：“总司令请程总指挥回南京去，有紧急的事和他磋商。”当时，岳森挺身而出，回答说：“程总指挥不在船上，只我一个人在这里，有什么事找我好了。”徐培根面带怒容，左顾右盼，问这问那，与岳森纠缠了约半点钟，但未在船上进行搜查，大概徐因怕对蒋介石消不了差，便将岳森带到南京去了。

岳森被带走，徐培根的兵舰转回下驶后，我们的小火轮继续上驶。程潜也如释重负地离开火舱上来了，我向他汇报了徐培根上船盘问和岳森被带走的情况。船将近秋浦时，程潜对我说：“蒋介石定会再派兵舰来追的，我们即刻上岸去；否则，会有危险的。”随即令船靠岸，大家一齐登陆。这时，程潜吩咐我们把行李和现钞都丢掉，他说：“‘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现在是逃难的时候，带这么多钱在身边，很危险！”我觉得这笔巨款弃之

可惜，因此，只叫大家把行李丢掉，而将一万多元钞票分给同行的6个人捆在身上。我们一行7人，沿着一条小路步行，走了10多里，天色已黄昏，借宿于秋浦县境的一个小镇的农民家里。当晚，我赶到秋浦县城，打电报给在九江的第六军参谋长唐蟠（兼九江训练处处长），告知脱险情况。第二天清早，继续徒步前进，到了湖口。这时，唐蟠派了队伍及轿马来接，当天傍晚，平安抵达九江。随身带来的现钞，由我经手，尽数交给九江经理处。后由唐蟠通知该处，发给每人一二百元不等，作为添置衣服行李之用。

我们在九江停留了两天，唐蟠向程潜汇报了部队训练情况。继而又搭轮船往汉口，随行者仍为我和罗友松以及四个卫士。到汉口后，程潜住在武汉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家里，我也随住谭家。这时，已经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继续执行原来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蒋介石等则背叛了大革命，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组国民政府，与武汉方面分庭抗礼。蒋介石叫嚣要以武力统一全国，而武汉方面提出的口号是：“打倒蒋介石军事独裁！”程潜到武汉后，谭延闿接待殷勤，国民党中央要人，如孙科、徐谦、林伯渠（当时国共合作，林系国民党中央委员）等，日夜来往谭公馆，密商大计。武汉反蒋空气，此时更为浓厚了。

（1964年）

## 王天培的《宁归歌》

龙和甫

贵州侗族名将王天培，于1927年8月25日被蒋介石、何应钦秘密杀害于杭州西湖畔，临终前写了一首绝命歌——《宁归歌》，秘托解差转寄其亲信。原稿现存其子王云处。读来感人肺腑。现将原歌抄录如下：

我在年幼兮，耕读奉养。  
我是侗族兮，同遭歧视。  
愤恨帝封兮，武昌起义。  
辛亥革命兮，直到北伐。  
为民革命兮，十有六年。  
三民革新兮，无限振奋。  
三大政策兮，尤所钦崇。  
为革命事业兮，奔走呼号。  
凡我老幼兮，皆应有责。  
有形无形兮，革命工作。  
竭尽心力兮，求达目的。  
适得其反兮，忽遭冤祸。  
哀我将士兮，万里从征。  
枵腹从公兮，惨无人知。  
津浦国道兮，独负其艰。  
孙张合作兮，混以白俄。  
日俄铁甲兮，搏以肉体。  
孤军奋斗兮，两月余矣。  
敌众我寡兮，弹尽粮绝。

日焰尘扑兮，饥瘦疾病。  
再接再厉兮，往返牺牲。  
伤亡枕藉兮，酸心惨目。  
实情实境兮，天地知之。  
是非混淆兮，公理沉没。  
青天白日兮，环境恶劣。  
恶有未除兮，恶潮澎湃。  
东海沧浪兮，吾宁速归。  
卫士环侍兮，心不忍弃。  
仰天叹息兮，守法而归。  
沪杭车站兮，效岳而归。  
人生至此兮，万念皆灰。

(1964年)

## 王天培之死

孟绍廉\*

王天培，贵州省人，侗族。由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就在贵州省军队中由初级军官逐渐被提升为高级军官，并曾兼任过贵州省军务督办的职务。

1927年，王曾率所部第十军参加北伐，在由湘鄂西进军徐州后，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前敌总指挥，仍兼第十军军长，奉命由徐州继续向北挺进，主要是对北洋军阀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作战。

王天培曾阅读蔡锷的笔札。笔札中蔡锷致某人的电报里表示他的观点和态度：他认为北洋军队是一支很好的武装力量，北方人朴实忠勇，而又有强健的身体，能吃苦也守纪律；又说甚欲置身彼中，为此后改良之导线，等等。这些话，使王天培很受影响，并深信北伐一定能够胜利；因此，就产生了到北京后要招一部北方士兵，补充和扩充他的部队的想法，并多方设法邀请北方的陆军军官。我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电请到徐州的。

我与王天培虽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前后同学，但并不相识。他的参谋长傅觉民与我是同期同学，又是同乡，相识既久，相知亦深，力向王推荐，王也就毫不迟疑地令速电邀请。这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当时，第三路总指挥白崇禧要委派四个纵队指挥官，傅觉民有被任第四纵队指挥官的希望，遗参谋长缺，尚无适当人接替。王有叫我接替之意，虽然在电报上并没有提及。

我由沪赴徐时，知王葆真在南京，因私人关系需要晤面，

---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中将参军。

在南京又由于王葆真而会见了张静江、吴稚晖、钮永建等，均托我带信给王天培。在他们的谈话中，对王天培都表示有好感，称王天培性直爽，有志气。张等并嘱我与王见面时，劝其常向“中央”报告，因为他的信电太少，有人说他对“政府”不够接近，这对他是会有影响的，应该注意。

我到徐州后，当即与王等晤面。我将所带的信交王天培后，并将张静江等所嘱托的话——常常去信电报的话也告知了他。他当时很直率说：“我向来就反对‘电报政策’，更不愿学别人的‘原地冲锋’（指有人专在电报报告中，夸大自己的战果，其实是在原阵地未动）。”我与他是初次见面，像那样直率暴露思想的人，在我是少见的。他紧接着将邀我的意愿也说出来，希望我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我以为与部队毫无关系的人，特别是在作战的时候，参谋长对执行任务上，是诸多不便的，就以此意表示婉谢。王也很爽快地说：也对，先参加工作，以后再研究名义。

彼时，蒋介石正准备召开蚌埠会议，电令军以上各单位都派代表到河南欢迎冯玉祥往蚌埠开会，遂发表我为中将参军，即以此名义代表该前敌总指挥部，同其他代表一起到河南欢迎冯玉祥，并与河南冯部的军政首脑联系，以便在北伐进行中互相支援。事毕回徐州后，正值傅觉民率第四纵队准备向张宗昌部出击，征得王天培的同意，我即随同第四纵队北进。

第四纵队所指挥的部队，也就是第十军全军的部队，由贵州出发，经由湘鄂两省，转战到津浦线徐州，仍继续北进作战，虽然节节胜利，很短时间，就进抵山东省的邹、滕地界，但因孙传芳派大部生力军增援张宗昌后，战况就迅速地发生变化。第十军长时间并无他军配合进行孤军作战，以久战疲惫之师，独当张（宗昌）孙（传芳）联军，不但众寡悬殊，而且劳逸的情势亦大异。因此，第十军就受到挫折。孙传芳见第十军受阻，就一鼓作

气的大力反攻。第十军在力尽援绝的情况下，士气低落，军官已失去信心，告急电报不绝，在临城指挥部附近，已发现溃退下来的零星士兵。

当时，王天培也从徐州到韩庄。指挥部请我到韩庄见王，当请他电李宗仁令驻徐州的第七军派队支援，并说：为鼓舞士气，挽回败势，就是一个旅、或一个团也可能起到作用啊。王天培说：革命不是哪一个人的事，而是大家共同的事。李在徐州，不是不知道第十军孤立无援，且久战疲惫。他认为应当增援的话，不请求他，他也应该支援，他认为不该援助时，请求他也等于零，任凭他算了，不去要求他。本来，第七军就在徐州，并无其他任务，只因蒋桂各怀鬼胎，对北伐就毫不关心，坐观成败，不主动去支援第十军。这确实违背“同仇敌忾”之义。但王天培在战事极度危急的时候，不采用晓以大义、动以利害的做法，激发李宗仁顾全大局之念，以达共挽危局的目的，而斤斤于意气之争，过于愤激，大发牢骚，究竟有什么意义，起什么作用呢？当然求援亦未必生效，可是，终算尽了应该尽的人事。当时王天培坚决拒绝向李请援，使我很难为情。我因疑张静江等称王天培“性直爽”、“有志气”，指的就是这些方面吗？

正好在那时，王天培得到蒋介石亲带两个新兵师前来支援，已到蚌埠的消息。王即迫不及待的赶赴蚌埠迎接。及至蚌埠，知蒋介石听说第十军败退下来，就仍带原来的两师返回南京。王也就紧追至南京。不料何应钦等竟以擅自退却的罪名，将王天培扣押。

张静江、吴稚晖等恐王天培在南京不安全，尤其是在蒋下野出国后。遂要求蒋介石将王天培安置在别的地方，蒋遂令把王天培移押在杭州。没想到蒋介石赴日不久，何应钦即密令杭州保安机关暗加杀害。

这个风声被当过陈仪副官长的王天培同期同学（杭州人，姓

名我已忘记）某闻及，用尽许多方法，寻找线索。终于侦知参加掩埋王天培尸体的一个士兵，许给他若干钱，仅要求他指出被埋的地点。结果被埋地点，就这样得到了。某并买一棺木，重加殓埋。此消息知者渐多，传播越广。何应钦也有所耳闻。既知已不能掩盖，如不明白宣布，更易招致物议。乃改填日期，宣布了王天培许多罪名：什么“临阵脱逃”、“纵兵殃民”、“抗拒命令”等等，并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通令各军。当时稍知情况的人们，就有“盖棺不能论定”的说法。

我对蒋介石及其所统率的北伐军，在北伐初期，估价很高，认为是真正的革命者；但由于耳闻目睹，特别是由于以卑鄙丑恶手段对王天培，真是感到惊异而痛心。王天培的为人，究竟怎么样？绝不是像我与他很短时间的关系所能了解到的。尤其是会谈的时间太少，对他以前的经过，更少闻知。不过，单就在北伐一路过程中的行动而言，正如吴稚晖等所称道的“性直爽”、“有志气”表现得很突出。特别应该指出的，他决不是所谓的“临阵脱逃”。何应钦为什么对他下此毒手？根据在贵州与王天培共事较久、相知较深的傅觉民说：王天培之死，与袁祖铭、彭汉章等之死，乃同一根源。以前，刘显世为贵州督军时，王文华因刘显世系其舅父，由日本毕业回国后，就投到贵州的军队中，依靠刘显世的力量，很快就被提升为旅长。何应钦与王文华系留日本同学，由王文华的关系，也接近刘显世左右，逐渐被提任贵州讲武堂堂长。王与何互相勾结，狼狈为奸，竟乘间驱逐刘显世而由王文华取而代之。王文华既系刘显世之甥，又屡受刘的提拔，竟恩将仇报，以怨报德，因此贵州人大为不满。在贵州的社会知名人士，鼓吹倒王文华，遂共推袁祖铭由川贵发动了定黔之役，驱逐了王文华。

当时王天培、彭汉章均系袁祖铭的师长，傅觉民在王天培师任旅长，都是驱逐王文华的主要参加者。树倒猢狲散。王文华被

逐，何应钦自然也失去了依靠。因与袁祖铭、王天培、彭汉章等结了不可解的私仇。何应钦以后投靠蒋介石集团得势后，没有一时忘却这种私仇。因此，彭汉章在武汉被监毙，袁祖铭在常德被刺杀，与王天培在杭州被暗害，虽系借刀杀人，死各异地，但都出自何应钦一个人的毒手。这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的。

(1964年)

## 我代表冯玉祥联络刘镇华、靳云鹗等的经过

席液池 \*

1926年9月，冯玉祥由苏联归国，在五原誓师，就国民联军总司令之职，响应北伐军北伐。1927年1月，督师进驻西安，准备出兵潼关，参加北伐。当时摆在他面前的两个问题，必须先作适当的解决，才能向东方进军。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盘踞在陕西大门外陕州、新安一带的刘镇华，可以拉拢，也可以继续为敌；第二个是久居漯河一带、正与吴佩孚和奉系军阀争夺直系军残余部队的靳云鹗。他的第三方面的势力如团结不起来，不是吴佩孚死灰复燃，便是奉系越发在河南扩充地盘和增加军事实力。千钧一发，所系甚重。其时，我任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议，冯玉祥派我为代表，分别前往陕州、郑州、漯河等地向刘镇华、靳云鹗等进行联络。兹将经过情形，分述于下，以供参考。

—

刘镇华原是豫西一个拉土匪起家的军阀兼政客。谁都知道他的政治手腕，八面玲珑，狡黠善变，惯于投机，是一个只计利害、不顾信义的人。他和冯玉祥有渊源关系。早在1921年，阎相文入陕西接任督军时，他倒了陈树藩的戈，因而得以蝉联陕西省长。阎因军饷奇绌，被逼自杀后，由冯玉祥继任督军。刘对冯卑躬屈膝，极力拉拢。冯的十六混成旅扩编为第十一师，能够通过吴佩孚这一关，刘也有协助之力。他和冯初期相处，关系搞得还不坏。就拿出旧社会那一套拉拢的办法，彼此换帖拜把子。冯

\* 作者系国民军总司令部参议。

年居长，常称他为“雪亚老弟”（刘字雪亚）。可是刘为省长，掌握本省财政，筹款拨饷，却又“当仁不让”，竭力支持他自己的镇嵩军。冯对刘很优容，第一次奉直战争时，率师出关作战，并将督军交给他。刘兼摄陕西省的军民两政，从此，更肆搜刮，筹饷扩军，羽翼逐渐丰满，就形成了一个拥有相当实力的军阀，常作政治投机交易。

当国民军在南口和直、奉联军作战时，陕西省政局已经变更。刘镇华想重温旧梦，攫取陕西地盘，受吴佩孚的指使，围困国民军第二、三军李虎臣、杨虎城等部于西安，历时8月，迨国民军五原誓师后，经派孙良诚等部驰援，西安之围始解。刘镇华被击败后，退出陕西，盘踞陕州、新安一带，犹拥有三四万之众。他看见吴佩孚已经垮台，没有希望了，有慑于国民军的声势，想和冯玉祥重联旧谊，先期拉上关系，那时是有利无害的。于是请王鸿恩为代表，往返多次向冯联络，表示愿意合作。但一接触到实际，他便躲开推延，态度极为暧昧。同时，奉系军阀也正多方拉拢他，更增加了他摇摆不定的心情。

冯玉祥那时的革命，主要目的是要打倒奉、直军阀，一切以军事第一，胜利第一。因此，必要时，敌人也可拉来作朋友。他考虑刘镇华的镇嵩军是国民军东出潼关的一个阻力；所占据的陕州，又是第一道关口。出师前必须有妥善的解决办法，才能顺利前进。1927年2月初旬，冯派我前往陕州向刘镇华商谈切实合作的办法。当时授意给我的有几件事：1. 和刘商定名义和编制及需要补充械弹饷项的问题，切实合作；2. 如暂时不能表明态度，如何让出陕州的道路；3. 侦察刘的部队情况及其在陕州的工事设备如何；并命我顺便往直军将领靳云鹗处，进行联络，且看一下在京汉线上直军败后的动态。

我到了陕州，见到刘镇华，面递冯玉祥给他的信。彼此略事寒暄，即归入正题。我说：“这次冯总司令命我前往来，代候起

居，面商一切。冯总司令和刘总司令本是多年的老朋友，为了救国救民，打算共同合作起来，这是很好的。冯总司令即将与北伐大军实行南北夹击，扫除祸国殃民的奉系军阀，前途胜利，是可以预期的。不过刘总司令所部，究竟如何编制以及应行补充的东西，如何办法？还望考虑决定。”刘沉吟片刻才慢慢地说：“我个人诚心诚意追随冯总司令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这里面的情况，你也一定知道，不是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不瞒老弟说，我们的军队和你们的军队不一样，下命令不如写信，写信不如当面叫大哥，事事要商量着办。今天所谈的问题，等我和他们商量之后，才能切实答复你。”过了两天，我在和刘镇华晤谈时，一见面就看见他面带阴沉抑郁之色。他首先向我说：“冯总司令对我这番意思，我感激不尽。奈我部下有些人都是绿林出身，旧习没能完全改掉，很难约束节制。他们素知冯总司令治军很严，勉强合在一起，恐怕日后万一有损贵军声誉的地方，彼此都不好。我个人是决心追随总司令在一块革命的，奈现时力不从心，有负总司令提携盛意，望代向总司令说说我的苦衷。容我一些时间，下点工夫，无论如何，我想终久都会追随总司令的。”我在陕州，也曾从旁了解他们部队内部的情况，知刘所说他的部下复杂、难以掌握，也系实情。如王老五（即王榦）、柴老八（即柴云陞）之流，过去都是土匪，对冯治军严峻，是望而生畏的。他们不愿相投，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想这时要刘镇华立即表明态度，看情况已不可能，于是提出第二个问题向他说：“总司令现在的困难，都是实在情况。来日方长，不妨从缓计议。不过大军不久要从潼关东进，总司令所驻的陕州防地，乃必经的道路，那时怎么能避免误会呢？这不能不先商量一个妥善的办法。”刘说：“关于贵军通过陕州的问题，我当考虑，请你放心好了。我虽暂时不便表明态度，但到那时也不会妨碍贵军的东进，我自有让路的办法，将来可以看见的。”我听了他的话，也不知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

无法再往下说了。

不过刘镇华从此向冯玉祥联系得更频繁，表面上似有进步。后来冯先委他为驻豫总司令，后改为东路军总司令。他仍然观望不前。冯又派任右民前往促其就职，并担任他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那时每当他对任右民礼貌表现得特别周洽时，不问可知是奉军被打败了；每当他对任右民态度显示出很冷淡时，不问可知是奉军又打胜仗了。有人说，看见刘镇华招待冯的代表饭食加菜或减菜，就可以知道前方军事的胜利或失败了。刘镇华和我说给国民军让路，当时不是出于至诚，但他对部下也确实难以控纵随心。又一次，他真的向部下提出拟与国民军合作的问题，有几个部下坚决反对。他又说：“国民军不久要大军东下，我们既不愿投冯，驻在陕州这个地方，势必受当其冲。为了避免冲突起见，我们就得让出陕州的道路。”当时也有人不赞成。刘镇华处在这种情况下，曾一度率少数亲信的人，由茅津渡过黄河，向山西境出走，以示部下，他决心不干了。其部下闻讯，又把他追回军中。原来他部下如柴老八、王老五等都是依附他来升官发财的，决不肯失掉他这座靠山的。故刘镇华用这种权术来统驭部下，使之听命于己。果然，主张联奉的受到一定的压制，其余亦皆表示服从，一直到冯的大军东进时，刘才就冯玉祥的委任，挂上国民革命军的旗子，命令附和他的部队，向登封、禹州方面移动，留许仙峰师殿后掩护。尽管有这样的表示，事实上还是躲在一侧看风色的。

1927年5月1日，冯玉祥在西安就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之职后，分三路出兵，与北伐军会师河南。这时已命我接任骑兵第一旅旅长，率部先行开路。我进至汝州境，知道许仙峰师仍盘踞在陕州，尚未撤走。当派人持函前往交涉，请其履行刘镇华允许给我军让路诺言，不料许复函竟云“守土有责，万难从命”。我再致函警告，略谓：“刘总司令已经表明和我军合作，彼

此应是一家。况撤防让路，早有成约。敝旅为先行部队，开通道路，以便后面大军跟进。使命所限，不容稍延。弟贸然前进，深虞发生误会，有伤双方友谊影响大体。希速撤防让路，以便我军通过；否则，发生任何后果，敝旅概不负责。”其时，孙良诚、方振武等部队也从后面跟来，迫不及待，他们向空中鸣枪示威，许部匆匆撤走。刘部所谓“扛着青天白日的旗被打跑的”，盖即指此。后来我率骑兵参加新安、洛阳等战役，打败了奉军，冯玉祥进驻开封。刘镇华看见局势已经大定，才请人向冯谢罪，所部就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

## 二

关于联系靳云鹗的经过是这样的。吴佩孚在南口攻击革命军，实力已有损失。迨他率师南旋，与国民革命军交战，又迭遭失败。其内部见吴大势已去，都想各谋出路。这时，直军将领靳云鹗想团结吴的残部，自树旗帜，以抗击进犯河南的奉军。一面派王海门（冯的老友）代表向冯玉祥联络，想借为外援。另有直军将领寇英杰素与靳不睦，投入奉军怀抱，导奉军来占河南地盘。同时吴佩孚穷途末路，正盘桓在郑州，也想拼凑残部，作死灰复燃的打算。冯玉祥认为机不可失，派我为代表见靳云鹗，给他们打气，壮声势，补充支援，促成其脱离吴佩孚、驱逐奉军的拟计。冯曾嘱咐我，第一向他们说明阎锡山已经合作，西北局面首先能打成一片，宣扬国民军的实力；第二要他们开出需要补充的械弹款项数目，当为筹拨；第三对外传我们赤化，有苏联的国际背景，加以辩白。唯一目的，要促成他们脱离吴佩孚，早日和奉军打起来。

2月初旬，我经陕州转郑州（时靳云鹗在漯河）。我见到阎治堂、贺国光、王维城、王文蔚、马吉第（靳的部下）等，他们正在酝酿打奉军。我按照冯玉祥所嘱咐的话，分别向他们交换了

意见，大家都很高兴。在一次宴会席上，贺国光代表发言，略谓：“现在国民革命军节节胜利，焕（冯玉祥字焕章）、百（阎锡山字百川）两帅也实行合作。大势所趋，不容我们坐视徘徊。我们决定要听焕帅的指示，对抢夺河南地盘的奉系军阀，实行反击自卫……”他们和靳云鹗商定，即出兵向开封的奉军进攻，并以阎治堂担任指挥。

我由郑州转漯河，见到靳云鹗。靳对我的来意，早已了解。除对冯玉祥允许补充支援表示感谢外，语意间，并怪吴佩孚过去不采纳他联冯攻奉的主张为失计。否则，不但不会遭到南口大战的牺牲，更不会落到现在下场。原来国民军退守南口前，靳云鹗想进行联冯攻奉计划，与吴佩孚发生过矛盾。我由漯河回陕时，因奉军锐进，郑州已经很吃紧了。因火车客运已停，我搭京汉路局局长劳文常的专车到郾师，骑驴到洛阳，转回西安，向冯复命。冯笑着对我说：“好了，你办的事都不错，你成军人政客了。”

（1966年）

## 奉军败走河南之役

刘翼飞 \*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已在湖南展开。吴佩孚闻讯，即由北京经长辛店到达保定主持军事，并令鄂督陈嘉谟负责对湖南的战争。迨唐生智会同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克复长沙、岳州，进窥武汉时，陈曾频电告急。吴于8月间，又由保定返抵武汉，亲率所部抗击北伐军。嗣因战事不利，无法支持，乃起用靳云鹗为“讨贼”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总司令，并授权指挥所属直军各部队。但因吴部内在矛盾重重，以致如刘佐龙、张慕楷等投降北伐军者大有人在，吴已束手无策。到了10月10日，死守已久的武昌，终被北伐军占领了，吴佩孚逃到郑州。

早在9月间，由苏联回国的冯玉祥已在五原誓师，自任国民联军总司令。这时，冯即利用吴的内部矛盾，暗中拉拢靳云鹗反吴。靳因冯以统帅自居，态度傲慢，虽曾虚与委蛇，但仍积极为吴准备收复武汉。未几，冯玉祥就任了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准备出兵潼关，向河南进军。奉方为了先发制人，当即向吴要求假道河南讨冯并收复武汉。吴虽同意奉方的主张，但靳却坚决反对，所部不听指挥。因而吴于1926年12月间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免去靳的本兼各职，以靳部大将田维勤继任讨贼军副总司令兼援陕总司令。吴的这一措施激起了靳部将领们的反感，任应岐和刘培绪公开通电反吴，并投靠了北伐军。靳云鹗也早同唐生智暗中联系成熟，接受委任为某方面军总指挥兼军长职务。从此，吴佩孚的处境日趋困难了。

\* 作者系东北军第十军第四旅旅长。

## 东北军大举下河南

自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武汉时，河南士绅代表（卸任河南省长）王印川及前陕西督军陈树藩曾先后到达北京，要求张作霖派兵入豫，以阻国民革命军北上，并讨伐冯玉祥。张作霖既决心先发制人于前，又经王、陈怂恿于后，便于1927年2月，命令东北军第三、四方面军张学良、韩麟春统率所部四个军（于珍第十军、赵恩臻第十一军、荣臻第十六军、胡毓坤第七军）以及万福麟第八军，分别由北京和冀南一带出动，向河南推进。从此揭开了东北军与直军以及东北军与国民革命军战争的序幕。

当时，吴佩孚已处于进退维谷，完全被动地位，不得不接受靳云鹗抗击东北军的劝告。即由靳任河南保卫总司令，派高汝桐为前敌总指挥，准备故意率部后退，诱东北军深入河南后，再以河南地方军队米振标部为内应，进行反攻。因此，吴佩孚又由郑州移驻巩县兵工厂。迨1927年6月北伐军将由武汉北上攻克郑州、南阳时，吴终于被迫离开了巩县，西走四川。

## 上蔡作战失利，东北军全部撤至黄河北岸

1927年3月中旬，东北军第八军万福麟部及第十六、第七军荣臻和胡毓坤部先后渡过了黄河。万部及时以骑兵的快速行军向洛阳方面挺进，阻击冯玉祥部东下，卸任陕西督军陈树藩曾随万的左右参与对冯部的军事活动；荣、胡部受命击溃高汝桐部以后，即南向漯河及郾城一带推进。第十一军军长赵恩臻待第十军重返开封接防后，即统率所部富双英、刘伟、陈琛的三个步兵旅，武汉卿的骑兵旅，段茂琪的野炮团及王德新的工兵团等全军兵力，由开封通过朱仙镇及尉氏县南进。4月初，攻占了鄢陵，并俘虏守将刘培绪、马德风和刘兰3人。

同年4月中旬，第十一军攻下了鄢陵不久，即向漯河及逍遙

镇之线前进。这时，由于陈琛部攻下了开封，曾晋升为中将旅长，刺激了副军长富双英急于求功的情绪。于是，富即率所部步兵第十二旅进入上蔡后，召集团长会议，当场指示徐英的第四十六团向汝南挺进，其余第五十团王某（名字忘记了）所部及第九十团苏锡祚部均驻守上蔡，以防不测。嗣因徐团正在南进途中，与当面国民革命军唐生智所属张发奎和黄琪翔部发生了激烈的遭遇战。富令王、苏两团增援不力，结果徐苏两团长各率残部向上蔡北方退却了。富双英随即指挥王团在上蔡竭力支撑，并向军部告急。陈琛和刘伟两旅虽曾奉命驰援，但陈旅迟迟其行，刘旅也援助不力，以致使富旅一部竟被包围缴械了，并被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的一个师，以富为师长。开到武汉后不久，富即只身逃回了北京。在富被俘后，陈琛又将所部摆出一线长蛇阵，逐渐投入战斗，致被北伐军各个击破，几乎溃不成军。因此，第十一军被迫撤至郾陵以南布防，后被压迫又逐步撤退。经过这次战斗，第十一军所有野炮大部遗失。段茂琪、王德新均被俘，在押解途中段逃走时被击毙，王幸免逃回了东北军，从而影响了东北军的全面战局。徐英和苏锡祚由于擅自从上蔡一直退却到开封，军团部命令第十军军长王树常将徐、苏而二人押解北京后，经有关将领保释，免予处分。

军团部为了增援第十六、第七军，命令第十军军长王树常（原军长于珍因开封败退被免职他调）统率所部由开封向郾城进军，我旅留驻郑州为军团总预备队。后因漯河及逍遙镇一带的战况紧张，曾抽调我旅的王云汉团驰赴前线增援，归第十军直接指挥，迨撤退黄河北岸后，才恢复原建制。

有一天，张学良军团长偕同我和邹作华由郑州乘专车去许昌，表面为视察军队。到达许昌车站时，适赵恩臻军长带领参谋长杨正治赶来见张，他们在仓促之间，向张军团长说明陈琛的失职情况后就走了。不久，即见杨正治转来向张报告已将陈琛枪决

了，同时枪决的还有陈旅的团长甘宗逊。这时，我才知道这次许昌之行是为处理陈琛问题的，因为他不但驰援友军不力，而且有伙同甘宗逊阴谋投向国民革命军的企图，以致有此结果。陈的旅长职务即以杨正治继任。

自上蔡战争失利后，冯玉祥部也乘机东进进攻洛阳。驻守洛阳附近的第八军万福麟部骑兵，曾与冯部小有接触，并未发生剧战。第八军军部由洛阳退驻巩县不久，洛阳即被冯军占领了。

自第十一军撤至鄢陵南方以后，战况日趋恶劣。在漯河及郾城一带的第十六、第七军及杨正治旅等，也遭到张发奎和黄琪翔等部队的猛攻（何柱国旅曾参加这一战斗，他与黄是保定军校第六期同学）。虽经第十军继续增援，全力以赴，但因士气沮丧，节节败退；原来估计晋军不致发动进攻的情况也与事实相反，他们正在跃跃欲试中。因此，军团部即于5月末，发布了总退却令，并责成我旅在黄河南岸邙山一带占领收容阵地，掩护各友军安全撤退。在我旅撤出郑州时，军团部令工兵将郑州车站的水塔破坏，以阻北伐军的追击。随后，我旅即进入邙山阵地。

由于我方事前毫无撤退准备，黄河铁桥上均未另铺木板，火车虽可通过，但驴、马、大车都不能通行。这个铁桥是由比利时为兴建的，已超过保险期限，平时火车通行不能超过四、五辆。因此，在郑州车站常住一比国工程师实行监督，以免发生意外。但当我军撤退时，情况紧张，迫不及待，尽管该工程师一再警告，谁还能听他那一套呢？于是，满载军团部及其附属小部队的官兵、武器列车，有如长蛇阵，接连不断地首先通过了。军团部过河后，即退驻新乡。

第十军其他各旅；第十六、第七军各部队及第十一军赵恩臻部等，分别由黄河铁桥、黑岗口和东明等处渡过黄河，集结于邯郸、顺德及保定一带。第八军由汜水渡河后，奉命在温县集结，不久只留赵有光旅扼守黄河北岸，其余各部队也向后方撤退了。

军团部撤到了新乡，曾派工兵营长王某到旅部对我说：“俟各部队撤完时，即将黄河铁桥炸毁，以免被敌军利用，并派工兵一连由我指挥。”当各部队将要撤完时，张学良军团长召我到军团部，面令我旅、杨正治旅、王以哲的卫队旅及赵有光旅，坚守北岸黄河桥附近地带，以阻敌军北上，只要守住几个月，就有办法了。我问道：“这是攻势防御或是守势防御？如果采取攻势防御，可不放弃邙山阵地的天然桥头堡，这样，不但便于再度南进，且可避免敌前渡河的危险。”张答：“这是守势防御，那个阵地没有保留的必要。”

我回到旅部，据报我方部队已经全部安全撤到黄河北岸。我即率部渡河，终将黄河铁桥炸毁了两节。随后，即遵令执行任务，杨正治和王以哲的两旅在铁道以左布置队伍，我旅和赵有光旅在铁道以右亘温县之线占领阵地。每旅正面广达七八十里，防御力极为薄弱，是最易突破的。杨旅以右是我旅刘振远（原姜凌云团，他已离职）团及王宝田团，一直到温县附近衔接赵有光旅防线。这样长达三四百里防线中，只配备了4个旅的兵力，其防御力如何，可想而知了。我记得《孙子兵法》载有这样的话：“一处不备，一处薄弱，处处皆备，处处薄弱”（大意）；还有《围棋谱》中写道：“破荷叶包蛤蟆，包着嘴露着腿”，我们这个防线就是这样啊！

### 黄河北岸的局部战及再度总退却

1927年6月初（约在端午节前后），东北军已全部撤至黄河北岸，除留4旅兵力扼守黄河北岸之线已如上述外，其余各部队均撤到冀南邯郸至保定一带休整。到了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了陆海军大元帅职，将东北军各旅均改为师，以张声势；对于各将领则补授实官并奖给大绶宝光嘉禾章及文虎章等，以维系人心。师分甲乙二种：甲种师为三团制，师长为中将级；乙种

师为二团制，师长系少将级。我第四旅改为第十师，除原有步兵三团以外，增加了卫队、重迫击炮、骑兵、通信和担架各一连，直属于师部。

黄河北岸的防御重点在京汉铁路两侧，对黑岗口、黄河铁桥及温县对岸的巩县等渡口，严加戒备，多派步哨，以防万一。赵有光师的大部警戒面在温县，我师王宝田团警戒温县一小部分。在此长达数百里的防线中，各团间隔很远，对于警戒方面都不甚注意；同时，士兵每届换班时，必须徒步涉泛滥的水区，加以天气炎热，日久则腿肿，眼生病，影响健康，士气沮丧，因而团、营长多有要求换班者，但又无兵可换。就这样地防守了数月，终于在官兵长期的麻痹大意情况下，冯玉祥所部第十九师师长吉鸿昌率部突于1927年8月初的某一夜间，由巩县的黄沙峪渡口偷渡到黄河北岸，并将赵有光师某营长俘虏了。我获得王宝田这一报告后，即令他集结兵力驰援，并及时报告军部。军部便令赵师及王团分别撤至詹店车站，随即乘火车退到新乡附近后。军部发令全线开始总退却。我和团长们都感诧异，并认为少数国民军渡河，还可集结兵力击退，为什么匆匆退却呢？这时军团部已经由新乡撤至北京光明殿，第十军军部暂在新乡。我即驰赴军部，见到王树常和万福麟两军长，他们对我说：“已经接到军团部命令，深恐晋军由娘子关出击，威胁我军右侧背，且有截断退路的危险，因而及时全部撤到河北省全境。”又说：“奉军团部命令，将赵师防守不力的某团长枪决，你师的团长王宝田也在枪决之列。”我为王宝田请求减轻处分，并直接电请张学良军团长对王宝田从轻处理。旋奉张军团长电令，王宝田降级为中校团长，戴罪立功，以观后效，而赵师的某团长已被先期处决了。

这次黄河北岸的总退却，全军都是用铁路输送的，除了赵师的一营与国民军进行了激战遭受严重伤亡以外，其余各部队均缓缓撤走，既无追兵，也无战斗。我第十师及赵有光、王以哲、杨

正治三个师，以及韩光第师等，都撤至保定附近待命。这时，东北军已经全部撤出河南省境，从而结束了河南战役。

(1965年)

## 直鲁联军三将领天津反正片段

赵激生 \*

1926年，奉军攻占天津，南取山东。同时，张作霖入北京登上了“大元帅”的宝座（不称“总统”也不称“执政”）。沿津浦路南进的奉系军队，主要是张宗昌和褚玉璞。他们攻到江南。张作霖任命张宗昌为山东督办，任命褚玉璞为直隶（即现河北省）督办。称为“直鲁联军”。本来，号称“五省联军”的孙传芳是两面受敌的（北受攻于奉军，南受攻于北伐军）。陈调元等倒他的戈，孙传芳濒于失败，乃与奉系张作霖合作，但都被北伐军打回江北。1927年，张作霖的“讨赤军”战斗序列是：第一方面军孙传芳，沿津浦线反攻江北的蒋（介石）军。第二方面军张宗昌和第七方面军褚玉璞，简称“二、七方面军”（亦称“直鲁联军”），沿陇海路进攻河南的冯（玉祥）军。（另有三、四、五、六等方面军，这里从略。）但是，北伐军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的各集团军迅猛发展。1928年，奉军节节败退。5月，日本借口“保侨”，派军占领了济南。北军继续败退。日本又在天津增兵，准备再造成第二个济南。张、褚两督办全都退到了天津督战。

保定放弃了，天津人心动摇。大批日本军队借口“保侨”，以轻重武器在市内马路上游行着。张作霖在北伐军的压力下，在日本的武力外交纠缠下，即以所谓“金蝉脱壳”之法，给北京留下了一个旅的军队维持治安，放弃了这个文化古城。张于6月3日离京去沈，天津因此越发吃紧。达官贵人纷纷携款避入租界，

\* 作者系奉军督办无线电队人员。

作鸟兽散，车站附近以及大经路上挤满了退下来的军队，横躺竖卧或席地而坐，马匹车辆紊乱已极。

车站上的督办列车空空无人，只剩下我们无线电队不多的人。14岁的我，没有独立行动的能力，只得随车东去，到了唐山。

直隶军队因不愿退到关外去，而与北伐军议和，并宣布维持天津治安者，计有徐源泉军、张冠武军、孙殿英军。徐、张、孙等谏阻褚督办不可出关，以免得到不良结果。但褚忠于张大帅，乃遁入租界与张宗昌由海路同赴东北。这时，徐、张、孙三个军的兵力，在北伐军未开入天津之前的关键时刻，负起了维持治安之责，对消弭日本在我内战中，借口保侨再造成的第二个“济南事件”的企图起了一定的作用。

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传来之后，北伐军先头部队已推进到塘沽、芦台。我们随第四十军于世铭部由唐山东撤。不料到秦皇岛后即被友军于学忠部缴了械。

徐源泉和张冠武、孙殿英共三个军在天津维持治安，因而投入了国民革命军，被编为第六军团，驻在昌平、南口一带。对这一支庞大的兵力，蒋、阎各集团军都争着想编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又都不供应军费给养。所以，仅仅靠着本部控制的402号火车头及货运列车挣钱维持生活。全军团的官兵成了后娘的儿子，无衣无食，喊出了两句口号：“冻死迎风站，饿死把肚挺！”这期间，在孙殿英的驻地就发生了窃盗慈禧太后陵寝的事件。盗陵的替罪羊，孙殿英部的谭师长就被软禁在前圆恩寺本军团的驻平办事处内。

国家“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全国的陆军要缩编为60个师。第六军团奉令改编，除孙殿英的一个军改为混成旅外，其余两个军改为一个师——第四十八师，师长为徐源泉。

1929年，改编后孙部奉令南调津浦南段。孙殿英的混成旅是先头部队。这时，济南尚被日军占据着（日本还杀害了我国外交官蔡公时）。所以孙先到黄河以北的晏城下车，起早往西，在齐河渡过黄河，经长清等地绕至兗州再上火车南下。孙殿英由于窃盗慈禧陵墓案件，他的部下谭师长被正法，这次又把他的一个军缩为一个旅，自必有很大不满。于是，他就利用了日军未退出济南而北伐军的势力尚未到达胶济地区的这种特殊形势，把他的全部军队扯到胶东找刘珍年去了。

（1989年）

## 第八军政治工作片段

荀怀谦 \*

1926年八九月间，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八军占领汉阳、汉口后，军长唐生智升任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第四集团军第一方面军总指挥李品仙兼任第八军军长，他们为了加强该军政治工作，遂在汉口大智门查家墩举办了一个政治训练班，训练政治工作人员，当时招收约有100人左右，参加受训。这些人一部分是流落汉口的失业、失学青年，一部分是武汉分校（当时编为中央独立师）在九江解散后退下来走投无路的青年，我是其中的一个。

这个训练班由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兼班主任，第八军第二师师长吴尚、第三师师长李云杰等充任该班的教官。训练班用佛学作为训练材料的主要内容，授课时反复地讲解“色相俱空”、“不二法门”、“金绳觉路”等佛法，李品仙每个星期还到训练班来作一次“精神”讲话。他一再地向受训的学员讲：你们毕业后分发到各团营去当政治指导员，首先你们本身就要体会“四大皆空”的意义。在临阵的时候想到没有父母、没有妻室儿女、没有生命财产，才能勇敢善战，并进一步以此鼓励士气，他们才能冲锋陷阵，战胜敌人。当时第八军司令部所用的信笺上面，也印着“大慈大悲救人救世”八个大字。军队中灌输佛学的思想教育，在当时，第八军算是别具一格。

第一次北伐后，第八军政治工作只是虚有其名。该军中各级政治指导员，写个标语也要通过各级主管军官的批准，要向士兵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政治工作人员。

讲什么话，必须商得他们的同意，并限定在该军中只能讲习佛学佛语。派到团营去的政治工作人员，更是不受欢迎。当时一般称该军政治工作是“姨太太”式的工作，因此派到第八军去的团营政治指导员，对工作都感到很棘手，特别是怕戴上宣传“赤化”的红帽子。就这样不上两月，这些人员均相继离开了第八军，该军的政治工作，从此即被取消。

(1963年)

## 北伐中的松口之战见闻

丘一中

1926年秋，北伐军克复武汉，吴佩孚败溃。吴佩孚心中不甘，乃唆使孙传芳由福建向广东进扰，决定先行占领松口。因松口这地方北通福建武平，东趋永定，西向蕉岭，南下潮汕；西南则取道兴宁、五华沿东江直抵广州，故闽粤有事，松口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次吴、孙计划向广东进军，目的是想乘虚攻下广州，动摇北伐基地，这种企图是极其阴险狡猾的。

吴、孙计划已定，孙传芳乃命令福建军阀周荫人统率所有侵粤福建部队进驻永定，派出他们的第四方面军第三军军长刘俊，率领步兵一个旅，骑兵（没有马）一个团共5000余人（他们当时编制是足额以15人为一班的），另外还派周荫人的特务团、炮兵团、机关枪营、辎重营、工兵营，以及其他部队约10000多人，作为入粤的先遣队伍，确定于1926年农历九月一日占领松口。

这个第三军军长刘俊，是孙传芳的爱将，又是福建军阀周荫人的死党，骁勇善战，他带领的军队是精选的强兵悍将，且装备齐全，弹枪充足，是孙传芳、周荫人认为最能作战的部队。他们于8月底由永定向松口长驱直入。九月初一日，果然到达松口。

在九月初一以前，松口已有风闻“北古佬”（当时松口一带称呼这支军阀部队）将到，市面仍然非常安定。农民耕作采樵，商店开门营业，师生上课，街上有国民革命军政治人员宣传演讲，书写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漫画，并劝居民疏散，封锁河面，所有一切船只，均命令尽开南岸，集中后秘密开往梅江上游，或打穿船底沉在河里，仅剩下交通渡船，重要物资

均送往溪南（松口对岸村庄），原来守松口的北伐军（国民革命军）有一个师（第三师），下属第七、第八、第九三个团，八月底把第七、第八两个团调到韩江下游高陂（大埔县属），参加第一军（何应钦任军长）攻打永定，故松口只剩下一个第九团，九月初一以前也撤出松口，进驻溪南，防守由蓬辣滩至横山一条长约30华里的南岸阵地。蓬辣、界溪、溪南、圳头、潭头炉、大黄、横山各个渡口，均分兵把守，兵力非常单薄，但人民极其相信革命军（即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认为北伐军十分英勇，都是黄埔军校的学生军，从广州至湖北，一路势如破竹，打得吴佩孚抱头鼠窜，福建周荫人有什么本事，能与北伐军对抗？故此虽然北军（即北古佬军队）入粤，不怎么紧张。北军来松口之前，曾派谍报人员进行侦探，听人民反映溪南革命军九团，以为有九团之众，且刘俊亦听知湖北北伐军节节胜利，所向无敌，故心有惧怯，不敢轻进，每经过一个乡镇集市或险要地区或高山峻岭，必经过骑兵侦察后，才敢前进，故行动迟缓。九月初一凌晨，松口镇上忽闻枪声，居民以为北军已到，纷纷关门躲避，这原来是虚惊，因北伐军巡逻遇到另一巡逻队发生误会，打了一梭子弹，立刻平息。居民又恢复平静，但四乡已盛传北军纪律极差，到处抢劫、杀人，焚烧房屋等，因而开始有人搬家至溪南戚友处。北伐军政治工作做得极好，政工人员大力宣传打倒军阀，统一中国，拥护孙中山三民主义，建设新中国，号召人民积极支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等等。满街张贴标语，处处都响起“打倒列强”的歌声，许多群众义务探听北军情况，并紧急藏起粮食，商店停止营业，仅仅有一些小食物店尚在开市，大家议论北军仍在路上，将碰到革命军的截击，军民关系很好，对打败北军，极有信心。

初一下午，北军先头部队抵达松口，在距离松口五里的官坪乡设军司令部，接着大队部队继续到达。以一团兵驻守车田乡

(松口北面 10 多里地方)、一团则驻守官坪保护军司令部，其他各团营分驻于天后宫(松口镇东边)、下店、书院、马头岗等地，另一部分则入松口镇内埋伏于大街小巷。其他后继部队则在派下、小金、仙口、石子岭、洋坑等地。松口东、西、北各乡镇行人绝迹。

初一深夜，开始隔河互相炮击，革命军大炮并不轰击市中心区，而只打松口郊区北军驻地。北军因不明北伐军驻地，胡乱发炮，打倒圳头的竹林中及溪南的乡村中为多，北军有炮 10 多门，一直发炮不断，北伐军则轰北军炮位。北军大炮虽多，但技术很差，炮弹只落在田野竹林，无一命中。有时双方也打水龙机关枪，但并未有伤人。本来北军可以渡过梅江攻击北伐军，但他们怯于革命军力量，不明革命军虚实，不敢贸然过江。本来九月暮秋，河水很浅，可以徒步，但九月初一以前曾下大雨，梅江水涨，北军全无渡江工具，所有船只都被革命军收到南岸隐蔽或凿沉，烟水茫茫，无法过江。由初二到初四只是隔河炮击，双方毫无进展。初四日北军扬言渡河，但一天过去，毫无动静。初五，北军有一部分工兵开到市区不远的瓦窑岌、五里亭一带砍伐竹木，并强抢居民门板桁桷，准备搭浮桥，想在松口市东边鱼子坝渡江。由于溪南地势较高，革命军以机关枪，居高临下，尽力扫射。北军仰攻，非常不便，革命军除用水龙机关枪扫射以外，又用大炮轰击，搭桥无法完成。

是夜，驻溪南革命军第九团派兵一连，由潭头渡过河，向泗坑村、岗背北军某营袭击，目的是为了骚扰。入黑时，天高气清，新月如钩，秋风萧瑟，渡河的革命军，把藏在芦苇深处的船划了出来，在龙潭头炉蔡屋后面下船，轻轻划过对岸茶山坝上岸，隐蔽在碑子岌。那里松竹茂盛，没有一个行人，静悄悄的，只听到虫声唧唧，河水下滩的响声。他们在丛林里休息了两个钟头，到了 11 点，新月已下山，但仍星光灿烂，这一连革命军就

向泗坑村北军营部袭击，击毙了两个哨兵，枪声响后，北军即用机枪射击。由于恰当寒秋，一片田畴，尽是晚稻，给革命军以最好的掩蔽，革命军又有熟悉地形的向导，沿着泗坑村内的田间小道，直扑敌兵营部后门，机关枪如急雨般向北军射击，北兵四边逃窜。在黑暗的田间小径里，革命军把队伍分散，四处开枪，吓得北兵心惊胆战，死伤了30多人。驻在大塘唇的北军另一营，闻枪声炽密，急向岗背驰援，却给迂回到杉树坑的革命军所阻，双方打了半小时，革命军退出战场，转向长岗岌，而北军驰援的刚进入岗背，却被泗坑北营认为是敌军，互相射击，混战了两个小时，才发现误会停止。那时已将近凌晨4时，革命军仍然由原船渡潭头炉返营，未伤一兵一卒。

北军军部在官坪，闻西边枪声大作，急用电话询问，但电话线不知在什么时候已被切断，无法通话，驻该地的一个团急派通讯兵查线，等到把线接通，革命军已退，泗坑、岗背两营那时正在接火，费了很大劲，才停止射击。

当松口正在隔岸双方炮击的初二，何应钦率领一个师及两个团（即第十七师及第三师调至高陂的第七、第八团）由大埔直趋永定，攻打周荫人的司令部。双方先在城郊展开激战。周军不支，退入永定城内，革命军奋勇杀敌，共经过一日一夜，至初四，永定城给革命军打破了，打死打伤周军极众，缴枪数千枝，大炮五六门，周荫人只带卫队数十人逃走。革命军另外派兵一团，截击圩下坝来援之敌陈云峰部，俘获很多。

永定已下，革命军即日回师增援松口。先头部队于初六早抵达桃皮坑，立即向被北军占领的车田、大布攻击，驻溪南的革命军一个团也由横山过河，革命军后继部队于继续开进，立即展开大战。革命军分两路进攻，左路第十七师由桃皮坑攻车田、大布，右路为第三师（三个团）由派下攻仙口。左路首先开火（因该师为先头部队），右路继至，向北军发动钳形攻势。步枪、大

炮、水龙机关枪、手榴弹如冰雹、雷雨，硝烟蔽天，双方吹着冲锋号，不时还展开白刃战。至初七晨，双方战斗更烈，因初六下午，两军争占桃皮坑与车田村交界的大岌顶。革命军几次占据该山顶，却又被迫退下，接着又再反攻占领。反复争夺至第五次，至初七晨，革命军终于占了大岌顶，控制了车田桃皮坑的战线主动权。北军失去大岌顶，退守车田、大布的界山。革命军又再占领界山，架大炮于该山顶，向车田、大布的北军轰击。同时在派下的革命军又进攻仙口，由小金抄击车田村之背。北军的高地尽失，抵抗不住，仓惶逃出车田，时在是日上午 8 时左右。

在松口的东北车田、仙口激战之时，松口西边枪声又起，因溪南第九团是在横山渡河后分西路进攻，一路直攻胡子顶，一路由车村入梅教，以截击北军之后。这时北军东、西、北三面受敌，在下店、书院、马头岗的北军，也仓惶向北撤退，但在官坪、洋坑、马山顶的北军还是顽强抵抗。国民军东路由车田攻入官坪，直逼北军军司令部，北路由仙口攻入洋坑。西路则在胡子顶、五谷亭山顶用机关枪向马山射击。北军支持到初七上午 11 时左右，全线动摇，北军司令部被包围，与各师各团的联系中断，至 12 时各师纷纷向栋子脑溃退。他们企图向龙牙（登文）司前逃返福建。国民军奋勇追杀，军号声、枪炮声、喊杀声震动大地。这时在逃亡中的北军军长刘俊中弹身亡（另一说为自杀）。北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逃走者约有 2000 多名。原驻松口市内的北军约有三四百名，也向大塘唇、岗背、泗坑逃走，被五谷亭山顶的国民军发现，立即对他们进行包围，在马山下、大塘唇、谢屋大路上被消灭了一部，另一部分窜至泗坑、长岗岌，利用田崁、棺材窿和坟地护身，拼命向国民军射击。国民军呼喊他们投降，他们不理，继续射击，国民军伤亡了 10 多人，乃决定冲上去，用一个连的兵力，向他们展开肉搏战，终于把 300 人左右的北军杀得尸横遍野，存下三数十人才弃枪举手投降，国民军

也伤亡了 50 多人，北军全数被消灭了。

由栋子脑逃至龙牙到上杭的北军残部 2000 多人，复被沿途国民军（曹、林二个师）截击，未到上杭已经伤亡被俘殆尽，周荫人部队于是全军覆没。

这次松口之战对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打击极大，粉碎了他们袭粤的企图，把其精锐部队消灭殆尽。是役毙北军军长刘俊 1 名，团长王其志 1 名，营长蔡兴邦、宋恒宾、张宝华 3 名，打死连排长不计其数。俘获骑兵团长李宝珩 1 名，军医处长 1 名，营长魏奎武、高金波、许秀林 3 名，俘虏排、连长及各级副官、参谋数十名。死伤北军士兵 2000 多名，俘 3000 多名，缴获大炮 10 多尊（门），水龙机枪一大批，长短枪 3000 多枝，子弹炮弹及其他军需品无数。北军败走时，沿途丢弃枪支、子弹、银元都不少，其银元用草织成的袋子装着，每袋 50 个，时在路旁发现。笔者当时年幼，战后过了几个月到石子岭、小金、大布等地扫墓，草叶中拾获的子弹或弹壳很多，因家长怕惹事，不准带回家中，都丢在野外作玩具。有不少人还拾获炮弹或银元包、衣被等。

大战过后，死尸堆积。革命军也牺牲了不少人，群众对革命军有感情，凡发现革命军尸体，即用树枝掩盖，报告到革命军营地，立刻就有人来收，有的由集益善堂买棺埋葬。革命军也打扫战场、掩埋。凡属官佐都有坟墓，记载其姓名职务，士兵有姓名可查的，也为之立碑书上姓名，但北军死尸极多，除官阶较高的北军将领，革命军代为礼葬，亦有碑石写上姓名职务，但士兵尸体一时收埋不及。集益善堂原是松口民间慈善组织，平时施放穷人棺材，打捞江河浮尸，发药赈粥等，经费靠捐助的，不怎么充足，大战以后，北军与革命军死亡太多，仅棺材一项，就使该善堂捐项用光。据说当时有人将此情况报告革命军，周恩来同志曾手令通知各军、师，将这项支出交回善堂（按：原文如此）。

据松口父老们回忆：当年的民国革命军被称为“学生军”，这些军队是有纪律、有文化的革命队伍，不论长官、士兵，对人民都亲切和气，不骂人打人，真是“秋毫无犯”。作战时，英勇作战，有不怕牺牲的精神。当在长岗岌肉搏战以后，北军在被包围中，革命军原要这一批部队投降，喊话叫他们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可以优待。但他们不听，继续开枪，出来喊话的革命军却被北军开枪打死，出来喊话的前后共四五批（每批两人或三人），最后才决定白刃肉搏，用刺杀术去消灭这批敌人的，但当北军不再抵抗，放下武器时，则不加任何伤害。还听说革命军中不少共产党员，他们很多是政工人员或下级连排长，总是冲锋陷阵，勇往直前，因而壮烈牺牲的不少，留给人们以深刻的印象。

大战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曾在松口东边的鱼子坝大广场举行祝捷大会。当时该军旗帜飘扬，戈甲鲜明，歌声四起，万人空巷参加这次盛会。当时北伐军能征善战，纪律严明，军民密切合作的印象，到今天老一辈人还是津津乐道的。

但是，周荫人部军纪极坏，到处抢劫、行凶、杀人放火，他们很怕革命军，由永定到达松口途中，每逢较为险阻的山川都必须派骑兵搜索以后才敢前进。驻地附近，必须把当地居民赶走，对于学校师生极不放心，往往以革命军侦探罪名，无故处死。在松口无辜而被杀的民众共有 8 名，多是知识分子。他们的工兵到松口瓦窑岌大砍竹木，准备渡河时，当地士绅徐某曾写一个呈文，请求该军军长刘俊约束部下，勿砍伐其祖山林木，即遭该军扣押，几乎丧命。这些部队驻到村庄，强迫居民送菜、送米、送柴，每天早晨须按时送到，如稍为迟来，则对送物的人施加鞭打。徐立生先生是年 18 岁，也曾被派去送菜。他每次挑菜去时，就怕被杀，恐慌到极点。有些人经过他们哨岗，不谨慎多看他们一下，立即开枪射击。军长刘俊刚到松口的第二天早晨立即拘捕松口商会会长梁某，勒令商人筹白银 10 万元，梁某一时无法应

付，卒被押在军部不得出来。到了战事紧张时，他才自己逃出来。至于拉夫、拆屋等，都是司空见惯。故此，人心憎恨，当他们败退时，派下、仙口、小金等地农民都纷纷起来，拦截这些残兵败将，或故意指引他们到革命军防地去，让革命军消灭他们。他们处处受敌，无可容身，终于全军覆没。

### 作者附记：

1926年的松口之战，消灭了福建军阀周荫人部，使吴佩孚、孙传芳企图入粤以捣国民革命军（北伐军）后方广州的阴谋粉碎。这是一次较大的战斗，意义也很重大。但文史资料提供这项史料的，似乎还不够，笔者今年春节返故乡松口，与一些老辈座谈，认为这项史料有提供的必要，于是访问老一辈乡贤徐立生先生等，并得到松口中学副校长陈彬宗同志的积极帮助支持，搜集当时有关的记录如《松声》（松口公学校刊）等文献，再加上本人的回忆写成此文。其中不足之处，尚未找到亲历这场战役的军事负责人，只是提供各人的亲见记忆。由于年代久远，双方各级军事负责人姓名、作战前的部署等等，战争进行中的指挥命令具体细节，都未能调查到。但作战的情况，打死、俘虏的北军头子都记录下来了。也许全文有些谬误之处，尚望知其事者补充、订正。

（1981年）

## 扫帚战略和口袋战术

李 培 基 \*

1927年9月中旬，阎锡山密招高级将官会议，决计投向北伐革命军出兵讨伐奉张（奉系军阀张作霖），以晋绥军进攻冀察两省。此时张作霖为大元帅，居北京，故东北军大部分兵力驻扎石家庄、北京、天津、保定一带。晋绥军旋出其不意，一鼓击败其主力，迫其退出关外。乃分兵为数路，各有奇正，互为援应，以正太路线为一路，阎锡山自行统帅，出娘子关进石家庄、正定，并分兵经五台出龙泉关截断保定、石家庄间的路线。以京绥路线为一路，由商震为总指挥，经丰镇大同出柴沟堡，进攻张家口。复以郑泽生骑兵一军由绥远的集宁、兴和两县经张北、沽源入热河趋承德，以进扰冀东，威胁京奉路线，阻敌归路。又以傅作义师由平型关经广灵、蔚县出紫荆关，至涿州截击京汉路线。以李服膺师由阳原经花稍营，出门头沟，直捣北京。此计划决行后，当时军中谓之扫帚战略。其意义因由娘子关起，沿太行山北至京绥远路线复东抵热河，曲折2000余里，宛然如扫帚扫荡，可谓善于讽喻，实际是一种威吓战略。在当时的情形，阎锡山于同年4月间宣布信服三民主义，并在6月间就任国民革命北伐军总司令，一俟国民联军（冯军）进至郑州，即行出兵，至是情况紧急，用迅速突击的办法比较易于奏功。

晋绥军已按照计划于9月18日分批出动，阎即通电就国民革命军北伐总司令，自将兵出娘子关，进攻石家庄。奉军军长汲金纯即行全军北退。革命军占据石家庄，沿京汉路线北进，节节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阎锡山部师长。

胜利。进至于望都以南，发生大战。阎总司令进至东长寿督战，军事进展颇为顺利。北路军进至柴沟堡、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撤兵南退，北路革命军遂即占领张家口。又南进至下花园，与敌军发生大战，情况异常激烈，鏖战四昼夜。按一般战况，敌军已陷不利，未料京汉线方面，敌军以戢翼翘一军由河间、安国进攻定县。石家庄至望都革命军作战联络线被敌切断，前线作战业陷于腹背受敌，且东长寿附近已经发现敌人。阎总司令见此不利的战况，乃急速退回石家庄，转入娘子关。时北伐军尚留在武汉，西北冯军在河南西部，均未能及时北进。阎军兵力薄弱，以致战事失利。遂命令各军分路西退，固守太行山各关口。令京绥线作战军即由下花园撤退，至雁门及平型关一带山地择要固守，放弃绥远、大同。商总司令奉令后，即行决定撤兵的办法，由李培基师长以步兵两团（缺一营）为主力的混合支队，在柴沟堡附近，构筑阵地。掩护本军向大同、雁门撤退，并沿京绥路逐步掩护，俟本军主力退过大同后，再向雁门撤退。又在桑乾河以西与作战军队另为一路，经阳原向平型关退却。至10月初旬，各军皆到达雁门、宁武关、平型关、胡峪口，大小石口等处。沿沟注山线，布置防御阵地，东接太行，西抵河曲，长有千余里，以晋绥的兵力，实难为连续的防御阵地，必须择要设防，使无疏虞。故当时又有布袋战术，虎口阵地的配备。因令平型关的守军西退繁峙县，筑阵地于城东，阵地左翼沿北山与东北高地铁角岭衔接。右翼则沿南山连接于东南五台山北麓。盖当地形势，南北皆山，中为谷地，宽约六七里，敌如由谷地向西进攻南北两山，得由侧面射击包围，用意甚为巧妙。以故军中有敌若来钻布袋的传说。予友刘绍庭曾以诗记之，载其《仓笺诗草》。由10月中旬起，敌军分路进攻。在京汉路线方面为三、四方面军，军团长为张学良；在雁北方面，总司令为张作相，以步骑兵数万，日夜进攻，未能得利，其间曾发生过数次激烈战斗，亦未攻破阵地。至1928年3

月间，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于5月间始行出击，与第二集团军于京汉路线会师进攻北京。6月2日，张作霖通电出关。8日，革命军入北京，北伐战役至此已告结束。

此次出兵失败，虽由于戢翼翘军进攻定县，实际是误信戢军可以参加革命。盖在出兵之前，戢军长曾派其亲戚尹符一到太原与阎联络，如山西出兵时，他可以参加革命军。殆望都大战发生，已据情报，知戢军在河间附近，但事先已经说好，纵不能立即参加革命，绝不进攻。以故未作适当的防备，乃至于失算。因其事为退军的关键，故附记于此。

(1959年)

## 对大革命时期中央独立师的回忆

蓝香山 \*

### 夏斗寅叛乱

1927年夏，武汉革命政府主力军如唐生智、张发奎等部为打倒奉系军阀，已开往河南继续进行北伐，武汉留守部队不多，反动派认为武汉空虚，有机可乘。而武汉又为水陆交通枢纽，物资集散中心，不仅政略上、战略上位居重要，且是当时革命政府的首都，为反动派所觊觎，特别是自蒋介石于4月12日叛变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已动摇，大地主、买办阶级、帝国主义同蒋介石相呼应，积极反动，掀起反共高潮。因此四川军阀杨森乘时蠢动，率领双枪兵（步枪烟枪）号称八师，顺流东下，梦想夺取武汉。杨森本人先率领一个步兵团突入宜昌。当时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夏斗寅部正驻宜昌，其先头部队散驻在兴山、秭归一带。他见杨森大举侵鄂，唯恐被鲸吞，立即退驻沙市。一面集结兵力，一面召集主要干部如旅长万耀煌、张森，团长刘绳武、余式谷，代参谋长叶蓬，沙市征收局长蓝文蔚等举行会议。夏斗寅原是投机军阀，无丝毫革命意识，正想乘时异动，邀功取宠，摄取特权，扩充个人实力，同时害怕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编并其部队，个人地位难保，不愿靠拢武汉革命政府，倾向蒋介石。该部万耀煌的态度开始模棱，由于其兄万玉拂（封建士绅）怂恿，终于反共。其他干部革命与不革命均无所谓。唯叶蓬、蓝文蔚反共最力，在会议上发言最多，正中夏斗寅的心坎。因此，

\* 作者系武汉革命政府中央独立师党代表。

坚决向武汉进攻。夏斗寅一方面致电武汉革命政府佯为求援，使对他放松戒备。一方面派蓝文蔚为代表到宜昌向杨森投降，愿作前驱同杨共举反攻旗帜。夏部 5 月 13 日由沙市乘船向武汉进发，15 日到达嘉鱼县。以上是当时夏斗寅的参谋长蓝文蔚（系家叔）亲口对我说的。武汉革命政府得知夏斗寅叛变情况，立即动员起来。同时湖北省政府派进步人士任建若，也可说是孔庚个人的代表到嘉鱼说服夏斗寅归顺，反被枪决了。由于杨、夏同时沿江南北进犯，武汉革命政府为加强力量应敌，特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编为中央独立师，协助叶挺将军平乱。

### 中央独立师的编成

5 月 16 日，武汉分校校长邓演达召集大队长以上干部会议，由校务委员恽代英主持，当时政治大队第一队队长徐向前也参加了会议。恽代英宣布夏斗寅叛变，本校有保卫武汉的重责，奉命编为中央独立师，以教育长侯连瀛任师长，训练部主任杨澍松任副校长，教官宗汉英任参谋长，本人任党代表。第一团以在武汉新招入学生第六期政治一、二、三大队编成，训练部副主任蓝腾蛟（作者当时姓名）任团长。团部直属队配有侦探连、重机关枪连、通讯队、辎重队、宣传队（由女生编成）。此团学生战斗技术还肤浅，特别是实弹射击未曾演习，他们都是高中、大学出身，文弱气习未除掉，体力不够健强，所恃的是中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骨干带头，有公而忘我的精神和一往直前的锐气。第二团以学兵团改编的步兵、炮兵、工兵三个大队编成，炮兵科长史文桂任团长，此团战斗技术较熟，体力较强，但缺乏政治挂帅。第三团以由黄埔开来的政治、炮兵、工兵三个大队编成，政治大队长张鸿儒任团长。此团军事和政治训练较有基础，是一支劲旅。恽代英勉励全体干部应坚定革命立场，勇敢杀敌，保卫武汉，当天就须行动。如有迟疑或动摇以军法从事。加强斗志，约束军

心。我对此番警告铭记在心，不敢稍有违抗。中央独立师团长以上干部纯系旧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称邓演达系，是以邓个人为中心团结一致的，并未成为人民的武装。邓演达平时对学生演讲，坚决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他虽坚决反对蒋介石，与共产党合作，但也具有政治野心，并未真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是想别树一帜的。因此，他潜在着革命摇摆性。我受任后思想上有顾虑，由于时间匆促，当日成立，当晚就须出发，学生缺乏战争经验，能否勇敢歼击叛逆，尚无把握。而团部主要干部一时难以选齐，最重要的助手是副团长。是日，我在家午餐，适辛亥革命同事商楚珩来访，我敬服他在辛亥、癸丑两役作战勇敢，特请他任副团长，他当面应允。黄昏时，他又来家将我唤在门外黑暗处细声说：“四方打来了怎么办？”我见他畏缩，不似 15 年前那样英武，对他说：“你可不去，我因任务在身，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是毫无回顾的。”由于我参加过几次军阀内战，视上战场为平常事，毫无惊慌，且头一次带学生作战，个人风头主义浓厚，很高兴地准备出发。但对这一仗是为人民革命而战，是为邓演达个人而战，当时是认识糊涂的。

### 中央独立师在叶挺将军指挥下平乱的概况

家叔蓝文蔚说，他定作战计划主张从距武昌 60 华里处金口登陆，强袭武昌。他去宜昌后，万耀煌、叶蓬认为登陆点太近，一旦企图暴露，有遭受歼灭之虞。他们改从嘉鱼登陆，以试探式的蠕动偷袭武昌。

邓演达当时对敌情的判断，认为杨森部队虽夸张称八个师，实际每师枪支不到 2000 枝，战斗力薄弱，大烟瘾过足后，还可在战场活动两三小时，烟瘾发作后，涣散疲沓如乌合之众是不堪一击的。夏斗寅部两旅共 4 个团，第一旅旅长万耀煌辖刘绳武、潘祖信两团，第二旅旅长张森辖余式谷、卢道生两团，每团枪支

不到1000枝，缺乏重武器，战斗力也是很脆弱的，更不堪一击。因此，对击溃夏斗寅、杨森，保卫大武汉，有充分的信心，对革命前途是乐观的。当时武汉革命政府已命国民革命军第二军鲁涤平部驰赴仙桃镇，近击杨森。另命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武昌卫戍司令叶挺为前敌指挥，指挥第二十四师和中央独立师迎击夏斗寅。

### 纸坊之役

中央独立师以蓝腾蛟团追随叶挺驰赴前线，以史文桂团巩固武昌，以张鸿儒团一个营由徐向前率领驰往金口警戒侧翼，其余为预备队，待命行动。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及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在敌情紧急中于5月16日夜由叶挺将军率领自武昌车站乘车至纸坊车站集结。我和叶将军在保定同学平时熟识，在患难中相见，更加亲密，而叶将军在北伐战争中对武昌攻城一役卓著战功是一员勇将，精神上感到有所恃而无恐。17日拂晓，夏斗寅前卫刘绳武团附山炮两门行抵纸坊，探知革命军有准备，匆忙地占领阵地，先发制人，摆开枪炮火阻止革命军前进。当时叶将军告我：“作战不比在学校演习按部就班，必须灵活迅速勇敢歼敌。”叶将军命我团沿铁路线实行中央突破，命二十四团从敌左翼包围，他自己率领一个团在中央后督战。全体战士，一鼓作气，冒着敌人猛烈地枪炮火步步跃进，相峙仅两小时即突破敌阵，占领敌炮兵阵地，获山炮两门，俘虏敌兵一排，敌军不支向土地堂溃退。在战斗激烈时间，叶将军手令“限时夺取敌阵地，如有迟疑以军法从事。”我当时感到惊异，叶挺在学校时沉静温和如未出阁的闺秀，为何今天这样厉害呢？很想不通。今天才理解到在革命战线人与人的关系不是无原则的一团和气，一切是从集体利益出发，公谊私情是有原则的划清界限，我当时畏惧叶挺严肃的观念，今天转变为敬服。

## 土地堂之役

革命军乘胜直追约近正午，敌旅长万耀煌率领潘祖信团及收容刘绳武团在土地堂占领阵地，阻止革命军前进，并以重机关枪火力集中在铁道线上。叶挺命独立师第一团和二十四师之一团从正面展开，驱逐该敌，以二十四师另一个团压迫敌之左翼，相峙两小时后正面已前进到敌机关枪阵地前。侧翼已迫近铁道线，万耀煌在惶恐中脱逃，于是敌军全线动摇，溃不成军，革命军占领土地堂。革命军乘胜猛追，沿途俘敌 500 余人，将达到贺胜桥时天近黄昏，奉命停止追击。当日自拂晓至黄昏部队未停留行动，各团火食担子追不上，战士们虽一天未进餐，精神仍饱满，意气很奋发。叶挺甘愿与战士们同甘苦，虽有餐不进，可见运动战中不携带干粮是要挨饿的，未经战阵之学生和无直接战斗经验的我，能一再胜敌，完成任务是我初料不及的。

5月17日晚，中央委员高汝霖和副师长杨澍松来土地堂慰问，并传达高委员为第一团党代表。我感到高委员厚重诚恳，内心里欢迎。当晚高委员、叶将军、杨副师长协议次日任务，第二十四师沿咸宁汀泗桥向崇阳、通城追击夏斗寅。中央独立师第一团从蒲圻转向嘉鱼协助鲁涤平军堵击杨森。我对脱离英明勇敢叶挺之指挥，单独负一方面任务，深虞不胜，精神上更加兢兢业业。

## 协助友军几点活动

中央独立师第一团到达嘉鱼后，侦知川军王文俊第八师主力驻新堤有一营驻宝塔州，纪律很坏，人民怨恨。此时副师长杨澍松来嘉鱼帮同指挥，我们派侦探连驻在江南岸陆溪口每夜隔江对北岸宝塔州敌进行扰乱射击，敌军如伏鼠潜伺，不敢还击一枪，一星期后即撤回新堤，使我们对敌更加轻视。6月初旬，独立师

第一团渡江从龙口向新堤攻击前进，不料敌畏我军新锐，避免决战，已撤往峰口。我当时贪功心切，同杨澍松商议认为敌军无战斗力，我军月来锻炼，战斗技能和体力有很大的增强，具有战斗力，应抓紧时机一举歼灭该敌，给友军作有力的支援。杨同意我的主张，于是人马轻装，行李装载在木船上沿河堤前进。6月7日，以强行军的速度一日约行百华里，黄昏前已达到峰口附近。由于沿途关防严密，路上断绝行人，出敌不意，有利于夜袭。当晚八时许，距峰口3华里处展开前进，第一营沿大堤直冲峰口街市，其他两营在大堤以右平地开进，向峰口后街包围。由于夜袭时间选择过早，学生对夜间战斗动作生疏，又不了解当地地形，且在极黑暗中不辨东西，过早开始射击，致打草惊蛇，垂成之功竟亏于一篑。此时敌人正摆开烟灯横躺直卧，吞云吐雾，突闻枪声，如神兵骤至，只得卷着烟枪烟灯落荒而逃。我们9时许进入峰口，仅缴获步枪500余枝，载在船上大米千仓（峰口是杨森军重要补给站）大烟土100余担。敌师长王文佛率所部向府场逃窜。次日，与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在沔阳彭家场通海口一带对峙的杨森军，闻中央独立师已占领峰口，黑夜之间，不知人数多少，深感到腹背已被革命军楔入，全军有覆没之虞，因而全线动摇，向荆沙撤退。如果当日杨森得悉中央独立师兵力单薄，从三面反扑，我军是有危险的。自此，第一团进驻通海口集结待命。此时武汉政治环境复杂，由于我平日不重视政治学习，对周围事物变化完全处在梦中，由此可知我精神的被动，看不出有革命的气氛。

### 中央独立师在白色恐怖中消失

夏斗寅自被击溃后，由崇阳通山至黄石市渡江窜往广济黄梅，由于唐生智部何键的压迫，遂退至安庆转往芜湖。唐部刘兴继续压迫，夏部又从采石矶渡江经和县含山窜到蚌埠才得到喘

息。这是家叔蓝文蔚亲口对我说的。

7月初旬，叶挺率二十四师回驻武昌，中央独立师第一团由沔阳也回驻武昌。学习回校时不见开会对这一战役作总结报告，我很怀疑，为何这样冷淡呢？未曾意识到革命内部已起分化，革命已转入低潮时期了。中央独立师复员后，第三团改为第一团，第一团改为第二团，原第二团的学生多数在白色恐怖中逃亡，解散了。第五期政治、炮兵、工兵学生已届毕业期，举行典礼后即出校，第一团也撤销了。当时革命局势日趋于混乱，在河南担任北伐部队唐生智、张发奎等部已开回武汉，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正酝酿政变，他们倾向许克祥在湖南的行动。唐生智正考虑投机。由于何键反共最力，促成唐生智走向反革命。7月15日，汪精卫集团公然宣布反共，逮捕革命党人，屠杀革命志士。大革命遭受顿挫。此时何键企图以武力包围武汉分校，一网打尽红色战士，并以机关枪威胁黄陂路邓演达的住宅。邓演达、恽代英为避免意外的袭击，特将武汉分校学生即第二团以野营演习为名移驻武昌郊外卓刀泉。时值盛暑，学生在正午演习中有些中暑死亡。邓演达此时尚坚持革命，只要张发奎合作，还可保住武昌革命根据地。由于张发奎追随汪精卫的意志，也走向反革命，邓感到孤掌难鸣又惧怕何键的危害，就离开武汉了。同学们在卓刀泉接到他的留别书相对失色，对革命也失去信心了。如果邓演达真诚接受共产党领导，同叶挺将军合作，掌握这批学生继续奋斗，仍不失为革命的一部分力量。

恽代英同志看到何键已放弃武装包围学校的企图，才命学生回到武昌两湖书院待命。武汉分校保定系军人是以邓演达为团结中心，邓离开后，教育长侯连瀛赴南京投严立三，被蒋介石逮捕。杨澍松逃往东北投入奉系军阀。史文桂逃往南京投张治中，张鸿儒回老家。此时湖北省政府任我为警卫团第一团团长，我也乘时离开学校，满脸盖上灰色。一方面服从湖北省政府命令，一

方面将全团干部撤换，尽用武汉分校的干部和学生，内有共产党员张应难（曾任过洪湖赤卫军师长）、蔡承波等。有一天，唐生智在南湖检阅第八军，我往参观，唐问我：“你团有多少共产党员？”我回答一个也没有，唐始默然。尔后，武汉分校在恽代英同志领导下，由朱勉方（同邓在保定同学，留德学生）率领追随叶挺参加南昌起义，随又转到粤东参加潮汕革命，参加广州张黄事变。这一团 2000 多学生有被反动派屠杀的，有为革命流血牺牲的，有因病死亡的，有投靠反动派的，也有转入地下继续进行革命的。

（1961 年）

## 我是怎样策动夏斗寅叛乱的

蓝文蔚 \*

我与夏斗寅交往多年，颇有感情。特别是 1927 年 5 月，夏斗寅在沙市称兵叛乱，我更是夏斗寅的叛乱活动的主要策划者。现在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如下的自白。

1926 年 10 月间，夏斗寅充当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奉命率所部进驻宜昌、巴东、秭归一带，防阻川军南下。这时刘文岛向唐生智建议以万耀煌代夏斗寅师长职务，唐生智亦疑夏与赵恒惕的关系深，恐不易控制，乃电召夏来武汉述职，欲乘机将夏扣留。不料事为孔庚所知，孔大力为夏缓颊，夏始得仍回宜昌。从此，夏对唐生智有戒心，乃通过蒋作宾与蒋介石发生直接关系。

1927 年 5 月，四川杨森探知夏斗寅部在鄂西兵力分散，疏于防范，宜昌仅驻有少数部队，乃以一师之众乘火轮数艘秘密通过巴东、秭归，突袭宜昌。夏部此时醉心于经营鸦片，川军在宜昌登陆时，夏部毫无抵抗即放弃宜昌，夏斗寅仓惶逃退沙市。当时武汉政府予夏以镇守宜昌重镇的任务，今不战而弃守，夏深恐追究其责任，而杨森部又随后追击，夏的部队又未能收集。夏在此时感到情势非常危急，当时我任沙市征收分局局长，夏逃抵沙市时，我以老朋友的身份出面招待他，意在助夏军费，使其军队不致抢掠地方。夏与我私谈时将其处境告我，并询问我如何解脱此困局？我建议夏一面火速收集部队，一面火速电武汉政府表示死守沙市，请唐速派援军。适其时宁汉意见分歧，蒋介石得知夏

\* 作者是夏斗寅的朋友，时任沙市征收分局局长。

处境困难，乃通过蒋作宾电夏斗寅一致反共。夏将这情况告我，并探询我的态度。我向夏表示对共产党不满。夏亦表示愿遵照蒋介石的意旨行事。但夏此时尚摸不清他下面主要将领的政治态度，希望我出面替他向万耀煌等探询一下，因我与万耀煌、张森、余式毅、叶蓬等都同为相好。约好由夏在沙市召开一个紧急军事会议，让我也参加。在会上，我首先提出反共的意见。我这一炮放出后，马上得到一致响应。接着我表示，要钱由我负责。万耀煌等一致说，要干你也得下水，提议公举我为参谋长，立即拟制反共计划。一面再电唐生智求援，以免唐生智怀疑，并可抽出武汉驻军，削弱防御能力；一面电杨森停止进攻，共同反共；一面电蒋介石约好以我师占领武昌为信号，请何键、刘佐龙部在襄河沿岸和鄂东开始行动。计划将夏师全部集中沙市后，速同眷属一起，坐大小轮船、木船，顺长江涨水之势，偷越城陵矶（此时城陵矶有唐军吴尚师一部驻守），在金口登陆急袭武昌。计划拟订后，唐生智果然答应以吴尚师增援沙市。杨森对夏部一致反共尚不放心。夏这时派我亲往宜昌说服杨森，杨森表示立即停止对沙市的军事行动，并相约杨军直趋仙桃镇，另以一部俟夏师离沙市后占领沙市与吴尚师对峙。我认为双方谈得很好，但杨森对夏仍不放心，借口我对湖北情况熟悉，留我在杨森的司令部内暂时协助他。我体会到杨的用意后，马上答应留下，并电告夏斗寅按计划立即实施。果然夏师马上开始行动了，一直到开船后才向官兵公开偷袭武昌的企图。但夏中途改变计划，于行抵嘉鱼时命全师登陆开始行动。为了表示决心，将唐生智、邓演达所派的该师党代表任剑若枪杀。（按：任剑若是武汉政府已得知夏斗寅的暴动后，遴派他前往劝阻夏斗寅、万耀煌等勿自绝于武汉政府，应悬崖勒马。因任与夏、万等有同乡、同学之谊，而唐生智得知夏放弃宜昌后，恐夏不可靠，乃由邓演达指派任剑若为夏师党代表，希望由任劝夏站稳革命立场，因任是张笃伦推荐的，必能与

夏相处得好。夏师在嘉鱼登陆时，恰好任由武汉去沙市的专轮抵达嘉鱼，被夏部发觉而遭杀害。)

夏师在嘉鱼登陆喊出反共口号事，立即为武汉政府得知，马上就组织了以学生军为骨干的讨夏部队。夏部广大官兵事先没有反共的准备，在行动上绕道200多里迟滞了进军。我原计划携带眷属突击武昌，意在免除官佐顾虑，示以必死之心。现在改在嘉鱼登陆，步行数百里，不仅不能收偷袭之效，而且眷属反成了绊脚石。所以夏部在纸坊一与革命部队遭遇即被击溃。夏认为在嘉鱼登陆活动地区大，进攻不成还可以向鄂东撤退，比在金口登陆安全。夏部在战败后采取了向蒋介石主力靠拢的方针，由武昌南绕道石灰窑渡江北走，唐生智派刘兴部追击夏部。（编者按：唐部三十六军刘兴部此时全军在河南与奉军作战，追击夏的部队为叶挺的中央独立师。）当时蒋作宾在安徽，指示夏向安庆退。

当夏部离开沙市后，杨森与我即到达沙市，杨森部并已进占了仙桃镇。夏在纸坊失败的消息传出后，杨森即放弃沙市退守宜昌。何键、刘佐龙部当然没有配合行动了。此时吴尚师乘杨森退出沙市，就占领了沙市。我在沙市与杨森分手乘轮经汉到安庆与夏会合，我们又进行了会商，主张夏斗寅赴南京见蒋介石，向蒋表示忠诚。蒋介石表示很满意，发表夏为新编第十军军长，令夏部开采石矶整训。从此，夏斗寅部成为蒋介石反共的基本反动武装之一。

（1965年）

## 二次北伐中三十七军的政治工作

向 之

—

第二次北伐与第一次北伐有本质的区别。第一次是国共合作，由广东出发，政治工作主要由共产党员来做，所以组织工作、动员工作、宣传工作均做得有声有色。第二次北伐是在1928年春，蒋介石1927年“四·一二”背叛革命之后，他又与国民党内的桂系及西山会议派发生了矛盾冲突。1927年8月，在李宗仁、居正、邹鲁、谢持、张继、傅汝霖等逼迫下，蒋介石宣告下野，旋到日本去一个短时期。由于西山会议派掌握不住武装，桂系与湘、冯等系又互相矛盾，使北洋军阀有南犯趋势，于是各方面又要求蒋介石上台。1928年初蒋介石又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1928年2月间，国民革命军整编为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分四路向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李景林、张作霖等部进攻。

早在1927年春，新败之大军阀孙传芳的部下陈调元率部归附了蒋介石，在浦口编为国民革命军三十七军。同时编成政治训练处。少将处长吴兴亚，上校秘书王君培，下设总务、组织、训育、宣传等科，共约80余人。虽然人数不多，但分成三派一系：吴兴亚从家乡找来一批湖北人；王君培找到他的一批吉林老乡；由于王君培的老婆史曼冰是湖南人，因而又带来了一批湖南人。另外由黄埔同学会派来13个分属第三、四、五、六期的北方籍同学，因此形成三派一系。王君培势力较大，他是黄埔一期毕业

生，是黄埔系和吉林派的头，外加他老婆拉进来的湖南派。可是吴兴亚曾随从孙中山当过录事等职，又兼任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他这一派认为出路很多，对政训工作满不在乎。吴兴亚虽兼政训处工作，但每月只是干领一份少将薪，安排一批同乡而已。王君培实际负责。总务科由湖南派一手包办。王君培每月的薪饷、空额、公杂费、宣传费尽量节省下来装入史曼冰的皮包里。黄埔系分掌组织训练、宣传工作，三、四期的摆老资格，五、六期的觉得学术科比他们学的多一些，因而互不服气。吉林派多属在北京将毕业的大学生，只能谈一些空理论，实际工作拿不出什么办法来。然而牌子、架子总是端着。既然有这些派系，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原来有几位女士，不久，即被几位领导人择优占领去了。如王君培占领了史曼冰，中间有过许多波折。王君培恋爱胜利之后，为了减少矛盾，政治工作人员清一色是男士。

陈调元初对政治工作很害怕，认为这都是蒋介石的耳目，有事无事常报告，与他私人利益恐怕受到危害。他认为这是真革命的青年，于是采取敬而远之态度。但陈调元毕竟是官场老手，人情世故吃得透，他常请王君培和科长们吃饭，赠给王君培马和枪，试探这批“革命人”，看是不是贪吃爱财？结果，他觉得这批人没有什么两样。因而他拉拢王君培获得成功，而这批政工人对陈也表示了好感。

## 二

陈调元担任第一集团军的右路指挥，由浦口乘火车到徐州，即转由晏城、蒙阴、莱芜、章丘等县进军到济南会师。沿途多半是山地，人民很困苦，高粱面的煎饼，掺一半的榆树叶子，这是张宗昌督山东的结果。以上各县是张宗昌所部范花脸的一师分驻，望见青天白日旗就跑，把纸老虎误认为是真老虎。由晏城到济南，他们不知为什么打仗？为什么死？不能掌握命运。政训处

到徐州后，除留少数在军政训处外，其余均分派到各团，担任政治教育。任务是：沿途贴一些五颜六色的标语；如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贪官污吏，不扰民、不害民，“蒋总司令万岁”，“国民党万岁”等等。此外，每到一村，即在晚间召集不服劳役的老头子、小孩子们听政治工作者的讲话，同时唱起歌来；老一套是：“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军队休息时也唱这个歌子。这是唯一的歌子。起初士兵们觉得青天白日旗比五色国旗不同的地方，这边有贴标语和唱歌的人，并作总理纪念周，那边没有。时间长了，均感到标语和歌子与事实完全不符，是放空炮、说空话。但是每月领薪饷，不贴标语、不唱歌还有什么工作呢？

到济南正打算庆祝北伐军占领山东的胜利，吓唬老百姓。可是不到两天的工夫，日本鬼子由青岛登陆，向济南挺进，借口支援张宗昌，保护胶济路。三十七军奉命退出济南。日军占领济南后，即大事屠杀，造成“五·三”惨案。外交官蔡公时向日军交涉，为日军割去鼻耳，凌辱致死！蔡公时至死骂日本鬼子，很有民族气节。

三十七军退出济南后，沿德州向河北沧州一带前进。还是尾追张宗昌的残军。到马家园附近遇褚玉璞队伍，打了一仗。相持了几天，这时冯玉祥的队伍李大璋师由河间府侧面夹击。直鲁联军撤退至天津小站、北京一带。

北伐军前敌总指挥是白崇禧。三十七军从杨村西绕过宝坻县、宁河县、崔黄口等地迂回包围天津。同时北京直系军阀队伍被二、三集团军压迫，放弃了北京，一部分向热河撤退，一部分向天津集合。一、二、三集团军会师北京地区。这时直鲁联军又放弃天津，向唐山一带撤退，未等开火，又撤至滦河以东山海关以西的三角地带，拟负隅固守。三十七军进驻滦县西南塔村。这

时已是凉秋八月，双方相持约一个月。奉系与蒋介石秘密沟通，奉军张学良易帜，挂了青天白日旗。因而奉军保住了山海关和东北，并不准直鲁联军向关外撤退。在这内外夹攻的形势下，直鲁联军的褚玉璞、李景林、张宗昌等均离队潜逃。所有队伍由第一集团军收编。张宗昌只身逃亡大连，遗留下来一排老婆（张的老婆共有 40 多个）和一营白俄兵。滦河东岸所有的阵地，完全用盐袋子修筑的，他们由天津撤退时，所有沿途盐滩掠夺一空！大量征用民间运输盐袋等物资。因而在滦河以东，山海关一带到处是死人、病人、死马、病马、瘦牛。牛马 10 元钱一头，盐每袋 1 元钱，部分作为胜利品处理了。这时候校级政工人员，也均骑上了马，佩带上手枪。由于各团领导私卖了一些战利品，因而政工人员也分得一小部分赃款。

### 三

胜利后，在滦县阅兵，白崇禧吹了一阵，攻击蒋介石是非不明。当然为黄埔系作了汇报材料。次日，三十七军即开赴北京整编。政治训练处驻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前江西督军李纯的旧宅，非常宽阔，80 多人住着很松快。这时政训处派在各团的政治教官，统调回政训处整编。因为政训处工作是蒋介石的情报网，所以完成这个工作是主要的。其余做多做少不是蒋介石的要求。在北京驻了 3 个月，终日无事做。80 多个政工人员，有三分之二染上了下淋症。一年北伐中每人发双薪（特殊待遇），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大部分消耗在酒饭茶肆、烟馆娼妓中。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革命，他们失去了勤劳、朴实的品质。他们认为这是革命的最后胜利，应该来享受，至于祖国建设，谁也没想。蒋介石也没有这样想。中间虽确有几个要求革命的，也开始对革命有了怀疑，这种革命与打倒的军阀有什么区别呢？实际蒋介石是口喊革命，实反革命，还不如军阀公开反革命那样坦率

呢！陈调元向政工人员讲话说过：“革命不是吹牛，革命要有兵权，我没有兵权，我能当军长吗？”这样更启发人们对“国民革命”有了新的认识。1929年1月，三十七军军长陈调元任山东省主席，该军编为四十五、四十六两师，四十六师师长范熙绩驻胶东一带，四十五师师长阮肇昌驻济南泰安一带。王君培任四十六师政训处主任，不久又兼任由冯玉祥部叛变来的石友三，即归蒋编的十三路军政治训练处主任。由于石、王皆是吉林同乡，所以蒋为了拉拢石，对王的活动费一次就给了2万元。蒋介石说：“我们做大事业，不在乎几个小钱。”以后听说冯玉祥部阮玄武归蒋时，一次就送给阮10万元。吴铁城到东北活动时，蒋告诉他的锦囊妙计，就是要对张学良附近有用的人均要花点钱。因此，山西代表赵戴文、冯之代表黄少谷对张学良的拉拢工作均因钱少而告失败。蒋介石的手法是上海交易市场“买空卖空”的手法。

（1961年）

## 龙潭战役片断回忆

张文鸿\*

—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军长，遗第一师师长缺，派李明瑞升任。第一师辖第三、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等4个团，团长分别由钟毅、胡天乐、王赞斌、陈济桓等人担任。我原在第一师司令部当上尉副官，从李明瑞接任师长后，我就得升为少校副官。在南京附近栖霞山和龙潭两役中，我始终跟随李明瑞在战场上指挥第一师与孙传芳部进行战斗，为时约7个昼夜，极为剧烈。兹将战斗经过忆述如下。

1927年5月间，第七军各师从安徽之芜湖和当涂等地继续北伐，在合肥市属之梁园一战，将张宗昌之第七军许琨部击溃后，一直追击经过临淮关、固镇以至徐州和鲁南的枣庄才停止。第七军第一师则驻于徐州及其附近补充训练，为期约一月余。嗣因宁汉分裂，第七军奉命回师南京，拱卫首都。此时孙传芳残部亦尾随我部南下，有渡江袭击南京的企图。因此，第七军为了肃清长江南岸的不稳部队，即于是年七八月间派第七军第二师李朝芳部，将原由孙传芳旧部改编过来之王普的二十七军缴械于南京下关。

1927年8月底（即阴历八月初），孙传芳军开始从浦口及长江下游分几处渡河。由于第七军警戒部队过于疏忽，敌军一部已经渡过八卦洲登陆，并未被察觉。我军被敌人攻击，仓促应战。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第一师少校副官。

不久守备乌龙山之二十三团罗浩忠部（记得系属于第七军第三师所辖）败退，乌龙山为敌攻占，一时南京为之震动。后来第三师钟祖培协同十九军第三师之一部反攻，将敌军约千余压迫于八卦洲而歼灭之，于是乌龙山被我攻下。与此同时，栖霞山为另一股敌人占领，威胁南京东北面。第七军派第一师李明瑞师长率领所部四个团出尧化门驰往栖霞山（距南京约 20 里），攻击占领该山之敌（约 2000 余人）。以十九团胡天乐部及二十团王赞斌部向山上之敌军仰攻。由于敌军占领该山后，构筑了简易工事，而且地形非常复杂，不利于我军前进。攻击开始后，我受到敌军之顽强抵抗，激战约半日，进展缓慢。所幸山高死角大，士兵伤亡不多。李明瑞看到正面强攻，与我不利，另派了一个加强连，由本地人带路绕道从山谷小路袭击敌军的左侧背。乘敌军慌乱之际，我正面部队一举突破敌军阵地。敌军纷向南面山下逃跑，我以火力追击，敌军感到逃生无路，均弃枪愿意缴械，我遂将敌全部歼灭。是役缴轻重机枪 20 余挺，步枪千枝，敌除伤亡约百余名外，全部被俘。我方亦伤亡约三四十名。战斗结束后，当日下午即将所虏获战利品及俘虏，分别由第三团和第二十一团押解回南京。师指挥所及第十九团、第二十一团当晚因火车不敷分配，暂在栖霞山上下及车站宿营或露营。

翌日，各部正集结在栖霞山车站等车开回南京，约于上午 9 时左右，忽闻东方离我十余里外之龙潭方面传来密集枪声。李明瑞当即命我和王荣（上尉副官，曾充俞作柏卫弁长，江苏高邮人）乘快马飞奔前往侦察情况。我们刚到龙潭车站附近，有第一军二十二师师长涂思宗（涂系广东梅县或兴宁人，番号和职务或许有错）立即迎上来问我：“你们是哪部分的，是不是第七军”，我答：“我们是第七军第一师，我是前来探问你们这方面的情况，并同你们取得联络的。”涂听到我的口音属两广方言，改用广东白话将龙潭附近战况告诉我，他说：“我们从昨天中午起，就同

此间偷渡之敌开始接触，因为我们的部队不多（好像说是两个团或三个团的样子），而且龙潭离长江边尚有10里之遥，仅能派出少数部队到江边担任警戒。敌人偷渡的队伍渡河点多，防不胜防，现在江边一带村落，发现了敌人约二三万众。昨天忽然急向我方攻击，自开始接触到现在（那时已是中午过了），双方互相冲杀，逐村争夺异常剧烈，死伤甚大。迄今我们正面临支持不住的模样，现拟退守龙潭及车站附近，以待增援。请你赶快跑马回去，向李师长报告，请他马上派队前来救援。”我立即策马驰回栖霞山车站，将龙潭危急情况向李明瑞报告。李即决定：一面将龙潭情况报告夏威军长，请速派队前来龙潭增援；一面亲自率领第十九和二十两团急向龙潭前进。

当我师到达距龙潭车站约二三里地（无地名）一小河时，遭到龙潭车站南面黄龙山的敌人射击。李明瑞判断第一军涂师已放弃龙潭车站向东败退，当即令十九团停止前进，沿小河西岸稍退回百余公尺，在各小高地占领阵地，并构筑简易工事，准备迎击向我进犯的敌人。二十团则控制于铁路南侧丘陵地带，等待我后续部队的到来，再作攻击部署。此时，远远听闻东南方向有密集枪炮声，判断敌军主力已向镇江方面追击第一军涂思宗部无疑，但仍无法侦知究竟有多少敌人已渡过南岸。而敌人留在龙潭及其附近一带高地的部队，估计顶多一个师约万人左右，其任务显然是掩护其主力向东面追击的安全。孙军曾在江西箬溪、德安、王家铺、九仙岭等战役为我第七军击溃，在吴城镇及马口两地为我缴械各2万以上，对第七军作战的勇猛十分畏惧，而且他们估计到同时进行两面作战极为不利，因而不敢贸然向南京攻击，对我方仅取守势。这样就给我军取得充裕时间，从南京调来七军主力和十九军1个师，次日各部先后到达前线。此时我军共计4个师约3万众，由七军军长夏威统一指挥。

## 二

当晚，夏威即下达命令，决于翌日拂晓开始向龙潭方面之敌攻击。十九军陶钧师为右翼队，担任向青龙山之敌攻击；第七军第一师（4个团）为中央队担任向黄龙山和龙潭车站之敌攻击；第七军第三师钟祖培部为左翼队，右接中央队自小河向北至长江边相机渡小河攻击河东岸一带村庄盘踞之敌；第七军第二师李朝芳部（是否整个师不大清楚）控制于铁路南侧某地（地名已忘）附近为军之预备队；军炮兵营（营长李某，全营官兵原系在江西被俘孙军改编成的）置于中央队归师长李明瑞指挥；军之攻击重点指向黄龙山。关于中央队之攻击部署，李明瑞作了如下之决定：以二十一团派得力营长率兵两连在中央队之右翼前进，由黄龙山南麓攻击黄龙山之敌，右面与右翼队陶钧师联络，左面与十九和二十两团主攻部队密切联系，掩护主攻部队右侧之安全；以第十九团、第二十团为主攻部队，向黄龙山西麓前进，到达黄龙山脚敌人射界之死角处停止，先由十九团向黄龙山上攻击（因山势甚陡，不能用两团兵力同时展开攻击）。待突破敌阵后二十团立即加入第一线扩大战果，追击敌人；第三团派一个加强营（即该团第三营，营长罗元勋）向龙潭车站攻击前进，其余团主力则沿小河由铁路向北延伸约500公尺，相机渡河攻击东岸村落内的敌人，并与左翼队第三师保持联系；二十一团（欠一个营）为师预备队，位置在炮兵阵地后某村落，并掩护炮兵团之安全；军炮兵团乘夜色从上游渡过小河就指定地位置放列，以火力集中于黄龙山顶敌人主阵地带炮兵阵地及敌方指挥所，支援十九、二十两团向黄龙山的敌攻击。

是夜月色朦胧，各部均于翌晨2时左右开始行动，进入攻击准备位置，炮兵亦已放列完竣。拂晓，攻击开始，我第二十团先向黄龙山之敌攻击，进展迅速，战约1小时即将山腹之敌击溃，

占领了山腹一带良好地势（在敌人视线之外，尔后此处为两团轮番攻击敌人的换班点）。午间，二十团继续向山顶攻击，山腹以上，山势颇陡，仰攻极为困难，进展迟缓，及至离山顶约五六十公尺处，地势颇缓，即为敌之主阵地，战斗剧烈，二十团伤亡甚大，因而攻击受挫，败退回到山腹处，重新整理。黄昏前再度向上攻击，亦被敌击退。第三团加强营于拂晓时沿铁路两侧前进，向龙潭车站攻击，因铁路线完全暴露于黄龙山前，受到山上敌人火力之控制。同时，龙潭车站之敌，构筑了坚固工事，因而，第三团加强营反复冲杀，均为敌人火力阻止，伤亡亦甚大，被迫停止攻击于车站西面约200公尺小丘陵地带整理。

第二天轮换第十九团担任攻击黄龙山顶之任务，当日两次攻击，亦和二十团一样，攻到敌主阵地时，均败退下来。两次攻击，较第一日战斗更为激烈，十九团第三营营长萧兆鹏腿部受伤，第二营营长邓祖余阵亡。我想定是敌人第一天晚上增加了兵力加强火力之故。第三团加强营是日曾作一次猛烈的进攻，亦为敌人火力压制，不能进展一步，只得退回原地。营长罗元勋亦于是日阵亡。晚上，我曾试图夜袭敌阵，终以敌人防备严密，未能奏功。

两天来战斗失利，李明瑞检讨失败原因，认为是我炮兵的协同太差，不能发挥火力支援作用。因为该营官兵均为孙军的人，不愿与孙军作战，射击时每每将射向改变，曾有过几弹落于主攻部队右后空处。因此，李明瑞对于第三天的攻击部署，略有调整。我中央队右翼之二十一团的一营，原来仅派两个连，应将该营其余两连增加，参加第三天的攻击；以师预备队二十一团一个营增加于主攻部队方面，归十九团团长胡天乐统一使用；炮兵方面，派师部少校副官张文鸿率手枪一班前往指挥。

第三天，李明瑞亲自到达第一线十九、二十团处指挥，官兵为之鼓舞。旋即率手枪连到炮兵阵地亲自指挥，李明瑞与我两人

皆是炮兵出身，遂各担任一门炮的射击，其余各炮均令该营营长、连长亲自瞄准射击，照我们测定的射程，并经检查后始准发射，8门炮一律指向黄龙山上敌阵。经我一小时连续不断的射击，敌人主阵地带工事受极大的摧毁，其山顶的亦受到我炮火之压制而停止还击。此时，我步兵各连已接近敌人主阵地前沿，正在此时，逡巡于长江之英国兵舰，为了援助孙军作战（在这以前8小时，曾炮击我师指挥所及炮兵阵地多发，但均没命中，我无损失），看到黄龙山顶一片尘雾，以为我军已占领山顶，遂向黄龙山顶连发五六炮。敌军受此强大火力轰击，死伤累累，敌方指挥官亦被击毙。在敌军陷于混乱之际，我军乘此有利时机，一鼓作气冲入敌之主阵地，敌人仅有零星抵抗。我完全占领之后，旋即冲上山顶。敌人纷纷溃退，逃下龙潭车站和龙潭镇内，我军遂完全占领黄龙山。此时攻击青龙山之十九军陶钧师的梁瀚嵩团亦攻占了青龙山，敌人亦逃下龙潭镇内抵抗。是时我师第三团的加强营看到有利时机，即向龙潭车站猛攻，车站守敌已呈慌乱状态，我第三团部队不久亦攻克龙潭车站。敌人向铁路以北溃退，逃进村落继续抵抗，而逃至龙潭镇之敌被十九军第四团梁瀚嵩部衔尾追击，纷纷溃退，于是梁团又占领了龙潭镇。因为铁路以北至长江边均为平坦地，村庄甚密，且到处都是水田，道路很窄小，纵横不一，据守村落敌人之火力完全可以封锁我军的前进路。当日下午，我军进展困难，是晚暂停攻击，均在铁路线沿线占领阵地，与据村落之敌彻夜对峙。

第四日拂晓，我师与十九军陶钧师同时向铁路以北各村落之敌展开攻击，经过3个小时的艰苦战斗，与敌一村一村的争夺，进展迟缓，仅能攻占约十余个村庄，双方死伤均大，形成村落与村落之对战。我方因连日激战，伤亡太大，所有预备队均使用完，因而攻击力减弱。当午，夏威军长到达黄龙山指挥，李明瑞将中央队作战经过及当前状况当面报告，并建议请第七军能够

增加一部到中央队方面来，协助继续向敌人村落攻击。夏威即令其军部警卫团团长李少杰（绰号李黑鬼）率该团加入中央队归李明瑞指挥作战。该团手提机关枪和轻重机枪较一般团齐备，火力亦较强。李少杰团到龙潭车站后，李明瑞派我带路引李少杰团跑步前往十九团占领之村庄，归胡天乐团长指挥。但经过路均为敌人火力控制地带，到达前线村庄时，李少杰团伤亡官兵已约六七十名。午后约2时左右，我军前线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激烈，我军因增加了生力军，一举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数处村落。同时我左翼之第三团主力以及左翼队第三师，均越过小河向敌之右侧猛攻，夹击敌人。至此，敌人全线崩溃，均向江边逃命。此时，敌人已没有有组织的抵抗，沿途弃械投降者甚众。我军追击至江边时，准备抢渡过江之敌人，看到我军追到，纷纷跪下求饶投降。尚据在村落之敌军，感到逃跑无望，架枪吹号表示愿意投降。至此战斗即告结束。

### 三

龙潭战役经过四天三夜搏斗，由于我军不计牺牲，前仆后继，勇往直前，终于摧毁强敌，挽回了南京的垂危命运。

龙潭战役，双方死伤极重，尤以敌方为甚。据记忆我方死伤营长如邓祖余、马庆华、罗元勋、萧兆鹏等约10员，其余连排长以下官兵约4000余人左右。敌方伤亡情况，实属无从确查，当时据俘虏官兵口供，得知其渡过南岸者约五六万人，被俘约一万五六千人，收容受伤的约4000人，打死和淹死约2万人。尚有2万人左右可能是逃回北岸和化装逃跑者。双方死伤之重，为北伐各战役所少见。

当敌人投降缴械时，我曾随胡天乐团清扫战场，遍地尸体横陈，腐臭难闻，令人掩鼻。我方派出卫生人员掩埋阵亡将士尸体，耗时旬日始竣事。事后据说地方派出掩埋队掩埋敌军尸体，

耗时月余，战争的惨烈可以想见。1928年，我们在武汉，据一些友人从上海来说：“龙潭战后已逾年，车经龙潭车站停车，臭气仍很浓烈。”可谓惨矣！

是役我方共缴获各种枪炮约2万余，我军官兵缴获（私藏不报之手提机关枪和各种手枪除外）步枪、轻重机关枪和各种大小炮，大部分（约万余）收集于某村落内民屋待运，并派第三师十四团担任守护。该团团长费维富（广西荔浦人）恃有战功骄傲，竟置命令于不顾，将队伍移驻于没有尸臭的东面村落去宿营，因而这批枪炮无人看守。此时第一军何应钦部队亦在十四团靠近村落宿营，看见这些枪炮无人看守，乘夜派人搬走半数以上，十四团发觉时，已经来不及追回。后来军部追究责任，十四团团长费维富受到撤职查办的处分。

我们胜利后，仍回驻南京城内，据留守人员谈，当龙潭战事紧张进行阶段，市内盛传孙军要到南京度中秋佳节。一般士绅商民，纷纷准备五色国旗拟迎接孙军入城，所有国民党中央各部以及军队留守人员十分恐慌。有些比较高级的官员，早已逃往杭州、上海，未逃的人员也准备便服随时逃避。

还有一点值得叙述一下的是，龙潭战役结束之后，南京国民政府所在地安定下来了。新桂系首脑为了纪念北伐以来各战役牺牲的官兵，在紫金山（当时还没有中山陵）附近建立了一座“第七军阵亡将士纪念塔”，规模不怎么大，但颇雄伟。嗣因蒋桂分裂，新桂系垮台，蒋介石窃据了中央政权，竟将“第七军阵亡将士纪念塔”拆毁。

（1964年）

## 蒋介石对谭延闿系的利用和排斥

李家白\*

蒋介石自从骗取孙中山先生的信赖，从而获得军事大权以后，一意在军队中结党营私，排斥异己，以巩固其独裁统治。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共产党员领导或参与的部队视若仇雠，固不待言；在国民党系统的部队中，他也一贯采用扩充嫡系并以收买、利用、挑拨离间、借刀杀人、以至以武力吞噬等等办法，排斥或消灭异己。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以及粤系、东北军之交恶，以至造成连年的军阀混战，主要原因在此，这是尽人皆知的。即使是比较接近蒋系并一贯为其忠实服务的杂牌部队，也难免被排斥、消灭的命运。

我自1923年随谭延闿所部湘军入粤参加革命，直至抗日战争时期，均在谭延闿系国民党军队中任职。回忆所及，就亲身经历及见闻，将蒋介石排斥异己的种种阴谋记述于后。

—

谭延闿自接受孙中山先生节制后，1923年秋，以建国湘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宋鹤庚、鲁涤平、谢国光、吴剑学、陈嘉佑等部号称五个军由湘入粤（当时我任宋鹤庚部团长）。在始兴击退了北洋军阀方本仁的进攻，然后参加东征陈炯明之役，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1925年，建国湘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当军长，鲁涤平为副军长，辖第四、第五、第六师及一个教导师，我任第五师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已经篡得军政大权，

\* 作者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五师参谋长。

自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将其嫡系两个教导团扩编为第一军。编制与各军相同，而且装备特好。我所在的第二军全军仅有步枪 1 万枝。第五师有 3 个团、1 个特务连，每团 3 个营 1 个机枪连，每营 4 个步兵连，每连只有“七九”、“六五”步枪 80 余枝，全师约有步枪 3000 枝及极少数的马克沁机枪。

1924 年北伐前夕，苏联援助大批枪械，均被蒋介石控制。由于曾布洛斯基任第二军顾问，力为争取，我第五师才分得俄式步枪 1000 枝、机枪 10 余挺，换下一部分缺少弹药的“六五”步枪和不堪使用的“七九”枪，实力稍得增强。北伐军去江西前夕，因弹药不足，我奉命赶回广州，因蒋已出发，才面请总参谋长李济深批发子弹 10 万发。自此以后，直至 1938 年，除武汉政府时期一个短暂停时间外，我部均在蒋介石隶属之下，参加了无数次的内战及抗日战争，从未见蒋介石给予一械一弹之补充。这种情况本难令人置信，然而事实确属如此。因此，我们也不得不另想办法，补充战役之消耗。

我师北伐，在吉安击败了北洋军阀蒋镇臣师，缴获步枪 1000 余枝、小炮 10 门、“七九”子弹 4 万发；随即又在南昌城郊歼灭蒋师残部，缴获步枪 2000 余枝、机枪 10 挺。1929 年，蒋桂混战时，在鄂西截击桂系李宜煊师，又缴获大量械弹，均不上报上缴，不仅陆续补充了历次战役的损失，且有剩余。师长谭道源命其亲信成立修械所，将破烂武器修好出卖，还生财不少。

原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首脑谭延闿、鲁涤平、谭道源等都是典型的官僚，只图个人享受，既谈不上有什么革命理想，也没有强烈的事业野心，自北伐前改编隶属蒋介石指挥之下，就采取了唯命是从的态度。宁汉分裂初期，第二军虽因俄顾问及共产党揭露蒋介石之反叛事实和一时利害之冲动由南京折回武汉方面，曾经奉命在鄂西击退杨森的进攻，对保卫武汉起过一定作用。但随即附和汪精卫之流，背叛了革命。谭延闿且悄赴南京，把第二军

投入蒋介石怀抱；在反共战争及蒋介石对冯、阎、李、白及粤系军阀的混战中，一贯充当了蒋介石的忠实走卒，真是无役不从、唯命是听。

在国内一切政治军事动乱中，二军系统的将领从来没有也不敢背离蒋介石，或有任何违背蒋介石意旨的表示，不敢与反蒋势力有任何勾搭，在杂牌队伍中，可说是唯一没有与蒋介石发生过摩擦的部队。谭延闿且将其女嫁给蒋介石的亲信陈诚，借此裙带关系，也有助于加深彼此的信赖。尽管如此，第二军系统各部始终未能争取列入蒋介石的嫡系。平时被克扣饷粮，不给补充，情况已如前述。与其他杂牌部队一样，第二军也一直受到歧视排斥，终归被其吞噬消灭。第二军教导师陈嘉佑部在武汉政府时代一度扩编为第十三军；1929年蒋介石对部队实行缩编，第二军及第十三军又被编为十八师及五十师；他的嫡系各部则名为缩编，实际不断扩大。1930年第一次反共围剿之役以后，十八师、五十师实力大为削弱；加上戴嗣夏的四十六师，合编为二十二军，以原五十师师长谭道源为军长（我随调军部参谋长）；实际上由蒋介石及其南昌行营直接指挥到团。军部对各师人事、编制、给养、指挥，均无权过问。所领军部编制虽与嫡系各军同样庞大，但每月仅发经费1200元，零用也不够。谭道源领了这个军长空衔，干脆不要什么编制，只带几个随从，迁驻高安、武宁、宜春一带，闲谈打牌消遣。更滑稽的是拨归二十二军建制的四十六师师长戴嗣夏始终没有来军部和我们见过面，有时，连他的驻地我们也不得而知。这当然是蒋介石的又一套把戏。

## 二

蒋介石对付杂牌军队的常用手法是，有用时，拉拢、收买、利用；不用时，歧视、排斥，挑拨离间，借刀杀人；一有机会，就把你吃掉。原二军系统的部队是杂牌中比较接近蒋介石的，二

军首脑谭延闿、鲁涤平之流，依靠蒋介石做了大官，连继承他们的谭道源也博得一个国民党中央监委的头衔，蒋不时对他有所馈赠。但蒋介石对他并不放心，除经常派有特务监视外，每当政局动荡之际，总要派人以点验、视察、联络为名，来到部队，实则密加监督或者同时用重利收买，使你为他出死力。据我所知，例如：谭参加蒋介石对冯、阎之战，蒋曾密赠谭道源特别费 10 万元，并以许多甜言蜜语表示笼络，1929 年，讨伐张发奎之役，陈嘉佑派人来我部活动，意在劝说谭道源反戈助张倒蒋（陈为原二军老将领，任十三军军长时，谭道源任该军副军长，旧谊甚深。此时，陈参加改组派活动）。蒋介石疑谭有二心，也可能早已获得特务情报，几乎同时派人赶到谭师进行“安抚”监视；一方面，又示意陈济棠代他密赠谭道源 10 万元。谭对蒋的用心非不深知，但他本无二志，乐得因势利用，以图自保，终于谢绝陈嘉佑，助蒋讨张。但一旦战役结束，蒋介石目的已达，就把他打入冷宫，连所受损失也不过问了。

蒋介石排斥消灭杂牌军队的阴谋手段，绝非我们身受者所能罄述，就我见闻所及，还可以举出一事。

1929 年春，谭道源师驻湖南常德时，何键勾结桂系向谭师进攻，谭退处湘西，旋奉蒋介石命，自湘西出鄂西截击由武汉溃退的桂系部队。5 月，谭师在宜都、枝江与桂系李宜煊师作战。李宜煊等原拟觅路窜回广西，蒋介石因恐桂系窜回老巢，留下后患，故命谭师截击；但又恐谭师力有未逮，不能完成任务，故又令贺国光代表他驰往李宜煊处告以蒋意：“只要李、白退出武汉，消除割据局面，对李、白所属桂系各军一视同仁，决不追究，你们都是国家军队，当可留下，听候安置，不要有何顾虑。”李宜煊表示接受。后突被我师攻击，李愕然质询贺国光，贺无以对，但说：“我也不懂，大概是误会，我马上打电话去问个清楚。”并说要制止谭师进攻，他却借故丢开李宜煊走了。谭师攻击李部，

激战不克，电报南京，向谭延闿告急，谭以告蒋介石，蒋答：“打不下，就算了吧！”及至谭延闿复电到我师，我们已将李宜煊部解决。捷报到京，谭延闿又以告蒋，蒋表示极为欣慰。谭延闿电复谭道源师长，大意说：你们坚决敏捷完成统帅使命，又能不暴露统帅意图，极蒙嘉许云云。由此可见，蒋介石处心积虑，消灭异己，是不择手段的。李宜煊固然受了骗，谭道源也没有得到好处，只从李宜煊手里夺得大量械弹。蒋介石明知我们虏获不报，他也就有功不赏，彼此装糊涂算了。

(1963年)

## 宁汉分裂和宁汉合流时的航空部队

曹宝清\*

### 一、初到武汉航空处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队随西路军北伐，10月光复武汉，11月航空队改组为航空处，以党代表张静愚①兼处长。原有飞行人员多已回粤，张即罗致北方飞行人员，这时有南苑航校三期的胡百锡、四期的李锡哲、李锡舰、严瑶圃、石宗翰、晏长祜、李云鹏等常与李大钊先生联系，经介绍到武汉航空处，被张任用为飞行员。他们听说我和欧阳璋、高在田由绥远回到北京，张派严瑶圃来京邀我们到武汉航空处参加工作。我们问武汉航空处情况，严说：“航空处改组不久，以原有的飞行员多已回粤，张处长想邀北方飞行员人员加入。武汉现有俄制‘地海威仑’飞机两架和英制‘爱弗楼’飞机一架，有飞机人员约10人。”我认为飞机只有3架，飞行人员10人已不少，我们3人全去，不好安排。商量结果，由高先去，我和欧阳等飞机多时再去。12月底高到武汉航空处，张任高为飞机队队长。1927年1月底，高给我来信说：张处长希望我和欧阳也要早点去。这时北京已成恐怖状况，我们起程，除告知家人外，其他人都不知道。

\* 作者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飞机总队长、航空处副处长。

① 张静愚：山东省人，出身清华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在中国招募华工，去当翻译。回国后，历任广州航空局航政处处长，国民革命军航空处党代表，航空处处长，南京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处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司令部司令，军政航空署副署长，税务署署长。

我和欧阳于2月中旬到达武昌，同高会见张静愚，张说：这里飞机目前虽然不多，但北伐军进展很快，一俟到达南京后，将有飞机战利品，想早点准备，先成立飞机总队，下辖两个飞机队。看他有因人而定编制的意思，我说：莫如等飞机多时，再成立飞机总队，较为好些。过了几天，接到委任令：任我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飞机总队长，欧阳璋为总队副兼飞机第二队队长，高在田为第一队队长。这时国共合作，飞机和机械人员都有一部分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每日练习飞机和学习，大家相处都很好，只因飞机少，不能得到充分的飞行练习，都盼早点解决飞机的问题。3月24日收复南京的消息传到武汉，大家欢欣鼓舞。我向张静愚建议：孙传芳在南京曾设有江浙闽皖赣五省联军航空司令部，司令是顾荣昌，下辖两个飞机队，队长是张维、耿煜曾，他们都是南苑航空学校三期毕业，与我和欧阳璋都是同期，高在田和他们也很熟，最好派欧阳和高往南京接收。张很同意，即派他们两人前往。当时我以为接收后，会合编为两三个飞机队，分驻南京、武汉两地，不料时局突变，没有实现。

## 二、宁汉分裂后的航空部队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屠杀工人，造成宁汉分裂。4月17日武汉政府、国民党中央罢免蒋的总司令职务，开除其党籍，通令缉办，所部第一集团军归军事委员会直辖。武汉各地贴满打倒蒋介石、打倒独裁主义等标语，各界游行示威，反蒋情绪高涨。张静愚是蒋派，看形势日非，他借赴南京接收飞机的理由，离开武汉。张临走时对我说：“形势发展，不知到何种地步，你先在这里维持，到不能维持时，即去南京。”我说：“看情形再说吧。”张走后，一切照常，也没有人注意。

4月下旬有一天，武汉北伐军在武昌南湖飞机场举行第二次北伐誓师大会，那天参加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唐生智、

邓演达等，他们到飞机总队部的演武厅里休息。我正在张罗招待，有一卫兵进来报告：“邓主任把队旗拔下来摔在地上了。”我赶紧出去看，邓一见面说：“你在这里呀，什么时候来的？”（1918年我与邓同在边防军工兵营当排长，邓是第一师，我是第二师，都驻通州，时常往来，很熟。）我说：“已经来两个多月了，还没有工夫去看望你。”邓说：“你们队旗怎么还没有换呀？”我说：“已经去做，还没有做好。”邓说：“没有做好，不用插队旗也可以。”我就告知勤务把队旗拿进部队收存起来。（原来队旗是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飞机队队部，现在应改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航空处飞机队）邓告诉我，有暇常到他那里去谈谈。

那天在誓师台上讲话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每个人讲话收尾，都喊：“打倒蒋介石”、“打倒独裁主义”等口号。誓师后并在演武厅开了一个谈话会。第二天唐生智、邓演达等即率部队沿京汉线向河南进军同奉军作战。飞机亦由南湖机场飞赴奉方侦察，协同作战。北伐进展迅速，5月初即进驻郑州。

航空处自张静愚走后，没几天，军事委员会即派余域西为副队长，赵某（名字已忘记）为党代表，5月初又发表孙科兼航空处长，这时高在田已由南京回到武汉。孙到任后，先召见所有飞行人员，询问每个人的姓名、年龄、出身、经历等，一面问，一面记。过了几天，即发表一个命令：“兹派曹宝清、高在田、胡百锡赴宁、沪、京、津等地联络航空人员，每人发给旅费五百元。”同时发表“派陈秀为飞机总队总队长”。

我接到命令后，就和高、胡商议，这命令不是派遣，而是资遣，如真为联络航空人员，应有计划、有目的和有安排的办法，是只口头上和人家联络，有什么意义？这是排除异己，促使我们趋向南京去，我们就决定先到南京。当天就离开南湖，我住在汉口交通旅馆，准备住两天即往南京。在启程的前夕，有航空处秘书方抱一（南苑航校一期毕业）来旅馆看我说：“今天晚饭为你

们三人饯行。”出旅馆时，方在我住的房门上，贴一个纸条“我们到某某饭馆（饭馆字号已忘记）吃饭去了”。我们正在吃饭时，航空处的副官（名字已忘记）也来了，让他一块吃，他说吃过了，就陪着谈话。吃完饭我们一起走，将下楼梯，即见有4个配短枪的士兵等着，这时那副官对高在田说：“处长找你到航空处去一趟”，士兵就拿出绳子要绑，我对副官说：“你们有5个人，还有武器，高能跑了吗？请不要绑吧。”那副官说：“不要绑了。”我和高说：“你先同他们走吧，我们明天也不走了，给你想办法。”

我回旅馆后，想今天方抱一请吃饭，是他们布置好的，究竟为什么逮捕高，也不清楚。第二天，我到航空处找赵党代表，问：“为什么逮捕高在田？”赵说：“有人告他。”接着掏出一封信给我看，信是寄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大意是：“高在田在南京受蒋介石的委任为航空司令，派来武汉运动飞行人员，把飞机飞往南京……”我看具名人不认识，好像是假名字，我说：“这是挟嫌报复，请调查清楚，并对高的饮食多与照顾。”高在航空处押了两天，也没有调查、也没有问，就送押军人监狱去了。那时送监狱的案情都是比较严重的。我原想找邓演达想办法，因邓已出发河南未回来，我即先找军官学校武汉分校教育长侯连瀛（1918年我和侯在边防军第二师工兵营同当排长）想办法，侯说：“邓到前方，去不了多久，告密信既是给邓主任的，还是等邓回来再想办法。”

6月中旬，听说邓主任已由河南回到武汉，我即赶紧往见，因会他的人很多，我简单的将高的情况叙述，略谓：“我与高在西北军航空同事，高之为人，心直口快，在飞机队时，有些得罪人，最近航空处改组，可能有人挟嫌报复，诬控他准备将武汉飞机飞往南京，我可负责保证高，决没有这种企图。”邓说：“高在田出来，你们准备到哪里去？”我说：“孙处长给我们的任务：到

宁、沪、京、津各地联络航空人员，可是这次高发生事故，我们不打算到以上地区，准备先到洛阳去。”邓说：“可以”，当即写去两个纸条，一是“高在田着即释放”，一是“发给曹宝清旅费五百元”。我致谢辞出后，即到政治部办理保释和领款手续，至此，高在田算是保释出来了。

6月底，我和高到达洛阳，先访问邓建中（南苑航校二期，在西北军任过航空处长、航空司令）。第二日，同邓晋谒冯玉祥总司令，我先申述去年西北军航空司令部退到绥远归晋军改编的经过，后以争运飞机，无法处理，回到北京，转来武汉，和高被捕禁押及保释的情形。冯说：“你们在绥远的情形，早已知道，听说运到包头的飞机，又便宜奉军了；武汉航空内部的分歧，也是受宁汉分裂的影响。现在继续北伐要紧，应当团结，你们就先在这里住些时，邓校长好好招待。”我们就和邓住在一起，这时洛阳有少数飞行人员，如刘中檀、陈德全、张国宝等，有俘获之“爱弗楼”飞机一架及“高得隆”飞机一架，准备筹设航空学校，邓建中为校长，刘中檀为教育长，并没法补充飞机和招收学员。

### 三、宁汉合流时的航空部队

8月中旬阅报，蒋介石于8月12日通电下野，宁汉合流。我和高在田谈：“咱们来洛阳快两个月了，当客人招待，住长了也不好，这里补充飞机比较困难，原有的飞行人员还没好的办法。我们所以来洛阳，是因为在邓演达主任处为你保释时所决定的。现既宁汉合流，蒋也下野，对邓的顾虑，可以不必了。”高说：“我可以先到南京去看看。”高与8月底到南京，正直孙传芳军队偷渡长江，袭击龙潭。何应钦之第一军由东而西，李宗仁之第七军由西而东与孙军展开激战，飞机队协同军队作战，轮番轰炸，孙军死伤惨重，飞机队第一队队长张维受伤，改派高在田继任队长。

龙潭战役结束后，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sup>①</sup>，以蒋介石下野，改为军事委员会航空处，并进行改组，以张静愚为处长，张意任我为副处长，让高给我打电报征询同意，并嘱迅即来宁，我接电后，即向冯辞行。我到南京时，航空处已改组就绪，处长张静愚，副处长曹宝清，处内分军事、会计、总务三科，一个政治部；金巨堂为军事科长，王子南为会计科长，汪丰为总务科长，凌鄂荪为政治部主任。辖两个飞机队；高在田为第一队队长；欧阳璋为第二队队长。所属飞机有接收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航空司令部<sup>②</sup>的法制“高德隆”机6架；“施来克”水机6架和鲁军遗留下的法制“贝利益”机3架及德制“水容克”机1架。

#### 四、参加西征

1927年8月间宁汉合作，不过是汪精卫政权在武汉叛变革命而与蒋介石政权合流。南京自蒋下野，由桂系操纵成立特别委员会，在武汉之唐生智，以反对特委会为名，派何键、刘型等部沿长江左右两岸至安庆、芜湖，威胁南京。12月20日南京政府下令讨伐唐生智，任李宗仁率第七军等部为西征军总司令。航空处沿江随军作战，成立水飞机一队，以刘国桢为队长，配属“施

<sup>①</sup>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宁汉分裂后，武汉政府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改为军事委员会航空处。蒋介石到南京后，又成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航空处，以黄秉衡为处长，张静愚为党代表。

<sup>②</sup> 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航空司令部：系接收孙传芳的五省联军航空司令部而改编，当时孙联军航空司令是顾荣昌，两个飞机队长，是张维、耿煜曾；所属飞机有法制“高德隆”机6架、“施来克”水机4架。孙军溃退时，所有人员和飞机都聚集上海虹桥机场。1927年3月收复上海时，是白崇禧部先到沪，即将孙军航空司令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部航空司令部。

来克”水机两架、“水容克”机一架，由我率领出发。在未出发前，我先在南京下关码头迤西试飞“水容克”机，试飞几次离不开水面。据机械员说，原来的螺旋桨已裂有大缝，不能使用，乃改用“贝利盖”机的螺旋桨；可能因长短尺寸、角度大小不同，发生不了原有的马力。我让他们研究修理原裂缝的螺旋桨，用麻布和胶缠裹裂缝，他们说，可以照这办法修理。及修好再试飞，情况良好。这时李宗仁总司令已乘兵舰到达芜湖。第二日，我先驾“水容克”机到芜湖降落，见李请示水机队进驻地点，李指示水机队径到九江，而第三军朱培德军长在九江。我将情况电告张静愚，10月28日，我到九江，第二日水机队亦到达，这时李宗仁亦进抵九江。水机队每日派飞机飞赴唐军各地侦察。11月2日奉令派飞机飞赴武汉散放传单，于是日上午，我偕李瑞彬（南苑航校四期）、萧健（科员）驾“水容克”机前往，飞过蕲春时即觉飞机震动，愈来愈厉害，一会儿，又发现有火星子由前向后喷，我就赶紧关上电门降落，这时已在唐军的区域，不能靠近江岸，即落在江中心。下来检查，见螺旋桨靠大轴旁边有鸡蛋大的窟窿，还在冒烟燃烧着，知是修理螺旋桨裂缝时用螺丝钉太近大轴，因摩擦久了而发火，当赶紧扑灭。而正处于唐军境内，需要躲避，从远处喊来一只小船，船老板姓萧，以渔为业，家住韦源口，离此七八里，遂同到老萧家里，躲了几天。我对老萧说：“请你在到飞机降落的地方去看看情况，并时常打听外边的消息，如有情况，请你赶紧告诉我们。”

第二天下午老萧来讲：“飞机自行飘流到江南岸，距这里约有十里路地方，被人用绳系在木桩上，可是围看的人太多，飞机上站满了人。”我想这架飞机算报废了。

11月8日老萧又来讲，听说有许多唐军过去了，一打听果然唐军已经退却。我和老萧说：“你再打听李宗仁总司令现到什么地方。”并雇佣老萧两个人和他的船只，20日拖着飞机，到了

武穴。我见李总司令将飞机失事经过和避难的情形，作了汇报。李说：“想不到飞机发生意外，你们很辛苦！你先在舰上休息，准备一同到武汉去。”这时水飞机队也在武穴，即由队派人将损坏之“水容克”机拖运上海飞机修理工厂去修理。老萧两个人也补在水飞机队当船工。11月15日李总司令乘兵舰到达汉口，受到热烈欢迎。

我到武汉后，接收武汉航空处及飞机队，当时处长是张维，队长杨鹤霄，飞机乃是原有“地海威仑”两架、“爱弗楼”机一架，经改编，连水飞机队，统归第四集团军指挥。

### 五、难忘的“水容克”飞机

1928年1月间，张静愚想添购飞机，苦无经费。有一天缪斌（军事委员会经理处处长）到航空处与张闲谈，提起筹购飞机经费问题。缪说：可用募捐办法，以无锡来说，只要你们飞机到那里降落一次，使群众能看见飞机，我可负责募捐至少10万元。张想10万元可以买中型机两三架，为宣传航空，是个机会。张和我商议，缪处长要求飞机在无锡降落，可是在那里没有陆机场，最好用“水容克”机在太湖降落，该机能坐几个人，视捐款多的人，愿坐飞机，也可带他们飞一回，这样的宣传，效果大些。我说，那架“水容克”机，在西征时，强迫降落于韦源口附近，被老百姓糟蹋得很厉害，每天上飞机的人，把机舱、机身、机翼都站满了，整踩踏一个多星期，各处角度恐有变形，要问王厂长（上海飞机修理工厂厂长，叫王承黻，清华大学毕业后，又到德、法留学），是否还能修好，我准备到上海去，就便先与王一谈。我到上海后，先往虹桥飞机修理工厂找王同到“水容克”机旁，将当时飞机损坏经过讲一下，并说现为宣传航空，要详细的检查，注意机翼等有无变形。王说须经过检查再决定。我住上海东亚饭店，第二天，王来看我说经机械员等检查，可以修理，

连做螺旋桨，约需 20 天左右。我说，可以修理，日期多几天没有什么关系，修好之后，请即与我们去信。

过了两天，我回到南京将修理“水容克”机的情况向张江报，张又转告缪斌，请他在无锡也早作准备。1月下旬接到王厂长的报告：“‘水容克’机已经修好，请派人试飞。”张问我谁去，我说：“我去。”张说：“多去一个人有伴好些，让谢鸣皋也去吧（谢原在孙传芳联军航空司令部飞机队任飞行员，是南苑航校三期毕业）。”我同谢到上海飞机修理厂找王厂长先看看“水容克”机修理的情况，并试试发动机声音也很正常。我对王说：“准备后天试飞，明天将‘水容克’先运到黄浦江去，一切准备好。”到时我同谢试飞，离开水面，没有多高，机头即向左转，改正不过来，幸而转过头来，还落在黄浦江里，算是没出事。下机和王说：“今天飞行很危险，差一点摔在陆地上，飞机毛病很大，起飞后，机头一劲向左转，改正不过来，要设法纠正过来。”王说：“要重新检查，可以修理，约需一个星期，才能修好。”我说，在修理期间，我同谢到杭州去几天，回来再试飞。

届时修好，我同谢第二次试飞，起飞后，机头仍是向左转，较上次更厉害，用尽力量，一点也改正不过来，坠落在水里，飞机摔坏。我们头部受震动很重，当时昏迷，谢还喝了几口水。救急船赶到，把我们两人救上船，赶紧到虹桥飞机修理厂换衣服，当日夜车回到南京。谢因喝了几口水，又以衣湿受寒，经医治十几天，病势转重而死。我头部受震后，有几个月感觉胀痛，医嘱须要有较长时期的休养。

这时国民党中央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兼政治会议主席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蒋又掌握了党、政、军的大权。蒋复职后，准备继续北伐，成立航空司令部，以张静愚兼司令，蒋逵为参谋长，仍辖高在田、欧阳璋的两个飞机队。我留在南京，一面休养，一面照料后方。

在那时期的飞机，都是接收旧机，迄未添购新机。因此，遇有飞机损坏，只要能修理的，总是千方百计的想办法修理，甚至要报废的飞机，亦勉强修理，加以设备简陋，检查粗率，很难达到要求。因为这样的凑合，在飞行时就很容易发生意外，像这架“水容克”飞机，在苏联人驾驶时，即以螺旋桨裂缝而停止使用；后西征时，想办法用布缠、胶粘、螺钉修理裂缝，以磨擦而发生燃烧，迫降敌区，被无数人踩踏十天之久。明知机翼已变形，不能再飞，又为宣传航空仍勉强修理，试飞时，终于坠落水中，几遭没顶。我以头部受震很重，从此不能再服空勤，回想这架“水容克”飞机，我的印象很深，终身难忘。

(1965年)

## 李汉魂枪杀胡谦始末

陈孝伟\*

胡谦是江西兴国人，曾充任大元帅增城命令传达所所长、黄埔军校第三期教育长，是国民党军界老前辈。他统率的十八师是第六军留粤部队。此人贪污腐化，劣迹不少。自从第六军由程潜军长率领参加北伐后，胡谦驻防惠州，独霸一方，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例如利用职权，指使亲信赖俊华组成孙文主义学会以打击进步组织的新学生社，利用地痞、工棍组织的工会和商人的同业公会掩护走私或贩运烟毒。“四一五”清党的时候，胡疯狂地进行血腥镇压，包围机关学校，任意捕杀公职人员和进步青年，造成人心惶惶。1927年第四军回师广东，李汉魂师到达石龙之后，得悉此情，并接受人民群众的控告，毅然以“为民除害”自许，李曾将此情密报张发奎、黄琪翔，申述解决十八师、扣留胡谦，以争取民众，支持和扩充实力的意见。这一意见当然得到野心勃勃的张、黄的嘉许。

当先头部队七十四团进驻惠州的时候，二十五师师部和七十三团驻石龙，七十五团驻博罗，并作出围歼十八师的计划。密令七十四团长黄世途就惠州形势、十八师驻兵地点，进行了解，绘出图说，连同该团驻兵部署上报。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利用当地各界举行欢迎大会的时机，调动七十四团部队，袭击缴械。欢迎大会是由当地国民党党部及人民团体召开的，李汉魂作了“拥汪倒蒋，继续革命和打倒一切军阀，为民除害”的讲话，博得与会群众的鼓掌。当时十八师派政治部宣传科长谢振南参加，谢看见部队移动，神色仓皇，并低声向我询问：“为什么

\* 作者时任第四军炮兵第一团政治指导员。

移动部队?”

欢迎会尚未结束，即开始进袭，几声枪响，十八师驻惠州部队，全部放下武器，胡谦作了阶下囚（当时胡爬上厕所瓦面，企图逃脱）。但由于事前联络不周，七十四团机关枪连与二十五师师部特务营发生误会，向该营乘坐的小轮船开往博罗部队扫射，机关枪声惊动了群众和十八师驻博罗部队，胡部宋士品团闻风向他处逃窜。

胡谦被扣留后，押于公园旁的七十四团团部，他倚老卖老，态度装作镇定，曾对我说：“老夫不知所犯何罪，请转告李师长迅将我送省，听候上级处理。”言毕狞笑。但李汉魂除发电向张、黄请示外，没有亲自审问，也没有军法处理，且给予一定的自由，对外通信未加限制。胡谦于被捕后的第三天，枪杀于惠州中山公园，人皆称快。杀胡后，群众燃放火炮，且有受害人亲属冲上要碎其尸体。

据李明（七十四团参谋长）回忆当时枪杀胡谦的原因有三：

第一，胡谦与蒋介石为日本士官同学（原文如此。——编者），门生故旧很多，系蒋当时留粤的嫡派，解省讯办势将被释，恐贻后患。

第二，抄获白银十几万元，烟土十余万两，是一笔巨额赃物，与他的致死不无关系。

第三，胡谦在东江一带民愤特大，罪该万死，这是就地处死的主因。

李汉魂于枪杀胡谦后，以胡在解省途中脱逃，被押解士兵击毙为词，向张、黄报告了事。据了解，胡在惠州搜刮的孽财不下数百万元，而李汉魂这次枪杀他，也发了一笔巨大的横财，全师官兵也因此换上新衣。人们都为李“敢作敢为”、“名利双收”而奔走相告。

（1965年）

责任编辑：谭天河 林正康

ISBN 7-218-05259-2/K · 1012

全套六卷：315.00元

本 卷： 51.00元